

追溯近现代中国起源与历史

——现代化中国的起源与简史，以及东西方世界

【一个基督徒的视角】

【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现代化起源、历史、思想、轨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法律、民情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文明体系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冲击、影响、等复杂关系】

第五章（上）

2020年9月

目录

追溯近现代中国起源与历史

——现代化中国的起源与简史，以及东西方世界

【一个基督徒的视角】

【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现代化起源、历史、思想、轨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法律、民情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文明体系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冲击、影响、等复杂关系】

2020年9月

===

。。。。。。。。。。。。。。。。。。。。。。。。。。。。。。。。
。。。。。。。。。。。。。。。。。。。。。。。。。。。。。。。。
。。。。。。。。。。。。。。。。。。。。。。。。。。。。。。。。
。。。。。。。。。。。。。。。。。。。。。。。。。。。。。。。。
。。。。。。。。。。。。。。。。。。。。。。。。。。。。。。。。
。。。。。。。。。。。。。。。。。。。。。。。。。。。。。。。。
。。。。。。。。。。。。。。。。。。。。。。。。。。。。。。。。
。。。。。。。。。。。。。。。。。。。。。。。。。。。。。。。。
。。。。。。。。。。。。。。。。。。。。。。。。。。。。。。。。
。。。。。。。。。。。。。。。。。。。。。。。。。。。。。。。。
。。。。。。。。。。。。。。。。。。。。。。。。。

第五章

1937年-1945年

西安事变与抗日战争

【关于西安事变的经过与重大影响和意义，请见本书上章文字】。

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信守承诺，不再把中国共产党当做是匪帮、敌人，而是团结全国开始抗战。从此，中日全面战争的大幕逐渐开始拉开。当时，中国积弱、政治混乱、军事力量散乱；全国虽然名义上统一，但各地军阀实际上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各自为政。蒋介石国民政府所能够完全掌控的军事力量，其实只有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骨干力量的所谓中央军。此时，作为中国政治军事上的名义最高统帅，蒋介石对于中日战争胜利的一个最大战略性贡献就是，在抗战初期就把中日的南北对峙局势，主动地、有意识地、有计划、有步骤地转变为东西对峙局势【即，通过淞沪战役以及后续的一系列大规模的极其惨烈的会战，使得日本进占上海、并进而从江浙向中国西南方向进攻。日本的军事步伐被中国西南的天然山岳屏障所阻。反之，如果日本从东北、华北向南方节节进攻，那么，盘踞在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以及江浙与广东福建的三角洲平原地区的中国大军就可能会被迅速地全部俘获、歼灭，从而导致中国抗日战争的迅速而全面的失败（事实上，这正是1945年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征服整个中国的路线图）】。从而，把日本拖入持久战、僵持战的泥潭之中，避免了日本三个月就全面战胜中国的企图。

【虽然，后来的军事发展形势表明，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军事战役，在之后的许许多多战术问题上都非常失败；但是，从宏观而言，产生了中日全面持久抗战的局面，极大地、尽最大可能程度地、团结了全中国各种力量，为之后的八年抗战、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中日淞沪抗战等大规模战役，使得日军的野蛮暴行暴露在全世界目光之下，显明在一切世人的眼前，罪恶昭彰于光天化日之下。这间接地导致了之后的美国对于日本的制裁和禁运，进而导致了珍珠港事件、美国对日本宣战、英美并肩在全世界范围内与法西斯政权开战、以及八年之后的中国抗战胜利】。

【在1937年以及之后的中日战争中，中国人以可歌可泣的牺牲精神（例如淞沪抗战中的八百壮士），向全世界显明了中华儿女的伟大、真挚、勇敢之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3%E4%B8%83%E4%BA%8B%E5%8F%98

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是1937年7月7日在中华民国北京(北平)西南方向的卢沟桥发生的日本军与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的冲突事件。中国军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战争之作战。

1937年7月7日晚，日本驻屯军在芦沟桥附近演习。驻丰台日军称演习中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遭拒绝后，即攻击城西芦沟桥。当晚10时40分，结束演习之日军称演习地点传来枪声，并有一名士兵叫志村菊次郎“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守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拒绝。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翌日清晨5时许，日军炮轰宛平城。

背景

地理位置

芦沟桥在北京西南郊，跨永定河（旧称芦沟河）上。芦沟桥始建于1189年，成于1192年，长266.5米，宽约7.5米，由11孔石拱组成；桥旁建有石栏，其上共有精刻石狮485个。芦沟桥高10余米，两旁栏柱石狮精工雕琢，形态各异，经马可孛罗推崇，西方人称为马可孛罗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旁另建有新桥；桥东附近宛平城，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从这里开始。

历史背景

卢沟桥事变背景

1901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依《辛丑条约》约定，日本开始在华北驻军。

清廷被推翻后，驻华日军由“清国驻屯军”改名“中国驻屯军”，驻地就在芦沟桥所在宛平城外。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傀儡政权，1932年3月9日在长春成立满洲国。

1935年日本推动华北五省自治，12月国民政府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应对。

从1936年5月起，日本陆续增兵华北，并于6月和9月制造两次“丰台事件”逼迫国军第二十九军撤离丰台。日本华北驻屯军占领丰台后，已经控制北平的北、东、南三面，卢沟桥成为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

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之后，中国不但未发生内战，反使更加团结。1936年12月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千余人在青岛登陆，占领中国国民党市党部以武力搜索，还赴各日营纱厂殴捕罢工工人。12月23日，日本首相广田弘毅在枢密院报告，如果国民政府以容共为条件，与张学良妥协，日本即断然排击。12月28日，关东军声称，倘中国政府接受共产主义与抗日政策，关东军将采任何必要方法，以防卫满洲国及维持东亚和平。

1937年初，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再与冀察政务委员长宋哲元谈判华北经济问题，以南京不同意日方之要求，仍无结果。1月6日，中国外交部向驻华日使馆抗议，天津日机散布荒谬传单刊物。3月，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谈话，谓国家主权必须完整，国际关系必须以平等互惠为原则。蒋介石招待日本经济考察团，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希望日本停止在中国活动。4月1日，日军在上海演习。4月，日本再增兵平、津；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大臣会议，决使华北成为防共、亲日、亲满地区。4月2日，日海军武官与天津会商，议决兴筑塘沽港口。报纸声言扩大塘沽协定及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不令华北“中央化”、“中央集权化”，甚至有驱逐第二十九军之说。4月25日，华北日本驻屯军开始在北平、天津郊区及通县附近演习。5月，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在热河承德，田代皖一郎在天津分别召开会议，加紧压迫绥远、华北。5月22日，汕头日本领事馆巡查青山寻衅闹事，殴伤中国警员；日军调军舰赴汕头港威胁吓，制造汕头事件。6月初，

近卫文麿组阁，广田改任外相，一意将就军人。6月4日，国民政府要求日本拆除天津日军用无线电台。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扬言，为对俄作战，应先予南京政府以武力打击，清除后方威胁。6月25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发表谈话，希望“中国再认识日本”；谓中国须认清日本生存与发展之权利，及满洲国生存与华北之必然联系。

中华民国军方

二十九军

1930年3月20日，中原大战爆发，由韩复榘、孙殿英两部在陇海铁路归德开其端（“中原大战”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等挑战蒋中央政府之内战）。

七七事变前，中国士兵大多是文盲，截至1936年底，全国训练完毕之高中及同等学历之合格预备兵，仅17,490人，专科以上文化程度之候补军官全国仅880人；当时一粒子弹价值约相当于7斤半大米或35个鸡蛋，因此平时训练多为空枪射击，训练素质非常低下，枪法不准。7月初，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北平城外的卢沟桥、长辛店、回龙桥、平汉线等处进行军事演习，制造摩擦。事变时，中国全国75毫米以上火炮只有800多门，其中重炮只有48门。

1937年上半年以前，国军在华北前线驻防只有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一个军兵力，辖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特务旅、2个保安旅，总兵力约10万人，分散于张家口、北平、天津及平绥铁路、北宁铁路沿线，兵力十分单薄。

1937年6月，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〇旅第二一九团第三营（约1,400人）为加强卢沟桥地区防御，将第十一连配置于铁路桥西端大王庙（营部所在地），重迫击炮连置铁路桥西，轻迫击炮连置城东门内，重机枪枪连置城内东北、西南部；并从6月26日开始，实行夜间特别警戒。

至于中国之决计应战，一以势迫出此，日本野心并无止境，如再忍让，不惟华北将为东北之续，且欲求偏安而不可得；二以人心愤激已至极点，中共主战尤力，此次如再不抵抗，内战势将重起；三以中国虽非日本之敌，然以土地之广，断非日军所能全部据有；四以英、美深忌日本势力之扩张，假以时日，国际情势定有变化，彼时如与日本谈判，为害亦较目前为轻，何况中、苏正在谈判互不侵犯条约，短期内可望获得援助。事变发生前，第二十九军军长为宋哲元，副军长为佟麟阁、秦德纯，参谋长为张樾亭，副参谋长为张克侠，总参议为张维藩，兵力编成如下表。

部队	司令官	部署	属下部队	兵力
第三十七师	师长：冯治安	西苑	第一〇九、第一一〇、第一一一、独立第二十五旅	约15,750名
第三十八师	师长：张自忠	南苑	第一一二、第一一三、第一一四、独立第二十六旅	约15,400名
第一三二师	师长：赵登禹	河间	第一、第二、独立第二十七旅	约15,000名
第一四三师	师长：刘汝明	张家口	第一、第二、独立第二十九旅、独立第二十旅	约15,100名
独立第三十九旅	旅长：阮玄武	北苑		约3,200名
独立第四十旅	旅长：刘汝明（兼任）	张家口		约3,400名
骑兵第九师	师长：郑大章	南苑		约3,000名
独立骑兵第十三旅	旅长：姚景川	宣化		约1,500名

特务旅　　　旅长：孙玉田　　　南苑　　　　约4,000名

河北边区保安队　　司令：石友三　　　黄寺　　　　约2,000名

而河北省和察哈尔省中除第二十九军以外的部队（7月上旬）则有第三十九师（师长庞炳勋）、第六十八师（师长李服膺）、第九十一师（师长冯占海）、第一〇一师、第一一六师（师长缪澄流）、第一一九师（师长黄显声）、第一三〇师、第一三九师、第一四一师、第一四二师、骑兵第二师（师长黄显声），总兵力约153,000名。

日本军方

日军强占中国东北地区后，继续对河北省、察哈尔省及绥远省等，施行其武力压迫及政治分化等，造成各种傀儡组织，在冀东有“冀察防共自治政府”，在察北则有“蒙汉回自治政府”；更于各该区积极培养成立保安自治等部队。河北事件发生以来，日军任意作非法演习。日本军部积极作侵华之动员准备。宋哲元与田代皖谈判之时，川越茂亦进见蒋介石有所表示。1936年上半年，日本向华北增兵，强化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设在天津。4月，华北日军开始演习。5月，在古北口等处筑炮台，在北宁铁路沿线派驻重兵。自5月起，日本不断扩充华北驻屯军。9月，强占丰台。

1937年1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提出要给中国“给予致命的痛击”。2月外务省制定《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声言“要对南京政权采取措施”。2月18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在丰台等地驻军；3月24日，日舰70艘拟在青岛大演习，以中国为假想敌。5月22日，日本驻汕头领事馆巡查青山清偕四戈迁入汕硕永平路神州行居住，拒报户口，并殴伤中国警察，遭中方拘捕，日舰开赴汕头威吓，称“汕头事件”；5月25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及广州领事馆为汕头事件向中国外交部及广东省政府提出抗议；5月26日，日本内阁讨论汕头事件，日驻台湾海军军舰奉命开抵汕头；5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汕头事件”发表谈话，说明日人拒不登记户口，且行凶殴伤中国警员，日

本政府训令驻使馆日高代办，第二次向中国提出“汕头事件”抗议；5月28日，中国外交部驻两广特派员刁作谦派秘书凌士芬飞汕头调查日人殴警案，日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竹吉贞治同行；5月29日，中日双方人员在汕头调日人清山清欧击，证实为日人先行凶；5月30日，汕案已查明，日方表示愿就地和平解决，驻汕头日舰已撤退3艘；6月8日，离汕头日舰复折回示威，日舰驶至汕头者增至7艘；6月12日，日本对解决“汕头事件”又复提出新要求；6月15日，日舰违例驶回汕头，外交部特派员刁作谦向日本领事抗议。6月日本集中其河边旅团于北平近郊，驻军根据《昭和十二年度帝国陆军作战计划要领》进行军事演习。6月21日，华北日军驻屯军司令部成立临时作战课，以准备侵华战争。6月25日，日军在芦沟桥附近举行军事演习。日军开始在芦沟桥一带连日举行夜间演习。丰台的驻屯军第1团第3营在芦沟桥附近的军事演习及挑衅活动日趋频繁。日军逐日不断训练、示威，更计划以丰台到卢沟桥一带60多公顷土地建飞机场，要求中国卖出这块土地，中方不予理睬。日军一面向中国地方当局施压，一面增加在卢沟桥一带演习，最初不过每月或半月一次，用虚弹射击，白昼演习；后来渐增到3天或5天一次，改用实弹射击，夜间演习。演习部队有几次想进入宛平县城，被中国守军严厉拒绝。6月28日，关东军司令官、朝鲜总督、南满铁路总裁、华北屯驻军司令官在大连会议，侵华形势，日趋积极。

日本之所以于此时发动战争，一以中国共产党再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容共、联俄之局复成，必须及时遏制，先控有华北；二以中国国力尚待充实，必须早予以挫折，不信蒋介石真有作战决心；三以德、日防共协定及日、义协定已于1936年11月成立，日本已不孤立，英、美不致断然行动。事变发生前，日军中国驻屯军约5,600名（另说8,400人），其中主力驻扎在天津，北平城内以及城外丰台镇各驻扎一支部队。天津驻有步兵第2团主力、炮步独立团、战车队、工兵队、机器化学战队及骑兵队一部。日驻军兵力如下：

中国驻屯军　司令官

军司令部　　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7月11日之后，由香月清司接任），参谋长：桥本群少将

中国驻屯步兵旅团（北平）　　　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

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北平）　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

中国驻屯（北平）电信所、宪兵分队、军医院分院

中国驻屯步兵第二联队（天津）　联队长：萱岛高大佐

中国驻屯炮兵连队（第一大队山炮第二中队、第二大队十五榴二中队）　　　联队长：铃木率道大佐

中国驻屯战车队　　队长：福田峰雄大佐

中国驻屯骑兵队　　队长：野口钦一少佐

中国驻屯工兵队

中国驻屯通信队

中国驻屯宪兵队　　队长：赤藤庄次中佐

中国驻屯军医院、仓库

别动队　　　注释

通州　步一连队一小队

丰台　步一连队第三大队，步兵炮队

塘沽　步二连队第三中队

唐山　步二连队第七中队

滦州　步二连队第八中队

昌黎　步二连队一小队

秦皇岛　　步二连队一小队

山海关　　步二连队第三大队本部，第九中队

部署　司令官

北平陆军部　部长：松井太久郎大佐，副官：寺平忠辅大尉，第二十九军军事顾问：中岛弟四郎中佐，长井德太郎少佐，笠井牟藏少佐

通州陆军部　细木繁中佐，甲斐厚少佐

太原陆军部　河野悦次郎中佐

天津陆军部　茂川秀和少佐

张家口陆军部　　大本四郎少佐

济南陆军部　石野芳男中佐

青岛陆军部　谷萩那华雄中佐

北平派驻武官副官　今井武夫少佐

陆军运输部塘沽分部

加上日本之伪军，足以对华北安全构成威胁；驻中国东北关东军辖4个师、4个旅及5个独立守备队，成为进攻华北二线部队；另外，日本台湾军和朝鲜军共有2个师兵力。

事变经过时间表

1937年7月6日，日军驻丰台部队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到长辛店地区演习，三十七师驻军不许，相持达十余小时，至晚始退去。7月7日三十七师驻军接到报告说：日军今日出外演习，枪炮都配备了弹药，与往日情况不同。旅长何基沣当据以报告了正在保定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并促其速返。冯立即赶回北平，听取了何基沣的情况报告，并与何布置了应战的准备。

事变起因各执一词

根据蒋介石传记《蒋中正》中收录的《何（应钦）上将军事报告》一文，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记录的秦德纯的证词：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七日夜十一时，驻扎在丰台的日本军队在未通知中国北平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在国民革命军驻地附近进行夜间军事演习，并之后以‘一名士兵失踪’为理由，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查。当时驻扎在卢沟桥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当时在山东乐陵县老家修祖坟）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7日当天由保定返回北平指挥）第一一零旅（旅长何基沣，在西苑旅部）第二一九团（代理团长吉星文，由庐山军官训练团回防长辛店车站）第三营（营长金振中，营部在宛平县城负责第一线战斗指挥，重伤后由陈光然团长接防指挥）。驻宛平和卢沟桥的守军，有“步兵四个连，重机枪一连，重迫击炮一连，轻迫击炮一连，合计战斗力1400余人”。由于时间已是深夜，中国驻军拒绝日军的要求。之后日军包围卢沟桥，双方都同意天亮后派出代表去现场调查。但是日本的寺平副官依然坚持日军入城搜索的要求，在中方回绝这一要求后，日军开始从东西两门外炮击城内，城内守军未予反击。在日军强化攻击后，中方守军以正当防卫为目的开始反击，双方互有伤亡。随后卢沟桥北方进入相持状态。”

根据日本陆军1937年发表的消息：

“1937年7月7日晚10时40分许，日本陆军中国驻扎步兵第一连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北平西南12公里的卢沟桥北侧，永定河左岸荒地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在河畔的龙王庙方向突然响了三发枪声。随后清水节郎中队长，野地第一小队长等人看到在河畔和卢沟桥城墙之间，有人用手电筒发出明暗交替的光亮，随即判断为中方军队士兵在用暗号互相联络。之后又有十几发子弹从龙王庙方向射出，日军未予以反击。清水中队长派遣岩谷曹长和两名传令兵马上向丰台驻军报告。收到报告的第一连队长牟田口廉也在联络北平特务机关后，决定在天亮后与宛平县县长王冷斋一同前往事发现场。

随后清水中队长率队向东面的西五里店转移，与从丰台赶来的第三大队在一文字山会合。凌晨3时25分，龙王庙方向又有3发射击。牟田口连队长认为频频出现的射击目的在于进攻日本军队，于是在4时20分下达战斗命令。

此时之前由森田中佐带领的对中谈判代表到达该地区，森田中佐作为代理连队长命令禁止装填子弹。日军代表随即要求中方将集结在卢沟桥周围的部队撤走，但该地区的中方部队已开始从龙王庙附近及长辛店高地方向开始对日军阵地进行迫击炮炮击。日军开始还击的时间是1937年7月8日凌晨5点30分。战斗开始后，日军歼灭龙王庙附近的中方部队，进入永定河右岸，包围卢沟桥。从被击毙的士兵身上搜出的证件表明，该士兵属于二十九军正规军。至此中方战死20名，负伤60名左右。

5时30分，日军第8中队开始向中方军队进攻，双方进入全面冲突，战斗持续2个小时后逐渐沉静。

战斗打响后，又有保安四团二营700人奉师长命令前来增援。

上午9点半，中方提出停战，双方进入僵持状态。”

事变爆发

1937年7月7日，日军侵芦沟桥，战事爆发，蒋委员长派兵北上，决心应战，并令宋哲元驻保定指挥。日军在北平西南15公里交通要道芦沟桥演集夜战。下午，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到芦沟桥北面回龙王庙至大瓦窑一带演习。19时30分，驻丰台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至芦沟桥西北龙王庙附近举行军事演习。22时40分，在日军演习方向响起枪声。宛平守军突听到城东北日军演习位置响起枪声。23时，几名日军来到宛平城下，声称有一名叫志村菊次郎之士兵“失踪”，要求入宛平县搜查，遭守城之国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〇旅第二一九团拒绝。午夜，日军在宛平县芦沟桥一带演集，借口失踪士兵一名，欲入城搜查。日军向宛平县城射击，进而向芦沟桥一带发起进攻。“芦沟桥事变”爆发。继称失踪日兵虽然归队，仍须明了经过情形。中国答应共同调查，日军竟突然进攻。夜十二时，日使馆武官（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电冀察当局声称：“有日本陆军一中队，顷间在卢沟桥演习，仿佛听见由驻宛平城内之军队发枪数响，致演习部队一时呈混乱现象，结果失落日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兵。”中方因其所称各点不近情理，显系别有企图，当即拒绝了他的要求。少顷，松井又来电话，声称：中方如不允许，彼方将以武力保卫前进。又为中方所拒绝。中国驻军吉星文团以时值深夜，恐引起地方不安，婉加拒绝；旋经冀察当局与日本驻屯军司令交涉，商定双方各派员5人实地调查。“七七事变”于是爆发。中方派出河北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长王冷斋、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冀察绥靖公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3人，与日方代表缨井、日军补给官寺平、秘书齐藤三人，于7月8日晨四时许到达宛平县署。夜11时借口搜查失踪哨兵，突炮轰宛平城；国军第二十九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吉星文团奋起抵抗，双方互有伤亡，成为抗日战争之导火线。

7月8日凌晨2时，日驻屯军第3营主力占领宛平城外唯一制高点沙岗（日称

一文字山）。日驻屯军占领宛平城东门外1公里的沙岗。晨5时，日方仍坚持入城搜查，中方未允，日军竟突向县城攻击，中国军队以守土有责，奋起抵抗，日军不支败退，由是战端乃启。日方代表缨井、日军补给官寺平坚持入城搜查。中日双方谈判，日方要求中国军队于8月11日先自芦沟桥撤退，中国方面坚决予以拒绝，谈判无结果。5时30分左右，日军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率步、炮兵400多人，向宛平城外第二十九军阵地进攻。正交涉间，忽闻东门外枪声大作，顷刻间，西门外大炮机枪声又起。第二十九军司令部（代理军长冯治安）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芦沟桥和宛平城"，"芦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上午11时战斗再起。一木清直带领第3营主力向回龙庙、铁路桥阵地进攻，在回龙庙与中国守军激战。第二十九军第二一九团第三营守卫芦沟桥和宛平城，在营长金振中指挥下奋起抵抗，双方互有伤亡。中国守军英勇抗击，两个排官兵几乎全部壮烈牺牲；接着，日军继续向中国守军进攻，猛烈炮火炸毁宛平县公署及大批民房。13时，牟田口廉从北平到达宛平城外沙岗前线；16时许，日华北驻屯军旅长河边正三到达丰台，命令日军将兵力集结于芦沟桥车站附近，准备明天天亮时进攻。至7月8日下午，何基沣旅从长辛店以北的第219团及八宝山以南的第220团一齐向日军反攻，并与敌实行白刃战，复将铁路桥及龙王庙等处夺回。16时许，日华北驻屯军旅长河边正三到达丰台，命令日军将兵力集结于芦沟桥车站附近，准备明天天亮时进攻。河边旅团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函约王冷斋与守军吉星文团长、金振中营长出城会商，王冷斋等以未便擅离职守却之；18时5分，日军炮击宛平专署，金振中负伤，国军步兵两连手持大刀、手枪突袭芦沟桥附近日军阵地，斩获甚众。日军利用缓兵之计，吊诱中国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表示系地方事件，愿作和平之解决；而暗中紧急动员，分三路向平津采取包围形势。当晚冯治安下反攻令，并发表声明称，"和平固所愿，但日方如一再进攻，为自卫计，唯有与之周旋"，日方获悉后，即多方派人疏通，又允无条件撤兵，秦、冯二人乃收回反攻令；北平市区及四郊临时戒严司令部成立，冯治安任司令，宣布每晚8时起城门全闭，11时后全市断绝交通，禁止行人通行，

并封锁至通州交通。

日军为争取时间调整部署，与中国方面谈判，双方达成临时停战协议。国军与日军在芦沟桥附近相持，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等与日军代表谈判，拒绝日军要求国军芦沟桥方面撤退至永定河西岸；战事复起，日军向龙王庙附近等处进攻，占据龙王庙、铁路桥及丰台等地，晚上进攻宛平城，国军奋起反击。双方协议，军队各返原防。至7月10日，日军未撤，冯治安等又下反攻令，日方派人疏通，致反攻未成事实。

停战谈判

110旅对日军的坚决回击，出乎日方意料。日方称失踪日兵业已寻获，向中方提出和平解决的要求（实际是缓兵之计）。此后，中日两国谈判，两军对峙。7月9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军议定停战办法：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二、双方部队撤回原防；三、芦沟桥由河北保安队石友三部驻守。7月9日凌晨2时，日本驻华大使馆北平陆军助理副官今井武夫与秦德纯达成口头停战协议，各自立即停止射击，双方军队撤回原防。中日交战双方对“日军占领永定河东岸，中方占领永定河西岸，日方撤走交战军队”达成一致，直到12时20分撤军完毕。后交战双方开始谈判，主要围绕“相关地区撤军”，“今后的治安保障”，“中方对挑起事端道歉”以及“取缔当地抗日活动”展开争论。在两国谈判期间，日本持续向北平、天津增兵。晨6时许，日军又向宛平城炮击。城内居民伤亡颇重，团长吉星文亦负伤。敌人并于是日占领大井村、五里店等处，截断了北平至卢沟桥的公路。日军又攻。是日晨，蒋介石电令第二十六路总指挥孙连仲派2个师向保定或石家庄集中；令庞炳勋第四十军及高桂滋所部也向石家庄地区集中，并命宋哲元由乐陵速回保定指挥。但日军并未撤兵，并于傍晚炮轰宛平城。

中方为了加强卢沟桥一带的兵力，乃于九、十两日先后将驻保定的陈春荣旅之一团、东北军五十三军万福麟部之骑兵团及钢甲车两列开到长辛店一带，计划在十日夜间袭击丰台之敌。九日晚七时左右，日方托人以电话劝

说何基沣旅长："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如果打起来，有两方面高兴：一方面是共产党，符合了他们的抗日主张；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可以借抗战消灭我们。带兵不怕没有仗打，但是不要为了个人去打仗。"何答以"现在的情况，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见无法劝服何基沣旅长，就通过29军军部给何发布命令，严令"只许抵抗，不许出击"本来何已经商得师长冯治安的同意，决定乘敌人大部兵力尚未开到的时候，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出其不意，予丰台之敌以歼灭性的打击，军部命令到达后，这一计划未能实行。从此，卢沟桥的战事就完全陷于被动。

7月10日凌晨2时30分，芦沟桥日军复行进攻，包围宛平县城，拆毁平汉铁路丰台至北平路轨。芦沟桥附近日军包围宛平县城；外交部向驻华日使馆提出书面抗议，要求立即制止制止军事行动。外交部就日军发动芦沟桥事变，向日本驻华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要求：一、日本方面须正式谢罪与处罚负责人员；二、对于死伤之军民及轰毁之建筑物，须赔损失；三、为防止再发生不祥事件，日本方面须提出今后保障；并声明保留一切合法要求；日本大使馆参赞日高表示，日方不愿以中国外交部为对手，而愿就地商谈。日军陆军部决定从关东军中抽调2个混成旅，驻朝鲜军中抽调1个师，从日本本土调航空兵团及3个步兵师赶赴华北。下午5时，日军又进攻宛平驻军，战事复起；北平市政府深夜召开重要会议，将日军违约挑衅经过情形，电中央及各省、市。芦沟桥一带中国军队遵约撤军，但日军却大批调兵共向中国军队进攻。日军继续进攻芦沟桥一带中国守军，扩大事态。

7月11日，宋哲元由山东抵达天津。7月11日，国民政府电北平市长秦德纯，对芦沟桥事变指示三点：一、不准接受任何条件；二、不许后退一步；三、必要时准备牺牲。中国允撤退芦沟桥及其附近驻军，惩罚负责官员，而日方表示遗憾。秦德纯与松井达成停战协定：一、第二十九军代表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并对责任者给以处分，负责防止令后不再惹起类似事件；二、中国在芦沟桥周围及龙王庙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三、

各抗日团体今后要采取措施并彻底取缔。日本召开首、外、陆、海、藏五相和内阁紧急会议，通过陆军占领华北、平津地区之计划，决定“军部必须把预先在关东军和朝鲜军方面准备着皂队赶快增援在中国的驻军。同时，在国内也必须动员所需的部队，迅速派到华北”。日军于凌晨向芦沟桥一带猛烈攻击，国军抵抗，上午11时日军又炮轰芦沟桥一带，双方冲锋，当晚日军向芦沟桥、南苑等处向国军猛攻。日本内阁决定增兵：调关东军及驻朝鲜日军各一部进攻北平，调日本国内陆海军一部进攻天津。18时，日本政府发表增兵华北声明，并改称芦沟桥事变为“北支事变”，声称“内阁会议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日本政府命朝鲜、满洲驻军开往华北。日本五相会议决定：火速告知关东军及朝鲜驻屯军司令部，迅速调遣已准备好之兵力（5个师团，目前用了3个师团和18个飞行中队）迅速进入华北战区以加强中国驻屯军之力量；同时，日本昭和政发表《关于向中国增兵的政府声明》及临参命第56号、第57号，并速调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独立混成第1旅团）、朝鲜军（第20师团）各一部以加强中国驻屯军战斗力。同日，日本陆相任香月清司中将为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接替田代皖一郎病危，并限当日到达驻地天津，行前分别晋见陆相、参谋总长等接受指示。

7月12日，宋哲元在天津对新闻界发表了如下的谈话：“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东亚两大民族，即是中日两国，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应自找苦恼。人类生于世界，皆应认清自己的责任。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合法合理，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能和，不平即不能和。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7月12日，独立混成第11旅团，从古北口出发。日军不履行撤兵协议，复在原阵地布置工，继续向北平增兵，凌晨日军进犯财庙被击退，晚上在宛平一带大范围进攻与国军激战，日机飞长辛店、保定侦察，天津日军占领东沧[16]:5480。日军四处向中国挑衅。

7月12日，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到达天津。香月清司午前下令华北驻屯军要“作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增加丰台、通县兵力；关东军部队主力集结于密云，航空队集结于天津；香月清司并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动用第一批增加之兵力，“一举歼灭中国第二十九军”，要求在7月20日以前完成部署。日本参谋本部拟就作战计划，决击溃北平、天津附近宋哲元军。丰台、通县等地日军向中国军队挑衅，并在天津集结飞机200余架助战。中国外交部于抗议之外，于是日声明，任何解决办法，未经中央核准者，概属无效；外交部发表声明，日军在芦沟桥之行动属非法，中国愿以外交方式和平解决。

7月13日，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从公主岭出发。蒋介石电令宋哲元，谓“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同时采取紧急措施，编组第一线战斗部队100个师，预备部队80个师，后备兵员100万人。蒋介石下令总动员，集结中国军队于保定、沧县一带。日军400余名乘汽车65辆，配有坦克4辆及迫击炮5门，进犯北平永定门，意欲入城，国军奋力抵抗，击退日军。

7月14日，新任华北司令香月清司要求撤退北平驻军、冀察中央机构及蓝衣社、CC团，罢黜排日要人，彻底镇压共产党活动，取缔排日言论机关、学生运动及学校与军中排日教育。中日双方开始和平谈判，中方代表陈觉生、邓哲熙，日方代表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参谋和知、专田等，就日方七项要求谈判。蒋介石设行营于石家庄。日本骑兵200余人向北平南苑第二十九军军部进攻，为国军击退。

7月15日，日军在平、津地区已逾2万，有飞机百架。

7月16日，日军至平津一带兵力已达10万以上。日军在丰台强筑飞机场。日本中国驻屯军对平津完成包围。日本五相会议过陆相杉山元提议，对华北事件谈判以7月19日为履行最后期限，不容许迁延；若谈判不能圆满达到目的，即大举进攻中国。日军增援部队先后到达北平附近。英国驻华大使试

图斡旋，提议中日停止调兵，为日本所拒。中国方面，拟定预备作战命令，任冯治安为总指挥官，决定第一三二师一部守北平城，其余所部协同第三十七师进攻丰台、通县之敌。

7月17日，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到达指定地区。拂晓，日军三次向北平大教场国军挑衅，国军予以还击。朝鲜军第20师由朝鲜龙山出发，主力于7月20日抵天津集结，其一部集结于唐山、山海关。日军占据天津西站、北宁路沿路各站。日本内阁决定在预算中增加临时军费，积极备战。

7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以吊祭7月16日病逝之前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为名，偕张自忠拜访新任华北驻屯军总司令香月清司，对中、日军队在芦沟桥冲突表示遗憾。宋哲元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谈判。蒋致宋哲元、秦德纯巧电："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上海"一・二八"之战，本于开战之前已签和解条约，乃于签字后八小时仍向我沪军进攻。此为实际之经验，特供参考，勿受其欺。"香月清司指挥部设到丰台；此时，入关日军已超过10万。宛平城外日军炮轰城内，并在北平至芦沟桥大道南北两侧构筑工事，天津日军源源开往丰台，日机6架在天津高空侦察，驻朝鲜日军第二十师团全部向中国开拔，师团长川岸率先头部队到达天津。日军步兵第2团及骑兵队、炮兵团、工兵队在通县集结。中国第二次向日本提议停战，和平谈判毫无进展，而日本之骚扰行为，则继续不绝。

宋哲元由天津抵达北平。7月19日，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接受日军中国驻屯军所提出：一、冀察政务委员会向日军道歉；二、第二十九军从平津、芦沟桥、永定门以东撤退；三、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实行中日共同防共等"停战"条件。宋哲元接受香月清司所有要求。宋哲元看到北平城内通衢各要路口均设有准备巷战的防御工事，当命令立予撤除，将关闭数日的各城门也完全开启，并且在返平后的次日（7月20日）又发表了书面谈话，其内容是："本人向主和平，凡事以国家为前提。此次卢沟桥事件之发生，决非

中日两大民族之所愿，盖可断言。甚望中日两大民族，彼此互让，彼此相信，彼此推诚，促进东亚之和平，造人类之福祉。哲元对于此事之处理，求合法合理之解决，请大家勿信谣言，勿受挑拨，国家大事，只有静听国家解决。”宋哲元被迫接受日军和谈条件，以要求恢复至卢沟桥事变之前状态为代价，而准备将北平守军撤往保定以保全实力。日军独立步兵第11旅团主力抵到达高丽营，其一部经山海关到天津。华北日军已形成对平、津包围，22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发表声明称，“从二十日午夜以后，驻屯军将采取自由行动。”。23时，第二十九军张自忠、张允荣签订就地停战协议；当夜日军又炮轰宛平城。

7月20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各部队先后到达集结地。获得增援的日军再次发动进攻。宋哲元以19日秘密协定下令国军第三十七师向西苑集结。第二十九军令第一三二师在永定河以南集结，另该师独立第二十七旅进入北平担任城防。日军向北平进攻部署就绪。宋哲元下令撤除北平市内防御设施，请北来中央军停止前进。上午，日军突然开炮轰击宛平县城及长辛店，千余人配合坦克40辆及汽车队增援芦沟桥，下午第二次开炮猛轰宛平城，数度向芦沟桥冲锋；国军沉着应战，吉星文负伤。日军便轰炸廊坊，平津危急。香月清司下令日军完成对芦沟桥地带攻击准备。

7月21日，日军控制北宁铁路，截断第二十九军联络，继续向平、津大举增兵，已有42列运兵车到天津，并不断由天津向丰台、杨村等地增兵。国军第三十七师集结完毕。

7月22日，日军向华北秘密运送机械化部队，并运送大量部队秘密向华北集中。国军第三十七师开始撤退。

7月23日，中国获得确切报称，日军8个师团约16万人，已抵达平、津地区，或正在乘船驶华途中；日本拒绝遵约从前线撤军，继续由国内向中国华北增派空军，大量运送军事物资。

日本政府通过《动员计划》，要求中国撤退进入河北部队；宋哲元以日军大举向关内输送，同时知道蒋介石之抗战决策，补给已经到达，亦决定发动攻势。

平津陷落

7月24日，北平市政府恢复夜间各娱乐场所之营业，市内各处所有沙袋等防御物连夜撤除；日军用飞机50架、重轰炸机一中队出发来华。

7月25日，日军仍拒不撤兵，上午日军铁甲车一列开到丰台，下午通县日军步炮兵500余人举行演习威胁驻通县国军。日军向廊坊驻军挑衅。日本第一支运输船队在塘沽卸下军用品达10万吨。是夜，日军第20师团77联队11中队，对廊坊中国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旅第二二六团进攻。中、日两军在廊房车站因电信线路修理问题而爆发“廊坊事件”：19时，日军200余人由天津开到廊房车站，借口修理电线，占据车站，切断平、津交通；国军还击，双方冲突。

7月26日，日军中午占领廊坊，下午即由丰台派兵一中队分乘军车数十辆，冒充北平城日使馆卫队野外演习归来，企图进入北平城内。日军占夺平、津间之廊坊，但进攻北平之日军则被击退。守军退至通州，下午，日军向第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第二十九军撤出。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提出最后通牒，要求第二十九军退往永定河以西。日军行抵广安门时，为国军独立第二十五旅第六七九团刘汝珍所阻，日军坚欲入城并作攻城状。19时，日军第一大队乘车向北平城内开进，在广安门与中国守军冲突。宋哲元闻报后，即令刘团备战，刘团即启开城门诱日军入城，及其进至一半，刘团开始射击，日军混乱损失甚重，即所谓“广安门事件”。日本华北驻屯军于22时20分下达于7月27日正午开始攻击之命令，并规定各进攻部队之方向。

7月27日，日军陷廊坊、宝珠寺等地。日军分别对通县、团河、小汤山等地

进攻。日军围攻我通县驻军傅恩营，傅部冲出重围，撤出南苑。冀东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在张馀庆、张砚田率领下反正，全歼驻通州县城日军1个连及特务机关人员，活捉殷汝耕；日人死者约180人。在通州总共400名日本军政人员全部被消灭。日本政府声明在中国华北采取“自卫”行动；还向国民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在7月28日以前撤离北平及其附近地区。7月27日上午特务机关长松井往见宋哲元，限三十七师（即冯治安师）于7月28日正午以前退尽。宋派张维藩代为接见，张将通牒送交宋哲元看过后，宋立即命张予以拒绝，并将通牒退还松井。同时，宋将情况报告了南京，并且表示“决心固守北平，誓与城共存亡”，随即发出自卫守土的通电，电文是：“自哲元奉命负冀察军政之责，两年来以爱护和平为宗旨，在国土主权不受损失的原则下，本中央意旨处理一切，以谋华北地方之安宁，此国人所共谅，亦中日两民族所深切认识者也。不幸于本月七日夜，日军突向我卢沟桥驻军袭击，我军守土有责，不得不正当防御。十一日协议双方撤兵，恢复和平。不料于二十一日炮击我宛平县城及长辛店驻军，于二十五日夜，突向我廊坊驻军猛烈攻击，继以飞机、大炮肆行轰炸，于二十六日晚，又袭击我广安门驻军，二十七日早三时又围攻我通县驻军，进逼北平，南、北苑均在激战中。似此日日增兵，处处挑衅，我军为自卫守土计，除尽力防卫，听候中央解决外，谨将经过事实推诚奉闻，国家存亡，千钧一发，伏气赐教，是为至祷。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叩感。”同时，下令设立北平城防司令部，派张维藩为城防司令，并配备了城防部队，准备固守北平。7月27日下午，日军步、骑约400人，附坦克数辆，猛攻团河。北平四郊激战。另有日军400余名，在空军配合下，进攻小之商镇。守军分别退至南苑及北苑；发现和平无望的宋哲元，拒绝日军一切要求，急令第二十九军各部集结平津一带，派人星夜赴保定，催促孙连仲北上支援。宋哲元当天晚间，又派戈定远星夜驰赴保定，催促孙连仲、万福麟等北上作战。日机多架次屡在北平上空侦察，并在城外投弹数十枚。日军进迫北平四郊。宋哲元下令第二十九军备战。宋哲元向全国发出守土通电。日军参谋总长下达武力占领平津的命令。同日，日本在30,000名冀东

反共保安队帮助下解除通州800名第二十九军独立第三十九旅武装。

7月28日至7月30日，发生平津作战。

7月28日晨，宋哲元下令全线总攻，国军一度收复丰台、廊坊。上午8时，日军发动总攻击，中国军队处处被动，牺牲惨重。8时，日军第20师团及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向驻守南苑之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二师发动进攻，国军与日军激战。拂晓，香月清司率日军铃木混成旅团、河边正三旅团和机械化旅团，自北、西、南3个方向对北平城发起总攻击。第二十九军驻地南苑，日军猛攻。在飞机、炮兵支援下，日军第20师团主攻北平地区第二十九军。当时，二十九军军部已移驻北平城内，驻在南苑的部队共有四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兵力约七千人左右。这时一三二师赵登禹部已由河间、任邱北调，向北平增援，于于27日傍晚到南苑指挥部，以一三二师后续部队已过永定河，拟挨全部到达后再变更部署。不料日军铃木混成旅团及华北驻屯军河边正三步兵旅团和机械化旅团于28日拂晓即由西、南两面向南苑开始进攻，另以一部切断南苑至北平的公路，同时以飞机数十架低空轮番轰炸，由晨至午，片刻不停。南苑由于事先未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仅以营围作掩体，在敌人空军的轰炸扫射之下，部队完全陷于不能活动的地步，且通讯设备又被炸毁，各部队与指挥部之间的联络完全断绝，指挥失灵，秩序混乱。敌人从营围东面冲入之后，战至13时南苑遂告失守。日军猛攻南苑，守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殉职。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教导团团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向城内撤退时被敌人截击，相继阵亡。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在激战中殉职，为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位殉职之高级将领，时年45岁。日军攻占南苑。伤亡2,000余人。北苑、黄寺为日军占领，清河镇、沙河镇亦分别被日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和独立混成第一旅团攻占。位于丰台的日军驻屯旅团主力，前进到大红门地区，切断南苑到城内的道路，阻击向城内撤退的第二十九军。第二十九军特务旅、第三十八师第一一四旅、骑兵第九师等部发起攻击。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一部向丰台日军进攻；15时，参加南苑战斗之日军返回丰台支

援，打退第三十七师所部进攻。7月27日驻天津附近的三十八师，在副师长李文田和旅长黄维纲等的策划下，进行了作战的部署，因师长张自忠去北平未回，故尚在待命出击中。至7月28日，得到日寇大举进攻南苑的消息，同时看到报纸发出二十九军克复丰台和通州保安队张砚田、张庆余两部已反正的号外，随后又接到宋哲元发出的守土自卫的通电，于是，李文田、刘家孪（天津警备司令）和马彦翀（天津市府秘书长）等，一面发出通电，响应宋的号召，一面调集天津保安队配合三十八师各路部队分向海光寺日军兵营、北宁路天津总站、天津东站和东局子飞机场等处日军进攻，自28日夜一时开始，先后与敌接触。7月28日下午3时，宋哲元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宋哲元与冯治安、秦德纯、张维藩在一起。当晚，宋哲元等移到保定，第三十七师奉令由宛平、八宝山、门头沟一线撤离北平。7月28日，日军攻陷北平，蒋发布抗战全军将士书，勉以牺牲到底，驱逐日军，复兴民族。北苑黄寺亦被占领。而第二十九军全军部队在北平、天津一线与日军全面交火。在通州总共400名日本军政人员全部被冀东反共军官训练团消灭。

7月29日张自忠到冀察政委会就职，将原冀察政委会委员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刘哲、门致中、石敬亭、石友三、周作民等免职，并用冀察政委会名义派张璧、张允荣、杨兆庚、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陈中孚、邹泉荪等为委员，同时发表潘毓桂兼北平市公安局长。张就职后，日方即直接指使潘毓桂、张璧等办事,而对张自忠则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紧接着，张又得到了三十八师在天津与日军作战的消息，始知大势已去，全局皆非，乃立即隐匿于东交民巷，旋即化装逃出北平。7月29日上午8时，独立混成第11旅团一部进攻北苑与黄寺，遭到中国守军独立第三十九旅、冀北保安队顽强抗抗。日军轰炸南开大学。18时，黄寺失守。日本参谋本部制订《中央统帅部对华作战计划》，决定“以中国驻屯军四个师为基干，击溃平津地方的中国军队”；“根据情况，以一部分兵力，在青岛及上海附近作战”；同日，北平失陷。北苑守军独立第三十九旅转移，北平陷落。独立

第三十九旅退至古城，战后回到北苑。北京城内独立二十七旅改编为保安队维持治安；日军进攻天津。宋哲元离开北平。同日，天津大约有3,000日军；李文田召集600名中国警察同日军作战。19时，军事会议部署，天津保安队一中队攻打东站。驻防天津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部队，凌晨主动向日军进攻，攻占天津总站日军驻地，并向驻海光寺日军司令部和东局子飞机场攻击。在日军空中轰炸、地面强力抵抗下，中国军队进攻失利，退至静海、马厂一带，天津失守。第二十九军开始撤退。冀东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在张馀庆、张砚田率领下反正，全歼驻通州县城日军1个连及特务机关人员，活捉殷汝耕；日人死者约180人。

至7月30日，平津陷落日军手中。驻通县伪冀混成第1旅团进占长辛店西面高地，日军侵占大沽。何基沣旅撤离长辛店。国军退静河马厂。天津经激战后陷落。江朝宗之北平治安会成立。

7月31日，独立三十九旅被解除武装；独立第二十七旅改编为保安队，突围到察哈尔回归第一四三师序列。华北两大名城均入日本之手。

8月1日，高凌霨之天津治安维持会成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在南京成立，发动海内外妇女同胞共同抗日。8月上旬，日军进占南口、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邯郸铁路沿线地区。8月，上海爆发淞沪会战。8月19日，冀察政务委员会自行解散，8月22日日本正式宣布。

1937年底，前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等人在日军扶持下，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平”改回清朝旧名“北京”。

各方反应

国民政府

7月7日，蒋介石时在庐山，正要与社会领袖举行国是谈话会。

7月8日，蒋介石电令冀察当局："宛平城应固守勿退。"蒋介石电令宋哲元速回保定指挥军事，固守宛平。蒋介石得知事变消息，即命中国国民党宣传部尽量发布新闻，令宋哲元积极准备，就地抵抗，如果谈判，须不丧失丝毫主权。蒋介石令何应钦速由四川返南组编部队；令孙连仲部两个师及庞炳勋部第三十八师开往石家庄、保定一带增援。

7月9日，蒋介石获悉日军启衅后，立即电示宋哲元主任："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狡之惯技，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吾兄忠贞亮节，中所素念，此后尚希共为国家民族前途互勉"。蒋介石致宋哲元密电稿。旋接冀察当局电呈："势已缓和，拟请将前派北上四师，在原地集结待命，以免刺激"。蒋介石派4个师向河北石家庄、保定集中，命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速返南京，面告军政部长何应钦，可知他已下决心。

7月10日，蒋介石向全国各行营、绥靖公署及各省市发秘密动员令，要求"全国各地方、各部队仍应确实准备，勿稍疏懈，以防万一"。蒋电调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冯安邦、池峰城两师，庞炳勋部一师一旅，刘戡第八十三师，速开保定、石家庄一带，以备应援；另令第二十一师李仙洲，第二十五师陈耀明继续开拔；又令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向前推进，第十师李默庵部开拔，第十七师赵寿山，第八十四师高桂滋，第三军曾万钟等部队准备动员。以阻止日军进一步侵略的同时，也在进行军事准备和部队调动。

7月1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决定，庐山谈话会第一期7月17日召开，第二期月25日召开，第三期月5日召开。蒋介石致电宋哲元：对日方针为不屈服，不扩大，就地抵抗。外交部于抗议之外，并于7月12日声明，任何解决办法，未经中央核准者，概属无效；再电宋哲元，全力抗战，勿为敌人所欺，7月11日之协议绝不能了事。命令黄河北岸中央军集中保定、沧县地区。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密电蒋介石、冯玉祥称："芦沟桥战事复经磋商解决办法，规定双方会同派员监视前方部队于现状下各撤原防，刻下正

在进行。惟彼不顾信义，能否履行，尚不敢必信。宛平城及铁路桥仍为我军驻守。”

7月13日，蒋介石以时局日趋严重，令驻庐山各部、会长官及办公人员即日返南京，处理要务。7月14日，设行营于石家庄。严宽致何应钦密电。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判断日军有扩大侵略的可能，于是在通过谈判、美英调停。

7月16日，庐山谈话会上午9时在牯岭图书馆举行，谈话会邀集人汪精卫、蒋介石同时莅临，汪精卫任主席并致词，张君励、张志让、王云五、张寿镛、江恒源相继发言，会场严肃和协，与会者精神大为振奋，11时结束。中国国民党庐山谈话会第一期会谈开始，7月20日结束，讨论对日作战方针。

7月17日，蒋介石表示应战。召集全国教育、文化、社会各界贤达在庐山开会，蒋介石发表主张四点，强调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芦沟桥事变”为最后关头，中国当坚持最低限度立场。指出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祇有牺牲到底，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蒋介石对庐山谈话会郑重宣布：“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祇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

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卢沟桥事变遂成为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标志。

7月19日，蒋介石同意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庐山谈话会举行分组谈话。7月20日，蒋介石返抵南京，召见各国大使，表示中国抗战决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把全国划分为四个战区。7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策定：“将日本人从长江上赶走，没收所有的日本商船和战舰”，打一场非局部而是全面之战争。

7月21日，蒋介石会见英驻华大使许阁森，望英国调解芦沟桥事件；英国仅表示停止原计划进行之英日谈判。7月24日，蒋介石接见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说明日本之和平谈判为其再生事端之准备。

7月25日，蒋介石接见自北平归来之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希望美国以《九国公约》发起国地位，出面阻止日本侵华行为；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晤见王宠惠，谓日本不愿第三国干涉，德国不能调解。7月26日，蒋介石认为日军进犯北平廊房、广安门，和平绝望，大战已开始。蒋介石接见德国大使陶德曼及法国驻华那齐雅，两人均认为日本政府已为军人控制。

7月27日，外交部为日袭击廊坊发表重要声明称，中国极度容忍，维护和平，但日军继续大量军队向平、津出动，进攻廊坊，复提出无理要求，蓄意扩大事态；中方已尽和平最大之努力，嗣后一切事态之责任自应完全由日方负之。7月29日晚，蒋介石再发表谈话，说是这不能算是战争了结，惟有一致奋斗，此后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与妥协屈服之理。

7月31日，蒋介石发布“告抗战全军将士书”，谓“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勉励全军“驱逐日寇、复兴民族”，与倭寇死并。国民政明令褒扬佟麟阁、赵登禹，追赠二人为陆军上将；军事委员会下达红军改编后三个师之番号，同意中共所提之人数及编制。释放全国各界救国会之沈钧儒、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

8月初，蒋介石复宣示抗战方针，随时随地抵抗，使日本人战而不取；各地重要军事将领，如广西白崇禧、山西阎锡山、四川刘湘、云南龙云、中共朱德等，不论以往与蒋有何意见，均会集南京[3]:663。8月1日，蒋介石宴平津教育学术界领袖张伯苓、蒋梦麟、胡适等，宣示对日抗战方针。

8月6日，蒋介石派宋哲元、刘峙分任第一、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反攻平津。

8月12日，中国国民党中政会决议，设置国防最高会议，以蒋介石为主席，为战时统一指挥党、政、军之最高决策机构；推蒋介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以军事委员会为统帅部。

8月16日，改以蒋介石为大元帅，组织大本营；南京失守后，大本营撤销，仍由军事委员会总揽军事。

中共延安政府

7月8日，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向全国通电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全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第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切实援助第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和一切日寇的侦探，巩固后方。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号召全国

军民抵抗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作战。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及红军将领于事变之次日，亦请蒋严令第二十九军保卫平、津、华北，动员全国海陆空军，驱逐日寇出中国，红军愿在其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中共中央就芦沟桥事变指示北方局在华北工作方针："迅速组成坚固的统一战线……立在平绥、平津以东地区，开始着手和准备组织抗日义勇军，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

从7月8日起，北平中共地下组织立即动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学联等救亡团体，组织战地服务团，出动到前线救护伤员；组织劳军团，携带大批的慰劳品，分赴前线及医院慰问；并进行了支援抗战的各方面工作，如募集麻袋供作防御工事等。

7月11日，周恩来、秦邦宪、林祖涵到庐山，会商陕、甘、宁边区地位及红军改编问题。7月13日，周恩来会见蒋鼎文、宋子文，商谈红军改编人数及指挥机关问题。

7月13日在延安召开了共产党员和革命机关工作人员参加的紧急会议。毛泽东号召："每个共产党员与抗日革命者，应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战前线。"

7月1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布《关于红军改编开赴抗日前线》命令。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战，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命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

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宣布取消"苏维埃政府"，成立"陕甘宁三省边区政府"。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救亡动给各地党部的指示》。

7月16日，毛泽东、朱德就红军准备参战与改编电彭德怀、任弼时等，在国民政府"许可主力红军参战条件下，拟以原一、二、四方面军出动，即以方面军编为师，军编为旅，师编为团"。

7月17日，周恩来、秦邦宪、林祖涵与蒋介石、张冲、邵力子在庐山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张闻天、毛泽东电叶剑英转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称，红军改编指挥机关，可以承认平时设政训处指挥，朱德为正主任，彭德怀为副主任；但战时不能不设以资统率之军事指挥部。

7月18日，延安举行盛大援助平、津抗战将士民众大会，到会数千人，通过致第二十九军将士电，毛泽东出席大会，报告芦沟桥事件经过及最新情况。

7月20日，周恩来、林伯渠在上海收到张闻天、毛泽东来电称，日军进攻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可能，我们决定采取蒋介石不让步不再同他谈判的方针；要求周、林二人留在上海观察形势。7月21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电告朱德、毛泽东称，我们在庐山力争无效，遂来上海、南京暂观时局变化，如中日全面开战，则《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即可发表。

7月23日，朱德在陕西三原云阳镇红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红军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等问题。

9月6日，中国共产党设立“陕甘宁边区政府”。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9E%E6%B2%AA%E4%BC%9A%E6%88%98

淞沪会战（又称八一三战役或上海战役；日本称为第二次上海事变）爆发

于1937年8月13日，是中国和日本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第一场大型会战。“淞”是指吴淞江（发源于太湖，汇入黄浦江，后汇入长江，再注入东海。在中国上海市区内河段，吴淞江习称为苏州河，简称“淞”），“沪”是上海的简称。

卢沟桥事变后，蒋中正为引起国际社会注意，而在上海主动发起战役。对中国而言，标志着卢沟桥事变后，中日两国之间的不宣而战，由地区冲突真正升级为全面战争。即便日本时为列强，亦动员全国，投入全面战争。例如随即大量增加公债发行，并发起了日本全国性的“消费节约运动”。

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在南方又集中兵力约28万人，陆海空三军联合猛烈进攻上海、南京地区。战斗在当时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的市区和郊区展开。上海是中国当时首都南京门户，又是中国经济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国民政府在此地指挥军队顽强抵抗。上海作为当时中国第一大商港，每年对外贸易额占全国二分之一以上。战役期间，上海法租界和苏州河以南的半个上海公共租界实行武装中立，分别划为法、英、美、意4国军队的防区。前线官兵表现英勇作战精神，在日本军猛烈炮火下牺牲巨大。苏州河以北的公共租界及其越界筑路地区属于日军防区，亦是日军在上海的作战基地。日本军原以为战役很快结束，梦想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没料到在上海地区战争持续三个月。中日双方共有约100万军队投入战斗。以硬打硬拼式单纯防御，来对付优势装备日本军，在战略上不利；1937年11月12日，日本军攻陷上海。

背景

西安事变

1932年1月28日晚，日军突然向上海闸北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史称“一二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将陆军大学由北平迁南

京，从第十期起改为每年招考一次，还增设特别班、参谋班、将官班等，培训军事人才，原有日本教官均解雇，改聘德国军官担任；秘密成立警卫执行部，由唐生智兼主任，筹备业务如：拟订各地作战计划、规定最高级指挥机构、划分战区设立司令长官、修筑国防工事、筹划江阴附近之长江封锁工程等；成立京沪警备司令部，由张治中任司令；增建苏州至嘉兴铁路。

1935年，由林蔚定稿之国防计划，主要内容是在郑州、开封、徐州、海州及河南北部汲县、新乡、辉县地区和京沪杭地区设施防御阵地。11月19日，上海公共租界一名日本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队员中山秀雄被射杀，为中山水兵射杀事件。由于日本海军与上海领事馆担心日本人社群的不安情绪爆发，这个杀人事件在案件发生后半年才公布。事件的嫌犯杨文道于1936年5月遭国际租界外国警察队逮捕。1946年10月12日，杨文道重新审判后改判无罪。

1936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为准备对日作战，把全国划分为几个国防区，张治中奉命兼任京沪区军事负责长官。张治中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名义设置一个高级教官室，作为备战之实际司令部，武职派在参谋处，文职派在秘书处。半个多月以后，高级教官室移驻苏州，先选定狮子林作为办公处所，后来移驻留园，决改对外名义为“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

1936年发生日侨萱生矿作枪击案与日本水兵遭袭案，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全员出动在闸北一带搜查，蒋中正电令何应钦：“据昨今形势，对方已具一逞决心，务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国军第三十六师由无锡推进至苏州附近；第八十七师由江阴推进至常熟、福山一带；原在南京附近之第八十八师推进至江阴、无锡；并秘密设扩充上海保安总团。12月12日，西安事变突然发生。在调兵遗将计划之下，原驻在京沪区之第三十六师、第八十八师被调走。这顿挫淞沪作战准备。张治中对抗日感到忧心。第八十八师8个月后被调回（开战前一刻）；第三十六

师则到八一三爆发才被调回，未经集结（8月13日奉令开拔，津浦线途中）就直接加入战场，对抗战来说是一个顿挫。

中国共产党得知西安事变后“欣喜若狂”，要求将蒋中正押至保安交由人民公审处以死刑，但遭到苏俄的强烈反对：“克里姆林宫的战略家深知，蒋是亚洲大陆足以发动抗衡力量，以阻止、防御日本进攻的唯一东方军事领袖。因此他们爱惜蒋中正的性命。”甚至不惜以断绝双方关系要胁中共，斯大林下令限十日内释放蒋介石。毛泽东对斯大林不杀蒋的电令“怒气填胸”。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之“三位一体”劫持蒋中正，陈诚认为：“此举名为抗日，实则脱离中央而走联俄投共之途径，较之两广问题，更为严重。”中共在西安事变后乐观认为：“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使中央军不敢猛进，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之局面。”最终在苏俄强力介入下，中共暂缓反抗中央军的活动并与国民政府展开合作。

蒋中正脱险后，认为“内乱症结仍在共党”，决心不准张学良再回西北，并从行政上取消“三位一体”的依据，1937年1月5日，以顾祝同、孙蔚如等取代张学良、杨虎城。东北军将领则同意中央题案调往豫、皖两省，三位一体宣告解体。淞沪会战之增援部队多受到内乱剿共牵制，渡江困难、步行途中，而无法限期支援上海错失时机。

西安事变之后半年，淞沪警备司令部新修京沪间电报电话线路四条、南翔镇通至沪西虹桥机场附近之苏州河木桥、绘制详细之上海日军据点位置及全市交通路线图、增设浦东各县沿海观察哨、增设警察总队、修筑国防据点工事29处、做好南市黄浦江封锁计划、组织别动队等。上海地方领袖杜月笙利用其地方关系，配合国军预定之作战计划，在闸北一带要点，租贷民房，在室内密建钢箸水泥掩体，平时不落痕迹，使用时打开枪口。

平津战事

1937年7月9日，蒋电令宋哲元："从速回驻保定指挥，此间决先派四师兵力增援。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并电令秦德纯："加强北京城内防卫，望勿再为日军缓兵之计所欺"。但宋哲元却下令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得抵抗。"并撤销北平市内的戒严，希望与日本军交涉和平解决，以保存个人实力；秦德纯则致电钱大钧："务必阻止中央军北上"。由于已摒弃安内攘外的方针，韩复榘、宋哲元等派系山头纷纷要求中央势力不得介入，一时间蒋也莫可奈何。徐永昌观察后表示："队伍太杂，能战者甚少，情形殊难描写。"7月15日，日本人宣布坚决要求第二十九军撤离平津地区；南京中央政府宣布不再授权冀察政务委员会作出任何让步，并派军队沿平汉铁路北上，集结在北平以南100英里。7月29日，蒋中正发表声明："所有平津军事失败问题，不与宋事，愿由我一身负之。"日本政府对外国记者宣布：他们不能容忍中国政府对华北"地方"事务之"干涉"。7月30日，北平沦陷。7月27日，日本在30,000名冀东反共保安队帮助下解除通州800名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九独立旅武装。7月28日，天津大约有3,000日军；李文田召集600名中国警察同日军作战。在通州总共400名日本军政人员全部被冀东反共军官训练团消灭。7月29日，日军轰炸南开大学。7月31日，日军占领天津。

淞沪会战之决策

西安事变后，张治中卸除中央军校教育长一职，专任京沪分区警备司令官。1934年至1937年春天，国民政府预估日军会从上海与杭州湾北岸登陆，因此动员第三十六师、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在苏州吴县、福山镇之间构筑吴福线（苏福线，预定226个国防工事，其中已完成157个），无锡、江阴之间构筑锡澄线（第三十六师驻无锡；第八十七师驻江阴、常熟；第八十八师驻苏州）。淞沪线是从上海到吴淞口，苏福线是从苏州到

福山镇，锡澄线是从无锡到江阴，这些工事都是在极端保密下完成的。另有乍浦、平湖镇、嘉兴之间的乍平嘉线（第五十七师阮肇昌负责构筑），海盐经嘉兴至吴江的海嘉线国防工事。

蒋开辟淞沪战场，目的是分散日军兵力："敌军战略本以黄河北岸为限，如不能逼其过河，则不能打破其战略，果尔，则其固守北岸之兵力绰绰有余，是其先侵华北之毒计乃得完成，此于我最大之不利。我欲打破其安占华北之战略，一则逼其军队不得不用于江南，二则欲其军队分略黄河南岸，使其兵力不敷分配，更不能使其集中兵力安驻华北。中倭之战必先打破其侵占华北之政策，而后乃可毁灭其侵略全华野心。总之，倭寇占京沪，其外交政策已陷于不可自拔之境，而其进占鲁南，则其整个军略亦陷于不可收拾之地也。"

蒋和德国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晓得华北平原无险可守，但上海街道和周边地区水道满布，对中国轻装备部队有利。法肯豪森认为，仅在沿海地区做初步抵抗就撤至平汉铁路，其持久抗战构想将使沿海地区过早放弃，于是外国物资来源将会断绝。其建议为国民政府采纳，1936年起开始在京沪、长江构筑国防工事。蒋百里建议："沪宁方面，敌人不利于使用大部陆军，我方应取速决主义，不宜多控制预备部队于后方，使敌人能以少数兵力，牵制我大部兵力。平津方面，敌人仍将集中优势兵力，我方应取持久主义，兵力应有纵长之配置。"

7月27日，国民政府海军部长陈绍宽奉命在行政院会议上报告，将实施在长江江阴段沉船以封锁航道的计划。

7月30日，张治中判断：

我在北方作战，固不宜破坏上海，自损资源，然若敌方有左列征候之一，如：1. 敌决派陆军师团来沪，已开始登陆输送时；2. 敌派航空母舰来沪时；3. 敌在长江艇队来沪集会时；4. 敌在沪提出无理要求，甚至限期答

复，即断定敌发动无疑。则因我主力军远在苏常以西，输送展开在在需要，且上海保安团抵抗力薄，诸种关系，似宜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

南京表达同意，覆电："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

1937年8月4日，白崇禧奉蒋电召飞抵南京，委白任副参谋总长职。中国最高当局知日本为贯彻其大陆政策，必不会停止行动，乃于南京召集全国将领开会，表示决心抗战。8月7日，南京国防会议里《关于中央之军事准备》："全国军队列入抗战序列者，第一线约100个师，预备军约80个师，使用于河北约50个师"主战场以河北、山东北部、河北南部为第一战区。但何应钦认为开战有困难："财政开支扩大，枪械、子弹仅可供六个月之需，防御工事未完成，空军不足等。"蒋中正选定上海为第二战场，是野战战略上判断在经济、军事、政治上，日军必然会追随国军行动，所以主动对上海日军发动攻势。国民政府外籍顾问端纳曾建议："对日作战须先消灭上海、汉口、青岛之日本驻军，再全力对付平津战事。"军事委员会管理部代部长姚琮："其利有五：指挥利便、集中容易、补给较便，江南多港湾不利于敌；易动列强观感而得多助。"因此，1937年《国防作战计划》规定："长江下游地区之国军，于开战之初，应首先用全力占领上海，无论如何，必须扑灭在上海之敌军，以为全部作战之核心，尔后直接沿江海岸阻止敌之登陆……不得已时，逐次后退到预设阵地，须确保乍浦、嘉兴、无锡、江阴之线，以巩固首都。"由于以上原因，蒋介石决定沿沪宁铁路调动军队，迎接即将来临的战争。

中国情势演变

中国一切阶级都日益认识到，进一步对日本屈膝妥协，对中国一切阶层都将意味着毁灭。1937年8月9日下午五时半，日本帝国海军陆战队西部派遣队中尉大山勇夫带一等兵斋藤要藏，乘车由法租界入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内，于附近滋事，中国保安队阻其前进，双方发生冲突，保安队死一人，

大山等亦被击毙，由是引起交涉。是为虹桥机场事件。此事发生，增加上海战争危机，但双方均表示用外交方式解决。中国亦派大军分布在真茹、闸北及京沪铁路沿线，藉以自卫。张治中被任为京沪警备司令，所统率之部队为第八十八师、第八十七师及教导总队。日军以此为借口，要求国民政府撤出上海保安队，拆除一切防御工事，并向上海增兵。中国持不扩大事态方针，由上海市长俞鸿钧和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周珏分别向日本驻沪总领事和日本海军通话，与日军折冲。当时日方声明，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本日未有奉命外出。纵令有人外出，也决不会有到虹桥机场。因为日本官兵是绝对不应该到机场的。

8月10日，日本运送增援部队到上海。

8月11日，日军佐世保第二舰队军舰16艘开到，陆战队2,000名登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率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赴上海组织防御。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向闸北地区推进，占领北火车站——宝山路——八字桥——江湾路之线，迅速展开占领阵地，利用杜月笙构筑之家屋内工事，打开枪口清扫射界，构成街市战阵地。日本驻上海领事冈本谒见俞鸿钧市长，对虹桥事件要求撤退保安及撤除防御工事。蒋中正命令受过精良训练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教导总队，装甲部队、重炮部队等陆续集结至上海市郊；蒋中正与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均坚信“上海必须固守”，因为华北平原无险可守，日本机械化部队可横行无阻，而上海的街道与水道，则有利于中国轻武装部队作战。又淞沪停战协定共同委员会亦助日本要求中国撤兵，均为俞氏严予驳斥，谓：“中国无挑衅意思。日既先行破坏协定，军队行动，绝对自由。”中国外交部亦声明：“中国在本国领土内，实行自卫，今后一切责任，应由日方负之。”上海严正驳斥，英、美、法、义外交官要求国民政府将上海列为不设防城市。同时，日军以军舰20余艘护送运输舰向上海增补军需品，并动员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约3,200人）与在乡军人、义勇团。俞鸿钧认为：“日本一面赞同以外交方式解决本案，一面又增兵威胁，

殊属不合。”下午9时，张治中接到南京统帅部之电话命令，将全军进至上海附近。国军原定于8月13日拂晓前开始攻击，但由于英美等驻华使节正在调停，中国为顾及国际视听下令前线张治中暂停攻势：“希等候命令，并需避免小部队之冲突为要。”日军并将其第1、3舰队30余艘舰艇集中在吴淞口。

8月12日，国民政府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推蒋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统率全局，领导对日抗战。中国海军完成对江阴水道阻塞作业，共沉大小船只35艘。国军第八十七师王敬久第二五九旅抵虬江码头；第二六一旅抵蕰藻浜车站、吴淞镇。第八十八师孙元良第二六二旅原本集结区为真如，但孙元良鉴于一二八作战经验，独断下令第二六二旅往闸北推进。 是日下午3时，应日方要求，召开淞沪停战协定共同委员会会议。会议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会议厅举行，出席者除中日双方外，尚有英、法、美、意四国代表，日方代表冈本声称：今晨中国保安队及正规军队，已在近郊设置防御工事，此种行动，违反停战协定，应请共同委员会加以注意，采有效办法，加以制止。俞鸿钧当即驳斥：“共同委员会设置之目的，在维持上海之和平与治安，并非协助日本政府实施侵略政策”。“虹桥事件发生后，日方曾一再表示静候调查事实真相，以外交方式解决，但一面竟军舰云集，军队大增，军用品亦大量补充，此外尚有大批军舰正在途中，源源而来。此种措施，不独妨碍各国侨民之安全，且对中国为一种威胁，且足发生危害之行为。中国在本国领土内，当然有权采取自卫之行动。……我方秉承中央所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一贯政策，对侨居上海之各国侨民，仍当加以保护。”各代表提议可否将保安队稍稍后退以免冲突。俞鸿钧答：“停战协定早已为日方破坏，故本日实无召集共同委员会之必要。”“我国军队，在本国土地行动，有绝对自由之权，此则未容他人之置议。”“为维持上海之和平治安计，如日本将增加之军舰与军队调回，则我方对撤退保安队一点，亦愿加以考虑。”会议毫无结果而散。日本在会上表示竭力避免战争，在行动上作好战争准备。日陆军省动员30万兵力分赴上海与青岛。日本海

军陆战队在12日晚陆续登陆，在越界筑路区一带布防。

日本情势演变

一二八事变以后，日方以虹口日军营房为核心，在周边租界、纱厂构筑百余处坚强掩体工事。日军参谋本部于卢沟桥事变后拟订〈处理华北时局要领〉："如抗日行为波及华中华南时，亦以不出动陆军兵力为原则"。日本参谋本部以"防苏"为战略重点，认为中国华北地方割据，派系独霸一方色彩浓厚，中国将无力发起全面战争。日本参谋本部井本熊男：

对华兵力使用限度的拘束，不用说，是来自对于苏俄的考虑。当时的想法，对苏兵力，加上预备队，是23个师团。而总动员兵力是30个师团，所以对华使用兵力只能有7个师团。因此没有向华北增兵的余裕。若有个万一时，是想就近从华北方面向东北转用兵力；但也觉悟到，这样的兵力转用，几乎是不可能的难事。

但稻田正纯认为：早在7月10日通过了由武藤章大佐所拟订之日本本土三个师团动员案，已从根本上推翻石原莞尔部长的不扩大方针。

日本原本对苏联军队有所顾虑，未料到斯大林于1937年6月11日进行大肃军（大清洗），连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红军拿破仑）都遭到杀害。6月30日，日本舰艇在黑龙江干岔子岛击沉苏联炮艇，日本驻苏大使与苏联交涉时发现对方态度软弱，日本军部因此认为苏联内部不安，于是扩大对华战事。

日本在进攻华北同时，又于1937年8月9日制造日军官兵驾车直冲虹桥机场侦察被击毙事件（即"虹桥事件"）作为借口，策划进攻上海。

7月2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采纳石原莞尔的建议，派出宫崎龙介为和谈密

使，并事先告知中国驻日武官萧叔宣安排相关事宜，预定由神户出发时被日本军部查获，遭便衣宪兵逮捕。7月28日，日本政府下令撤走长江沿岸日侨，上海日侨准备以武力保护不在撤退之列。7月29日，日本参谋本部制定《对华作战计划大纲》："一、以中国驻屯军进行作战，在平津地区对中国军队尽量加以沉重打击。二、在情况不得已时才在青岛和上海附近作战。"

当时日军在河北、绥远、平津一带。8月10日，日本海军希望控制长江流域，日本海相米内光政要求陆军出兵，但遭到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与参谋本部石原莞尔的反对，经过争辩后决定派遣最小限度的兵力进行压制。8月11日，日本第三舰队驶集黄浦江及长江下游浏河以下各港口。到8月12日止，日本借此集中军舰30余艘，海军及陆战队1.5万余人，于8月13日向国军进攻，淞沪战争遂告发生。日本集结驻上海陆军及海军陆战队约万余人。

参战部队

中国部队

1937年9月21日以后，第一期防御部队，第三战区司令官蒋中正，副司令顾祝同。

左翼作战军　中央作战军　右翼作战军

总司令陈诚　总司令朱绍良　　总司令张发奎

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

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兼

第十一师，师长彭善

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

第十四师，师长霍揆彰

第四十四师，师长陈永

第六十师，师长陈沛

第六十七师，师长黄维

第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

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

第五十八师，师长俞济时兼

第一军，军长胡宗南

第一师，师长李铁军

第七十八师，师长李文

第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

第五十六师，师长刘尚志

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朱绍良

左翼王敬久

第七十一军，军长王敬久

第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兼

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

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兼

第六十一师，师长钟松

独立第二十旅，旅长陈勉吾

炮兵第三团第二营，团长卢蔚云

重迫击炮第三营

战防炮第一营

右翼孙元良

第七十二军，军长孙元良兼

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兼

第十八师，师长朱耀华

上海市保安总团，总团长吉章简

炮兵第三团第一营，团长卢蔚云

战防炮第一营一连

步兵学校小炮排

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

第二十八军，军长陶广

第六十二师，师长陶柳

第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

第五十五师，师长李松山

独立第四十五旅，旅长张銮基

炮兵第二旅第二团

第十九集团军薛岳

第四军，军长吴奇伟

第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

第九十师，师长欧震

第六十六军，军长叶肇

第七十七师，师长罗霖

第一五九师，师长谭邃

第一六〇师，师长叶肇

教导旅

第七十五军，军长周碞

第六师，师长周碞兼

独立第三十四旅，旅长罗启疆

第六十九军，军长阮肇昌

第八师，师长陶峙岳

第十五师，师长王东原

第十六师，师长彭松龄

第五十七师，师长阮肇昌兼

第三十二师，师长王修身

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

第七十军，军长李觉

第十九师，师长李觉兼

第四十五师，师长戴民权

第五十二师，师长卢兴荣

新编第三十四师

暂编第十一、十二、十三旅

国军参战军队未必准确，部分仅列名战区序列，实际可能被移转至杭州湾、浙东防御。其间中国空军阎海文上尉之壮烈事迹受到日军赞扬；沈崇诲上尉因机械故障与日舰同归于尽。

日本部队

日本第一次大规模增兵

8月14日首批编成部队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参谋长饭沼守少将

第3师团，师团长藤田进中将（8月18日于热田港启航，8月23日到吴淞张华滨登陆）

第11师团，师团长山室宗武中将（8月18日于多渡津启航，于8月23日到达宝山川沙河口，强行登陆成功）

独立飞行第6中队

日本第二次大规模增兵

日本参谋本部于9月7日以“临参命”第916号命令，调以下部队转属上海派遣军。该部队于9月12日后，陆续进入淞沪战场。

后备步兵10个大队

炮兵3个大队

工兵2个大队

重藤支队（台湾守备队5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中队）

日本参谋本部于9月11日以“临参命”第919号命令，下令派遣下列部队增援淞沪。

第9师团（9月23日自大阪启航，27日在杨树浦至吴淞间登陆）

第13师团（9月27日自神户启航，10月1日在张华滨、虬江口一带登陆）

第101师团（9月18日自神户启航，22日在吴淞、杨树浦间登陆）

野战重炮兵第五旅团

飞行团

日本第三次大规模增兵

日本参谋本部于10月20日发出“临参命”第119号命令，正式组建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参谋长田边盛武。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会同上海派遣军攻

略上海命令。

第6师团

第18师团

第114师团

国崎支队

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

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

日本参谋本部于10月30日发出“临参命”第134号命令，将第16师团编入上海派遣军的战斗序列。

1937年虹桥事件以前，日本在上海军舰本有12艘，8月11日又有佐世保第2舰队军舰16艘开到，陆战队2,000名登陆。日本为支援上海作战，日本海军以加贺、龙骧、凤翔等航母于长江口外之佘山岛一带，策应日本本国机群作战。

日本第1舰队、第3舰队除了5艘于吴淞口外，川内、由良、名取、鬼怒之二等巡洋舰，与时雨、白露、夕暮、有明、初霜、子日、若叶、初春等新式一等驱逐舰，早在8月10日前停泊于淞沪附近。

1937年8月14日，中国空军飞机意外坠弹于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交接处的大世界，造成上海平民三千人死伤。

“八一三”

8月13日上午9时，日军先以坦克车一辆，掩护4、5人试探进击闸北，国军即予以还击，一时双方枪声大作。至11时稍停。上海市长俞鸿钧曾向日方

提出严重抗议，并将抗议书录送领事团。上午，中国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进至上海市区，第九集团军司令张治中下达对虹口警戒，集团军主力于上海北站、江湾、吴淞一线，第八十八师一部对丰田纱厂之日军警备；第五十七师第一六九旅进至徐家汇至工部局苗圃一线；独立第二十旅第六五九团，集结于北部泾桥及虹桥机场。日军炮击后进攻，中国军队立即反击，淞沪抗战正式爆发。同时日军舰艇主动开始向闸北国军阵地进行炮击，下午3时，日军在海、空火力支援下，由租界再次向闸北地区宝山路、八字桥和天通庵路发起进攻，国军第五二三团第一营开始在上海八字桥遭遇日本海军陆战队，双方进入战斗状态。下午3时半，中日两军正式开火。日军司令部设于杨树浦公大纱厂内，当日国军克复八字桥，日军攻宝山路青云桥，占引翔港。日军以虹口日租界为依托，在长谷川清指挥下，先以一部进攻天通庵、横浜路一带，接着以主力进攻宝山路、八字桥、天通庵，均被中国军队击溃。日军在坦克掩护下沿宝山路进攻闸北、虹口，国军守军第八十八师予以还击。是日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第九集团军于8月14日拂晓开始攻击虹口附近地区日军。两军前哨部队在八字桥遭遇，易谨营长向日军射击。

国军第八十八师发起总攻，突击日本海军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本部；然而在日军坚固要塞阵地及第3舰队驻上海驱逐舰有力舰炮支援下，国军攻势受挫。

“八一四”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痛斥日本对中国之侵略，宣布实现天赋自卫之权。声明书原文如下：

“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近年来，中国政府及人民一致所努力者，在完成现代国家之建设，以期获得自由平等之地位；以是之故，对内致力于经济文化之复兴，对外则尊重和平与正义，凡国联盟约，九国公约——中国曾参加签订者，莫不忠实履行其

义务。盖认为“独立”与“共存”，二者实相待而相成也。乃自九一八以来，日本侵夺我东四省，淞沪之役，中国东南重要商镇，沦于兵燹；继以热河失守；继于长城各口之役；屠杀焚毁之祸，扩而及于河北；又继之以冀东伪组织之设立；察北匪军之养成；中国领土主权，横被侵削。其他如纵使各项飞机在中国领土之内不法飞行，协助大规模走私，使中国财政与各国商业同受巨大损失；以及种种毒辣之手段：如公然贩卖吗啡、海洛因，私贩枪械接济盗匪，使中国社会与人种陷入非人道之惨境。此外无理之要求与片面之自由行动，不可胜数。受一于此，已足危害国家之独立与民族之生存，吾人敢信此为任何国家任何人民所不能忍受。以迄于今，吾人敢言：中国之所以出此，期于尽可能之努力，以期日本最后之觉悟而已。及至芦沟桥事件爆发，遂使中国几微之希望归于断绝。

芦沟桥事件之起因，由于日本大举扩张天津驻屯军，且屡于辛丑合约未经允许之地点施行演习；日本此种行动，已足随时随地引起事变而有余。而本年七月七日深夜，日本军队竟于邻近北平之芦沟桥施行不法之演习，继之以突然攻击宛平县城。我守土有责之驻军，迫而为正当防卫；我无辜之人民，于不意之中，生命财产毁于日本炮火之下。凡此事实，已为天下所共见。

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日本之行动有深足注意者，即其口头常用就地解决，及不欲扩大事态之语调；而其实际，则大批军队及飞机、坦克车，以及种种新战争利器，由其本国及朝鲜与我东北，源源输送至河北境内。其实行武力侵略，向我各地节节进攻之事实，绝不能为其所用之语调，所可掩蔽于万一。中国政府于芦沟桥事件发生后，犹以诚意与日本协商，冀图事件之和平解决。七月十三日，我外交部曾向日本大使馆提议双方及时停止军事行动，而日本未与置答。七月十九日，我外交部长复正式以书面重提原议，双方约定一确定日期，同时停止军事动作，同时将军队撤回原驻地点。并曾声明：中国政府为和平解决此次不幸事件起见，准备接受国际公法或条约所公认之任何处理国际纠纷之和平方法，如双方直接交涉、斡

旋、调解、公断等等。然而以上种种表示，均未得日本之置答。

于此之际，中国地方当局为维持和平计，业已接受日本方面所提议之解决办法。中央政府亦以最大之容忍，对于此项解决办法，未予反对。乃日本军队于无可借口之中，突然在芦沟桥、廊坊等处，再行攻击中国军队，并于本年七月二十六日致哀的美敦书，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北平。此则予双方约定解决办法以外，横生枝节，且为吾人所万万不能接受者。日本军队更不待答复，于期限未至之前，以猛力进扑中国文化中心之北平，与中外商业要枢之天津。南苑附近，我驻军为日本轰炸机及坦克车所围攻，死亡极烈；天津方面，人民生命横遭屠戮，公共建筑、文化机关以及商店、住宅，悉付一炬。自此以后，进兵不已，侵入冀省南部，并进攻南口，使战祸及于察剩凡此种种，其横生衅端，扩大战域，均于就地解决及不扩大事件语调之下，掩护其进行。

当此华北战祸蔓延猖獗之际，中国政府以上海为东方重要都会，中外商业及其他各种利益，深当顾及，屡命上海市当局及保安队加意维持，以避免任何不祥事件之发生。乃八月九日傍晚，日军官兵竟图侵入我虹桥军用飞机场，不服警戒法令之制止，乃至发生事故，死中国保安队守卫机场之卫兵一名，日本官兵二名。上海市当局于事件发生之后，立即提议以外交途径公平解决；而日本则竟派遣大批战舰陆军以及其他武装队伍来沪，并提出种种要求，以图解除或减少中国自卫力量。日军空军并在上海、杭州、宁波以及其他苏、浙沿海口岸，任意飞行威胁，其为军事发动，已无疑义。迨至昨日以来，日军竟向我上海市中心区猛烈进攻，此等行动，与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向河北运输大批军队，均为日本实施其传统的侵略政策整个之计划，实显而易见者也。

日本今犹欲以淞沪停战协定为借口，将使中国于危急存亡之际，尚不能采用正当防卫之手段。须知此等停战协定，其精神目的，即欲于其地点内双方各自抑制，以期避免冲突，不妨碍和平解决之进行。若一方自由进兵，

而同时复拘束他方，使之坐而听受侵略，此为任何法理任何人情所不能曲解者。

中国今日郑重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际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此等条约，其最大目的，在维持正义与和平。中国以责任所在，自应尽其能力，以维护其领土主权及维护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日本苟非对于中国怀有野心，实行领土之侵略，则当对于两国国交谋合理之解决，同时制止其在华一切武力侵略之行动；如是则中国仍当本其和平素志，以挽救东亚与世界之危局。要之，吾人此次非仅为中国，实为世界而奋斗；非仅为领土与主权，实为公法与正义而奋斗。吾人深信，凡我友邦既与吾人以同情，又必能在其郑重签订之国际条约下各尽其所负之义务也。”

蒋鉴于敌军装备优良，国军不利于阵地作战，乃拟定一长期作战方略，利用广大之空间土地，求得时间上持久之胜利，不重一城一地之得失，而以积小胜成全大局；同时发展敌后武力，使敌军活动仅限于点线，首尾不能兼顾。是日起，上海战况即趋剧烈，日海陆空军全体出动，两方互以大炮轰击，日夜不停，江湾路及北四川路各处，中国军队节节胜利。蒋中正下达总攻击令，命令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夺回8月13日被日军攻击占领的市区据点，并向日军阵地进攻。随后大日本帝国陆军向上海增援，中日军在上海市狭窄的巷弄内厮杀攻防，双方都死伤惨重。中国空军飞上海作战，曾炸日领事馆及出云号旗舰未中，然在浏河则炸沉日舰一艘，伤四艘，中国飞机一架受伤。中国空军轰炸汇山码头、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炸伤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等10余艘日舰。

上海上空，空战激烈，日方之高射炮火，满布天空，吴淞口炮战亦烈。中国飞机一架因弹架损坏，二弹落大世界前，死伤市民1,000余人，至为痛惜。京沪警备部队改编为第九集团军，张治中任总司令，开始全面反击日军。

14时50分，日机最精锐之联队鹿屋及木更津海军航空队18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由台北松山机场起飞后分两路侵袭，9架轰炸杭州笕桥空军基地，9架轰炸广德机场。下午，日军6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由台湾飞杭州、广德、长兴轰炸，被国军击落3架。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防空总台首任少将总台长陈一白当即无线电急告从南京开会直接飞抵刚刚降落的空军第四大队高志航少校大队长，在不到30分钟空战中，高志航击落日机2架，全大队击落日机6架。日机被空军第四大队高志航部痛歼，造成九比零之纪录。中国空军全部安然返防，为胜利之始。当晚日本广播称“18架飞机中，有13架失去联络”。此后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提议以后每年8月14日为中国空军节。各地爆发多起空战，空军有效拦截日军侵扰，据不完全统计当日光加贺号便折损10架攻击机，在8月时双方都仍互有胜负。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下达总攻击令，命令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与第八十七师夺回8月13日被日军攻击占领的持志大学、五洲公墓、沪江大学、八字桥等市区据点，并向日军阵地纱厂进攻。第八十八师第二六四旅长黄梅兴在持志大学战斗过程被迫击炮击中阵亡。第八十八师进攻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

同日，日本近卫内阁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决定对中国采取“断然措施”。

八月进攻阶段

8月13日以后两个星期里，战斗集中在上海心脏地区3英里长战线上，日本海军大炮轰炸城郊闸北和江湾，阵地前沿整个街区放火，形成火墙以防备侧翼进攻，中国战士和日本海军陆战队员冲上去拼死厮杀。8月15日，日机

16架袭南京，中国飞机升空迎战，击落日机6架，中国损失1架。15日、16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机再袭杭州、南京、嘉兴、南昌等地，被国军击落达46架之多，日鹿屋及木更津两机队几尽歼。8月15日，蒋中正日记中记道："倭寇空军技术之劣，于此可以寒其胆矣！"台风过境上海。中国军队在虹口曾迫入公共租界中区，挺进至汇山码头，日本海军操场一带有血战。中国下令总动员，沪杭为第三战区，作战方针为"战区以巩固首都及保有经济策源地之目的，迅速围歼上海附近之敌，并打破其沿海沿江登陆之企图"。淞沪之战国军由陈诚率大军增援，参战部队达50余师，日军增援亦在30万以上，藉海空军掩护，对国军发动猛攻。日本下令总动员，以第3师团、第11师团为基干编组"上海派遣军"，日本天皇任命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任务为"协同海军击灭上海附近之中国军，并占领上海及其北方地区要线"。日本帝国政府发表声明：

帝国已达到其能隐忍之限度，为着膺惩支那军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之反省，现今不得不采取断然之措施。

8月15日，日本军机20余架炸杭州，16架炸南京，在杭州被国军击落8架，在南京被击落6架。8月15至18日，中国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及上海警察、保安队，进攻上海市区日军，中国军队伤亡严重，中日战事日趋扩大。

8月16日在句容被国军击落2架，击伤1架。在上海被国军击落2架，在扬州、镇江被国军击落3架，在嘉兴被国军击落2架。8月17日，国军第三十六师到达南翔。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主张抵抗："日本之所谓不扩大者，盖为对内欺君民，对外欺国际之口号，对我国则藉获暇豫，大量征发，积极充实战备。本月中旬后必大举攻我，最小限度亦须完成其华北五省计划。"共计3日来，日本军机损失已在30架以上，国军军机仅受伤数架，空军人员死2人，伤5、6人。

8月18日，日军第3、第11师团完成临时动员，分别由热田港、多渡津港出

航，集结于马鞍群岛。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由苏州一带进入战场。国军又停止进攻，英、美、法、德、义五国向中国提议："中日双方由上海撤兵，划上海为中立区"，日方拒绝。蒋中正派陈诚与熊式辉视察上海战况。蒋中正下令任命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引来张治中不满："陈辞修资格太浅，怎能指挥我！"冯玉祥虽是两人直属上司，但无法调和两人摩擦。

8月19日晚，驻守四川北路的王敬久率领87师逼近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次日，87师在被日军攻击下退回四川北路阵地。

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第三战区，以冯玉祥为司令长官，顾祝同为副司令长官。将淞沪战场划分为5个区域防守。汇报上熊式辉认为上海不宜打。陈诚建议："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故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铁路南下直扑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事以牵制之。"蒋对陈分析很赞同，说："一定打。"陈说："若打，须向上海增兵。"同日，宋希濂率领的第三十六师进攻汇山码头，虽然一度攻入，但最终并未能夺取。

8月21日，日军日久米师团抵吴淞口。日军军舰猛攻狮子林、张华浜、蕰藻浜、浏河、杨林口。中国为保证作战安全，斯大林为解除东顾之忧及使中国共产党苏醒，在南京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8月22日，上海市区战争移至百老汇路及北四川路附近。是晚，日军松井石根大将率第3、第11师团及第13、第16师团各一部，同时登陆吴淞、川沙，进攻宝山、罗店、浏河一线。日军在海军炮轰配合下，发起两栖作战。国军第五集团军于晚间对日军实施全线反攻。原打算由汇山码头突破，可惜攻击过早，第九十八师尚未赶到，导致第三十六师之攻击陷入被动，陈诚："我军以五师之众，对数千的敌陆战队实行攻击，竟未能奏功，实在是当时部署种种不当的缘故。"

8月23日，日舰31艘集蕰藻浜两路局码头冒死登陆，卒为中国军队肃清。是

日晨，日军第11师团与中国海防司令沈鸿烈部战舰激战。同日，日军又在宝山、川沙间登陆。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诚奉命守罗店，经激战后，未几即成焦土。下午，上海市闹区之先施百货公司被日机投掷一弹，死伤700余人，四周商店均震毁。

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再次通电呼吁中日停战；他以为日军损失不小。但此时日军第3、11师团开始向吴淞铁路码头、川沙口（非浦东川沙，乃今宝山小川沙）实施强行登陆，并击退了沿岸守军。国军江防司令刘和鼎电报请求支援，张治中覆电："敌人于狮子林、川沙口登陆，即与陈诚次长商定部署，以第11师向罗店北进，支援第56师之作战，而由正面抽出兵力为预备队……是时据报蕴藻浜附近同时有敌军登陆，我守军迎击中……"

8月24日，中国军队反攻狮子林、吴淞，日军一度被击退。然日军初步登陆者5,000人终未驱尽，留驻于吴淞一带。陈诚第十五集团军第11、第14、第67、第98师与日军血战。张治中电："连日敌机甚为活跃，全日在各处轰炸，毫无间断，我军日间几无活动余地。"白崇禧："无制空权，仗无法打。我官兵日间因飞机不能动，夜间因探照灯亦不能动。长期抵抗需另作打算。"

8月25日，日本任命松井石根到上海充任统帅，同时宣布封锁中国沿海口岸。英国大使许阁森由南京乘汽车去上海，中途亦为日机投弹，英使受伤。

8月26日，日本外相广田向全世界广播说："日本现在惟一的方针是给中国以打击，使之屈膝，不再有战斗的精神。"同日，日本空军飞到中国首都南京贫民区北府塘炸毁6所学校、1座医院，炸死200名工人。日本海军发表人在上海宣布，对中国海岸线从秦皇岛到北海全部封锁。

8月27日，日本陆军前来增援海军，在长江和黄浦江汇合处登陆。8月28日，日军第11师团推进至川沙口南方地区后，以主力攻占罗店镇。蒋日记

写道："近日战局，渐转劣势，人心乃动摇矣。"

8月29日，德国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建议国军死守罗店："敌之目标，为驱逐我军远离上海，截断我与政治、财政策源中心之联络。目前最要害地点，莫如罗店。宜绝对在该处阻止敌人，使不能犯刘行，更不能趋向嘉定。稳固由南翔经嘉定－太仓之连络，极关重要。"罗店失陷。国军退守闸北、江湾、庙行、双草墩一线。日军一部进逼狮子林。

8月30日，英国向日本提出抗议。在上海初期战争中，日本飞机，大炮曾予我方以相当威胁。吴淞口外集结之日军准备登陆者15,000人，时时企图着陆，均以大炮掩护。南京上海沿线，均遭日机滥炸。英、美、法等国此时虽一再企图调停战事，将上海划为中立区，乃战端已开，无法收拾而不果。日本首相亦作谈话："目前已不能与南京交涉，唯有痛击中国，使之屈膝。"

8月31日，拂晓后，日军以飞机30余架，并以海军舰炮猛击吴淞，强行登陆；日军另一部由市轮渡码头登陆。中国守吴淞的第六十一师的一个团，伤亡过半，不支后退；惟吴淞炮台，仍由上海保安总团固守。张治中将在刘行的第六师调到杨行、吴淞，驱逐登陆之敌。该师于31日夜，向吴淞攻击前进，与敌遭遇于杨行以北地区，发生激战。蒋日记写道："我军转入被动地位矣。"。

九月进攻阶段

9月1日，吴淞失陷，日军在杨树浦登陆进犯。日军浅间支队占领狮子林炮台。9月1日至9月7日，吴淞、狮子林、宝山相继失守。

9月2日，日军岸上兵力遭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阻于罗店一带，原欲用在青岛方面的天谷支队转派增援上海到达吴淞外海，沿吴淞镇、月浦镇、罗店镇的路线推进。9月2日起，日军重兵进攻三官堂第六师阵地，并强渡泗塘河，被击退。

9月3日，蒋中正督促张发奎在金山卫构筑防御工事，但随着10月蕰藻浜、大场告急，原杭州海防驻军移调，造成防务空虚。9月3日至4日，日军连续向三官堂一带进犯。第六师十八旅奋勇阻击，歼敌不少，但该旅伤亡甚众，旅长翁国华和团长朱福星负伤。

9月5日，日军浅间支队联合天谷支队突破月浦镇东方阵地。日军分三步骤进攻：第一步由飞机密集轰炸，再升起观测气球，由炮兵及舰炮进行炮击，摧毁守军工事。第二步以战车掩护步兵推进，炮兵、飞机持续阻绝国军增援。第三步以突破之缺口向国军阵地左右席卷，每前进一小段就构筑机枪掩体，防堵守军反击。 是日晨，日军分由吴淞、张华浜和沙龙口夹击宝山至三官堂阵地。第六师腹背受敌，各村落都被烧夷，火药局守兵全部牺牲，第十七旅旅长丁友松以下伤亡过半，相持至午，该师退守泗塘河。敌军越过泗塘河桥向西侵犯，于是，狮子林、吴淞间联系通道被敌打通，而宝山城中国守军由此陷入重围。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演说："中国方面利用帝国之忍让，侮日抗日之势愈加高涨，战局终于波及华中。至此，政府认为采取从来消极局部之手段已不能收拾局面，不得不积极全面对中国军断然给予一击。"

9月6日，国军第98师师长夏楚中奉令死守宝山。宝山守军第583团第3营姚子青电报："敌兵舰30余艘排列城东门江面，飞机10余架轰击各城门……职决遵命死守。"师长覆电："战至一兵一卒亦须固守，准备充分巷战，万一城垣被陷，亦当与敌偕亡于城中。"姚子青阵亡于东门，除一人翻墙逃出外，守军全数阵亡。陈诚："激战至6日十时，卒以伤亡殆尽，无法支持，全营官兵自营长以下偕城作壮烈之犠牲。"姚子青如此拼死壮举震撼中国。国军伤亡过重，国民政府下达第二期作战计划，命令各部队停止现有攻势，转赴各预定阵地防制。第二期作战指导："如不能达到各个击破敌人之目的时。依状况后退至敌舰炮射程外，以决战目的占领阵地，乘敌海陆军火力不能协调之际，发扬我精神与物质之威力"。

9月9日，日本宣布全国转向战时体制，下令进行第六次动员。

9月10日，日军西村敏雄少佐视查完上海战况回报："中国军的抵抗确实顽强，无论被包围或被炮轰均绝对不后退。派遣军之临时动员以军舰运输而后续部队跟不上，使两师团陷入苦战。"日本陆军认为上海方面兵力过少，即使增兵也只是杯水车薪，但由于必需突破上海方面的悲惨战况，最终不得不同意增兵。日军统率部决定增强上海派遣军之兵力。

9月11日，张发奎集团军（右翼集团军）转进至杭州湾北岸；张治中集团军（中央集团军）退至浏河、罗店、蕴藻浜；陈诚集团军（左翼集团军）退守江湾、洋泾一线阵地。国军第三战区司令电：

为整理淞沪嘉浏一带阵线，节约兵力，俾达韧强抗战之目的，第九、十五集团军即刻转移。第九集团军北站、江湾、蕴藻浜右岸之线转移，占领预筑阵地，但需节约兵力……

日本发布对第9、第13、第101师团及第3飞行团之上海派遣令（临参命第99号）。采取不扩大方针的第一作战部长石原莞尔随即呈报辞职，转调关东军副参谋长，原职由下村定少将继任。

国际情势演变

英国政治战略长期以来不重视华北，集中力量巨额投资华南和长江，加强同国民政府金融联系，希望"和平"解决北方冲突，只要地方性妥协，不会搞中日经济集团；美国官方态度是与他们无关，泛泛同情中国。9月12日，中国正式向国际联盟控诉侵华事变，自13日开始召开第18届国际联盟总会，日本以中日问题应由两国自行解决为方针拒绝参与会议。在日军进攻上海后，日军以上海公共租界工业区杨树浦作根据地，没有考虑英国在此投资1亿英镑之利益，决心迫使南京完全屈服，因此在华英商坚决亲华；美国一向坚持"门户开放"，表明重视中国市场，重申孤立主义，在受威胁地区被要求撤出，10月5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芝加哥演说

预示改变政策，10月6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日本侵略和破坏九国公约。于9月27日召开国际联盟委员会，通过谴责日本军机轰炸中国无防备都市的决议。

9月14日，日军重藤支队登陆贵阳湾，纳入第11师团指挥。日军攻击重点放在罗店镇南方。何应钦："日军在沪共约12万人，不独炮火优于我军，即人数亦已相当。"

中国第一期防御

9月15日，中国防线从江边移开，撤出日本海军火力圈，围绕上海北站固定轴心，战线长40英里。9月17日，中国军队撤至北站、江湾、庙行、双草墩（罗店西南）一线，继续与日军激战。舞厅、戏院、饭店都变成医院收容伤员，妇女自愿当护士，童子军白天深入战场抢运伤兵，商会、工会募捐大批款项购买补给品和慰劳品，上海抗敌后援会向国军供应一切所需。

9月20日，蒋亲自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后方到达部队编组成第十九集团军，加入左翼作战。儿童收集香烟锡箔和空罐头筒，装上金属碎片，做成简易手榴弹；数万人同战壕战士建立定期通信关系，为伤员和康复人员安排各种娱乐节目和讲课班，中小学生到医院替文盲战士写家信。

9月21日，中国军队调整部署。国府军事委员会调整第三战区部署：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朱绍良任中央作战司令，陈诚任左翼作战司令、前敌总指挥，张发奎任右翼作战司令。冯玉祥调任华北第六战区司令官。此时，日军到上海参战有第11、第3两个整师及第13、第16、第101、第9师各一部，计10万余人，炮300余门，坦克200余辆，飞机200余架，与中国第九、第五、第十九集团军对峙于北站、杨行、施相公庙、浏河一线，展开激烈攻守战。文化工作者全国抗敌联合会在上海全市建立几百个分会，会员总数超过10万人；作家、教师、新闻记者一方面坚持本职工作，一方面每天晚

上承担讲课任务。日第3、第13师主力又进攻浏河公路，被中国军队遏阻。

9月23日，张治中辞去前线职务，转调中国大本营管理部部长。顾祝同身边的参谋曾振：“张治中在上海初期作战时，喜欢在报上发表战况，以英雄人物自许，无非是想出风头，博得好评；报纸也有些替他吹的。委员长见报，便屡次告诫，不要发表谈话，他哪忍得住悠悠之口？而上海那些记者，偏偏每天必来……最后大概是受了委员长一顿骂，顾副司令长官也劝他不要说了，张治中才不再发表谈话。”

9月22日，日军谷川支队开始登陆；第101师团于吴淞、上海之间登陆，朝第3师团左翼推进。日军主力突穿国军第十八军阵地。同日，65架日机空袭南京，轰炸30个地方。

9月26日，江湾、闸北中国守军在烟幕弹掩护下进攻，中国军队退至大场、新泾桥、唐家桥带。

9月27日，日军第9师团于吴淞、上海之间登陆。

9月30日，日步、炮、空协同全线进攻，相继突破万桥、严宅、陆桥阵地，全线转移陈行、广福、施相公庙、浏河一线。

中国第二期防御

10月1日，日军第13师团于吴淞、上海之间登陆，被定位为二线兵团。10月4日，日本作战部长下村定召开会议研究“是否扩大华北方面的作战以实施山东作战，或将其停留于适当战线转用兵团于上海方面”，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强调应实施山东作战，但内部最终决定：“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在上海方面的积极行动，以期获得战果。”隔日，决定转用华北兵力将主战场移至上海。下村定部长的着眼点在于想将敌军主力予以击破，截断上海经济迫使国民政府屈服。预定再派遣一个军于10月30日在金山卫登陆，此登陆计划引起参谋本部的争论，认为准备不足危险性太大，但九国公约在即，最终

仍决定断然实施。日本陆军省制定〈昭和12年度对华北作战计划〉："对华中方面原计划以第九军占领上海附近，但中国军队增加了兵力，构筑了防御工事，因此计划新编第十军从杭州湾登陆，两军策应向南京作战。"

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于芝加哥举行隔离演说（Quarantine Speech）："(日本)现在已出现了无宣战布告或警告，无正当理由就空袭，杀戮包括妇孺在内的一般市民。这好战倾向有逐渐流行蔓延之虞，应由爱好和平的国民共同给予防阻隔离。"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美国总统演说，全国响应，中南美各国亦均赞助……美国在九国公约会议可能将主张先礼后兵，设法调停；不遂，与各国采取制裁方法……"但陈公博在巴黎与中国驻欧使节开会后不表乐观："因为他们态度都不很积极。"10月6日，日本外务省河相达夫对于美国总统措词强硬的演说作回应："现在世界上'有资源国家'与'无资源国家'的争执，热烈讨论资源、原料分配不公的问题，如不能矫正此不公平，而'有资源国家'拒绝对既得利益让步时，是否除了战争外别无他法？"

10月7日，日军第3、第9师团在国军第87师及第一军正面由蕰藻浜北岸强渡，指向大场。国军加以狙击并激战数日。

10月8日，日本参谋本部二宫义清少佐视查完上海战况回报："日本军兵力强但缺乏弹药，军官死伤因狙击所致，应改变服装。中国步兵的战法在于'紧跟对方步兵'；跟着对方以利用手榴弹或迫击炮来分胜败，另外也有避免受日军炮击的目的。"10月9日，日本外务省："日本的行为是属于自卫。"

10月12日，何应钦："战事发生至今，国军在淞沪死伤达六万三千余人。中国空军损失约四十架，海军几已被全灭。"

10月15日以后，第21集团军到达。

10月17日，国军第二十一集团军到达前线。上海派遣军战况并不理想（9月11日至10月20日，日军只推进5公里），预定于14日对大场镇的攻击被迫延

期，甚至原先的二线兵团（第13师团）也投入一线作战，故日本参谋本部决议将主战场由华北移至华中，在中国东北待命之第18师团及华北之第6、16师团及国内之第114师团、后备部队两个联队，均使用于上海方面；第16师团，预定由白茆口登陆。由于日本本土仅剩近卫、第7两师团，显见参谋本部对上海作战期待极大。由于上海作战消耗过大，日军感到几乎没有余力为而后的太原会战增加兵力。日本陆军省要求上海派遣军于九国公约开会前攻下闸北、嘉定。

10月18日，国军军事委员会作战组第一部刘斐因“不明原因”提供错误情报：“日军有在杭州湾登陆企图，估计最多一个师，不会对上海战局有影响。”

中国第三期防御

10月19日，15万日军在上海前线开始“总进攻”，集结大批步兵、700门大炮、150架轰炸机，目标是占领上海西北大约6英里之大场镇；10月24日，150架轰炸机全部集中在大场镇上空轰炸。顾祝同电何应钦：“闻敌将有三个师团来沪增援，其先头部队26日可抵沪。”

10月25日，日军突破大场、新泾桥阵地。

到10月26日，日军右翼向前推进大约5英里。10月26日早，陈诚阵地司令部所在地大场镇失守，蕰藻浜被日军突破。江湾、闸北中国守军向虹桥镇、小南翔撤退，以一部留苏州河北岸要点及四行仓库阻止日军。国军自上海市区撤退：“本军以达成持久抗战之目的，除以一部据守铁道沿线附近诸点外，将南翔以东阵地逐次转移于吴淞江南岸。”陈诚、白崇禧、李宗仁均建议撤守苏州河防线阵地，往吴福线、锡澄线移转，蒋中正一度同意，但随后又下令回防。同日，国军工事尽被日军大炮飞机轰毁，遂被迫向苏州河南岸，江桥镇，小南翔一线后撤，大场庙行即被占领，同时进攻真如。因上海守军侧背受日军威胁，国军纷纷自江湾闸北向沪西撤退至苏州河南岸

江桥镇小南翔新阵地；战事移至真如彭浦一带。闸北发生大火。浦东国军炮兵仍坚守。

国军撤出闸北时，10月27日国军第八十八师忠勇战士一营，由团附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率领，潜伏于苏州河畔之四行仓库，掩护大军撤退。大场镇落入日本人之手，国军开始有秩序撤退。事后该营不愿离开阵地，宣誓与敌周旋，悲壮激烈。女童军杨惠敏穿过无人区，将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献给400余名勇士，在闸北失陷后，国旗依然迎风飘扬。仓库上悬国旗，英军劝其退入租界亦遭拒绝，沪地人士以食物用品慰劳者，不绝于途。国军撤离上海，在西郊打掩护战，坚持一个多星期，使日本人未能完全包围上海。苏州河畔国人展望此一幕血之斗争，无不感动至泣，全国人心由八百壮士所表现之精神，益为奋发。

10月30日，日军向虬江南岸猛攻，中国军队撤至新泾镇以南抵抗。国军离开上海北站，闸北成为一片火海。国军粮弹俱尽弃守防线，撤入英租界。后被汉奸出卖，缴械俘虏再被转至南洋作为苦力俘虏营。

10月31日，于苦斗4日后奉蒋命令，退出最后阵地，移入租界。日本上海派遣军为封锁上海南市，决定攻击苏州河南岸的敌军；第3师团开始渡过苏州河；翌日第9师团右翼渡河成功。

闸北撤退后，沪西战事双方以苏州河为对峙线，自沪杭路以西至申纪滨为止。左翼小南翔迄土地堂一线，敌人以南翔、嘉定为目标，五路进攻。土地堂与广福间拉锯战相继数天，真南路上，炮火连天。

是月，孙立人率税警总团第四团在周家桥成功击退日军渡河。但在此役孙立人受到迫击炮弹攻击身受十三处创伤，因宋子文之助立即送往香港接受完整治疗。

日军登陆金山卫

11月3日，日军数次越过苏州河。11月4日，日军第13师团接替重藤支队、永津支队的长江守备任务。

11月5日以后，日军第10军在杭州湾北岸之全公亭、金山卫两地登陆，日军两路猛犯松江。是日拂晓，日军第10军第6、第18师团及国崎支队，在全公亭、金丝娘桥、金山卫、漕泾一线登陆，分南北两路进攻松江桥、闵行及吕巷、太平桥。国民政府代表、特务头子戴笠招募组织射击和特务团，包括苦力和上海公共租界市政职工共3,000人，负责狙击和侦察敌人动向，由于汉奸告密，其中500人被日本人炸死于一座建筑物里。右翼军命令所部对北路日军阻击，双方鏖战至11月6日晚，中国军队撤到南桥、叶榭附近。日军向黄浦江突进。晚间，国军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主张将军队撤到吴福线。军令部长徐永昌："我军若撤至吴福阵地，敌必在上海协定线坚固不进，以缓和各国之干涉。日前上海各国领事调解浦东南市作中立区，我以为许之至佳。而反对者有之，持重观望者有之。在今日说，直是不费之惠。蒋中正则拟固守南市，是又出于纯军事或外交范围外矣。"

11月6日下午，南路日军攻占吕巷、广陈后，于晚间攻占金山。日军在靠近乍浦之金山卫登陆，到11月8日推进，威胁国军右翼。

11月7日，为统一指挥上海派遣军及第10军，日本大本营编成中支那方面军，由松井石根大将兼任方面军司令，并下达临参命600号（统制线）："将华中方面军的作战地区为苏州、嘉兴之线以东。"

11月8日，太原、任县失守。国军于晚间下令淞沪战线向平嘉、吴福线移转。由于九国公约会议正在召开，蒋中正则电令前线希望再守3日。按日方统计伤亡已达4万余人。

11月9日，青浦、松江经日机轰炸，几成焦土而沦陷。中央军朱绍良部开始向青浦、白鹤港转移，左翼陈诚部同时西撤，右翼翼军张发奎部撤至苏嘉线附近。日军第3师团向龙华推进，第9师团向高家湾追击。蒋中正下令撤

退，但部队秩序已经混乱，国军兵分两路（北路沿京沪铁路，南路沿苏州河）向南京及杭州撤走，因日军战斗机不停朝沿路退兵机枪扫射，国府军此阶段伤亡尤为惨重。

中国军队奋勇迎击，寸土必争，日军因正面进攻挫败，乃于11月初以重兵自杭州湾北岸登陆，中国军队后路受威胁，乃于11月11日全线撤退，重作布置。南市孤军苦战3日，于11月11日撤退，浦东亦为日本占领。11月12日夜，上海市区全部陷落，淞沪会战结束。日军攻占上海后，进攻南京。

会战之后

11月13日，国民政府发表自上海撤退之声明

："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同日，日军第16师团在太仓附近白茆口登陆。国军于月中由太仓、昆山、浏河撤退，将全线调整，东起福山，经常熟，越苏州、吴江、平望，西接嘉兴，东南迄乍浦至独山。日军向支塘镇前进。国军第十五、第二十一集团军一部进入常福阵地。间谍早就告诉日本人有空档地方和守兵薄弱之据点，在德国军事顾问坚持下，南京建造一系列坚固堡垒实际上不战而撤。

11月15日，蒋中正召集会议，希望国军努力抵抗掩护迁都。南京撤退开始。

11月19日，国军下令弃守吴福线。徐永昌："九时悉嘉兴被敌占领，我军退至距城数里之线。又南浔亦为敌占领。常州顾墨三（祝同）电话，苏州为敌占领，已退无锡、江阴之线。因偕往蒋先生处，决定不必再论守城，祇求江阴至长安之线能多守几日。据何敬之（应钦）云：仅军政部之要品须一百列车方能运走。"

11月20日，苏州失守。同日，南京告急时，国民政府即移驻四川省之重庆，建为陪都，主要军政机关则在汉口办公。到11月中旬，日军和南京之间只有一支国军迅速丧失战斗力撤退，直接威胁南京。11月23日，日军至无锡。11月26日，国军下令弃守锡澄线，上海战役结束。蒋介石日记中留下："竟不分步骤，全线尽撤，绝无规律，痛心盍极！"

11月27日至12月7日，江阴要塞因弹尽援绝失陷。宋美龄在战争期间亲赴上海战场慰问官兵，遭日军炸伤出国医治。

战后统计

8月13日战事爆发，厂矿迁移委员会成立，工厂内迁至1940年大体结束。内迁企业中67％是重工业，至1940年经政府部间协助内迁之技工约12,164人，其中机器业5,968人。

依日方统计：淞沪战场阵亡9,115名，负伤31,257名，合计40,672名。根据日本防卫厅所著作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表示，日军实际伤亡是98,417人，日军公开发布的4万多人明显缩水。何应钦个人统计：国军死伤约187,200名。这次战役，日军伤亡6万多人，被中国军队击毁、击伤飞机120多架，舰船20余艘。计淞沪之战前后3个月，日军死伤逾10万人，中国军队浴血苦战，尤以八百孤军之困守四行仓库。

后果与评价

对战局的影响

淞沪会战挫败日军中央突破、速战速胜之战略意图，迫使日军在华北战场上转攻为守，在青岛地区暂停军事行动，打乱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之全盘计划，使他们未能3个月灭亡中国。从国际上来说，使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在欧洲之行中借到大笔贷款来购买武器：从英国借到1亿3千5百万元；从瑞士和荷兰财团借到2千3百万元；从捷克斯洛伐克之斯科达工厂借到5千万

元。它是中国局部抗战转向全面抗战之历史转折点，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占有极重要地位。国民政府各部门加紧实行军事管制，全国都在动员年轻人接受军事训练。

白崇禧对淞沪战役之检讨：“对日军之检讨：1. 敌人利用淞沪沿海之形势，发挥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之威力，以装备之优良，训练之纯熟，发挥各兵种在战场上之战力，予我军创伤甚重。 2. 日军官兵在战场上均能发挥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有武士道与大和魂之精神，彼虽为我之敌人，亦应取其所长而效法之。 3. 敌人之纪律太差，对民众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我军虽装备不如敌人，因日军之行为所激起同仇敌忾之心理，却为抗日战事中激发精神之利器。 对国军之检讨：1. 国军官兵深具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于淞沪战场虽制空、制海权操之于敌手，而我方之装备训练亦远不如敌人，然我军悉能以血肉之躯与日军相抗，其视死如归之精神可歌可泣。 2. 我军以劣势之陆军装备，抵抗敌军海陆空联合作战之优势，所凭借的全是爱国精神。自8月13日至11月9日将及三个月，我军伤亡虽重，但敌人损失也不少。打破日军阀三个月征服中国之迷梦。 3. 我军因无空军掩护，炮兵又少，攻坚非常困难。抗战期间，我军攻陷敌人坚固阵地之战役，固不乏其例，如昆仑关与密支那两场战役，但终属少数，考其原因乃在于武装不如敌人。 4. 日军炮火猛烈，又有空军掩护，我军进攻效果很少。 5. 我军训练远不如敌人，使用同一武器之命中率亦远逊于敌人，步兵对轻重武器因训练不精，不能使用自如。未发挥较大之威力。”

外国列强认识到，一旦日本胜利，在华利益是得不到保障；通过国际联盟、布鲁塞尔之九国会议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强力声明，正式遣责日本侵略。中国军队之牺牲精神和战斗能力，赢得各国军事观察家高度评价。中国赢得世界人民同情和声援，他们充分了解中日战争第一个大战役，因为战争是在一个国际大港口进行。英国《泰晤士报》1937年10月28日社论中说：“十周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之荣誉”；“一般所认为不能保持一日之阵地，彼等竟守至十周之久，此种奇迹，自属难能可贵”。

1937年10月，英国不希望惩罚日本，促成九国公约签字国之布鲁塞尔会议，由美国牵头，邀请苏联参加，日本和德国没有出席会议；在意大利反对下，会议只通过一项敦促“和平解决”之决议便休会。英国《新闻纪事报》10月28日社论也说：“华军在沪抵抗日军攻击之战绩，实为历史中最英勇光荣的一页。”

淞沪之战，日军共投入2个军9个师团约30万人，比整个华北战场日军全部兵力多出2个师团。10月，日本恢复对华北攻势。经过3个月战斗，日军伤亡5万多人，令“速战速决”、“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的意图失败，提高了中国国民抗战斗志与士气。11月8日，板垣师团开进山西太原。

原先蒋中正打算速战速决，并将日军注意力从华北转移到华中，为了达到这目的他将手中受过德国顾问训练最精良部队全数送上前线。不过由于速战速决目标失败，导致更多兵力加码投入战场与具有军舰支援且补给源源不绝的日军进行绞肉战，总计国民政府在这场战争除了中央军外，先后各派系部队共78个师、7个独立旅、3个暂编旅、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炮兵7团、财政部税警总团、宪兵1个团、上海市保安总团、上海市警察总队、江苏省保安团4个团，3队海军舰队，兵力总数60万人以上。精锐部队如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以及久经训练、装备精良之财政部税警总团都被全完消灭，国军总共牺牲30多万人。在战斗中损失三分之二以上，使蒋实力大为削弱。

此外，《李宗仁回忆录》中指出：“当时我军参战约五十余师，战斗兵员在六十万左右，约全国兵力的百分之六十。当时淞沪战场离苏嘉铁路第一道国防线尚有百余华里。投入战场人数既多，然而上海是十里洋场，四面平旷，无险可守，日军陆海空三军的火力可尽量发挥，我军等于陷入一座大熔铁炉，任其焦炼。敌方炮火之猛，猛到我炮兵白日无法发炮，而夜间又无法寻找目标，只是盲目轰击。所以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

御外来的历史上，鲜有前例。……是我国抗战八年，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一役。”蒋中正知道国军只有极小机会获胜，上海将会失去。12月6日，蒋介石从武汉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分析中国面临之问题，并保证要继续抗战。1938年11月28日，蒋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敌人）乘虚在杭州金山卫登陆，这是由于我们对侧背的疏忽，且太轻视敌军，所以将该方面布防部队全部抽调到正面来，以致整个计划受了打击，国家受了很大的损失。这是我统帅应负最大的责任，实在对不起国家！”

冯玉祥说：“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援5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

除了军队的耗损以外，淞沪会战后期毫无章法的总撤退使整个战线完全溃散。11月10日早上，蒋介石急忙下令从上海撤退，整个撤退乱成一团，最后，撤退变成了“溃败”。日后创造长沙大捷的名将薛岳回忆11月11日傍晚，他正在安亭司令部与67师师长黄维通电话时，突遭日军攻击，通话中断。他急令特务营抵抗，同时率人员撤退，特务营全部牺牲。途中雪铁龙车又遭日军袭击，司机、副官和卫士全部中弹殉职。此时薛岳正感冒发烧，急忙打开车门，跳到路旁的稻田中，游过河沟幸免于难。薛岳爬上河对岸后，又乏又冻，加之重疾高烧，躺卧在公路边，幸好国军五十四军十四师一支部队恰好经过，被送至昆山疗养。胡宗南随第一军撤退到青浦西北，司令部和警卫连几被全歼，牺牲巨大，身边只剩下几个人，他在11月20日致信戴笠说：“黄埔部队多已打完，无人撑持，其余当然望风而溃矣。”。淞沪会战大溃散让日军得以长趋直入，间接导致了南京保卫战提早开战。甚至有人指出10年后蒋介石在淮海战役惨败的影子，早在1937年岁末就曾在上海闪现过，“在同一地方连连摔倒，这是蒋介石军事上最拙劣之处”。

以军事面来说，国民政府不但战败以外还让其军事实力大幅受创，使得多

年建军付诸流水；但在政治面上却是成功的，淞沪会战将中日冲突成功的台面化宣传到国际媒体。也让世界清楚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本的立场：不再等待日本“和平地”将其一块一块地征服侵吞，也证明了中国绝不会向日本投降。随着战争进展，中国不得不得不从全国各地调集精兵来补充严重损失。

最后，日军原先希望借由有限度冲突取得在华利益的作法，在淞沪一战后开始无法收拾。淞沪会战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及其军队崭新一面，使人们看到日本军事力量在有利战略形势下用三个月才占领上海。最终也只能在伤亡惨重下勉强夺得胜利，而国民政府在此战以后毫无对日本妥协的态度使日军无法回收战争成本，在一无所得下日军必须增兵以在这场战争获得利益，这种恶性循环最终使日本国力逐步拖入崩溃边缘，并引发更大规模战争。12月13日，日军打入南京，洗劫难民，奸淫掳掠；国军撤退时遭受损失，有些人来不及撤退。

虽然淞沪会战中国在战术上失败，但战略上成功将日军移往中国东南，使日军主力陷入山川河流众多之地形，使日军无法占领全中国。中国工业实行军事管制，数十万人修建新军事公路连结苏联；立法院院长孙科前往苏联、英国和法国，争取支持中国长期抗战。上海守军之抵抗掩护党政机关学校和工商企业转移往内地，为抗战保留元气。从政治上来说，使国内动摇分子也有信心，认识中国力量。

对中国政治的长期影响

蒋中正在淞沪会战几乎投入所有的精锐部队，最后除了惨重伤亡之外战争还输的一败涂地，但日本当时尚未做好侵略中国的准备，因此无法有效的趁胜扩张，否则淞沪的战败后果将不堪设想。各种抗日政治派别代表在武汉商讨联合行动之措施。在这之后，中央政府的兵力与各地军阀的差距缩小，这时中国共产党、各地军阀都各据一方，拥兵自重。日后长江中下游的各省的丧失，使得国府吃紧的财政更加雪上加霜，不得不与各地军阀争

夺税赋资源，造成抗战中的内战。1938年1月15日，根据中央政府特别授权，晋察冀边区政府在五台山正式成立，在山西、察哈尔及河北省共拥有10万游击队员。淞沪会战后大量的游勇散兵，国民政府无力加以收编，因此成为各地土匪游击队造成后方百姓的困扰，或者被中国共产党加以吸收，使得八路军与新四军的实力急速强化，到1940年7月7日时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五十万人。蒋中正知道"攘外必先安内"，但还是没法改变历史。但由于中央军的惨重牺牲，奠定了蒋中正作为中国抗战军事统帅的地位和形象。也让抗战时各地军阀大多听令重庆政府的命令，如果没有淞沪抗战，各地军阀依旧无法统一指挥，蒋中正也无法处决临阵脱逃、失守山东的韩复榘。

对上海城市发展的影响

持续3个月空前惨烈的淞沪会战极大的改变了上海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上海的苏州河以北地区，包括上海公共租界的北区和东区，以及闸北华界，由于控制了黄浦江下游岸线，和陆上门户火车站，曾经是20世纪初上海城市发展最迅速的地区。

淞沪会战期间，闸北成为中日两军对峙的前线，几乎100％毁于战火，新市区的损失达到70％，此外南市区和吴淞的损失也相当严重。无数的建筑物葬身火海，上百万当地居民被迫避难到苏州河以南的租界地区。

上海进入日据时期后，上海城市的精华完全集中于苏州河以南面积有限的租界地区，此后除虹口租界外，苏州河以北地区严重衰落，对上海后来的城市发展造成了长期性影响。战争废墟上后来曾经形成大片难民聚居的贫民窟，曾是上海很长时期内极其注目的城市景观（由于缺少保护价值，现在大部分已经改造成高层楼群）。

阵亡将军

朱耀华中将。字强生，湖南长沙人，国军第78军第18师师长。1937年10月

24日拂晓，日军在150架轰炸机，10余辆坦克掩护下，集中兵力猛攻18师驻守的大场镇，18师官兵苦战3日，万余官兵牺牲，大场镇失守，举枪自尽殉国。（但另据资料，称因卫兵阻拦朱耀华自杀未果，但亦受伤致残，后曾任第八战区军法执行部执行监。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共镇反运动中被杀。）

吴克仁中将。字静山，黑龙江宁安人，满族，保定军官学校5期炮科毕业，国军第67军军长。所辖107 、108师是淞沪抗战中最后赶到战场的原东北军主力，1937年11月8日拂晓，日寇柳川第10军主力渡过黄埔江。9日，吴将军在掩护上海守军撤退时，在白鹤港遭到日军便衣队袭击，壮烈牺牲。

路景荣少将。江苏武进人，1902年生，黄埔四期毕业，国军第98师583团团长，师部少将参谋长。1937年9月10号在上海月浦与日军激战中牺牲，时年35岁。

李友梅少将。字竹三，广东五华人，1908年生，黄埔四期毕业，国军第1军第1师第4团团长。1937年9月18日，在淞沪会战顾家宅之役中牺牲，时年29岁。

杨杰少将。字子英，河北容城人，1895年生，黄埔四期毕业，国军第1军第1师第1旅副旅长。1937年10月11日，在淞沪会战顾家宅之役中牺牲，时年41岁。

庞汉祯少将。字胤宗，广西靖西县人，壮族，1899年生，广西陆军讲武堂及中央军校南宁分校高级班毕业，国军第7军第21集团军第170师第510旅旅长。1937年10月23日下午3时，在陈家行指挥战斗中，被日军火炮击中牺牲，时年 38岁，后追晋陆军中将。

秦霖少将。字松涛，广西桂林人，1900年生，广西陆军讲武堂毕业，国军第7军第171师第511旅旅长。1937年10月23日，秦霖将军在日机轰炸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7岁，后追晋陆军中将。

黄梅兴少将。字敬中，广东梅县客家人，1897年生，黄埔一期毕业，国军第9集团军第88师第264旅少将旅长。8 月14日下午3时许，黄梅兴将军亲临前线指挥，在爱国女校附近被日军迫击炮弹击中，壮烈殉国，时年40岁。一同殉国的还有旅部参谋主任邓洸中校及通讯排官兵30余人。黄梅兴将军是淞沪抗战国军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将领，后追晋陆军中将。

宫惠民少将。字剑豪，广东曲江人，黄埔四期毕业，国军第4军第90师第270旅旅长。1937年10月28日在嘉定清水显牺牲，时年31岁。

刘启文少将。河南南阳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国军第67军第108师第322旅旅长。1937年11月8日在石湖荡与日军激战中牺牲。

蔡炳炎少将。字洁宜，安徽合肥人，黄埔一期毕业，国军第18军第67师第201旅少将旅长。淞沪抗战中有“血肉磨坊”之称的罗店争夺战中，8月27日晨，蔡炳炎将军亲率402团两个营攻击罗店日军，不幸中弹阵亡，时年35岁，后追晋陆军中将。

吴桐岗少将。辽宁人，国军第67军参谋长，1937年11月8日在上海松江与日军激战中牺牲。

邓玉琢少将。辽宁东港人，国军第67军第107师参谋长。1937年11月9日在上海松江与敌激战中牺牲。

朱之荣少将。辽宁人，国军第67军第107师第321旅旅长。1937年11月10日在上海松江与日军激战中牺牲。

李伯蛟少将。湖南邵阳人，早年投军，国军第28军第63师第187旅旅长。1937年11月在上海金山卫阻击日军登陆部队，激战中牺牲。

吴继光少将。江苏盱眙人，1903年生，黄埔二期毕业，1937年11月11日在白鹤港与日军激战中牺牲，时年34岁，后追晋陆军中将

各类评论、检讨

1938年11月28日，蒋中正：

上海开战以后，我忠勇将士在淞沪阵地正与敌人以绝大打击的时候，敌人以计不得逞，遂乘虚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这是由我们对侧背的疏忽，且太轻视敌军；所以将该方面布防部队全部抽调到正面。以致整个计划受到了打击；国家受了很大的损失。这是我统帅应负最大的责任，实在对不起国家！

张治中："上海之未能一次总占领，统帅部失机于先，叫我停止攻击；后来大战展开，除陆军外，又没有配合有力的空军。"

第九集团军作战课长史说："部队方面，必须学会对坚固据点的攻坚战术，但当时部队军官缺乏攻坚知识与经验，又没有威力强大的武器……初期攻击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就不知道用重炮直接瞄准去破坏和压制日军火力点以及接近爆破"。

胡宗南身边的参谋于达："革命军积下一个很不良的习惯，其原因可能是蒋委员长对于底下的"学生"很不放心，而事事干预他们。打仗是瞬息万变的，等委员长看到前线电报已经过了好几天，战况早变了，必打败仗的，此乃源于"毛头小子不放心"的心理。而师长也常越级指挥下级团长，常使旅长不知兵在何处。不放心和越级指挥造成作战能力低落。"

孙元良："国军虽动员了优势兵力，但机动运输集结力不足，结果演变成车轮战，始终没有足够的预备兵团，给了日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法肯豪森："双方海空火力落差太大，国军仅能用夜暗期间，日军海空兵力无法发挥优势时，对白昼日军所占据之村落进行反攻。"

陈诚："附近各县地方官员负责者，事先不组织民众，事后不知动员抵抗，

这也是我们作战中极大的缺点。”“汉奸太厉害了，敌机一来总部到处都是小镜子，一闪一闪地向敌人指示目标。夜间则发信号弹，捉不胜捉。”

顾祝同：“大场情况变化后，闸北阵地侧背完全暴露，必须调整态势。但国际联盟11月初要在日内瓦开会，会中要接受我国控诉，将讨论如何制止日军侵略行为，所以委员长有意要留在闸北作战……尽量争取时间，唤取友邦同情。”

顾维钧为九国公约会议与淞沪会战的关连作分析：“西方人士一开始就认定，中国是个政治不团结，军事上又涣散落后的国家，……西方认为中国的抵抗无济于事，日本终究要占领中国，那么向中国提供援助又有何用，认为抗战不可能持久……问题在于，是运用这些军队坚守上海，从而在国外产生心理上的效果呢，还是要后撤至一个偏僻角落进行战斗。这地方不为任何人所知也就不会有任何人关心，但损失是相同的。全世界都知道上海是什么地方，战斗为了什么。在上海集中了西方各国最大利益，……所以我们主张政府尽可能坚守上海线。”“不幸的是，中国军事最终恶化了。恰巧又与11月15日美国新国会孤立主义碰在一起，这此因素导致布鲁塞尔会议上一些主要代表团都催促赶快结束会议，……事情很明显，以后再也不可能有何作为了。”“虽然罗斯福看出了当时欧洲与东亚方面的危机，但美国国内民意上的姑息压力使其无法有实质作为。”陈诚：“战略原是达成政略的一种手段。但是战争既启，就应该以战略为主，不能因为政略牵制战略。因为战略保持胜利的时候，政略的环境就可以跟着好转。反过来说，如果战略失败，就是当初认为有利的政略，亦必跟着恶化。这次战略受政略影响极大，乃是国家的不幸，并不是国家的错误，因为我国本身准备不足，要希望人家援助的关系。”淞沪会战后期的“死守”被学者形容成“为政略殉”，非出于战略因素，而是为了国际舆论、民心民气而战。蒋中正当时痛苦的表示：“借此战略关系而撤退，使敌不敢穷追，是于将来之战局有利，然于九国公约会议之影响，其不良必甚大，使此心苦痛不已。”

第88师参谋张柏亭：“委员长训示政略目的，是强调日本军阀的侵略行为，而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中外视听所集，要在国联开会时，把淞沪战场的现实景况，带到会场去……”“孙元良8月12日率先占领上海北站、宝山路、八字桥、江湾路一线，此独断决策对战局有决定性的影响，使国军取得闸北轴心阵地。”“淞沪战场一开打，中国老百姓就开始协助日军割断电线、破坏电讯，或扰乱治安、刺探军情。”

蒋中正：“绪战第一星期，不能用全力消灭沪上敌军。何应钦部长未将巷战及攻击武器发给使用，待我想到，催发战车与平射炮，已过其时……何应钦误事误国，亦我想到太迟之过也。”“由大场撤退至苏州河南岸以后，以张发奎为指挥官，使金山卫、乍浦一带无人负责，不注重侧背之重要，只注意浦东之兵力不足，调金山、乍浦大部移防浦东，乃使敌军得乘虚而入，此为我战略最大之失败也。”

白崇禧：“我方装备训练远不如人，全赖血肉之躯与之相抗，打破日本军阀三个月征服中国之迷梦。上海抗战原计划是节节抵抗，故有设吴福线、锡澄线，后因敌人掌握制空权，行军不易，不能按照原定计划实施。复以命令下达仓促，部队准备不周，故原计划尚未实现便开始撤退。”

滕昕云：“国军在围攻时期空军尚有表现，但随着战损增加，任务重心转为首都防空，使日本在后期取得制空权。在海空劣势下，反登陆作战注定不会有太大成就。甚至有些部队在未与敌人接触前，就遭到日军舰炮、航空轰炸而伤亡过半。”‘1936年7月，国府财政顾问李兹罗士曾向蒋中正直言：“阁下期望英美支持中国抗日极为不智！”两者所言皆正确，李兹罗士乃是当下情势分析；蒋中正则是长远局势之发展。’

黄仁宇：“德国顾问误判情势，认为日军在金山卫方面的行动应该只是属于两栖佯动，藉以吸引国军注意，并非作战重点”‘苦撑待变即是持久抗战的主轴，日军击破了国军的抵抗，使国军蒙受极大损失。蒋中正不会不清楚，他惟有采用长期持久战略，持续消耗敌人实力，并静待“国际情势”的变

化，别无他法。’

吴相湘：“蒋委员长诱使日军主攻向由‘自北南下’改变为‘自东西上’的战略终成功，一切可按1935年7月持久抗战的计划了。”

李云汉：“就原定计划而言，日本决不能将其兵力用在长江流域，如今却调集10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到了长江流域，而使中国初步达到持久战略的目的。”

蒋纬国：“此役打破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吸引日军主力到华东，使长江下游之人员、工厂能迁往西南大后方，增加持久抗战之能力。”

重光葵在《昭和之动乱》：“华北战事扩大，立刻刺激了上海，米内光政海相强硬要求陆军出兵，参谋本部则坚决反对。这事把政府夹在中间，弄得近卫首相非常难为，结果通过了最低限度的出兵折衷方案，派了三个师，叫松井带领向上海出发，但仍陷于苦战。第二次又派柳川以几个师编成一个军，从杭州湾登陆，中国军这才开始退却。”

汪兆铭：“战被动、和亦被动。就战来说，自从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横著一个“战给国际看”的念头。中苏缔结《不侵犯条约》当时，武断苏联必于三个月内出兵参战。《九国公约》国在比京开会时，武断会议结果必能制止中日战争，一切战略因此之故，皆处被动，以致败坏不可收拾。”

德国顾问：“自战斗开始日军即掌握了无可争辩的制空权，对战局自会产生不利影响。重野战榴弹炮由于训练不足与观测不够精确，多数均留在后方。过早爆破上海与青浦道路间之桥梁，增加国军后撤之混乱。”

东条英机：“太平洋战争前，日本对中国作战四年以上，以日本国力对复兴中强有力的中国作战，自感国力的不足。”

10月28日，英国海通社：“上海十周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

家的荣誉，此乃前所未闻者。”泰晤时报：“华军已从滑稽故事之迷雾中，脱颖而出，此为近代史中的第一次。”

郑浪平：“事实上，就算国军事先在杭州湾金山卫待命，也没有足够军力阻挡日军第十军三个半师团登陆（日军1师团约2万人）。”“中国没有完整与统一的后勤系统，更没有后备军人，征兵制才在试办阶段，因此由各地强征来的补充兵员，多是没受过军事训练的。”

中国大陆的书籍以负面评价为主，一般称为“片面抗日”、“对九国公约不切实际的幻想”、“安内攘外的误国政策”、“出卖中国”、“不抵抗主义”、“妥协主义的下场”。台湾学者认为这是“后见之明”、“人为加工”、“与日方交涉是出卖国家的说法欠缺客观”。

潘汉年：“主要是由于抗战已经三月有余；而对外并未坚决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对内，始终没有严厉打击政权机构中的亲日份子与主和论的官僚政客。……连日来消息所传不外是调解、妥协、停战，于是给热望九国公约会议的同胞们，一个严重的心理上的幻灭。……其中南京少数大吏相机进言蒋委员长提议与日直接谈判和平，这群汉奸的活动及著名亲日份子、和一贯主和的官僚政客，依然追随最高领袖之左右的事实，有意散布各种谣言，致使妥协和平空气弥布一时。”

由于国民政府中央军如第3、9、14、36、87、88师、税警总团（德国人称为盐师）等部队是由德国顾问所训练，第87、88师也派有德籍顾问，因而淞沪会战的“德式中央军”被部分外籍人士称为“德意志战争”。10下旬日军进入闸北时，对国军的防御工事赞叹不已，誉为“现代巷战之典型阵容”。

拨补制度的问题：（可能是陈诚或法国顾问建议的）国军伤亡过大时，直接将兵员送上前线补充，部队不换防（整个部队不撤下来整补）以免换防发生危险，有作战经验的老兵也能带领新补士兵延续经验，称为“拨补制度”。代价是，许多前线军士官已濒临死亡仍拒绝后送就医，因过多新补兵

员训练不够容易临阵退缩，要是中下级军官不在场监督，部众可能怯敌轻弃阵地，导致精锐干部与老兵严重伤亡，后期无力发动全面反击。

国防线的缺陷

国防线原是由德国顾问实地勘查所设计，但规模庞大非中国财政所能负担，于是参谋本部李青等人参照德国规划，拟定出折衷方案的国防线。国防线的工事掩体、交通壕多来不及完成，或找不到掩体、打不开暗锁，部分工事构筑位置、品质不符需求。

罗卓英："吴福阵地与工事无图参考，无人指示无钥开门。前线撤退而在国防阵地之军政要员，尤其兵站、交通、通信等单位却同时失去连络，无人负责。江南湖沼河渠交错，在军事上非完全障碍，有变成空隙薄弱之虞，须有水面巡防之部署。"

纪念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1号建有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用以纪念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和淞沪会战两场战役。

中华民国空军将首次空战胜利的日期八月十四日订为纪念日，是为"中华民国空军节"。

抗日战争的发展以及各项战役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6%8A%97%E6%97%A5%E6%88%98%E4%BA%89

中国抗日战争，或称日本侵华战争；国际称第二次中日战争（英语：Second Sino-Japanese War）；史称八年抗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2017年改称十四年抗战。指20世纪初期日本与中国之间发生的战争，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东亚战事的主要部分。中日战场主要位于中国境内，同时也包括缅甸北部等邻接地区。战争时间若从1941年12月9日中华民国对日正式宣战算起仅有四年，是为二战期间东亚陆上战斗的部分；自1937年7月7日日本展开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算起则有八年，且宣战文告中亦有“之前四年余神圣抗战”一句，故有“八年抗战”之称，是为中日全面战争；若往前追溯自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算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为止，则这场战争为十四年。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在100天内占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次年3月1日，日本帝国参谋本部及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一新政权，定名为“满洲国”。后令大清末代皇帝溥仪登基为满洲国皇帝。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从卢沟桥进攻平津地区，不久华北沦陷，中日全面开战。8月13日，中日双方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展开大规模会战，淞沪会战爆发。12月13日，南京保卫战南京失守，侵华日军主导下发生南京大屠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统计20万至30万人遇难；中国首都迁至重庆，重庆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

1941年12月8日，日本舰队突袭太平洋美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其他地区日军亦四出攻击，美国、英国与日本互相宣战，中国亦正式对日本宣战并及德国、意大利。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元首发表《开罗宣言》，要求日本应将窃取自中国之所有领土（如满洲、台湾及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1945年7月26日，美、英与中国对日本发出《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命日本无条件投降。同年8月14日，日本天皇敕令，保证实行波茨坦公告规定之条件；9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投降，中日战争告终。

中国抗日战争于二次世界大战中有显著影响，使日军约百万的主力部队被牵制于中国战场，而无法向北进攻苏联配合纳粹德国的要求牵制苏联兵力，使得苏联远东部队调往欧洲得以保卫莫斯科，并调派精锐兵力支援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事，减轻其他同盟国在各个战场的作战压力；虽然日军占领东南亚及印尼等地，但日本海军无法登陆澳大利亚阻断同盟国印度洋石油供应链的计划以失败告终。抗日战争间接帮助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反攻，令日本无法和德国配合共同进攻苏联，亦间接改变苏德战场双方的兵力对比，红军之所以能够全力对付德军，也是因日本必先通过击败中国，才能完全配合在缅日军进而入侵英属印度及其它地区，甚而打破当时日本和德国战略合作的构想及打通欧亚大陆的目标。

名称

这场战争在汉语社会常称为“抗日战争”、“八年抗战”，简称“抗战”，另外亦有“第二次中日战争”、“抗日卫国战争”之称。台湾史料常称为“中华民国抗日战争”，中国大陆则通常称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并于2017年将“八年抗战”改称“十四年抗战”。当描述的主语为日本时，则称其为“侵华战争”、“日本侵华战争”或“日军侵华”。

战争背景

1880年代　日本确立向东亚大陆扩张之国策，以夺取东亚大陆的丰富资源和发展空间。

1874年　牡丹社事件　大清与日本签订《北京专约》，使日本据此认定琉球并非中国之藩属国，日后通过琉球处分事实吞并琉球国。

1894年　甲午战争　大清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大清承认朝鲜独立并放弃其宗主国地位，赔款二亿两白银，割让台湾全岛、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予日本。

1900年　八国联军之役　大清与十一国签署《辛丑条约》，赔款重多，割让山东半岛部分地区予德国使之建立租借地。

1905年　日俄战争　日本同俄国签订《朴次茅斯和约》，俄国所占之旅顺、大连转让与日本。大清与日本通过不平等条约之《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承认日本所获得的利益。

1911年　辛亥革命　中华民国宣布建立。12月，以袁世凯为首的清政府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展开南北议和。次年2月，溥仪宣布退位，清朝灭亡。中华民国继承清朝法统。

1914年6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　日本第一步即以参战国姿态出兵山东半岛，夺取德国租借地、长春、旅顺间之铁路及其支线，及附属利益让与日本。

1915年1月7日　北洋政府要求日本撤兵　日本拒绝撤兵，并对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

1915年5月8日　　　二十一条　　袁世凯政府承认日本《二十一条》大部分要求，并于5月25日签订《中日民四条约》。

1928年5月　　济南惨案　　日军借口革命军对济南城内的日本侨民进行抢劫、屠杀12人，而出动军队展开报复，杀害中国军人与民众六千余人，其中，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派遣济南的外交处处长兼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署内职员17人被日军杀害。

1928年6月　　皇姑屯事件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日本战犯时，因事件中被暗杀者张作霖的身份，将此事视为日本侵华的起点。时张作霖为中华民国安国陆海军大元帅，行使大总统职权，为中华民国国家元首。

1874－1928　　　　《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全岛、澎湖列岛予日本、日本与俄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由俄国手中转移辽东半岛旅顺、大连、长春至旅顺间之铁路及其支线，及附属利益；《凡尔赛条约》将德国租借地转移给日本；日本获得朝鲜的宗主权并最终通过《日韩合并条约》兼并朝鲜半岛。

工业革命后，中国和日本作为东亚传统农业国家，在政治、军事上皆面对西方列强的威胁。日本在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推动日本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而主政中国的清政府在同一时期开始推行的洋务运动并未完全成功。至抗日战争结束，中国亦未能完成国家的工业化。

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日渐强大，在各种因素之下，日本对外扩张，确立“大陆政策”。此后，日本亦进入瓜分中国的列强行列。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制造牡丹社事件，事后与清政府签订《北京专约》。1878年，日本设立直属于天皇的参谋本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清政府求和，订立《马关条约》，依照条约：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赔款二亿两白银，割据台湾全岛、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并开四处商埠与日通商；随后，俄国立即联合德国、法国等，要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满清政府，增加

赔款3千万两，此为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因此种下日俄之间仇恨，而引起1904年之日俄战争。

1900年，中国发生庚子拳乱，引起八国联军事件。中国纷争不断，积弱不振，成为日、俄两国觊觎侵夺目标。

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与日本订立《朴次茅斯和约》，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有各种优越利益，及监督保护之权；俄国将旅顺、大连让与日本；俄国筑长春、旅顺间之铁路及其支线，及附属利益让与日本，日本为保护南满铁路权益，在辽东半岛部署军队，1919年更设立关东都督府，在旅顺口设关东军司令部。

1911年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进入北洋时期，但没有结束中国国内的混乱。中国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则在缓慢地推进。此后，中国经济未走出清末以来的困境，以致政府的财力、军力匮乏，无法与日本以及西方列强抗衡。主政中国的袁世凯在1913年向日本等列强进行善后大借款时，中央政府财政既已接近破产。

1914年7月，七月危机，随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日本因与英国同盟关系，对德国宣战；中国则宣布中立。日本第一步即以参战国姿态出兵山东半岛，夺取德国租借地；进而兵临济南，占领胶济铁路全线。日本随后在龙口登陆，竟完全越出租借地区，以及中国政府所划之日德交战区域，进占潍县，兵临济南，其间日军征收物资，役使人民，把中国视同敌人一般，直到德国在青岛守军完全降服后。

1915年1月7日，中国北洋政府认为战事已告一段落，照会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要求日本撤兵。日本大隈重信内阁训令驻华公使答复中国日本拒绝撤兵，另外再令其向袁世凯直接提出分为五号之《二十一条》要求。1月18日，五号《二十一条》条约由日本驻华公使亲手交到袁世凯手里，打破国际惯例。5月7日，袁世凯政府承认日本二十一条要求。

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他逝世后，各地军阀割据南方各省逐渐脱离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最先成立于广州，日后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北伐的推进而迁移至不同的城市，最终定都于南京。

1929年中国与苏联的战争中，东北军一败涂地，致使此后张学良对日军采取彻底的退让路线。

1928年5月，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试图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炮轰济南城，与中国北伐军发生交战，造成济南惨案，杀害国民政府外交部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17人。

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暗杀北洋政府末代领袖、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是为皇姑屯事件。因张作霖的国家元首身份，此事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视为日本侵华的起点。同年12月，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名义上完成中国统一。此后，一直被视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国民党清党后，发动南昌起义，走上武装反抗之路。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朱毛会师后不断发展壮大，在湘赣粤闽等地建立起多个“苏区”，依靠自身武装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此外，自协约国武装干涉俄国内战后，苏联为防范日本，一面与中方签订《孙文越飞宣言》、《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声称尊重中国对外蒙的主权，一面积极帮助外蒙古独立。张学良则愤怒声讨两大帝国主义疯狂渗透东北，致北患无休无止。1928年，中央政府为取缔不平等条约而开展革命外交，获张学良支持。蒋与张均持反共立场，决定对苏强硬、武力接管中国东省铁路、防止共产主义渗透，遂对苏联宣战，但以惨败告终。东北军面对苏联红军一败涂地，毫无反抗能力，致使张学良其后对日军采取彻底的退让路线。

1931年－1937年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由于张学良未料日军大举进攻，令王以哲不加抵抗，故日军轻取沈阳。事后，蒋为“安内”而忍耐，并寄希望于国联。

1931年6月19日，日本参谋本部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策大纲》，决定在一年内侵占中国东北，旋命令关东军执行。关东军、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东京策划入侵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6月25日，为进犯中国东北寻找借口，日本制造“中村上尉事件”。1931年7月1日，日本警察在万宝山地区屠杀中国农民，制造“万宝山事件”，并煽动朝鲜排华。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动用3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7月6日，张学良密电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我要求割地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避免冲突，以公理为周旋。”传“8月16日，蒋介石以“铣电”密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但为张本人一贯否认，“瞎说，瞎说，根本没有这种事情”，至今也未发现蒋有所谓的“不抵抗指令”。1931年9月6日，张学良从北平发“鱼”电给东北边防长官公署军事厅长荣臻，与东三省政务委员会代主席臧式毅：“查现在日方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健，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9月6日，张学良电令驻沈阳北大营旅长王以哲称：“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同日张学良电臧式毅、荣臻称：“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同日，日本在东北召开领事会议，准备发动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变”，攻打沈阳北大营中国驻军，“九一八”事变爆发。当夜11时15分，日本关东军自动将南满铁路柳条沟段铁桥炸毁，诬指为东北军所为，开始攻进沈阳北大营。时张学良方滞

留北平，严令驻军王以哲旅不作抵抗，日本军遂于9月19日晨6时占领沈阳。东北军在“少帅”张学良指示之下，不予抵抗。齐齐哈尔发生小规模抵抗战斗。东北三省遂全部失陷。

一二八事变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在上海奋勇抗敌阻击日军。

1932年，蒋重返南京主持政府后，就开始秘密准备抗日。1月2日，蒋发表演讲，指陈宣战之弊害。第一次淞沪会战，发生于1932年1月28日，又称“一二八事变”，日方称“第一次上海事变”。“九一八事变”后，日方为转移国际视线，并压迫国民政府屈服，在上海不断挑起事端。1932年1月28日晚11时半，日本海军司令官盐泽以发动事宜准备就绪，乃命日军向上海闸北区、虬江路、青云路、天通菴等地进犯，中国驻军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以守土有责，遂奋起抵抗。淞沪抗战开始。2月1日，日本军舰炮轰南京；2月4日，国民政府召集各界领袖，在洛阳举行国难会议，惟军政负责人仍留南京，至12月政府正式迁还。2月3日，蒋抵洛阳，会商对日抗战计划，2月5日由洛阳往郑州，行经黑石关以东至汜水之间，观察地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国工农红军由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和红四军分别由会昌和石城向赣州进军，2月4日抵达赣州城东外五里亭和城西南郊，赣州战役爆发（赣州战役是1932年2月4日至3月7日，一二八上海抗战是1932年1月28日至3月3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等兵力被中国工农红军牵制在江西无法调往上海支援抗战。2月8日，以最精锐之第八十七、八十八两师编成国民革命军第五军，驰沪增援，仍以第十九路军名义加入战斗。2月14日，张治中奉命率第五军到上海增援。陈铭枢第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率领下奋起抵抗。日军三度增兵，四易主帅，前后出兵10万人，战线延及吴淞、太仓、嘉定一带，日机并轰炸苏州、杭州，军舰亦逼近南京威胁。3月2日，第十九路军因后援不继，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发表撤退通电。

战役历时33天，3月2日，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第十九路军腹背受敌，被迫全线撤退；其后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宣布停战。3月19日，中国在上海英国领事馆与日方举行会议，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五款。主要内容如下：划上海为非武装区，规定中国在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无驻兵权，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在该地区则可以驻兵。日军返回战前原驻地，国军暂留现驻地位。5月19日，蒋下令调十九路军开往福建剿共。是役参战日军约6万人，国军约7万人，武器虽远逊于日本，仍能力战月余，士气民心之旺，博得各界赞佩与同情。11月，蒋在参谋本部下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悄悄展开与德国军事和经济合作。

满洲国

1932年1月16日，郑孝胥、臧式毅等在沈阳举行"满洲善后大会"，筹备组织日本傀儡国满洲国。3月9日，傀儡组织举行建国典礼，以清朝逊帝溥仪为"执政"，定年号为"大同"，定都于长春（改名为"新京"），重要机关或由日本人任顾问，或由日本人充要职。郑孝胥任国务总理。由驹井任"国务院"总务厅厅长，总揽大权，日本人分任次长及司长把握主权，各机关均有日本人。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于是时对外国干涉提出威吓。6月14日，日本政府对"满洲国"予以承认。8月8日，日本派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为驻"满洲国"特派全权大使及关东长官，其权力等于总督。9月13日，日本武藤信义为大使，于9月15日与其总理郑孝胥签订"日满协定书"，许日军驻扎东北，确认日本人在东北之权利与利益。于是攫取东北盐税、邮权，及关税，东北遂沦入日本人铁蹄之下。

长城战役

1933年1月1日，日军进攻山海关，中国守军何柱国所部安德馨营英勇抵抗，经两昼夜激战，全部殉国。日本关东军在山海关炮击榆县城，中国守军奋力还击，与日军巷战。1月3日，日军攻陷山海关。随后日军加紧西进，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部署3路进犯热河，东北军守凌源腹背受敌，退

守长城要塞喜峰口。3月1日，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扣留军用汽车偷运鸦片输送天津，3月3日夜竟率所部满载私物潜逃，不战弃守承德。3月4日，日军以120名骑兵先头部队占领承德，热河各地随之陷落，日本将热河并入满洲国。3月6日，蒋由汉口乘车北上，3月7日到郑州；3月8日抵达石家庄；3月9日到保定；3月25日，蒋才乘机离开。3月8日，政府通缉汤玉麟，命军政部长何应钦驻节北平，驰调国军北上增援。3月9日，日军抢占喜峰口，傍晚，奉军长宋哲元令，第一〇九旅旅长赵登禹率兵跑步驰援抵达战场；考虑到日军日间火力优势，宋哲元派赵登禹带队夜袭，并将第三十八师董升堂团也交赵登禹指挥。3月10日，第二十九军赵登禹旅在喜峰口与日军激战。3月11日深夜，赵登禹亲自带"大刀队"500人只带大刀和手榴弹分两路雪夜行军，于3月12日凌晨夜袭日军，砍死砍伤逾千人，缴获坦克11辆、装甲车6辆、大炮18门、机枪36挺、飞机1架，500名大刀队员仅23人生还。此后，日军继续进攻，突破中国守军的长城防线。中日两军在长城爆发军事冲突，虽然中国军队在几次战斗中占上风，但在日军迂回包抄下，北平、天津受到威胁，因而签订《塘沽协定》，中国军队撤到长城以南。5月31日，黄郛遣代表熊斌与日方代表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协定》。

1933年5月，日本关东军派遣伪军刘桂堂部、张海鹏部、李守信部，共约1万6千多人向察哈尔进攻。5月26日，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6月22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康保。一个月后，伪军反攻重占多伦。

华北事变

1934年11月7日，蒋在绥远会见荣王、德王、潘王等蒙人与党政人员，并对各主席和边外将领指导一切。

1935年与1936年，中国为保卫华北，两度不惜一战。1935年4月起，日军开始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日本军方以动武威胁，迫使中央政府党、政、军人员和机关撤出河北省、察哈尔省，并要求中方取缔军民排日行

为。6月27日，察哈尔省政府代主席秦德纯接受关东军特务长土肥原贤二之条件，撤退张家口驻军及中国国民党党部，解散排日机关，协助日本人在内蒙活动，允许不向察哈尔省移民，是为"秦土协定"。7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协定》。从此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继驻平政务委员会之后，同归终了，国民政府失去对河北省之统驭力。国民政府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出任委员长，第二十九军各师师长分任北平、天津等市市长。土肥原贤二催宋哲元与商震宣布自治。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受南京国民政府节制之地方行政机关；但对日本军部，宋哲元等人就是下一个溥仪。

1935年11月9日，上海公共租界发生日本海军中山水兵射杀事件。11月，土肥原贤二操纵多个汉奸组织联名致电北平宋哲元、河北商震、山东韩复榘、山西徐永昌、绥远傅作义、察哈尔张自忠等，要求开放政权，允许"自治"。11月24日，河北省蓟州密云区兼滦州榆关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日军唆使下，在通县通电全国，宣布脱离国民政府独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宣告成立，殷汝耕担任"委员长"。12月25日，殷汝耕又宣布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辖25县，自任"政务长官"。1935年12月18日，国民政府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对抗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日本军方所期盼之"自治"政府完全失去设立之根据，土肥原扰攘数月之分离华北阴谋只得暂时搁置。1937年7月，日军相继攻陷北平、天津，在日军指令下，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席王克敏等人在北平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也被并入。

绥远战役

1936年5月12日，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孙、察哈尔省原政府委员德穆楚栋鲁普亲王（即德王）在日军支持下，宣布成立"蒙古军政府"并自任"总裁"。11月，德王自组织内蒙古军政府，"西北蒙汉防共自治军"改称大汉义军，并

一再侵攻绥远。1936年11月26日，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部克复蒙军盘踞之百灵庙，是五年来中国首次攻势。战争最终以晋绥军大获全胜而告终，大汉义军在此次战争中几乎全军覆没，并最终被撤销编制，日本方面因为此次严重失利而减少了在总攻中使用日伪军的次数。陈诚率军赴援，称："人所待我者为不战而屈，今后我决战而不屈。"

攘外必先安内

1934年，中共依苏联指示长征，冀取得物资；蒋中正则藉"剿共"控制西南。

蒋提倡的"先安内，后攘外"国策，即先剿平中共和地方割据势力，再凝聚力量抗日，与国内激昂的民族主义浪潮背道而驰。

1931年起，留俄国际派掌控中国共产党大权，观念和目标并不切合中国实际状况，仍然高谈无产阶级革命，企图占领都市，继而使各省独立。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于苏联国庆日在中央苏区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江西瑞金。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

一二八事变后，蒋中正遣十九路军剿共，十九路军多有伤亡，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等私下与中共停火，并联合两广倒蒋。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中华共和国"，李济深任主席，废除中国国民党。11月2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曾与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订立同盟协定，双方停止军事行动；第十九路军允尽力消灭福建与苏区间一切障碍势力，双方恢复商品贸易，并采互助合作原则；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赞同福建境内革命之一切组织之活动。但一个多月后被国民政府击溃。

中国军队拥有庞大陆军系统，从1933年起陆军装备、编制整顿。1933年10月，国民政府动员近100万国民革命军围剿中国共产党控制之农村根据地，

迫使红军向陕北长征。

1934年，苏联扶持的盛世才政权，与国民政府支持的马家军在新疆发生冲突，苏联直接派兵入侵新疆。

1935年，蒋加快备战，首先在全国各地推行“新生活运动”，灌输民众“军国民教育”；接着，国防设计委员会改为资源委员会；借着追剿“长征”红军，中央军政进入西南各省；统一货币，实施“兵役法”。新生活运动教导人民“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资源委员会勘探、储备物资，兴建工业。8月1日，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是关于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之崭新纲领，又称《八一宣言》；宣言果断放弃中共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一直执行之左倾关门主义的“反帝下层统一战线”策略，首次提出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之主张。12月9日，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的彭涛等人通过“北平学联”发动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学生1,000余人出动示威，反对自治运动，要求停止一切内战，与军警冲突，数人被捕。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正式将“反帝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发展为反日反蒋、上层与下层双管齐下之统一战线策略。

1936年，蒋积极和各个地方军系谈和，完成中央军30个师整编。5月，日本破坏海关缉私，并增兵华北，中国一再提出抗议。6月，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组织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反对国民政府“不作为”，称兵入湖南，即“两广事变”。7月，广东军队抗命拥蒋，蒋中正最终得以实控两广。日本总想待中国内变，但是不若其所希望，两广问题不但未引起内战，反使团结加强。9月，基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放弃反蒋方针，确立“逼蒋抗日”。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趁蒋中正亲自到西安指挥剿共之机，发动西安事变，对蒋“兵谏”，震惊中外。斯大林闻讯后下令限十日内释放蒋介石，毛泽东对于苏联不杀蒋介石的命令感到愤怒。最后，中共派周恩来赴西安同中国国民党协

商解决问题，在宋子文、宋美龄斡旋下，蒋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而获释，国共两党表面上联合抗日，成为日后影响中国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关键因素之一。12月23日，日本首相广田弘毅在枢密院报告，如果国民政府以容共为条件，与张学良妥协，日本即断然排击。国内各股势力都愿意服从蒋指挥，共同对抗日本；促使蒋必须一改从前暗中准备抗日之态度，采取更强硬立场回应日本挑衅。

1937年－1938年

1937年初，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再与冀察政务委员长宋哲元谈判华北经济问题，以南京不同意日方要求，仍无结果。日本有“甲等师团”17个陆军常备师团，加上各特种部队，兵力约40万人；有后备军人动员体系，完全编组后备师团，兵力可达400万人。4月，日本再增兵平、津；外务相、大藏相、陆军大臣、海军大臣会议，决使华北成为防共、亲日、亲满地区；报纸声言扩大塘沽协定及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不令华北“中央集权化”，甚至有驱逐第二十九军之说。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就模仿普鲁士参谋本部建立参谋作业；战术灵活，战场部署不苟，单兵战斗基本动作完全按照教典展开；炮兵测量与步兵、装甲部队协同作战熟练，空中火力到位。战争开始时，日本在军事和经济方面都占有强大优势，计划采用速战速决之作战方针，甚至提出“三个月灭亡中国”；面对日军强大攻势，在中国形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订全国抗日军事方针，建立全民族抗战之政治、军事体制。中国在抗战爆发前夕，陆军共138个师，180多万人，部队编制、器械和训练落伍，战力低落，没有后勤动员能力；部队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原来地方势力之武力，靠主官个人关系维系士气，没有国家观念；政府国军德械师只有8万人；军队现代后勤、医疗和训练体系建立不久，个别省区部队装备是民初单发枪械，停留在清末水平。战争初期，日军凭借军事装备，相继占领北平、上海、南京等城市，控制主要交通点线；中国军队武器装

备落后，利用广阔国土空间，采取逐渐消耗乃至消灭日军之防御作战方针，挫败日军速战速决之计划。日本舰艇有285艘，排水量1,400万吨，空军飞机2,500架；中国舰艇有50多舰，排水量5万7千吨，空军飞机500架。

面对日本侵略，在中国抵抗日本侵略之战争中，正面战场之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日军之进攻，在淞沪抗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保卫战等多次大规模战役中显示中国军民之决心。

七七事变

1937年5月，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在热河承德，田代皖一郎在天津分别召开会议，加紧压迫绥远、华北。6月初，近卫文磨组阁，广田改任外相，一意将就军人；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扬言，为对俄作战，应先予南京政府以武力打击。6月以来，驻丰台日军演习渐增至三至五日一次，初为虚弹射击、昼间演习，后竟实弹射击、实行夜间演习，且有数次演习部队竟要求穿宛平城而过。

1937年上半年以前，国军在华北前线驻防只有第二十九军1个军兵力，分散于张家口、北平、天津及平绥铁路、北宁铁路沿线，兵力十分单薄。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辖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特务旅、2个保安旅，总兵力约10万人。

7月6日，驻丰台日军不顾大雨、道路泥泞，在芦沟桥铁路桥东北龙王庙演习场地，以芦沟桥为攻击目标，进行攻击演习，至宛平城东门外要求通过宛平城到长辛店地区演习，遭国军拒绝，双方交涉至晚间，日军退回丰台。在日本的寺平副官依然坚持下，日军包围卢沟桥，开始从东西两门外炮击城内，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吉星文奉命率团反击，是为卢沟桥事件或七七事变。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晚7时30分，驻丰台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至芦沟桥西北龙王庙附近演习，

晚10时40分宛平国军突然听到城东北日军演习响起枪声，数名日军到宛平城声称丢失一士兵，国军拒绝其进城搜查要求，日军立即包围宛平城，并开枪示威；北平东交民巷日本华北驻屯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据清水节郎报告，即令丰台一木清直大队长带领第三大队前往卢沟桥指挥战斗，夜12时，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电话通知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第二十九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当即答复，“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丢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引起误会”。日本则称为“北支事变”。7月8日凌晨2时，冀察政务委员会派宛平县长王冷斋与松井久太郎交涉，当时失落之日军已归队，4时日方代表要求宛平城内国军从东门撤至西门，由日军占据东门再行调查被拒；谈判期间，4时50分日军向宛平城开炮轰击，国军第二十九军吉星文第二一九团金振中营开枪还击，中国抗日战争揭幕。“七七事变”在日方看来，仍然算是许多大小冲突之一；日军在宛平县郊演习，姿态耀武扬威，还要求进城搜索，全是在制造借口，压迫中方让步；实际上，日本并不将中国放在眼里，军部设定假想敌是苏联；东京根本没有打算在中国扩大战事，只打算巩固华北势力范围，扩大日本利益；但华北、东北日本少壮军官却嫌打打停停太缓慢，主张再给中国“一击”，令中国就范；七七事变后，日本内部“扩大”与“不扩大”两派相持不下；扩大派占上风，东京下令增兵华北。

7月8日，蒋在当日写下：“倭寇在芦沟桥挑衅：一、彼将乘机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二、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三、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四、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中共中央发表通电，向中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在山东老家，几天后才赶回天津坐镇；宋为保存实

力，不愿拿地盘和部队与日本硬碰，想透过与日方交涉保持局面，尽量委曲求全；于是宋搁置部下之备战计划，不顾南京电报，和日军私下洽谈停战协议；宋为“表示谈判诚意”，下令撤除北平沙包和拒马。

7月17日，蒋写道：“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弥战祸乎。”蒋发表《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第二次庐山讲话），正式表明准备全面抗战的方针。

7月14日，毛泽东等致叶剑英电，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及红军将领，请蒋严令第二十九军保卫平、津、华北，动员全国海陆空军，驱逐日寇出中国，红军愿在其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中国共产党首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电呈蒋，愿在领导之下，为国效命。蒋之严正表示得到中国各地势力支持，陕北中国共产党及红军、四川川系、广西桂系、山西晋系、西北马家军、云南滇系等军政将领一致表态拥护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共同抗日。

平津作战

日军于7月25日攻占廊坊车站。7月26日，日本总攻北平、天津，第二十九军缺乏战备，奋力抵抗。月底，日军进占天津、北平，第二十九军主力退守保定一线，余部由张自忠率领接受日军条件而困居北平，平津作战结束。

7月27日开始，日本军根据参谋总长之命令组建派往中国战场之化学部队；此后，又培训各部队中从事化学战之人员，并在中国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

7月31日，蒋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只有抗战到底，与倭寇死并。8月初，蒋复宣示抗战方针，随时随地抵抗，使日本人战而不取；各地重要军事将领，如广西白崇禧、山西阎锡山、四川刘湘、云南龙云、中共朱德

等，不论以往与蒋有何意见，均会集南京。8月7日，蒋召开国防党政联席会议，各地方军事领袖都出席参加，蒋在会上宣示，战事一起，“各省与中央须完全一致，各无异心，各无异言。”与会人员全体起立，一致赞成。

战争动员

战争之初划分5个战区，以第三战区为重心，保卫京沪杭，至1945年增至12个战区。

1937年8月8日，日本曾拟有《停战条件》及《国交调整案纲要》，准备谈判。8月12日，中国中央政府决设置国防最高会议，推蒋为陆海空军总司令，以军事委员会为统帅部。国民政府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推蒋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统率全局，领导对日抗战。8月15日，日本正式下动员令，编组上海及华北派遣军。8月16日，改以蒋为大元帅，组织大本营；南京失守后，大本营撤销，仍由军事委员会总揽军事。8月20日，中国划分南北各战区。8月20日至25日，中共召开洛川会议，确立抗战方针：“创造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同日，毛泽东则命令八路军跨越山西至河北，支持傅作义部队作战，却事后透过无线电告知前线指挥官，早先命令纯粹为宣传，事实上八路军应尽量放慢移动速度，“每天移动五十里（徒步25公里），每行军三天，休息一天。”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改编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及陕北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八路军辖3个师（第115、120、129师），计3万人，师长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副师长为聂荣臻、萧克、徐向前，政治委员聂荣臻（兼）、关向应、邓小平。全军共4.6万人。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决

定从第115、第120、第129师各抽一部共9,000余人，组成直隶中央军委的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萧劲光任主任。9月11日，按全国统一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番号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由正副总指挥改称正副总司令，但八路军称呼仍被指战员和群众习惯沿用。

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任命北伐名将叶挺为军长；尔后，由中共中央提名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又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副主任。新四军辖4个支队，计1万余人，支队长为陈毅、张云逸等。全军共1.03万余人。

8月28日，日本宣布封锁中国港口，对沿海一带，中国苦无海军，仅由陆军固守。日军曾炮轰厦门。9月6日，日军攻赤湾，威胁香港，日舰巡行于伶仃洋面，港粤航行陷于停顿。

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宣示服从国民政府领导，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且派遣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到南京。9月23日，蒋为中共共赴国难宣言发表谈话："……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中国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

淞沪会战

1937年北平芦沟桥事变后，蒋为长期作战，将日军入侵方向由北向南改为由东向西，同时也为引起国际社会注意日本侵华，在上海主动攻击日军；中日两国不宣而战，由地区冲突真正升级为全面战争。蒋对麾下称："上海

这一仗，要打给外国人看看。”8月之交，中国部分军队已开抵上海附近，并计划封锁江阴要塞，使长江日本船舰无法逃脱；行政院秘书黄濬受日本收买，泄露消息，汉口一带日舰、日侨先期退出。7月中旬，日本驻上海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建议东京，不宜将战场局限于华北，应同时攻取上海、南京，分散中国兵力，制其死命。7月下旬，长谷川清借口陆战队1名失踪，布防上海闸北。8月9日，中、日士兵在上海机场冲突。8月11日，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接南京电话：“进军上海”；8月12日，国军德械师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分别出现在江湾、闸北。

1937年8月13日上午9时15分，淞沪会战揭幕。国军第八十八师先头部队在八字桥遭遇日军，双方互指对方先开火。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中首场大型会战，是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之战役。中方称“八一三战役”，日方称“第二次上海事变”。中日双方约有100万军队投入战斗，战役持续3个月，日军宣布死伤4万多人，国军统计死伤30万人（日军死伤实则近10万人）。上海日军初仅陆战队1万人，中国陆军4万人，空军轰炸日本军舰；此后双方陆续增兵，国军虽不惜牺牲，终不抵日本炮火。据学者李君山统计，30个国军德械师，有21个师先后派到淞沪战场。

日军机13架轰炸杭州。日本军机分批袭杭州及广德机场，时国军第四大队各机甫自周家口抵笕桥机场，即紧急升空作战，由大队长高志航率机27架，分途拦截，结果击落日军九四式轰炸机3架，后世称八一四空战。中国空军取得九比零战绩，1940年国民政府明令订8月14日为空军节。

1937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宣布自卫抗战。中国可供作战飞机仅220余架。中华民国空军分批出击上海敌军事据点及船舰，并以驱主力防卫首都南京。8月23日，日军松井石根率两个师团登长江南岸，上海战事从市区攻防转为大规模阵地战。第一阶段，日军刚登陆，国军在长江沿岸强攻图打击日军；第二阶段，9月11日起，国军因伤亡过大改采守势，将主力撤到浏河－罗店－蕴藻滨－江湾一线，日军转守为攻，主攻罗店，国军死战不退；

第三阶段，日军在北线进展，南面防线突出，一部向南回转，欲包抄国军后路，鏖战苏州河。9月中旬，国军退守第一预备阵地；日军约10万人，国军约30余万，制空权则在日本之手。日本启动后备动员体系，共12个师团抵上海。战役后期，国军败退，上海将失守。由于国军抗敌死伤极为惨烈，战史学家喻之为“血肉磨坊战争”，甚至被喻为“中国版凡尔登战役”。9月28日，国际联盟谴责日本暴行。9月下旬，国军退守第二预备阵地；10月26日，主要阵地失陷，退向上海西部。10月，国府决议迁都重庆。10月下旬，日军迂回包抄后方，国军主力开始撤向苏州河南岸。10月21日，国军以广西军队为主力兵分三路总攻顿挫，日军立刻跟纵逆袭；10月26日，蒋亲自下达“固守”命令，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手令：“著第五二四团中校团附谢晋元，率该团第一营（加强）杨瑞符部，于本晚先在北火车站附近，占领阵地，掩护师主力转进后，迅速进入四行仓库固守待命。”谢晋元率领由约430人组成一个加强营，固守四行仓库；他们从此成为上海“孤军”。10月27日，最多三万民众在苏州河畔四行仓库观战；10月29日，由女童军杨惠敏冒险送入之中国国旗在四行仓库顶楼升起。

11月7日，日军组成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同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日军2个师（第10军）登陆杭州湾，国军全线西撤。11月9日，国民政府发表自上海撤退之声明：“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金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11月11日，国军撤出上海。11月12日夜，上海沦陷，淞沪会战结束。11月17日，蒋于陵园官邸召开第三次会议，独排众防守南京，陆军训练总监唐生智表示愿意防守首都。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言，决不为城下之盟，“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更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吾人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

的，特此宣告，惟共勉之。”由于苦战之后，实力丧失十之六七，无法遏止日军前进，预设之长江至苏州、嘉兴及江阴至无锡国防线不守。除军队耗损，淞沪会战后期毫无章法之撤退令战线完全崩溃，令日军得以长驱直入，间接导致南京保卫战提早开战。东京大本营主张不进攻南京，设下追击“统制线”，限制日军在苏州、嘉兴以东之线；日军前线将领则主张“暴支膺惩（惩罚暴戾的支那）”，认为只要逼迫中国，占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就能屈服中方求和，逐渐成为日本舆论主流；12月1日，木东京大本营颁布《大陆命第八号》，正式下达“敌国首都南京攻略”之命令。

南京攻守

1937年11月下旬，松井石根5万部队兵分6路，进兵南京。12月3日，数十架日机飞临南京上空，中国空军只剩下两架零件完整能起飞之战机，乐以琴、董明德驾驶美国造“霍克III型”双翼驱逐机迎战，乐以琴殉国，年仅23岁。12月8日晚，日军全线突破中国军队的外围防线，直逼南京城。 12月12日，中国首都南京陷落，12月24日，杭州继之。攻陷南京后，日军入城大肆搜捕中国士兵，第6师团奉命“不论妇孺，一概格杀”，又以“未和中国宣战”为由，中国士兵不具俘虏资格，默许集体杀戮、施暴。12月13日南京失守后，日军遂进行震惊世界之“南京大屠杀”。当时南京各国记者（包括日本随军记者）报导：民众被迫自掘坟坑，然后日军以机枪集体射杀；中国人遗体堆叠山高，成堆抛入长江。日军进入南京后，大肆劫掠、奸淫、屠杀，被掳官兵、平民妇孺，或遭集体扫射或被砍死，为时一周。国军第七十三军七十七师排长徐朝禄少尉见到“沿街满是尸体，还有好多赤裸的女人及女孩，被日本人用刺刀从下体挑得肚破肠流，躺在那里。”日军用绳索，将数百名徒手士兵或民众捆绑在一起，用机枪扫射，或用汽油焚烧。由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底，日军在6个星期内，屠杀至少20多万人。在张纯如《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南京浩劫》里，列出不少机构和学者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之研究数据：根据当时南京之埋葬纪录，最少也有20万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录得死亡人数为26万；南京军事法庭提出遇

难者总数在30万人以上，在中国被普遍接受。12月15日，蒋发表《为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12月17日，中支那方面军举行南京入城式。而根据日本陆军内部资料，自1937年11月8日至12月13日止，日本华中方面军总共死伤两万六千多人。

华北作战

华北日军占领北平后，计划进一步占领华北、山西北部和绥远。一方面以主力沿平汉铁路进攻河北保定、沧州、石家庄、德县一线。另以一部在主力右翼，沿平绥铁路北攻南口。1937年8月初，日军编成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联合中国驻屯军一部沿平绥铁路东段进攻察哈尔，以"解除对中国驻屯军后侧及满洲国境的威胁"。中国任命傅作义为国民革命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加强防御华北，负责平绥铁路东段。8月7日，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进入南口阵地。日军在关东军参谋长坂垣策划下，以相当大兵力主攻南口，中方由汤恩伯部之王仲廉师苦守，8月9日，日军开始正式攻击。察哈尔境内日军南攻张家口，激战16天，8月下旬，南口失守，张家口亦陷。日军并攻陷怀来和延庆。8月29日，日军两支部队在宣化会合，防御平绥铁路西段的中国军队面临夹击危险，遂分头撤退。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随即在伪蒙骑兵协同下沿平绥铁路向西继续进攻。8月31日，日军中国驻屯军与到达的国内援军编组为华北方面军、第1军和第2军，连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在内，日军用于华北作战部队合计约37万人。9月，日军为确保华北主力侧翼安全，以第5师团、察哈尔派遣兵团分东、西两路从北面进攻山西。日军进陷山西大同。9月13日，李服膺部在天镇、阳高一线守护不力，大同弃守。9月中旬，日军逼近内长城，企图突破平型关、茹越口，与察哈尔派遣兵团进行协同，欲歼灭中国第二战区主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平型关、雁门关一线组织防御。

太原会战

1937年10月，国军第179旅开赴前线，太原市民夹道送行。

1937年9月24日，日军攻占重镇平地泉。第八路军朱德部奉命增援，与山西王靖国部配合两方夹击。9月25日，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被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以东设伏，经过激战，该部日军1,000余人被全歼，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击毁汽车100辆、大车200辆，缴获步枪1,000多支、轻重机枪20多挺、战马53匹。甫经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之红军林彪师会同晋军、陕军重创4,000日军于晋北平型关，为中国在北战场之首次胜利。9月26日，中国军队歼敌一个联队，日军向蔡峪口溃退，中国军队继伏重兵于平型关之土沟，待其增援之两联队经过，尽予以歼灭，遂成平型关大捷。蒋致电嘉奖。9月26日起，日军于连云港与中国军队发生炮战，图在墟沟登陆。9月27日，中国军队乘胜攻灵丘，两败日军。10月2日，日军占领连云港外东西岛。

10月初，卫立煌率国民革命军第十四集团军从河北石家庄转赴晋北增援，并负责指挥忻口会战。忻口正面中国守军与处于日军后方第十八集团军密切配合，多次重创日军，使日军在晋北苦战。10月26日，日军左纵队进抵娘子关侧后，中国守军主力仓促后撤，日军当日攻破娘子关，并追击溃退的中国守军。中央军及晋军破之于忻口，军长、师长战殁，而战地不为之动。

10月，日军一支西陷绥远省城归绥，一支南犯太原。11月2日，晋东方向日军占领昔阳，形成与晋北日军会攻太原之势，忻口中国守军当夜南撤保卫太原。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命令主力撤至太原以南，以傅作义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守太原。日军改自河北攻晋东；11月9日，日军占领太原。

8月8日，蒋分析国军作战态势时认为："全部战略之弱点，乃在山东，应设法补救。"南口之战告一段落后，日军循平汉铁路南下：9月，攻陷河北保定；10月，攻陷石家庄；11月，攻陷河南安阳；另一路由津浦铁路南下，

攻陷德州。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不战而走，12月27日放弃济南。青岛以陷于海陆夹攻，守军于炸毁纱厂后西撤。1938年1月11日，蒋由武昌飞开封，召集第一战区、第五战区团长以上军官会议，演讲“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要求各将领要铲除保存实力、拥兵自重之亡国思想，演讲完毕，当场下令逮捕韩复榘。1月14日，经国民政府法院将韩复榘判处死刑，之后枪决。

华东作战

1938年2月，津浦铁路北段日军（华北方面军）深入鲁南，南段日军（华中派遣军）越过淮河，企图合犯徐州。面对徐州北面门户洞开，李宗仁调整部署，同白崇禧商定改为节节抵抗、诱敌深入，吸引日军孤军南下，相机将敌围歼。3月，南来日军进攻临沂，为时8日，伤亡颇大；在津浦铁路南段，张自忠第五十九军（30,000人）强行军不到24小时到临沂近郊沂河西岸，3月12日分两路强渡沂河，同时庞炳勋第三军团（第四十师5个团，13,000余人）从临沂杀出，坂本支队（第5师团第21旅团为主力）向北溃退。3月17日，国军第二十二集团军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3,000多人殉国；3月18日，濑谷支队（第10师团第33旅团为主力，配属炮兵、工兵、装甲车之“战斗群”，约万余人）攻下滕县。

徐州东北台儿庄攻守尤为激烈，为时4周。濑谷支队以第63联队组成“台儿庄派遣队”，3月24日开始进攻台儿庄；同日蒋带白崇禧到徐州，隔日白崇禧向蒋建请调来有德式反战车炮之中央炮兵第十团；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第三十一师池峰城部守台儿庄，至3月31日全师伤亡超过七成，孙连仲挂电话给池峰城：“士兵填完了，你就填上去，你填进了，我就来填进去！”。

中国以4倍兵力，截断日军补给，歼其16,000人，日军于4月7日后撤，证明其并非无敌。

4月7日，汤恩伯第二十军团（10个师，72,000人）大败坂本支队；同日李

宗仁、白崇禧下令全线反攻，汤恩伯军团、孙连仲集团军反攻大破濑谷支队，重创坂垣师团。3月16日至4月15日之“台儿庄会战”，中国军队约29万人和日军约5万人在徐州台儿庄激战一个月，中方伤亡5万余人，毙伤日军2万多人；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曾3次赴徐州视察督战。捷报传到武汉，10万人上街游行庆祝。南京失守后之士气为之重振，人心尤为兴奋。日军两个师团伤亡近2万人，中方死伤3万余人。日军改向山东、河南之交与安徽北部进攻。5月17日，李宗仁主动放弃徐州，国军主力撤出；月底，河南兰封、归德相继失陷，日军攻打襄阳、樊城。5月，国军放弃徐州，战场移于豫东。历史学家黄仁宇称：“不是先有国军才有抗战，而是因为抗战才造就出国军”；4月25日，李宗仁呈蒋四月敬电：“前次台儿庄作战，孙总司令连仲指挥所部，固守台儿庄各村落，虽敌屡以主力，集中炮火，猛烈攻击，皆能不恤伤亡，沈着应战，并时反击，予敌以重创，使汤军团及张轸师，达成包围，把握胜利。汤军团长恩伯，指挥主力，迂回枣、峄，行动敏捷，侧击敌军，果敢攻击，获取胜利之基础。该总司令、军团长，忠勇奋发，指挥洽当，寔已开国军胜利之途径，树袍泽奋斗之楷模，恳予特别褒奖，以励有功，至所部各级官长作战功绩，已令查明呈报，以资分别奖叙。谨电呈鉴核”。

1938年6月5日，国军不守开封。国军掘毁郑州以东花园口黄河堤防，洪水向南泛滥，人民损失惨重；6月9日决口成功，开始放水。总计淹没40余县，河南民宅冲毁140余万家，陆沉800余万亩，安徽、江苏耕地陆沉1,100余万亩，倾家荡产者480余万人；夺去89万民众性命。日军进攻郑州、南窥武汉之企图为之滞延。

华中华南作战

薛岳指挥第九战区激战13昼夜，歼敌1万4千余。

武汉为南京撤退后最高统帅部所在地，亦为日本次一攻击目标。1938年2月以来，日本空军不断轰炸，遭到坚强抵抗：2月8日，中国空军及苏俄义勇

军击落日机14架，中国大队长李桂丹战殁；4月29日，击落日机21架，中国损失9架，苏俄损失2架。6月15日，日本海军溯长江西上攻陷安庆，会同陆军突破江西马当要塞。7月25日，九江失守，武汉外围会战开始，日军分3路前进。

9月底，日军主力第106师团孤军深入到江西九江德安县万家岭地区，国军第九战区部队由薛岳指挥下属10万将士，在南浔铁路战场与日军约28,200人激战13昼夜，歼敌1.4万，日军前所未遇重挫。

10月，国民革命军12集团63军、153师、93师在广东省广州湾地区与日本第21军进行攻防。仅十余日，广州、佛山及增城等地即告沦陷，粤汉铁路失守，间接迫使国军退出武汉。国军伤亡1万人，日军伤亡约2500人。10月12日，日军4万人登陆大亚湾，10月21日占领广州。10月24日，国军主动退出武汉，武汉会战结束；11月11日，日军占领岳阳；11月12日长沙大火，20万人无家可归。蒋致孔祥熙十一月皓电："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用人失察，防范疏忽，致长沙大火人民受殃，着即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

1938年－1941年

中国敌后军民展开"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即散兵作战）等广泛之游击战争，牵制与消耗日军，并在1940年进行"百团大战"；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相互配合抗日持久战，使战线延长。日军虽然占领大片中国国土，但无力全面进攻中国，无法实现征服中国之目的；于是，日军在正面战场采取局部军事打击以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之策略，把军事进攻之重点转向后方，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作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英等盟国成立中国战区，在中国建立空军基地，中国则出兵缅甸联合盟军对日作战。

分而治之

1937年，“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1937年12月14日，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席王克敏等人在北平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并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8年3月28日，北洋军阀段祺瑞心腹梁鸿志任“行政院长”之“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并与日本订立条约。1939年9月1日，日本人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和察南自治政府合并，在张家口成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1941年改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德王任“主席”。1940年3月29日，汪精卫政权成立于南京，汪精卫自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主席之位为林森预留；陈公博、周佛海等分据要津，“维新政府”取消，北平“临时政府”改名“华北政务委员会”，由日本直接控制，非汪之权力所及。

日本侵略中国时，曾打着“反对共产主义”旗号，多次与国民政府接触，希望同蒋合作，分化中国士气与国际影响力，但是蒋中正与国民政府没有屈服。日本作战方针最早为“三月亡华”。日本于1937年12月22日向中国提出更苛刻“和谈”条件，并声称“蒋介石须在规定的时期内派遣和平谈判代表至日本所指定的地点”，蒋乃中止与日本谈判。

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决定：“如中国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与此政权签订调整两国邦交关系的协定，协助新生的中国的建设。对于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或使它归并于新的中央政权。”1月16日，近卫文麿发表由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之〈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公然宣布“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而与各省政府主席签订和约。1月18日，国民政府发表〈维护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的声明〉，严正表示“必竭全力以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11月第二次近卫声明表示“东亚新秩序应由中日共同主导”、“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声称

只要答应和解，就从华中、华南撤军，华北在名义上属于中国。同年底，第三次近卫声明发表。

1938年1月，孔祥熙继蒋为行政院长，3月，蒋任中国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任副总裁，汪难免有不快之处。12月19日，汪夫妇与追随者从重庆出走，先到昆明，然后转往河内。12月29日，汪致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请依近卫之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3点，与日本恢复和平。1939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革所有职务，国民政府下令严缉民族叛徒。3月，汪在河内遇刺，未中，再宣布和平是中国独立生存之要道，急于自立政府。汪一行人在日方协助下，5月抵达上海，6月转赴东京。12月30日，日、汪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参与其事之高宗武及陶希圣竟逃往香港，将全文披露，证明汪之卖国证据，日、汪大感狼狈。1939年9月12日，日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西尾寿造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任总参谋长。1940年3月26日，汪精卫伪组织在南京成立。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的保护下来到南京，以“还都”的名义于3月29日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蒋严正驳斥，明令通缉。

中共代表潘汉年在袁殊引荐下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岩井英一会面，岩井要求中共与日本、东南局双方情报相互交流，潘汉年答应会帮“岩井公馆”（专门搜集重庆、英美情报的单位）在香港搜集关于英美、国军的资料，于是开始定期向日方汇报重庆、国军、英美情报。

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潘汉年控制下的香港地下党在日军协助下安然无恙的前往上海获得特别通行证并撤离。随后岩井英一协助潘与汪政府的影佐祯昭会面，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基本共识。1940年在经过饶漱石同意之下潘汉年与李士群取得联系，开始与新四军展开交流合作。1941年潘汉年住进李士群的私人寓所，同年李士群成功捕杀国民政府最大地下抗日组织（上海区书记齐庆斌）。戴笠：“李士群阻挠国府在沦陷区实施各种政策，凡足以献媚日敌者，无所不用其极。另在杭州设无线电台，专侦察

我军事行动，实为抗战以来罪大恶极之巨奸。”

陈恭澍对李士群与中共联手感到痛心：“七十六号（汪政府下以李士群为首的组织）”是杀人不眨眼的，他们是一伙汉奸、强盗、流氓及共党份子组成的罪恶集团，以往人们以为“七十六号”只是一个罪恶的渊薮而已，但很少人了解，它还在暗中掩护共产党地下活动，并协助共党份子直接、间接打击国民政府抗日工作人员。

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说，“事实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国民党的意图”。

1943年6月25日，陈布雷呈给国民政府中央的电报指出：“共党潘汉年现充新四军代表，由李士群之拉拢，在京沪江淮一带公开活动与敌伪交往频繁，延安代表冯延寿（实际上其为饶漱石的人）（化名）在南京与日军及汪精卫洽商政治停止摩擦、军事停止冲突、物资相互交换等。”

1943年9月5日，毛庆祥呈给国府中央的电报：“敌方（日本）极力献媚苏俄，企图完成联俄联共政策，尤其希望在中国联络共产军牵制国民革命军作战之兵力，现奉日军命令汪逆精卫会见八路军毛泽东代表进行谈判，而潘汉年早与汪伪正式谈判妥协，且由汪伪介绍潘汉年与日军领袖见面，东条认为此举是与东军联俄互相配合之行动，但驻南京之日军总司令长官畑俊六大将则坚持反对联合。”

深入内陆

1938至1944年，日军轰炸重庆达数百次之多。

1941年6月5日的轰炸致多达4000位民众死亡。

为动摇国民政府抗战决心，迫使其屈服投降，从1938年到1943年，日军出

动大量飞机，对成为中国抗战政治中心之重庆持续数年“战略轰炸”，使许多民众遭轰炸而牺牲。1939年后，日本空军对中国后方轰炸远及于西北兰州、西安、西南之昆明，而以重庆为主要目标。总计日军对西南大后方，投弹60,174枚；重庆受创最烈，尤其是5月3日至5月4日，落弹上万枚，伤亡惨重。特别是1941年6月5日，日军出动24架飞机分三批轮番轰炸重庆，空袭时间长达5个小时；十八梯大隧道内由于避难民众人数过多，通风不畅，致使1,200名左右之避难市民被活活闷死；这就是“六五大隧道惨案”。此一年之内，总计各地被空袭2,600余次，人民死者28,000余，伤31,000余，房屋被毁138,000余间。除少数边远省份外，中国各省均曾遭到日机轰炸；这种不区分军队与平民目标之无差别狂轰滥炸，给民众生活带来深重灾难，人们长期生活在恐怖之中。

日本为巩固已有据点，维护水陆运输线，扩大占领区，严密封锁中国对外交通，1939年至1941年，一再发动攻势。日军仍以长江一线逐步朝内陆攻击，希望借由歼灭四川省周边省分的战区兵力，逼使重庆国民政府投降。重要战役，一为两次赣北之役：第一次在1939年3月，日军约50,000人，进犯南昌，国军约20万迎击，一周后南昌陷落；第二次在1941年3月，日军约4万，国军倍之，激战于南昌以西地区，为时2周，日军颇有损失。二为两次鄂北、豫南之役：1939年4月，国军在各战区反攻，5月，武汉日军5万分路进攻，为10余万国军所遏阻，成相持之势。历史学家吕芳上称，1940年枣宜会战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与敌激战九画夜，命令部队死守阵地，没子弹用刺刀、用大刀、用石头、用石齿与敌缠斗、拼个死活，以原始身驱对付现代武器。1940年5月，日军再度进犯，兵力约增加一倍，中国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阵亡，6月日军占领宜昌，截断四川、湖南间水运。三为两次湘北之役：1938年11月，日军自湖北侵入岳州，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下令纵火，长沙全市几化为灰烬，1939年9月日军10万来攻，10天后为国军20余万拒退，为第一次长沙大捷。长沙会战结东后，白崇禧在衡山军事会议上分析，日军有“快”、“硬”、“锐”、“密”4项

优点；国军在反击时，应以稳定对快速、坚韧对强硬、伏兵对锐利、严明对机密。

1939年2月10日，日军占领海南岛；6月发动潮汕战斗占领潮安、汕头；11月，登陆钦州湾；兵力约5万人，西趋广西，袭陷省城南宁，完全断绝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间之交通。11月15日，日军70艘登陆艇在北海湾龙门港登陆，很快占领南宁；12月4日，占领昆仑关；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要收复昆仑关，向蒋申请调用中央军第五军任主攻。12月，国军16万于南宁东北昆仑关大举反攻，历时两月。12月18日，国军反攻，血战近两周夺回昆仑关。而在1939年10月下旬时，时任陆军次官的阿南惟几在省部联合会议上发言表示，已经有数十万名日军阵亡于中国战场（病死与意外身亡者应不含在内）。

日本对外扩张政策，分南进与北进。1939年5月起诺门罕战役，苏军在朱可夫统领下以寡离众，击溃日本关东军两个师团。7月，日本决定南进，为处理“中国事变”，更须解决南方问题，断绝越南、缅甸与中国交通。

1940年，日军出兵侵入越南，威胁英荷南洋帝国。6月，乘法国在欧洲战败，迫令停止滇越铁路为中国运输物资，中国通海口之交通线全断。自此中国深感财政困难，通货膨胀不已，军民生活日益艰苦，直到1944年秋间，实为中国抗战最艰苦阶段。9月，六万日军登陆安南北部进攻滇桂。

而日军同样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如东条英机在1941年10月14日的发言当中，就承认日军已经有数十万人在华作战阵亡（应不含病死与意外身亡人数）。另根据日本战后研究，在华日军作战阵亡或因重伤残废无法再度返回战场：1937年至少5.1万人，1938年至少8.9万人，1939年至少8.2万人，1940年至少4.2万人，1941年至少4.1万。

敌后战场

中国抗日游击挺进军纵队，是国民政府正规军游击兵，由每个中国战区的

游击总指挥部所管辖，与忠义救国军、义勇军及其他地方抗日武装相互合作协助抗战，并非只有共产党组织敌后战场。国民政府1938年11月划分的十二个作战区域，分别为第一战区、第二战区、第三战区、第四战区、第五战区、第六战区、第七战区、第八战区、第九战区、第十战区、鲁苏战区和冀察战区，其中前十个既包括正面战场，也包括敌后战场，而鲁苏战区和冀察战区是单纯的敌后游击区，主要作战部队为24集团军、39集团军、河北民军等。鲁苏战区位于山东省南部、江苏省北部，日后卷入黄桥战役的韩德勤，即负责苏北游击；冀察战区负责察哈尔、河北、太行山一带的游击，日后与八路军发生摩擦的朱怀冰、张荫梧、鹿钟麟，即负责河北游击。

为孤立抗日力量，日军强迫大批老百姓迁徙到其划定之变相集中营，建立"集团部落"，使许多地方成为"无人区"，以此割断民众与抗日军队之联系。日本严格禁止老百姓在"无人区"居住和耕作；而在"集团部落"内部，则实行"米谷统制"政策，农民自己加工粮食之工具也被没收；日军规定农民生产之一切粮食果品统归大仓，严禁私留或者买卖，否则受到严厉惩罚；生活在"集体部落"之老百姓已经失去一切人身自由。

日本军制造"满洲国"后，万里长城成为它与华北地区之所谓"交界"地带；从1941年秋到1942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八路军沿长城一线建立带状之抗日根据地；日本军感到威胁，在"满洲国"军配合下，把居民强行迁移到集团部落，将原来之村庄烧毁，不愿意迁移之居民则被屠杀，结果在沿长城一线建立500公里以上之无人区；因此，大量农民失去家园，因饥饿与疾病而死亡。1940年10月2日至11月30日间，日军在扫荡八路军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区与太岳区时，下令："这次作战，与过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凡是敌人地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并要一律埋死或下毒。"

1940年7月22日，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名签署“正太铁道战役”的战役预备命令，毛泽东审阅了此命令。最初预定22个团参战，但8月20日战役打响后，众多未被命令参战的团陆续加入，其中不少团是1937年后中国共产党在日占区和华北根据地当地扩编的，自备粮服军火，尤其是枪支、军服五花八门，训练和组织程度也不齐，其对日军袭扰压抑已久，彭德怀和左权始料未及，最终形成105个团的规模，更名为“百团大战”。战争期间日军发动反击战剿灭周边一带的八路军根据地，受损的平汉铁路、同蒲路、石太路、井陉煤矿区迅速恢复运作，随后日军以国军为主要目标发动战役。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特务处为基础，整合国民党党务调查处，成立国民政府调查统计局，由戴笠负责，在敌后区先后设置别动队与忠义救国军。1938年8月情报机构改组为中统局和军统局。1939年5月汪精卫政权成立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后，二者展开激烈斗争。1940年，因军统局计划使用“美人计”暗杀亲日者丁默邨失手，年仅22岁的郑苹如被杀害，后来郑被中华民国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列为情报典范人物。

国共争夺敌后战场

1940年，第89军在黄桥战役中被歼；三个月后，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被歼。国共互相指责。

1939年11月26日冬季攻势晋系阎锡山爆发十二月事变，11月28日薄一波领导的山西新军宣布起义脱离晋系编入八路军120师、129师编制，促使冬季攻势担任主力的第二战区处于混乱。12月冬季攻势，国军动员80个师，55万兵力，各战区分别收复包头、信阳、沁阳等城市；隔年更攻入开封、新野、襄阳、福州等地；日军反攻回复原来战线，日本军部检讨时认为：“……我军未依期望进展，掌握主动，致使中国军队能发动此一顽强之攻势，直可视为事变以来陆军最为黯淡之时期。”

1940年3月，国军由山西南部经太行山至河北向日军发动攻势，八路军在距

离日军50英里外的情况下发动抗击朱怀冰、石友三的6万国军，八路军取得上风。在华中地区，国共双方则发生竹沟惨案、平江惨案等事件，中共处于不利地位。1940年10月，新四军与苏鲁战区之国军游击队在江苏泰州黄桥镇冲突，消灭苏北国军。苏北地区的中国共产党新四军与当地驻扎的国民革命军发生黄桥战役，一举击溃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所属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九军。军事委员会命令新四军一律开赴黄河以北作战；命令期限一再展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指挥第三十二集团军上官云相部包围新四军主力10,000多人。1941年1月4日至12日，新四军在皖南泾县遭国军包围（皖南事变），军长叶挺以下5,000人被俘，副军长项英被杀，番号撤销；中国共产党称为第二次反共高潮，自行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并要求恢复该军番号，惩办与事变有关人员，撤退华中国军，平毁陕甘宁边区封锁线，废除一党专政，再要求承认中国共产党之抗日政权，维持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现状，八路军、新四军编为6个军，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国、共代表分任主席副主席。最后中共统一整编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为7个师。

1941年－1945年

1941年，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不仅使中国孤立无援，更公然分裂中国东北与外蒙古国土。

美国取消在华治外法权。

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署《日苏中立条约》、《共同宣言》，其宣言内有："……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中国共产党出于此条约有利于打破德日包围苏联的局势，为国际局势考虑，表态全力支持。但其态度难以为民众所接受。

4月15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声援两国条约，并重申日苏两国条约并未

变更中国领土权，反而确保了两地的安全。国民政府外交部王宠惠部长发表声明，强调东北四省及外蒙均为中华民国之领土，《苏日共同宣言》对中国绝对无效。

1941年7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禁止对日本输出石油等战略物资，冻结日本在美财产，并要求日军撤出越南。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美国对日本宣战，并呼吁世界各国对日本实施贸易制裁。12月9日，中国正式向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宣战，12月11日，纳粹德国和意大利王国对美国宣战，接下来几天，德国和意大利的宣战行为令其他轴心国成员匈牙利王国、罗马尼亚王国、保加利亚王国和克罗地亚独立国也对美国宣战。不久之后，除了先前与日本签立互不侵犯条约的苏联以外，英国等同盟国也对日本宣战。

从此中国不再独立对日作战，抗日战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日本的战略重心也从中国转变为美国。因此中国与英国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并与英美等国签订废除部分不平等条约，令重庆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上升。英、美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与内河航行权，与中国另立《中英平等新约》、《中美平等新约》，此举带动了欧美国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风潮，是中国司法走向独立的标志。

1944年春季，中国军队在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战场发动攻势作战；至1945年夏季，共歼灭日伪军47万余人，攻克城市70余座，收复大片国土。

中国内陆战区

1939年9月至1944年8月期间，中国军队与日军在第九战区有过4次大规模会战，日军先后出动66万人次、共伤亡10.7万人，国军出动100多万人次、共伤亡13万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直到1944年5月第四次长沙会战，激战月余，日军才攻陷长沙。

1941年1月16日，日本陆军中央部制定了《对华长期作战计划》，企图在年内在不减少现有兵力，对重庆国民政府采取高压的军事态势，利用国际形势变化尽早解决中国作战。

1941年4月，阿南惟几制定了长沙作战计划，力图在现有兵力的情况下，最大可能的摧毁重庆政府战力。

1941年9月，日军第二次来攻，4天后退却，此为第二次长沙之捷。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目的在消灭第九战区作战主力，在9月28日攻入长沙，10月1日日军主动撤退；国军由西、北、南三面增援，损失严重。

第二次长沙会战于1941年9月6日爆发，历时33天，日军攻占长沙，之后迅速撤离，国军趁机收复失地，双方恢复战前状态。

第三次长沙会战发生在1941年12月24日至1942年1月16日。阿南惟几为策应日军夺取香港作战，再次进兵长沙，薛岳领导国军节节抵抗，削弱日军攻势后往两翼撤退，诱使日军抵达长沙城下，两侧国军切断日军补给线；1942年1日日军不支后撤，遭国军拦截袭击，损失惨重。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开战以来，同盟国取得的首次胜利，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1940年起，有说法表明中共根据地开始从事特货鸦片种植销售，1942年鸦片收入成为中共边区经济最重要收入来源，1944年更达到总财政收入30%的规模，透过此类贸易赚得许多金子、法币等。

美国驻华代办艾哲逊于9月4日在重庆以呈国务卿1541号函，述瑞典人加斯塔夫·苏得邦谈话："在山西共产党地区种植鸦片所得之金钱，用以垫支共产党的岁收，维持共产党发行的货币，和购日本占领区的商品……大部分鸦片似乎是在敌人控制的区域内出售或易货"。

中共以晋北及陕北鸦片栽种区域最广，并以武装部队护送，将鸦片统一收购运至耀县及柳林销售，国民政府曾于1943年4月欲派内政部陕豫甘宁绥区烟毒检查团赴陕北调查，遭萧劲光拒绝。

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会战，在打通浙赣铁路，摧毁沿线机场后撤退。

1943年5月9日至12日，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畑俊六的率领下，在湖南益阳南县厂窖镇屠杀平民3万余，强奸妇女两千多人，烧毁房屋、船只无数，史称厂窖惨案。

中缅印战区

日本方面不满足于控制东南亚的油气资源，同时注意到滇缅公路对中国战场的意义。于是罗斯福与蒋中正磋商组建盟军中缅战区，由蒋中正兼任司

令，中国派代理司令长官杜聿明率10万名集合中国精锐力量的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与日本作战。原本中英两国军队预定在曼德勒筹划与日军会战，但是日军先夺取了英军控制的仁安羌，使得英军开始向印度方向退兵，于是日军迂回至中国军队背后，令中国远征军右翼暴露，结果联合作战破局成为各自溃退惨剧，远征军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残部被迫自野人山回国或撤往印度，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六军撤退回国。

这次战斗中，国军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战死。最终缅甸被日本占领，滇缅公路中断，10万远征军经血战只有4万余人安全撤离，杜聿明被召回。美军兼任中缅战区参谋长的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和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廖耀湘则留下继续负责在印度编练军队。史迪威重一隅而忽略全局，与中国全面抗战之战略观念不同。遂公开反抗蒋之命令。

1943年6月24日，史氏因要求撤换杜聿明军长不获中国政府同意，乃不经预告，于二日后将中国战区作战之美国第十队轰炸机，全部调埃及助英军作战。其后史氏曾拒绝将租借法案下拨给中美商业组织之中国航空公司两架运输机转交中国空军，不肯向华盛顿代转中国前线500架飞机之作战计划，反对美军1000桶飞机汽油之借用。史氏甚至要求担任中国三军统帅，美援武器直接援助中共，大为中国朝野所不满。

战事逆转

1943年冬常德会战。

1944年夏，国军第十军在衡阳保卫战中奋战47日，7600位将士身亡。

1945年春，湘西会战日军重挫，中国转入反攻。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元首在埃及开罗发表新闻公报《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自1895年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1943年11月，日军进攻常德，战斗一直持续至12月20日，日军一度攻占常德，但在中国军队反击下最后撤退。

1944年1月4日，支那派遣军向东京大本营提交作战计划，准备大规模进攻，打通平汉铁路及粤汉铁路，破坏美国在中国空军基地；1月24日，东京大本营批准作战计划，正式名称是“大陆打通作战”，行动代号为“一号作战”，动员兵力51万，轰炸机200架配合作战，调集2年用空军弹药，军用马匹67,000头。为了取得东南亚地区的物资，日本于1944年4月发起豫中会战，击溃汤恩伯在河南省的大军，打通了平汉线之河南至武汉段。4月23日、5月1日、5月25日，先后攻陷郑州、许昌、洛阳。6月19日，日军攻破长沙。6月2日，第十军进驻衡阳。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率部顽强抵抗47天，最终城破。第十军掘壕灌水，作背水一战之决死阵势，能夜战，常逆袭，日方称为“勇敢之重庆军”。华中日军与华南日军又联手发起桂柳战役，一路占领广西，打通湘桂铁路，最后打到贵州省独山，震动重庆。11月11日，桂林和柳州同时失守；12月5日，日军攻陷独山；12月10日，第二十九军军长孙元良率900余人，跑步抵达独山，挡住日军攻势。

正面战场之中国军队在1944年缅北滇西反攻作战中也取得胜利，并在6月收复柳州后，制订反攻计划；日军被迫开始收缩战线。1944年5月，由卫立煌指挥的中华民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日军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抢通中印公路。1945年1月，中缅国军会师南坎。中印公路首次通车，蒋决定命名为“史迪威公路”，自兹由印度运入作战物资，得以畅通，印度输油管亦接通至昆明。

1945年2月以后，盟军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于是为了消灭美军在中国的飞机场以维持大陆交通线的通畅并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集中全力于本土防卫，1945年3月起日军先后发动豫西鄂北会战和湘西会战。在河南，日本军

于3月下旬从豫中会战之后的防线以东向西发动攻击，其前锋一直冲到西峡口。在湖北，3月日本军向西北部发动攻击，于4月8日攻陷老河口；不过之后国民政府军随即发动反攻，收复了除老河口之外所有被日军占领的地区。"湘西会战"从1945年4月9日起，止于6月7日，是中国抗日战争中最后一场会战；日军为争夺芷江空军基地，共投入5个师团10万兵力，国军由何应钦亲自指挥9个军26个师18万兵力，战线长达200余公里。战场位置在湖南省中西部，此战又称"芷江攻略战"。日军攻入湖南西部，但是在中国军队抵抗之下，日军遭受挫败而退回原阵地。双方参战总兵力28万人，战线长达200公里。国军在会战主力王耀武指挥下，取得雪峰山大捷，会战以日军战败而结束，歼敌3万余人。在湖南战场上中国军民一寸山河一寸血之浴血奋战，激起中华民族战胜日军之信心和勇气，日军自此逐步收缩战线。湘西会战之胜利，标志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由防御转入反攻阶段。

1945年4月，中国军队乘胜追击，反攻广西桂林、柳州，于5月27日收复南宁，6月29日收复柳州。7月27日，国军反攻，收复桂林。策定反攻广州计划，完成一切部署，陆军总司令部推进桂林。8月，美国第十航空队调增中国。

疆独崛起

1944年，苏联帮助东突厥斯坦建国。

1944年9月，苏联驻伊宁县领事公开支持肯定"伊宁解放组织"，随后该组织在迪化市、阿山、塔城县、阿克苏等地建立分支机构，为之后的三区革命创造了有利的基础。9月2日，盛世才任命预备第7师杜德孚指挥权。

11月7日，东突解放组织特别选在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发动大暴动"伊宁起义"。11月8日，穿着哈萨克共和国军服的士兵乘坐十多辆马车，车上架有机枪封锁伊宁城北司令部桥头，阻止国民革命军增援。11月12日，暴动者

在封锁伊宁市区后，开始针对汉族屠杀。11月12日，爆发伊宁事变（中共誉之为三区革命，中华民国称为“叛乱”），在伊犁、塔城、阿尔泰三个地区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伊力汗・吐烈（乌兹别克人）说：

“醒来吧！醒来的时代到了。真主是我们的信仰，穆罕默德是我们的圣人，伊斯兰是我们的宗教，东突厥斯坦是我们的祖国。……按真主‘给暴虐以惩罚’的意志，我们相信真主无疑的诺言。我们伊犁人民团结起来，用棍棒铁锤起来反对横暴的政权而起义了，短时间内把汉人政权推翻后建立我们的伊斯兰政府。汉族血腥压迫的旗帜将被我们踏在脚下成灰烬。我们举起祖先留下来具有宗教意义的月芽、星星标志……所谓‘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谬论，制造假历史的骗子们，应该听清楚，永远记住以下事实：他们不要忘了，东突厥斯坦英雄的儿女们曾用棍棒攻击他们，汉族忍受不了这种打击。中国的官吏和帝王为了自己的土地和政权，建筑了三千五百公里万里长城，像害怕鹰的兔子一样跑到长城里面。这些事实虽然被汉族政府历史学家所隐瞒，但全世界历史可以证明这一事实。太阳是不能被衣襟遮盖住的。……”

1944年11月13日，国军预备第七师参谋长自伊宁向外发电报求援，国军支援往伊宁方向进攻到达二台，国民政府专案公署刘秉德遭杀害。15日，抗日战争第八战区司令朱绍良任命李禹祥率第7预备师、新编第45师，展开进攻果子沟的战役。国军残留在伊宁最后据点艾林巴克飞机场、鬼王庙、北大营遭受苏联动用大炮猛轰两三个月，国军发生饿死的情况。

11月22日，国军杜德孚赶往伊宁，并调集精河一带部队增援。12月朱绍良向伊犁河谷增援第二十九集团军李铁军、第45师谢义锋均遭敌军合围全军覆没。

1945年，国军在伊宁守军受到暴民猛攻，单1月1日早晨即遭到四千发炮弹、万余枚12公分迫击炮攻击。1月5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宣布脱离中

华民国而独立，和国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副主席阿奇木伯克·霍加，总司令阿列克山德洛夫。

1月31日，伊宁艾林巴克国军残部与汉族居民约四千人企图突围，在路途中遭全数消灭（杜德孚自戕），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占领伊犁全境。4月，曹达诺夫·扎义尔成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民族军政治部部长，在事后肯定苏联动员部队参与伊宁起义的贡献。7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进入全面反攻阶段，势如破竹占领托里县、额敏县、塔城县。

8月15日，中苏签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苏联承认国民政府对东北和新疆的主权，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与新疆内部事务交换承认外蒙古独立。斯大林表面上同意此条件，将东突厥斯坦的领导人，从苏联潜回的艾力汗·吐列秘密解回苏联，但是对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援助依然源源不断。

8、9月，在苏联协助下攻占哈巴河县、布尔津县、承化县、拜城、阿克苏旧城、库尔干均纳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版图。共击溃国军12个团2个营，俘虏前线最高指挥官郭岐、师长宛凌云在内的国军6000多名政府官兵，确立伊犁、塔城、阿山全境为统治区。9月，国军新编第46师徐汝诚到达迪化前线，第八战区副司令郭寄峤进入新疆。9月13日，国府吴忠信、朱绍良、郭寄峤分析情势：“三区叛乱军已推进到玛纳斯河，距迪化仅两日路程，目前屯兵玛纳斯西，有向迪化进攻之势。现守迪化之军队仅六营，援军由青海或兰州最快八到十日才能到达。”

暴动期间中国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东北日报》、《边疆服务》等报刊则对国民政府压迫新疆少数民族、残酷剥削政策进行报导，并联合中共中央共同声援伊宁事变的民族起义。新疆暴乱的革命者（如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伊斯哈克拜克·木农阿吉）自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民族军”或“11月革命”。中共1950年以前称新疆暴动者为“伊犁当局”、“伊塔阿三区”，在伊宁事变领导者“空难死亡”后改称为“中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三区革命”。

日本投降

1945年7月26日，中国蒋委员长、美国总统杜鲁门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波茨坦声明，对日本提出最后通谍，促其宣布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使用三国巨大之陆海军全部力量，使日本武力及其本土完全毁灭。三国予以日本“最后之打击”。此时美国的原子弹已试验成功，美国新总统哈利・S・杜鲁门对于苏联的参战并不抱太大兴趣，未邀请苏联协商或署名，造成苏联颇为不满。日本始终认为如果无条件投降，等于毁灭日本；公告中虽有将来可依日本人民的意志，成立一个倾向于和平及负责之政府之字句，然而未提及日本最关心之是否保存天皇，因之不肯接受。

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市投下第一枚原子弹，8月9日又在长崎市投下第二枚原子弹。

1945年8月8日，苏联根据雅尔塔秘密协议宣布对日作战，随后出兵中国东北，相继占领朝鲜北部。占领东北后苏联大肆烧杀抢掠。

据《陈诚回忆录•受降》一文载，“苏俄掠夺我东北物资，尤堪使人发指。自九一八日本据有东北后，刻意经营各种轻重工业，十余年来投下资金，在一百亿美元以上。俄军侵入后，竟以此项工业设备，视为战利品，建议由中、苏双方共同经营”，在“我方提出对案，指定南满铁路及其附属事业、水电工厂、抚顺煤矿、鞍山钢铁厂、东北航空及松花江航运，均不在共同经营之列”后，苏联竟“不以此项对案为准，公然拒绝我方接收，并将我政府所派之东北矿区特派员张莘夫一行八人，加以杀害”。据估计，苏联在东北地区共掠夺战利品损失为1946年币值的53亿4千万日元，折合当时美元13亿6千万。尚不含没有折价的白金32401.55克、白银1866549.69克和钻石741.0662克。

1945年8月9日，中国各个敌后根据地军民开始大规模反攻作战，取得重大战绩。

1945年8月10日下午7时，日本政府正式向中、美、英、苏四国发出《日本请降照会》。下午7时50分，日本政府请降书，已请由瑞士、瑞典转达盟方，日本愿意接受盟方《波茨坦宣言》之各项规定，无条件投降，但仅要求保留天皇，仍为日本元首。晚上8时许，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经中央通讯社收获，发布号外，“顷刻震动全市，街头人山人海，遍处欢呼呐喊……超过十万以上之男女老少市民……奔赴国民政府暨中央党部前欢呼，向蒋主席致敬……”同日，在延安总部，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大反攻第一号命令，令山西、河北、山东、绥远军队进向察哈尔、热河、辽宁，配合苏联及外蒙军作战，亦即抢先进入东北。

在美军空运、海运帮助下，中国国民党迅速占领各大城市，接受日本投降。8月13日，毛泽东对干部演说。中国共产党则接收经营多时的中小城市、乡村地区，在苏军协助下，也收复一个省会城市张家口。八路军、新四军于敌后长期控制大量铁路干线，增加在西南正方对敌的国民革命军接收日占区之困难。8月14日，朱德、彭德怀电陈蒋，公开表示抗拒统帅部8月10日给予该军驻防待命之命令，8月15日朱德又自称“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致电冈村宁次饬其命令所属日军投降，受降地点及代表指定：一、华北在阜平地区，由聂荣臻负责；二、华东在天长地区，由陈毅负责；三、鄂豫两省，在大别山地区，由李先念负责；四、广东在东莞地区，由曾生负责。

在中国军民和苏美盟国打击下，日本已无力继续战争，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15日晨，同盟国由瑞士政府之通知，获悉日本天皇已颁敕令，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各项规定，宣告投降后，遂同时公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是日正午，日本昭和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

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8月15日15时，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致电冈村宁次，饬其命令所属向中国共产党投降。朱德另电冈村宁次，命令日军分别向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广东）中共将领投降。最终日军拒绝朱德的要求，同盟国则完全不予理会。

8月16日，日本大本营向全体陆海军发布命令，停止战斗行动。于1944年接替汪精卫担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之陈公博，宣布解散伪国民政府，汪精卫政权宣告灭亡。 日本既已宣布无条件投降，盟国遂委任麦克阿瑟将军为盟军最高统帅，接受所有日本皇军投降（all Japanese armed forces by the Emperor），并负责主持占领日本本土，日投降代表团由首席代表河边虎四郎参谋总长率领，于8月19日乘飞机至马尼拉，签订投降条件。国军按照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于《一般命令第一号》所划分之受降范围，中国战区受降范围应为中国（东北除外，归苏军受降）、台湾以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委员长接受日本全面投降。8月16日，蒋中正致电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做出相关指示。8月17日下午5时32分，冈村宁次覆电表示服从指示。

在雅尔塔会议中，苏联获得同盟国主要国家允诺具有旅顺、大连等港阜之控制权，因此日军宣布投降并不代表苏联攻势划下中止。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发表声明：“八月十四日日皇所发表的投降声明，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给武装部队关于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尚未布，而且日本军队还在继续进行抵抗，因此，日本实际投降尚未发生。我们只有在日皇命令其军队停止敌对和放下武器，而且这个命令被实际执行的时候，才承认日本军队投降了。鉴于以上各点，远东苏军将继续对日攻势作战。”

8月9日，苏军占领德王府，8月23日，八路军攻克张家口，“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宣告结束。直到1945年8月23日，苏军开入旅顺港完成攻势目标后，中国战场的组织性大规模战争甫真正结束。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向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投降，中国派徐永昌参加签字见证。9月8日，何应钦由芷江飞南京，9月9日上午9时，代表最高统帅，主持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投降，八年中日战争告终。对中华民国来讲，抗日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正式结束。按盟军指令，中国战场上的日军必须立即向国民政府投降，但中共中央则不这么认为，除热河、察哈尔之张家口、山海关等6都市由苏联军所占据转交给中共外，其余重要都市多未进入和平状态，战事仍然持续。

8月，设置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以陈仪为长官。10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奉麦帅下达之命令接受在台日军的投降并接管台湾。10月25日，驻台日军在台北公会堂完成受降仪式，随后陈仪发表广播宣告恢复对台湾、澎湖列岛之主权。12月25日，美国国务院照会国民政府，希望中华民国能尽快派兵赴日参加占领。后因国共内战，中国最终未能派占领军进驻日本，其中也导致形成钓鱼台列屿主权问题争议。

参战方

国民革命军

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张自忠，屡建功勋，在枣宜会战中力战殉国。

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第一次国共内战，同时避免对日冲突扩大。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军大幅扩编。至1945年，国军共有120个军、354个师，此外尚有独立旅、独立团等。据统计，八年抗战中，国军中陆军伤亡将士三百万人以上，当中将级军官阵亡已超过200名，中下级军官更大幅伤亡。此外，抗战期间国军亦首次离开中国，组成中国远征军，到

缅甸与印度的英军共同作战，且亦屡有胜果。重庆国民政府以中国西南地区为大后方抵抗，利用本身广大的中国疆域减抵日军的攻势，也取得同盟国部分支援，直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常州以东到上海一带是“忠义救国军”控制，名义上司令官是戴笠，在上海郊区和黄浦江对岸一带游击，由青帮和洪门组成，暗杀间谍和汉奸，牺牲100多人；1938年8月13日“忠义救国军”潜入日军虹桥机场升起一面中国国旗。

冈村宁次于1939年时曾表示：“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于四亿中国民众，也不是以各类杂牌军混合而成的二百万军队，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青年军官阶层为主体的中央军。在历次会战中，它不仅是主要的战斗原动力，同时还严厉督著逐渐丧失战斗力意志而徘徊犹豫的地方杂牌军，使之不致离去而步调一致，因此不可忽视其威力。黄埔军校教育之彻底，由此可见……有此军队存在，要想和平解决事变，无异是缘木求鱼。”

东北抗日武装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粮绝十日，以棉果腹，宁死不降。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沦陷初期以旧军队为基础的自发抗日武装力量，人数最多时曾达五十万人，但在日军强大兵力的进攻下，缺乏统一领导而又成分复杂的义勇军，于1933年即大部陷于瓦解。一部退入关内，一部分由中共领导组成东北抗日联军，继续坚持斗争。

八路军、新四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迎来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红一方面军改编为第115师，红二方面军为第120师，红四方面军为第129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留守南方的红军部队和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938年5月，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提出抗日战争应分为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

新四军完成训练后，分成4个师，分别命名为：团结师、前进师、勇敢师和抵抗师，于1938年4月27日离开皖西颖水根据地，开赴前线，5月10日抵达南陵，5月16日分成小股力量沿南京－芜湖铁路潜越敌人防线，首次同日军交战。

华侨

华人华侨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做出了很大贡献。抗战期间，世界各地华人华侨为中国抗战捐款超过13亿元。许多华侨回国参加抗战，当时全国战斗机飞行员中华侨占了四分之三。著名的南洋华侨机工队活跃在滇缅公路上，保证了抗战物资的运输畅通。

美国援华

美国在外交上支持中国，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美国对日本提出抗议并力促中国和日本的和谈。1941年，由于中日和议始终难于达成和日本入侵中南半岛，美国对日本实行石油和钢铁禁运。日本石油和钢铁来源断绝，冒险偷袭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全力援华，1942年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无偿援

助，并根据《租借法案》向对华租借大量军事物资，包括“驼峰空运”。美国以租借法案名义通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从缅甸、印度向中国运送作战物资支持中华民国继续抗战。

美国派员到中国参战，包括“飞虎队”、美军第14航空队和第20轰炸机队。飞虎队正式名称为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缩写AVG），因为飞机头部画上鲨鱼头，而未见过鲨鱼之昆明市民称作“飞老虎”而得名。1937年初，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飞行员陈纳德获聘为中国空军顾问；1941年4月，苏联撤走航空志愿队，陈纳德遂成立以美国机师组成之美国志愿航空队，从租借法案争取到约100架战机，并在美国招募约100名后备役军机机师及200名地勤人员。志愿队员月薪750美元，击落日机1架，给奖金500美元。

1942年6月，根据《中美租借协定》规定，国府分别派遣中国空军机师赴印度和美国受训；1943年10月，中美混合联队（Chinese-American Composite Wing）成立，隶属于美国第14航空队指挥。

1942年1月，日军大举进攻缅甸，5月切断中国最后一条对外交通线滇缅公路；6月，中美两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中国正式成为“租借协定”受援国。4月，中美决定开辟“驼峰航线”，为中国抗日战争补给油桶、弹药、药品、食品和黄金等物资；美国空军第10航空队和中国航空公司共同承担“驼峰”空运任务，其中以美国空运为主。1942年末，日军占领缅甸，为防止日军入侵西南地区，国民政府炸断惠通桥并沿江布防，滇缅公路封闭。驼峰航线上600多架运输机几乎全天候运转。为保证中国物资供应，美军开始空前的大规模空运。自1942年起，驼峰航线开辟，从喜马拉雅山脉东侧（横断山脉等高寒山区）由印度飞往中国，至二战结束，中美两国至少642架飞机失事或失踪，1,382名机组人员牺牲；向中国运送物资65万吨，占外援物资总量八成。驼峰航线不仅地形险峻复杂，气

候堪称世界上最恶劣，天气制约著空运数量；经常有暴风雨、湍流猛烈、横风每小时160至240公里，结冰严重。有时气候急变影响飞行，使货物甩出飞；结冰把机翼压变形，令飞急降数千英尺。数据显示，在1941年到1945年之间，援助中国物资81%是透过“驼峰”空运，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玛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丽江白沙机场，进入中国云南和四川，总航程约800公里。航线经过高山海拔4,500至5,500米左右，最高海拔7,000米以上；由于当年飞机设备落后，机上没有加压装置，机员需要极大耐力。

苏联援华

随着纳粹德国崛起，苏联希望将战略中心转移到东欧而不是远东。因此，苏联希望援助中华民国抗日战争来牵制日军，从而减轻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压力。1937年4月，国共和解已成，苏联表示愿给中国以军火借款，中国反应冷淡。8月21日，苏联同中华民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第二条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协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以施行。”另有口头声明，在中日关系未恢复前，苏联不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中国不与第三国订立防共协定，苏联允3个至6个月内，实行参战。

苏联对华出售重型武器曾超德国，并先后分别对华贷款3笔，共计2.5亿美元，实际到位1.7亿美元。苏联允许中国使用这些贷款从苏联购买武器装备，成为抗战初期中国军事装备主要来源。据统计，抗战开始至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中国利用苏联信用借款购买飞机904架（包括轻重轰炸机318架）、坦克82辆、汽车1,516辆、自动牵引车602辆、各种火炮1,140

门、机枪9,720挺、步枪6万枝、步枪子弹16,700多万发、机枪子弹1,700多万发、炸弹31,100颗、炮弹187万多发。

1937年9月初，中国代表到莫斯科，开始进入谈判阶段。不久，朱可夫率苏联顾问团到中国。10月，第一批苏联航空部队与500名苏军专家、大批苏联飞机一同到达汉口空军基地，他们开始向中国飞行员教授驾机技术。苏联协助培养了部分飞行员、领航员及地勤人员。在苏联境内的萨雷—奥捷克至兰州的公路上，向中国运送军事物资的汽车累计5260辆，运行总里程1850万公里，苏联运输人员先后达4000多人。为确保抗日军火物资的西北大通道的安全，国民革命军中央军嫡系部队进驻了河西走廊，设置了“河西警备总司令部”，驱逐了盘踞河西走廊的青海省地方军阀马步芳的军政势力。

1937年11月，苏联给予中国以5,000万美金借款，用以购买飞机，苏联空军志愿队“正义之剑”继至。1937年11月援华陆军装备开始发货，其中坦克82辆。在1937年的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中，国民革命军损失了大量装备，根据苏联援华军事顾问回忆，国民革命军抗战开始的一年半时间里损失了六十个师的装备。1937年11月蒋介石嘱咐对苏谈判代表杨杰将军向苏联提出采购20个师装备。其中每师装备8门115mm榴弹炮、16门三七战防炮、16门步兵炮等。经过中苏两国反复协商，定为由苏联提供20个师的装备，其中，每个师装备76.2毫米M1902/30野战炮8门，4门115毫米榴弹炮（一战时英国援助沙俄的QF 4.5吋榴弹炮）。这些装备分别通过香港、九广铁路、粤汉铁路运抵衡阳，以及滇越铁路运抵昆明。

1937年12月1日，苏联航空志愿队首次参战。

1938年1月，中国派孙科赴莫斯科，商谈中苏同盟不成，苏联反向日本提议解决两国悬案，日本未加理睬。1938年冬，第二批志愿队来华，其中有当时被授予苏联英雄的雷恰戈夫，先后在武汉和台北给予日军重创。苏联空军志愿人员先后来华共700多人，其中200多人在华牺牲；从1937年8月至

1941年，苏联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共击毁日机1,049架。1938年7月9日至8月14日，苏日在张鼓峰（今中朝俄边境）发生冲突，1939年6月27日至9月16日，苏日在中国领土诺门坎发生冲突，两次冲突都以苏军重创日军结束。

1940年为使用苏联第三笔贷款，国民政府向苏联提出需求清单展开谈判，确定了的购买清单里没有山炮，变成了200门76.2野炮，200辆装甲拖车，1941年交货后装备炮兵七个团。

苏联继1939年与纳粹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后，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签定《苏日中立条约》，背叛了1937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签订，苏联对中国援助全面停止。条约宣称“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庄严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政府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苏日中立条约》也违背了1924年5月31日在北京签订的《中苏协定》，该《协定》第四条规定：“两缔约国政府声明，嗣后无论何方政府不订立有损害对方缔约国主权及利益之和约及协定。”。

苏日签约后，斯大林亲往火车站送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并破例与日外相共同坐一段火车送行。

4月25日，苏联和日本政府代表在东京交换条约批准书，宣布《苏日中立条约》正式生效。条约的有效期为5年。

国民政府对于苏日中立条约表达了严厉的批评，中国共产党则发动舆论，全面支持苏联与日本的中立合约，并认为双方相互尊重对华领土主权的主张（满洲国），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

然而日苏双方都把对方作为潜在敌人。日本把几十万关东军守在东北，准备大量化学武器一旦和苏联发生战争时用，直到2000年之后，还有中国人因为地下化学武器泄露而伤亡。日本支持白俄反苏，而苏联则支持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活动。

1945年2月，美英苏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中划分战后在华利益，中国政府并不知情。1945年4月5日，苏联在《苏日中立条约》到期前单方面宣布《苏日中立条约》失效。而中国方面在1945年6月由继任杜鲁门总统于接获贺浦金斯报告后，于6月9日在白宫会同代理国务卿约瑟夫·格鲁约晤宋子文举行商谈方才得知，而美方则对中国以'维护世界和平'为由施压，要求对俄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45年8月9日苏联军队在没有条约的情况下向满洲东、西及北三个方向，发动八月风暴攻势，一个星期以后，从日本手中夺取了中国东北地区（当时满洲国）与内蒙古。由于此时的中国新疆与外蒙古早已被苏联军队入侵占领，并干涉其内政（补充说明：1930年代和1940年代，苏联多次试图吞并新疆地区，将其改为"东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为此扶植了很多新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团体，并积极寻找在新疆的代理人；1921年5月苏俄军队开进外蒙古，与蒙古人民革命党军一道于7月6日进入库伦，击败了恩琴的白俄军队，同年也将中国军队逐出外蒙古。此后，苏联将唐努乌梁海改组为独立的唐努-图瓦人民共和国；1944年直接并入苏联，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个自治共和国。）迫使1945年8月14日的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王世杰只好勉强和苏联政府代表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直到1945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但中国却因此同意外蒙古公投独立、允许苏联在东北和新疆享有特殊权益，整个东北工业设备被苏军洗劫一空，损失20亿美元惨重代价。

中德军事合作（1928年－1941年）

中德军事合作早在1928年11月就展开，中国国民政府聘用德国顾问团；“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日趋紧张，1934年起，德国顾问团协助国军创建3个“示范师”，组建10个炮兵营，并组建工兵、汽车、高射炮、海岸要塞、电信、炮兵航空观测队等专业化部队。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开始时，中央军是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其中最精锐部清一色是德式装备；国军从武器到兵工厂几乎全部来自德国，甚至连防御计划也是德军顾问制定。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德国协助中国整训30万精锐部队，并出售大量军火物资；与此同时，中国还从德国购买大量军火物资，特别是1937年底中日激战期间，德国不但未像其他国家一样限制对华出口武器，反而加紧对华军火运输。从1936年起，德国和中国签订了2.82亿德国马克的军火销售协议。阿道夫·希特勒曾经希望将中华民国拉入反对苏联的联盟当中，并积极调停中日战争。但日本步步进逼，始终未能成功。截至1938年8月，至少有1.44亿马克（约5,816万美元）之德国军火物资运抵中国。1938年2月希特勒宣布德将正式承认“满洲国”；4月德国禁止对华军售，并召回全部在华军事顾问，随后更召回驻华大使。

但德国军火在中国抗战初期依然有重大影响。中德合作令国民政府军装备大大改进。“八一三淞沪会战”时有大约70名德军顾问直接参与指挥国军各级部队；在上海到南京之淞沪战场上，尽管蒋介石将所有德式训练之中央军精锐全部投入战斗，却仍遭惨败。外国舆论对于中国军队英勇智谋，亦再三赞誉；虽训练犹未充足，装备犹未齐备，外人以为不能支持一周之阵地，竟能抵抗十周。

英国援华（1941年－1945年）

英国在19世纪时在中国拥有庞大利益；但是1930年代在东亚已是鞭长莫及，而且要与北非和西欧的德军作战。抗战初期中国多次向英国求助都被拒，蒋甚至亲自向英国大使卡尔表示，中国政府可以提供20万人替英国保卫香港，依旧被英国拒绝。

1938年10月，中国华南、华中相继失守，英国在华势力范围基本为日本控制，英国开始援华；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对华提供财政援助货款共1,550万英镑，其中三分之二是1940年后提供。英国对中国抗战支援基本上只限于道义，对中国的帮助包括开通滇缅公路和为驼峰航线提供基地。英国对华军援微乎其微。

日军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参与侵略中国的日本军各部队包括中国驻屯军、关东军、华北方面军（北支那方面军）、上海派遣军、华中方面军（中支那方面军）、驻蒙军、华南方面军（南支那方面军）、中国派遣军（支那派遣军）、参加攻击中国东南沿海和长江沿岸的大日本帝国海军部分军队。日本占领中国本土大片精华地带，并继续施行“以华制华”的策略，建立汪精卫国民政府。

皇协军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为为解决前线作战兵力不足的现象，招募当地人民来负责占领区治安。根据日本占领区的傀儡政权的管辖范围，设立如“南京和平建国军”、“华北治安军”等，各占领区政权没有干预其他政权辖下伪军活动的权利，但日本军官有权随时任意调遣地区的伪军。 1938年时，皇协军在中国的数量约为7万8千人，随着1940年汪精卫叛离国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后，在华皇协军数量急剧上升至14万5千人。其中，又以1943年5月14日，庞炳勋、孙殿英两人联名通电投日，所率领的军队数量为庞大。对于

东北方面，1940年时的满洲国军人数正规军约10万余人（30个旅）；武装较好的警察队约5万名以上，‘兴安军’约1万名以上。

1945年初，仅汪精卫政权统治区就有皇协军40万余人。

战争结束

战后影响

战后统计

经过14年之冲突，中国士兵至少伤亡300万人，可能另有一百万人因病及营养不良而亡故；阵亡士兵有九成以上是蒋的部队；炸死、烧死、饿死、淹死、被枪打死之中国人民还有900万人；不同时期，前后有数千万人成为难民，很多人颠沛流离死在路途中，不少人则在难民营过世。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共伤亡3,500万人，财产损失6,000亿美元，中国人民为民族之独立解放付出重大代价；中国战场牵制日军陆军兵力之60%以上和大量海空军力量，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卓越贡献；中国国际地位也因此而提高。中国在战争中所承受的损失极大，按1945年货币折算，约为6,500亿美元。中国平民约有900万死于战火，另有800万平民死于其他因素，9,500万人成为难民。另外有统计，中国抗日战争直接伤亡合计可能达2,062万人，合可累计之战争直接伤残人口，军民伤亡3,480万人。1947年2月15日，联合国提出报告草案，详述中国八年所遭战争破坏：据估计战争死亡人数逾900万，由于战争死于疾病及受伤人数达数百万，劫后余生者亦陷于穷困和流亡；交通遭巨大破坏，教育受严重损害，工矿业十损其九，灾荒和瘟疫波及广西500万人、湖南1000万人。日本的入侵导致中国年均人口增长数由1927－1937年间大约350－360万降至1937－1945年期间的约310多万。

附：中国政府历年来公布的抗战军民受伤及死亡数据：（1）1946年底，国民政府公布军人伤亡331万多人，人民伤亡842万多人，共计1,173万人。（2）1947年5月20日，国民政府对1946公布的抗战伤亡人员总数进行了修订，军人作战伤亡3,227,926人，军人因病死亡422,479人，平民伤亡9,134,569人，总计人口伤亡12,784,974人。（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日本侵华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作了初步估计1,000万人和500亿美元以上的财产损失。（4）1985年公布战争中的伤亡人数为2,100万人以上。（5）1995年，公布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

中国抗日战争时任国军参谋总长之何应钦在《开战之前敌我兵力比较》中，对比"七七事变"中日军力，开战之初，日本兵员总数为448.1万人，其中现役兵、后备役兵、预备役兵为战斗兵，数量199.7万人，补充兵人数248.2万。协助日军的中国"伪军"最多时超过100万。陆军常备师团17个，海军舰艇190万吨位，空军飞机2,700多架。据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后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约为455,700~700,000人。（不包括印缅战场上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和美英协同歼灭的约16万日军，及苏军在东北消灭的日军。）

中国抗日战争中开始之初，国军陆军现役兵170多万，补充兵约50万；海军舰艇11万吨位，不足日本十分之一；空军仅有战机305架，各式飞机加起来共600架；75毫米以上之火炮只有800多门，其中重炮只有48门。中国国军兵力最高时达500万人。1937年，中国飞机、大口径火炮、坦克、汽车年产量为零；而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设备能力为年产3万辆）。据台北中央日报社出版《蒋总统秘录》第十一册第122页载：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军与日本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38,931次小型战斗。据中华民国国防部1946年统计，国军作战伤亡322万7926人、病亡42万2479人，总计损失365万0465

人。军令部统计自七七事变以来陆军阵亡131万9958人、负伤176万1135人、失踪13万0126人，空军阵亡4321人、负伤347人，海军舰艇全部损失，损失战机2468架。据日本统计，“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总兵力212万人，中国派遣军有62万人；到日本投降，日军总兵力约700万人，中国派遣军有105万人。日军八年在中国战场之伤亡，负伤131万8670人，阵亡177万9774人。根据日本统计，日本军在整个二战死亡约185万至186万人，其中中国战场死亡约40万4千6百人，其中中共武装打死3万多人；苏军打死关东军约8万多人，太平洋战争南方军约死亡125万人。至于1983年读卖新闻社所出版的《战争：中国侵略》所给出的数据是自1937年7月7日至战争结束为止，总共有七十多万日军死于中国战场。

中国先后征发兵员1,400万人，伤亡官兵320万人，人民生命牺牲以千万计，财产损失约4,880亿美元。国民政府兵役部门实征壮丁总数为13,922,859人。据蒋纬国《抗日御侮》一书记载：“抗战八年，国民政府兵役部门征兵近1,400万，至于游击区、沦陷区、壮丁，则由战区司令长官自己设法招募”。此外“凡属军事所需之工事、道路、机场，均由民工以义务劳动方式，参加土工作业。八年抗战各战区工事之构筑，军用道路之开辟，被炸桥梁之抢修，以及敌军可能利用之道路的破坏，先后所发动之民工，当在10,000,000人以上。”

据1943年7月中华民国驻英大使顾维钧转述，英国方面认为“我国抗战公报多夸大不足信，尤以报告敌人伤亡数目为最，此次湘鄂一役所称敌方伤亡三万，超过不啻十余倍云云。”据何成濬日记记录，薛岳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后由于虚报战绩过于夸大，被同侪将领“笑斥”。军令部长徐永昌对国军将领普遍虚报战绩的现象感慨：“由谎报一点看我国军人无耻，可谓达于极点。”

日军和中共军队一般会将内部报告和对外宣传区别对待，内部报告较为真实，不过日军官方战报同样往往也偏离事实极远，其″大本营发表″的内容

都是经过军部言论统制机关加工的，此词语在日本现在已成为"说谎"的代名词。例如枣宜会战日军资料声称仅伤亡一万一千多人，然而根据日军内部极机密档案统计，1940年5月与6月的中国派遣军死伤多达四万以上，其中大部分应该伤亡于枣宜会战。又如在日本陆军高层的报告当中，日本第21军在1939年4月所发动的四月作战仅阵亡14名，受伤39名。然第21军所送交的战时旬报当中，就自承仅参战的第104师团至4月20日就阵亡105人，受伤253人。而另一参战的第18师团则仅在4月15~20日就阵亡36人，受伤142人。然四月作战在4月28日才告终止。除此之外，华北方面军于战果报告中提出该方面军于1941年仅阵亡2,352人，受伤5,001人，然根据华北方面军战时月报，该方面军于1940年11月至1941年10月间可确认之作战伤亡共计为阵亡4,599人，伤重不治264人，受伤10,338人。

战后审判

战后，盟国在东京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对于裕仁天皇的处置，在1943年开罗会议上，西方代表曾有在战后废除天皇一设想，罗斯福对此咨询蒋中正意见，蒋中正则表示“应让日本人民自己决定”。

1947年2月24日，香港法庭判处第一名日本战犯野间贤之助死刑。1948年4月20日，中国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向哲濬对法庭表示：中国政府要求对凡在对华战争中发生重要作用之日本战犯，予以“严厉与公正”之处罚，这种处罚并非在报复，而实在为杜防日本侵略之重演。12月23日，日本战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7人，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绞刑。

中国战区则在1945年12月成立战争罪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和汉奸进行审判。日军中将酒井隆，战后由第十一战区缉获，押解战犯军事法庭证据确凿判处极刑正法。1945年10月3日，南京军事法庭将陈公博由日本引渡回

中国。1946年4月12日，江苏高等法院以叛国罪宣判陈公博死刑确定。6月3日，发由苏州狮子口执行枪决。1947年3月10日，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侵华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南京大屠杀主谋、华南派遣军司令官，中将军衔）死刑；判决书宣布："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同年二十一日，亦即谷寿夫部驻京之期间。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及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4月26日押赴雨花台执行枪决。1947年5月19日，南京大屠杀日本主犯之一田中军吉由日本押解到上海。6月11日，松本洁（嘉山之虎）经战犯法庭判处两个死刑，立即核准执行。6月17日，日本战犯米村春喜、下田次郎行刑。1948年1月28日，百人斩（南京大屠杀）之中的田中军吉、野田岩、向井敏明押赴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国府成立战犯法庭，由石美瑜任审判长。12月22日，经过多方求证之后，松井石根因参与南京大屠杀，被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绞死。1949年1月26日，原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上海被国府国防部军事法庭宣布无罪，引起全国人民的激愤。中国共产党对此向南京国府提出强烈抗议，得到国内舆论的广泛赞同。1月31日，南京政府遵从东京麦克阿瑟命令，将日本侵华战犯260名连同冈村宁次等九人一起送往日本；2月4日抵东京。

1950年，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移交武部六藏等日本战犯969人、溥仪等伪满战犯约300人。这批日本战犯和此前在国共内战中俘获的140名日本战犯，分别被集中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太原战犯管理所集中关押改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6年4月宣布，对在押的日本战犯从宽处理。6月至7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审判无一人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同年，其他1017名被认为罪行较轻、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被免予起诉释放回国。1964年3月，在中国服刑的最后一批日本战犯共3人被特赦释放。

抗日战争对中国影响很大。随着中国领土被日本占领，中国金融、军事、教育、工业、人口等都有很大改变。1936年前，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各项经济指标在1937年达到顶点。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一成果被打断。中国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以及城市化进程亦因战争停滞、后退。

经济损失

1947年6月4日，国民政府发表抗战损失统计，中国抗战直接损失达310亿美元。中国在战争中所承受的损失极大，按1945年货币折算，约为6500亿美元。

人口及难民

抗战八年，国民政府兵役部门实征壮丁总数1392万2859人。中国平民约有900万死于战火，另有800万平民死于其他因素，9500万人成为难民。

在国共内战后的两岸武力对峙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击败中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政府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为了维护政权的合法性，较少提及国军在正面战场的贡献，而多强调中共在敌后作战的战绩，并将中共的地位形容为“中流砥柱”，并在各个宣传途径上斥责中国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双方的抗战主力之争绵延至今。

中华民国政府在2008年《中华民国年鉴》中评论抗日战争：

“从民国26年到34年，为8年全面对日抗战时期。影响抗战阵营最大的因素

是中共，共军的主力用在敌后扩张基地，国民政府除全面抗日外，还要防止中共的扩张。战争初期沿海各省及华北、华中、华南相继撤守。民国30年珍珠港事变后，抗日战争变成同盟国对抗轴心国的战争，中国和盟邦并肩作战，不仅中国战场的情势日趋稳定，而且派遣远征军支援缅甸战场。8年抗战使中国社会发生很大的变迁，民众在抗日宣传中获得国家观念，强化了民族主义，这种主义后来被中共用来对抗美国；民众为逃避战火，造成重大的人口移动，减少省际的隔阂，有助于社会的整合和政治的统一。但战争使各项产业萧条，尤其田园荒芜，生产减少，农村经济衰退，造成许多退伍而不愿归田的人，成为政府和社会的负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4%BA%AC%E5%A4%A7%E5%B1%A0%E6%AE%BA

南京大屠杀（日语：南京事件、南京大虐殺、南京虐殺事件）是对于日本帝国军队在大日本帝国的侵华战争全面升级的初期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城后，对当地居民实施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规模屠杀、强奸以及纵火、抢劫等一系列战争罪行与反人类罪行的统称。日军暴行的高潮自

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开始持续6周以上，直至1938年2月开始有所收敛。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和调查，在大屠杀中有20万以上至30万中国平民和战俘遭到日军杀害，在大屠杀第一个月约2万中国妇女遭日军奸淫，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军纵火烧毁。

1945年日本投降后，由于大多数关于屠杀的日本军事记录都是保密的，或者在盟军接收前就已被销毁，历史学家一直无法准确估计大屠杀的死亡人数。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估计南京大屠杀中有超过20万的中国人被日军杀害。在中国，自1947年南京军事法庭审判以来，认为约有30万人在大屠杀中遇难。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就一直在争论死亡人数这一事件；且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政治问题，也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障碍，围绕大屠杀的争议仍然是东亚地区国家间关系的中心问题。日本学界对此争论不一，对遇难人数的估计有20万人、4万人、2万人等几种，亦有否定论者和日本民族主义者声称这场屠杀是为了宣传目的而捏造的。“否认派”的论调得到部分日本右翼政商势力的支持，在华人区引起反感，这也使得南京大屠杀成为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历史问题之一。

在日本，日本政府承认南京沦陷后对许多非战斗人员“发生过杀害非战斗人员和掠夺等行为”，但对遇难人数则暧昧不清，在那里服役的日本老兵也证实了大屠杀的发生。日本政府和社会中人数不多但声音响亮的少数人辩称，死亡人数属于军事性质，从未发生过此类罪行。对大屠杀的否认和对杀戮的修正已经成为日本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在日本，公众对大屠杀的看法各不相同，但几乎没有人完全否认事件的发生。

背景

继卢沟桥事变后，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同时为摧毁中国之抗战意志，从8月15日至12月，对中国首都南京城实施无差别轰炸。日军对外号称可以在几个月内快速击败中国，不料遭遇三个月的顽强抵抗才攻破沿岸地区，使日本陆军在初期大失面子。1937年11月中旬日军加强从上海转往内陆的行动，中国抵抗战力逐渐被瓦解，在淞沪会战失败后决定坚守首都南京。11月20日，蒋中正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官。12月8日，日军全面占领南京外围阵地，因为日军登陆后受限于本身的资源不足，经常沿路进行掠夺强征作为补给来源，如有不从即进行杀戮。另外日军受上级指示加速推进进攻战线以及报复上海会战等心理的情况下出现大量杀害战俘的行为。10日开始，日军对南京城垣阵地展开猛攻；12日，南京卫戍司令部下令弃城突围撤退；13日，国府溃散，增援的各路日军陆续攻入南京。日军于进攻当时中国首都南京前后，对攻占区的军民开展无差别抢劫、强奸及屠杀。

中国军队上海苦战抵抗

在上海战场上，日军遭到中国军队强有力之抵抗，三个月后才占领上海。从1937年8月到11月，中国军在上海与日本上海派遣军已经进行近三个月惨烈而胶着的战争，这让错估局势的日本有些难堪。战事在日本第10军从杭州湾登陆之后急转直下，侧后被袭的中国守军全线撤退。在日军的迅猛追击下，国军的撤退变成无比混乱的溃逃。军事委员会此时深感事态严重，在17日和18日三次开会讨论南京防御的问题。会议上多数将领认为部队极需休整，而南京在军事上无法防御，建议仅仅作象征性的抵抗，只有唐生智以南京是国家首都、孙中山陵寝所在，以及国际观瞻和掩护部队后撤等理由，主张固守南京。中华民国最高领袖蒋介石期望保卫首都的作战对德国的外交调停有利，并且以为能够等到苏联的军事介入。出于内政和外交上的考虑，蒋介石最终采纳唐生智的建议，决定“短期固守”南京1至2个

月，于11月26日任命唐（阶级上将）为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负责南京保卫战。副司令长则为罗卓英及刘兴。

随后，日军各部队分三路开始向南京进军。根据坚守南京的决策，军事委员会在12月初日军接近南京城之前共调集约13个师又15个团共10万余人（一说约15万人）的部队保卫南京。这些部队中有很多单位刚刚经历在上海的苦战和之后的大溃退，人员严重缺编且士气相当低落，而国民党临时抓来的壮丁大多没有完成训练，军纪极差。唐生智多次公开表示誓与南京城共存亡，对蒋介石则承诺没有命令决不撤退。为了防止部队私自过江撤退，唐生智采取背水死战的态度。他下令各部队把控制的船只交给司令部，又将下关至浦口的两艘渡轮撤往武汉，还命令第36师封锁从南京城退往下关码头的唯一通道挹江门，而撤退的讯息却未传达到负责封锁的部队知晓，使得国军在撤退过程中出现疯狂的自相残杀情景，这一"破釜沉舟"的命令给后来的悲剧性撤退埋下隐患，造成许多无辜民众与士兵溺毙，尸体迅速堆满江面，惨不忍睹。

11月20日，中华民国政府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政府机关、学校纷纷迁往内地，很多市民也逃离南京。在6月有101.5万城乡居民的南京市，12月初，常住人口据估计只有46.8万至56.8万人，但这并不包括军人和从前方逃亡到南京的难民。22日，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留在南京的二十多位西方侨民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他们提出在南京城的西北部设立一个给平民躲避炮火的安全区。29日，南京市市长宣布承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为安全区提供粮食、资金和警察。唐生智还承诺将部队撤出安全区。12月5日，国际委员会收到日本政府模棱两可的回复，随即开始安全区的工作。

从上海到南京的事情经过

日本原本打算在上海附近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从而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然而，日本上海派遣军在淞沪战场苦战三个月，受到惨重的损失，日本决

策层在是否直接进攻南京的问题上产生分歧。考虑到苏联在北方的军事威胁，日军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等人主张“不扩大”战事。因此，11月7日东京将上海派遣军与第10军临时编组为华中方面军的时候，将方面军的作战区域限制在苏州、嘉兴一线（即“制令线”）以东。而日军战地指挥官却强烈要求进攻南京：15日，柳川平助的第10军无视参谋本部的命令，决定趁中国军队溃退“独断敢行”地“全力向南京追击”；22日，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鼓动参谋本部放弃“不扩大”方针，称“为了使事变迅速解决，乘现在敌人的劣势，必须攻占南京”。11月下旬，日军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全面越过“制令线”，分别沿着太湖的南、北两侧开始向常州、湖州进攻。鉴于前线进展迅速的既成事实，24日东京大本营废除“制令线”，并在12月1日下达攻占南京的正式命令。

12月1日，日本最高统帅部向松井石根为司令官之华中方面军（包括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下达命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日本裕仁天皇下令中支那方面军进攻南京。于是日本军向南京推进。日本军快速推进，沿途造成混乱并实施暴行。

其间，日军各部根据“给养就地征发”之军令，在前往南京途中普遍进行烧杀淫掠。进攻南京的作战开始后不久，疯狂前进的作战部队就把辎重部队远远抛在身后，由于日军原本没有深入内陆作战的后勤准备，部队立即面临着粮食供给中断的严重问题，日本军司令部于是下达实际是要部队抢劫的“就地征收”命令。日军在抢劫中通常伴随着奸淫妇女的暴行，为了消除自己抢劫和强奸的证据，日军除了杀死受害人，还经常放火烧毁整个村庄。

“日军作战的指导者……下达：“在当地征收粮食，以谋自活”的征收命令。……自从命令下达后，罪恶感就消失了，军人们变成到处偷袭抢夺谷物、家畜来充饥的匪徒。……这个就地征收命令，使下级官兵发狂，不但

抢夺粮食，并且强暴中国妇女。……下级队长就指示……意思就是要湮灭证据。……所以，下级官兵们为了保护自己，毫不考虑的杀掉无辜的中国百姓，这才发展为“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导火线。 ”

——日本军上等兵曾根一夫，《南京大屠杀亲历记》

日军在从上海进攻南京的过程中，在南京以外的金山、杭州、苏州、无锡、芜湖、扬州等地犯下一系列暴行，至少3万多人被杀，大量妇女被日军强奸。

1938年1月抵达南京的日本记者石川达三，依据大屠杀期间对日军官兵面对面采访的资料，写成报告文学《活着的士兵》（1945年末得以出版）。此文详尽记述了侵华日军在支塘镇、古里村、常熟、无锡、常州、丹阳、汤水镇等地都存在对中国平民的屠杀和劫掠，以及杀害放弃抵抗的中国军人。这些暴行都是南京大屠杀的预演或延续，而南京大屠杀则是日军所有暴行当中的最高潮。

南京陷落与中国军队撤退

12月8日，日军全面占领南京外围一线防御阵地，开始向外廓阵地进攻。11日晚，蒋介石通过顾祝同电告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12日，日军第6师团一部突入中华门但未能深入，其余城垣阵地还在中国军队手中。负责防守中华门的第88师师长孙元良擅自带部分部队向下关逃跑，虽被第36师师长宋希濂劝阻返回，但已经造成城内混乱。

下午，唐生智仓促召集师以上将领布置撤退。按照撤退部署，除第36师掩护司令部和直属部队从下关渡江以外，其他部队都要从正面突围，但唐生

智担心属于中央军嫡系在突围中损失太大，又口头命令第87师、第88师、第74军和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这个前后矛盾的命令使中国军队的撤退更加混乱。

会议结束后，只有属于粤系的第66军和第83军在军长叶肇和邓龙光带领下向正面突围，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成功突破日军包围，第159师代师长罗策群战死。其他部队长官大多数没有向下完整地传达撤退部署，就各自抛下部队前往江边乘事先控制的船只逃离。这些部队听说长官退往下关，以为江边已经做好撤退准备，于是放弃阵地涌向下关一带。负责封锁挹江门的第36师没有接到允许部队撤退的命令，和从城内退往下关的部队发生冲突，很多人被打死或踩死。

12日晚，唐生智与司令部成员乘坐事先保留的小火轮从下关煤炭港逃到江北，此后第74军一部约5000人以及第36师也从煤炭港乘船过江，第88师一部和第156师在下关乘自己控制的木船过江。逃到下关的中国守军已经失去建制，成为混乱的散兵，其中有些人自己扎筏过江，很多人淹死、或是被赶到的日军射杀在江中。大部分未能过江或者突围的中国士兵流散在南京街头，不少人放弃武器，换上便装躲入南京安全区。

虽然中国国民政府部署10余万兵力守卫南京，但日军很快占领南京东郊与南郊，用飞机与重炮轰炸市区，到12月13日，南京终于陷落。

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报导：日军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进军南京途中相约进行“杀人竞赛”，商定在占领南京时先杀满100人者为胜。从句容到汤山，两人分别杀了89人和77人；到南京紫金山下时，两人各称杀了106人和105人；但是不知道谁先杀满100人，所以决定这次比赛不分胜负，重新比赛谁杀满150名中国人。向井和野田在战后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

死刑。

屠杀

日军在占领南京时，对城内外大规模“扫荡”，搜查隐匿在城内之中国士兵，即所谓“便衣队”；多数未来得及撤退之中国军人被俘。

日军攻占南京时在战场上俘虏数万中国官兵，在日军高层的授意下，这些俘虏都被集体屠杀。因为日军向来有宁死也不投降的玉碎传统，对投降的战俘抱有歧视，便采取“大体不保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在搜捕“便衣兵”过程中，日军根据人们头上帽箍、肩上、手上之老茧作为判断是否军人之证据；但是很多平民也被抓走，即使躲在难民区之平民也不能幸免。数万中国平民在日军搜捕溃兵的时候受到牵连被一同屠杀。日军将捕获之中国军民驱赶到长江边和南京郊外集体屠杀；同时日军还在南京大街小巷、住宅、寺庙、村庄等处随意杀人。在占领南京后的几个星期里，日军毫无约束地在城内外游荡，随意杀害平民，被日军强奸、抢劫的受害人也往往被日军杀死灭口。根据1946年中国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调查，确认被日军集体屠杀并被毁尸灭迹有19万多人，被零散屠杀、尸体经过南京慈善团体掩埋达15万多具。被日军屠杀的中国官兵和平民在20万至30万人之间。在东京审判之判决书中曾记载：“在日本军队占领的最初的6个星期里，南京及其周围被杀害的平民及俘虏就达20万人以上。……这个数字不包括抛尸长江、挖坑掩埋和以其他方式处分的人们在内。”

日军对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军警人员以及他们认为是可能参加过抗日活动和适合兵役年龄的中国青壮年，进行过若干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二战后，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在南京犯下的集体屠杀有28案，19万余人受害。

从12日深夜到13日，败退下来的几万中国溃兵和逃难平民蜂拥至挹江门外的下关一带，试图渡江逃离南京。13日，日本陆军第6师团、第13师团、第16师团从三个方向进攻下关，日本海军也逆流而上抵达下关江面，数万中国溃兵和平民被合围在下关沿江的狭长地带。在这一天，即日军占领南京的第一天，日军就杀害大量溃兵、降兵、俘虏以及难民。

日军报称，13日清晨，第6师团步兵第45连队从长江上游向下关进军，途中歼灭一支正在逃离的中国大部队。第16师团从南京城东扑向下关，其中步兵第30旅团的先头部队上午10点抵达下关，用坦克炮和重机枪射杀在岸边聚集和正逃往江上的“溃兵”，用光1万5千发子弹；第33联队前进途中歼灭一千几百名前往下关的“溃兵”；第16师团主力的先头部队在下午2点30分到达下关，在岸边用重机枪及高速炮向在江上漂流的溃兵猛烈射击两个小时，使2000多人葬身江中。第13师团的山田支队从长江下游沿南岸进击，下午占领乌龙山炮台后通过燕子矶向幕府山炮台前进，途中在幕府山北面长江南岸（即草鞋峡）遭遇大量溃兵和避难民众，山田支队至14日清晨共俘虏14777人。同一天，日本海军第11战队突破乌龙山封锁线，逆流而上向南京进发，向江上顺流漂浮的溃兵用舰炮、机枪和步枪连续射击。据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的日记记录：“海军参谋松田的报告说，13日，11战队大部到达南京下游，歼灭1万乘木筏退逃的敌军。”事实上，日军在江边射杀的“败敌”和“残败兵”中不仅包括中国军人，无疑也有许多想逃出南京的中国平民。

除了在下关江岸和江面的“歼灭战”，日军13日还杀害大量未能前往下关的溃兵和难民。在城东，大批溃兵和难民从紫金山与幕府山之间向东逃亡时，撞上在这一带扫荡的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该师团步兵第30旅团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在日记中记述道：“这天遗弃在我支队作战区域内的敌军尸体

超过一万几千具，此外，再加上装甲车在江上歼灭的，以及各部队的俘虏，我们支队共解决两万以上的敌军。”

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即现在的《每日新闻》）报导两名日本军官的“杀人竞赛”。日军第十六师团中岛部队两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其长官鼓励下，彼此相约“杀人竞赛”，商定从上海到南京时，谁先杀满100人为胜者。他们从上海杀到南京，向井敏明杀了89人，野田毅杀了78人，因皆未满100，“竞赛”继续进行。12月10日中午，两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军刀已砍缺了口。野田谓杀了105人，向井谓杀了106人。又因确定不了是谁先达到杀100人之数，决定这次比赛不分胜负，重新比赛谁杀满150名中国人。这些暴行都一直在报纸上图文并茂连载，被称为“皇军的英雄”。《东京日日新闻》（即现在的《每日新闻》），连续刊登该报四名随军记者浅海、光本、安田、铃木分别从中国江苏省常州、丹阳、句容、南京等地发回的现场报道，详细报道了此二人在无锡横林镇、常州车站、丹阳奔牛镇、吕城镇、陵口镇、句容县城、南京紫金山等地刀劈百余人的经过。这些报道不仅仅时间、地点明确，杀人过程及数字清楚，而且同时还配发了照片。日本投降后，这两个战犯以在作战期间，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中人员“实为人类蟊贼，文明公敌”的罪名在南京进行审判并被执行枪决。

奸淫

日军进入南京后到处抢劫、纵火，南京城南最繁华之商业区和人口密集之住宅区是受害最严重之地区，主要街道几乎都成废墟；而在抢劫、纵火同时，日军还有组织或分散强暴妇女，甚至对在难民区避难之妇女也不放过，冲进那里对妇女强奸。在日军占领南京之后一至两个月内，约有2万至

8万名中国妇女遭到日军强奸。日军不分昼夜并在受害妇女的家人面前施行强暴，被强奸的妇女甚至包括12岁的幼女、60岁的老妇，乃至孕妇。很多妇女被轮奸，有些妇女甚至会被日军强奸数次，类似的事件往往导致有妇女受不住日军的折磨而死。受害人或是试图保护她的亲属如果稍有反抗，往往就被日军杀死，母亲身边的孩子因为哭闹也经常被日军一并杀害。此外，日军还强迫乱伦行为，不从就加以杀害。日军对妇女的大规模强奸和虐杀直到1938年2月才有所收敛。

德国人约翰·拉贝在1938年1月14日给上海理事会主任W.迈尔之信："约两万名妇女和姑娘被强奸。"

日本政府与军方当时对日本国民新闻封锁，但南京大屠杀之暴行遭到世界舆论谴责。约翰·马吉牧师记录了一起典型的强奸灭门惨案。12月13日，30个日兵闯入夏淑琴一家与房东居住的门东新路口5号，他们先杀死房东夫妻和夏淑琴的父亲，摔死了夏淑琴母亲怀里的1岁婴儿，之后轮奸母亲和另一个房间里16岁、14岁的两个姐姐，她的祖父母在试图保护孙女的时候被杀死。之后日兵杀死惨遭奸淫的母女，并且在她们的阴道里插进瓶子和木棍。当时7岁的夏淑琴和她4岁的妹妹被刺刀扎伤，她们因为昏死过去而幸存下来。最后，日兵杀死房东的两个孩子，4岁孩子被刺死，2岁孩子被用军刀劈开脑壳。

日军在南京期间对女性的奸淫恶行是在军官默认、纵容、鼓动下的集团性暴力。日军发现女性就加以奸淫的现象非常普遍，而日军军官通常不会将其作为违纪行为加以处理。不仅如此，日军军官还把放纵士兵强奸作为鼓舞士气的工具。为了让部下发泄在上海战场上几个月的苦战中积郁的不满情绪并且鼓动部下进攻南京，日军军官向士兵宣传只要攻入南京"就可以拥

有漂亮的姑娘”、“杀人、放火、强盗、强奸都可以”。日军举行入城仪式后，数万日军闯入城内，一周之内就有8000以上中国女性遭到奸淫。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设立的收容所是日本士兵搜索“花姑娘”的主要目标之一。日军占领南京十几天后，罪行累累的各部陆续离开，而留在南京执行“警备”的第16师团仍然在长期进行强奸作案。1938年1月下旬，天谷支队接替16师团之后，强奸案件进一步增加了。

南京沦陷之后的六个星期之内，日军几乎侵入城内所有的建筑物。据统计，城内外23.8%的建筑被纵火焚毁，63.0%的建筑遭到劫掠，因各种原因遭到破坏的建筑合计88.5%，这些破坏绝大多数都是日军在占领南京后造成的。

日军占领南京初期，5万日本士兵从中国难民那里抢夺大量生活用品和食物。此后的几个星期，日军闯入市内的建筑大规模抢掠，有的时候他们在军官的组织下将住宅、商店、机关、仓库等建筑洗劫一空，再用军用车辆把赃物运走，即使各国使馆也未能完全幸免。在占领南京后的一两年内，日军、日本宪兵还强占大量中国人的店铺、住宅和建筑，有的直接由日军占用，有的则无偿交给来到南京的日本平民。除了日本军人，少数日本随军记者也加入到抢掠的行径当中。

12月18日，日军于南京故宫飞行场举办陆海军合同慰灵仪式。从12月19日或20日开始，日军开始在市内纵火。日军在洗劫商店之后，经常将其付之一炬。市区南部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是南京主要的商业区，几乎全被烧光，整个市区约三分之一的建筑物被焚毁。

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大掠夺。据统计，南京市共损失古物26584件，计商代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字画7720幅、书籍45979册。

人道救助

南京安全区

鉴于日军进攻南京之形势，为在最危急时能使未及撤退南京之难民有一个躲避之住所，1937年11月间，留在南京之外籍人士代表决定成立一个国际救济机构，定名为“南京安全区（难民区）国际委员会”。1937年11月22日，留驻南京城内的西方人决定仿照饶家驹神父在上海建立南市难民区的模式建立一个“南京安全区”，给来不及撤退的中国难民提供避难所。他们成立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私人机构，推举西门子洋行驻南京代表约翰·拉贝任主席。国际委员会划定的南京安全区以美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和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金陵中学、鼓楼医院等教会机构为中心，占地约3.86平方公里，四面以马路为界：东面以中山路为界，从新街口至山西路交叉路口；北面从山西路交叉路口向西划线至西康路；西面从上面提到的北界线向南至汉口路中段（呈拱形）再往东南划直线，直至上海路与汉中路交叉路口。界内分设25个难民收容所，最多时收容难民约25万人。

中国政府承认安全区，承诺实现安全区的非军事化，并且提供给国际委员会现金、粮食和警察。日本方面拒绝承认安全区，但是表示只要安全区没有中国军队驻扎，日军不会攻击安全区。但日军占领南京后，并未遵守与国际委员会的约定，强行闯入安全区，劫掠财物、奸淫妇女，大肆抓捕青壮年并予杀害。国际委员会就此多次向日本使馆及日军当局提出抗议，要求按国际惯例对安全区予以保护，但是日军暴行并未收敛。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下属26个难民营，其中25个在安全区内，分设在交通部大厦、华侨招待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最高法院、金陵大学等处，另有设在城东南双塘的1个难民营。

12月23日，日军在南京设立自治委员会，为关闭安全区做准备。1938年1月底，虽然暴行仍在继续，日军却声称已经恢复南京城的秩序，强迫安全区内的难民还家。日本军占领南京后，于1938年2月下令解散南京国际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强行命令平民离开难民区。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改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国际委员会及难民区不复存在，最后一批难民营被迫于1938年5月关闭。

在日军入城后长达数月的屠杀期间，安全区内有25万人，难民所直接管理的难民最多时有7万人。为了救助数量庞大的难民、维持他们的生活、并庇护他们少受日军伤害，国际委员会及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20多位西方成员和数百名中国成员，为此艰苦斗争。

其他避难所

在大屠杀期间，除了国际委员会组织的收容所，在城内外还有一些中国人和欧洲人自发组织的难民营，如城北下关的和记洋行、东北郊外的栖霞寺和江南水泥厂等。

南京城外东北郊的句容县、江宁县和栖霞山一带是日军首先进攻的地区，大量青壮年被杀，妇女被掳走强奸。附近的江南水泥厂和栖霞寺仿效南京安全区的做法设立难民营收容附近的农民，其中也有少数未能撤离的中国官兵。江南水泥厂与丹麦史密斯公司（F.L. Smidth co.）和德国禅臣洋行有商业合同，因此在战前请两家公司派代表与留守员工一起守护厂内财产。德商派卡尔·京特任代理厂长，丹麦人辛德贝格稍后到达，两人在厂区收容难民最多时有4万至5万人。栖霞寺住持寂然法师在寺内也设立收容所，最多时有2.4万难民。

城北和记洋行曾收容大量难民，据应当在一万人以上，但在这里避难的难民大部分被日军捕去杀害。根据幸存者的证词记录，仅12月14日一天日军就从和记洋行带走并屠杀数千人。此外，江北六合县的葛塘集难民营约有

难民2000人，城东南的剪子巷老人堂收容530多人。

遇难者人数与后续处理

收尸记录

对南京大屠杀期间遇难者尸体的掩埋和处理大致有五个途径：

红卍字会、崇善堂、红十字会、同善堂等慈善团体的掩埋；

南京市民自发组织与一家一户的掩埋；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雇工掩埋；

南京市、区伪政权及其下属机构的掩埋；

日军部队的掩埋与毁尸灭迹。

根据已发现的资料，南京当时8家慈善团体共埋尸19.8万具。其中：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埋尸43123具。据该会1945年的《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慈善工作报告书》及所附埋尸统计表记载，从1937年12月22日至1938年10月30日，在城内收埋1793具，城外收埋41330具，其中女尸75具、孩尸20具。世界红卍字会八卦洲分会在八卦洲江岸收埋被射杀的死者尸体、江中浮尸以及打捞江中尸体，正式资料提及埋尸1557具，又有该会函件提及处理尸体1万余具。南京崇善堂埋尸112266具。该堂在战后提交给军事法庭的统计显示，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1日，该堂在城区收埋7548具，在城外收埋104718具。该堂埋尸的“前期资料”较少。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收尸22691具。该会1938年1月5日以前在南京下关、和平门一带收埋8949具，此后得到日军许可后留下按日记载的收尸记录，到5月底又收埋13742具。南京市同善堂收埋7千余具。该堂掩埋组组长刘德才在战后南京军事法庭审判谷寿夫时出庭作证：“我同戈长根两个人所经手掩埋的尸首就有七千多了”。南京代葬局收埋1万余具。代葬局掩埋队也受雇于南京伪政权。掩埋

队队长夏元芝于1946年为汉奸嫌疑辩护时称："曾率领代葬局全体掩埋伕役，终日收埋被惨杀军民尸体万余具"，这一数字得到当年掩埋伕役的确认。顺安善堂收尸约1500具。1940年12月该堂在一份调查登记表中称："迄至南京事变后，对于掩埋沿江野岸遗尸露骨，人工费用约去陆百元。"按照当时一般收尸付费4角计算，约收埋1500具。明德慈善堂收尸700余具。当时的堂长陈家伟在1940年12月的文件中称："雇用伕子十余人，掩埋尸首"、"廿七年春，掩埋七百余具"。众志复善堂也参与埋尸，但是具体数目不详。

当时民间的4支市民掩埋队共埋尸4.7万余具。其中：城西市民掩埋队，由湖南木商盛世征出资雇工，收埋上新河地区死难者遗体28730具。城南市民掩埋队，由平民芮芳缘、张鸿儒等组织难民30余人掩埋尸体7000余具，其中难民尸体5000余，中国军人尸体2000余，分别埋葬在雨花台山下和望江矶花神庙等处。回民掩埋队，由鸡鹅巷清真寺王寿仁以"南京回教公会掩埋队"、"南京市红卍字会掩埋队"名义掩埋尸体400余具，所收尸体以回民为主。北家边村民掩埋队，由北家边万人坑唯一幸存者严兆江带领，收尸6000余具。

与日军合作的南京市和各区伪政府以多种方式处理尸体，有据可查的埋尸数量有7000余具。下关区在南京城西北，伪区长刘连祥1938年1月30日报告，经过半个月工作，在下关、三汊河一带收埋尸体3240具。第一区在城东南部，伪区公所在1938年2月工作报告中称当月收埋尸体1233具。第二区在城西南部，最近发现该区伪公所的两份文件中提到请崇善堂掩埋了区内两处遗尸共27具。第三区在城东北部，最近发现该区伪公所曾请崇善堂、红卍字会掩埋区内多处遗尸10余具。1938年底，伪南京市政公署督办高冠吾命伪卫生局派掩埋队收集中山门外灵谷寺至马群一带遗骨3000余具，葬于灵谷寺之东，立"无主孤魂之碑"记录埋尸经过。

日军在支持中国团体处理尸体之外，也直接进行埋尸和毁尸的处理。日军

战俘太田寿男1954年供认日军动用部队处理的尸体总数达到15万具。近年来发现的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和回忆也明确证实，日军曾大量直接掩埋遇难者的尸体，或是将尸体焚烧，或是投入江河、水塘之中。

“整个码头，是一座黑黝黝的尸山。有五十个或许一百个人影在其间来回走动，他们在往江里拖尸体。痛苦的呻吟，流淌的鲜血，痉挛的肢体，再加上哑剧般的寂静。对岸隐约可见。就像月光下的泥泞一样，整个码头在微微闪光，那是血。不久，结束了作业的“苦力”们被迫朝着江岸站成一行。“哒哒哒……”机枪的声音，仰身，倒下，就像跳舞似得，这一伙人落入江中。结束了。……“约有两万人。”一个军官说。”

——《朝日新闻》特派记者今井正刚，《文艺春秋特辑：我在那里——目击者的证言》1956年12月号

遇难人数

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一直是各方争论的焦点，而且至今各方没有一致的结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和学界坚持采信30万的遇难人数，这是国民政府在战后军事法庭的相关审判中确认的。不过近几年来，随着新的史料的发现，中国学者的态度发生一定变化，如孙宅巍曾表示，在日本承认侵华日军在南京大规模屠杀的前提下，具体遇难人数“是30万再多一些，还是30万再少一些，应当是可以讨论的”。日本内阁会议于2007年4月24日通过一份答辩书，暧昧地表示对于南京大屠杀“不能否认发生过杀害非战斗人员和掠夺等行为，但在具体的被杀害人数上存在各种议论，政府作出断定是困难的”。日本学界对遇难人数的主流看法是，从数万至十万以上的中国人遭到日军杀害，然而日本极右翼分子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他们把东京审判的结果看作是强加给日本的“东京审判史观”。

对于中国来说，30万这个数字已经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在战争中对中国人民造成的深切苦难的象征，并且这一由战后南京军事法庭所确认的数字，被

当作是对日本侵略者正义审判的结果的一部分。因此，在日本右翼试图美化和否认侵略战争的背景下，来自日本的对这一数字的质疑就会被中方理解为日本对侵略历史的否认，从而激起中方对这一数字的进一步守护和确认。而在日本，对于右翼来说，30万这个数字被认为是中国式的夸张，更是“东京审判史观”的象征，而中方对这一数字的强调，则被日本右翼看作中国对日本施加政治压力的一张历史牌。

实际上，要根据现有的档案、证词以及其他历史记录得出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确切人数或者较准确的估计数是非常困难的。首先，有关大屠杀的第一时间原始档案十分匮乏。南京从1937年大屠杀发生直至1945年战败，都在日军占领之下，因此直到1946年中国国民政府正式还都南京之后，南京临时参议会6月11日成立以后才正式开始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而且，对还原大屠杀经过最为重要的日本官方文件，已经被日本方面在战败前后有计划地销毁和隐藏。例如，日军共有57个步兵大队直接参加对南京的进攻作战，但其中只有16个大队陆续公开当时的《战斗详报》和《阵中日记》。其次，中方在战后进行调查时遇到诸多困难，最终提交的数字也有争议之处。除了缺乏资料和众多大屠杀事件的受害者已经遇难之外，幸存者之中有的因为对自身补偿不报希望而对调查十分冷漠，有的则因为对于受害感到羞耻而隐瞒自身的情况。在遇难者遗体数量的统计上，由于大量尸体被焚毁和抛入长江，这一部分的数字只能进行估计，而在尸体掩埋的统计上，崇善堂提供的数字由于没有原始文献而存在一定疑问。另一方面，学者们对大屠杀范围的认识有所不同，这包括遇难者身份、大屠杀的地理范围和持续时间三个方面。中国方面的统计数字通常对战死的军人、被俘后被杀的军人与遇难平民并不加以区别。而一些日本学者则将日军以俘虏兵名义抓捕并杀害的平民归入战死的军人，从而将这一类遇难者排出在统计之外。关于大屠杀持续时间，战后审判提出日军大规模施暴时间为日军入城的12月13日开始的6个星期，但实际上，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至少在12月10日南京战役爆发时已经开始，即使在第二年2月，日军的零星杀戮仍

未停止，强奸和抢劫仍然严重。关于大屠杀的地理范围，由于1937年的南京在行政上包括城墙内的8个城区（城区内设有国际安全区）、近郊的6个郊区，以及远郊的8个县，如果采用较狭义的地理统计范围，就会得到较小的数字。由于对遇难者人数的统计范围采用不同的标准，在日本学者中出现相差甚远的结论。例如笠原十九司等“肯定派”为提出的“十万人以上，或接近二十万人，或者更多”，以秦郁彦为代表的“少数派”提出的“四万人左右”、数千人、数百人，以及认为大屠杀“不存在”的“否认派”。日本一桥大学日本史教授藤原彰在《南京罪行：一种解释性的概述》一文对日本否定派学者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死亡数字进行批评：“正如日本的保守的修正主义者所言，和平和奴性是可笑的，因为二战对于日本而言是正义和光荣的。正是这种赤裸的政治逻辑鼓动这群修正主义者不断否认大屠杀的事实，而这正暴露其学术上的破产。”

战时讯息传播

1938年初，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签发给日本驻美大使馆的密电电文，含有“日军至少屠杀了30万中国平民，许多是残忍方式的杀戮”的内容。一说认为电文是日本政府所作；一说认为是转发了被日本当局查没的《曼彻斯特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的新闻稿。

战时日本当局的新闻审查

战争期间，日本当局对日本国内媒体施行严格的新闻审查，回国的日本官兵也被命令对在战争中的罪行禁口，这使得相当部分日本国内民众难以及时了解南京大屠杀的详情。但是，随着有更多的战时退伍兵返回等情况的变化，大屠杀的信息在日本主流媒体之外得以传播。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日本媒体随军记者发出的稿件和照片都要经过日本军方和当局的严密审查，凡是对军方不利的一律没收，违规的记者

要受严厉处罚。

《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说："在战场上听到的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暴行，但这些事是绝对不能写的。只让写些什么在战场上邂逅的友情和前后方的佳话等，这类军中的所谓美谈。"

《中央公论》特派记者石川达三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跟随第16师团进行实地采访，写成报告文学《活着的士兵》。杂志社删节四分之一内容后送审，被日本当局查禁。石川还被当局以"将虚构作为事实，紊乱安宁秩序"的理由被处以监禁缓刑，编辑和发行人也被处罚。从此战争中日本记者再没有对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报道。日本传媒还被严厉禁止转载中国及西方媒体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南京被日本报纸粉饰为安宁祥和的地方。

除了防范新闻媒体泄露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南京战役后回国的日本官兵也被禁口。参与过南京暴行的日军士兵曾根一夫后来说：

"为了不使军队在战地的恶的一面让国民知道，在强化新闻管制的同时，对在战地的士兵的泄漏严密封锁。南京攻击战结束后，部分老兵返回国内时就曾被禁口。我也是昭和十五年（1938年）秋返回国内的，在离开所属部队之际，被告诫'诸位回到国内，征召解除就成了地方百姓了，但作为军人的名誉是值得自豪的，而有污皇军体面的事绝对不许外传。'这是烦琐的说法，要而言之就是'即使回到国内，离开军队，在战场干的坏事也绝对不许说'。"

因为涉及军事机密，日本记者发回国的照片都要接受审查。

日本国内充斥占领南京的报捷海报。

当时在上海发行的英文报纸《密勒士评论报》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对现今日本的影响

笠原十九司著书《南京事件》中“遭日军绑架的中国妇女”为题的照片。

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在1997年11月出版的《南京事件》一书中以“遭日军绑架的中国妇女”为题使用了这张照片。次年，日本右翼历史学者秦郁彦在多家历史右翼刊物刊文，指责笠原十九司以及当年的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使用这张照片上恶意歪曲事实，理由是使用者们配置了不同于照片摄影者（或首发刊物的编辑）配置的说明。这张照片原载于1937年11月10日出版的日本《朝日俱乐部》周刊，由朝日新闻社摄影记者熊崎玉树（熊崎玉樹）在中国江苏省宝山县盛家桥（现上海市宝山区盛桥地区）拍摄，原标题为“在我军的援助下干完农活后返回村落的日之丸村的妇女和孩子们（我が兵に援けられて野良仕事より部落へかへる日の丸部落の女子供の群れ）”。1938年，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出版发行的《日寇暴行实录》刊载此照片，并配在“成群结队的江南地区的中国妇女被押往日军驻地遭凌辱、轮奸、和枪杀”的标题之处。最后，此事以该书停售、变更照片以及作者和出版社向各方致歉了结。

2014年，同样使用了该照片的本多胜一的《中国的日本兵》也被历史右翼刊物提出相同指责。本多胜一发表书面声明称“书中已经注明了所用照片的说明都来自中方的调查。不过的确有声音认为中方对照片的使用存在问题。例如何人何地何时拍摄不明，肆意附加政治性说明等。我们这些日本市民派对中方的这些作法不加批判地接受，会在日本国内授人以柄。至于那张照片，的确不知道《朝日俱乐部》发表时配置了不同内容的照片说明。确实是错误使用”。

战时外国新闻媒体讯息传播

当时欧洲战事尚未爆发。西方和中国的新闻媒体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向全世界披露日军暴行真相，亲历大屠杀全过程的中国人和西方侨民则留下日军暴行的详细记录。

在撤退中留下的少部分美英等西方国家记者，最早向全世界报道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在12月初日军向南京发动总攻的时候，在南京城有来自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的十几名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他们中的多数人随着帕奈号撤走，只剩下《纽约时报》记者都亨（F. Tillman Durdin）、《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斯蒂尔（Archibald T. Steele）等5人。12月15日，日军攻占南京2天之后，由于南京的对外通讯全部中断，这些西方记者为了尽早发出南京沦陷和日军大屠杀的独家报道，随美舰奥胡号离开南京前往上海。12月15日《芝加哥每日新闻》刊载斯蒂尔发自南京江面奥胡号的电讯，首先将日军屠杀的暴行大白于天下，斯蒂尔称："离开南京之际，我们最后见到的场面是一群三百名中国人在临江的城墙前井然有序地遭处决，那儿的尸体已有膝盖高"。《纽约时报》在12月18日和次年1月9日发表都亭关于日军残杀数万中国战俘和平民的报道。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1937年用一架1930年代的老式16毫米摄影机拍摄共四盘放映长度达105分钟的电影胶片，这是迄今唯一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影像。约翰·马吉在当时的信件中也有大量关于大屠杀的描写："强奸妇女的行为已无法形容和想象"，"我能说的是，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大街小巷都有死尸，我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下关地区。"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费区目睹日军在南京地区的暴行，将马吉牧师拍摄的记录日军暴行的胶片偷运到上海柯达公司，制作并带到美国各地

放映，并在美国《读者文摘》上揭露日军违反国际战争法的暴行：“日本人从我们的宿营地抓人时，把手上有老茧和剃光头的，都当作当兵的证据，认为务必判以死刑。他们想要枪杀谁，就把谁拉出去。”

1930年代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1938年初撰写《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第一次向世人公布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痛斥日军制造“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

《拉贝日记》：1937年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约翰·拉贝在日记中详细记录日军的暴行。

《魏特琳日记》

中国受害者的叙述

200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开始建立历史证人个性化档案。共新建立档案12425份，包括39名外籍人士、103名原侵华日军老兵、2663名大屠杀幸存者和9620名大屠杀遇难者。

李秀英，怀着7个月身孕，与3个日本兵搏斗身中37刀，在鼓楼医院收治并留下影像资料。她并赴日本进行对日索赔诉讼。于2004年12月4日6点10分在南京鼓楼医院逝世，享年86岁。

夏淑琴，全家9口人被杀7口，她被刺伤后从死人堆里爬出。

姜根福（1929年12月20日-2007年），弟弟被日本兵摔死，母亲因为反抗强奸而被开枪打死，父亲被抓走，二姐因反抗强奸被刀劈死。

崔金贵，亲眼见慈善团体崇善堂的收尸埋尸过程，并确定崇善堂在埋尸时

有计数。

尚德义，1937年12月6日上午11时被日军抓获，同时与1000名以上的中国男子一起被机枪扫射，绝大多数当场死亡。他由于被尸体压住晕倒而幸免于难。

伍正禧，在南京新华巷62号避难时，其二哥伍正保、大表哥云馆、三表哥三云、表叔老王被抓走并枪杀。祖父被刀捅死，30岁的表娘被强奸。

邵翰珍，父亲邵锦晴、祖父邵才潮和舅舅任发和被日军枪杀。

皇甫泽生，保卫南京的一个士兵。被日军俘获后与几百人一起，在板桥镇一个山沟里集体被日军用机枪射杀。日军在射杀后再用刺刀捅死幸存者。他和另一个重伤难友为仅存者。

孟宪梅，在淌水沟接水时，亲眼看到日军用多辆卡车把老百姓押到现在的汉中门新桥桥口下面用机枪射死。

陈光秀，在南京汤山镇许巷村，父亲被枪杀，包括弟弟在内的村里100多个年轻人被刺刀刺死。艾家四兄弟被扔到天空摔死。多名女性被强奸。母亲因为父亲和弟弟被杀导致忧郁而死。

刘文静，大方巷广场集体屠杀（一百多人）见证人。

天津工商银行退休职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钟铭当年在南京一家商铺当学徒，说道："日本鬼子进城后见人就杀，城里到处都是尸体，载着日本兵的汽车就从尸体上开过去。那个惨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赵斌，生于1937年11月27日，出生17天即遭遇南京大屠杀，是年龄最小的大屠杀幸存者，2012年8月3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75岁。

日方的记录和证言

侵华日军各级指挥机构当时的命令和军官的记录为直接物证：

攻占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司令部曾接到命令："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焚烧。"

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中也记道："大体上不保留俘虏，全部处理之。"

日军第16师团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的作战记录《进攻南京纪实》。

侵华日军随军记者的报道、士兵的日记、证言也被列为南京大屠杀的证据：

侵入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辎重第6联队小队长高城守一日记中说，1937年12月14日，他看到南京下关江边："尸体像漂流的木头被浪冲过来；在岸边，重叠地堆积着的尸体一望无际。这些尸体可能有几千、几万，数目大得很。"

日军第16师团老兵东史郎的日记（《东史郎日记》）为重要实证，例如他在1937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哭喊着的支那（中国）人被装进邮袋中，西本（日本兵）点着了火，汽油一下子燃烧起来。就在这时袋子里发出一种无法言状的可怕的喊叫声。袋中人用浑身的力气使袋子跳了起来，自己滚动……手榴弹在水中爆炸了，水面一下子鼓了起来，然后平静下去。"

其他重要的日本兵日记还有：高岛市良日记、小原孝太郎日记、会攻南京的日侵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等。

《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的著作《中国之旅》，记录"百人斩"等屠杀事件。

笠原十九司教授，日本国内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权威学者之一，曾多次提供南京大屠杀证据（《侵略亚洲的日本军队》，大月书店出版）。

审判

台上四人从右至左为：日本陆军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上海派遣军司令朝香宫鸠彦、第十军司令柳川平助、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1937年12月17日，摄于日军南京入城式。

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书上写道："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十五万五千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由红十字会掩埋的是43071人，由崇善堂收埋的是112266人，这些数字是由这两个团体的负责人根据各该团体当时的记录和档案向远东法庭郑重提出的）。根据这些团体的报告说，尸体大多是被反绑着两手的。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毁的尸体，以及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

法官之一的梅汝璈指出，对于南京大屠杀一案"花了差不多三个星期的工夫专事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人数在十名以上）的口头证言，及检查和被告律师双方的对质辩难，接受了一百件以上的书面证词和有关文件，并且鞫讯了松井石根本人"，"审理是特别严肃认真的"。松井石根听取法庭宣布的罪状和科刑后，表示"南京事件，可耻之极"。法庭判决书中遂有郑重声明："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毁的尸体，以及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死的人们计算在内。"值得注意的是：远东国际法庭认

定被杀害者为二十万人以上，未包括尸体被日军消灭的被害者在内，而且这个数字仅是“在日军占领后六个星期内”的。

东京审判中，因为南京大屠杀而判罪者仅有身为乙丙级战犯的松井石根，罪状是未阻止南京大屠杀的进行；不过在南京军事法庭方面的审判则起诉包括百人斩见报的向井敏明、野田毅以及南京大屠杀时期担任第六师团师团长的谷寿夫等人并判决死刑，三人随后于1948年1月28日和4月26日，于南京雨花台刑场枪决伏法。

出于对战争犯罪追究的恐惧，日本政府在停战后迅速展开了有组织的大规模销毁罪证的行动。

1950年苏联向中国新政权移交日本战犯969人、伪满战犯约300人，与在此之前国共内战掳获的140名日本战犯，集中安置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太原战犯管理所。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56年4月正式宣布，对于在押的侵华战犯给予从宽处理。6月、7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审无一人被判死刑或无期徒刑；同年，其他1017名日军战犯因“表现良好”经免起诉无条件释放回国。1963年，最后一批日本战犯3人被中共中央特赦释放。

争议

中国官方方面的争议

中国大陆与日本否认派都一致认为，国民党政府当时的无能作为是导致南京军民大量死伤的重要原因之一；曾参与作战的前国军将领亦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蒋介石消极抗日所导致的结果；蒋本人也称自己“作为全军统帅第一个有罪过，我们对不起已死的官兵和同胞，对不起国家，尤其对不起自己

的良心。”但是，日本的南京大屠杀责任否定派（并非事实否定派者）同时主张，对中国军队前期顽强抗战所造成伤亡的报复是促成大屠杀的原因之一。

另外，中国北京大学历史教授王奇生在〈抗日战争研究〉中指出，国军习惯性假造数据，不管是战绩虚报、军饷虚领或夸大日军伤亡等等，经常性的扩大十倍来计算，因此相关数据并不可信。他并引述1943年驻英大使顾维钧转述英国人所说："中国抗战公报多夸大不足采信"。这一观点也被日本的右翼，包含南京大屠杀责任否定派、事实否定派都用于质疑遇难者人数等方面。

日本方面的观点和争议

许多曾在当时南京附近作战的日籍老兵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左翼的日本社会党及左翼背景的日本教职员组合对南京大屠杀也多抱持承认大规模屠杀的立场。尽管如此，还是有部分日本右翼民众否认南京大屠杀。而因为秉持观点与政治立场不同，不同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有不同的解读与看法，其中死伤人数的部分，有二十万以上、十多万人、四万、数千、数百乃至于完全否定者等各种说法；

研究大屠杀事件的日本学者对死亡人数主要有几种看法：

至少十数万人以上

主要支持者有笠原十九司（都留文科大学教授）、洞富雄（早稻田大学教授）、藤原彰（一桥大学教授）、吉田裕（一桥大学教授）、吉见义明（中央大学教授）、井上久士（骏河台大学教授）、本多胜一（新闻记者）、小野贤二（化学工作者）、渡边春巳、熊谷京二郎。

洞富雄在1973年7月发表《南京事件和史料批判》、《驳南京大屠杀是所谓“无稽之谈”》（日本现代史出版会），批判铃木和山本的否定史观。1967年写成《近代战史之谜》（人物往来社，后半部分为《南京事件》），1972年4月出版单行本《南京事件》（新人物往来社），1972年11月出版日中战争史资料《南京事件》（河出书房新社），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对教科书文字进行修改，他又立即于同年12月出版定本《南京大屠杀》进行驳斥。

四万人左右

主要支持者有秦郁彦（日本大学教授），另外冈村宁次在《冈村宁次阵中感想录》中认为约有4到5万人被屠杀，抢劫、强奸等“大有其人”。

两万至数千

主要支持者有亩本正己（元防卫大学校教授）、板仓由明（战史研究家）、原刚（防卫研究所调查员）。

认为仅有数百人死亡，乃至于完全否定的态度

主要支持者有铃木明（杂志记者）、田中正明（元拓殖大学讲师）、东中野修道（亚细亚大学教授）、富泽繁信（日本“南京”学会理事）、阿罗健一（近现代史研究家）、胜冈宽次（明星大学战后教育史研究）、杉山彻宗（明海大学教授）、渡部昇一（上智大学名誉教授）、大原康男（国学院大学教授）、西冈香织（军事史学会会员）、深田匠（政治学者）、前野彻（东急元社长）、铃木正男（大东塾塾长）、水岛总（纪录片《南京真相》导演）。

东中野修道指责在19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教科书没有登载南京大屠杀，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从1950年代至1980年代，南京大屠杀曾先后被收入中国大陆的中共党校教科书、高校教科书以及中学教科书。

1984年，教文社出版松井石根的亲信秘书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

诉讼和政界事件

2017年1月15日，APA集团酒店摆放其董事长所著的有关否认南京大屠杀、侵略战争等历史问题的争议书籍一事被曝光于中国网络，引起中国广泛不满并杯葛该集团酒店。不久，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发表言论否认南京发生了大规模屠杀，而只承认有小规模的抢劫平民和杀人发生，并表示“如果真的屠杀了30万人，那所有日本人都应去下跪道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亦迅速对此作出官方回应。

2013年2月13日，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为南京大屠杀道歉，并促请日本要承认历史。

2012年2月20日，南京的友好城市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在会见南京代表团时称，“南京事件没有发生过”。南京代表团虽当场未直接提出反驳，但次日南京市方面即宣布停止与名古屋市的交流。中国政府亦随后发表声明谴责河村隆之言论。

2007年6月19日，由约百名日本众议院议员组成的议员联盟“思考日本前途和历史教育之会”指称，1937年日军入侵南京时，死亡人数只有2万人。该会会长中山成彬（自民党籍众议员）表示，根据1938年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呈交的文献，国民政府谴责日军在该次攻击中杀害2万平民，该数据是时任中国驻国际联盟大使顾维钧根据1938年1月28日《每日电讯报》和另一份报纸的报导所得。该会“南京大屠杀史实查证小组”组长户井田彻（自民党籍众议员）则要求中国政府移除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内的日军负面照片。

2005年，参与“百人斩”的两名日军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3名遗属向东京地方法院控告《东京日日新闻》于1937年11至12月间的报道失实，和《朝日新闻》于1971年出版的《中国之旅》一书中所提及关于两名军人的“百人

斩”竞赛失实并损害其名誉，向该两报社索偿3600万日元。2005年8月23日，东京地方法院审判长土肥章大裁定报道属实并非捏造，驳回赔偿请求。撰写《中国之旅》的前《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在判决后指出：“‘百人斩竞赛’真实性无容置疑，原告意图否定整个南京大屠杀以至对中国发动侵略；不过在诉讼过程中找到新的事实和资料，却进一步肯定这个史实。”

1994年5月3日，战时日军大佐、二战后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说：“（在日军进入南京后）不久，我就到了南京”，“我认为南京大屠杀及其他事情是编造的谎言”。7日，永野茂门引咎辞职。

1990年，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在接受采访时说：“人们说日本人在那里（指南京）搞了一次大屠杀，但那不是真的，它是中国人编造的故事。这个故事破坏了日本的形象，它全是谎言。”

1989年，自民党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等人撰写的《日本可以说不》、《日本还要说不》、《日本坚决说不》等三本书中说道：“无端挑起战争的好战的日本人，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残暴的日本人，这就是人们对日本人的两个误解，也是‘敲打日本’的两个根由。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消除它。”

1988年春，战时特别高等警察课（特高）课长、二战后法务大臣、文部大臣、日本国土厅首脑奥野诚亮否认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无效”，要从舆论上“再审东京审判”，遭到日本国内外舆论抨击。当年5月，奥野诚亮被迫辞职。

1986年9月，日本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宣称南京暴行不是战争罪行而“仅仅是战争的一部分”，并说1910年日本对朝鲜的吞并是朝鲜心甘情愿成为殖民地。当日，藤尾正行被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免职。

1977年，日本文部省在一个标准历史书中把二战中的日本给战争对方造成的伤亡、日本的战争暴行，和强行将中国及朝鲜犯人送往日本劳动营的内容删去，只留下了一些美国轰炸东京的照片、一幅广岛废墟的照片和一份

日本战争死亡人数的统计表。

1973年，日本作家铃木明出版《南京大屠杀之虚幻》一书，首次指出“百人斩”为虚构。此后在日本，关于“百人斩”是否属实，成为争论的话题。

1965年，日本历史学家家永三郎起诉日本文部省大幅删改及掩饰日军在南京大屠杀和整个侵华战争中的暴行描写，其家门口遭到日本右翼极端分子的围堵、骚扰。1970年，东京地方法院法官杉本良吉裁决，教科书审查不得超出纠正事实及印刷错误的范围，家永胜诉，右翼极端分子向律师、法官和家永本人威胁要暗杀他们。

赔偿责任及条约

《中日和约》

1951年9月8日，部分联合国成员国在美国旧金山签署了对日本国的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条约承认日本负有战争赔偿责任，但是“因日本目前拥有的资源不足以支持一个自主的经济体，且不足以完全赔偿前述之一切损害与痛苦”。条约规定签署国放弃要求日本国提供劳役补偿及打捞沉船费用等以外的权利。由于当时的联合国成员国中华民国没有签署该条约，1952年4月28日，日本与中华民国单独缔结《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即《中日和约》。该条约及补充文件规定中华民国放弃要求日本国赔偿战争损失及提供劳役服务的权利。

《中日联合声明》

1972年9月29日，日本国断绝与中华民国外交关系，并声明废止《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曾经存在的相关法律责任和政治约束亦永久消失。同日，日本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中日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

和国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纪念

为纪念大屠杀中的死难者，南京市的政府、厂矿单位和民间组织在当年日军进行大规模屠杀的部分地点和遇难者丛葬地的部分遗址上陆续建立起22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遗址纪念碑。第一座纪念碑由下关发电厂于1947年在厂区内建立。南京市人民政府自1985年开始，在挹江门、中山码头、煤炭港、鱼雷营（有碑未立）、草鞋峡、燕子矶、东郊、江东门、普德寺、上新河、汉中门、清凉山、五台山、北极阁、正觉寺、金陵大学、花神庙、仙鹤门、太平门等地建立19座遇难同胞纪念碑和丛葬地纪念碑。江宁区湖山村、西岗头村的村民在当地自发建立两座民间纪念碑。

南京市人民政府为悼念大屠杀遇难者，在日军大屠杀的一处主要地点和遇难者丛葬地江东门，设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座遗址型专门史博物馆于1985年落成开放，经过1995年、2005年两次扩建，现占地约7.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展陈面积9800平方米，包括展览集会、遗址悼念、和平公园和馆藏交流等4个区域，其中展览陈列包括广场陈列、遗骨陈列和史料陈列三部分。遗骨陈列室中陈列有建馆及扩建时从丛葬地（俗称“万人坑”）挖出的遇难者骸骨，史料陈列大厅中有千余件相关历史资料，并设有拉贝日记和东史郎日记资料展，每年12月13日在纪念馆的悼念广场上举行大规模的和平集会。该馆共收集10000多份历史资料和文物，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南京大屠杀期间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约翰拉贝的旧居，2006年起作为“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正式开放，总面积为1628平方米，分为六个展区，共展出300多张图片、50多件实物及4部影像资料片。

纪念日

2014年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2014年12月13日是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在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南京全城鸣笛向死难者致哀，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主持。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夏淑琴、少先队员代表阮泽宇（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后代）一起走上公祭台为国家公祭鼎揭幕，随后习近平在仪式上发表讲话。同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香港海防博物馆堡垒大堂举行纪念仪式，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出席仪式并致献花圈。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澳门保安部队高等学校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活动，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李刚与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胡正跃、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司令员王文敬献花圈。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地也都举办形式各异的国家公祭日活动。

遗产登录

2015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咨询委员会对中国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南京大屠杀相关资料进行审核。10月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公布2014—2015年度新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项目名单，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纪念活动

2012年12月12日，为纪念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75周年并祈祷世界和平，江苏省扬州市虹桥社区大学生村官与扬州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在社区广场用千余支蜡烛摆成“南京•300000”的字样。

相关事件

2012年2月20日，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与来访的南京市政府代表团会面时，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2月21日南京市政府宣布暂停与名古屋市政府间的官方交往。

2017年1月12日，一名赴日旅行的中国游客在微博发布消息称，在其居住的东京APA酒店客房中，放置大量由该酒店集团CEO元谷外志雄所写的书籍，书里否认南京大屠杀和韩国慰安妇的存在，并称“所谓日本犯下的罪行，是美国为投下原子弹而编造的谎言”。1月15日，该网友前往APA旗下另一家酒店补拍视频，并在该酒店购买到了一本酒店CEO所著的书籍。该网友在视频称书中提到，“不合逻辑的事情被当成历史，比如30万人被杀害的南京大屠杀理论，这之前，南京人口是20万，这之后，南京人口为25万，所以在这一个月中，30万人被杀害是绝对不成立的，所以南京大屠杀和韩国慰安妇是不存在的，但中国和韩国忽视了这些事情，不断用这些谎言来谴责日本。”视频发到网上后被广泛传播，多家APA酒店均被中国各大旅行网站下架。针对日本APA酒店在客房中放置右翼书籍的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7日表示，这再次表明日本国内一些势力始终不愿正视历史，甚至企图否认和歪曲历史。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国民，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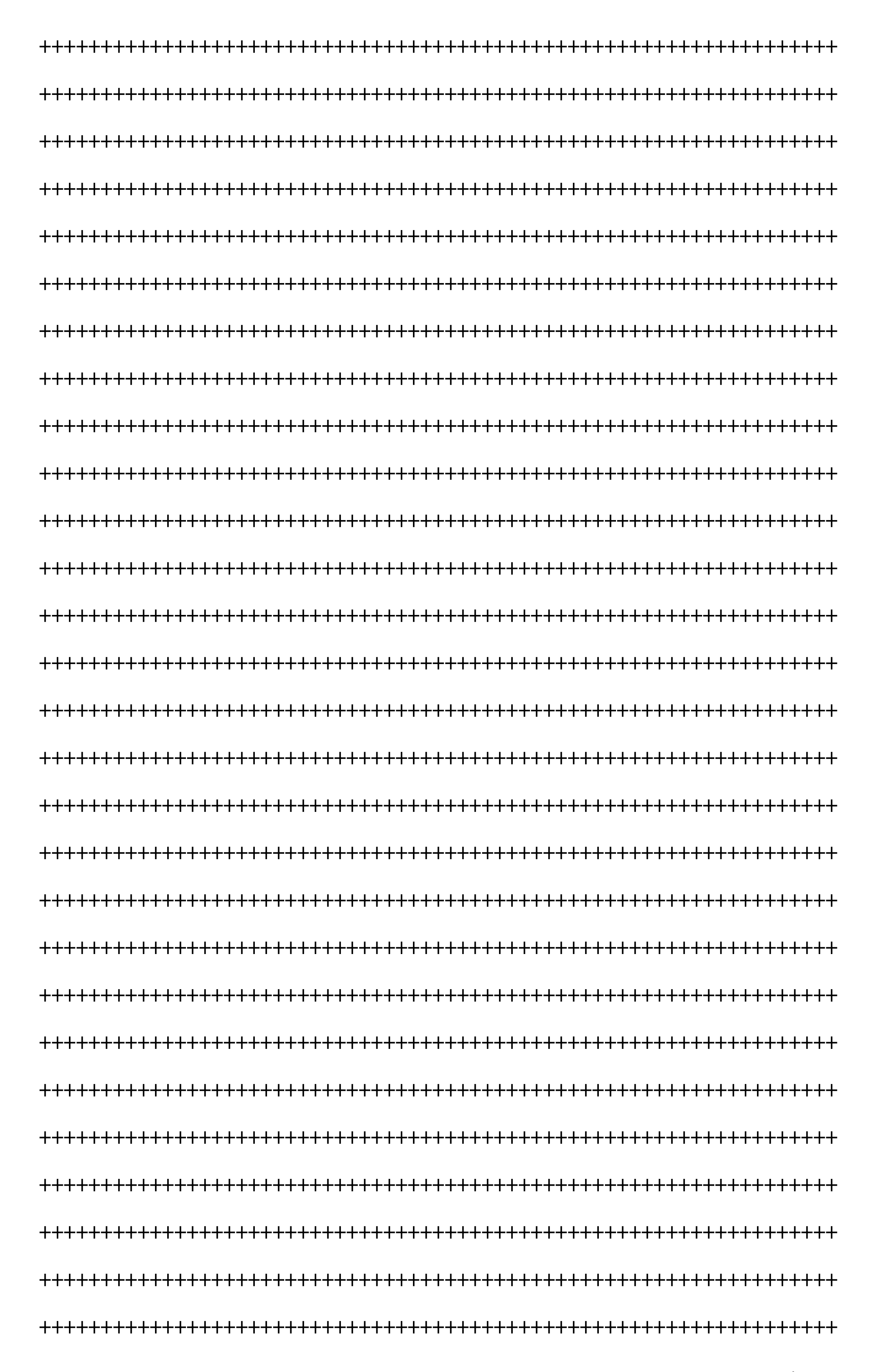
2017年12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任丘一网民在网络上发表侮辱南京大屠杀死难者言论，引发部分网民不满。王某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被任丘市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15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关于南京大屠杀、以及中日战争的一点深深省思

在1840年以后的、迄今180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日本与俄国是整个世界上的、对中国伤害最大的两个国家，也是所谓“列强”中的、最野蛮、愚昧、暴戾、罪恶、精神文明落后的两个国家。其中，日本可以排名第一，俄国排名第二，因为日本对中国的伤害，甚至超过了俄国对中国的伤害。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俄罗斯【俄国在历史上，虽然也受到了基督教信仰体系之中的东正教的深刻广泛影响，但是，相对而言，在西方国家中，俄国的基督教信仰文化是最为淡漠、肤浅的。在中世纪，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正教体系，从公元八世纪左右开始把基督福音传播到今天乌克兰的基辅、以及更远的莫斯科等斯拉夫民族地区。但是，由于历史上俄罗斯民族曾经在之后的数百年中被成吉思汗后代的蒙古野蛮部族间接统治，所以，俄罗斯的基督教信仰文化历史并不深厚。后来，彼得大帝兴起，俄罗斯效法西欧国家开始实行政经改革。然而，彼得大帝进一步地压缩东正教会的影响，甚至把俄罗斯的东正教会管理体系变成沙俄皇帝政府统治之下

的一个政府部门；从此，东正教信仰在俄罗斯变得愈发形式主义、徒有其表、信仰冷漠、影响肤浅】趁着清末、民国时代的贫弱，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道德地、欺压性地，占据了中国大片领土，并在中国东北地区、新疆地区、蒙古地区肆虐，行了许多不公不义、甚至残暴屠杀之事。更有甚者，苏联用各种明里暗里的阴谋手段，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中国扶植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并在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鼓动、怂恿、大力支持中共，通过武器、物资、技术、财经、掠夺东北工业物资、转让东北、等等支援手段，使得：——中共以暴力战争的形式，通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等等，彻底夺取了中国统治政权，并在整个二十世纪下半叶、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统治和奴役数以亿万计的中国人民，直至今日。

相比之下，近现代史中，日本对于中国的伤害甚至更加超过了俄国所带来的伤害。本来，在1840年的时代，日本与中国都是处于同样的封闭落后的社会状态。西方文明、科技、贸易理念、现代政治经济文明观念的到来，对于日本与中国都带来了同样的巨大冲击。因而，几乎同时，中国与日本都相应地分别进行了变法图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所采取的路线，是仅仅聚焦于器物层面【即，仅仅是物质、工业、制造、军火、生产、科技等等方面的革新与改革】的所谓洋务运动。【遗憾的是，虽然历史早已经一再地证明这种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是一个必然失败的死胡同，但是，直到今天，主流中国人仍然对于——这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存在着深刻内在逻辑缺陷的、没有真诚深思之态度的、轻轻乎乎的思路，——笃信不疑。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从1980年代迄今已经有四十年。然而，中国虽然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却仍然在政治文明方面极其落后，人民的眼睛、嘴巴、信息、头脑、思想、精神被严格封闭，甚至充满了愈

演愈烈的所谓“战狼”精神（正如二战时期的日本人一样）。这种以世界文明和西方文明为敌、自以为义、自高自傲、好勇斗狠、充满欺谎的状态，必将把中国带入一个更加混乱、失败的未来。】

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虽然也在大约中国洋务运动时期、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了变法图强，但是，日本的变法道路，则远远地比中国更彻底、走得更远。日本的明治维新，不仅改革了器物层面的物质生产制造、军火科技、经济运作、等等方面【这些方面，中国的晚清洋务运动也都涉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深刻、彻底地改革了——国家政治制度、教育制度、文化制度、等等社会中更为上层建筑的层面。日本的明治维新获得了极大成功。在短短半个世纪内，日本就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岛国，一跃而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国、军事强国。甚至，在晚清、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本战胜了清朝与俄罗斯两个庞然大国，在一系列战争赔款条约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从中日甲午战争以及日俄战争中，取得了巨大胜利】，从而使得国家进入更加飞速发展的轨道。

日本的现代化道路如此成功，以至于，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有大批留学生，带着仰慕的目光，来到日本留学，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并“崇敬”地把日本称为“东洋”。这些留日学生【包括鲁迅、周恩来、蒋介石等等无数人】回到中国以后，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影响。

甚至，在现代汉语中，很多现代词汇都是来源于日本首先把一些源自于西方文明体系中的概念词汇所翻译成【或“创造”出】的中文语汇。这些语汇，甚至占到了现代汉语语汇中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三十词汇的程度。例如，“科学”“民主”“革命”“共产党”“共产主义”“干部”等等，都是来自于日本文化人士们首先翻译而形成的词汇。

但是，——尽管，日本自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后开始全面西化、维新；尽管，日本的科学、技术、军事、政治、文化、教育取得了惊人的发展；——然而，日本却并非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文明的国家。

事实上，西方文明的真正核心，正是在于基督教信仰；——正是因着基督教信仰所影响、导致的文明土壤，——才使得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真正地发展起来；才使得人的生命被真正地尊重；才使得世人真正认识到，——人的生命有着怎样尊贵、神圣的价值。人生命的价值，不是在于其外表上的高矮胖瘦、相貌美丑，而是在于其内在的心灵、灵魂、精神的价值，是在于其信仰、真挚、谦卑、信实的生命价值。圣经告诉我们，人是那位伟大的、宇宙天地之造物主、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与样式所造的；我们本应是上帝的儿女；世人彼此之间本应当是弟兄姐妹。

正如中国的洋务运动一样，在日本的现代化道路上，日本仅仅是看到了西方文明的某些外壳，却并没有学习到、也不愿意接受，西方文明的真正精髓，即、基督教信仰以及其所影响和产生的文化土壤。事实上，主流日本人，正如同主流中国人一样，直到今天，对于基督教信仰文明，实际上仍然是不知所云、懵懂无知。在近现代历史上，虽然，日本的政经现代化取得了巨大成功，日本早已成为与世界列强比肩的发达国家；虽然，中国的政经现代化至今还非常残缺不全，仍然还亟需全面开始与完善；——但是，其实，在真正的精神信仰层面，日本与中国的差别，其实很小。在两者的文化中，虽然，都强调着牺牲精神、奉献精神、吃苦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等等；——但是，两者都没有意识到，——个体之人的生命是何等宝贵、珍贵、尊贵，以及，为什么如此尊贵。对于此问题的回答，——只有当一个人真正地认识那位创造宇宙天地与世人生命的伟大造物主的时候，只有当一个人真正地认识到那伟大之上天的公义圣洁、慈爱恩典的时候，——他在内心之中，才会真正地有所明白、才会有所感悟。

+++
+++
+++
+++
+++++

请注意，我们并非是在这里说，西方文明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可以划等号。事实上，西方国家既不是铁板一块，也绝非都是圣徒。

【引述 《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下）》 关于西方文明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

虽然基督教信仰的文化思想与文明体系影响如此广泛，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文化思想与文明体系简单地当成了基督教信仰本身，或者，如果我们简单地仅仅把西方文明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划等号，那么，我们就犯下了严重的、望文生义、不认真负责、偏离事实的错误。

事实上，我们只要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近三百年来，虽然有很多好的事情，比如现代科技革命的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民主自由制度、法治、自由经济、平等贸易、社会大分工协作、医疗、教育等等，还有无数的、具体的科学技术发明，都是来自西方；但是，也有很多坏的事情，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神论主义、进化论哲学、性解放、放荡主义、离婚泛滥、家庭破碎、甚至同性恋等等，也都是来自西方。

显然，如果我们刨根问底、认真查考、追本溯源，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明白，西方世界绝不是铁板一块，西方人也绝非全都是纯洁无辜的、敬虔谦卑的圣徒。

任何思考东方、西方文明体系比较的人，如果，——看不到西方文化的优异成分；看不到西方文明给人类所作出的、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看不到现代人要在何等广泛而深刻的程度上，感谢——培根、波义耳、牛顿、等等无数科学家、哲学家，以及源自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现代医院体系、现代教育体系、现代经济法律制度等等；看不到在西方的无数的、大批的、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们，在科学、文化、政治、法律、医疗、教育、服务、信仰领域，为社会、为人类所作出的可歌可泣的杰出贡献；看不到在西方各国有那么多、数量巨大的信仰敬虔、谦卑诚实、热忱真挚、敬老爱幼、爱人如己、勤奋工作、热心服务于大众和全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真诚基督徒们；——那么，这样的人就一定是没有良知、没有诚实态度的人。

另一方面，任何思考东方、西方文明体系比较的人，如果，看不到——西方文明中的错误、缺憾、谬误成分，比如，在诸如法国为首的、遍及西方各国的、打着人文主义旗号、放荡不羁的淫乱主义、性解放主义；在诸如德国为首的、遍及许多国家的民族自大主义、好战主义；在诸如俄国为典型代表的信仰虚伪主义、专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起源于英国等国学术领域的达尔文进化主义，和盛行于德国的唯物主义、泛神主义、自然神主义、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那么，这样的人就一定不是仔细思考与观察、真诚寻求真理的人，而仅仅是盲目崇拜西方的武力与物质繁荣，而在心中没有正义、没有饥渴慕义之心的人。

事实上，即使我们撇开这些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历史、哲学史等历史领域的角度不谈，单单从宗教信仰、基督教教会的历史与现状来看，西

方文明体系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极其复杂的、甚至分裂的、内部景况；——这也从侧面再次证明了，西方文明体系绝非简单地、直接地等于基督教信仰本身。

基督教会的简史

在基督教信仰的传播与教会历史中，在大约公元15世纪以前，基督教会一直分为东西两大部分。

天主教与东正教的由来

东方教会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是从大约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归依基督教信仰以后，把罗马帝国从罗马迁都至当时的拜占庭市开始的。拜占庭市位于欧洲与亚洲陆路交通的重要枢纽节点。它后来被改名为君士坦丁堡。这个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以基督教信仰为国教的帝国，被后世的历史学家称为拜占庭帝国；她从公元四世纪一直延续到公元十五世纪，存在了将近一千年的时间，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没有改朝换代的重要国度之一。公元八世纪左右，这个以希腊语为主要官方语言的基督教国家，开始不断地把信仰传播到后来称为俄罗斯等、以斯拉夫民族为主体的各个国家。俄罗斯这些国家曾经在很长时期一直处于农奴制度状态（俄罗斯的农奴制度一直到后来十七世纪彼得大帝改革、效法西方工业革命等等的时候，才开始被完全消除）；然而从公元八世纪开始，基督教信仰已经逐渐把社会文明和人道关怀制度带给俄罗斯等的广袤土地。

西方教会以罗马为中心，在君士坦丁大帝迁都君士坦丁堡以后，延续和保持了从公元一世纪下半叶（注：耶稣基督于大约公元元年左右降生，于公元三十三年左右被钉十字架）、使徒彼得时代以后建立的教宗制度。在从公元四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的上千年历史中，以罗马教宗制度为核心、以拉丁语为主要官方语言的西方众教会，与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以拜占庭帝王为政权中心、以希腊语为主要官方语言的东方众教会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在公元一千年以前，东西方教会基本上是兄弟般的关系。他们——都以圣经新旧约全书为共同的信仰根基与中心教义的基础；都相信和承认，圣经、也只有圣经，是上帝的全备话语、是上帝亲自的、超自然的启示与默示；都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都信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

但是，在公元一千年之前，在东西方教会之间，也一直存在着既合作、又有纷争的状态。两者在各自教会权威、教义细节等等方面都有很多争议、互相对对方不服气。这种状态持续到公元一千年，终于矛盾完全爆发，互相之间彻底决裂，互相否认对方的信仰合法性。

中世纪

公元十五世纪，君士坦丁堡被后来称为土耳其人的突厥民族攻陷。君士坦

丁堡为改名为伊斯坦布尔；这个名字是源于突厥人的伊斯兰信仰。从此，拜占庭帝国正式覆灭。然而，东方教会，此时已经自称为东正教，逐渐开始向莫斯科方向迁移、直至后来以莫斯科为其中心，继续与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天主教会体系分庭抗礼。大约在同时，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体系（自称为天主教系统），于公元十五世纪开始了被后世称为文艺复兴的一种近现代文化革命运动。

值得指出的是，从大约公元四、五世纪至十五、十六世纪的一千年，被后世称为的所谓“中世纪”，其实并非人们所常常误以为的、专制主义压迫的黑暗时代。事实上，任何诚实的历史学家都会承认，尽管在这期间发生了几次针对中东的十字军东征、回击伊斯兰的进攻和劫掠，但是，总体而言，在这大约一千年的漫长历史年代中，整个欧洲，包括西方教会影响下的西欧，和东方教会影响下的东欧，在政治与军事上，基本上是处于和平时期，几乎很少有国家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很少有兵荒马乱、生灵涂炭、改朝换代的时期。在许多乡间、市镇、经贸中心，人民安居乐业，许多地方治安良好、常常夜不闭户。

在中世纪的长达一千年中，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教会与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各有特色、短长、优缺点。

东方教会所处的拜占庭帝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帝王及其家族笃信基督教信仰。东方教会分成各个教区，众教区的各级牧者、长老等等围绕着拜占庭帝王，彼此和谐，处于互相和平、长达几乎一千年的安稳状态中。事实上，拜占庭帝国这个名称，是后世的历史学家给起的；当时的人们从未曾这样称呼。他们这个国家，一直自称为“基督之国”、或“东罗马帝国”。

而在西方教会，随着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时代在公元四世纪、公元五世纪的解体与破败，罗马教宗体系饱经风霜、生死存亡、无数的患难、危机。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一本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著名的基督教圣徒、奥古斯丁，以及他的《上帝之城》。这本书讲述了，根据圣经、耶稣基督的教导，所谓上帝的国度、上帝之城，究竟是什么意思。在长达上千年的中世纪历史中，西欧从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但是，却有一个统一的教会体系，就是以罗马教宗为首的天主教教会体系。

我们会在其他文字中，继续深入讨论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历史之间的比较，以及他们两者之间的短长、利弊、得失；并从中反思，基督教信仰的教义，以及，基督教信仰与世上国度、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文明体系之间的深刻关系，应当是怎样的。

中世纪与近现代之间的分水岭

公元十五世纪是西方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正式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近现代历史的开始。此时，一方面，君士坦丁堡被伊斯兰的突厥人攻陷，因而，整个欧洲大陆与东方地区之间的贸易枢纽、中枢节点被强行隔断。从此，西欧各国开始大兴海上贸易，从而使得曾经位于西欧文明边缘地带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成为海上强国，纷纷在经济政治上依次崛起。

另一方面，从公元十五世纪，以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城邦为中心，因着一个开始于美第奇家族的长达约两百年左右的统治，开始了——被后世称为文艺复兴的艺术文化运动，以及，与此同时的、罗马天主教体系所受到的巨大冲击和影响。美第奇家族供养了许多后来极为著名的艺术家，包括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人。这些艺术家回归基督教信仰临到欧洲之前的时期的希腊艺术风格，以绘画和雕塑人体为美、为荣。美第奇家族积极地涉足政治与宗教领域，甚至有的家族成员自己成为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教皇。美第奇家族的奢靡与腐败之风，加重了罗马天主教本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的弊病。

天主教与东正教的谬误

自从公元四世纪开始，当圣经新旧约全书被从原文（旧约是希伯来文，新约是希腊文）翻译成罗马的官方语言、拉丁语以后，罗马教宗系统就开始逐渐把圣经束之高阁，使普通人无法轻易接触到、阅读到圣经。在公元十六世纪以前的长达一千年中，西欧各国绝大多数人民，都只能从教会的神职人员那里聆听基督教信仰的教义，而没有机会自己去阅读圣经、上帝的话语。

在教义方面，天主教系统添加了许多圣经本身没有、甚至是圣经明文反对的内容，例如，不恰当地高举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地位，甚至称之为圣母、上帝之母，以及，把历世历代的许多基督教使徒们、圣徒们当作偶像崇拜、向他们顶礼膜拜、祈祷、祈求庇佑（在这些方面，东正教与天主教存在着同样的谬误，即，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圣经本身的教义和教导，而在后世添加了一些违背、偏离圣经内容的教导、信条）。而且，天主教

还在后世自行添加了一些伪经、次经，以及向圣母玛利亚祈祷、敬拜的玫瑰经，等等。

好在，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纷争与分裂状态，虽然是一件很不好、极其令人伤心的事情，但是，这种状态却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可信地保证了，圣经新旧约全书本身，一直被精心地、忠实地保存着，直至后世，因为天主教与东正教双方之间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互相监督、有力督责的效果。

并且，尽管天主教与东正教中存在许多谬误和偏差，但是，我们仍然要说，他们的主流信仰、主干教义、主要信条，例如"使徒信经"等对于基督教信仰教义的总结，是正确的。所以，在天主教与东正教里面的信众，如果真心地、真诚地、热忱地寻求和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真的以耶稣基督为自己生命的救主，那么，我们仍然可以说，他们是良善的、真诚的基督徒——尽管，我们应当诚实指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

圣经的广泛翻译传播，以及近现代时代的开始

公元十五、十六世纪，随着君士坦丁堡被突厥人攻占、拜占庭帝国灭亡，东方教会保存的希腊文的圣经原典以及许多其他希腊文写成的著名基督教历史文献和著作，被教会人士抢救、传播到西方教会体系。这些希腊文的文献以及圣经原典，开始让西欧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罗马教会的圣经拉丁语译本，在一些重要教义方面的词汇概念上，存在着一些翻译上的失

误或偏差。

几乎与此同时，欧洲发生了许多历史意义影响深远的事情。我们仅举以下三件极其重要而著名的事情为例。

第一件事情是，金属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大规模、迅速地、廉价地印刷、传播纸质书籍在技术上成为可能。

第二件事情是，罗马教宗的教义上的谬误，以及财物方面的奢侈腐败作风，终于激起了教会各级神职人员以及普通基督徒们的反抗。以德国的马丁路德为代表，一大批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反抗教廷、传播圣经、传播真正纯正的福音与基督教信仰教义。马丁路德把圣经翻译为德语，极大地推动了圣经在社会中的普及化、广泛传播。

第三件事情是，英国的丁道尔开始把圣经翻译成英语。这些圣经翻译运动本身，直接导致了现代德语书面语、现代英语书面语等等的诞生，因为在那之前，西欧的书面语言只有一种，就是拉丁语。

圣经的广泛传播，使得欧洲的无数普通人开始真正地、详尽地明白基督教信仰的真正主旨、原则、精髓；这些基督教宗教改革运动，深刻地革新、更正了欧洲各国人民在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方面的许多认识与观念。这样的革新与更正，直接地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开

启；以及，现代民主自由政治运动、法律、经济等等许多方面的变革，如火如荼地在各地展开。

这些事情，推动了、构成了过去五百年来的欧洲近现代史，并进而，对于全世界的文明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影响作用。今天，每一个出门坐火车汽车飞机、早上吃牛奶面包、上班穿西服革履、住在高楼大厦或四季温暖如春之庭院别墅里的人，都要感谢培根、牛顿、波义耳等现代科学的开启者们，更要感谢那些舍生忘死地传播圣经、传播基督福音的敬虔基督徒们。

基督教会简史的总结与反思

从上面的简史中我们可以看见，在耶稣基督降生以来两千年的历史中，每当人们贴近圣经、寻求圣经、明白圣经话语的时候，他们就展现出热忱、敬虔、谦卑、真挚、积极的信仰，他们的生命就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社会与国家就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也发生极其巨大的改变；上帝的祝福就极大地、温暖地、令人震撼地临到他们。

反之，当人们沉浸在自己的罪性与私欲中，沉浸在彼此的纷争中，当人们没有真诚地、认真地、热忱地寻求上帝的话语、信仰的真理的时候，那么，他们的生命就显出冷漠、消极、惰怠的样式，他们的道德就不断滑坡，他们整个社会与国家就充满了许多动荡、败坏之事。

从基督教会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反思。

一，上帝的国度，虽然表现在地上的教会中，但是，从终极的意义与层面而言，基督的国度不属于这地上的任何地方，而是属灵的、属乎天上、那永远的国度与家乡。

二，然而，这并不是说，基督教信仰在这个地上就没有：——确定的、明晰的、任何人都无可否认的见证。事实上，现代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人道主义、人的生命与自由被极其重视，到艺术文化、经济与科学的大发展等等，——在无数的层面上，现代人类文明都被深深地刻下了基督教信仰的烙印。（读者可以阅读《基督教的果实》《基督教信仰之大众证据》《基督教信仰之证据的反思》等系列书籍，进一步查考这些方面的事实与信息。）

三，但是，在基督教信仰与西方文明之间，是无法划等号的。前者固然在极大程度上深刻影响了后者，但是，后者中包含着许多其他方面的成分与因素，甚至包含了无数的糟泊、不义、败坏、奢侈、贪婪、淫乱，等等。

那些感叹“为什么基督教信仰没有全部改变欧洲人、使全体西方人都成为基督教圣徒，或是为什么没有彻底消灭那些罪恶的恶人”的人们，并不明白：——上帝是公义、圣洁、慈爱与恩典的，他的终极道德审判必将来到，他的终极惩罚是永远的；然而，他以恩典与慈爱，给世人悔改己罪的时间与机会，使他们真心地、真诚地、而不是被强迫地，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在

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上帝的无限公义与权柄，到那终极的审判日，必将昭然地显明在一切世人的眼前。

四，那么，为什么有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对于基督教信仰和西方文明不太了解、不求甚解的人，常常把这两者看为同等呢？

这一方面是由于，许多世人并不了解基督教信仰的真正主旨、福音的真正涵义：——“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人在世上应当勤勉而敬虔地生活、工作，但是却不应当把心系于这个世界，以这个世界、或其中任何被造之物为心灵的归依”；尤其是不了解基督教信仰、与世上之国关系的教义：——“基督的国度属乎天上，而不属乎地上；真诚、谦卑的基督徒应当在这个世上作盐、作光，把基督的爱带给世人，见证福音的真实，见证耶稣基督伟大、圣洁的爱；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温柔的福音，是圣洁的福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烛火他不吹灭。”

另一方面是由于，世人因着自己生命中的罪性，因着自己的心系于这世上的国度与荣华，所以，常常误以为，神的作为和果效，是要终极地显示在这个地上的世界中。他们把世上的荣华璀璨、建筑物的宏伟绚丽、人群的华盖云集，错误地当成了天国里的永远荣耀。他们总是以为，非得要通过外在的、表面光鲜的“荣光”，来看待那些属灵的、属天的、属乎道德的事情。

五，基督教信仰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影响最大，特点也最独特的宗教信

仰。它虽然指出，我们不应当以这个被造的世界或是其中任何被造之物、被造之人为我们心灵的依归，而是要单单地敬拜那位创造宇宙天地、创造我们生命的主；但是，它不是像佛教那样抱着虚无、万事皆空、不垢不净、不生不灭、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诸相皆虚妄的态度，以否定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一切世事。它告诉我们，应当积极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以谦卑、温柔、真诚、和平的心，以勤勉、专诚的工作，去面对一切事情、一切世人。

它虽然指出，只有上帝才是我们的造物主、生命之主、永生之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上帝是我们道德律法的颁布者、是圣洁公义而全能的终极道德审判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道成肉身，耶稣基督谦卑地降身为人，生在马槽里，生在律法下，取了奴仆的样式，甚至谦卑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永远的救恩，使一切相信他、接受他救恩的人，得到永生，得以进入那永远的天国、得享那永远的幸福与美好。

它不是像伊斯兰教那样用火与剑传教、荼毒、劫掠，而是用谦卑、慈爱、怜恤与和平的方式，把福音向世界分享。它不是像伊斯兰教那样推行、奉行政教合一的教义与制度，更不是要在地上建立起什么伟大的、属世的国家；它不是要以严刑峻法来统治臣民，更不是要让整个社会万马齐喑、丧失活力与创造力。在圣经福音书中，耶稣基督清楚地说道："我的国属乎天上，而不是属乎地上"。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基督教信仰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良善影响是最大的，也是有目共睹的。

+++
+++
+++
+++
+++++

【引述 《基督教的果实》基督教信仰对于文明的影响，例如，在如何对待战俘、以及如何看待世人生命之尊贵性的方面、等等】

基督教信仰对于古代罗马社会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其对于法律的看法，以及应当如何遵守法律。罗马法律系统是人类系统性法律制度的先驱，是现代西方法律制度的前身。然而根据罗马帝国的第十二法典，法律的权威来源与依据既不是人的良知，也不是对错之分。人们遵守法律的原因，仅仅是法律自己的文字要求，再没有什么别的更高权威来源。法律的诠释，仅仅是字面的意思，而没有法律精神的延伸。罗马帝国在立法过程中本身就存在很多缺陷，而在执法体系中则更加充满腐败。在CICERO时代，罗马帝国的司法系统千疮百孔，腐败盛行，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法律制度不可能给富人定罪，因为他们无论犯了什么罪行都可以通过贿赂的方式被免罪。当基督教信仰在罗马帝国范围内传播开以后，这一切都被改变了。人们开

始严肃地把司法与执法过程看作是出于上帝的神圣旨意，出于上帝的公义与平等。在基督教信仰影响下，人们遵守法律，不主要是由于畏惧法律的惩罚，而更主要地是由于人们出于宗教信仰的动机。整个罗马帝国的执法系统都经历了革命性的转变。在第一位基督徒身份的皇帝统治之下，基督教会的主教被委托来主持法律的裁决与审理，解决人们之间的纷争，调停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调解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冲突；看护婴儿，扶持弱者，帮助那些贫穷受欺压的人。教会在处理这些纷争以及各项事务的时候，非常有智慧、公平、恩慈、友好，以至于赢得了整个帝国中许多人的心。这种出于爱心的法律正义，是罗马人未曾见过的。甚至许多不信基督教的人们也主动来找教会的主教，请求调停处理他们之间的一些争执。

在历史上，基督教信仰对于奴隶制的废除也发挥了重大影响作用。在古罗马帝国，奴隶制是一件最违背公义的事情，也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悲惨。对于今天的现代人来说，我们可能很难认识到古代奴隶制的野蛮与残酷。我们不知道在古时，有多少自由人被强迫作奴隶。历史文献记载，在雅典的人口中，只有很少比例的人是自由的，其他人都是奴隶。在斯巴达，为了减少奴隶的总人数，法律规定可以把那些老弱病残的奴隶们大规模地、冷酷地杀死。在罗马，奴隶的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所有下层劳动都被他们做了，导致那些贫穷的罗马自由人大规模失业。罗马的奴隶总数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们后来起来反抗的时候，竟然能够与骁勇善战的罗马军团对抗数年之久。有罗马人曾经提议，命令所有奴隶穿上特别的衣服、容易识别。但这个提议被统治者否决了，因为他们担心，如果奴隶们穿上那种特殊识别的衣服，奴隶们会发现彼此有如此多的伙伴，以至于会联合起来造反。在奥古士都凯撒大帝统治时期，如果一个罗马人的奴隶数量少于十人，就会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通常，很多罗马人会拥有两百个以上的奴

隶，有的人的奴隶数量甚至远远超过两百个。据史料记载，有一个罗马人竟然拥有4116名奴隶。根据传说，有的奴隶主甚至可能会拥有一万名到两万名奴隶人口。在罗马帝国中，贩卖奴隶是一件很赚钱的生意。THRACIAN的父母如此冷漠而贪婪，甚至于把THRACIAN的儿女们出卖为奴隶。罗马士兵在一场战争胜利以后，会把大规模数量的俘虏收来作为奴役。西西里海盗占领了地中海以后，把那里的人口贩来、带到DELOS市场去贩卖，有时一天就会买卖一万名奴隶。

这些奴隶的生活如何呢？固然，有的奴隶主比较友善，尤其在对待那些家中生养的奴隶时，会很有感情与友谊。固然，在战场上把俘虏收作奴隶，总比直接杀戮他们好。但是，这些奴隶们这样活生生地被人奴役，的确是一件非常残酷不公的事情。这些奴隶们大多数命运如何呢？他们像牲口一样、光着身子被买来卖去；被用链子拴在地上；被折磨、施以酷刑；被鞭打，被石头打死；被刀刺死，被吊死，被毒死，被十字架钉死；被烙印；被野兽撕碎；当他们太年老而无法做工的时候，被驱逐到TIBER的一个岛上饿死；他们的生死完全掌握在奴隶主手中。那些贵族家里的青少年人，以大规模地杀奴隶为乐。一个名叫VEDIUS POLLIO的罗马人，由于其奴隶不小心打碎了一个花瓶，就命令把那个奴隶扔到鱼塘里，把他当作鱼群的食物。一个罗马参议员仅仅为了让朋友看人在死前的痛苦，就命令手下人杀死自己的一个奴隶。甚至罗马妇女们也残酷无情地对待自己的女奴隶们。

SENECA的著作中曾经用寥寥数语勾勒了罗马普通奴隶的悲惨一天。为了服侍主人的荒淫醉酒，奴隶要整晚不吃不睡地站在那里，等待吩咐。他们不

敢有任何怨言，因为他们哪怕是打一个喷嚏、或是弄出一点点小声音，就会遭受致命的鞭刑。

这就是奴隶们的悲惨命运。他们也没有任何逃跑的可能，因为罗马法律规定，任何人都不可收留逃跑的奴隶。没有什么语言能够形容奴隶的可怜生活与绝望。

哲学家们如何看待这些奴隶的悲惨命运呢？许多古代文人哲士甚至不把奴隶当人看。亚里斯多德把奴隶定义为可以自动移动的工具。VARRO说，奴隶与家畜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奴隶可以说话。这些概念都代表了公众中流行的、针对奴隶的观点。尽管在基督教信仰以外，不是没有人对奴隶心存怜悯，但是，只有基督教坚定而一致地认为，奴隶也是人，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当SENECA试图劝说少数罗马精英们要善待奴隶的时候，保罗在圣经里已经清楚地讲述了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应当有的关系，以及一般性的原则。基督教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坚定地声称奴隶是人，而所有人都应当以弟兄之爱来彼此相待。基督教虽然不教唆奴隶们造反，而且顺服与谦卑是基督教信仰的重要内容，然而，基督教信仰最终推动了奴隶的自由与解放。保罗在圣经中的《腓利门书》是一封关于奴隶与奴隶主之间关系的重要书信。早期基督教的教会虽然不能直接制定民事法律，但规定教会内部的基督徒，如果与奴隶女子发生性关系，就要娶她为妻；这与当时罗马帝国的风俗完全相反。主人不可虐待奴隶，否则就会被赶出教会；尽管这在国家法律的眼中并不违法。贩卖奴隶者死的时候，不会以基督教的葬礼仪式进行安葬。主人的命令如果是直接违反上帝命令的，奴隶就不要听从主人的

命令。在教会内进行主的圣餐仪式的时候，奴隶身份的基督徒可以分饼和杯，而奴隶主若还没有受洗，却要退到一旁。

这样，在很多可能的方面，基督教都致力于改善奴隶们的处境。渐渐地，基督教信仰对于奴隶制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最终导致彻底改变、乃至最后消除了这个制度。历史文献中记载，在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下，有数千的奴隶们都得到了解放，因为教会宣称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任何人都不应当成为别人的奴隶。后来，在基督教信仰所影响的社会风气作用下，JUSTINIAN凯撒大帝开始颁布关于奴隶们怎样可以得到合法自由的法令条例。不过，那个时候奴隶制还没有被一下子完全消除。起初，法令规定，如果奴隶逃走以后、再回到原主人那里可能会受到严重虐待，那么，该奴隶就可以得到自由、而不需返回原主人家里。后来，到封建时代的时候，基督教信仰关于平等、正义等等的教义已经深入人心，奴隶制度因而就被正式取消了。

不幸的是，后来，虽然奴隶制在西欧已经消失很久了，但在葡萄牙人与穆斯林的影响下，贩卖非洲人作为奴隶的风气于1444年又开始盛行起来。从那以后，贩卖黑奴制成为欧洲许多基督教国家的一件令人耻辱的罪。黑奴制从葡萄牙与西班牙开始，然后英格兰、法国、荷兰也陆续加入。然而，从黑奴制一开始兴起的时候，基督教传教士们就从未停止针对此制度的强烈抗议。事实上，历史上这个制度的削弱与废除都能够追踪到基督教信仰的影响。

很多代人以来，人们常常被属世利益蒙住了眼睛，然而这件事情最后终于牵动了许多人的良知。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基督徒贵格党人大声疾呼道，奴隶制是与基督的福音原则相违背的。这些呼声影响了英国与欧洲很多有良知的人。很快，奴隶的贩卖与运输被正式禁止了。接着，有法令颁布出来：若有人给奴隶主付上足够价钱，那么，奴隶就可以得到自由。

在基督徒们的呼声与呼吁影响下，许多基督徒国家先后放弃或禁止了奴隶制度。美国在林肯总统的领导下正式解放了所有黑人奴隶。巴西通过了一系列法律，逐渐使它们国内的奴隶们得到自由。俄国则一次性地解放了两千万本土的农奴。

从始至终，历史告诉我们，基督教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反对奴隶制度、彻底废除奴隶制，并最终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角斗士的游戏是古罗马帝国另一个极不人道的制度。在罗马帝国内角斗士的竞技场曾经一度极其热闹；角斗士的生死相搏是广受公众喜欢观看的活动。这个活动极其血腥惨烈，而罗马人却极其喜欢看这种好勇斗狠的野蛮

场面。而政治家们则把这个活动看作是吸引百姓兴趣的有利工具，以此维持社会秩序。这个角斗士的游戏不仅在罗马帝国的首都才有，而且，遍布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几乎所有城市和地方。甚至，当一个富人宴请宾客的时候，也会把自家的角斗士叫出来进行搏斗杀戮比赛，以取悦宴席上的客人。这种嗜血的屠杀游戏如此广受欢迎，以至于各级罗马政府常常需要作出一些规定，限制角斗场里面的进行搏杀的角斗士人数。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常常可以看到两百名以上的角斗士在同时彼此杀伐。史料记载，当角斗士游戏兴盛的时候，一个月内，就会有两万至三万人被杀死。那些参加角斗士杀戮的角斗士们，都是罗马帝国在扩张的过程中从各地捕获来的俘虏与奴隶们。

历代罗马统治者曾经想要取消这样残忍的游戏，但是，由于罗马人非常喜欢观看这种嗜血的过程，所以统治者对此总是无能为力。只有当基督教信仰到来的时候，普罗大众在宗教情感的感召下，才认识到人生命的价值、灵魂的价值，因为耶稣基督为罪人死、使他们能够有永远的生命。到君士坦丁大帝的时候，由于他已经是基督徒，所以颁布法令、禁止角斗士游戏。不过，由于这个民间传统太根深蒂固，所以一时还不能在社会上完全禁绝。直到后来，有一位谦卑的基督教圣徒，冒死闯入角斗场，阻止正在进行的杀戮游戏，并被愤怒的观众们用石头打死。从那以后，罗马帝国再也没有角斗士游戏了。那位圣徒的死唤醒了罗马公众的良知。他的名字叫TELEMACHUS，死于公元404年。

基督教信仰在历史上也在阻止战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基督教信仰

以前，THUCYDIDES的论述非常有代表性："我们要记住，我们报复敌人是理所应当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利用武力来抒发自己的仇恨。面对敌人，我们决不能心慈手软"。然而，基督教的教导却是："不要为自己申冤，要听凭主怒"。在古罗马人的多神主义宗教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巨大差别，显而易见。在基督教信仰到来以前，罗马人为了争权夺利，为了征服别人，常常发动许多无谓而残酷的战争。无论是战争过程中还是战争结束以后，交战双方都非常残忍、毫无人道。今天，我们遗憾地说，在人类中，战事还没有完全止息；但是我们必须看见，基督教信仰对于人类的巨大、正面而积极的影响，使战争在很大程度被减少和减弱。

基督教导我们，我们若想要自己如何被别人对待，就也要如何对待别人。如果我们越多地明白这样的教导意义，在我们之间的战争就越会被减弱、甚至消除。今天，我们把文明国家之间所发生的侵略事件看作是极其严重的战争罪行。今天，我们要维护正义与自由，这样才能避免战争的流血。我们不再以攻城略地、围困敌人为傲。战场上的血腥战斗以后，不再有大规模的平民杀戮和彻底的城市毁灭。任何没有必要的武力和暴力行为都受到禁止。战场上的伤员得到红十字会的抢救和照顾。战俘被有尊严地对待。战败方的被占领区域得到正义的管辖和治理。

所有这些关于战争的规则与变化，在历史上都可以追溯到基督教信仰的巨大影响作用。甚至GIBBON在总结罗马帝国的灭亡的时候说道："由于基督教信仰的影响，战争的残酷性被大大降低。罗马帝国虽然灭亡了，但是，并没有发生战胜者大规模地残暴屠杀平民的事情，因为交战的双方都愿意相

信和接受基督教信仰”。在战斗中，修道院受到尊重，没有被战火波及。当军队来临的时候，人们逃到教堂里面避难，并在那里受到保护，免于战争的痛苦。

在基督教信仰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里，人们对于战争的观念普遍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公众心中，基督教信仰所唤醒的良知，甚至使他们愿意放弃复仇的甜蜜快感。1814年盟军战胜法国拿破仑军队的时候，由于盟军一方的基督教信仰的情感，巴黎没有被摧残。当时，在伦敦的一个口号是："法国人毁了莫斯科，但我们不要毁了巴黎"。

如果我们把当年希腊人与罗马人的历史与今天基督教信仰影响下的现代战争相比较，就会看见社会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在希腊与罗马时期的战争中，如果一个城市被打败了，那么，其中所有的居民就都会被劫掠，并全部会被贩卖为奴隶或直接被杀戮，不论其中的人群是士兵还是政府人员、富人、知识分子、无辜的妇女、以及年轻孩子的母亲等等。在我们的时代与古时的悲惨命运之间，无疑有着巨大差别。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这些变化都是由于基督教信仰所带来的、缓慢的、然而却是确定无疑的、人心之中的深刻变化。这些深刻变化提升了人们的道德情感，除去了他们的心中的固执偏见，纯净了他们心中的欲望；简而言之，把野蛮人变为文明人。这种变化，就是因着那位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教导和所成就之救恩而导致的。

请大家记住，我在前面所记述的那些古时之事，绝非是一些偶然的、少量的、不经常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那些都是史书中有据可查的、大量的、常规性的事情。这正如圣经罗马书1章29、31节所说的："这些人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心、阴险；满怀嫉妒、凶杀、好斗、欺诈、幸灾乐祸；又是好说谗言的、毁谤人的、憎恨 神的、凌辱人的、傲慢的、自夸的、制造恶事的、忤逆父母的、冥顽不灵的、不守信用的、冷酷无情的、没有恻隐之心的。" 那些在基督教信仰来到之前的古人，没有一颗恩慈怜悯的心，不愿意聆听悲惨之人的哀哭。他们所看重的，只是心肠刚硬地到处争权夺利；在他们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不信任、狡诈、仇恨、暴戾。

基督教信仰所带来的变化是奇妙的、令人震惊的。角斗场成为废墟。无家可归的穷人得到了居所。那些陌生人、老年人、病人、孤儿可以看病、可以得到收容、可以得到照顾的公共医院、孤儿院、疗养院在各地兴起，不论是大城市还是小村庄。那些过去残暴嗜血的百姓，现在热心于每日照顾那些贫穷困苦之人。富人不再吝啬。商人不再在眼目中只看利润。士兵不再只看工资。工人不再为小事斤斤计较、消极怠工。所有人都涌入教会这个大家庭，彼此以弟兄之情相待。虽然，在过去两千年的历史中，基督徒中间也常常存在偏见、属世之心，然而，若我们与基督教信仰到来之前的时代相比，就能够清晰地看见基督教信仰的巨大影响作用。许多恶俗传统都已经消失殆尽。事实上，从近两千年前基督教兴起的时候，直到今天，我们都能够看见一个稳定的、虽然缓慢但却持续前进的洪流，推动着文化与文明的发展，推动着那充满了自私情感的、如同僵化水池一般的人心。今天我们社会中的几乎所有公共事业与社会福利运动、以及与个人生活息

息相关的家庭事务，无论是医院、学校、法律、平等、救济，还是一夫一妻婚姻，等等都起源于基督教信仰的影响。这些事情对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影响作用是巨大而永久的。

【引述 《为基督教信仰之真实性辩护》 基督教信仰对于文明的影响，例如，在如何对待战俘、以及如何看待世人生命之尊贵性的方面、等等】

关于对基督教信仰的一些反对意见

马可福音14章56节：

有许多人作假证供控告他，但他们的证供各不相符。

我们在本章讨论一些常见的对基督教信仰的反对意见，以及我们的回应。限于篇幅，我们仅举三点为例。

I。在历史上，有些基督徒们【译者注：也包括天主教徒，即，在基督教宗教改革之前的、以罗马教皇为中心的形式】的行为表现很不好。

人类历史的书页总是被血腥玷污。有一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们，有时会彼此残酷迫害。有时，在基督教信仰的名义下，战争的号角被吹响，敌对双方的军队拼死搏杀。在一些监狱里面、在宗教裁判所，以信仰的名义，捆绑着囚徒。

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们，把所有这些坏事都归罪与基督教信仰。他们因此说，不想与干了这些坏事的基督教发生任何瓜葛。

对此我认为，反对者的意见既不公正，也不诚实。我想问，在日光之下，在人类历史上，在没有基督教信仰的地方，难道就不没有频繁的战争、无处不在的人与人之间的欺压、迫害了吗？难道，这个世界上若没有基督教信仰，就充满了和平与温情了吗？请看一看世界各地、人类历史中，那些没有信仰之人或异教者之间的长久的争斗、屠杀、劫掠、改朝换代、生灵涂炭、酷刑、逼迫，难道比基督教信仰的地区更好吗？难道，没有了基督教信仰，就处处是鲜花、和谐与和平吗？难道，人类历史上的那些血腥屠杀、不平等、罪恶，是基督教信仰引起的吗？难道在福音来到世上之前，人们就互相没有争斗、逼迫吗？自从福音来到世上以后，在基督教信仰以

外的国家和地区，难道就没有内战、弟兄相残、国与国之间频繁的战争吗？那些不认识上帝、不认识福音的世上国家，难道就是和平的吗？在那些地方，难道就没有战乱、荼毒吗？

我们必须要诚实地回答上述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要被仔细咀嚼、认真分析，然后，我们才能够得出诚恳、全面而正确的结论；我们才能说，基督教信仰究竟有没有导致人类中的战争，或是加剧人类之间的争斗。

事实是，在福音到来之前的人类历史，以及福音到来之后的、那些没有基督教信仰的各国各族的历史，都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类中间的战争从未就停止过，人类中间的不平等、欺压、迫害也从未停息过。许许多多国家都经历着频繁的改朝换代，社会结构和秩序周期性地崩塌，生灵涂炭，大规模的人口杀戮，等等。那么，人们怎么能说，基督教信仰是引致或加剧人类战争、迫害的罪魁祸首呢？那些罪恶之事，本来早已大规模地存在。谁能够摆出哪怕一点点的证据，来说明，在这个世界上的什么角落，若没有基督教信仰，社会秩序就更好、更和平、人们就更守道德、生命就更圣洁？

的确，我承认，在基督徒之间常有许多争论，甚至有时会有激烈的纷争。

我也知道，在那些没有基督教信仰的地方，有许多战争、打仗的风声，有许多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伤害、迫害。但是，这些能够证明什么呢？这只证明了，人就是人，人常常被自己的罪恶情感所胜过，以至于弟兄之间彼此伤害、残害。

然而，我必须要指出重要的一点。基督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软化了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减轻了战争所带来的残酷伤害。今天，与福音到来之前的古代时期相比，人们的战争虽然残酷，但是，在基督教信仰影响下，有一丝怜恤同情的光明、人道主义的关怀。比如，战俘会受到人道的对待；战败的国家与城市不会受到大规模的奸淫和劫掠。而这种人道主义现象，往往在那些非基督教信仰的国家很不常见。

是的，我承认，在历史中，在基督徒中间有时会有争执、纷争、甚至战争。但是，难道人们为了食物而发生争执，就说明了食物是不好的吗？难道人们为了钱财而争斗，就要毁掉世上的钱财吗？难道这些事情，就说明了食物和钱财是罪恶之物吗？

的确，基督徒之间的争执与争斗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客观事实。可是，为什么不看整件事情的全貌呢？为什么不看所有历世历代一切事情的综合全局呢？为什么不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充斥着战争以及人与人之间

的斗争呢？为什么不说，无论在哪一个国家中，无论在哪一种宗教信仰体系中，都有那些自私自利、战乱、弟兄相残、以及虚伪之人呢？为什么不说，那些没有信仰的人，就像是前不久法国的那些人文主义者、无神主义者们一样，发动的冗长战争呢？为什么不分析，法国在无神主义的影响下，爆发的大规模战争与迫害，乃至皇宫与葡萄园都荒芜了呢？难道大家都忘记了这些铁的事实了吗？我听说，盗贼们往往喜欢混在人群中，大喊："抓贼啊！抓贼啊！"而他们的目的，不过是转移人们的注意力，然后自己行更多的偷盗之事。现在，那些借口基督教信仰会带来坏事、所以要抛弃基督教信仰的、无神主义者们，他们不就像是那些贼喊捉贼的人吗？难道他们不是正在让世人去注意基督徒们所作的错事，然后自己在世界中大行拆毁、偷窃、杀戮之事吗？

的确，我承认，曾经有一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互相毁灭、相咬相吞。但是，如果有人说这是基督教信仰所直接导致的后果，那么，我坚决反对。谁能够向我指出来，在基督的道德教导中，有哪一条、哪个字、哪个词、哪个音节，是允许或容忍任何逼迫、战争之事呢？难道基督教导我们要去争斗吗？难道他教导门徒们要去互相迫害、撕咬、吞噬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绝没有。在基督的话语中，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教导。恰恰相反，基督严厉地禁止报复、复仇，禁止逼迫、陷害、迫害他人。当耶稣被抓捕、即将被送审、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个门徒想要拿出刀、进行战斗，但耶稣立刻制止他，并严厉地指责了他。我要在这里强调，在这世上的各个宗教信仰体系中，基督教信仰是唯一地强调应当饶恕、宽容、原谅、爱你的仇敌。在伊斯兰教中，以及在其他各个异教迷信传统文化中，报仇常常被当作是最高的美德之一；那些牺牲的、或自杀的穆斯林圣战战士们，被可兰经应许会得到天上最丰富的报偿。在这世上，在基督教信仰

以外，所有宗教信仰体系以及非宗教思想体系，都推崇要以严厉的态度、霹雳的手段，来对付敌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只有基督教信仰大声疾呼：当爱你的仇敌，当以和平的心、良善的愿望对待一切世人。

马太福音5章43-48节：

43“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44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45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46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甚么赏赐呢？税吏不也是这样作吗？47如果你们单问候你们的弟兄，有甚么特别呢？教外人不也是这样作吗？48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可是，在如今的社会，在人文主义、无神主义等等泛滥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许多人却把那唯一主张“饶恕人、爱仇敌、与人和平”的基督教信仰，当作成了许多战争、欺压、恶事、冲突的罪魁祸首，——只是由于，历史上某些自称接受基督教信仰之人所作的那些违反耶稣基督教导、违背福音原则的恶事！这样的指责，是来自什么样的人的口中呢？为什么是来自那些推崇武力、信奉杀戮、献身圣战的异教信仰者们口中呢？为什么是来自那些发动血腥战争的无神主义者口中呢？即使这些人所指责的、历史上那些所谓基督徒们所作的事情都是事实，那又说明了什么呢？难道不恰恰说明了，那些所谓基督徒们，正是违背了福音的原则，背叛了他们的主耶稣基督吗？如果说，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能够指出，耶稣基督，不论是

通过他的教导、还是通过他自己的生命榜样，鼓励暴力、战争、复仇，那么，这些反对者们或许可以说，他们对基督教信仰的反对是有理有据的。但是，他们根本不能指出这样的例子。只要圣经——这本神圣的书所包含的上帝启示、基督话语、道德教导，是告诉我们要爱人、避免冲突、谦卑、和平，那么，——那些上述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们就是无理无据的。事实证明了，不是基督教信仰导致冲突和战争；而恰恰是，基督教信仰、福音精神的缺失，导致了冲突与战争、人与人之间的刀剑相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引述 《圣思录》 中国历史上的十四次人口灭杀】

以下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些残酷战争记录：

中国历史上规模较大的人口灭杀事件，都是战争造成的。古代中国的战争非常频繁，在商朝的《卜辞》中就记载了各种战争61次。而据《春秋》记载，在春秋时期242年间，各种战争达448次。到了战国时期，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

战国时的秦人嗜好战争，他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臂夹着俘虏，追杀自己的对手。司马迁记载:秦国攻魏杀8万人，战五国联军杀8.2万人，伐韩杀1万人，击楚杀8万人，攻韩杀6万人，伐楚杀2万人，伐韩、魏杀24万人，攻魏杀4万人，击魏杀10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前262年，击赵白起杀42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又攻赵杀9万人。以上不完全统计，杀人已达130万之多。此外，秦人战死的数字还没有计入。

战国末中国人口2000万人。可中国军队却远远超过欧洲。秦始皇守五岭用兵50万，防匈奴30万，修长城50万，造阿房宫秦皇陵的130万（其中受宫刑者达70多万人）。以至于“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汉书·严安传》）。

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有一颗流星落下，有人在陨石上刻字:“始皇死，土地分。”秦始皇就把陨石坠落地周围居住的人，全部杀了。

秦始皇的后宫姬妾，凡没有儿子的，全部殉葬。修造墓地的工匠，在葬礼完毕之后，20多万役卒全部封在墓里，死于非命。以后凡修皇陵的民

工几乎都是同样悲惨的下场。

下面是历史记载的14次较大规模的人口灭杀事件:

中国历史上十四次人口大屠杀 - 1.秦末农民战争

从公元前205到公元前195年西汉建国初，共历10年。秦朝末年全国有2000多万人口，到汉初，原来的万户大邑都只剩下两三千户，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也就是说，大城市的人口剩下十分之二三。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现象（《史记·平准书》）。

中国历史上十四次人口大屠杀 - 2.汉武帝伐匈奴

汉武帝在位50多年（前140-前87），几度讨伐匈奴，海内虚耗，人口减半，50%的人死亡。

中国历史上十四次人口大屠杀 - 3.西汉末年混战

公元2年，全国人口5959万。经过西汉末年的混战，到东汉初的公元57年，人口只剩下2100万，损失率达65%。20年间，西安的人口从68万减到28万，大荔从91万减到14万，兴平县从83万减到9万，绥远县从69万减到2万。

中国历史上十四次人口大屠杀 - 4.三国鏖战

公元156年，人口5007万。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三国志》记载：265年，蜀国灭亡，“男女口94万”，280年，吴国灭亡，人口245万。《晋书·地理志》记载：公元280年，西晋统一，统计得人口为1616万人。诗人描述为“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

百余一，念之断人肠”。由于三国前期人口流亡众多，战乱频繁而无法统计，军阀割据而信息不全，三国前期人口数是历史盲区。

中国历史上十四次人口大屠杀 – 5.晋十六国角逐

八王之乱

从公元291年开始，先后有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长沙王、河间王、东海王越及成都王颖八王为争夺皇位，在洛阳相互攻杀，战乱历时16年之久，死亡人口达数十万，许多城镇均被焚毁，史称“八王之乱”。“八王之乱”使西晋初年并不十分发达的经济，受到更为严重的破坏。与此同时，关东地区又爆发了罕见的蝗灾和瘟疫，史载“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进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 公元311年，刘曜攻长安，关中地区的人口仅余原人口的1%-2%。 实际有很多人口是被缓冲带的坞壁组织吸纳进去，这是以前对“坞壁林立”现象的忽视导致的。

后赵地盘很小，皇帝却有五个皇后，一万多名姬妾宫女。他死了以后，儿子日夜与五个皇后母亲淫乐，被岳父杀掉，灭绝了皇族。

皇帝石虎，一次征集美女3万人。仅公元345年一年中，因征集美女而不情愿者被杀达3000余人。为容纳美女，石虎分别在邺城、长安、洛阳兴建宫殿，用人力40万。而朝廷的苛捐杂税，迫使缺衣少食的农民卖儿卖女，卖完后仍然凑不够，只好全家自缢而死，道路两侧树上悬挂的尸体，

前后衔接。前燕进围邺城，后赵的数万宫女，不是饿死，就是被士兵烹食。

石虎的长子石宣，害怕弟弟石韬跟自己夺位，先派人刺死石韬，再密谋干掉老爹提前接班。事败之后，石虎立即登上高台，将石宣绑到台下，先拔掉头发舌头，砍断手脚，剜去眼睛，扔进柴堆活活烧死。石宣所有的妻妾儿女，全都处斩。石宣的幼子才5岁，拉着祖父的衣带不肯放松，连衣带都被拉断，但仍被硬拖出去杀死。太子宫的官吏差役数千人全被车裂。石虎死后，登基33天的儿子，被另一个儿子杀掉。183天后，又被另一个儿子杀掉。103天后，一名汉族将军冉闵杀尽皇室，下令:“凡杀一个胡人者，官升三级。”霎时间，仅首都邺城屠杀胡人20万，总共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

中国历史上十四次人口大屠杀 - 6.南北朝混战

北朝的北齐，辖有2000万人口，到北周时人口仅900万。南朝刘宋辖有469万人口，到南陈灭亡时只剩200万人，损失率达60%。

中国历史上十四次人口大屠杀 - 7.隋朝役民

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文帝杨坚的次子杨广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了父亲和哥哥杨勇，霸占父亲最宠爱的陈夫人。他扩建洛阳皇宫，每月役丁200万人。修运河，隋炀帝“诏发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俱要至。如有匿之者斩三族”，役夫达543万余人。昼夜开掘，男人不足，女人充数，死者过半。如此浩大的工程，其目的只是为了满足隋炀帝到江都享受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又三次率军进攻高丽，伤亡无数。

隋末至唐初，从公元611到628年18年间，兵变、民变和宫廷政变共136次，有50多位称帝称王者，均统兵15万人以上，各据一方，相互混战。全国户数由890万减至290万，人口由公元606年的4602万人，减到639年的1235万人，损失率73%。

中国历史上十四次人口大屠杀 – 8.安史之乱

公元755年至公元763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历时8年。唐朝皇帝为夺回江山，竟乞求匈奴、回纥帮忙收复洛阳，应允其任意抢掠三日，使洛阳成了一片废墟。历时8年的残杀，使黄河流域萧条凄惨，人烟断绝，兽游鬼哭。中国人口从900万户锐减至200万户，3/4的人惨死于变乱之中，残存者以纸为衣。公元755年，全国有5292万人口，到760年，全国人口仅余1699万。损失率68%。

中国历史上十四次人口大屠杀 – 9.黄巢起义及唐末之乱

当时有一句俗语:“黄巢杀人八百万——劫数难逃。”黄巢占长安，其部属“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待到官军反扑长安，城内百姓都向着官军，“巢怒，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

黄巢所过之地，百姓净尽、赤地千里。《旧唐书》记载:黄巢率领全军围陈州近一年，数百(一说三千)巨碓，同时开工，成为供应军粮的人肉作坊，流水作业，日夜不辍。将活生生的乡民、俘虏，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纳入巨舂，顷刻磨成肉糜，并称之为“捣磨寨”。陈州四周的老百姓被吃光了，就“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

唐末到五代十国，前后历时80年，中国内外一片混战，亿万生灵涂炭。前后58个皇帝，有42个死于非命。

唐武宗（841年-846年在位）时，全国有496万户，后周世宗（955年-960年在位）进，仅余120万户。到宋初为200万户。损失率76%。

中国历史上十四次人口大屠杀 - 10.金、元灭两宋

宋宣和三年（1122年），全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至元十一年（1274年），人口仅剩887万。损失率高达91%。

蒙古人灭花剌子模，屠杀撒马尔罕城约百万人；灭西夏，屠八十余万人。蒙古人数次西征，凡有抵抗即屠城，共屠数百城，包括屠杀了巴格达的数十万人口，整个中亚一片废墟。

忽必烈屠杀了中国1800万人，中国北方地区有90%的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四川在蒙古大军屠杀前，估计有1300万—2000万人，屠杀后竟然仅剩下不满80万人，几乎成了无人区。在蒙古军队的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蒙古人在中国境内实施的种族灭绝，作为世界纪录，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1985年版。

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如果杀死蒙古人要偿命，杀回回罚银80两，杀汉人则只需罚交一头毛驴的价钱。汉人娶新媳妇，头一夜一定要让给蒙古保长，中国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

也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

中国历史上十四次人口大屠杀 – 11.元末混战

元人陶宗仪所著的《南村辍耕录》里说，“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男子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他们把人肉叫做“想肉”，意谓食之而使人想也。“淮右之军”即朱元璋之军，这个吃人上瘾的军队，何尝考虑过民意！

明朝的开国者朱元璋出身微贱，生性残暴。他在生计艰难之际为郭子兴收留重用，完全借郭子兴而兴，得势后却忘恩负义。朱元璋的好友杀了都元帅，朱元彰又杀了好友，当上都元帅。1366年，朱元彰救应遭难的皇帝，在龙舟上把皇帝推入长江，建立了明朝。他杀来杀去，先征服了中国人，才转向驱赶已经式微的蒙古人。

夺得天下后，朱元璋翻脸不认人，“火烧独角楼”，大杀功臣、朝臣。据史书记载，胡惟庸、李善长、蓝玉三案总共杀人达10万之多。朱元璋在位30年，杀人20万，基本上将功臣杀光。连毫无二心的幼时放牛娃朋友徐达也不放过，可谓冷酷残暴到了极点。

朱元璋赐给常遇春美妾，可常遇春的元配砍掉了美妾的手。朱元璋派人杀了常遇春的元配，将其肋骨砍成小块煮熟，由朱元璋分发给常遇春及众大臣食用。

明朝最著名的酷刑莫过于“剥皮楦草”，就是将一个活人的皮剥下来，再塞上草。历史上的皇帝很少用这种酷刑，只有土匪、流寇和酷吏才下得了手，而明初的几个皇帝竟都乐此不疲。剥皮时如果让被剥皮者早死了，明朝竟规定:“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

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剥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无须审判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他惩治官僚，如空印案、郭桓案，数万人被连累致死。因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刑的，每年都有数万人。但明王朝最终仍然陷于腐败泥淖而不能自拔，严嵩的贪污款就相当于好几年的国防预算！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用了46名妃妾、宫女殉葬。在以后的70年中，这种野蛮的制度又在皇帝与诸王中流行。

朱棣比起乃父来，毫不逊色。1402年，他夺了亲侄子的皇位，导致几十万人战死沙场。建文帝宫中的宫人、女官、太监被杀戮几尽。他曾一次枉杀1.4万多人。他还将忠于建文帝的旧臣如方孝孺等人全部杀死。仅方孝孺一家，灭“十族”就杀掉873人！对于方孝孺的妻女，丧尽天良的朱棣竟把她们送进军营，让士兵轮奸，一个女子一日一夜要受20余名男子的凌辱。有被摧残致死的，朱棣就下圣谕将尸体喂狗吃。永乐末年，他大肆屠杀宫女、宦官，在这次大惨案中，被杀的宫女有3000人之多。

明成祖死亡（1424年）的当天，30多名宫女都被饷之于庭，吃完以后，被带上殿堂，哭声震动殿阁。殿堂内置有小木床，使宫女立在床上，梁上结有绳套，把她们的头放在圈套中，然后撤掉小床，将其吊死。据说，这样殉葬比活埋要痛快得多。

中国历史上十四次人口大屠杀 – 12.明末混战

从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明末清初国内混战54年。明末全国人口为1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80%多，损失人口8000多万。

1628年（崇祯元年），陕西的大饥荒弄到人相食的地步，正是这场空前的大灾难拉开了明王朝灭亡的序幕。李自成的大顺军的战马，饮的是俘虏的血。战马饮惯了血，对水不屑一顾。上了战场，战马一闻到血腥味，奔腾嘶鸣，眼睛发红，简直像狮子一样。大顺军打下安徽桐城，百姓箪食壶浆，以迎义师。一名农民在城门口拦住几名大顺军兵士，向他们讲述自己的苦难。一个大顺军小头目说:“哎呀，你既然那么苦，何必活在世间？”就把老农杀了。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初九，张献忠攻陷成都，下令屠城三日。三日过了，停止大杀，仍然每日小杀百余人以树威。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所著《圣教入川记》记载，张献忠每日杀一二百人，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10万，亦不算多。清军一来，他就逃了。在大军逃离成都前，更是对成都实行残酷的“四光政策”，尽杀蜀人，从老百姓到军队家属（老弱病残）再到他部队中的湖北兵、四川兵，最后连早期跟随他出生入死的秦兵也在剐杀之列，剐杀后制成腌肉以充军粮。单就此点来说，实在独步中国大屠杀史。

据《蜀破镜》记载，某日晚，张献忠的幼子经过堂前，张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晨起后悔，责问妻妾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杀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

张献忠学朱元璋剥人皮，“先施于蜀府宗室，次及不屈文武官，又次及乡绅，又次及本营将弁。凡所剥人皮，渗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于王府前街之两旁，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如送葬俑”。张献忠创造了许多杀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将军们四面出击，“分屠各州县”，名曰“草杀”。上朝的时候，百官在下边跪着，他招唤数十只狗下殿，群狗嗅到谁，就把谁拉出去斩了，这叫“天杀”。他想杀读书人，就开科取士，将数千四川学子骗来杀光。

每屠杀一地，都详细记录所杀人数，其中记有人头几大堆，人手掌几大堆，人耳朵几大堆。打下麻城后，他把妇女的小脚砍下来堆成山，带着他最心爱的一个小妾去参观。小妾笑着说:“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双秀美的小脚放在顶端，就再好也不过了。”张献忠笑眯眯地说:“你的脚就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脚剁下来放到“山尖”上。张献忠兵败溃退，更是杀妇女腌渍后充为军粮。如遇上有孕者，刨腹验其男女。对怀抱中婴幼儿则将其抛掷空中，下以刀尖接之，观其手足飞舞而取乐。稍大一些的儿童或少年，则数百人一群，用柴薪点火围成圈，士兵在圈外用矛戟刺杀，看其呼号乱走以助兴致。

《温江县志》上说，温江县由于张献忠的屠剿，“人类几灭”。张献忠

死去13年后（1659年），县里清查户口，全县仅存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记载:“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14户。”

满族征服汉族，始终贯彻一个既定方针:屠杀。对蒙古人和朝鲜人却不是这样。努尔哈赤的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杀穷鬼”。两年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共杀辽民300多万，辽东地区的汉人基本被杀光。皇太极破锦州，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

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数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没有一人敢反抗，甚至没有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清军在江阴一县，就杀了17万人，全城仅50人幸存。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人。1649年，清军占领湖南湘潭后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的反清暴乱，大同全城军民被屠尽，“附逆抗拒”州县及汾州全城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攻破广州时屠城，“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

张献忠的屠杀与清兵入侵，使四川人口由600多万锐减至50万，只剩下10%左右。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胆敢反抗的居民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此外，满清又杀苗民100万，杀回民数百万，把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杀到只留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

满清入关后，对明代朱姓宗室，可谓残酷至极。除鲁王朱以海一系逃至菲律宾得以存留外，其余几乎全部斩尽杀绝。崇祯的长子被多尔衮绞死，其次子隐姓埋名在民间数十年，不慎暴露了身份，年已70多岁的他，和他的两个儿子仍被康熙帝下令凌迟处死。明朝永历帝尽管逃到了缅甸，还是被清朝抓回云南，全家被杀。

中国历史上十四次人口大屠杀 - 13.清代的白莲教起义（1796-1805）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全国人口为3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全国人口为2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1亿人口。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9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州县达204个，抗击清政府从16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弁400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20余名。清政府耗费军费2亿两，相当于4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

中国历史上十四次人口大屠杀 - 14.太平天国起义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义军在起义后的6年中，不过牺牲4000余人。然而1856年的内讧，洪秀全利用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及亲信6000余人，又在天京大开杀戒，两个月总共杀了文武官员2万人。后来又利用石达开来天京靖难，凌迟处死韦昌辉，将其尸体寸磔，割成许多块，每块皆二寸，挂在各处醒目的栅栏处，标上"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的字样，真是惨厉之至。"洪杨之变"最终导致了十几万人被杀。

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率湘军攻入“天京”后，杀害数十万人。整个天京城所余3万多名太平天国将士，无一投降，全部战死或者自杀。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最多时有100万人口，到光绪登基时，十几年的时间，南京只剩下不到50万人口。

太平天国爆发（1851年）前夕，中国人口为4.3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人口只剩下2.3亿人。一场农民战争使中国损失了2亿人，其中只有4000万人直接死于战争，这是何等的残酷！以后直到1911年，全国人口才恢复到3.4亿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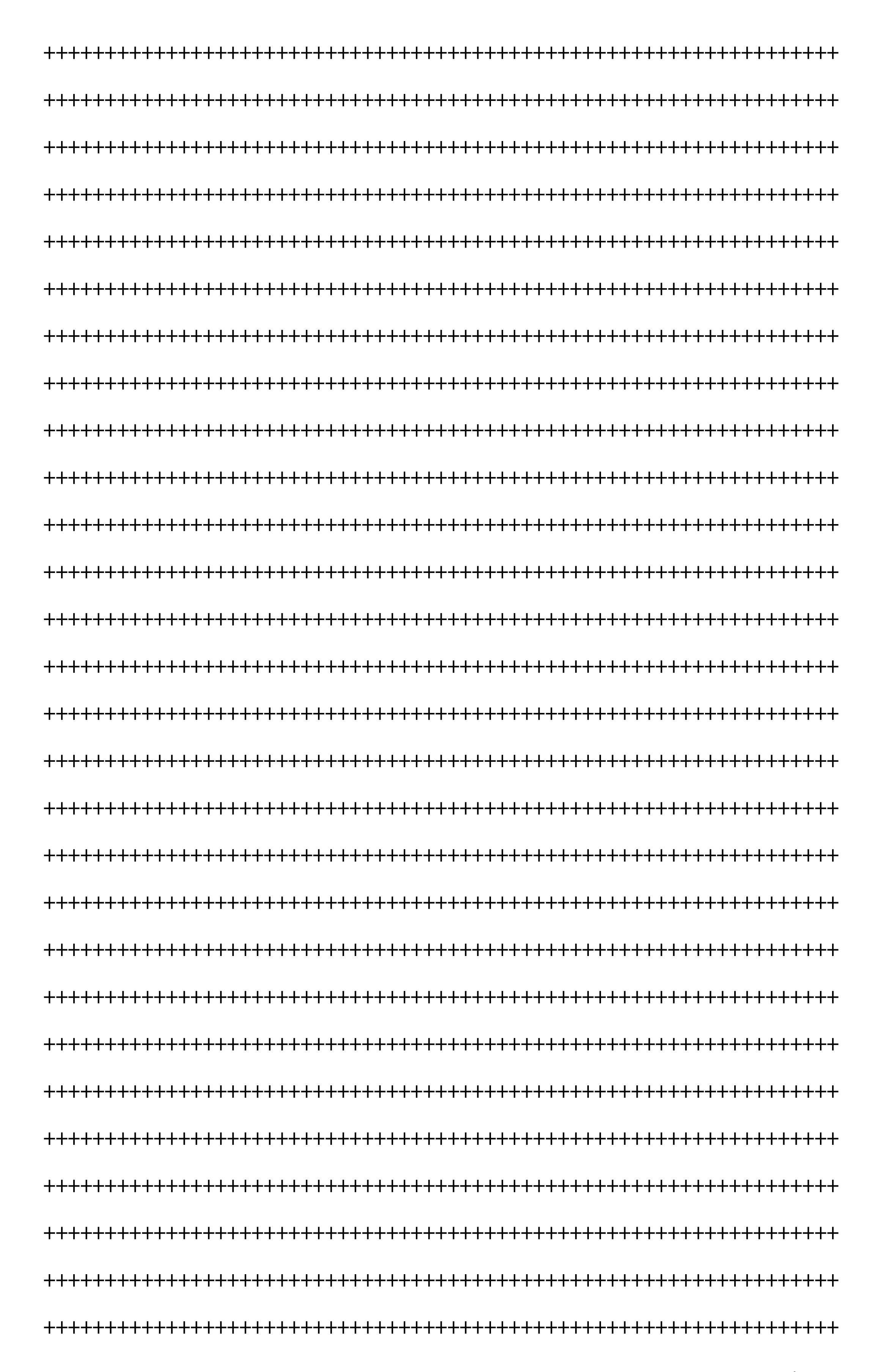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继续讲述 1937年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历史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6%E6%B1%89%E4%BC%9A%E6%88%98

武汉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一场横跨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浙江省及湖北省等广阔地域大规模战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领导中

国第5、第9战区部队，以湖北武汉地区为中心，抗击由华中方面军总司令畑俊六指挥的大日本帝国陆军。该战役共进行了四个半月，是中国抗日战争初期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庞大和最出名的战役。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日加列夫、特霍尔率领苏联航空志愿队支援中国。

武汉会战包括有：马当战役、九江战役、黄梅战役、广济战役、田家镇战役、瑞昌战役、马头镇战役、星子战役、万家岭战役、富金山战役、信阳战役。

背景

1937年7月7日，日军对中国实施全面入侵，北平及天津不到一个月落入日军手中，整个华北平原暴露在日军面前，11月12日日军攻占上海，南京有陷落的危险，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于是宣布迁都重庆市，在上海、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及民营部门、大批难民、以及各种战略物资大举西迁至西南重庆，其中大部分因运输不及仍滞留于武汉。加上武汉原有的工业、经济、文化基础，到1937年底，武汉已成为国民政府的实质首都。因此在1938年，武汉周边集结了国民政府的大量资源，包括自苏联所得到的军事及技术援助（苏联航空志愿队）。

日本方面，由于1937年开始的诸次军事行动让日本感到兵源匮乏开始逐步增兵，增兵加上前线开销使得日本平时经济体系无法负荷；军费的开销迫使近卫文磨于1938年改组内阁，并于同年5月5日发布国家总动员法，日本自此正式进入战时经济体制。

战时经济体制的推行虽然减缓了日本财政破产的速度，但是长久下去并非办法，加上对苏联军事实力的顾虑， 日方急欲在短期内迅速逼垮国民政府，以便聚集更多资源以便进行北进以及南进政策。正如日本天皇裕仁在武汉会战前的御前会议中所说，要给国民政府最后致命的一击，迫使中国

投降，不愿再见到“帝国雄师百万受制于中国”。因此日本对于武汉会战也是倾举国之力，孤注一掷。据战后发现日军文件所述，“陆军为汉口作战倾注了全力，没有应变之余力”，连日本本土仅留的一个近卫师团也待命随时准备增援武汉。

武汉的重要性

武汉位于长江中游，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城市，人口超过二百万，该市被长江及汉水分成三部分： 武昌、汉口及汉阳，武昌是政治中心，汉口是商业的集中地及汉阳是工业重镇，在粤汉铁路和京汉铁路建成后，它是中国内陆的重要交通中心，同时也是将南方港口运来的对外援助运往内陆的枢纽。日军侵占南京(参见南京保卫战)后，国民政府虽西迁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却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和战时首都，当时中国的军事力量集中保卫武汉，日本政府及中国远征军总部均预期武汉陷落将令中国停止抵抗。

战前准备

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定保卫武汉作战计划。在徐州失守后，即调整部署，先后调集约50个军130个师和各型飞机200余架、各型舰艇及布雷小轮40余艘，共100万余人，利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地区有利地形，组织防御，保卫武汉。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7月中旬～9月中旬由白崇禧代理）指挥23个军所部负责江北防务；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27个军负责江南防务。另以第一战区在平汉铁路（今北京一汉口）的郑州至信阳段以西地区，防备华北日军南下；第三战区在安徽芜湖、安庆间的长江南岸和江西南昌以东地区，防备日军经浙赣铁路（杭州一株洲）向粤汉铁路（广州一武昌）迂回。

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后，积极准备扩大侵略战争。决定先以一部兵力攻占安庆，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然后以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以北地区，由武胜关攻取武汉，另以一部沿长江西进。后因黄河花园口决堤，日军被迫中止沿淮河主攻武汉的计划，改以主力沿长江两岸进攻。4日，日军司令官畑俊六指挥第2、第11军共约140个大队35万兵力负责对武汉的作战。以冈村宁次指挥第11军5个半师沿长江两岸主攻武汉；东久迩宫稔彦王指挥第2军4个半师沿大别山北麓助攻武汉。以及海军及川古志郎第3舰队120余艘舰艇，日本第一个飞上天的飞行员德川好敏男爵中将的航空兵团500余架飞机，另以华中派遣军直辖的5个师团分别担任对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区的警备任务，以巩固后方，保障此次作战。

序幕

武汉会战的战火在1938年2月18日于日军的空袭中展开，这场空战被称为二一八空战，中国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3月24日，日本国会通过了国家总动员令，授权政府可无限投入经费支持战争，作为总动员令的一部分，国民征用令亦容许日本政府征兵。

4月29日，日本陆航对武汉实施大规模轰炸以庆祝裕仁天皇的生日，中国方面由于事前已知道其目的加强准备，该场战役被称为四二九空战，是中日战争中其中一场最大规模的空战，中国空军共击落日机21架而只损失了12架飞机。

在1938年5月徐州陷落后，日本政府计划大规模入侵汉口及攻占武汉，以消灭国民革命军之主力，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亦在准备武汉周边的部队整训以及防线规划，因而在武汉附近集结了超过一百万的军队、大约200架飞机

及30艘军舰防守武汉。并在河南地区设置了前缘防线滞迟徐州当地日军的进攻，但由于中日实力悬殊使得河南防线迅速崩溃；为了争取到更多时间以加固武汉之防卫，国民政府在6月9日于郑州花园口自行炸开黄河堤坝，称为花园口决堤事件，并宣称决堤乃日军所为。花园口决堤虽阻延了日军对武汉的进攻，但是亦导致500,000至900,000名平民死亡，这亦导致1939年华北很多城市出现泛滥。

主要战场

长江以南

6月13日，日军登陆部队占领安徽省会安庆市。这被视为武汉会战的开端，在长江南岸，中国第9战区在鄱阳湖以西部署了一个团，另一个团被部署在江西省九江市一带。6月29日，日军舰队通过马当水闸。日本第11军的主力沿长江南岸进攻，日军波田支队于7月23日在九江市以东登陆，中国军队虽然尝试阻止，但未能阻止日军第106师团登陆及在7月26日攻占九江，波田支队沿长江西进及在8月10日于瑞昌市东北登陆及进攻该城，防守的国民革命军第2兵团在得到第32集团军的增援下实施阻击，但是当日军第9师团加入进攻后，中国军队无力再战及瑞昌终于在8月24日被占领，第9师团及波田支队继续沿长江前进，而第27师团则同时进攻箬溪，中国军队第30及第18军团沿瑞昌-箬溪公路及附近地区抵抗，战况彊持了一个多月，直至10月5日第27师团攻占箬溪后，日军转向东北前进在10月18日攻占了在湖北省的辛潭铺及向达之前进。

与此同时，日军及江上支援舰队继续沿江西进及在瑞昌西面遇到中国第31军及第32集团军的反抗，当马当镇及富金山 (在阳新县)被攻占后，中国第2兵团部署了第6、第56、第75及第98军连同第30集团军加强江西地区的防御，战役直至10月22日因中国丧失了在阳新县、达之及在湖北省的其它城镇才结束，日军第9师团及波田支队接近武昌。

万家岭

当日军进攻瑞昌时，日军第106师团在南面沿南浔铁路(南昌市 – 九江市)前进，防守的中国第2兵团第29集团军及第4军和第8集团军倚仗庐山及南浔铁路北面抵抗，结果日军溃退失利。

8月20日日军第101师团从湖口县渡过鄱阳湖增援第106师团，他们突破中国第25军的防线及攻占新芝，又与第106师团协同尝试攻占德安县及南昌市，以保障西进日军的南翼，中国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利用第66军、第74军、第4军、第29军会同第25军与日军在马当要塞及江西省德安县以北爆发激战，战况陷入僵持状态。

接近9月底，日军第106师团以4个团的兵力迂回至德安县以西的万家岭地区，薛岳命令第4军、第66军及第77军侧击日军，日军第27师团试图增援，但被埋伏在万家岭以西百岁街的中国第32军军长商震阻击，10月7日中国军队实施最后总攻击以包围日军，激战持续了三天，全被中国军队击退。

10月10日由于遭到孤立及缺乏补给，日军第106师团（由于有部分兵力驻守九江，实际参战人数约1万3千人）以及前来援救的第101师团，第27师团，第9师团，4个师团遭受重创，而且在武汉会战中投入的青木、池田、木岛、津田，四个旅团，在包围圈被歼灭；并且丧失指挥作战能力，所以紧急空投数百名军官；4个师团最后仅仅约略1500残部兵力突围逃出，中国方面史称万家岭大捷。

战后，公元2000年，日本战史承认，第101师团、第106师团、第27师团，第9师团，4个师团遭受重创，及其辖属旅团、联队、大、中、小、支队，确为伤亡惨重、损失极大。神社中，祭拜战死人数，呈倍数增加，在当时，确是不敢承认，是为稳定社会、安定民众信心。

长江以北

在山东，石友三1,000名流动部队打进济南城，坚守几天；游击队短时间占领烟台。常州以东到上海一带是“忠义救国军”控制，名义上司令官是戴笠，在上海郊区和黄浦江对岸一带游击，由青帮和洪门组成，暗杀间谍和汉奸，牺牲100多人；8月13日“忠义救国军”潜入日军虹桥机场升起一面中国国旗。在长江以北，日军第6师团在7月24日自安庆突破了中国第31及第68军的防线，在8月3日攻占太湖县、宿松县及黄梅县(属于湖北省)，当日军继续西进后，中国第5战区第4兵团部署兵力在广济、湖北及田家镇以迎击日军，第11集团军及第68军被命令在黄梅县布置防线，而第21集团军、第26军及第29集团军向南移动以侧击日军。

中国军队在8月27日收复太湖县及8月28日收复宿松县城，但8月30日日军增援，第11集团军及第68军发动的反攻不成功，他们后撤至广济连同第26、第86及第55军抵抗日军，第4兵团命令第21集团军及第29集团军从黄梅东北侧击日军，但未能阻止日军前进，9月6日广济失陷，9月8日第4兵团反攻收复广济。9月8日武穴失陷，日军之后包围田家镇要塞，第4兵团利用第2军增援第87军防守要塞，及以第26、第48及第86军协同侧击日军，但是面对拥有强大火力和丰富作战经验的日军遭遇巨大伤亡，日军在9月29日攻占田家镇要塞及继续西进，于10月24日攻占黄陂及追近汉口。

大别山

在大别山以北，第五战区第3兵团将第51、第19集团军及第77军部署在安庆的六安及霍山地区，第71军防守富金山及固始县(隶属河南省)地区，第2集团军在河南省的商城及湖北省的麻城，第27集团军及第59军在黄河地区及第17军团在信阳组织防御。

8月底日本第2军分两路从合肥进攻，南路的第13师团突破了国军第77军的防线、攻占霍山及转向叶家集，邻近的第71军及第2集团军利用已有阵地抵抗，第13师团进攻受阻及要求第16师团增援，9月16日日军攻占商城，守军撤至商城以南地区，依据大别山的战略据点继续抵抗，10月24日日军攻占

麻城。

北路的日军为第10师团，他们突破了国军第51军的防线和在8月28日攻占六安，9月6日他们攻占固始县城及继续西进，国军第27集团军及第59军集结在黄河地区抵抗，经过十日的激战，日军在9月19日渡过黄河，9月21日第10师团击破国军第17军团及第45军，攻占庐山，他们继续西进，但面对国军在信阳以东发动反击而退回庐山，日本第2军利用第3师团增援，与第10师团协同进攻信阳，10月6日迂回到新塘及攻占平汉铁路的柳林车站，10月12日日本第2军攻占信阳及进至平汉铁路南面，会同第11军一同进攻武汉。

广东作战

由于武汉地区的战事仍然僵持，中国自国外的战争物资仍持续自南方港口输入，日军在此时决定抽调3个师的后线部队对中国的海上生命线施加压力，故决定以两栖登陆的方式占领广东沿海港口。由于广东地区的粤军主力多抽调支援武汉会战，故占领的步调出乎各方意料的顺利，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广州地区沦陷。

日军在各处的攻击接连告捷，同时完成包围武汉的行动。因为广东的失守让武汉的战略地位不再重要，固守亦失去实质意义，为了保全有生实力国民政府决定弃守武汉，日军在10月26日攻占武昌及汉口、10月27日攻占汉阳，日军完成攻占武汉三镇的行动。

化学武器的使用

根据吉见义明及星野松野的资料，日本陆军大臣发出“临参命”对中国人使用化学武器，在武汉战役期间，闲院宫载仁亲王传达天皇命令，从1938年8月至10月在375处使用有害气体，虽然海牙公约第23章、凡尔赛条约第171章及华盛顿条约有关在战争中使用潜艇和有害气体的条款第5章已禁止使用化学武器，而国际联盟在5月14日的决议亦被日本皇军采纳。

总结

经过四个月激战，国府空军耗损极大，海军基本被消灭，日军成功攻占武汉，但是国军大部分主力仍在，日军被削弱。日本战前目的是在武汉作最后决战、以消灭国军主力及结束战争目的未能达到；战争争取到时间成功让转移至华中设备以及人员迁移至西南地区，为以后能长期坚持抗战奠定基础。日军在华中发起数次战役皆无重大斩获，中国战场陷入僵持。裕仁决定不再作战略准进攻，以维持现状为目的。可以作有限进攻，或让新兵练习实战。直至1944年一号作战前，日军再没有大型作战与武汉会战规格相同。

畑俊六所率南北两路日军艰难的突破50个中国军拦截，突入武汉外围，鉴于武汉外围已无险可守，国民政府以持久战略考虑放弃武汉，退至重庆。11月2日，表面上风光无限的畑俊六乘军舰抵达武汉。在武汉会战前中国有100万正规军队加上200万地方军，但是武汉会战后还有300万正规军队，不包含地方军。而日本已经用尽全力，国内只剩一个师团了。人口数大幅度降低，无法支应战事。战局不可避免的走向日本最感痛苦的长期消耗战。

会战期间，以卢作孚为首的民族企业家运送大批军队及作战物资到前线，将武汉地区大批工业装备和人员转移到四川，在敌机狂轰滥炸下，川江航线为抗战胜利立下殊勋。总计日军对西南大后方，投弹60,174枚；重庆受创最烈，尤其是5月3日至5月4日，落弹上万枚，伤亡惨重。此外，苏联航空志愿队参加保卫武汉的空战。会战迫使日军大本营重新调整对华战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战略，以求尽快结束所谓的“支那事变”。日本政治诱降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到1940年，汪精卫政权在中国国内影响甚小，无法左右抗日力量最强的黄埔系军队，于是选定蒋中正为诱降对手，但终未成功。武汉会战历时4个多月，中国军队伤亡40万人，日军损失10余万，无力继续进攻，中国抗日战争开始战略相持。中国达成了下列的战略目标：一、使日军原本南北向的作战线，转为东西向，解除

了国军主力于抗战初期即被日军围歼于沿海地区的危机；二、争取了时间，将部分东南沿海的战略物质、军工生产设备，迁移到大后方，也保留了持续防守的能力。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8E%9F%E6%9C%83%E6%88%B0

太原会战是1937年9月11日至11月8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第二战区与日本军队在山西太原附近地区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战役。包括天镇战斗、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太原保卫战，以及广灵、灵邱、崞县、原平等战斗。

太原会战双方指挥官分别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和日本华北派遣军寺内寿一大将，朱德第十八集团军配合第二战区作战。

这场战役结束后中国政府在华北、西北的大规模战事宣告结束，日军成功取得山西大同一带的煤炭资源。

背景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华北日军计划在华北、山西北部和绥远决战，企图以主力沿平汉铁路进攻河北保定、沧州一线，待保定作战后，再进攻石家庄、德县一线。另以一部在主力右翼，沿平绥铁路北攻南

口。1937年8月初，日军编成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联合中国驻屯军一部沿平绥铁路东段进攻察哈尔，以“解除对中国驻屯军后侧及满洲国境的威胁，消灭察哈尔省内的中国军队”。中国任命傅作义为国民革命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加强防御华北，负责平绥铁路东段。

序幕

南口战斗

1937年8月7日，汤恩伯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13军进入南口阵地。在关东军参谋长坂垣策划下，日军以相当大兵力主攻南口，中方由王仲廉的第八十九师防守。8月9日，日军开始正式攻击。激战16天，8月26日，南口失守。中国军队伤亡1.6万余人，日军伤亡1.5万余人。

张家口战斗

1937年8月21日，察哈尔境内日军南攻张家口。中国军队领导者为一四三师刘汝明。8月26日张家口陷，国民革命军向察哈尔南部之洋河右岸撤退。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随即在伪蒙骑兵协同下沿平绥铁路向西继续进攻。日军并攻陷怀来和延庆。

8月29日，日军两支部队在宣化会合，防御平绥铁路西段的中国军队面临夹击危险，遂分头撤退。8月31日，日军中国驻屯军与到达的国内援军编组为华北方面军、第1军和第2军，连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在内，日军用于华北作战部队合计约37万人。

大同战斗

1937年9月2日，日军为确保华北主力南下平汉线作战的侧翼安全并获取煤炭等战略物资，以华北方面军第5师团联合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分两路从北面进攻山西，在大同天镇同中国军队发生战斗。中国军队领导者为六

十一军李服膺和十九军王靖国，日军方面领军者则为酒井兵团酒井镐次。战斗中，守住阵地的国军与酒井兵团互有攻防。9月11日，中国第二九九团孤军坚守天镇一周后突围南退，12日撤离大同。

部署

1937年9月13日，由于大同失守，日军第5师团攻占河北省阳原、蔚县、山西省广灵后，挺进山西浑源、灵丘，企图突破平型关、茹越口，与察哈尔派遣兵团进行协同，欲歼灭中国第二战区主力。9月中旬，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采取收缩防御的态势，将军力集结于雁门关、平型关、娘子关，沿内长城进行防御，其中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一军防守茹越口，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撤至雁门关阵地，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第七十三师及第十五军退守平型关、团城口既设阵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一五师进出平型关外，遮断日军后方供应连络线。决心与东线平型关当面日军决战。

会战经过

平型关战斗

1937年9月20日，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攻占灵丘；22日攻占平型关西北的“东跑池”制高点。9月24日，日军攻占平地泉。

中共中央派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林彪115师、贺龙120师配合第2战区王靖国部配合作战。9月25日晨，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偕同大批辎重车辆，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西进，进入了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以东预设的伏击区域。115师师长林彪采取“避强击弱”的战法，放过要伏击日军的先头部队，歼灭其辎重部队千余人，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击毁汽车100辆、大车200辆，缴获步枪1,000多支、轻重机枪20多挺、战马53匹，为中国在北方战场之首次胜利，也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对日军的第一个歼灭战胜利。

9月26日，日军向蔡峪口溃退，中国军队继伏重兵于平型关之土沟，待其增援之两联队经过，尽予以歼灭，遂成平型关大捷。毙伤日军运输队500余人。蒋致电嘉奖。9月27日，中国军队乘胜攻灵丘，两败日军。

9月27日，日军混成第15旅团进攻繁峙县北、雁门关以东的茹越口长城阵地。28日，中国守军第203旅反冲击失败，日军突破茹越口，中国守军第203旅旅长梁鉴堂殉国。29日夜，西路日军攻占繁峙，遮断了平型关正面中国军队的退路，阎锡山被迫下令向南撤向五台山、代县一带，平型关战役结束。30日，占领繁峙的日军混成第15旅团进占代县。中国守军从内长城防线撤退后，东面的日军第21旅团进入大营镇。

忻口会战

1937年10月10日，卫立煌率国民革命军第14集团军从河北石家庄赴晋北增援，集结于忻口附近。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负责指挥忻口会战。会战13日打响，双方交战激烈。自15日起，板垣又投入第五师团主力七八千人向永兴村、安家庄一带进攻。10月19日，日军兵力增至十个联队，卫立煌急电蒋介石请求援助。25日，卫立煌给蒋介石发密电称："剧战半月，伤亡奇重：八五师仅剩一营余，第十、廿一、五四、八三各师可编三、四、五营不等，独五旅编两营，晋、绥军参战各旅各仅余二三百人。"26日，娘子关失守，阳泉、寿阳相继陷落。10月31日，卫立煌电报蒋介石称：晋北各师战斗员伤亡三分之二以上，每师所剩由一营余至一团余不等，火力不能维持，援兵无法赶往，补充兵短期不能送到。"11月2日，蒋介石令晋北各军向太原以北青龙镇阵地转进，与晋东军协同作战。

10月18日，120师358旅716团在雁门关黑石头沟设伏，经3小时激战，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击毙日军数百。21日，第716团再次于黑石头沟伏击，击毁日军10余辆汽车。从18日至21日，第716团在雁门关以南地区，共毙伤日军500余人，切断了日军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此外，第十八集团军还取得夜袭阳明堡战斗的胜利，也对日军造成了损失。

娘子关战役

1937年10月6日，日军川岸文三郎率领关东军第20师团强攻河北井陉娘子关，策应其第五师团之攻势。孙连仲的第26路军与曾万锺率领的第3军依工事抵抗。11日，日军进攻井陉、砭驴岭，中国守军第38军第17师迎击。14日日军突进苇泽关、旧关，被中国第一战区第一军团、第三军包围，但中国军队火力不足，至22日，日军仍坚持抵抗。日军被迫于21日抽调第20师团全部及第109师团一部由冀南回援。10月26日，日军攻破娘子关，并追击溃退的中国守军，晋东平定、阳泉相继失守，日军进逼太原。

太原保卫战

1937年11月2日，晋东方向日军（第20师团和第109师团）占领昔阳，形成与晋北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和第5师团）会攻太原之势，忻口中国守军当夜南撤保卫太原。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命令主力撤至太原以南，以傅作义为太原城防司令，率领国民革命军第35军守太原。

11月5日东路日军占领榆次，6日北路日军兵临太原城下。7日两路日军在日空军配合下，对太原发动总攻。经过激战在8日晚突破北面城垣，傅作义率部从城南突围。11月9日，日军占领太原、祁县、平遥后停止进攻；中国军队退守子洪镇、韩侯镇、兑九峪；太原会战结束。

后续

南口之战告一段落后，日军循平汉铁路南下：9月，攻陷河北保定；10月，攻陷石家庄；11月，攻陷河南安阳。另一路由津浦铁路南下，攻陷鲁南德州。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E%E5%9B%A2%E5%A4%A7%E6%88%98

百团大战，又称晋南游击战、正太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次大型战役，是由国民政府所辖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以下皆以八路军称呼）在1940年8月至10月间自行发动、以破坏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矿山为目的的破袭作战。参加作战的中国军队包括八路军120师、129师和晋察冀军区与当地民兵。中共宣称战争初期战报统计（第一阶段）共达一百零五个团，因此定名为百团大战（原正太战役）。战争期间日军发动反击战，使得周边一带的八路军根据地受到一定打击，受损的平汉铁路、同蒲路、石太路、井陉煤矿区不久后恢复运作。然而，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对日军的打击，使得其不得不重视在敌后活动的八路军等抗日武装，将大部分兵力用于对敌后根据地的多次扫荡。

1940年7月22日，由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名签署的“正太铁道战役”的《战役预备命令》由八路军总部正式下发到晋察冀军区、第120师及第129师，同时上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毛泽东审阅了此命令。命令中要求参战的部队最初预定22个团。8月20日晚20时，战役打响。随后众多未被命令参战的团陆续加入，其中不少团是1937年后中国共产党在日占区和华北根据地当地扩编的，军饷与军火不在国民政府供给名册内，实际自备粮服军火，尤其是枪支、军服五花八门，训练和组织程度也不齐，更大量是没有军服拿起枪是兵放下枪即是民的民兵。其对日军袭扰压抑已久，开战后未等八路军总部命令即加入战斗。导致战役规模迅速扩大，彭德怀和左权也始料未及，更不用说身处延安的毛泽东，最终形成105个团的规模，因而更名为“百团大战”。

作战背景

日本出于战略要求从1938年秋开始政治诱降，希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议和；而在另一方面，汪精卫于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史称汪伪政府），以“和平反共建国”为号召，意图拉拢支持反共的人民。同时国共摩擦不断，双方互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清楚国民政府与日方谈判的进展，对于形势过于严重估计。加上认为日军有可能西进，于是八路军高层在通报中央军委而尚未有回复的情况下决定发动一场较大规模破袭战打击日军。

华北局势

1939年，国民政府成立晋察冀敌后战区，鹿钟麟任战区总司令。1940年春季，华北八路军在山西省策反收编国民革命军九七军，将战区总司令鹿钟麟逐出省外。同时1939年，山西爆发晋西事变，和八路军摩擦不断，1940年初双方和解。

1940年四月至六月间，日军以第三十六、三十七、四十一师团为主力，在山西省南部进行春季晋南战（国民革命军约8万）、乡宁作战（国民革命军约3万）、晋南反击战（国民革命军约4万）。

在抗日根据地，由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日本侵华的战略要地华北的发展日渐壮大，日本军队在1939年夏季，集中了分散在长城、华北、东北的部分军队，以铁路、公路等交通线为依托，对华北地区的抗日力量连续发动大规模扫荡，并在荒原挖沟筑堡试图阻碍抗日力量的进攻，实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借此控制并逐渐缩小抗日力量。但1939、1940夏季两次扫荡，将集中于华北地区30余万日军、伪满洲国军队的分布点不断增加，力量分散。这对华北地区的八路军集中优势力量展开大规模进攻提供了有利条件。

日军军力分布

百团大战的涉及范围中，驻有日军3个师团全部、2个师团的各2个联队、5个独立混成旅团全部、4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各2个大队、1个骑兵旅团的2个大队，共20余万人，另有飞机150架和伪军约15万人。 自1939年冬以来，日军以铁路、公路为支柱，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并企图割断太行、晋察冀等战略区的联系，推行所谓"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这一时期，日军每大队约700人。日军华北方面兵力密度为一平方公里0.37人，各师团兵力平均分散在约200处。百团大战后日军正式实施对八路军的剿灭战。战争期间日军发动反击。

日军组成如下：

独立第八混成旅团（旅团长水原义重少将，参谋泉可畏翁中佐）

第三十四大队（驻井陉附近）

独立第四混成步兵旅团（旅团长片山省太郎中将，参谋土田兵吾中佐）〔该旅团伤亡最为严重，阵亡总数276名。）

独立步兵第十五大队（德江光中佐，驻阳泉）

独立步兵第十四大队（原田寅良中佐，驻寿阳）

第十二大队（驻榆次）

独立第九混成步兵旅团（旅团长池上贤吉少将）

第四十大队（驻太原）

第三十九大队（驻忻县）

独立第三混成旅团（察南南部）

独立第二混成旅团（北部同蒲路）

池田龟市中尉排级分队（驻娘子关警备队）

经过

战役准备与发起

八路军攻克娘子关

7月2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下达《战役预备命令》，规定以不少于22个团的兵力，大举破击正太铁路。同时要求对同蒲、平汉、津浦、北宁、德石等铁路以及华北一些主要公路线，也部署适当兵力展开广泛的破击，以配合正太铁路的破击战。8月8日，朱德、彭德怀、左权下达《战役行动命令》，规定：晋察冀军区破击正太铁路石家庄至阳泉（不含）段；第129师破击正太铁路阳泉（含）至榆次段；第120师破击忻县以北的同蒲铁路和汾（阳）离（石）公路，并以重兵置于阳曲南北地区，阻击日军向正太铁路增援。要求各部在破击交通线的同时，相继收复日军占领的一些据点。

八路军原定动员兵力为22个团（晋察冀10个团，129师8个团，120师4个团），重点目标为正太铁路，其次是平汉铁路、同蒲铁路北段和白晋铁路。为了攻击的突然性，未经中国共产党军委批准展开了战斗。战斗开始后，各部投入了大量兵力，计晋察冀军区39个团、第129师（含决死队第1、第3纵队等）46个团、第120师（含决死队第2、第4纵队等）20个团，共105个团20余万人，还有许多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参加作战。最终参战总兵力达到105个团。

在华北交通线中，正太铁路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一。

第一阶段（1940年8月20日－9月10日）

战役最早由8月20日晚8点开始的华北交通要道破袭战为序幕，当时正太铁路横越太行山，是连接平汉、同蒲两条铁路的纽带，也是日军获得山西煤炭资源的重要通道，也是对晋察冀边区等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据点的主要分布区，同时井陉煤矿也在这条铁路上。因而正太铁路成为战役第一阶段的主要战场，集中了30个团的兵力。八路军的进攻战役首先在正太铁路发起，因此战役开始时被称为“正太路战役”。

作战初期八路军兵力部署异常隐蔽，日军直至战斗打响才发觉中国军队的动向，日本方面将9个独立混编师投入战场。至9月下旬为止，正太铁路全线瘫痪，并破坏北宁铁路、平绥铁路、平汉铁路、津浦铁路，井陉煤矿亦遭破坏。并占领娘子关的部分地区。

9月1日至18日，日军派出独立第九混成旅自太谷、榆次地区与独立第四混成旅由平定、和顺地区相互策应前进，至松塔镇附近。该部署旨在摧毁敌人后方设施，并扫荡周围潜伏之敌军。根据日方战时机密资料，第九与第四这两个混成旅团于9月1日至11日总共死伤483人。

第二阶段（1940年9月22日－10月5日）

在第二阶段时期，除暂留约10个团兵力继续阻挠道路和桥梁的修筑，主力则把战斗对象转移到铁路交通线两侧的日本守军与被抗日根据地包围的日军据点，目的是巩固并扩大战果，其中以榆辽战役、涞灵战役最为激烈。延安地区、山东地区、安徽地区的八路军也投入作战。日军也投入使用了战争公约所禁止的毒气与生物武器展开反扑，战争也进入相持阶段。

1940年10月3日至11月2日，日军发动晋察冀边区肃清作战，派遣临时第101混成旅团（驻蒙军、第1军、第110师团、独立第十五混成旅团）参与战斗。

第三阶段（1940年10月6日－12月5日）

由于八路军随后遭到日军反击战的强大打击，作战转趋消极，日军第36师团成功扫荡并消灭了辽县、涉县、潞城等地共军根据地，结束了第二期第一次反击战。11月19日，日军第37师团发动第二期第二次反击战，由沁县、南关镇一带出发；独立第16旅团由平遥、霍县出发；第41师团一个大队由洪洞东方向沁源前进，途中均未遭有力抵抗，12月3日顺利消灭沁河一带共军根据地。日军110师团驻石家庄正与国军冀察战区、第一战区、第二战区接触中。日军第一混成旅团驻邯郸，与国军冀察战区、第一战区交战中。中国共产党宣传："日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几已消灭殆尽，独立混成第二、三旅团消灭过半，独立混成第八、九、十六等旅团各消灭一大队，第三十六、百一、二十七师团均有严重伤亡。"

为回应八路军的百团大战，日本军队开始将各地的机动兵力集结于华北地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借以迫使八路军退出华北交通要道，先后对太行山地区、太岳地区、晋察冀边区、晋西北等地进行扫荡。华北日军于1940年9月23日—10月11日在察南南境，10月11日－12月4日在晋中（第二期晋中作战），驻蒙军于10月13日－11月26日在晋察冀边区发起反击作战。八路军则分兵展开运动战和游击战、麻雀战（骚扰游击战术）进行反击。到1940年12月5日，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因日军展开大扫荡而宣告结束。

百团大战从1940年8月15日起至12月5日止，历时3个月15天，中国共产党宣称：整个战役作战地区囊括冀察全境、晋绥大部及热南大部，配合作战的地区，战线延及至鲁、皖东、豫东、苏北。中方投入兵力有100多个团和配合作战的根据地军民，共数十万人。日军参战的有110师团和25师团全部，26、36、41师团各两个联队，35、37师团各一个联队，第1、第2、第3、第4、第5、第7、第9混成旅团全部，第6、第15独立混成旅团各一部，还有大量伪军，约二、三十万人。

日军情势判断表示：

华北共军自今春以来实施改编扩充，合正规军、准正规军可能达25万以上。自今年8月所谓百团大战以后四个月，因被我军彻底扫荡，其大部分根据地设施覆灭，要重建需要相当时日。……百团大战中的战死者，以朱德所发表，达一万八千人，三年来没有积极从事抗战，专心储蓄的资材几乎全部泡汤，根据地设施被破坏，加以因与重庆对立激烈化，军费拨付困难，其重建自非短时日所能完成……国共的关系，与时日的经过在逐渐下降，但今后无论双方是否能够妥协，在中国共产党无法以实力对抗蒋军的现况下，其活动范围将局限于皇军占领地区警备比较脆弱的方面，或蒋系势力比较稀少的杂军地盘。故从确保北支治安的观点，需要细心注意并监视其动向。

战役结果

中共方面观点

彭德怀在自传中记载“此役共消灭日伪军三万余人，自动瓦解、溃散的伪军、伪组织比此数要大得多”

百团战后八路军总部的《百团大战各阶段作战概述》中说：八路军毙伤日军12645人、伪军5153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407人，日军投诚7人，伪军反正1845人；攻夺敌人据点293座。1940年12月10日的《百团大战总结战绩》中认为，此役八路军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投诚47人，伪军反正1845人（合计46380人）；消灭据点2993座，破坏铁路900多里、公路三千里；破坏桥梁、车站260多处；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八路军伤亡17,000余人，共产党所控制的华北抗日根据地也随之大幅度扩大为华北437个县中的10个县。

国民政府观点

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代主任熊斌呈百团大战电报：

百团大战之实际情形，录呈如次：(一)此系八月号(20)日开始，与敌正面作战五天，有(25)日即将大部撤往平山、盂县、五台一带，只留少数兵力在铁路沿线续行袭援……(二)中共此次在正太路沿线所用兵力共十一团，朱彭报为三十余团(三)所获战绩计破坏铁路二百余里，破坏大道桥梁四十余座捣毁车站十一所……(四)斯役敌伤亡三千左右，及伪军二千余，中共伤亡亦约三千余……。

日方观点

根据日军战史，日军在上社镇撤退时战死44人、阳泉与盂县战死66人、榆社与辽宁战死80人、晋中地区战死71人负伤66名失踪2名、涞源地区战死133人、插箭岭战死1人负伤1人、第二次反击战(察南南境失踪31名)，皇协军（“伪军”）伤亡失踪1202人。百团之战是游击的战略进攻，平汉铁路于8月25日恢复通车，同蒲路9月8日全线通车，石太路9月20日勉强可通车，井陉煤矿区机器修复仍可使用。

根据日军战史（参见《华北治安战》（上），第295－319页）为：上社镇撤退时战死44人、阳泉—盂县战死60人，负伤180余人、榆社与辽宁战死80人、晋中地区战死71人负伤66名失踪2名、蔚县涞源地区战死133人，失踪31名、插箭岭战死1人负伤5人，浑源、灵邱方面战死78人，日军合计战死人467，失踪33人，负伤251人，伤亡合计751人。

根据日军医疗部门内部极机密档案与日本华北方面军内部机密资料研判，1940年8月至12月整个华北方面军共战死2,349人，战伤4,004人。

关于暴露实力的争议

聂荣臻认为：“毛泽东批评说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

1943年邓小平说：“百团大战中本区军事力量过于突出暴露，不仅自己伤亡很大，元气不易恢复。且警惕了敌人对我们的严重注意，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华北工作座谈会，会中党内一致对于百团大战持否定态度。彭德怀做了检讨：“百团大战……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过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军队主力从正面战场吸引过来，有利于国民党……这很明显是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这也是彭被批判的罪名之一。1959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文革中的批判

1959年庐山会议后，共产党将彭德怀定位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

1967年2月24日清华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出版的大字报《兵团战报》第六期《打倒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彭德怀》一文声称：“彭德怀公然提出要保卫大后方、保卫重庆、保卫西安，实际上是要保卫坐镇于重庆的蒋介石。彭德怀急于保蒋，拒不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在战略相持阶段，我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背着毛主席，和朱德、杨尚昆、彭真、邓小平等商量，大搞冒险主义、拼命主义，先后调动了一百零五个团，共四十万兵力，全线出击，打攻坚战、消耗战。彭

贼保蒋卖力，得到了蒋介石的欢心。” 红卫兵声称：″百团大战是朱德、彭德怀违反党的组织纪律，不请示毛泽东，擅自搞百团大战，完全违背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并把日军的兵力吸引过来，导致重大损失。″

台湾和日本学界的批评

傅应川（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局长）：就军事而言，若日军真蒙受重大损失，必将退出地区整补，然从日军随即发起反击，而石太、同蒲路段迅速通车，中国共产党的战果统计纯属夸大，无法取信。

学者刘凤翰认为以参战部队与日军编制制度来计算，该役日军最多2万人（满编情况下），日军伤亡约在3千人左右。他说，“这种被共军指为消灭殆尽的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实际上只战死276人，还参加了2次晋中反击扫荡。共军自称一百零五个团，这当然是中共的宣传，骗那些不懂军队编制之人。”

有学者认为，第三阶段根本不存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原本要攻下四个县，但日军已有防范，八路军勉强打下其中一个县，且立即放弃，百团大战正式结束，第三阶段实际上从未进行过。之后中共中央为了夸大战果的宣导需要，将日军追击共军的反击战称为“第三阶段抗日反扫荡”。彭德怀曾接获毛泽东电报要求：“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布结束，蒋介石正发动反共高潮（黄桥战役），我们尚须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中共中央机关“新中华报”则为此定调百团大战在12月5日结束”。

史学家李云汉认为，八路军仅是做策应性游击，从未参与过决定性的大会战。所谓百团大战基本上是有意渲染，并非真正的一次战役。

古屋奎二：他们所破坏的地段，实则乃仅限于为日军守备兵力稀少或是毫无日军之处；而且破坏之后便为日军所立即修复。

https://zh.wikipedia.org/zh/%E9%87%8D%E5%BA%86%E5%A4%A7%E8%BD%B0%E7%82%B8

重庆大轰炸指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由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4年12月19日，日本对战时中国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6年半的战略轰炸。据不完全统计，在1938~1943年5年间日军对重庆实施218次战略轰炸，中国方面则指控日军1938年2月至1943年9月间出动飞机9513架次，空袭重庆及附近地区200余次，投放包括细菌弹在内的各类炸弹2.16万枚，炸死1.19万人，炸伤1.41万人，炸毁房屋1.76万幢。日本对重庆实施的空袭，是由日本陆、海军航空队联合进行的“地毯式轰炸”，是继纳粹德国空军在1937年4月西班牙内战中对格尔尼卡平民实施轰炸之后，历史上最先实行的战略轰炸。其目的是希望透过制造大量平民杀伤，以瓦解中国军民的抵抗士气。

为纪念大轰炸罹难者，重庆市自1998年以来，每年的6月5日，定为重庆大轰炸纪念日，全城拉响防空警报，警示人们勿忘历史、珍惜和平。

发起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展对中国的全面侵略。11月，中国国民革命军在淞沪会战中失利，当时的首都南京被日军占领陷入危机，国民政府在11月20日起撤往重庆作为战时陪都。随后在1938年华北、华中战场日军依序将国军击退，中国的沿海精华区几乎被日军完全占领；依照普通国

家的输赢定义，此时的中国几乎失去了首都、所有主要对外港口，依照前几次冲突的经验法则，日本认为这时候国民政府应该主动向日本媾和。

但是，这次国民政府没有明确让步之迹象，撤往重庆之后打算和日军长期对抗；日军虽然在1938年对华中精华地带发动武汉会战，国库的财力及作战部队的冲力已经几乎耗尽，日本参谋本部也承认由于受到后勤制约，因此当时没有能力攻入重庆；要进一步打进四川根据地似乎遥遥无期，在各种压力下日军开始寻找各项军/经手段逼使重庆政府收手，日本方面认为战略轰炸亦成为一种可能可以成功的作战方式。

1938年底，日本开始对重庆进行战略轰炸。虽然中国方面指控日本从1938年2月18日对重庆东南方的广阳坝机场轰炸为首开战略轰炸重庆之始，但在1938年日军尚未攻陷华中据点，且日本并不存在足以自华中沿岸机场长距离轰炸的技术及机型，故对重庆进行空中军事行动也主要是侦查或式小规模袭扰为主，而非有组织性的大规模航空作战；1938年10月日军攻陷武汉后，12月2日后日军大本营对华中方面军下令开始向重庆实施“由空中入侵对敌军战略中枢加以攻击同时进行空中歼灭战”，这项命令公文为“最高指令大陆命第241号”，为日军正式有组织性对重庆城市地带进行战略轰炸之开端，目的是希望震撼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打击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

在大本营命令下，日本帝国陆军部、海军部才进行直接协调，拟出相关轰炸计划，目标是“陆海军航空部队协同在全中国各要地果敢地进行战略、政略的航空作战，挫败敌人继续战斗的意志”。包括重庆、兰州等主要城市都被列在战略轰炸的目标中，但限于机队规模，足以结合海、陆军空中兵力轰炸者只有重庆。

五三、五四大轰炸

目前日军战史上纪录第一次的对重庆战略轰炸是1938年12月26日，由日本陆军航空队自汉口派遣12架九七式轰炸机及10架伊式重轰炸机，当日下午1

点飞抵重庆上空轰炸，但发现重庆上空云层浓厚根本找不到目标，因此只草草扔完炸弹后无功而返。在1939年1月7日、10日、15日再度发动攻击，共投掷了10.8公吨的各型炸弹，但同样的也没办法评估轰炸成效。日军在前几次的轰炸发现四川盆地的多雾气候让轰炸定位非常困难，一年间只有5月到10月能见度较好；加上日军也清楚对于中国内陆的资料不足，贸然发动大规模攻击只会遭受无意义损失，因此大本营后续补派了"要求前线部队加紧训练，预定于1939年秋季发动作战"的命令；而且陆军手上的九三式轰炸机无论是载弹量还是航程都不足以担负任务，九七式轰炸机亦尚未转换完成，手上只有少量自意大利购买之BR.20轰炸机（日军命名为伊式重轰炸机）执行任务，不过缺乏护航的轰炸机队在814空战中已经证明了是拦截机最好的目标，因此为了避开战斗机采用命中率低的高空轰炸，因此自1938年底到1939年前半年的轰炸日军虽损失不大，但国府也没多少损失。

因此，1939年5月，海军航空队接手陆军任务使用九六式轰炸机执行任务。5月3日及4日，日本海军航空队的轰炸机由汉口机场（武汉王家墩机场前身）起飞，连续轰炸重庆市中心区，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眼看着敌机投弹在地面上升起一朵朵光烟，已升为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第21中队中尉副队长的张明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冒着敌机群密集的火网，向敌阵冲去；张明生所驾驶的飞机被敌机火力击中，但他并没有马上跳伞，直至油箱爆炸，他全身着火，才跳伞而下，着地时已身负重伤。当地百姓以为他是日本人，捡起鹅卵石打他，他只能用微弱的声音叫着："我是中国飞行员，我是中国飞行员。"张明生在江边坚硬的鹅卵石上躺了4个小时，才被赶到的一个韩姓警官找人把他抬到南岸的医院救治。重庆市中心大火两日，商业街道被烧成废墟，3,991人死亡，2,323人受伤，损毁建筑物4,889栋，约20万人无家可归；同时被炸的还有外国教会及英国、法国等各外国驻华使馆，连挂有纳粹党旗的德国大使馆也未能幸免。

1939年间，日本飞机飞了14,138架次轰炸，并投下60,174枚炸弹。根据中方计算，造成28,463人死亡、31,156人受伤，13,871栋房屋遭到摧毁。日

本于1939年的大规模轰炸主要为此次，因为随后发生的张鼓峰事件与诺门罕事变将日本空中军力的注意转向，再一次的发动大规模攻击则是要等到1940年。

八一九大轰炸

1940年5月，日本大本营指示由陆、海军联合实施空中作战，由陆、海军联合发动“101号作战”，同时对中国后方轰炸。陆军第三飞行集团主要以山西运城为基地，海军第一、第二联合航空队主要基地为汉口。主要兵力为九七式重型轰炸机36架、中型攻击机90架（不含备用机）。

由“岛田繁太郎大将备忘录”中记载当时海军轰炸重庆的片段纪录，101号作战的主要攻势集中在1940年7月28日至8月31日，海军在这段期间共轰炸20批次，使用了2050架次陆上攻击机、201架次舰攻/舰爆、99架次舰战、39架次侦查，消耗94枚800公斤（八〇番）炸弹、2906枚250公斤（二五番）、11148枚其它型号炸弹，共15036枚各式炸弹。8月19日的轰炸尤为惨烈，日本海军投入超过140架轰炸机，重庆2,000多户民居被毁。到1940年9月初的统计，当年日军对重庆实施72架次轰炸，共发动4445批机次攻击，投掷了3千吨以上的各型炸弹。

六五隧道惨案

1941年初，日军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先向中国集中力量空袭，发动名为《102号作战》的大规模轰炸。在1月至8月，超过3,000架次飞机空袭重庆，当中包括夜间空袭。6月5日，从傍晚起至午夜连续对重庆实施多小时轰炸。重庆市内的一个主要防空洞部分通风口被炸塌引致洞内通风不足（据幸存者曾婉清说当天有汉奸为日军飞机发信号，日军是有目标地轰炸洞口和通风口的），洞内市民因呼吸困难挤往洞口，造成互相践踏，以及大量难民窒息，估计死者数以千计（当时的官方没有公布确实的伤亡数字）。

告终

1941年中以后，日军为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海军航空队从中国完全抽出，中国战场仅存陆军第三飞行师，其编制规模多半不超过200架，顶多维持持对前线的空中掩护，无法实践1940年的空中轰炸规模。同时，第三飞行师下属轰炸机部队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少将在1940年8月任官后多次同乘轰炸机视察对重庆轰炸效果，也参加了101号作战。在远藤少将战后的回忆录中，陈述当时他目睹轰炸机多次差点炸到靠泊在重庆的美国炮舰，加上陆军为了南进政策无法抽出部队攻占重庆，对重庆的战略轰炸也变成不人道、破坏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且没有战略意义的作战任务。且在重庆轰炸的同时，纳粹空军也在对伦敦实施战略轰炸，日本驻德英武官回馈给本国的资料也让航空军官省思对敌军首都战略轰炸的实际效果；因此在102号作战结束后，1941年9月3日他向上级单位第三飞行集团指挥官木下敏中将提出“重庆爆击无用论”，该论点在陆军高层中也得到重视。

虽然陆军高层没有批示停止轰炸，但用兵幅度在1941年晚期开始显著收缩。至1941年底日本对美宣战后，轰炸重庆逼迫国民政府乞和的想像也就毫无意义，战略轰炸造成的军事打击也不具决定性效果；虽然日军仍然持续对重庆进行轰炸，但主要集中在重庆周遭的军工厂区域。到了1943年8月以后，重庆周边防空雷达站部署完毕，美国陆军驻华空军特遣队扩编为第十四航空队后，重庆周边已经有6座机场、至少400架的美军及国军战机防卫驻守，对日军来说深入重庆的轰炸危险性大增，日军空袭重庆的频率遽减；国军纪录有案最后一次遭日军空袭为1944年12月19日，梁山、万县、开县三个地区遭到轰炸，为重庆大轰炸的终结。

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

人员伤亡

关于重庆大轰炸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档案、报刊文

献资料有不同的记载，然而各种档案文献资料记载和众多调查研究成果的人员伤亡数据各不相同。造成上述不同数据的原因主要是对重庆大轰炸的时间范围、地域范围、资料来源等不同而各有差异。

关于重庆大轰炸人员伤亡调查研究情况汇总表

统计时间	死亡人数	受伤人数	伤亡时间范围
1942	30136	9141	1938~1941
1945	15737	1938~1941	
1986	8059	9207	1938~1941
1987	9218	13908	1938~1943
1992	9900	10233	1938~1941
1994	11178	12856	1938~1941
2001	11889	14100	1938~1943
2002	11889	14100	1938~1943
2002	近30000		1938~1943
2005	23600	31000	1938~1943

财产损失

重庆大轰炸期间关于财产损失的情况，各种档案记载及文献研究资料说法不一，存在直接损失报送不完整，种类繁多，交叉重复现象；间接损失难以估量，时间久远不便折算等各种问题。

如房屋损毁数《抗战时期重庆的防空》一书统计，1939年至1941年，因日

机轰炸造成的房屋损毁9570栋31481间；《重庆大轰炸》统计为9250栋33300间；《重庆市防空志》统计为17452栋37182间；《重庆通史》统计为“炸毁房屋17608栋，使繁华的重庆市区大半化为废墟，财产损失无法计数”；《日本侵华暴行实录》统计为17462栋。

中国的反击

苏联航空志愿队于1938年10月进驻重庆，开始反击日本轰炸。除了拦截任务外，志愿队也曾发动奇袭攻击日本轰炸机的主要驻扎机场，最大的一次战果是1939年10月3日下午以9架SB-3轰炸机对汉口机场发动的攻击，此次奇袭炸毁至少50架日军各式战机，并造成第一联合航空队司令冢原二四三中将重伤。

中华民国空军。1944年2月，位于重庆云阳的国民革命军空军轰炸机队首次展开对日占区的反击，26架B-25型轰炸机轰炸日占区。

情报战

当时蒋介石的炮兵顾问韦伯被日本人收买，向日军提供大量军事情报，对重庆造成巨大的损失，同时还参与日本伞兵空降绑架蒋介石的计划。在美国密码专家赫伯特·奥斯本·亚德利的帮助下，中方最终得以找到内部潜伏的间谍。

战略意义

重庆大轰炸是二战期间对参战国首都（陪都）大规模轰炸之一重要战例。日方原本希望依靠“无差别轰炸”促使中国军民投降，但国民政府在八一九大轰炸后发布《国民政府令》，正式确认重庆为“陪都”，且“还都以后，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表达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作为报复行动，1944年之后，从中国成都起飞的美国B-29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日本为此次战争付出了沉重代价。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98%8C%E4%BC%9A%E6%88%98

南昌会战是中国抗战时期1939年春夏之际，中日双方以争夺江西省会南昌城为目标展开的会战。该会战是武汉会战后，中国军队抵御日本有限攻势的首次会战，也是中日正面战场进入相持阶段后中日军队的首次大战。中方参战部队为薛岳指挥的第九战区，日方参战部队为冈村宁次指挥的第11军。会战中，国军29军军长陈安宝阵亡。日方称南昌作战，代号“仁号作战”。

背景

1938年底武汉会战结束后，重庆国民政府弃守了武汉三镇，但战力大部分成功转移至周边战区；由长江北岸为进攻主轴线的日军占领该地后，面临主要的困局便是补给线不稳的隐患。

在进攻武汉三镇的过程中，日军虽有计划向长江南岸扫荡，但是主攻部队受挫，这个战术行动在当时并未贯彻；因此国民政府第九战区部队仍控制住大部分的江西省，包括鄱阳湖平原，以及周遭水系。这对攻占武汉的日军可谓芒刺在背-位处长江下游的国军可使用布置水雷、或是利用南昌机场供战机炸射长江水路的日军后勤线，对日军后续战力施展都造成阻碍。因此，日军在短暂的休整时日过后，首先便是计划拔除长江中下游的国军兵

力，而作为当时第九战区指挥部且为江西省水陆交通重镇的南昌，便成为日军下一波攻势的主要目标。

过程

南昌会战主要围绕南昌城的保卫和反攻展开：第一阶段日军进攻南昌，中日双方在南浔沿线、武宁、万家埠、乐化、安义、靖安、奉新、南昌市区等地发生战斗，结果为日军突破防线攻陷南昌城；第二阶段中国军队反攻南昌，双方在高安、奉新、大城、西山万寿宫、生米街、市汊街、璜溪激战，结果为中方失利撤退。

保卫南昌

1939年春，日军向南昌进攻，中国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将军率部迎战，日军在南昌附近修水防线遭受重大伤亡后使用毒气突破中国防线，随后攻陷南昌。

反攻南昌

1939年4月，在中国第三十二集团军上官云相指挥下逆袭南昌，试图收复该城，在日军顽强抵抗下中国军队付出重大伤亡后停止进攻。

影响

南昌是东南重镇，当时中方辖区下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战略基地，南昌城失陷使得江西核心区域沦陷，第3战区与大后方的联络陷于困境，浙赣铁路被切断，军事补给只能依赖浙赣两省的公路线，东南各省未沦陷地区的处境更加困难，日本在南中国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A%8F%E6%9E%A3%E4%BC%9A%E6%88%98

随枣会战发生于1939年5月，日军为消灭中国第5战区的主力，向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中国军队与之展开为期20余天的会战。

背景

武汉会战后，日军因占领地域过广，导致兵力分散，因此停止战略攻势，转攻为守，实施反消耗战，力图巩固占领区。

国军为牵制敌人，于是于1939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在各战区发动“四月攻势”，以积极袭扰、敌后游击来牵制日军。第5战区方面，国军从东、西两面向平汉铁路南段进攻，压迫日军侧翼。

日军华中方面军第11军司令冈村甯次为巩固武汉及周边占领区，指挥第3师团、第13师团、第16师团及骑兵第4旅，由信阳、应山、钟祥一线，向桐柏、随县、枣阳方向发动进攻，企图围歼国军第5战区主力部队，随枣大会战于是展开正面大型战斗。

过程

1939年5月1日驻钟祥、京山方向的日军，在飞机、战车及火炮支援下，向钟祥以北中国军队阵地发动进攻。

5月4日日军突破长寿店两侧守军阵地后，即以主力沿襄河东岸，向枣阳方向突击。国军顽强阻击，并不断以襄河西岸的部队渡河侧击北犯日军，但日军仍乘火力优势，突破守军防线。日军与国民革命军第84军激战两昼夜

后，又夺取了塔儿湾阵地，国军被迫放弃高城，向西转移。

5月5日日军第3师一部向天河口市发起进攻，并于两天后夺占天河口。

5月8日日军占领枣阳。高城日军向厉山阵地发起进攻，与国军第84军展开激战。日军因攻势顺利，遂令驻信阳的第3师第29旅也向桐柏进攻。

5月10日日军占领再占湖阳镇和新野。

5月12日夺取唐河，并一度占领南阳。另一方面，驻应山方向日军第3师主力亦发起进攻，连陷吴家大店、徐家店。日军第3师第29旅攻陷桐柏。

由于日军先后占领桐柏、高城、三阳店、唐河、新野一线，即将合围桐柏山、大洪山的国军主力，为争取主动权，转守为攻，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急令第31集团军主力，会同第1战区第2集团军由豫西南下，向唐河、新野一带反击。同时，命令在大洪山、桐柏山担任游击任务的第39军、13军向唐县镇、枣阳攻击，牵制日军西进，又命令襄河两岸部队堵截日军退路。

5月13日国军增兵南阳，先后克复唐河、新野。

5月15日各路援军发起攻击。

5月19日国军收复枣阳。日军因苦战多日，疲惫不堪，遂向东南退却，国军仍一路对其发动追逐攻袭、各地方保安团、警察治安团亦发动敌后袭击干扰撤退。

5月23日国军收复随县，日军亦退回钟祥、应山等原驻地，恢复战前态势，随枣会战宣告结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8%80%E6%AC%A1%E9%95%BF%E6%B2%99%E6%88%98%E5%BD%B9

第一次长沙战役（又称为“第一次长沙会战”、“湘北会战”，日本称“湘赣会战”），指1939年（民国28年）9月至10月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第九战区部队在以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接壤地区对日本军队进行的防御战役。这次战役是继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日本为达到对国民政府诱降和军事打击，集中10万兵力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向长沙发起了进攻。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1939年10月1日被正式任命为司令长官）为保卫长沙，采取以湘北为防御重点，“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调动了30多个师和3个挺进纵队，共约24万多人参加此次战役。至10月9日，中国军队第195师恢复到进占鹿角、新墙、杨林街之线，日军陆续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至10月14日，双方恢复战前态势。

战略

日方作战目的：“作战目的与襄东会战相同，在于急促彻底打击逐渐活跃的江南敌军，以保证我军的安全，即所谓自卫战斗。”。其战术目标是“在最短期间内，捕捉敌第9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

8月15日，日军第11军制订的《江南作战指导大纲》明确战役指导方针是：“实施本作战时以奇袭为主，尽量在短期内结束战斗，然后恢复大概原来态势。”

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以所谓天炉战法，依湖南的地势，左倚洞庭湖，右凭幕阜山，以其间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这四条河做为迟滞日军的依据，并彻底实施“化路为田，运粮上山”的做法，将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机动力消除。故总体方针为“后退决战，争取外围”：国军以且战且退做法在四河与幕阜山间游移，攻击然后后撤躲藏，将日军拖入四河之中，最后再以长沙城中主力与外围藏在山林中的部队合围深入四河中的日军。

日军战斗序列

长沙一次会战日军战斗序列

第11军司令官 冈村宁次

第6师团 稻叶四郎

第33师团 甘粕重太郎

第101师团 斋藤弥平太

第106师团 中井良太

上村支队 上村干男

奈良支队 奈良晃

第三舰队 香月清司

第三航空团 管原道大

冈村宁次根据作战日志回忆：“参加作战兵力为三个师团（自西排列为第6、第36、第106）和两个支队（各自以步兵一个联队、炮兵一个大队为基干，即由江北师团抽出的上村支队和奈良支队）。据判断，敌兵力最初约有25个师。”

主要战事

日军于9月17日发起进攻，其部队从江西省北部向西进攻湖南省，但是日军的进攻由于向西过度延伸及国民革命军从南北两面反击，因而被迫向东撤退。

9月19日，日军沿新墙河对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到9月23日日军将国军逐出新墙河地区，其第6师团及第13师团在炮火支援下渡河及沿汨罗江向南推进。

激烈的战斗在23日后仍然持续，中国军队向南撤退以吸引日军，同时其增援部队到达东西两翼以实施包围，9月29日日军到达长沙外围，但是他们因补给线被切断而未能攻占该城，10月6日，冈村宁次宣称在达到作战目的后撤军。10月8日，双方恢复原有的态势。

总结

国军认为：长沙是第一个没有失陷的中国主要城市，其指挥官薛岳从他在该城的胜利中获得荣耀，这令中国阻止日军与其在中国南方的部队会师。

日军认为：其拟定的作战目的为歼灭粤汉线第九战区的有生力量，并未有占领长沙的目的。作战过程已击溃第九战区大量有生力量，取得很大的胜果。

根据日军内部一份统计图表，日军在1939年10月的可确认作战受伤人数为4,958名，11月下降到了2,795名，考量该图表统计上很可能少算大量的作战伤亡（特别是作战阵亡方面）且39年11月依旧有南宁作战等战役，第一次长沙会战的39年10月部分日军死伤极可能便多达好几千名，而9月战况远较于10月激烈，死伤很有可能远多于10月。合计起来日军在整场第一次长沙会战的作战死伤总人数，必然远远大于日军自身所公开发表的3,550人。

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丛书·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一书中写道："……此次会战，从日军进攻开始，至日军主动撤退告终，战场全局的主动权基本上操之于日方。战斗结果，两军都回到原有阵地。因此，就会战局部而言，双方未分胜败。但从抗战的全局而言，却是对中方有利。日军要消灭第9战区主力的目的未达到，反而消耗了自己不少兵力和武器，并退回原阵地。而中国方面判断日军将进攻长沙，为此作好了'万一长沙不守'的多种准备，故将日军未能攻到长沙而退却视为胜利。"

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会战结束后给"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呈交的《关于解决中日事变作战之意见》中说："摧毁敌军的抗战企图，是至难中的难事……在作战中放弃已占领的要地要域而返回原驻地的作法，不啻鼓励敌人反击，并会成为敌人宣传的材料。"流露出日军高层指挥官对战争前途的焦虑和沮丧。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A%8C%E6%AC%A1%E9%95%BF%E6%B2%99%E6%88%98%E5%BD%B9

第二次长沙战役（又称"第二次长沙会战"），指1941年（民国30年）9月至10月，抗日战争期间，以中国第九战区为主的部队在湖南省长沙地区对日本军队进行的防御战役；本次会战从1941年9月7日至10月9日结束，历时一个月。

经过

1941年1月16日，日本陆军中央部制定了《对华长期作战计划》，企图在年内在不减少现有兵力，对重庆国民政府采取高压的军事态势，利用国际形势变化尽早解决中国作战。1941年4月，阿南惟几制定了长沙作战计划，力图在现有兵力的情况下，最大可能的摧毁重庆政府战力。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中央部一方面抓紧作对苏战争的准备，驻守在长沙地区的日方华中派遣军一方面应付可能的北进入侵苏联作战，一方面加强湖南地区的作战准备。阿南惟几于九月上旬制定了针对国民政府第九战区薛岳部的作战计划，计划调集第十一军下辖的4个师团及一个战车联队共计四十五个步兵大队、二十六个炮兵大队约12万人的军力进击第九战区。 根据日本派遣军的作战计划计划，阿南惟几制定了不以"占领地方"及"夺取物资"目的，而是摧毁第九战区薛岳部有生力量为目的的作战计划。其将主力并列于狭窄正面，纵深梯次配置，以第 3、第 4、第6师团主力及第18混成旅团等部位于岳阳的桃林、西塘、新开塘地区，为第一梯队，直取长沙；第40师团和第33师团的两个联队位于临湘地区，为第二梯队，沿粤汉铁路两侧及长（沙）岳（阳）古道正面进攻长沙。 另外以第6师团的两个联队由忠防、西塘分两路向大云山实施包围，掩护主力部队集中和展开；以第14独立混成旅团从岳阳乘军舰渡洞庭湖向营田以西地区进攻，保障主力攻击部队右翼安全。

为确保第九战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第3、第5、第6战区对当面日军发起攻击，以牵制日军集中，但是未起到明显效果。第9战区除用相当兵力在赣北、鄂南、湘北袭扰日军后方外，由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集中12个军33个师，一部在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布防，一部在株洲地区机动， 采取逐次抗击日军进攻；诱日军在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歼灭之。

9月7日，日军第6师团两个联队分别由忠防、西塘地区出发，在飞机配合下从东、西、北三面扫荡大云山。中国军队第4、第58军的四个师进行英勇抗

击。8日，日军占领大云山，9日中国军队反击，日军不支退后，16日，日军反击，重新占领大云山。18日拂晓，在杨林以西20千米的狭窄地带，日军主力强渡新墙河，遭中国第4、第58、第20军共六个师的阻击，但日军迅速击溃国军。19日，日军抵汨罗江北岸，随即分路强渡汨罗江，突破中国军队防线，中国守军全线溃退，至21日，日军全部渡过汨罗江，全速前进。此时浏阳、株洲地区第9战区军队依计划逐次加入战斗。第26、第72、第74军自浏阳方向侧击日军；第10、第37、第79军、暂编第2军从长沙以东正面迎击日军；第4、第20、第58军向日军后方攻击。

具体作战如下：

20日 日军破译第九战区薛岳电令汨罗江南岸四个师抵御日军，主力九个师从东侧围攻日军的作战电报。日军进行反迂回，妄图围歼第九战区的精锐七十四军。

21日 第九战区顽强抵抗于平江、金井一线。

22日 日军再次破获第九战区电报，调整战术，从左翼山中迅速突破，第九战区防线崩溃。

23日 第九战区二十六军被日军突围，在突围作战中遭受重大损失，日军各部向长沙进逼。

24、25日 薛岳下令放弃长沙，由七十四军逐次抵御撤退，日军第六师团向捞刀河谷进军，企图围困七十四军。

26日 七十四军与日军第6师团在捞刀河谷遭遇，双方爆发激战。后日军第3师团加入战斗，七十四军不支转进。

27日 日军第4师团渡过浏阳河，冲入长沙西北角，大部突入长沙。

28日 日军第4师团占领长沙，第3师团向株洲方面追击第9战区溃退部队。

29日 日军占领株洲。

10月1日 日军第11军认为“作战已达到目的”，开始逐步退军。6日 日军退至新墙河，双方回复战前对峙状态。

战果

此战日军攻占长沙。之后迅速撤离，国军趁机收复失地，双方恢复战前状态。

第二次长沙会战历时33天，第9战区宣称击毙日军4.8万余人，击落飞机3架，击沉汽艇7艘，使日军攻占长沙的计划宣告破灭。

日方由日本防卫厅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编辑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提出，日方的作战方案是以摧毁第9战区有生力量为目的，而非占据长沙。日方在此次战役以轻微的损失而达到作战目的。

根据日方记录，“早渊支队……翌28日完全占领长沙……第十一军认为完全达到了作战目的，10月1日日落后，开始返回”[2]，“作战结束后，军所报告的战果为：敌交战总兵力约五十万，遗弃尸体五万四千具，被俘四千三百人。日方损失：战死一千六百七十人（内将校一百二十二人）、负伤五千一百八十四人（内将校二百七十二人），去向不明者十四人，马匹战死一千一百六十八匹、负伤一千零九十二匹。”但是日军伤亡实际上很可能远高于此，因为会战期间国军曾经反攻宜昌以牵制进犯长沙的日本第11军，而驻防宜昌的第13师团主力约1.8万人左右(该师团1941年兵力约为26,214人，参与进攻长沙之部队约7,711人，故留守之师团主力兵力约1.8万人，包含8个步兵大队，战斗兵兵力约为1万人)，经过10多日激战，该师团接近崩溃玉碎，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下令烧毁第一线联队送回之军旗与机密文件并准备与各幕僚部长自杀，却因为友军及时支援得以幸免，光第13师团就处于覆灭边缘，日军实际伤亡肯定远超出于公开战报数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8%89%E6%AC%A1%E9%95%BF%E6%B2%99%E4%BC%9A%E6%88%98

第三次长沙会战（日语：第二次長沙作戦），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战役，发生在1941年12月24日至1942年1月16日的湖南和江西北部的部分地区，交战双方为中华民国第9战区司令薛岳所统帅的国民革命军第9战区部队共300,000人与大日本帝国第11军司令阿南惟几所统率的日军第11军共约120,000人，此次战役主要经历日军向长沙推进的外围战斗、攻守双方在长沙城的攻防战斗和日军撤退时国军进行的反击作战三个阶段。在战役指导上国军方面指挥官采用了“天炉战法”对抗日军，而日军指挥官阿南惟几则出现了明显的判断失误，最终导致战役结果为中方成功防守长沙，日方遭受惨重损失撤退而结束，因此又被中国方面称为“长沙大捷”。此次战役是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盟军与日军交战的首场战役胜利。

战役背景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之后，日军占领了中国京汉、粤汉铁路以东的大部分地区，但并未达到迫使重庆国民政府与中国广大军民放弃抵抗的目标。另外由于前期进攻作战中国民革命军在淞沪会战等战役中对日军的逐次打击使得日军亦受到较大损失；日军自身占领广大土地后需要分配兵力防守因

而机动兵力更为薄弱；中国军队在日军占领区的游击战也使得日军需增派兵力防守已占领的地方；日本国内也因战争而使得经济进一步被拖累。因此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乘胜占领岳阳后便停止了进攻，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蒋中正与国军统帅部则称之为“二期抗战”之起点。

自从进入相持阶段之后，两湖平原周边空间成为抗战主要战场之一，分别由第五战区与第九战区负责防务。但是第五战区在1940年枣宜会战遭重创，宜昌与襄阳等遭夺取后重要性锐减；湖南地带就只剩第九战区尚具防御力，而日军华中方面军的主力则是第11军，在湖南战场隔新墙河对峙，并在抗战期间多次交战。1939年9月14日，在二战欧洲战事爆发同时，日军发动了第一次长沙会战。在这次战役起，第九战区部队利用湖南河川水渠遍布的特性布防，并采用“逐次抗击以消耗日军力量；争取外翼以力图后续包围；后退决战以坚守长沙；趁敌溃退以包围歼灭”的战术欲要大量杀伤日军有生力量，然此次日军的作战指挥官时任第十一军司令冈村宁次较为谨慎，在判断其攻占长沙无望之时及时下令撤退，使中国军队围歼日军的战略目标未能达成，然而此次会战也是中国军队第一次成功守住主要城市并击退且杀退日军，因而被中方宣传为：“湘北大捷”。日军冈村宁次则解释此次撤退是“已达到消耗中方第九战区有生力量之战略目的撤退”。

1940年末，法国向德国投降，日军入侵法属印度支那，英美对中国方面增加物质面的援助；包括1941年租借法案将中国纳入供给国范围，并开放滇缅公路维持外援畅通等。日本察觉重庆国民政府方面和谈的意愿剧降，更打算继续打到日军退让时，只能抢先制人打击中方战力；11军军长阿南惟几集中了十余万人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此次战役日军成功破译了国军行动部署的电报，一度成功占领长沙并对国军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然而在中国军队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术向日军占领的湖北宜昌发起反攻，迫使日军须回师救援，因而长沙在被日军攻占后不久即被国军收复，最后战局依旧维持之前态势。中方宣称此次战役为“第二次湘北大捷”，日方则认为此役“给重庆方面第六、第九战区之精锐所部予以重大杀伤”。

双方部署

日军方面

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总指挥：第十一军司令阿南惟几中将。

1941年10月日本国内东条英机内阁上台，进一步扩大了对外战争的规模，同年12月7日，日本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攻击美国夏威夷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月，日军向香港发起进攻，日本中国派遣军命令华中第11军司令阿南惟几发动进攻以策应香港作战。另一方面，由于前两次日军都未能成功攻占长沙，第十一军在日军内部也颇受指责，因此阿南惟几也急于想用攻占长沙来一雪前耻，同时阿南惟几认为，依据所获得的情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军第九战区所部精锐的第四军和第七十四军均被抽调南下，认为此时长沙防御兵力单薄，力主再攻长沙。

然而此时，日军第十一军内部对于是否发起第三次对长沙的进攻意见却较为分歧，不少师旅级高级军官认为：湖南北部从新墙河到长沙一带地形复杂山川河网密布，不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行进，无法发挥其优势，因而不赞成立即进攻长沙。唯仅有当时的第三师团长丰岛房太郎是阿南惟几的老乡兼同窗好友，因而对议案表示支持，最后经过争论，阿南惟几坚持决定进攻长沙。阿南作出如下部署：以第3师团、第6师团、第40师团及独立混成第9旅团、第十四旅团，配以空军、炮兵、坦克及海军舰艇共计12万人马，从岳阳逐次突破以攻占长沙。同时，赣北地区日军部队从南昌实行佯攻以牵制赣北地区中国军队。

国军方面

第三次长沙会战国军总指挥：第九战区司令薛岳上将。

1941年10月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中国抗日战争第九战区司令薛岳即推断日军定会再次进攻长沙，因而也积极进行准备与动员。虽然日军战前的

部署和行动都较为缜密，但第九战区仍从日军赣北部队减少和湘北部队增加等迹象中判断出日军不久即将再次发动长沙攻势。薛岳在总结前两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后，进一步完善了其“天炉战法”，决定依据湘北的地理优势（即“天炉”），在新墙河、汨罗江和捞刀河之间逐次布置防线，以第二十军、第三十七军和第五十八军等部逐次抗击日军以削弱其攻势，从防线撤退下来的部队并不后撤而是撤向两翼，以长沙城为饵，诱使日军向钻往这个“炉底”，令之前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因作战不利而戴罪留任的李玉堂率领其所部第十军为核心守卫长沙城，把日军牵制在炉底。同时，第九战区在长沙城西的湘江对岸岳麓山制高点布置炮兵部队支援城内守军，并动员湘北民众破坏日军在战区的交通线，以之前撤往两翼的部队切断日军补给，待日军攻势受挫补给断绝而被迫撤退之时再将之前外围后撤至两翼的部队会同其他生力军共同从东、西、北等各个方向合围歼灭日军，歼敌地点预定在地形崎岖没有大道的捞刀河与浏阳河之间。

薛岳称：“天炉战法，就是在预定的交战区域，构筑纵深网的环形阵地，部署充分的守军，以伏击、侧击、截击等多种方法逐步消耗敌军，消磨锐气，然后再使用优势兵力，施行反击和反包围，对敌方部队予以歼灭。属于“后退决战”之方法，因敌之变化而变化之歼敌制胜方略，如炉熔铁，又如炼丹，故名。”

战役进程

外围攻防战

1941年12月24日，阿南惟几下令进攻长沙，当天日军第6师团与第40师团开始自新墙河渡河，且利用夜袭与炮击辗压守军防线。第3师团与泽支队则在25日早上发起攻击。24日傍晚恰逢寒潮过境，湖南经历少见的低温和大雪，气温从12摄氏度下降至摄氏零下5度，气温遽降不只造成进军困难，也让日军架桥与渡河都因此延迟；经过2天1夜激战后，防守新墙河的国军第20军和第58军遭日军采燃烧弹破坏防御工事，以致伤亡过半。发动攻势的

第三天（12月27日）下午，新墙河防线大致遭到瓦解，日军则继续南下朝汨罗江防线推进，而守新墙河的国军则按照预定转移至汨罗江二线阵地和两侧山区转移。

1941年12月26日，先行挺进的第6师团已经开始准备向其前进道路上的第二条河流—汨罗江进行渡江作业。27日，第三师团也开到汨罗江；此时国军防守汨罗江的是第37军、99军和从新墙河撤下的58军，而第20军则在平江和平江以北地区布防，中国军队的防线呈现“倒八字”阵型。日军将攻击重点放在长乐街方向以求尽快推进，日军依靠强大的炮火优势和空军支援不到3日即突破了汨罗江阵地，防守的第20军向东转移至山区，第37军和第58军则向高桥一带和汨罗江、捞刀河之间转移。

12月29日，日军第40师团完成横渡汨罗江之作业；然而12月30日晚上，40师团所辖的后勤部队－辎重第40联队遭到国军夜袭，联队长森川敬宇中校战死。这个不算起眼的损失让40师团前线部队在后勤上陷入险境，也为会战后期40师团提早撤退埋下伏笔。

由于汨罗江大部地区以南原本就是田野，外加雨雪天气导致道路泥泞不堪，而湘北地区的百姓又早就把可以通行的大路大为破坏，导致日军渡过汨罗江后诸如坦克和重炮等机械化装备不仅很难推进反而成为累赘。原本依据先前的计划，日军此次长沙作战之“牵制中国军队以策应香港作战”的原先计划已经达到应当撤退。但日军到经过约一周的激战顺利推进至长沙城外，这一战局得阿南惟几十分兴奋，认为此次可以攻占长沙以雪之前未胜之耻，因而继续命令部队向南攻占长沙。然而，中国军队在湘北作战区让开正面向两翼撤退本身就是按薛岳“天炉战法”的预定计划，诱使日军往“炉底”长沙城的重要环节之一。

长沙城攻防战

长沙城位于湘江东岸，隔江对岸的岳麓山是俯瞰长沙全城的制高点，原有

的城墙早已拆除。日军为迅速接近长沙城的核心以尽快攻下长沙，并没有采用逆湘江而上先占岳麓山制高点的进攻路线，而是把湘江东岸作为攻击重点方向由正面进攻。第九战区防守长沙的是李玉堂所部第十军，这支部队在先前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曾因作战不利而遭国军统帅部严厉批评，军长李玉堂也被撤职，仅仅因为暂无接替人选而暂时留任，因而此战对于李玉堂和第十军而言都是“哀兵之战”，李玉堂也立誓守住长沙以洗刷上次战败之耻并得到上方首肯，第十军的官兵也士气高涨喊出了“守住长沙，要回军长”的口号。第十军部队和长沙居民协力在长沙城内布置了周密的防御体系，在城郊，守军工事采用地堡式，依托西面的湘江，对其余各个方向呈半圆形，外围工事由麻园岭—朱家花园—杜家山—二里碑—黄土岭—妙高峰—猴子石的连线，逐层向城市核心构筑，且逐层加大密度和强度，以中山西路—黄兴路—八角亭—南正街—坡子街这一线的核心工事最为坚固。在长沙城内几乎所有主要道路设置铁丝网和地堡，较大体积的建筑物都布置有火力点。为防止日军从湘江水路迂回，第十军把长沙南北两侧湘江水域都用水雷进行封锁。在湘江对岸岳麓山国军布置炮兵对城内守军进行火炮支援。

12月31日至1月2日

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在长沙城内与日军进行激烈巷战。

1941年12月31日日军的第3、第6和第40这三个主攻师团分别进抵长沙城外，并依据计划分别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向长沙发起进攻。1942年1月1日，日军攻势更加猛烈，喊出了“到长沙城过元旦”的口号。日军和国军第十军的主力—方先觉所部预10师首先在长沙南郊的金盆岭至猴子石一线附近展开激战，所部29团依托阵地和迫击炮奋力抵抗，日军也毫不示弱在飞机和火炮掩护下向守军阵地发动了多次猛烈冲锋，战至上午10点，阵地被日军攻占。日军随后推进至由第28团防守的二线阵地，28团团长葛先才率部奋力抵抗一步不退，日军进攻受阻便将主攻方向改向东面和北面，并成

功攻占了东郊和北郊的全部阵地，仅有预10师的阵地仍然未被攻占，28团团长葛先才因战功而被国军统帅部破格提升为“少将团长”。

元旦过后，日军攻势趋于猛烈，长沙形势吃紧，薛岳身边不少参谋人士均劝薛岳将指挥所搬至后防安全地带均被薛岳拒绝，薛岳坚持将指挥所设置在长沙城边的岳麓山就近督战，同时薛岳发布遗嘱电报“如战区司令长官殉职，则以副司令长官罗卓英代行其责”并严令第十军“固守长沙，不得退缩”。担任守城主力的预10师师长方先觉也给妻子准备好遗书，誓与长沙共存亡。1月2日，日军凭借强大的火力优势继续向长沙市区发动猛攻，中国守军按计划退守第二线阵地，其中以修械所一带的战斗最为激烈，日军对国军阵地发起了以营为单位的集团式冲锋，将28团固守的冬瓜山阵地攻占，下午，第29团发起反攻，将阵地收复。原本位于第三线防御阵地的第30团主动出击支援二线友军发起了对日军的突袭。当日，第十军部队协同在白沙岭地区歼灭突入长沙市区的日军第3师团加藤素一大队并击毙大队长。国军士兵从该名少佐大队长身上搜得获得重要机密文件，大意为：“日军弹药匮乏，补给告急”，薛岳获得该情报后，兴奋地说：“有此情报，胜过千军万马”，于是薛岳根据战前部署和敌我双方态势开始部署后续对日军的围歼计划。

1月3日至1月5日

1月3日，长沙城内的战斗趋于白热化，日军两个师团在火力掩护下集中兵力发动步兵强攻，先后攻占了守军二线阵地中的开福寺和陈家山，战至下午4时，日军第3师团工兵营攻入长沙市中心，李玉堂立刻令所部另一个主力师第190师进行封锁和阻击，日军工兵擅长攀上爬下于守军对制高点进行了激烈争夺。此时，预10师师长方先觉认为，若二线阵地被日军突破就只能据守城垣，因此必须清除城垣前的射击障碍，于是下令将妙高峰下的长街全部焚毁。就在长沙城内中日两军进行近身肉搏战之时，湘江对岸岳麓山上的炮兵利用地形上的绝对优势，对城内的日军进行了猛烈的炮火打

击，使攻城日军伤亡很大。

1月4日，日军再次对长沙市中心发动全面猛攻，双方在国货陈列馆和湘雅医院等重要位置进行了反复争夺均有不少伤亡，岳麓山炮兵则依靠东北风的有力风向继续对日军进行打击。经过数日的激战，第十军伤亡已接近三分之一，但仍旧士气不减继续与日军进行逐屋逐巷的争夺。此时，薛岳正在调兵遣将准备围歼长沙城内日军，而阿南惟几既不知晓己方情报已被截获，也不知道中国军队正从各个方向前往长沙准备反攻，依旧命令所部尽快攻下长沙城。入夜，中国军队已经到达日军背后对日军形成夹击，然而此时阿南惟几仍未下令立即撤退仍固执欲要攻占长沙，日本国内甚至还发表了“日军已经占领长沙”的消息。次日，时任十一军的参谋长木下勇少将和其他参谋都认为若再不撤退就可能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于是全体力劝阿南惟几立刻下令撤退，阿南惟几于是下令部队向东山等方向撤退并在撤退时发起最后进攻以作掩护和隐蔽，日军攻占长沙的计划宣告失败。

撤退与截击

日军匆忙从长沙撤退并向北突围

在日军大举进攻长沙城之时，薛岳就开始部署对日军后期的歼灭战，蒋中正不仅应薛岳请求将先前从第九战区调走第四军和七十四军调回，还将七十三军和九十九军也交由薛岳调配，薛岳在得知日军正面临弹药缺乏且补给困难之时，立刻电令第九战区共九个军的兵力从东南、东北、西面和北面四个方向对日军进行合围。具体部署如下：第二十六军和第七十三军在浏阳河一线向北追击；第四军由株洲向北追击；第五十八军和第二十军在汨罗江由北向南堵击；第七十八军和第三十七军由东向西截击；第九十九军在石子铺以北、新市以南由西向东截击。

长沙城至汨罗江

1月5日就在第九战区的反攻部队已经打到长沙城外围日军背后之时，阿南

惟几才被迫下令日军全线撤退，日军反转始遭受国军原本在各处的部队包抄追击，湘北当时天气转坏，使得日军飞机无法进行支援；原本藏匿在影珠山、古华山内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军对掩护撤退的日军发起攻击，当时自影珠山东侧北撤的部队为第3师团、西侧北上的部队是第6师团。日军掩护主要师级部队的单位为第九混成旅，为了掩护大部队撤离争取时间而发起攻击。该部队的山崎茂上尉组成混编攻击组（集成大队、约3百余人）在1月8日晚上朝影珠山北部发起夜袭，试图摧毁该区的国军指挥中枢；最后该部队在影珠山腰子坡遭到歼灭，国军在伤亡4百余人的代价使日军全员阵亡，山崎大队遭到歼灭给阿南惟几带来相当震撼。

国民革命军在日军撤退之路上截击日军。日军先头部队遭到阻击后，才知路上有中国军队拦击，于次日拂晓以主力向国军阵地猛攻，第二十军主力133师全力顶住了日军的反扑，日军正面进攻受挫则改为夜袭，将第五十八军的第10师击溃。但在捞刀河与汨罗江之间日军撤退极为艰难，国军第20军和第58军在影珠山和古华山对日军发动伏击，日军最终突破了国军的在此地的包围，但付出较大伤亡，也被国军夺取不少武器，由于日间行军易遭国军发现，日军多选择夜行，然而由于夜间不熟地形，导致无法正确辨别方位，抓捕中国百姓带路则基本都会被带进国军的伏击圈。

日军第六师团是之前参加南京大屠杀的主力部队，早在会战开始时中国军队中就出现“和第六师团同归于尽！为死难同胞报仇雪恨！”的口号，因此在撤退中第六师团先后遭到第七十三军和第九十九军等部队猛烈的攻击，伤亡惨重。日军为突破包围也奋力接战，在弹药不足和补给匮乏的情况下，顶住国军的炮火，以白刃战法进行突围，战至1月8日，第6师团成功突破捞刀河，向汨罗江开进。此时，阿南惟几突然改变命令，令第6师团改变行军路线，并且必须在前进中消灭国军的截击部队，这一临阵突变使得第6师团再次陷入国军7个师的包围，战斗极度被动。日军为了救援被国军围追

堵截的部队，派出第9混成旅团南下接应，但在影珠山遭到国军部队的抵抗，未能达成目的，第9旅团山崎集成大队被国军全歼。第3师团大青山一带遭到国军第四军、第二十六军和第七十八军的攻击，师团长丰岛房太郎负伤。第40师团沿途遭到第三十七军和第七十八军轮番多次的侧击和截击，其中第236联队损失惨重，多名军官阵亡。1月14日，日军经过苦战终于渡过汨罗江向新墙河推进。

汨罗江至新墙河

在1月14日至1月16日，第九战区所部第20军、第37军、第58军、第73军、第78军等部在汨罗江之新墙河之间地区向日军发起拦击、追击和侧击，同日军发生四次激烈的包围与突围战斗，部分国军部队甚至追过新墙河，攻入原本的日军防区，然而始终未能对日军形成完整的大建制的包围和歼灭，日军尽管在撤退中伤亡惨重且极为狼狈，但指挥系统仍能有效发挥，且在极度困难的状态下各部队的战斗意志依旧坚定。1月15日战区天气转好，阿南惟几立即派出18架飞机进行低空轰炸，在空军的掩护下，日军在1月16日成功突围并撤回到新墙河北岸。在12天的撤退中，日军因遭到国军的猛烈围堵攻击而伤亡巨大，仅有1.3万人成功撤回，日军以往不留尸体于战场的惯例也被迫放弃，在战斗地点留下大量尸体未能带回。在湘北地区双方交战开始后，按计划为牵制国军而在赣北地区发起佯攻的日军部队约3000余人在向中国守军阵地发起进攻，但3天后被赣北地区的国军击退撤回原防地。至1月16日，交战双方依旧恢复沿新墙河对峙的战前态势，第三次长沙会战至此全部结束。

结果及后续

统计与反响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成功击退日军进攻，据国军战报记载，日军伤亡在65%以上，损耗无计。 此战被认为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军事上的重大

胜利。

更重要的是，1941年12月初日军刚偷袭珍珠港，陆军席卷东南亚，同盟国军屡战屡败，中华民国军队在长沙的胜利显然成为政治上的强心针，进而引起当时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美国总统罗斯福称：“盟军的胜利，全赖华军长沙大捷”，英国媒体也用“在此远东阴云密布之际，唯有长沙上空之云彩确切光辉夺目”的标题进行报道。苏联和西方同盟国也有大批记者和参观团来到长沙进行访问。由于李玉堂等将领指挥第十军成功防守长沙，在战役结束后，原本属“待罪留任”的军长李玉堂升任27集团军副司令，原预10师师长方先觉升任第10军军长，原28团少将团长葛先才升任预10师副师长，其他战斗中获得战功的将领也得到了国军统帅部的奖励。中方此战虽然获胜，但也总结认为在后期截击日军的作战中，国军忽略了重点控制渡河点并未能强力破坏日军渡河设备从而使得日军未受到大建制的歼灭性打击；日方则认为，此战准备不足，在过程中多次更改命令指挥失当，使得作战陷于被动。

后续发展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之后，中国第九战区召开了大规模的庆祝大会。在此之后的两年内，日军再没有向第九战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然而，第九战区部队尤其是长沙一线守军由于长期相持亦放松了警惕，日军则在此战后总结了经验教训，于是在1944年的长衡会战中，日军经过充分准备，集中主力20余万人向第九战区发动攻势，并改变进军策略，改由湘江逆水而上先夺取岳麓山炮兵阵地，在1944年的第四次长沙会战中日军成功攻占长沙，并在整个长衡会战中将第九战区击溃而使其至战争结束都再无反击能力。唯在衡阳保卫战中，第十军孤军坚守衡阳长达47天并重创日军，大大延缓了日军打通其“陆上交通线”计划的进程，令日本国内生产原料匮乏，从而为中国军队会同盟军在滇西和缅北的反攻作战及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作战创造了战略优势。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A1%E9%98%B3%E4%BF%9D%E5%8D%AB%E6%88%98

衡阳保卫战是发生在1944年6月22日到1944年8月8日之间中国抗日战争后期最惨烈的一场城市争夺战。衡阳保卫战是中国抗战史上最成功的战役和以寡敌众的最典型战例，被誉为“中国的莫斯科保卫战”。衡阳保卫战是中国整个抗战史中作战时间最长、双方伤亡士兵最多、程度最为惨烈的城市争夺战，也是日本战史中记载的唯一一次日军伤亡超过中国军队的战例。

背景

战时衡阳

衡阳是湖南中南部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是两广的门户。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重心向西移，大批的工商业、金融机构、文化机关也纷纷迁移到衡阳境内，促进了衡阳经济的发展，战时的衡阳还有“小上海”之称，也是仅次于重庆、昆明的第三大工商业城市和金融中心。胡阙文的新民机器厂、周锦水的华城电器厂、谈家骏、吴士熏的立达铁工厂、叶佑阶的民生铁工厂、祝燮臣的机器厂、石庆福的固华电器修理厂、张曰琳的琳记机器厂、江仁归的永生化工厂等都在战时迁入衡阳，衡阳城郊的白沙洲、黄茶岭、合江套等地遍布着工厂。据文史资料记载，至1943年，衡阳稍具规模的工厂共有215家，手工业近千家，有职工约

1万余人。

为了满足当时市场的需要，工商户甘冒空袭之险，仍将店堂修饰一新，商品品种繁多，花样新颖，上午车运郊外防空，下午返店开市，营业直至午夜，甚至通宵达旦，因此战时衡阳号称“不夜城”之称。葛先才师长回忆衡阳城“自蒸水口至黄茶岭以上约十余华里之湘江两岸工厂林立，盛况空前”、“湘江有轮渡两艘对开，可见江面之宽，商旅之繁”。第十军士兵蒋鸿熙回忆衡阳城“车水马龙，百货俱全”，非常繁荣。南岳衡山还一度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在地，蒋介石在南岳衡山召开了四次南岳军事会议。

战争谋划

一号作战计划

1944年春，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失利，导致日军的海上交通补给线接近瘫痪。因此，日军急于打通一条大陆交通线。日本军方制定《指导一号作战的基本方针》，内容可以概括为：歼灭中国的空军基地以阻止中国空军空袭日本本土；打通粤汉、湘桂以及京汉铁路南部，实现与南方地区的铁路联络；沉重打击国军主力，使国民政府无力继续作战。

日本将一号作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京汉作战，中方称为豫中会战，第二阶段为湘桂作战，中方称为长衡会战及桂柳会战。

保卫战前夕

进驻衡阳

6月2日，第10军军长方先觉率领部队进驻衡阳，与原守城第54师饶少伟会合。5月29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国军以确保西南中美空军基地基安全，迟滞日军进攻，守衡阳之两个星期，有效阻敌深入”，第54师饶少伟接获电令。

战局部署

方先觉军长和各师长检查了衡阳外围的国防工事，发现阵地范围太大，现有军力不能周密防守。经过研究，衡阳守军决定放弃既有工事，把防御工地向内收缩，重新规划为：

第3师，全部主力部队防卫衡阳城内，并适时调兵协调其它守成区防线。

第190师，主力占领五马归槽、橡皮塘、莲花之线，保持重点于右翼；一个营附师战防炮连在泉溪市耒河西岸新码头构成前进据点；一个部在酃湖南岸铁路堤经湖之西岸，湾塘至蜈蚣桥之线，占领警戒阵地。

预备第10师，以一部占领马王庙、托里坑、欧家町、黄茶岭之线警戒阵地；主力占领汽车西站、虎形巢、张家山、枫树山、五桂岭、江西会馆之线；并以一连占领停兵山、高岭两独立据点，确实固守。

暂编第54师（一个团的兵力），以一部在东家湾亘何家山之线，占领警戒阵地；主力占领冯家冲，沿耒河左岸，至耒河口之线，构成据点阵地，重点保持于左翼。

新编第19师（一个营的兵力），以占领来雁塔迄望城坳间据点阵地；以一部于高家塘、三里亭、胡坳、马王庙之线，占领警戒阵地；主力占领草桥、辖神渡、瓦子坪至汽车西站之线，重点保持于瓦子坪、汽车西站间地区，并于杜家港、易赖庙前街、青山街、杜仙庙、杨林庙之线，构筑预备阵地。

衡阳警备保安志愿队（一个连的兵力），全部主力占领石鼓嘴一地，防止敌人从汽车西站之线深入。

炮兵部队（野山炮共147门）在雁峰寺、县政府、益阳路、万国商场附近，清泉路西侧地区，占领阵地。

军司令部位置于中央银行；前进指挥所位置于五桂领。

物资准备

美军林赛准将在昆明为衡阳守军准备了一批装备：9门37战防炮、6门75山炮、26门臼炮、2支火箭筒。

第十军军属炮兵营在营长张作祥中校的带领下，去昆明领取这批武器，并接受训练。在返回衡阳过程中，却被广西桂林境内的炮兵第一旅扣留，欲吞并整炮兵营和所有武器，经上报蒋介石委员长，炮兵营才得以离开广西。途中炮兵营数度遭遇日军小部队，经艰难战斗终保全这批美式武器。

6月中旬，蒋介石特派后勤部长俞飞鹏来衡阳城处理第十军补给事宜，在围城之前，抢运入衡阳城的粮弹有530万发步枪枪弹、28000枚手榴弹、迫击炮弹3200发。

居民撤离

为了减少居民伤亡，方先觉军长劝导当时衡阳全市30万市民离开衡阳。经过商量，粤汉铁路局和湘桂铁路局同意调整火车于火车东西两站疏散衡阳市民。逃难的衡阳市民分两路，南行者乘粤汉路车，西行者乘湘桂路车，军部派参谋人员在车站协助疏散。

周边失守

经过第四次长沙会战，1944年6月18日，长沙最终沦陷。长沙沦陷前后，醴陵、湘潭、株洲等地也相继失守。衡阳处于日军包围之中。

参战部队

中国方面

参与衡阳保卫战的中国军队仅有一万五千余人。

方先觉所辖第十军原编制三个师：第3师、预备第10师、190师。但190师为后调师，大部分为干部只有少数兵员。后来又加入了原守衡阳城的第54师，但第54师只有一个团，之后紧急招募所有衡阳城内现役警察和警务后勤人员加编衡阳警备保安志愿队，虽然衡阳警备保安志愿队只有一个连兵力也划归新编第19师指挥。第十军还有直属工兵部队：含战车防炮连、野炮兵连、山炮兵连。

此外，空军第4大队也从21中队、22中队、23中队中抽调出25架P-40战斗机，支援衡阳战场。

日本方面

中国军队作战序列

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中将

第3师，师长周庆祥

第7团，团长方人杰上校

第8团，团长张金祥上校

第9团，团长萧圭田上校

预备第10师，师长葛先才少将

第28团，团长曾京上校

第29团，团长朱光基上校

第30团，团长陈德坒上校

190师(后调师)，师长容有略少将

第568团，团长俞延龄上校

第569团，团长梁子超上校

第570团，团长贺光耀上校

暂编第54师，师长饶少伟少将

新编第19师

衡阳警备保安志愿队

第10军直属工兵部队

战车防炮连

野炮兵连

山炮兵连

日本军队作战序列

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陆士21期）中将

第68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为人（陆士22期）中将（后为堤三树男（陆士22期）中将）

步兵第57旅团，旅团长志摩源吉（陆士23期）少将

步兵第58旅团，旅团长大田贞昌（陆士23期）少将

第116师团，师团长岩永汪（陆士24期）中将

步兵第109联队，联队长泷寺保三郎大佐

步兵第120联队，联队长和尔基隆大佐

步兵第133联队，联队长黑濑平一大佐

第13师团，师团长赤鹿理（陆士22期）中将

步兵第185联队，联队长伊藤义彰大佐

步兵第104联队，联队长海福三千雄大佐

步兵第116联队，联队长大坪进大佐

第40师团，师团长青木成一（陆士24期）中将（后为宫川有三（陆士25期）中将）

步兵第234联队，联队长户田义直（陆士27期）大佐

步兵第235联队，联队长堀内胜身大佐

步兵第236联队，联队长小柴俊男大佐

第58师团，师团长毛利末广（陆士23期）中将

步兵第51旅团，旅团长野沟叁彦（陆士22期）少将

步兵第52旅团，旅团长古贺龙太郎（陆士22期）少将

独立步兵第5旅团，旅团长野地嘉平（陆士23期）少将

战役过程

江东岸及警戒阵地战斗

首次接触

6月19日，日军先头部队于在下摄司、易俗河附近，与国军第3师接触。第3师侦知日军的大部队正由湘江东西两岸兼程南进，第3师以一部沿湘江东岸与日军实施迟滞作战，以阻扰日军的前进。

城区轰炸

6月22日，日军飞机首度轰炸衡阳城，湘江两岸市区均引起大火。自此以后每日，日军飞机都会飞临衡阳市区和衡阳飞机场轰炸、投放燃烧弹，衡阳城城区连接大火，预第10师第28团及军直属部队，四处奔走进行消防灭火工作。

耒水之战

6月22日晚上8点，日军第68师团由株洲、渌口沿湘江东岸南下，抵达衡阳城东30里外的泉溪市，耒水西岸驻守着第十军的190师568团第1营的少数警戒部队，警戒部队当即与日军交火，将日军击退，与日军在耒水两岸对峙。

6月23日，拂晓，日军第68师团再次欲从泉溪市强渡耒水，向着国军据守的新码头发动攻击，国军190师568团第1营营长杨济和指挥士兵以战防炮和机枪打翻日军的木船和橡皮舟。

午后，日军知道正面强渡耒水不易，就先以一部隔着耒水佯攻，主力部队潜入泉溪市南边，绕越渡过耒水。国军190师568团第1营西撤，进入衡阳东约12里的五马归槽据点。

日军第一次总攻击

6月27日，渡过湘江的日军猛攻，进抵欧家町、黄茶岭，向停兵山、高岭、江西会馆主阵地猛攻。

6月28日，日军力图合围衡阳，发起了第一次总攻击。城南作为正面战场，

战斗最为猛烈，双方争夺张家山高地数日反复达20多次，阵地依然在国军控制中。停兵山、高岭据点守军全部牺牲，无一生还，日军被歼亦不下千人。

7月2日，日军暂停进攻。

日军第二次总攻击

7月11日，晨，日军发起第二次总攻击，向衡阳城垣倾泻大量炸弹、燃烧弹和毒气弹。日军付出极大的代价，也无法接近守军的核心阵地。

7月12日，日军攻占虎形巢。

7月15日，守军退西禅寺、张飞山，改守第二线。日军攻击重点从衡阳西南转向城之外廓。

7月16日，市民医院南端高地失陷。日军攻击转向西北郊。第二次总攻失败，日军战史："我军再度发起总攻击，与上次一样，仅夺取极小部分阵地外无所进展，损失却更惨重，大部分步兵连已由士官代理连长，战况并不乐观，于是攻击再度停止。"

7月17日，日军对衡阳城猛烈轰炸，逐次夺取城郊据点，压缩包围圈。

7月19日，日军再次停止进攻。

7月21日，日军佯装退兵，引诱守军出击，又空投"归来证"，向第10军诱降。

7月27日、8月2日，中国空军两次向衡阳城内投下蒋介石的手令，要求方先觉军坚守衡阳城待援。7月27日，蒋中正令方先觉："守城官兵艰苦与牺牲情形，余已深知，此时只有督率所部，决心死守，以待外援之接应。非万不得已，不必发电详报，以免被敌军偷译。"8月2日，蒋中正令方先觉：

“此次衡阳之得失，实为国家存亡所关，决非普通之成败可比。……第二次各路增援部队，今晨皆已如期到达……。”

8月3日，日军对衡阳大肆轰炸。

日军第三次总攻击

8月4日，日军第11军横山司令官聚集第40、58、68、116师团及13师团一部，57旅团，11万人，轻重炮100余门，炮弹40000发，对国军阵地发动第三次总攻。以飞机大炮向核心阵地和市 区狂轰滥炸，4个半师团的日军从南北西三面猛攻核心阵地。

8月7日，敌机和炮兵继续进行轰炸，扫射和施放毒气。在伤亡惨重以及弹尽援绝之下，军长方先觉命参谋长孙鸣玉起草最后一电：“敌人今晨由北城突入之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已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国，免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系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职方先觉率参谋长孙鸣玉、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同叩。”

8月8日，凌晨四时，日军逼近第10军指挥部所在地中央银行，方先觉军长与其他师长被俘，衡阳沦陷。日军第11军以竹内参谋为代表入城谈判，双方同意停战，日方并承诺保全守军官兵安全。

伤亡人数

日军在衡阳之战中使用了毒气。据美军十四航空队化学战情报官汤姆生上尉（Ralph Thompson）的研判，日军所使用的是芥子气与路易氏剂混合物。

国军：第十军方先觉总数约-九个团-17,600余人，伤亡15,000余人，其中死亡约7,600人。

日军：第11军横山勇总数约-五个师团-近14万余人，伤亡约70,000余人,其中阵亡约48,000余人。根据日方公开的资料包括志摩源吉少将在内，士官以上战死390名，负伤520人；总死伤19,380人。

中国平民：3174人

关于志摩源吉被击毙的记载有二种：

国军的记载：8 月 6 日中午，志摩源吉出现在衡阳市民医院附近，被第八团迫击炮连连长刘和生发现，刘和生用8发炮弹轰击，炸死志摩源吉。日军的记载：志摩源吉到衡阳市民医院西南角的第六十一大队阵地视察，被一名国军狙击手以两发子弹爆头。

据第40军老兵常紫光回忆，在真武庙附近的战斗中，很多战士将手榴弹绑在身上扑向日军与其同归于尽，空气中弥漫着人肉被炙烤的焦糊味。据第十军预10师老兵彭忠荣回忆，他的两个排长都牺牲了，他的连原有118人，保卫战后只剩13个。据74军炮兵团野营士兵冯宗恺回忆，他所在的营五、六两连官兵200多人参战，只有不足50人幸存。

日军在衡暴行

杀人

6月，日军侵入南岳。据佛教刊物《海潮音》记载，南岳和衡阳城区被残杀的僧尼达200人，以南岳居多。7月2日，日军志摩支队攻陷衡阳城郊古渡口辖神渡。时年16岁的杨善璟见证，日军对着村民机枪扫射，村里很多家庭全家被杀害，还有人因喝了日军投放细菌的水病死。时年8岁的谢笃元见证，街上到处都是尸体，亲父被日军捉去做伙夫的次日就被打死。7月21日，驻扎在霞流火车站的一小队日军外出掳抢，其中两个日本兵在东塘欲强奸一洪姓少女，少女的父亲及叔叔用耙头打死日军一人，但一人脱逃回队报信。第二天，日军小队全体出动，报复性地屠杀当地居民18人，烧毁

房屋235间，使10个村庄200多人无家可归。11月23日，日军在东街外珍珠山罗家坳无故枪杀五名群众，并刀割肉喂狼狗。

第582团炮兵排长汤毓云7月11日目睹，衡阳南郊一座荒废的寺庙全是当地村民尸体，池塘内都漂满了尸体。

诗人洛夫的家人由市区逃去衡南县相市乡避难，洛夫大哥莫祥林和堂叔莫景松被日军抓去干苦力，莫景松被日军刺刀杀死。莫祥林也听说自己在成章中学的英语老师段辉在衡南县茶市遭日军枪杀，师母被强奸后自杀的事。

强奸

6月下旬，日军进入衡山县潭泊街，拦截逃难妇女数十名，关入潭泊港内大禾场一民房，集体奸淫。多名妇女被奸杀。8月某日傍晚，一队日本兵强奸旧衡阳县小司堰刘家全家妇女。衡阳市民刘隆祥回忆，他避难的广塘村6月30日被日军侵入后，当天就有12名妇女被强奸。广塘村及附近村子多名妇女被奸污后或跳河自尽或精神失常走失，附近池塘水坝经常出现溺水女尸。衡阳籍女作家琼瑶回忆，陈氏全家在衡阳乡间山里逃难时，母亲险被一日本军官强暴，经琼瑶幼弟哭泣才使日军放弃邪念。7月的一天，诗人洛夫的大哥莫祥林目睹8个日军在耒水上抢劫渡船，轮奸了4个逃避不及的农村姑娘。据战后调查，仅在旧衡阳县鸡笼街一地，日本兵就强奸了500多名妇女。常宁县内，妇女被强奸50567人次。祁阳县（今祁东县）共有3873名妇女被强奸。

衡阳民众因阻止强奸行为，而遭到杀害的案例也有很多：

时年9岁的衡东县居民袁立业见证，药铺塘西岸 60 岁的“财大娘”因阻止日军强奸其14岁侄女，被刺17刀身亡。

7月5日，南岳广济庵清传和尚因援救被强奸妇女被日军刺杀。

7月20日，一个日军在衡山东塘村强奸17岁少女，被少女的父亲和叔父打死，日军随后报复屠杀24名东塘村村民。

12月，一日军在南岳枫木桥强奸女被村民处死，村民又被日军枪杀13人。

建筑破坏

琼瑶回忆道，正在衡阳县渣江镇农村的她都能看到衡阳城的大火，火光将黑夜都映成红色。石鼓书院先因1939年的日军突袭而被炸成废墟，在衡阳保卫战期间进一步被毁，石鼓山变成光山秃岭。省立衡阳图书馆（今衡阳市图书馆）馆舍被炸，藏书仅存2000余册。6月23日，日军先头部队在入侵衡南泉溪、茶园(土皂)时放火烧毁店铺500多家。

文物破坏

书画名家曾熙的书画作品多由家人带回石市乡老家，在日军入侵后遭到破坏，画作被日军拿来垫马圈。

保卫战影响

衡阳会战对日军而言，可说是在中国战场上，最惨烈的一战，后来依据日军曾参战的官兵描述衡阳之战，中国军队根本是拿手榴弹当刺刀在使用，国军将三颗手榴弹串成一串，看到人影就丢，日本第11军伤亡惨重。

血战间日军的兵力前后补充了三次。在城郊的阵地争夺战中，日军付出了损失两万多人的代价，而中国守军至最终只损失了不到一万人，这种战损比在当时日军中是不可接受的。包括了日军第68师团长佐久间中将、参谋长原田贞大佐残废，和第57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阵亡才得以近逼市区。血战期间在日本国内更因各地的战况不利，导致东条英机的军人政府因而倒台。

衡阳战役的历史意义在于延缓了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的步伐进程，

加剧了日本内阁的危机，并最终导致了东条内阁的垮台。

当时时文表示“衡阳驻军及人民，乃以英勇姿态，展开抗战史中最光荣之一页，相持48日（按实际47日）不徒予后方以从容布置之时间，且使太平洋美国毫不顾虑而取塞班岛。东条内阁穷于应付而急遽崩溃。”

对保卫战的评价

1944年，蒋中正电令全国部队于8月20日，在各防区内向衡阳阵亡守军致敬。由于衡阳保卫战的战绩，方先觉所率第十军各师师长均获颁青天白日勋章，使得第十军成为中华民国建军史上至今唯一一个师长以上将官共获得青天白日勋章达到四座的军级部队。

《大公报》社论：“拿衡阳做榜样，每一个大城市都打四十七天，一个个地硬打，一处处地死拼，请问：日寇的命运还有几个四十七天？”

《救国日报》社论：“抗战八年，战死疆场之英雄烈士，至少数十万人；而保卫国土，致死不屈者，亦不在少数；但其对国家贡献之大，于全局胜败有决定作用者，当为衡阳守军。”

1947年8月10日，衡阳抗战纪念城在岳屏山顶举行了命名奠基典礼时，蒋介石总统颁训词：“我第十军残余部队，喋血苦守此兀然孤城者，历时48日之久，此为全世界稀有之奇绩，而我中华固有道德之表现与发扬，亦以此为最显著。”

衡阳沦陷期间

将领遭遇

衡阳沦陷后，方先觉和众师长被囚禁于衡阳城外的天主堂。

7月左右，第3师师长周庆祥少将、第十军参谋长孙鸣玉少将二人在天主堂

翻墙逃走。10月间，方先觉在军统局特工的帮助下逃离衡阳城。

经过两次越狱，日军将剩下的国军将领转而囚禁于莲湖书院。约45年2月，葛先才师长与军部军械科长罗生靖中校等人，在衡阳县政府保安大队和中央特工人员的掩护下，通过草桥逃离，在湘西芷江飞机场乘美国运输机飞往重庆。

士兵遭遇

衡阳沦陷时，部分守军逃往城外，如第74军炮兵团野营的冯宗恺、彭锦元和两名受伤士兵逃到原驻衡南白露坳、衡山九渡铺以西山地。战防炮营第一连连长朱懋禄与部下用两根木头顺湘江漂流而下，半个多月后到达桂林。一九〇师五六八团一营三连连长陈鹤九带着43名同伴偷渡湘江，留下地址后分别逃亡。第十军三师参谋处的陈瑞璋和王鉴开，攥着手榴弹，小心躲开日军，朝西南跑向六十二军防区。

日军将衡阳东洲岛上的船山书院用于囚禁中国士兵战俘。其中有中国士兵找机会逃离：74军51师士兵曾琪与几名战士趁着日军防备松懈，逃到衡阳城外。第十军预10师彭中荣彭中志兄弟趁看守日军睡着，假扮买菜日军逃离衡阳城。第十军预十师28团3营李若栋营长从铁炉门码头抱木漂江而下，逃离衡阳城，并在衡山组织游击队，并在花桥设立“衡东收容所”，收容逃离衡阳城的第十军战士。

日军将中国战俘强迫做苦力，部分中国士兵在外出时寻找机会逃离。如第十军军部通讯营的卢庆贻在被日军押着朝零陵方向行进时，联合10多名被俘人员杀掉看押他们的日本兵，逃往山中，后在武冈县城被国军第七十四军收留。如第十军三师通信连无线电排少尉报务员张恩泽被日军押去修机场，十个月后趁给日本兵买烟的机会逃走，辗转到达西安第十军官兵收容所，去了广西柳州。如炮兵观察哨的彭礼光被日军驱赶到城南收集尸体，趁着天黑跳进西禅寺附近的莲塘，借机逃生。

现今社会

保卫战老兵

姓名　出生年月　　贯籍　抗战期间情况　　　二十一世纪初状态

卢庆贻　　　约1928年　　湖南长沙　　1945年8月6日傍晚，值班的卢庆贻替军长方先觉发出给蒋介石的最后一封加密电报　　居于湘潭市雨湖区姜畲镇

石永固　　　约1920年　　河南永城　　参与了长衡会战（第四次长沙会战和衡阳保卫战），并在衡阳保卫战期间负伤　居住于南京向阳养老院

常紫光　　　约1920年　　四川成都　　母亲与妹妹在日军突袭中炸死，决定投笔从戎，隶属于国军第40军，保卫战期间奉命保卫衡阳机场　居于成都市铜丝街

冯宗恺　　　1920年3月　广西博白　　衡阳保卫战期间任74军炮兵团野营第六连上尉连长，驻守在回雁峰

周慎　约1915年　　　　　　　现居于衡阳县集兵滩

王水根　　　1921年　　　浙江萧山　　加入第10军预10师28团2营5连，衡阳保卫战期间镇守衡阳南门

彭中荣　　　1919年　　　湖南长沙　　衡阳保卫战时任第十军预10师第29团迫击炮连连长。

彭中志　　　　　　湖南长沙　　彭中荣之弟，与兄同隶属第十军预10师第29团

杨光荣　　　约1919年　　　　　衡阳保卫战时任第五军48师战车防卫炮炮兵连第四连连长

彭火昌　　　1910年10月　广东兴宁　　第十军第190师第568团1营士兵，在衡阳保卫战序幕时据守耒水西岸

蒋鸿熙　　　　　　　　　　　　解放后回到苏北农村教书，1989年去世，家人在2005年将他的回忆手稿出版

曾琪　1924年　　　湖南衡阳　　加入国军74军51师，衡阳保卫战时在天马山和黄茶岭一带作战。　2013年10月19日去世

张恩泽　　　约1926年出生　　　湖南长沙　　第十军三师通信连无线电排少尉报务员　　　解放后在重庆一罐头厂工作至退休，2013年病故。

聂鼎权　　　1914年5月　　四川仪陇　　工兵学校毕业后分到第10军第3师,任少尉排长　　　抗战后在湖南开电车，后定居郴州市安仁县，2014年病故。

地点的改变

西禅寺：西禅寺如今已不存在，只留下一棵百年古樟。

张家山：改名胜利山，现为衡阳市气象局所在地，衡阳市计划修建张家山抗战遗址园。

花药寺：已被炸毁，原址位于衡阳市动物园。衡阳市民族宗教界人士座谈会讨论过重建花药寺的事宜，但至今未果。

史料文物收藏

衡阳市档案局和衡阳市档案馆收藏有一批市民捐赠的文物史料，包括160张日本人所摄照片和军事邮便，5件抗战时期的望远镜等实物，《衡阳忠义录》审编稿(1-3卷合订本)等。衡阳地方志专家萧培多年收集衡阳保卫战相

关史料，被称为衡阳研究衡阳保卫战第一人。2017年8月，在东洲岛进行的考古调勘中，发现了几十颗锈蚀的子弹，应为日军遗留。

战争遗留问题

衡阳保卫战在衡阳部分地区留下了废旧子弹枪炮。2006年2月，衡阳县樟树乡村民莫运七锄田时锄中一颗战争遗留子弹，子弹射进莫运七左眼，致使左眼被摘除。衡阳市动物园原为战场之一—花药寺的后殿。2006年，动物园工作人员在水塘里挖出了近500颗子弹。2016年，动物园工作人员在园内一小山坡上挖到了一枚长约20厘米，宽约8厘米的小钢炮。2014年12月9日，衡阳市公安局将近年来在衡阳市建筑工地和河道中发现的一批战时废旧炮弹，运至衡东县某空军靶场集中销毁。

纪念设施

南岳忠烈祠纪念堂

衡阳抗日英雄纪念城：1947年8月10日，国民政府为纪念衡阳保卫战中牺牲将士，在衡阳市岳屏山上建立了衡阳抗战纪念城，由蒋介石亲笔题字衡阳抗日英雄纪念碑。中共建政后，纪念碑上的蒋介石题字被下令剔除。现存文字为1984年重刻。

衡阳保卫战陈列馆：位于岳屏山西南山麓，由民革衡阳市委发起，2016年开始动工。

南岳忠烈祠：2014年9月1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的通知》，衡阳抗战纪念城和南岳忠烈祠列入名录。

华新开发区陆家新屋里的衡阳保卫战纪念馆

张家山烈士墓：2014年9月，衡阳市委和衡阳市政府拟在张家山（今改名胜

利山）规划建设衡阳保卫战纪念园。2015年12月，衡阳市人民政府将张家山烈士墓（全名“陆军第10军衡阳保护战阵亡将士之墓”）列为衡阳市文物保护单位。

衡阳保卫战纪念馆：2005年，衡阳市华新开发区在开发的过程将已废弃的陆家新屋组织修复，并在左厢房建立了衡阳保卫战纪念馆。

纪念活动

衡阳市各文化场馆会不定时举行演讲、展览等各类宣传活动，衡阳市民也会自发或在组织下到衡阳抗战纪念城或南岳忠烈祠悼念牺牲将士。

2015年为抗战70周年，社会各界举行了各类纪念活动：

7月，郝柏村来到衡阳市张家山祭拜抗日烈士，呼吁为张家山抗战烈士立碑。8月，民盟衡阳市委和衡阳古玩城共同举办纪念衡阳保卫战文艺演出和集邮展。9月2日，衡阳钢雕艺术大师杨君林创作的《铁血屏障》钢雕在晶珠广场展出，钢雕高4.7米，重1.7吨，分别象征保卫战的天数和将士数。9月6日，“孤城涅槃——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摄影图片展”在衡阳市博物馆，仪式上博物馆接受了多位收藏家捐赠的衡阳保卫战文物。

2019年3月，来参加首届衡阳国际马拉松赛的一支退伍老兵队伍来到衡阳抗战纪念城祭扫。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1%82%E5%8D%97%E4%BC%9A%E6%88%98

桂南会战，发生在1939年11月－1940年2月，中国军队在广西省南部地区防御侵华日军进攻的作战。

会战背景

在武汉会战后，中日双方虽然在华中地区多次爆发大规模会战，日军甚至采用战略轰炸来试图对国民政府施压，但大体来说，这些战争即使折兵损将仍没有出现改变双方僵持现象的契机。在政治面上反而因日本加入轴心国，德国在西欧开战后促使观望态度的欧洲列强增加与中国间的联系；在失去沿海主要港口后，国民政府与海外最主要的联系动线就是法国殖民地法属印度支那由海防港到昆明间的铁路，这条动线也持续不断的让中国补充需要的战争物资，在1938年，此路线的物资运量是1937年的4倍，国民政府当时自外购买的重装备也都由此动线输入。

1939年2月，日军占领海南岛，在海口登陆后，旋又占榆林港，为其南进作准备。政治局势让日本对华战争造成强大的负面效果，对日本军部而言则是相当恼火的议题。虽然日本政府对英国与法国以外交途径施压，实际上收效甚微；这时日本帝国海军提出南进的作战方案。作战构想是由海上入侵占领广西南宁到龙州县一带，并在当地建立飞机场作为战略轰炸基地。

这个构想在政治与战术面都受到相当支持。陆军提倡的北进政策在1939年9月诺门罕战役刚被苏联狠狠修理一顿，9月新上任的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富永恭次少将自然想避免陆军内部再度做些什么烂点子让上层灰头土脸，对此提案支持的方式则是将关东军原本打算增援诺门罕的第五师团抽调南进，既避免前线单位误判高层立场做出错误举动，也在不影响现有前线部

队下实施作战计划。9月欧战爆发，日军大本营命其第21军攻占南宁附近，遮断桂越间之国际通路，同时获得其航空队向中国西南航空作战之基地。在政治面上，桂系部队当时已经是退守四川后国民政府中一股重要支柱，广西受到攻击对桂系也会产生不小的政治冲击，甚至有机会松动持续抗战的立场；而南宁到龙州一带的补给线遭切断不但影响到越南与中国交通线安全，也可以在欧陆局势无暇它顾时，适时对法属印度支那做出利于日本的军事作为。由于战术目标与政治效果符合各方需求，日军作战计划很快的就批准进行。

会战经过

日军攻势时期

1939年11月上旬，日军第5舰队及加贺航空母舰掩护其第5师团及台湾旅团在海口集中，日军飞机狂炸中国广西各重要城市。当时中国军队从南宁至钦州湾、防城沿岸设防为第四战区所属夏威第十六集团军一部，其第四十六军守备防城、钦县、合浦、廉口海岸线，第三十一军守备西江沿岸各要点。

日军部队在海南岛三亚湾集结，约70多艘的登陆舰在1939年11月15日与16日陆续自钦洲湾登陆。11月15日，日军第5师团及台湾旅团在钦州湾登陆，中国军队新编第十九师退守上思、板城，日军于11月17日攻陷钦县，第5师团沿邕钦公路，台湾旅团沿小董——百济——蒲津北进，11月21日迫近郁江南岸，11月23日渡过郁江攻陷四塘，11月24日占领南宁，12月1日占领高峰隘，12月4日占领昆仑关后即改取守势。据日军回忆登陆时气象并不好，因此守军出现松懈而让日军有着可趁之机，结果日军在登陆中与阵地巩固过程并未遇到强大阻碍，因此第5师团很快便快速向北推进。第5师团兵分三路自钦宁公路北进，11月22号已在邕江南边集结；第5师团的中村支队以夜袭与夺取民船等方式等以近战方式对守军采以突袭为主的步兵攻势，南宁守军国军135师则迅速溃败，日军在11月24日随后2天的时间扫荡周遭阵

地，压制制高点。

11月20日，第21军在11月17日占领的钦州市开设司令部；11月26日，前线部队临时编组为“钦宁兵团”，由第五师团师长今村均中将指挥，并沿着钦宁公路攻占广西各处要点；到12月1日统计，攻击与扫荡南宁周边之后，日军战死145人、受伤315人；清点国军死尸6,125具、俘虏664人。同时在南宁城内掳获了铅块300吨、煤炭200吨、棉花500捆、棉线321吨、铁30吨、锡60吨等军需物资。第五师团下辖的骑兵第五联队、森本大队在12月2日，位于南宁东北八唐首度遭到战车4辆、1500人左右的国民革命军在炮兵掩护下攻击。日军因此派出了21旅团（中村支队）反击，击退了该波由国民革命军200师与188师混编部队组成的攻势，并顺势占领了昆仑关，但最后只在昆仑关留下一个营（大队）的兵力防守，其余部队则撤回南宁。

重庆政府反击

桂林行营主任、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提出反攻计划，并得到蒋批准。会战初期，广西省除了桂系部队以外并无重装部队可反击；而昆仑关失守让重庆当局高度重视日军后续发展。在日军推进已到极限时，重庆方面才开始进行反击行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决定投入刚整编完成之中央军第五军以及其隶属装甲兵团，对广西重要战略据点昆仑关进行强攻。该战役期间主攻部队为攻坚昆仑关的第五军，但实际上掩护第五军攻势，国民革命军对南宁一带发动全面性反击；包括第三十八集团军、第十六集团军、第六十四军、第六十六军、第四十三军等，整个战场至少有15万人以上进行强攻。

12月17日晚上8点，昆仑关战役正式发动。12月18日，中国军队开始攻击，当日攻克昆仑关、九塘，12月19日攻克高峰隘，12月20日高峰隘、九塘、昆仑关又陷入日军之手。

日军师团确认该地遭攻击的时间则是在隔天（18日）早上，今井师长下令

中村支队再度开赴救援；紧接着的半个月间是日军在南宁至昆仑关的公路一场又一场的包围、突围战事。从12月25日开始，中国军队第五军及第一五九师、第九十二师等部队协同作战，先后占领昆仑关附近重要高地，激战至12月31日攻占昆仑关、天阴，将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击毙，歼灭其5,000余人。战役结束后，昆仑关防务防由桂系部队接手防卫。

日军反击

在1939年12月期间的战役，日军在广西以第五师团、台湾混成旅团等部队抗衡15万人以上的国民革命军强攻，至于21军其余部队则开赴广东试图发动翁英作战、还有分派由步兵第11联队为主体的及川支队南进朝龙州县推进，并在11月21日占领镇南关，掳获包括汽车、汽油与重油等石化燃料、枪支等军火物资；兵力本身就不甚充足又多路分兵的结果导致日军在昆仑关遭包围时缺乏预备队救援，最后日军放弃广州等地攻势，回防巩固南宁一带防线。不过重庆方面并没有因此低估该地日军造成的问题，仍处心积虑的规划夺回南宁；蒋中正甚至在1940年1月7日飞抵桂林、1月10日赴第十六集团军司令部迁江（宾阳北方约50公里处）视察，直到12日才离开，都显示重庆方面对广西战事的高度关注。

日军为挽救其在南宁方向之惨败，从粤北抽调第18师团及近卫旅团来援。

日军经过短暂休整，在1940年1月7日至13日，由海运增援第18师团、近卫混成旅团；两支部队在钦洲湾登陆后，沿北肃清钦宁公路一带干扰补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一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一军。由日本帝国海军组成的第3连合航空队（下辖第14航空队、第15航空队；约100架飞机）则在1月10日起朝柳州、桂林等地实施扫荡任务，在1940年初的夺取广西一带之制空权，陆军也增援第90飞行战队、第21独立飞行队（均使用九七式俯冲轰炸机）强化空中支援能量，在日军发动攻击前，当地的国军完全是处于制空劣势态势之下。

1月25日，日军第18师团1个旅团及第15师团一部沿邕宾路正面攻击，近卫旅团沿邕永（淳）路向贵州迂回攻击，进行宾阳战役。在增援就位后，21军发动大规模攻势驱离、围歼宾阳以南的国军；除了继续在南宁囤积作战物资，1月22日18师团与近卫旅团到达攻击发起点。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在宾被炸，各部联络中断，形成独立作战状态。1940年1月28日，日军发动攻势（宾阳作战）；2月3日，第五师团下辖之步兵第41连队占领昆仑关；2月4日，安藤利吉司令官抵达刚攻占的宾阳，国民革命军不但丢了昆仑关，而且战线还进一步溃败，大量部队遭日军包围；会战以国军后撤结束，2月13日日军主力撤回南宁，战线继续僵持。2月2日，日军占领宾阳、思陇，中国军队第二、第三十六、第六、第九十九各军乃向隆山、都安、忻城撤退，第二军第九师师长郑作民在撤退中被炸身亡。

宾阳战役结束后，日军第18师团调回广州。根据日军统计，在1月28日到2月13日的作战间日军掳获了战车19辆、轻装甲车5辆、汽车30辆、野山炮20门、速射炮13门、迫擊炮41门。清点的国军尸体有27,041具、俘虏1,167人。中国军队以主力用于邕钦公路以东地区，以一部用于以西地区，将日军后方遮断，协力邕江北岸部队之作战。

宾阳战役后，蒋介石于2月22日开始，以4天时间在柳州召开有100多将领参加之柳州军事会议，检讨桂南作战，白崇禧以督率部队不力，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陈诚以指导无方皆予降级处分，还惩处、奖励其他一些将领。

结局

桂南会战的败仗，让重庆当局相当难堪；不仅是广西与越南间的交通因此受到影响，耗费大量人物力打下的反击战最后却一溃千里；从战前桂林行营对日军的战略意图判断错误，会战中无论是作为地主的桂系或是号称精锐的黄埔系将领都出现作战不力的状况均让蒋中正十分恼火。会战后惩处作战不力将官数目也是抗战史中首位。

1940年6月17日盘据邕江南岸日军沿邕宁（明）路进攻，当晚攻陷绥渌，6月24日占北江圩，7月2日占龙津。日军在攻占南宁后，并未造成桂系部队的厌战情绪，滇缅公路的开通也让西方的援华动线更难摧毁，占领南宁一事便失去军事与战略价值，随后在1940年中日军便主动撤离南宁。6月10日西欧战场德军进占巴黎，法国战败，日军第5师团于9月进入法属印度支那。龙津、凭祥日军于10月26日开始入越南，中国军队于10月28日收复龙津，10月29日第六十四军占领高峰隘及邕宾（阳）路之三塘与剪刀墟，10月30日第六十四军收复南宁。至11月17日邕钦一带日军全部退出，广西境内已无日军；桂南会战结束。南宁再被入侵要到1944年一号作战期间的事情。

根据日军一份未完成的统计图表显示，日本的中国派遣军在1939年11月仅确认有2,795人作战受伤，到了该年的12月却暴增至至少18,629人作战受伤，隔年1月则至少有10,741人作战受伤，到了1940年2月依旧有至少5,043人作战受伤，虽然该统计表有统计不周全(特别是作战阵亡人数)、阵亡人数与受伤人数比例过分悬殊而不合逻辑(显然因为资料不足导致阵亡人数漏算极多)等缺陷以至于该图表未被完成，且应有相当数量的伤者是受伤于冬季攻势，但仍然可以看出桂南会战日军伤亡极为惨重。另根据日军战时月报所提供的数据，仅1939年12月19日至1940年1月日军第五师团便可确认有1,282人阵亡，2,800人受伤（实际死伤者应该更多，因昆仑关之役期间屡次发生日军单位全数玉碎死绝状况，阵亡者之比例理应极高，故阵亡人数应该被严重低估。），足见桂南会战作战之激烈。

惩处名单

白崇禧：指导不力，由一级上将降阶为二级上将

陈诚：指导不力，由一级上将降阶为二级上将

叶肇：37集团军总司令，撤职查办

徐庭瑶：38集团军总司令，撤职扣押交付军事法庭审议

姚纯：36军军长，撤职查办

郭肃：36军参谋长，撤职查办

陈骥：66军军长，撤职查办

傅仲芳：99军军长，撤职查办

李精一：49师师长，撤职查办

宋士台：160师师长，撤职查办

苏祖馨：135师师长，撤职留任

郑作民：第9师师长，因战殉职故责任免究，部队编号取消改无名师

伍宗骏：135师405团团长，扣押交付军事法庭审议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A3%E5%AE%9C%E4%BC%9A%E6%88%98

枣宜会战为1940年5月至6月，中国第5战区部队在湖北省枣阳、宜昌地区对日军华中派遣军第11军进行的防御战役，日军方面则称为宜昌作战，目标

是消灭宜昌周围的第5战区兵力。

背景

宜昌是武汉和重庆间最重要的内河港口，其西即三峡，为战时陪都重庆的门户，且是沟通大江南北各战区的后勤补给枢纽，枣阳则隔汉水与宜城相望。1939年底，国军主动发动冬季攻势，予日军相当大的冲击；日军为了增强关东军兵力已准备对苏联长期抗战，因此开始设想如何将当时总兵力已膨胀到85万人的中国派遣军转用至其他战场。除了派遣今井武夫执行"桐工作"(与重庆当局进行谈判)，并企划实施一场大型攻势来对重庆当局施压，而宜昌除了是交通要道，也是飞机轰炸重庆的良好中继站点。

于是日本大本营在4月10日遂决定对宜昌发动攻势，企图将国军第五战区主力围歼于枣阳宜昌地区。不过因为日军兵力有限，发动作战的决定中并没有将占领宜昌纳入作战计划当中，只打算在达成重大打击目标后撤，这对后来作战期间造成极大影响。

为阻止日军进犯，第五战区分为左、中、右三个集团军，采取分路挺进敌后袭击，主力向两翼外线转移，相机与日军决战的方针，并调集6个集团军，计21个军56个师兵力参加作战。会战分为以枣阳和以宜昌为中心的两个作战阶段。

参战兵力

国民革命军作战序列

第五战区 – 司令长官李宗仁上将

第2集团军 – 孙连仲

30军（军长池峰城）

第27师（师长黄樵松）

第30师

第31师

68军

第119师

第143师（师长李曾志）

第11集团军 - 黄琪翔

84军（军长莫树杰）

173师（师长锺毅）

174师

189师

92军

第22集团军 - 孙震

41军

45军

第29集团军 - 王缵绪

44军

67军

第31集团军 – 汤恩伯

13军（军长张雪中）

第89师（师长舒荣）

第110师

85军（军长王仲廉）

第4师（师长石觉）

第23师（师长倪祖耀）

预备第11师

第33集团军 – 张自忠

37军

55军（军长曹福林）

第74师 （师长马贯一）

第29师 （师长许文耀）

77军

江防军 – 郭忏

26军

75军

94军

国民革命军第128师

第6游击纵队

第7游击纵队

总兵力：6个集团军、21个军级单位、56个师；约40万人

日本军队作战序列

第11军 – 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中将

军直辖部队

野战重炮兵第6旅

军战车团

战车第7联队

战车第13联队

第3师团

第13师团

步兵第58联队

步兵第65联队

步兵第104联队

步兵第116联队

野炮兵第19连队

工兵第13连队

辎重兵第13连队

第39师团

步兵第231联队

步兵第232联队

步兵第233联队

野炮兵第39连队

工兵第39连队

辎重兵第39连队

第40师团

池田支队 – 由第6师团3个步兵大队组成

小川支队 – 由第34师团2个步兵大队组成

吉田支队 – 1个步兵大队

第13军（支援部队）

仓桥支队 – 自第15师团抽调4个步兵大队组成

松井支队 – 自第22师团抽调3个步兵大队组成，第二期攻势投入

汉水支队

陆军第3飞行团

第一遣华舰队

海军第2联合航空队

总兵力：49-54个大队（约8万人）

第一阶段

5月1日至4日为日军攻击发始期，日军由汉水支流唐白河渡河，首阵由第3师团进攻泌阳县、沘源县，第39师团进攻枣阳。至5月10日，日军各单位大致完成渡河。到此日军的展开与1939年随枣会战中对襄东的攻势相同，国军误认日军能力，仍以去年会战为版本制定包围日军的预定战略计划。

为阻敌逃窜，完成围歼日军任务，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5月10日率领5个师自宜城市渡河，试图深赴占领区截断应山至枣阳的日军后勤线，33集团军一开始进军顺利，也确实阻绝了日军后勤线几天。然而日军战力并没有因此出现重大衰退，日军为打开南退之路，集中第13、39师团、池田支队于大洪山附近集结，南下击杀33集团军，北方战线只留下第3师团与31集团军交战。张自忠亲率第74师(师长马贯一）、第9师及总部特务营与敌人血战，5月16日，退到宜城市南瓜店，在遭敌包围，伤亡殆尽的情况下，中午，张自忠将军左臂负伤，身中六弹殉国，随他出征的官兵也全部阵亡。

至于日军击杀张自忠的证词则是:11军在作战时偶然截收到33集团军部发送无线电的讯号，要求第39师团对其战区的周遭进行搜索。第39师的步兵231连队第11中队第1小队（队长松本治雄少尉）在高地棱线抄入国军侧翼发动

攻击时，偶然发现在山地的一处凹地发现一群国军高级军官，因此投掷手榴弹后发动突击将这批军官击杀。在收缴相关文件之后才发现这是33集团军部，而在国军俘虏的证词以及39师团参谋长専田盛寿上校的验尸下确认被击杀的军官中包括集团军长张自忠，不过日军并未将其遗体还给国军，而是就地安葬，并且释放俘虏传递讯息；当天晚上，数百名国军夜袭墓地将张自忠遗体夺回。

在成功击溃33集团军、恢复补给后，南下的日军扭转战线北上，参加首波攻势的11军在5月16日于枣阳周边集结，同时间在枣阳的国军则有14-15个师左右。5月19日日军发动总攻击，国军随即战线崩溃往北西溃退，日军有一小部分甚至差点直冲第五战区司令部老河口市。不过追击过程中日军也犯了冒进错误导致不必要的伤亡，39师团的步兵233联队朝白河追击时，于5月20日薄暮派遣侦察部队找寻渡河点，3个军官观察同个渡河点时，因视线阻碍其中2个认为他们所观察到的地形为河对岸，1位认为是河中沙洲，最后联队采多数决认定为对岸，而决定半夜渡河；结果在21日凌晨第一批渡河发射信号弹后才发现这个渡河目的地确实是沙洲，但为时已晚，整批部队遭遭白河对岸的国军集火射击，毫无掩蔽物的部队便在集火下3百多人当场战死，233联队长神崎哲次郎上校也在阵亡名单内，这场"白河渡河作战"成为39师团在本次会战中最大的单次作战损失。

5月天气已步入炎夏，经历多日激战的日军大多疲惫不堪，因此日军上层决定将战线转移准备强渡汉水，且让部队实施短暂修整；所以国军被重创的战线并未进一步遭撕裂，得到喘息的机会。此阶段日军评估已击溃15个中国师，并清点遗尸3万3千具、俘虏1000名；日军的损失在5月31日的清点则是战死850人、战伤3000人，但这数字并不包含战病；而一支激战近月、跋涉上百公里的部队全无病号这点也是不可能存在，但目前也无进一步资料证实当时日军情形。不过根据日军内部一分未完成的伤亡统计图表显示，1940年5月日军至少有23,538人作战受伤，是为其他月份作战受伤人数的好几倍(3月仅确定有3,595人作战受伤，4月因策应作战上升至至少8,057人作

战受伤)，虽然该统计表有统计不周全(特别是作战阵亡人数)、阵亡人数与受伤人数比例过分悬殊而不合逻辑(显然因为资料不足导致阵亡人数漏算极多)等缺陷以至于该图表未被完成，但依旧可以看出日军实际伤亡远远多于公开战报数字。

至于是否实施第二阶段作战（进攻宜昌），日军内部当时也经过一番争执。由于补给线已拉长至上百公里，加上确实击溃了相当多的国府军；园部中将与他的主要参谋群、后勤单位认为应见好即收。并主张“部队已疲困，大本营也没有下令攻占宜昌的命令”；但积极派参谋的意见则强调“如果只满足这样的战果，将无法统御11军”。最后由积极派主张获得优势，第二阶段战役继续遂行。

第二阶段

5月31日日军强渡襄河。

6月1日日军攻占襄阳。

6月2日第五战区部队分为左、右兵团，由李宗仁、陈诚分任兵团长，向襄阳反攻。

6月3日国军克复襄阳，日军遂南下进攻宜城。

6月5日日军渡过襄河，直取宜昌，国军第77军及江防军，在荆门西侧至江陵之线竭力抵抗。

6月10日日军对宜昌发起进攻，守军奋勇抵抗，与日军激战至12日终告失守。日军由襄阳南下时，国军第2、第31集团军尾随其后，收复襄阳、宜城，进至当阳、荆门以北。

6月12日宜昌沦陷。

6月16日日军撤离宜昌，国军立即反击。

6月17日国军克复宜昌。日军在撤退途中又接到其大本营确保宜昌的命令，突然回兵。

6月23日宜昌再度沦陷。

之后，日军将兵力配置于宜昌、当阳与襄河附近。国军集结在信阳、钟祥，随县、荆门、宜昌、江陵以北之线，双方形成对峙局面，枣宜会战遂告结束。

结局

枣宜会战历时近两月，日本原先的作战目标获得成功，此役日军会战后号称中国军遗尸63,127人，俘虏4,797人。缴获主要战利品野战炮11门、山炮12门、机关炮2挺、迫击炮53挺；就一支35万人的大部队来说，日军缴获的重装备顶多是1个集团军单位的规模，由此可见第五战区的支援火力一直处于弱势。日军虽然受兵力规模所困无法对第五战区部队进行围歼，但仍成功将其重创直到抗战结束都无法回复有效作战能力；除此之外，国民政府丢失了鄂北鄂西江汉平原富裕的产粮区，日军亦得以在宜昌取得前进基地，修建飞机场对重庆等大后方进行轰炸，加上欧战的不利形势，枣宜会战后，中国抗战进入最危险的时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1%AB%E5%8D%97%E4%BC%9A%E6%88%98

豫南会战为1941年1月至3月，中国第五战区部队在河南省南部对日军华中派遣军第11军进行的防御战役。

背景

1941年1月，日军为消灭豫南地区国军第5战区主力部队，以华中派遣军第11军为主，在华北方面军一部配合下， 纠集步兵7个师、骑兵1个旅、战车3个团的兵力，在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的指挥下，分左、中、右3个兵团，准备向豫南发起进攻。 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决定采用避实击虚的战略，留少数兵力正面抗击，主力转向两翼，待日军进攻兵力分散之时，从其两侧及背后围歼之。

国军一部在平汉路西平附近阻击日军，另一部在日军后方截断交通，以主力预伏于方城、泌阳以东及上蔡、汝南一带，伏击向堰城、舞阳北进之日军。

经过

1月26日日军攻占确山、邢店、高邑、泌阳一线。

1月27日日军推进至驻马店、汝南、沙河店、龙王庙一线。

1月29日沿平汉路及西侧快速北进的中路日军，由于国军已撤出沿线地区，使其寻找守军主力的企图落空。日军左、右两路兵团分别受到国军第13军和第85军的攻击，损失惨重。

1月31日日军变更部署，将中央第17师团一部向左右两翼迂回，其一部由遂平经上蔡向右旋回，企图与汝南北进之右路第40师团南北夹击第85军；中央第17师团主力则由遂平分两路经西平向舞阳方面迂回；左路第3师团主力也向舞阳推进，企图南北夹击第13军。国军第85军和第13军在日军完成合

围之前，分别向叶县、郾城及沙河以北地区转移，使日军再次扑空。与此同时，国军第2集团军从泌阳、唐河及其以北地区向舞阳日军后方攻击，切断其后方联络线。此时，日军由于侧背受到中国军队攻击，正阳已被国民革命军克复，后方交通受到威胁。

2月1日日军回撤。

2月21日日军第3师团除留一部于舞阳对北警戒外，主力向镇平、南阳转进；另分兵经象河关向泌阳转进，企图夹击国军第2集团军。国军第13军乘机反攻，克复了保安寨、舞阳，续向方城追击。

3月4日日军第3师团先后攻陷南阳、唐河。

3月6日国军第59军进行反击收复南阳。

3月7日日军第17师团转进至象河关附近，遭到国军第68军截击，伤亡甚重，转向信阳方面退却。

3月11日全线恢复战前态势，会战结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9%AB%98%E4%BC%9A%E6%88%98

上高会战为1941年初日军为巩固南昌外围阵地，保证占领区安全，决定对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9战区部队实施的军事打击。日方将此次战事的名称

称为锦江作战，将此作战视为短期战术攻势，但最后在国民革命军优势的防御作战中遭到击退，且遭受预期以上的战损。

背景及计划

1941年初，中国派遣军为加强华北治安战，决定将驻江西安义地区的第33师团调往华北，由于在江西区域已久未进行大规模作战，中日双方皆有蓄存一定战力；日军作战方针是计划在轮调前发动一次攻势性防御，顿挫当地国军，巩固华中战略要地南昌外围。而选择的战斗区域则是上高，该地为第9战区所辖的19集团军本部，如可成功摧毁将会让该地国军的作为转入消极。

1941年3月14日，日军调集第33、第34师团及第20混成旅团，分北、中、南三路秘密集结。在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指挥下，企图对上高实行分进合击，打击和削弱国军。由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集结了第49、第70、第72、第74军约11个师的兵力参加作战。

双方战斗序列

国民革命军

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参战兵力约66000人。

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副司令刘膺古

第70军：李觉

预9师：张言传

第19师：唐伯寅

第107师：宋英仲

第74军：王耀武(由副军长施申诚代理)

第51师：李天霞

第57师：余程万

第58师：廖龄奇

第二挺进纵队：康景濂，约3000人

第72军：韩全朴

新14师：陈良基

新15师：傅翼

第49军：刘多荃

第26师：王克俊

第105师：王铁汉

江西保安团，仅参与追击，约5000人

辎重部队，约10000人

日本帝国陆军

第十一军司令园部和一郎，总兵力65000人，进犯兵力42000人，阵地守备后方勤务23000人。

第33师团：师团长桜井省三中将，总兵力24000人，进犯兵力13000人

直属部队

第33步兵团：荒木正二少将

步兵第213联队：河村大佐

步兵第214联队：滨田中佐

步兵第215联队：古田大佐

搜索第33联队：中田中佐

山炮兵第33联队：古田大佐

工兵第33联队：井上中佐

辎重兵第33联队：陈田中佐

师团通讯队

师团卫生队

配属部队

独立工兵第3联队一部

迫击炮大队

第九师团第五兵站辎重兵中队

第106师团卫生队

第34师团：师团长大贺茂中将，总兵力27000人，进犯兵力20000人

直属部队

第34步兵团：岩永汪少将

步兵第216联队：小川大佐

步兵第217联队：落合大佐

步兵第218联队：佐藤大佐

搜索第34联队：田川中佐

野炮兵第34联队：长林大佐

工兵第34联队：门胁中佐

辎重兵第34联队：知览中佐

师团通讯队

师团卫生队

配属部队

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第2大队

独立山炮兵第51大队

独立山炮兵第52大队

迫击炮第1大队第1中队

迫击炮第3大队第3中队

独立工兵第2联队：小坂中佐

独立轻装甲车第9中队

独立混成第20旅团：池田直三少将，归大贺茂师团长指挥，兵力8000人

独立步兵第102大队：坂本俊马中佐

独立步兵第103大队：小野中佐

独立步兵第104大队：野村中佐

独立步兵第105大队：森重中佐

骑兵队

炮兵队：小金井少佐

工兵队：笹良

通信队：下白石

辎重队

第三飞行团，飞机约100架，人员700人

海军航空队，飞机约50架，人员300人

后勤部队，人员约5000人

铁道联队

千田兵站部

第十兵站自动车队

兵站病院

战况

1941年3月15日，北路日军第33师团由安义向奉新、上高方向进犯，国军第70军在奉新城东西设防，凭借潦河两侧高地抵抗，在日军飞机和炮兵的猛烈轰击下，被迫撤守奉新。日军攻陷奉新后，强渡锦江，续向上高进击。南路日军第20混成旅团，由赣江北岸发起攻击，于夜间两次强渡锦江，遂由独城以北地区沿锦江南岸西犯，受到国民革命军第70军第107师和第74军第51师的阻击重创。

3月16日，中路日军第34师团沿锦江北岸向高安方向进犯，企图协同北、南两路击破守军第70军，再以3路围攻第74军。第70军第107师在日军强烈攻势面前丢城弃地，仓皇突围。3月18日，第34师团侵占高安又西进龙团圩。第33师团进至上富、若竹坳附近，3月19日，遭到第70军一部伏击，经苦战突围撤至奉新。

日军第34师团突破第70军右翼部队阵地后，向西突进，在棠浦、泗溪之线受到第74军的阻击。日军第20混成旅团由灰埠附近北渡锦江与第34师团会合。3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74军英勇抗击日军的进攻，固守上高外围阵地。第49军与第74军之第51师将日军第20混成旅团击退至锦江以北；遂渡江向北，协同江北第70军主力攻击日军第34师侧背。3月22日至24日，日军在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上高以东第74军阵地发动猛攻。国军奋勇抗击，主阵地失而复得3次，为实施两翼对日军包围争取了时间。国军第70军、第72军和第49军适时赶到主战场，由南北两面包围日军，形成了南北5公里、东西15公里的包围圈。

在此情况下，日军第34师团长大贺茂中将一面向汉口日军第11军司令部急电求援，一面命令所部突围撤退。第11军司令部急令第33师团驰援解围，并同第20混成旅团掩护第34师团撤退。

3月25日，退至奉新之北路日军第33师团一部向官桥街、棠浦急进，被围第34师团亦向东方向突围，两路日军得以会合。3月26日夜，第74军攻克泗溪，并协同第72军等部将日军压迫于官桥街、南茶罗一带。3月27日，日军向奉新、南昌方面突围、狼狈溃逃。第49军、第70军分两路对日军实施侧后追击，予以重创。3月28日，国军主力进攻官桥街，与日军激战至下午，将日守军600余人全部歼灭，并毙日军第34师团少将指挥官岩永，收复官桥街。3月31日克复高安，截断了日军东逃归路。

4月1日，日军以15架飞机掩护突围，向斜桥方面逃窜。国军乘胜追击，收复了沿途城镇。4月2日，国军克复子西山、万寿宫、奉新等地，4月8日和9日又克安义外围的长埠、宋埠、平洲、弓尖各要点。日军受到重大伤亡后撤回原驻地。双方恢复战前态势，会战结束。

结果

此役中华民国方面宣称日军共投入兵力6.5万余人，国民革命军则投入11个师、10万兵力。国军宣称让日军伤亡15,792人，日军宣称造成国军损失死伤17,119人、失踪2,814人；缴获装备有山炮6门、迫擊炮1门、24挺轻机枪、掷弹桶24具、408把步枪、各式弹药11万1717发。而日军对于己方损失已未存任何战报。日本战后著作则称日军伤亡约5,500人。

日军山炮属联队(团级)编制武装，一联队4门，缴获6门代表至少有2个步兵团遭击溃，对会战最多是6个步兵团的日军来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单位受创严重，这在大部分日军作战中并不多见；此役后日军11军军长园部和一郎在同年4月调任军事参议官，6月转预备役，相较于同样任11军长的前后任：冈村宁次与阿南惟几日后的官运亨通，显然他必然犯下某些大错才会让他仕途受挫，而他的调任很明显与会战结果有关，间接证明了上高会战国军表现应成功打击日军。

纪念

现宜春市上高县、新余市渝水区有上高会战遗址分布，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0年4月3日，参访大陆的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曾到上高会战英雄纪念碑祭奠。

国共的发展与变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8B%E8%A5%BF%E4%BA%8B%E5%8F%98

晋西事变，又称十二月事变、十二月政变、新军事件，指1939年11月28日，国民政府冬季攻势初期所发生的阎锡山二战区与八路军间的国共摩擦事件。这起事件破坏了国军第二战区在晋南三角地带对日军的攻势计划。中共指控阎锡山“背信弃义、发动内战与日军联合夹击共军”。国民政府与阎锡山则认为中共违抗命令、策动叛变、兼并国军。

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此后日本逐步加强了在华北的势力，山西也处于日本势力扩张的危险之中。1935年底，日本炮制华北事变，随即要求华北五省实行“自治”；共产党发动一二九学生运动鼓动抗日救亡。1936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渡过黄河东征，阎锡山的晋绥军遭到惨败。蒋介石随即派出关麟征指挥五个师开入山西。5月初，中国工农红军回师陕北，国民政府的部队却并未撤离山西，而是驻扎在山西河东道，在6月成立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陈诚任总指挥，对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构成威胁。蒋介石还拉拢正在庐山受训的晋绥军高级将领。阎锡山深感蒋的威胁加深，曾愤恨地对其表侄梁化之称：

我不亡于共，亦要亡于蒋。

与此同时，日军加紧进攻绥远。面对日军、嫡系国军和红军的进逼，阎锡山不得不小心维护自己的地盘，并审时度势，决定联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拒蒋，一方面拒日，以求自保。就此，阎锡山曾无奈地对手下人说，

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有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都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

1936年9月18日，自强救国同志会内的部分左派人士发起成立“抗日救国同盟会”。阎锡山怕触怒日本方面，遂将其更名为“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并自任会长。10月下旬，经阎锡山邀请，中国共产党党员山西人薄一波主持牺盟会工作。自此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和阎锡山以特殊形式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阎锡山官办的各类团体，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11月，阎锡山经与蒋介石会商，命令晋绥军傅作义、赵承绶等部反击入侵绥东的日伪军，并于11月24日收复百灵庙，当时人称"百灵庙大捷"。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5日，阎锡山到南京出席国防会议，拥护全面抗战，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8月，国共双方就第二次合作达成协议，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编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开入山西抗日。阎锡山提出"民族革命"口号，同意由牺盟会组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又称"新军"，以和时称"旧军"的阎锡山原有的晋绥军相区别）和太原工人武装自卫队，挂靠在晋绥军名下，并拨给武器装备。9月20日，根据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建议，阎锡山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场总动员委员会，续范亭任主任委员。

日军占领北平、天津之后，便出兵山西。8月27日，阎锡山赴雁门关内太和岭口指挥部队抗击来犯日军。 9月初，日军侵入山西，晋绥军在天镇、广灵的防御失败。9月下旬，晋绥军、中央军和八路军共同进行忻口会战。由于战事不利，11月4日阎锡山离开太原南撤临汾。11月8日，日军占领山西省首府太原。

这期间，日军来势汹汹，而阎锡山的晋绥军损失溃散不少，各级文官多已弃职，阎锡山遂寄望牺盟会和决死队支撑他扭转危急局面。通过阎锡山的支持，到1939年夏，新军已发展到4个决死纵队、一个工兵旅和一个暂编师，共达50个团约五万多人；山西七个行政区中的五个及其所属县政权由牺盟会掌握，105个县中已经有70个县长为牺盟特派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

国民政府观点

1936年秋，阎锡山为团结各方势力共同抗日，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

会）以组训民众展开游击战，未料被共产党刘岱峰、郭挺一、张文昂、牛佩琮、宋时昌等人渗透把持，抗战爆发后犠盟所提出“民族革命十大纲领”，为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改头换面而来，并利用所掌握的军政大权撤换国民党籍县长，使全山西省105县之中60多人属中共“牺盟会”干部。之后更利用行政力量组织中共犠盟武装，如游击队、决死队、自卫队等，自称“新军”，将阎锡山所属晋绥军称作“旧军”，并宣传旧军不会抗日，来制造双方对立，进而号召“解除顽固份子武装，发扬新军之优良，方能作到无条件之存在”。

1939年3月，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决定将中共“牺盟会”所操控的各县政权收回，并把新军改为教导军，以遏阻内部的壁垒对立。11月26日，国民政府发动对日军之冬季攻势，阎锡山所属第二战区奉令担任主攻。11月28日，独立第二旅韩钧公开叛变，杀害“旧军”军官〔决死第四纵队第十总队鲁应录下属第二营全数遭击毙〕及其眷属，又捕杀国民党籍同志会、突击团等抗日组织。12月7日，韩钧发出虏电，决死队第一纵队薄一波、决死队第二纵队张文昂、决死队第三纵队戎伍胜、决死队第四纵队雷任民等陆续叛变。叛军最后演变成十个团，随后贺龙公开声援并加以收编。

阎锡山宣布韩钧“叛变”，并通电全国对其进行讨伐。晋西事变爆发。

晋西事变爆发后，阎锡山曾对山西省牺盟会全体人员发表文告：

阎锡山将军告晋省全体牺盟同志：

自绥东抗战以来，我牺盟在全国抗战历史上，有它光荣伟大的功绩，这都是我全体牺盟同志艰苦奋斗的收获。不幸隐藏于我牺盟组织内部之别有阴谋的伪装分子掀起晋西事变，以致一部军队被劫持叛变，各地民运工作多陷停顿，各地同志或被叛变分子欺骗宣传所蒙蔽，或为其武力所胁迫，致形成混乱之局，大敌当前，遭此变故，实所痛心！事实如何，不能不为我全体同志道之：

一、晋西事变爆发之后，我陆续从背叛牺盟分子所发之一切言论文件，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他们已经赤裸裸自招了他们的立场，和他们对牺盟的企图，充分证明了这些别有组织背景的伪装分子，一向在牺盟内部所进行的各种阴谋活动与政治企图。我为抗战排除万难成立牺盟会，并为适应抗战紧急需要大量提拔青年干部，原期对国家民族尽最大力量，不意此等伪装分子混入内部，只为部分利益，不顾民族利益，际此抗战进入千钧一发的阶段，脱离国家民族立场，捏造事实，进行分裂……此不惟是我牺盟的叛逆，亦乃国家的罪人，应为全体牺盟同志所彻底认识者。

二、事变一开始，此少数阴谋分子所捏造之唯一口实，第一是山西已局部投降妥协，第二说我被顽固分子包围，在事实证明我全体军民依旧在前方与敌浴血苦斗……始终不渝！但对一切危害抗战制造分裂的阴谋活动，决不予宽容，阴谋分子之欺骗宣传，绝不能掩盖铁的事实于永久。

三、事变发生以来，使我多数牺盟同志蒙受其害。或不明真相盲从附逆，或迫不得已，被其裹胁，加之各地情况遽变，一时未复常轨，致徬徨歧路莫知所措者亦属不少。兹所告者，我牺盟政治立场与路线，始终不变，团结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一举抗敌，是我国的基本精神，今日牺盟的恶运，乃少数分子背叛牺盟所造成，我全体同志应认清是非与利害，勿为无稽谣言所动摇，要百倍的坚定自己的立场，一本以往精神，站在牺盟的旗帜之下，奋斗到底，我已告知各地军政当局对各地牺盟同志加以保护，对于明了事实真相后觉悟归来的同志，尤予以切实之保护，望我全体牺盟同志，明辨是非，负起拨乱反正的责任，勿为奸谋所迷惑，是所至盼。

1940年1月，张文昂、韩钧取得八路军115师独立旅支援，1月13日，决死队独立七旅34、35团由李梁率宣布起义。1月14日，驻静乐之203旅刘玑取得八路军358旅支援后叛变，将原旅长刘武铭枪决。217旅雷任民、郭挺一会同暂一师续范亭叛变。保安团张隽轩率部投共。

阎锡山：当时隐藏于我犧盟组织内部之别有阴谋伪装份子掀起晋西事变，

以致一部分军队被劫持叛变，各地民运工作多陷停顿，各地同志或被叛变份子欺骗宣传所蒙蔽，或为其武力所胁迫，致形成混乱之局。

1957年5月，曾任第二战区副司令的杨爱源答复美国留学生葛林： 28年对日抗战时，共产党煽动国军叛变，有人建议将叛变军官捕杀，阎先生认为应改变人的错，不应该激发人的错，未接受。阎先生认为盲目反共，等于双料共产党，贻害人类。

善后

阎锡山在事变后之处理：

即日电令将韩逆钧撤职查办，专案将事实真相呈报中央、通电友军，并向中央自请处分。

晓谕决死二纵队全体官兵，不听韩逆谎言，听命艾(子谦)、白(英杰)二旅长命令到指定地点集合。

通令各军政机关，协助艾白二旅长收容未附逆及逃回之官兵

因叛变受害之军政人员及民众，下令调查慰抚

通告晋省各地民众，请大家安心协助政府抗战到底。

中共方面观点

事件酝酿

随着中共势力在山西的影响不断扩大，阎锡山开始对中共及牺盟会、新军产生一定提防。阎锡山撤退到临汾后，成立民族革命大学，公布了《民族革命十大纲领》，纲领内容与中共中央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内容

类似。另一方面，1938年2月16日，阎锡山成立了以山西旧派人物为主要成员的民族革命同志会并自任会长，以该会与牺盟会、中国国民党相抗衡。

1938年2月日军南侵，阎锡山经吉县过黄河撤到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八路军、山西新军、晋绥军同日军进入相持阶段，日军控制交通要道和大中城镇，抗日军民则控制山区。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绥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相继成立。

1938年8月，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召开军师长参加的古贤会议，会上旧军反对新军，旧派反对新派。1939年1月，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举行，会上确定“容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并秘密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1939年1月27日，阎锡山从山西吉县西渡黄河进驻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秋林会议（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与会者有师长及独立旅长以上军官、各区专员及保安司令以上的行政区干部、公道团骨干、牺盟会各中心区及部分县特派员等160余人，汇集了新旧两派的重要人物。牺盟会和新军领导人薄一波、续范廷、牛荫冠、雷任民等出席。阎锡山在会上说：

武汉失守后，抗战越来越困难，二战区削弱了，只有共产党、八路军壮大了。现在，我们要自谋生存之道。

他还提出，“现在天要下大雨，应该准备雨伞。”在会上，阎锡山提出了中心议题即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制，并强调文官不得兼任军职是蒋介石的命令。这一提议遭到与会的牺盟会和决死队领导人薄一波、决死队二纵政委张文昂等人的强烈反对。秋林会议上，阎锡山还提出了“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指挥，统一人事和待遇”的“统一方案”，取消决死队的四个纵队和工卫旅，进行改编，目的是把新军统一于旧军，会上还提出取消续范亭任主任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场总动员委员会、限制牺盟会活动、缩小专员权限、取消若干进步法令等。会后，阎锡山决定将牺盟会控制的各县政权收回。秋林会议同时，停止活动八年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重建，赵戴

文为主任委员，中统黄树芬为书记长，10名委员中蒋中正委任6人，阎锡山委任梁化之、李冠洋等4人。会后，阎锡山用各种办法羁留与会的牺盟会和新军领导人近3个月不让其回前线。如韩钧在“第二战区校尉级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当了三个月的指导员。直到经党的同意，采取表面接受、实际抵制的办法，答应了阎锡山的要求，取消政委制、按照统一方案分别改编为旅，阎锡山委任旧军军官担任各旅旅长。直到6月份，薄一波等人才被允许离开秋林镇。

“统一方案”下的决死队改编：、

一纵队改编为：独1旅：旅长梁述哉兼，政治部主任牛佩琮；216旅：旅长台耀玺，政治部主任周仲英

二纵队改编为：独2旅：旅长艾子谦，政治部主任韩钧兼；196旅：旅长白英杰，政治部主任徐荣

三纵队改编为：独3旅：旅长颜天明兼，政治部主任董天知兼；197旅：旅长赵世玲，政治部主任张凤阁

四纵队改编为：独7旅：旅长卢宪高，政治部主任李力果；203旅：旅长刘武铭，政治部主任刘玉衡。

政治保卫队改编为：209旅：旅长张韶芳，政治部主任廖鲁言；212旅：旅长孙定国，政治部主任王成林；213旅：旅长郝玉玺（1939年11月从秋林镇回部队路上被害），政治部主任纪锦章。

工人武装自卫旅改编为：207旅：旅长郭挺一，政治部主任侯俊岩

以上各旅旅长均为原晋绥军军官，政治部主任多数为中共党员。政治委员制取消。

1939年6月，续范亭的第二督察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撤销，阎锡山委派赵承

绥为第二督察专员公署主任、保安司令，统管晋西北的军、政、民工作。在晋西北各县建立了“精建会”、“突击团”等组织，专门进行破坏中共的活动；派“联络官”、“视察员”到决死四纵的独七旅和二0三旅进行策反活动，鼓动旧晋军军官挑起事端，使斗争尖锐化、明朗化。续范亭的二专署所属7个游击支队中，2个支队归入晋绥军，5个支队进行改编。其改编结果为：

暂编第1师：师长续范亭，参谋长张希钦

一支队改编为36团

二、四支队合编为37团

五、八支队合编为44团

六、七支队合编为决死13团，划归第十一专区杨集贤部

后来阎锡山又将赵戴文、赵丕廉从重庆调回。这两人曾在薄一波、张文昂在山西国民师范学校念书时任校长，阎锡山想通过他们劝薄一波、张文昂接受取消新军政委制，但未能成功。拖到1939年5月底，阎锡山遂向薄一波直接提出，“文官不能兼军职是蒋委员长的决定，只能执行。我们必须取消专员兼任的政治委员。”当时梁化之给阎锡山分析，称决死队一纵队（当时驻在晋东南）完全是中共控制，三纵队完全是阎锡山控制，二纵队是一半对一半，四纵队不存在专员兼政委的问题，但也可能是一半对一半。薄一波眼看取消新军政委制已无挽回余地，便称“化之说得对，决死一纵队完全是共产党掌握的，即使取消了政治委员，也不可能回到山西旧军序列。不过，我回去，还可以做点工作，你看怎么样？”阎锡山同意了。1939年6月初，薄一波、戎子和回到晋东南。

从秋林镇回到太岳之后，薄一波随即向中共中央北方局汇报了秋林会议情况并提出对策，获得北方局的首肯。1939年8月6日，北方局发出《制止阎锡山之动摇与巩固山西统战的指示》。9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山西

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随后中共中央以山西省委名义发出《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的宣言》。

这时薄一波已经从专区搬至决死队一纵队司令部。1939年6月，薄一波在山西省沁源县活凤村召开决死队一纵队第三次全体干部会议，史称活凤会议，具体布置切实掌握部队。11月初，决死一纵队第四次扩大干部会议召开，薄一波作了题为《如何克服目前时局危机与坚持长期抗战》的报告，指出目前妥协投降危险严重，山西的顽固分子反对中共、反对决死队、反对牺盟会、反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活动日益严重，对此种危险形势必须加强思想准备。薄一波强调要加强组织准备，掌握部队，巩固政权。

1939年下半年，新军各纵队都进行了一定准备。比如一纵队将仍在部队的原晋绥军军官100多人送到白晋公路以东由罗瑞卿主持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分校学习。由政工干部取代这些军官的职务。在晋西南区党委领导下，从1939年10月开始有计划的组织干部撤离秋林地区，11月达到高潮，到事变发生时需要事先撤离的党员干部和一些进步群众都已经撤到新的地区新的岗位。

1939年10月29日（辛亥革命山西光复纪念日），在陕西秋林的枣林会议室召开了民族革命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阎锡山作了《抗战最高峰》的政治报告，在讨论同志会公约时，新派老派激烈争论，最后无果而终。会后，阎锡山留下新军代表韩钧不放其回部队，阎锡山提出调韩钧担任山西新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梁化之），韩钧拒绝。这时，山西旧军与新军、旧派与新派矛盾日增，而阎锡山和中共方面日益不信任。山西已成一触即发的局面。1939年11月，阎锡山下令秋林地区的党政军机关人员一律参加国民党。1939年11月，19军副军长梁培璜、61军副军长吕瑞英到临汾与日军清水师团参谋长山下秘密会谈，人称“临汾会谈”。11月22日，日军突然从晋西的乡宁、蒲县、大宁、隰县突然撤退，19军迅速接防，使得决死二纵队、政卫二〇九旅、八路军晋西支队处于敌、阎夹击中。

事变引爆

1939年11月26日，国民政府发动对日军的冬季攻势，阎锡山的第二战区担任主攻。也在11月26日，梁化之允许从1939年8月就已经在秋林镇的韩钧第二天回前线，并叮嘱“必须走大路，千万不要走小路”；韩钧当天下午就带警卫员秘密走小路，11月28日安抵二纵队驻地隰县义泉镇（今黄土镇义泉村）。11月29日，二纵队召开纵队领导紧急会议，韩钧向张文昂、廖井丹、郝德青等介绍了阎锡山要拿二纵队开刀消灭新军的紧急严峻形势，以及阎军配合日军夹击消灭一纵队的阴谋计划；各路阎军已经就位，必须争取主动，不能坐以待毙。二纵队政委张文昂不了解秋林镇的政治形势，对韩钧的话表示怀疑，当场与韩钧激烈争吵。韩钧心急如火，情绪激动，声泪俱下，致使紧急会议中断。张文昂打电报给新军总政治部主任梁化之、副主任刘岱峰，大意是：韩钧返部后，召开会议，神经过敏，认为形势紧张，究竟如何？刘岱峰瞒着梁化之复电：形势紧张，希按韩的意思行事。张文昂看过复电后，迅即在二纵队领导会上统一了认识，做出了应对突然事变的紧急安排。韩钧委托郝德青于12月2日到隰县张家川（今为龙泉镇东部）向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汇报。

11月28日，决死队二纵队一九六旅十七团同纵队部与六专署驻地附近缴械了十九军一个营。 鲁应录的新军33团展开激战。鲁应录系原晋绥军军官，不听牺盟会指挥，故双方发生激战。鲁德第一营、第三营突围，第二营被歼灭。

1939年12月1日，阎锡山以发动冬季攻势为名，命令决死队二纵队于12月5日向灵石、霍县段的同蒲铁路实行破击，同时命旧军4个军47个团为预备队，配置在二纵队后侧。12月1日当天，韩钧与张文昂联名致电新军总政治部主任梁化之、副总指挥陈光斗：旧军66师在隰县以东，73师在午城，“在我们背后准备所谓冬季攻势”，要他们转告阎锡山，该两师“无移此必要，恐惹是非，请变更驻地。”12月2日，韩钧与张文昂再次联名致电梁化之并

阎锡山，请严令61军、19军各部万勿轻动，各归原防。这时陈长捷的61军从南向北，王靖国的19军从西向东共计47个团的兵力向二纵队包围逼近。同时同蒲铁路上的灵石、霍县日军也在增兵。12月2日韩钧在下桑峨（今属寨子乡）召集196旅的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议，迎击阎军进攻的紧急动员和作战部署，并命令第六团第一营把61军11月下旬安插在纵队司令部附近谙正村（今属黄土镇）的一个营解除武装。

12月2日，独立第二旅旅长艾子谦叛变投靠十九军。12月3日，王靖国的第十九军在永和地区包围了决死队二纵队一九六旅旅部，旅长白英杰（白兴杰）、参谋长张文龙杀掉政工人员，解决了牺盟会永和县政府，带旅部机关投靠十九军。晋绥军随后破坏永和县、大宁县等六县的政府及牺盟会等组织，杀害了洪洞县、临汾县、蒲县的县长，袭击了位于隰县的八路军第115师晋西独立支队后方医院，杀害了医院伤病员。赵承绶则率部进攻驻晋西北的决死队及八路军第115师第358旅。孙楚部在晋东南进攻决死队三纵队。沁水县、阳城县、晋城县、浮山县、长治县等地政府皆被摧毁。12月4日，孙楚捣毁阳城县牺盟会的《新生报》社，活埋了编辑王良。

12月4日林枫致电毛泽东、王稼祥、滕代云、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并各地新军："一个重大的突然事变已首先在晋西发动......"。中共中央派彭德怀由延安赴秋林。12月5日、6日，彭德怀先后会见了阎锡山与梁化之。彭痛斥反动分子的罪行，陈述利害关系，表示拥护进步，坚持反对倒退的决心，同时也表示了某种让步。谈话以后，彭向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说："阎的上述反动决心有动摇之意。总之，阎投降与反共未到最后决定。"12月6日毛泽东与王稼祥复电朱德、左权、彭德怀、陈士榘、林枫、彭绍辉、罗贵波、赵林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彭真等《关于晋西南事件中我们的方针的指示》："晋西南阎部新旧两军已发生严重武装冲突，表现着山西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反新军反抗日的武装叛变，可能在晋西南、晋西北再扩大化。"我们的方针是："速即通知进步分子，立刻警惕，准备坚决应付事变。对叛军进

攻决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以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要反对阎。”“在新军内迅速巩固党的领导，不可靠者断然撤换。”“八路本身严加警戒，以防意外，并应给新军以鼓励、掩护和支持。”12月6日晋西南区党委在隰县张家川召开了区党委、二纵队、八路军晋西支队部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在区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晋西南新军“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张文昂任总指挥，韩钧任副总指挥兼前敌指挥，廖井丹任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指挥晋西南所有新军一致行动，包括独立第二旅、第一九六旅、第六行政区保安旅、政卫第二〇九旅、第二一二旅、第二一三旅。部队向康城、石口一带集结、动员、整顿，清洗队伍中的旧军官，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调一批军政干部到新军。

二纵队司令员韩钧于12月7日从隰县义棠镇向阎锡山发电报（史称“虞电”），称：

总座百川先生：

王、陈二贼欺我太甚，甘作汉奸。学生誓与二纵队万余健儿，为总座争一伟大胜利，兹定于十二月十日誓师。此后半月内，恐无暇报告钧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是生报告恩师最后之一言，胜利的结果将见受教。

学生韩钧敬叩 印

收到电报后，阎锡山立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称：

韩电对我不称长官而称老师，不称职而称学生，并说十二月十日誓师，表示不相隶属了，韩钧反了！

阎锡山宣布韩钧“叛变”，并通电全国对其进行讨伐：“韩钧着即撤职查办。所有独二旅、一九六旅部队着艾、白两旅长妥为收抚。其不甘附逆率部来归者，准予免究。如有甘心附逆之徒，则命令剿除。”并任命陈长捷为剿叛总指挥，指挥61军、19军等进攻新军。故国方有称“韩钧事件”、“韩钧誓师

叛变事件”。阎锡山秘密移防秋林附近的官庄村，直到四、五天后局势明朗才搬回秋林镇。

晋西事变爆发后，阎锡山曾对山西省牺盟会全体人员发表文告称，

阎锡山将军告晋省全体牺盟同志

自绥东抗战以来，我牺盟在全国抗战历史上，有它光荣伟大的功绩，这都是我全体牺盟同志艰苦奋斗的收获。不幸隐藏于我牺盟组织内部之别有阴谋的伪装分子掀起晋西事变，以致一部军队被劫持叛变，各地民运工作多陷停顿，各地同志或被叛变分子欺骗宣传所蒙蔽，或为其武力所胁迫，致形成混乱之局，大敌当前，遭此变故，实所痛心！事实如何，不能不为我全体同志道之：

一、晋西事变爆发之后，我陆续从背叛牺盟分子所发之一切言论文件，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他们已经赤裸裸自招了他们的立场，和他们对牺盟的企图，充分证明了这些别有组织背景的伪装分子，一向在牺盟内部所进行的各种阴谋活动与政治企图。我为抗战排除万难成立牺盟会，并为适应抗战紧急需要大量提拔青年干部，原期对国家民族尽最大力量，不意此等伪装分子混入内部，只为部分利益，不顾民族利益，际此抗战进入千钧一发的阶段，脱离国家民族立场，捏造事实，进行分裂……此不惟是我牺盟的叛逆，亦乃国家的罪人，应为全体牺盟同志所彻底认识者。

二、事变一开始，此少数阴谋分子所捏造之唯一口实，第一是山西已局部投降妥协，第二说我被顽固分子包围，在事实证明我全体军民依旧在前方与敌浴血苦斗……始终不渝！但对一切危害抗战制造分裂的阴谋活动，决不予宽容，阴谋分子之欺骗宣传，绝不能掩盖铁的事实于永久。

三、事变发生以来，使我多数牺盟同志蒙受其害。或不明真相盲从附逆，或迫不得已，被其裹胁，加之各地情况遽变，一时未复常轨，致彷徨歧路莫知所措者亦属不少。兹所告者，我牺盟政治立场与路线，始终不变，团

结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一举抗敌，是我国的基本精神，今日牺盟的恶运，乃少数分子背叛牺盟所造成，我全体同志应认清是非与利害，勿为无稽谣言所动摇，要百倍的坚定自己的立场，一本以往精神，站在牺盟的旗帜之下，奋斗到底，我已告知各地军政当局对各地牺盟同志加以保护，对于明了事实真相后觉悟归来的同志，尤予以切实之保护，望我全体牺盟同志，明辨是非，负起拨乱反正的责任，勿为奸谋所迷惑，是所至盼。

12月9日，毛泽东对晋西事变的估计和方针又作了补充指示，认为，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其目的在向我们示威，取得我们让步，以便他能确实掌握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压倒新派与我们的力量，以准备实行投降时的比较有利阵地”。但目前阎本人“对实行投降与公开反共，似尚未下最后决心”。“整个说来，现时局是布置投降的时期，未至实行投降的时期”。我们的方针，“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

事变发展

阎锡山宣布讨伐决死队二纵队后，派出六个军向隰县、孝义一带攻击。

由于中共方面薄一波等人已经做好了防范，所以阎锡山的讨伐并没有获得多大成效。晋西事变爆发后，薄一波向决死队各部发出电报，要求所有新军部队必须明确支持二纵队。一纵队还动员了三个主力团准备支援。中共方面在事件中始终坚持拥护阎锡山抗日的姿态，并没有攻击阎锡山，而是将矛头对准晋绥军的高级将领们。决死队各部和牺盟会领导纷纷致电阎锡山，抗议王靖国、陈长捷、赵承绶、孙楚挑起事件。新军在事件中还得到了八路军的支持。晋西事变中，新军三纵队有四个团，二纵队有小部分倒向阎锡山，其他新军33个团均离开了阎锡山。

事变发生后，为了应付晋绥军的进攻，决死队发动了“反顽战役”。12月9日，决死队开始发起反击，以一部就地作战，主力则分为两路，一路出击

隰县，一路出击石楼县、永和县，然后会师隰县午城镇，直取大宁县、蒲县。12月10日，政卫第209旅2个团出击隰县县城之部消灭晋绥军第十九军一个团部及一个营；出击石楼县、永和县的部队则因遇阻而未能按原定计划和出击隰县的部队会师。12月14日，陈长捷率7个团进攻第六行政区保安旅，占领汾西县暖泉头（今属勍香镇）；黄骅率领八路军第115师晋西独立支队第2团及政卫第209旅第52团一部前来增援，一昼夜后击溃陈长捷部，追击数十里。

晋西南党委从11月下旬在隰县张家川召开区党委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区党委林枫、张稼夫、王达成、黄骅、龚子荣及部队领导同志陈士渠、张文昂、廖井丹等，12月9日会议讨论了晋西南的形势，认为突然事变已经开始，顽固分子已在实践其妥协投降的阴谋，如果能予以迎头痛击，尚可能推迟投降局面，决定：（一）晋西南阵地一定要坚持，驱逐叛军出晋西南，进步政权与群众利益一定要保卫。（二）要快干，要主动的武装自卫。（三）武装斗争，要由新军出面来干，反对旧军解决新军，要求晋东南、晋西北给以帮助，集中晋西南新军，免被各个击破。（四）八路军开始时不参加战斗，保持靠近新军。会后，迅速集中新军、八路军（只有支队部和一团、二团尚在河东）于隰县康城、石口一带。12月7日至8日，中共晋西南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隰县高家条召开，林枫代表区党委总结了过去的工作，主要讲了当前的形势、党的方针和紧急动员工作；王达成做组织工作的报告：抗战以来，晋西南区共建立地委四个（汾孝称中心县委），县委二十六个，区委八十三个，支部八百三十八个，共有党员一万七千八百六十九人，大会选举产生了区党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委员：林枫、王达成、张稼夫、龚子荣、陈士渠、黄骅、王文达、刘文珍；候补委员：杨尚儒、武永祥。大会选举出中共七大代表：林枫、王文达、彭德、马平定、解学恭、梁树棠等。因为晋西事变发生，大会只开了两天就告结束。

乡宁地委武装部部长兼一一五师独立第一支队第一大队政委彭之久率领一

大队到汾南地区领导军政民工作，整理政卫二一二旅，收集干部，坚持汾南工作。政卫二一三旅旅长郝玉玺从秋林返回途中在吉县被阎军34军杀害，部队没有及时转移，12月31日被阎军包围，此日突围，转移到太岳沁源县，损失惨重。

12月12日夜晚独二旅第6团团长在汾西县它支村（今属勍香镇）陈雉卿在团部奉命率第一营返回二纵队司令部（驻霍县）途中,突然绑架团政治部主任李曙森、组织科长任景龙、宣传科长廉指明、民运科长王劲虹、一营教导员王润、二连长田运齐等，在一条山沟里就地枪决……,陈的叛变阴谋被二连指导员姚永贞察觉,姚与陈周旋后即回连队,一面派人向附近的一九六旅部队紧急求援,一面把机枪班掌握在手中,旋即向陈雉卿射击。这时，韩钧派二纵队游击十七团部队已赶到,进行截击,陈雉卿急忙带领警卫人员和少数军官逃走。

12月12日晋西北阎军赵承绶、郭宗汾部向新军决死四纵队形成包围形势，四纵队内部反动军官也准备随时下手决死第四纵队发生营长支长禄无理扣押政治教导员，连长万春祥毒打政治指导员的事件。四纵队政委雷任民、独七旅政治主任李力果、二0三旅政治主任刘玉衡及其他在部队领导金敏、刘仰峤、罗萍、王黎生等召开党委与部队行政领导人参加的紧急扩大会议，政委雷任民主持会议，会议认为在晋西北，赵承绶已布置好向决死四纵队进攻，四纵队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必须当机立断，争取主动，抢先下手肃清内部的顽固军官，完全掌握部队，集中力量对付外部的敌人。会议最后决定：12月12日夜全军同时行动。按计划一举逮捕了两旅部和二十团、三十四团以及随营学校的顽固军官，取得了完全的胜利。12月13日部队迅发，突破日、伪、顽的包围，从交城山中转移到岚县普明镇一带，靠近晋西北区党委和一二0师三五八旅指挥机关。并派阎步沄到岚县王狮向中共晋西北区党委罗贵波汇报行动计划。13日，决死四纵队二0三旅刘仰峤、刘玉衡带领十九团解决了旅部，逮捕了阴谋发动武装叛变的旅长刘武铭等反动军管，现场搜查出刻好的“忠勇抗日义勇军”图章及委任状等。是日

夜，独七旅方面，由三十四团政治主任姚仲康解决了团部，旅长卢宪高带三十四团的八、九两个连逃阎锡山处。与此同时，十九团政治主任杨叶澎内外配合，把二十团的队伍也拉了出来。四纵队根据区党委的指示，于十六日转移到岚县，向彭三五八旅靠拢，清理内部，巩固部队。

12月13日，贺龙、关向应、周士第、甘泗淇致电晋西北区党委及三五八旅，对晋西北我军部署提出意见：彭三五八旅旅部与七一四团应集结于普明与赤坚岭之间，赤坚岭必须控制在我军手中，以保持战略上的机动。警六团应集结于岢岚、保德、五寨三角地带，以策应续范亭部。一、二团接近决死四纵。12月16日，赵承绶在兴县召开高级军事会议，部署军事行动，企图消灭晋西北的决死四纵队等抗日新军武装，续范亭中途退席，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晋西北区党委，当时驻兴县的阎军有赵承绶第一、二、三骑兵团，步兵第六十八师、七十一师，杂牌军游三师等；郭宗汾的三十三军驻临县。

12月21日，决死队主力及八路军第115师晋西独立支队共6个团攻击据守孝义县水头镇的晋绥军第十九军一部，因对方已经集中兵力，未能攻克，不得不撤出战斗。22日，决死二纵队、晋西支队在隰县石口、水头地区一带与阎军激战后，此时，汾孝地区狭小，无回旋余地，处于日阎夹击中，晋西南区党委作出突围到阎军后方之决定：（一）第六专员行署及部队后方、俘虏队共两千人，由马佩勋率领送往太岳区；（二）王达成率领决死二纵队游三团一个营汇同甘一飞领导的四大队留汾孝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并掩护隐蔽在群众中的干部；龚子荣和刘文珍、解学恭带领三大队和灵石大队坚持洪赵地区的游击战争并整顿党的组织。（三）决死二纵队主力和晋西支队组成两个梯队，新军作为第一梯队，八路军第115师晋西独立支队作为第二梯队，出弓阳、关上，西进中阳、石楼，沿黄河南下，突围到阎军后侧，与阎军“换防”，直捣晋绥军的根据地永和县、大宁县、吉县、乡宁县。12月23日，两梯队顺利抵达中阳县境内。第一梯队南下，第二梯队西进，第一日占领留誉，歼33军一个营。第二、三日，在三交激战两日，

歼二零二旅两个团大部，但第一梯队南下受阻，撤回与第二梯队会合。

12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反磨擦问题。毛泽东指出，现在阎锡山表面上未投降，心中已投降，他在打新军便是投降，样子上还未投降，实际上已反共，样子上还没有公开反共。我们要利用阎的这种矛盾，在拥阎之下反阎。在这种矛盾之下我们可以取得胜利。同一天，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晋西北区委和八路军总部等，指出，“阎已令赵承绶调兵（向北）进攻四纵队，武装冲突势不可免，应立即准备作战，继续巩固新军。武装冲突不应由新军先发动，而应在赵承绶进攻时，新军占有利阵地，取防御姿态反攻而消灭之。”12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一二0师主力日夜兼程回赴晋西北，并令彭八旅接应决死二纵队和晋西支队北上。

晋西南地区新军由于连续作战20余日，极度疲劳。而顽军正以数倍兵力逼进，面临被晋绥军包围的危险，晋西南区委决定北上转移到晋西北，报告中央同时即开始实施。12月27日晚，新军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在柳林镇东西两侧过三川河与公路通过日军封锁线，进抵临县招贤镇、任家山，整编为6个团八千人。这时接到中央军委指示，在旧军强大力量进攻下进入晋西北是正确的，应当继续北上，与八路军主力会合。12月30日，又转移至离石、方山、交城、静乐地区。驻防于晋西北的晋绥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集中骑兵第一军八个团的兵力，在白文镇、寨上村、开府、方山一线，企图阻止晋西北新军南下，并以郭宗汾的三十三军六个团在临县以南阻止晋西南新军及晋西支队继续北上。针对赵承绶的部署，续范亭星夜赶回，到岚县史家庄向区党委作了汇报，并令暂一师抢占了赤坚岭战略要地。

12月28日，阎军第三十四军以召开联防会议为名，将新军政卫二一三旅参谋长张焕骗去扣押在军部。于12月30日晚，三十四军六个团、六十一军三个团和八十三军新编十四团，在三十四军军长彭毓斌的指挥下，从南、北、西三个方面，向乡宁县周家岭一带的二一三旅发动了进攻，战斗首先

在五十七团阵地打响，31日晚五十七团撤到盘道村与旅部和五十八团会合后，向襄陵县刘庄方向转移。

12月29日，彭绍辉率领的七一四团主力，完成护送弹药到晋察冀一二0师部的任务，返回途中在太原以北的耀子村歼日军二个中队，于29日晚赶回岚县史家庄。至此，晋西北八路军摆脱了被动局面。30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一二0师彭三五八旅与决死四纵队从岚县出发，接应决死二纵队和晋西支队继续北上；并令一二0师主力星夜返回晋西北，准备反击阎军的进攻。30日，晋西北党委在岚县史家庄召开军政干部紧急会议，决定了行动计划和作战部署，成立了“晋西北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续范亭任总指挥，雷任民任副总指挥，罗贵波任政委。同时，部署了军事行动。这就形成了决死二纵队由东南、决死四纵队等部由西北夹击赵承绶、郭宗汾等部的态势。以决死第四纵队的四个团及暂一师三十六团分编为左右两个纵队。由彭绍辉指挥分别向方山、临县白文镇方向出击，冲破顽军的阻截，打通道路，接应二纵队与晋西支队北上；以七一四团及保安第七团为预备队集结于岚县地区，并对静乐日军警戒；以决死第四纵队第十八团进占兴县，摧毁兴岚两县的旧政权和公安局，控制黄河边的黑峪口，以保障我军与陕甘宁边区的交通；以工卫旅两个团由岢岚开至兴县以北的魏家滩，相继消灭驻在保德的顽军第二00旅；以暂一师三十七团警戒五寨方向的日军；调警六团自雁北赶回保德、五寨间，相继消灭顽军杨集贤部；在文、交地区的工卫旅第二十二团及彭三五八旅的独立二团一营消灭顽军暂编第一旅薛文教部。

12月31日日，毛泽东、王稼祥发出《关于晋西事变以及我军军事部署的指示》，指出目前形势，阎锡山以全力进攻晋西南，准备得手以后，转攻晋西北，隔断华北与边区及华北与各个区域的联系，将牵动华北全局，这是关系全党的重大事件。

12月1日至9日，晋西北新军先后占领寨上、开府、阳坡、马坊、方山、白

文镇，从东、北两面将阎军压缩在临县城附近。此期间，决死二纵队、晋西支队由招贤镇进至静乐县米峪镇、天池店地区。1日，雁北阎军白志沂部，勾结日伪军和土匪乔日成部，三五八旅张宗逊、张平化指挥六团、四团和动委会察绥支队（雁北支队）等部，消灭白志沂部于浑源地区。与此同时，西雁北地区在晋绥边特委的统一领导下，在决死四纵队十八团二营及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一举摧毁了左云、怀仁、右玉、朔县等阎军政权。3日，工卫旅在晋西北区党委的领导下，逮捕了该旅旅长郭挺一。5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彭、聂并告贺、关，命令贺、关即赴晋西北指挥，并指出：晋西北关系全局，吕梁已失，靠夺取晋西北作战枢纽。7日，贺龙指示彭绍辉、罗贵波：机动灵活迅速消灭骑一军，取得方山；消灭白文镇赵承绶部；立即解决郭挺一。9日，中央军委总参谋长滕代远来到晋西北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军事行动和作战问题。10日，在滕代远统一指挥下，晋西北新军自白文镇和方山两路向临县赵承绶、郭宗汾部发起进攻。决死二纵队、晋西支队、政卫旅、二0九旅从东面进攻，彭三五八旅、四纵队、暂一师、工卫旅从北面进攻。同时，军委命令王震的三五九旅七一七团东渡黄河，在碛口地区相继配合战斗。13日，两路同时迫近临县城郊。当晚，赵承绶、郭宗汾部怕被我军歼灭，弃城逃走。14日，晋西南、晋西北我军胜利会师临县。15日，在临县城召开会师大会和庆功会。16日，我追击部队在招贤镇、田家山歼其一部；在碛口截其一个团，歼其四百余人，赵、郭二部主力越过离军公路逃向晋西南。党中央根据统一战线政策，命令四纵队等部将赵、郭阎军追至汾离公路以南即停止前进。1940年1月20日，晋西南和晋西北的新军部队在临县会师，召开了祝捷与会师大会。晋西北反顽固战役胜利结束。

1940年1月上旬，在乡吉地区建立起晋西南工委。彭德任书记，郭达任组织部长，廉怀德任宣传部长。北方局发来指示信，要求晋西南党的组织转入地下，以公开社会职业做掩护，进行合法活动；暴露身份的党员撤到太岳根据地；政治上表现动摇的党员，坚决切断组织关系，派一些党员干部打

入到敌人内部，给我们提供情报。战役结束后，晋西南被晋绥军全面占领。

在此期间，第八集团军孙楚所部，联合部分中央军向在晋东南地区的新军决死第一、三纵队和八路军发动进攻。新军和八路军奋起自卫，打退了进攻。

1940年2月4日，贺龙和关向应率领一二0师主力从恒山地区星夜赶回晋西北，根据晋西北的形势重新作了军事部署，决定将决死二、四纵队及八路军晋西支队和一二0师部共14个团布置在南线，以防阎军从晋西北进犯；北线由三五八旅主力及暂一师三十六团等部负责歼灭盘踞在河曲、保德、岢岚、五寨的阎军。同时决定，决死第四纵队行政上属晋西北新军指挥部，训练与作战完全由八路军一二0师领导。

中央军介入

在事变中，阎锡山晋绥军横扫晋西南，但在晋西北遭惨重失败，而晋东南则被中央军乘机占据。事变过后，阎锡山的地盘损失了四分之三，只能居于晋西南，不再能控制山西其他各地晋西南完整的县只有吉县、乡宁、隰县、石楼、永和、大宁、蒲县。嫡系部队61军、19军、独八旅、特别是骑一军和三十三军均损失很大。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第十九军军长孟宪吉、第八十三军军长杜春沂均离阎投蒋。

1939年12月30日，蒋介石派遣天水行营主任程潜赴二战区调查、点验。1940年1月3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下令：

胡宗南部派两师增援晋西，归阎长官指挥，……以卫长官统一指挥晋东南之中央军及孙楚部。

这导致第61军撤回原防地，以免被胡宗南部进占。

10万中央军控制晋东南后，还进一步控制了晋东南十多个县的政权。阎锡山的部下杨乃超在日记中记述道：

近日之电报，大都是关于晋东南中央军及中央军所派之县长打击我精建会敌工团之同志及分训团工作之情形。

阎锡山大有被中央军架空的危险。续范亭就此评论，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是“阎王定下杀马计，跑了马儿又伤身”。

解决

晋西事变后，阎锡山感到来自蒋介石中央军的威胁增加。中共中央则认为阎锡山仍有合作可能，且蒋介石有推翻阎锡山孤立中共的企图，遂提出调停。

1940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对山西新旧军的磨擦问题，我们采取强硬方针是对的。当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指出：“（甲）国共分裂之谣不可信，这是汉奸放的空气；（乙）你应对外表示八路拥护阎长官抗日建国一如往昔，但希望旧军停止进攻新军，双方和解以利抗日。”1月11日，毛泽东在复彭德怀的电报中，对目前国内形势指出：“还不是全国下雨之时，在全国任务还是组织进步力量，力争中间阶层，击退大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反动，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未丧失。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阎锡山的反动。他就是目前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部分。他的阴谋十分恶毒。他已封锁了吕梁山与中条山。我们对策，以贺、关力量首先夺取晋西北的全部，至少是大部，以晋东南力量巩固晋东南未失阵地，争回已失阵地之一部，打开一条通洛阳的路，十分要紧。然后由贺关与晋东南各出一部，向吕梁山攻击，至少恢复

原有陈支队阵地及一条交通线，打通延水关。如果此时阎锡山愿意讲和(还未丧失此种可能)，则让他占领吕梁山的大部，我只占一小部及一条交通线，就此罢手，否则战事难免扩大。”1月16日，毛泽东、王稼祥指示王世英，立即向阎锡山等表示：山西新旧军斗争应和平解决，以便团结抗日，拟派南汉宸去秋林协商，问阎是否同意。

1940年1月27日，毛泽东和王稼祥给当时在山西前线的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电示：“（甲）薄一波、戎子和、续范亭、雷任民、宋劭文、张文昂、韩钧及各地牺盟、民青，应继续不断打电报给阎、梁、杨，痛陈陈、王、孙、赵四人进攻新军，破坏牺盟，惨杀抗日人员的罪恶，并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免为敌人利用，愿在阎领导下团结抗日，决无他求，以示仁至义尽。（乙）此间已用肖劲光名义向阎提议调停，并指明陈支队被攻，吕梁山八路兵站线被消灭，八路伤兵被惨杀……。但八路愿继续团结在阎领导下抗战，如阎愿意谈判，则准备派人去谈。”1940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以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名义致电阎锡山，提出愿意调解山西新旧两军冲突。1月28日，毛、王又电王世英，要他再问阎锡山等，“是否真正同意此间派人商谈团结抗战及调解新旧冲突”。2月11日，毛泽东为新军起草薄一波致阎锡山的电报，希望阎锡山调和山西新旧两军，重新团结一致抗日。内容如下：

长官阎钧鉴： 三个月来，山西内部阋墙之争，中外惊疑，敌人拊掌，而演变所极，尤属痛心。盖我为鹬蚌，人为渔人。此渔人者，不但有一日本帝国主义，更有一顽固势力。彼挟其地位以临吾人，企图挑拨吾新旧两军，取吾两军而置其囊中。先取其一，使钧座陷于孤立，继取其二，使钧座陷入绝境。然后分之裂之，摧之折之，而晋绥军尽矣。设此企图而能实现，非但抗战不利，钧座不利，新军不利，即旧军同人亦绝无所利。为今之计，极宜由钧座调和两军，重新团结，一致抗日。两军虽一时以兵戎相见，然新军全属自卫，绝无成见。苟利抗日，无不服从钧座之指挥，想旧军同人亦必不固执己见。钧座一纸团结之令，则和协之局立现，抗日战线

重整于三晋之间矣。一波忝受知遇之恩，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敬祈速决大计，俾有遵循，大局幸甚。

毛泽东同时指示：

此电不提任何条件，只提两军团结，使阎及旧军好转弯。待萧劲光去谈判时，再与阎磋商条件。如各守现地，互不侵犯，双方均不加处罚等。此电只用薄一波出名，续范亭也可打同类电报去。如阎同意妥协，再由新军诸领袖联名发一团结抗日宣言，就可了事。

山西全省新军应公开发表下列口号：

拥阎抗日；

新旧两军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新军不打旧军，要求旧军停止打新军；

枪口对外，停止内争。

以上这些口号，应在一切接近旧军的地方写出来。

2月11日，毛泽东电朱、彭等，指出，在蒋介石的分化政策下，阎锡山可能与新军达成妥协，新军也以在有利条件下仍属阎指挥，恢复合法地位为宜。我们的政策在于暂时中立阎，不使阎与国民党中央联合对我，不使新军受国民党中央指挥。并指出，同阎锡山谈判应由萧劲光以居间调停形式出面进行。阎锡山复电中共中央，表示，“萧主任有暇，希望前来一谈。”2月25日，萧劲光、王若飞持毛泽东致阎的亲笔信到达秋林。信中鼓励阎：“尤因先生领导提挈至明至慎，必能处理悉当，益臻进步，团结之途，无可疑者。”毛泽东还指示萧、王，“你们俩去给阎锡山讲清楚，我们共产党是诚心实意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嘛!你们为什么要同室操戈，制造磨擦，杀人略地，让日本强盗高兴呢？抗战初期你阎锡山同我们合作的还可以嘛!为什

么现在跟着蒋介石的指挥棒转，同我们过不去呢？我们也不是好惹的。”“警告他，我们共产党以忍让为怀，可决不软弱可欺。”萧劲光、王若飞向阎锡山提出了如下和平解决办法：

双方停止军事行动；

双方停止政治攻击；

新军表示拥阎，不受中央政府改编；

双方互不处罚，互不侵犯；

今后统一于进步，实现阎之十大纲要；

恢复与新军电台联络及人员来往。

中共方面的这些提议受到阎锡山、赵戴文、杨爱源、梁化之、李冠洋等以及王靖国、薄右丞等的欢迎。阎锡山表示：

新军仍属晋绥军是其愿望，但问题已交中央，不便说话，只好让其自然演变，不了了之；

已令各军停止军事行动及政治攻击，如韩钧等受日寇攻击，他还要助韩；

与新军电台经常联络，并未断过；

今后当注意以进步求团结。

阎锡山还公开表示，自己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自己的存在于团结有利。阎锡山同意了中共提出的恢复晋西兵站线的条件，但未同意在沿线驻兵。萧、王在秋林与阎谈判了4天，达成了初步协议。双方同意继续派代表具体协商联合抗日和划分防区等细节问题。阎锡山亲笔给毛泽东写信，表示，“仍盼共同努力，克服当前一切困难，以尽民族革命之全功。”4月

初，双方正式达成协议，确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南与晋西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区，晋西北为八路军活动区。从此双方划界而治。

5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笔致信阎锡山，信中说："此间同志对山西之团结夙所关怀。苟先生对团结有进一步办法，来等无不愿尽绵薄，以挽危局，以利抗战。夫唇齿相依，患难与共，处今之世，惟先生能熟察之也。披诚直达，敬希明鉴。"

事后

中共和阎锡山方面达成和解协议后，双方均对该事件作低调处理。此后双方保持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但是，双方始终认为对方是事变爆发的责任方，并且在这一问题上从未取得一致看法。

吕调元等最后未及撤离秋林地区的牺盟总会领导人被阎锡山逮捕，羁押七年，1946年被毒杀于太原狱中。

后来正逢中共和阎锡山关系处于低潮时，1944年7月21、22日《西京日报》刊登了阎锡山对中外记者团谈话，内称阎锡山在1939年准备冬季攻势时，新军二纵队负责人韩钧率部叛变。该报同时还刊登了第二战区参谋长郭宗汾对记者团的报告。阎锡山的谈话和郭宗汾的报告对中共进行了严厉指责。时在延安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太岳军区政委薄一波将此事向彭真进行了汇报。中共中央闻知后，责成他们商议对策。彭真召开数次座谈会，决定了反击的方针，报中央批准后执行。根据该方针，1944年8月13日由新华社接连发表《韩钧谈晋西事变真相》（该文由毛泽东起草）、《薄一波同志揭露阎锡山通敌叛国内幕》，刊登于8月14日的《解放日报》上。后来《解放日报》又于8月16日头版发表了新军总指挥续范亭所作的《三年不言之言》，8月24日发表了续范亭的《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这

些文章反驳了阎锡山的指责，并揭露阎锡山私通日本人还签订和平协议。这次言论交锋是中共和阎锡山在事件结束后首次也是惟一一次专门就该事件进行正面交锋。1944年8月中共指控阎锡山“背信弃义、发动内战”，并称晋西事变为“中日提携”之结果：

就晋西事件本身而论，是阎锡山首先背信弃义，发动内战。阎锡山企图解决新军、蓄谋已久，至1939年1月间，乃授权王靖国、陈长捷等，准备进攻新军；并找反共将领，一个个地向他们说：“共产党、八路军势力日益壮大，再加上犠盟会、决死队与之合作，我晋绥军将无立足之地。现在我们只有解决新军、犠盟，援用日本所提中日提携办法，达到生存之目的。”有一个反动军官(刘武铭)问：如何解决？王、陈答以先改组决死四纵队为“中国抗日忠勇先锋军”，再集中晋西六个军，配合日寇，解决决死二纵队，然后协同日军，解决一、三纵队。果然不久，阎锡山即委任陈长捷为“讨叛”军总司令。陈于1939年11月29日(晋西事变前九天)发出密令，分三路向新军进攻，计南路纵队为六十一军、八十三军及警备军之第七十三师等，司令由陈由兼，进攻隰县属之义泉，黄土(八路军晋西支队)；北路纵队司令为梁培璜，率十九军及三十三军之一部，进攻隰县……于是1939年12月1日，阎锡山下令决死队二纵队要准备于5日向同蒲线大举破击，实行所谓“冬季攻势”。我正在动员部队，执行破击命令时，阎军与日军同时开始向我军进攻。我们二中队处于日、阎两军包围夹击之中，情势至为险恶，有全部被歼危险，不实行自卫，就要死亡。我只得一面对敌进行血战，一面又被迫不得不进行自卫，以抵抗旧军。苦战兼旬，始突破日寇和旧军包围，转入晋西北，此即所谓“决死队之叛变”。从此以后，决死队就被称为“叛军”了。

国民党阵营内部对阎锡山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以及晋西事变颇有看法。直到阎锡山去世之后，台北《民族晚报》还在其去世后六七天专门发表社论《阎锡山值得国葬吗？》指责阎锡山，其中称，……十九年四月五曰中央下令通缉等固无论矣，即抗战前后，虽然阎氏始终站在抗日战线，但因为阎

氏大量培植左倾分子，卒使共党势力在山西坐大；二十八年十一月，新军叛变十五万之众，均投向共匪，成为后来晋察冀区共军主力，又是谁之过欤？……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4%E6%A1%A5%E6%88%98%E5%BD%B9

黄桥战役，又称黄桥事件，是1940年10月，苏北地区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与黄桥所属战区的国民革命军第89军之间发生的中等规模武装冲突。

1939年3月，南昌沦陷，江苏已成敌后，新四军越区自行扩大抗日根据地，与毗邻防区的国军发生摩擦，其间互有小规模武装攻击。1940年新四军北上，进入苏北时任省主席韩德勤的防区，7月接近黄桥镇时，驻黄桥“日军久攻不下的”国军先自行退却，新四军旋即进驻黄桥，此举引起韩德勤的不满，韩请示蒋介石，却只得到含糊回复。于是韩集结了4倍于新四军，即约1.5万人的兵力，向新四军进攻，新四军获得胜利，一举将国民革命军第89军消灭，也占领了姜堰，89军中将军长李守维战败溺水身亡，中将旅长翁达战败自杀。

此役是新四军改编以来遇到的最大的战役之一，该战役的防御对象并非精锐的日军或汪伪部队，而是参加过徐州会战的抗日将领、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所属的抗日主力部队。此“抗日主力部队”的战力表现却令世人大跌眼镜，韩部掌握进退主动权却混乱不堪，数倍对方的重大

伤亡，又加上陈毅在战前已对国军陈泰运、李明扬、李长江部渗透，因而在战役中唯有韩部嫡系部队孤军深入，而新四军战斗部队四千余人，以逸待劳，轻松取胜，新四军声称国军1.1万余人伤亡或俘虏，国军声称的伤亡数字是官兵“五千余”。

战役背景

此前军队粮饷来源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由南京国民政府划定一定的防区，防区内军队就地自筹一部分，二是由中央拨给一部分。而对于如失去领地后入关的东北军，没有固定防区的出川川军，则只能依靠中央拨给。对于新四军，按照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时与蒋介石的协议，每月应发给新四军军费为法币18万元，实际每月给8万元，后经叶挺和项英多次要求，增加到每月法币13.5万元，同时国民政府最初划给新四军的防区为：第1、2支队在长江以南，芜湖以东，高淳、溧水、金坛之线以北，丹（阳）金（坛）公路以西；第3支队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铜陵，南至青阳，北临长江；第4支队在皖中淮南铁路沿线一带。

随着1937年南京失守，1938年武汉失守，1939年南昌失守，国军主力在日军进攻下已节节西退，除去随汪伪政府投靠日军的伪军，敌后只余部分国军半隐藏游击，敌后自筹粮饷越发困难。主力部队尚可从中央优先获得硬通货和实物补给，非主力部队能从中央获得的补给则大幅减少，加上39年法币开始贬值，实际只能依靠自己。同时，因蒋介石、顾祝同为新四军划定防区非常狭窄，不利新四军作战及发展。因此，新四军决定向防区外发展，1939年5月，陈毅派遣叶飞率领第六团赴国民政府所属江阴、无锡、常熟地区活动。陈毅、粟裕遂决定，陆续派遣部队北渡长江，向长江北岸发展。经过几个月作战与发展，至11月底，新四军已有数支主力到达苏北，控制了长江渡口，新四军跨长江两岸，占据有利态势。

1940年初，主持华中的刘少奇制定战略先集中发展苏北。粟裕率领所部新四军进入苏北。当时新四军实行“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1940年4月5日，毛泽东于“发展华中根据地的部署”中认为：“华北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蒋介石企图划定华北为我两军（新四军、八路军）防区，我之斗争艰苦，不入华中（国军防区）不能生存。”

战役前奏

双方摩擦

八路军及新四军在华中的发展，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注意和警惕。随着新四军自西、南两面，八路军自北面逼近苏北，尤其是皖东的新四军正处于苏北国军与重庆后方的联络补给线上，使韩德勤感到莫大的威胁。

1939年，韩德勤出动正规军包围突袭了进入本辖区内东海县的八路军独立第三团，杀伤该团团长以下数百人。同年夏，又围攻活动于高邮湖以北闵家桥地区的抗日游击队，惨杀该游击队领导人陶容以下数百人，其中大部是共产党员。当地的陈文部队发展到3000多人，是民间抗日武装。陈文仰慕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治军有方，遂派员与中共苏北工委取得了联系，主动请党整军。经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批准，委派苏北工委委员吕镇中及陈淦去陈部创办教导队，并建立了中共秘密组织。韩德勤因陈文屡不听调遣，仍在扩充部队并有投共之嫌，派主力八十九军突然将其包围，狠打一个星期，全部缴械或杀害，团长陈文也遭谋杀。

1940年3月，韩德勤致电军委会称：“请严令各部队非经军委会、战区长官令准，不得自立名目，组织游击队。理由：查苏鲁豫皖边区一带，发现某军某支队名义之杂色军队甚多，到处收缴民枪，非法组织民众。”该建议得到国府军委会的批准并转各战区执行。

1940年，3月5日，八路军包围延川县政府，并将保安团缴械，随后中共派出萧华部，歼灭国军山东省保安第25旅。同年4月，中共乘胜追击，集结八

路军精锐，袭击国军高树勋、朱怀冰及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锺麟部，并获得胜利。新四军亦于7月4日起发动对国军李明扬部的攻击。中共并形容此类对国军作战战果为“反摩擦斗争的胜利”。9月，协同新四军开辟苏北的南下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部）第一、第二支队和新四军第五支队，分别抵达涟水以北地区和大运河西岸，与新四军苏北部队形成有利的战略态势。

1940年4月15日，毛泽东、王稼祥电令刘少奇、项英抵抗韩德勤的部队：

第115师彭明治、吴法宪支队约一万二千人，不日从鲁苏边出动，向北前进，估计约三个星期内外可与刘少奇方面配合夹击韩德勤。

1940年7月12日，毛泽东下令：

一、为对付韩德勤的进攻，第一一五师彭吴支队约一万两千人，不日从鲁苏边出发，向苏北前进，约三星期内可与刘少奇配合夹击韩德勤。韩德勤是顾祝同唯一嫡系，受我打击后，顾有对我皖南、江南新四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英准备应付办法。惟决不可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二、左权、黄克诚率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一万两千人已从太行山出动，不日到冀鲁边境，随时可调至陇海路南与彭雪枫配合作战。

半塔集之战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前方将领发出《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一）陈毅猛烈发展苏北，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扩大军队二万至三万，建立巩固根据地。其在江南者一直发展至淞沪、沪杭、苏嘉三路全线，并超过沪杭路直达海边，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并扩大军队三万至五万。……（三）胡服（刘少奇）直接指挥皖东斗争，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化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四、五两支队应由一万扩大到四万以上，决不让任何反动派隔断我徐州浦口区域。……（五）彭雪枫部确实掌握新黄河以北（即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西起开封，东到海边，将此整块地区化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

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坚决不让任何反动派插入，扩大军队至四万。……”

1940年3月，国军制定了《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计划由李品仙、韩德勤部进入淮河南北，将中共军队压迫到长江以南或伺机歼灭，以截断新四军与18集团军之南北联系。蒋介石虽然对八路军南下保持高度警惕，但是不赞成在抗战时期就和中共产生大规模冲突，只倾向小规模各个击破，于是修改方案，密令韩德勤“密着选编纪律严明、政治知识充实之众为机动小部队，各配属以优秀政工人员，派员统一指挥，预为充分之准备，先肃清运河以东之伪军伪组织后，相机迅速进入洪泽湖南北附近地区，与李兼总司令部队协力将伪军压迫于大江以南，或一举剿灭之，务截断南北伪军之连系。并侧重政治工作……”接到蒋介石命令后，韩德勤部署117师刘漫天部3月底在本辖区内的天长、六合、盱眙等地攻击违令进入的新四军，并主攻皖东新四军第八支队领导机关驻地半塔集（注，半塔集在津浦路东属军委会划分给韩德勤的游击区域）。

半塔集当时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双方兵力悬殊，半塔集坚守待援，十万火急。奉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之命，从江南刚刚过江、驻扎在江都吴家桥的挺进纵队在副司令叶飞率领下，日夜兼程，火速西进，前往增援。最终，在半塔集守军和挺纵援军的奋力反击下，国军的围攻被击溃，新四军在半塔集战斗取得胜利，韩、李军东西夹击聚歼新四军守军的计划失败。 在半塔集，叶飞见到了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双方进行了一次长谈，就苏北局势交换了意见。刘少奇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已经确定要进攻新四军，顽固派既然来进攻，我们就有理由奋起自卫。他分析：八路军黄克诚部正在南下，已到达陇海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四、五支队在皖东的部署亦已展开；江南新四军也准备渡江北上。对苏北三而合围的态势已经形成。他希望叶飞在苏北担负起“引敌围攻、孤军坚守、待援歼敌”的任务。

战前部署

1940年7月，粟裕指挥新四军出其不意的渡过长江，驻守黄桥国军何克谦部（属桂系）不战而逃。国民政府中央于7月16日通过中央提示案。8月，国民政府参谋长何应钦电令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停止不法行动，苏北、山东并非各该军作战区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规定作战境内。”1940年9月，中共得知国民政府第92军李仙洲企图以三个师援助已遭新四军打击的韩德勤，毛泽东立即下令八路军第二纵队杨得志急行军到新四军第四纵队彭雪枫所在地，115师第5旅到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张爱萍所在地。9月3日，韩德勤集结李明扬、李长江、陈太运部和保安第三旅为右路军于姜堰，集结第117师(欠1旅)、独立第6旅(欠1营)、保安第一旅(欠2营)为左路军于曲塘，共同进攻营溪。9月6日，保安第一旅被歼灭2个团，进攻失败。新四军释放了该旅被俘副团长以下全部人员，确保了该旅在后来的黄桥战役中逡巡不进，中立观望。9月13日，作为报复，新四军进攻姜堰，次日即攻陷该城。9月30日，韩德勤集中其大部兵力，由海安、泰州等地分三路向黄桥前进。这时，八路军南下部队尚在老黄河一线，第五支队仍在运河以西，难以对苏北部队进行战役配合。经过审慎研究，为了赢得一举解决苏北问题的时间，新四军陈毅决心以劣势兵力在黄桥地区独立同韩部决战。粟裕协助陈毅具体组织战役并负责战场指挥，决定以黄桥为轴心，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歼击韩部。9月30日，新四军撤出姜堰，却并不将姜堰交还韩德勤，而是通知非韩嫡系的李明扬、陈太运前来接防。李明扬大喜过望，不仅不通知韩德勤，甚至也不知会陈太运就单独前来接管了姜堰；于是新四军又另送给陈太运一百多条枪。这些离间收买的举措进一步分化了国军。撤离姜堰到达了新四军的底线，黄桥战役一触即发。

过程

新四军撤出姜堰后，粟裕亲临黄桥前线指挥战役，陈毅在黄桥以西约20公

里的严徐庄“总领全局”。此役国军集结26个团3万余人，于9月30日出动，因受阻于暴雨，迟至10月4日开始进攻黄桥，新四军防守兵力为7000人（其中战斗兵仅5000人），重装备很差，全军才1门迫击炮。国军虽有战役发起的突然性（黄克诚部直至战役结束未及南下支援）以及总体兵力的优势，但战役指挥失当，兵分多路，直接进攻黄桥兵力不足，给新四军以各个击灭之机。此外，由于新四军战前的一系列孤立韩德勤行动，使李明扬、李长江、陈太运部以及部分非韩嫡系部队于战役中坐视韩部嫡系被围而不施救援。

10月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到，“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计划以黄克诚部急行军南下救援陈毅粟裕，但韩德勤早有准备，于战前将老黄河等多条河流渡口船只全部烧毁破坏，严重迟滞了黄部南下进程，直至战役结束四天后才抵达尚距战场近80公里的东台白驹镇。毛泽东集中兵力防守黄桥的企图落空，陈毅粟裕部面临孤军困守的境地。

国军部署是，以韩德勤部嫡系李守维89军、翁达独立第6旅共15000人为主力，分经营溪、古溪、祖师庙、加力(地名)进攻黄桥北面和东面；以李明扬、李长江、陈太运部为右翼，以5个保安旅为左翼，分别进攻黄桥以西和以南，并掩护中路军两翼安全。针对韩军进攻部署，粟裕认为，“一般作战原则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但此次实力较弱各路非嫡系杂牌军已暗中表示中立，先攻击之于政治不利，且即便杂牌危殆，韩德勤也必定不理会其存亡而是会以先尽力攻下黄桥为根本目标，故而首战应直指进攻黄桥的先锋韩德勤嫡系翁达旅，翁达独6旅装备精良，该旅下辖2个团，每个团装备8门捷克造81毫米迫击炮，每个营装备6挺捷克式重机枪，每个连装备9挺捷克式轻机枪，该旅步枪系捷克式和中正式步枪。一旦翁旅被歼，各路杂牌必然不敢动作，且能予敌士气以严重打击。”据此，粟裕命大部主力在城外埋伏，仅以少部兵力守城。10月4日下午三时，翁达独立第六旅攻至黄桥以北2-3公里处，粟裕令第一纵队立即出击，以逸待劳，仅三小时全歼翁旅，

中将旅长翁达自杀。此时国军第33师猛攻黄桥，几乎突入城内，但原定中路进攻的89军李守维部却未能在此时到达黄桥，原来正在行军中的李守维得知翁达正被围歼，惊恐之下，既不敢救援翁旅，又不敢继续向黄桥进发，反而命令所部原地构筑工事防守，致使三十三师的进攻功亏一篑。10月5日，已歼灭翁旅腾出手来的新四军各部包围33师和89军，当天歼灭33师，次日歼灭89军。至此，战局大势已定，为免更大损失，国军残余各部当即撤离战场。此战，与新四军早已暗中输款的李明扬、李长江、陈太运部毫无损失。计从10月3日至10月6日，粟裕指挥新四军经过多次战斗，共歼灭国军主力12个团，保安第十六旅全部，保安第三旅、保安第五旅各一个团，共计一万一千余人，国军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独立第六旅旅长翁达及旅、团长数人阵亡，俘虏国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九十九旅旅长苗瑞林、一一七师参谋长等师、旅、团军官30余名，下级军官600名；缴获长短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189挺，山炮3门，迫击炮59门及大量弹药和军需物资，新四军取得胜利。新四军乘胜追击，进占海安、东台等地并重占姜堰。十月十日，新四军苏北部队前锋与南下八路军先头部队会师于东台县之白驹镇。韩德勤率余部1000余人向兴化撤退，新四军追至东台即因“政治原因”放弃继续追击（兴化时为江苏省政府驻地）。

影响和后续

1940年4月1日，毛泽东派出119师、120师及徐向前部以主力南下华中开辟新的根据地，另派一部支援新四军反顽。

黄桥战役使新四军在苏北地区站稳了脚跟。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何应钦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

先前八路军徐向前于8月14日偷袭国民政府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扩展地盘，影响抗日行动，后面的新四军陈毅及管文蔚部，于7月擅自由江南防区

渡过江北，又偷偷袭击江苏省政府韩主席所属陈泰运部。并切断国军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严令制止，仍顽不遵命。复于10月4日，向苏北韩主席猛攻，韩部独立6旅16团韩团长遇害，5日又攻击89军掳去第33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瑞体以下官兵数千人，并导致89军军长李守维“冲入水生死不明，经查苏北、鲁村均非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作战区域，各该军竟越境进攻，似此对敌寇则不战自退，对友军则越轨以相侵，对商谈后提示方案则延怠不遵，而以非法越轨视为常事。……”

1940年11月4日，毛泽东致电新四军将领，要求他们学习陈毅在黄桥战役中分化、瓦解国军抗日部队的经验。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反过来指国民党挑起摩擦的投降活动、亡国活动。国民政府何应钦、白崇禧再发齐电：

第十八集团军自抗战以来，即列入第二战区之战斗序列，新四军自成立之初，即列入第三战区战斗序列；均各有指定作战目标与作战地境，此擅离规定之战区，夹击苏北之友军，究系遵何命令？……利用中央一再优容爱护之厚意，冀逐渐扩充而一气贯通晋、冀、鲁、苏，完成其外线长蛇之势，又无与敌寇纠缠之劳；驯至师行所至，见敌则避，遇友则攻，……故一面兄等部队方庆握手苏北，渲染百团大战之时，一面敌人横断河北之德石铁路，自本年6月中旬动工，未受丝毫障碍，竟得迅速庆祝通车……

大公报对皖南事变的报导：

军委会通令：据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复于本月四日袭击第四十师，乃为紧急处置，将该军解散编遣，军长叶挺就擒，交军法审判，副军长项英在逃，通令严缉”云云。这一

件事，甚使国人震惊，而尤恐牵动抗日大局。

就我们所知，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并非突然而来。据何参谋总长白副总参谋长致朱彭叶项的皓（1940年10月19日）电谓："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德勤省主席所辖属陈泰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霸等地后，又陷秦于黄桥及泰县之蒋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

统帅部虽严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复于十月四日向苏北朝鲜部猛攻，韩部独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划去除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江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部已继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云云。这种自乱阵线、偷袭攻击友军的行动，依军纪，本应予以制裁，而统帅部初未采取断然处置，若在一般军队必不能邀此宽典。

新四军北移之命，曾经延展一个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过，在中央规定的路线上曾有该部的辎重及政治工作人员渡江北移，而该部大队则不北而南，更于途中袭击四十师，因此乃有解散编遣的紧急处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军事件的综合经过。这事实，至为不幸。

《大公报》记者对此评论："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取消了建制，共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军令统一了，最高统帅权确立了，国家的统一规模才算告成。""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为华北、华中两支独立的军队，配着他们的边区政府、抗币、共产党旗、国际歌……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若干友邦人士从重庆飞向延安，乃有"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之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纪念

泰兴市黄桥镇的黄桥战斗指挥部旧址于1982年3月25日，成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A%96%E5%8D%97%E4%BA%8B%E5%8F%98

皖南事变又称为新四军事件，此间的"皖南"即指事变发生地区——安徽南部，而新四军则是指共产党辖下，分别由叶挺和项英担任正副军长袁国平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该事变发生于民国30年（1941年）1月4日－1月14日，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民党辖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部队与新四军之间的一次数万人规模的中等冲突事件。事件中，新四军所属军部兵力与皖南部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

事变背景

中共文献的记录和叙述

国共摩擦

根据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定，新四军在编制上属于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领导。但是新四军事实上只听命于延安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坚持要求部下“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由此与毗邻战区的留守国军屡有发生摩擦，互有数百人规模的小型武装冲突。毛泽东曾指示新四军所在的中共东南局“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当时中共认为，要开辟苏北，最大障碍是国军韩德勤部。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建议从华北调八路军一部南下，并令江南陈、粟部队北上，进入苏北。

所以新四军在扩大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不时与处于同一战区的国民革命军发生武装冲突。新四军完成训练后，分成4个师，分别命名为：团结师、前进师、勇敢师和抵抗师，于1938年4月27日离开皖西颖水根据地，开赴前线，5月10日抵达南陵，5月16日分成小股力量沿南京－芜湖铁路潜越敌人防线，首次同日军交战。苏北地区徐州失守后，由6万正规军防守，韩德勤担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省府设在阜宁，徐州群众动员委员会李明扬也留下来，1939年2月和3月间，日军占领海州，主力转移后国军立即收复，4月日本人宣布苏北游击队得到八路军增援；苏南地区是顾祝同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许多游击队包括新四军在此活动，而新四军控制着长江以南从南京到常州一带地区。常州以东到上海一带是“忠义救国军”控制，名义上司令官是戴笠，在上海郊区和黄浦江对岸一带游击，由青帮和洪门组成，暗杀间谍和汉奸，牺牲100多人；8月13日“忠义救国军”潜入日军虹桥机场升起一面中国国旗。

1940年7月，江南新四军突然渡江，占领原何克谦驻守之黄桥。1940年10月

初，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集结26个团（兵力3万余人）意图夺回黄桥，与陈毅粟裕率领“新四军第一支队”（兵力7000余人）发生交战。因国军各部相互之间另有矛盾，黄桥地区陈太运、李明扬、李长江部抵制韩的进攻命令，在战役中唯有韩部嫡系部队约15000人孤军深入，而新四军约5000战斗人员则以逸待劳，致使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九军中将军长李守维战败溺水身亡，中将旅长翁达战败自杀，国民革命军万余人伤亡或被俘。10月11日，新四军与八路军在东台县白驹镇会师。

曹甸战役对皖南事变的影响

11月14日，军令部将拟定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呈报给蒋中正，准备集中第三、第五战区主力，第一步先“肃清”江南新四军，第二步“肃清”所有黄河以南之八路军、新四军。但蒋中正担忧此举将导致苏北韩德勤所部遭到新四军报复，因此国民政府并不准备在新四军北移之前在苏北展开军事行动。然而新四军方面苏北将领则激进的多，时任华东局书记的刘少奇在接连取得半塔集、郭村、黄桥三大胜利后，认为以军事手段完全可以解决韩德勤，而解决韩德勤后，华中整个局面就焕然一新。因此反倒急于发起对韩德勤的进攻。11月11日，刘少奇致电延安，建议“首先消灭韩德勤，巩固苏北，确保津浦路以东地区，集中全力在皖东决战后再相机向西大发展”。毛收到后急忙当天复电制止陈毅、刘少奇、黄克诚等人，指出“目前即刻动手打韩德勤、霍守义、何柱国，在政治上极端不利，尚须忍耐”，并明令“第一次攻击令须由延安下，你们不得命令、不得动手！”其真实原因是担忧主动打击韩德勤将致使皖南新四军立即遭受国军报复围歼。

11月22日，刘少奇、陈毅将再次电报延安，称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部“于23日移盐城指挥，各部务于26日之前进入各自攻击准备位置，秘密集结完毕，待命攻击”。此电表明，刘、陈、黄已无视毛泽东11月11日回电自行其是，也置皖南新四军同袍之生死于不顾。毛泽东无奈回电同意但请其将进攻时间延后数日，同时此回电抄送叶、项，提醒其苏北作战无可避免即将

开始，皖南新四军应尽速北撤。

新四军军长叶挺收到毛泽东电报后大为担忧，立即意识到曹甸一战必将给新四军总部带来不利影响，11月29日叶挺请示中央："苏北动作能否延至我安全北渡之后?"毛复电，一面安慰叶挺"苏北动作无关大局。顾祝同可能会叫几下，你们敷衍一二"，但同时命令皖南新四军应当：1、"现在开始北移"；2、"分批北移"；3、"十二月底移完"。

曹甸是宝应县东北的一个集镇，西临宝应湖，周围是水网地带。曹甸工事坚固，内有碉堡、暗堡四处相通，易守难攻，驻有韩德勤保二旅一部、八十九军三十三师两个团及直属工兵营、特务营、炮营等共约5000多兵力。而韩德勤在兴化及其附近之保六旅、独六旅等亦约5000多兵力，随时可以策应曹甸。为此，曹甸已成为消灭韩德勤的最大障碍。

1940年12月13日16时，共军攻击部队开始运动，19时半总攻开始。因地势平坦，河沟阻隔，国军炮火攻击猛烈，至21时许，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第一团攻入曹甸西北角炮楼，但此时新四军在东北、东南两线的攻势尚未展开，使国军得以集中兵力在西线组织反击；22时许，新四军第一纵队经过近迫作业，越过濠沟，不久突破东小圩，占领了部分阵地。可是，此刻八路军在西线的进攻都处于间歇期，致使国军得以在东线进行反击。新四军进攻的先头部队未能巩固住前沿阵地，后续部队受国军炮火压制，无法向前运动。直到14日拂晓，曹甸东、南、西三面均各自为战，未能形成统一的进攻步调。新四军虽突破国军前沿阵地，但未能突破曹甸国军的基本阵地。

刘少奇于12月15日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称："我攻曹甸未下。此次战役，我伤亡共约2000人，消耗甚大，平桥虽被我占，但韩部及东北军尚有3000多人在车桥、泾口、安丰、曹甸一带，此次战役大概只能如此结束。苏北问题已成僵局，急切不能彻底解决。"

1940年11月29日，曹甸战役打响时，遭受重大打击的韩德勤立即向蒋介石、何应钦致电告急。12月3日，何应钦接到韩德勤的告急电报，他把苏北战事同皖南新四军北移进行联想分析之后，发觉如果新四军经苏南北渡，势必增加对韩德勤的压力，遂提笔在此件上批道："可令汤恩伯东进，但仍恐不济急。故对在江南之新四军不准由镇江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若江北异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本案请照上意速呈委座核示。"此电表明，国军歼灭皖南新四军军部实为临时决定，而非蓄谋已久。

曹甸战役新四军战败，后果严重，结果令国军大感欣慰，由此也不必再因顾虑韩部影响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决心，因曹甸战役证明新四军根本不具备消灭韩德勤的实力。且曹甸战役与此前半塔集、郭村、黄桥又不同，此战新四军并非劣势兵力防守反击，而是主动集结优势兵力进攻国军，结果还战败，可谓政治、军事双双失败。国军既有了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口实，又有围歼的信心，后者遂陷入极其危殆之局面。

移防命令

同月19日，因为担心类似黄桥事件的再度发生，蒋中正命令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电报在细数1940年的国共冲突后，指责说：

综观过去陕甘冀察晋绥鲁苏皖等地历次不幸事件，及所谓人多钢少之妄说，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磨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非法行动之事实，若不予以纠正，其将何之成为国民革命军之革命部队？除苏北事件委座已另有命令希切实遵照外，兹奉谢将前经会商并奉核定之中央提示案正式抄达，关于第十八集

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作战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静候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案其他各问题之命令。

命令新四军接电报后迅即将全部撤到旧黄河以北。11月9日，毛泽东以上述受令者“朱彭叶项”四人名义答复：“中央提示案内所列办法，七八月间，经周恩来同志传达后，德等以中央意旨所在，唯有服从，而下属苦衷，亦宜上达。”“德等再三考虑，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重增德等无穷之罪。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责成彼等严饬军纪，和协友军，加紧对敌之反攻，配合正面之作战，以免操之过激，转费周章。”11月1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拟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叶挺任总指挥，刘少奇任政委，陈毅代理总指挥。

毛泽东覆电后，新四军并未如“皓电”及中共中央所言随即移防。另一方面，因迟迟未见移防，同年12月3日，蒋介石致电叶挺：“新四军应在繁昌、铜陵渡过长江，在无为附近集中，然后按规定路线北上。”此电且仍受中共中央认同。不过此军令一出，前往换防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师与新四军纷争再起，华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猛攻曹甸，国军损失惨重。国民政府方面大为恼怒，转而拒绝皖南新四军东进从苏南渡江的方案（怕皖南新四军与苏北新四军会合后再打韩德勤），重新命令皖南新四军必须直接北上，从安徽铜陵、繁昌间北渡长江，并延长最后期限至1940年12月31日。但中共方面认为国民党规定的直接北渡方案是阴谋，皖南新四军最终坚持走东进再由苏南北渡的路线。此外，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却仍驻云岭，并不按中共中央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指示的路线北渡移防前进。12月初，东南局副书记曾山等新四军皖南非战斗人员1700余人开始经国军52师和108师防区向江北转移，后陆续安全到达苏北。

12月7日，蒋介石正式批准了军令部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但表示应“暂缓下令”，“待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国民党高层此时在八路军、新四军北移问题上，态度比蒋介石更为急切。10日，蒋介石命令顾祝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期限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同时还批准了军令部关于实施《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的要求。

自从11月9日朱彭等发出“佳电”之后，中共中央便明确指示：对皖南采取让步政策，对华中取自卫政策。同时还指示新四军必须在12月31日前全部北移，北移中要提高警惕，做好充分的自卫准备。25日，蒋介石面见周恩来，“以极富感情的神情”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开到河北，称新四军如不遵令北调则“必定失败”。26日，中共中央又电项英，对他们一再拖延、迟迟不北移提出了批评，要求项英立即撤离。12月28日，项英召开会议，决定遵守中共中央指定的北移路线：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迂回天目山到溧阳。并确定1941年1月4日，新四军部队开始转移。同时，12月27日，第三战区和第三十二集团军在徽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研究新四军不从北移命令后的进剿计划。29日，上官云相在宁国县万福村召开军事会议，确定集团军围剿新四军部队的部署，限定各部队于12月31日前秘密完成作战准备。1941年1月1日，新四军领导将“全部移苏南”的决心电告中共中央，但未说明具体路线。1月3日，毛泽东、朱德回电：“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

新四军北撤路线的谈判和请示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从11月9日立即开始与第三战区协调北调路线。其目的有二：一是尽量取得国军的同意，另一则是尽量选择一个日军拦阻力量较少的路线。

国军起初给新四军指定的备选路线有三条：

第一条是经繁昌、铜陵地区渡江到无为的路线。这条路线是沟通皖南新四军军部和江北部队之间联系的交通线，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渡江至皖东就是走的这条路线。从新四军军部进驻皖南开始，军部通过这条路线向江北部队输送了许多干部和物资。叶挺军长于1939年5月到江北视察，走的也是这条路线。这条路线的优点是路程较短，群众基础较好，沿途所经地区为新四军第三支队和江北无为游击纵队的活动地区；缺点是需要经过五十余华里的敌占水网地带，还得穿越长江敌伪封锁线，不利于大部队的行动。

第二条路线是由云岭向东经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至竹箦桥、水西地区（苏南指挥部所在地），再经苏南敌占区北渡长江。这条路线是皖南军部与苏南部队经常来往的一条路线。这条路线有利的方面是：路程也较短，沿途设有许多兵站，群众基础较好，同时苏南我军可以接应。不利的方面是，需要经过国军108师的防地，国民党方面只同意新四军非武装人员据此线北移，而不同意战斗部队沿此线北移。1940年12月初，皖南新四军后勤机关人员1700余人人即循此线辗转北移经苏南到苏北地区。

第三条是由军部驻地云岭南下茂林、三溪入旌德、宁国转广德、郎溪到溧阳渡江再到苏北的路线。这条路线大致上就是后来皖南新四军移动的路线。这条路线群众工作基础薄弱，路程也比较远，又是向国民党的后方和重兵扼守的方向行动，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不利。但在国民党同意皖南新四军部队沿此路线北移以及国民党顽固派尚未完成对新四军进行“围歼”部署的情况下，只要新四军行动迅速、坚决，由此路线胜利北移是完全可能的。

皖南新四军最初计划走第一条和第三条路线，即同时东走苏南和往北走繁昌、铜陵两条路线转移。叶挺于11月上旬亲赴上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洽商皖南新四军北移事宜。

据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长钱俊瑞回忆说："十—月九日（即发出佳电那一天），叶军长即从军司令部所在地之云岭，起程到上饶，谒见三战区顾司令长官，洽商—切有关北移的问题。"商定的新四军北移路线为："由茂林、宁国、经苏南渡江北上。"（此路线即第三条路线。）

傅秋涛（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1955年授上将军衔）回忆说，我军决定北移后，叶挺军长亲自奔走，向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提出北移路线，并要求沿途国军不得拦阻。顾祝同同意我军经泾县、茂林、宁国、宣城、郎溪至苏南敌后北渡，并允于沿途保护。（该回忆同样说明，国军第三战区至少在11月份仍同意新四军沿第三条路线北移。）

项英的警卫战士郑德胜（1955年授中校军衔）回忆说：叶挺军长亲自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我军北移问题，"国民党要新四军由云岭出发，翻越丕岭，取道旌德、宁国经天目山进苏南，再过江到苏北。""转移前，项英还派人到上饶找顾祝同要求增补武器弹药。顾祝同说我以人格担保，从云岭到宁国没有一个日本兵，待到宁国后，连同以前欠的武器弹药全部补齐。"（该回忆同样说明，国军第三战区至少在1940年11月份仍同意新四军沿第三条路线北移。同时国军还承诺了武器弹药的补充）

顾祝同虽然是战区长官，但和新四军毕竟隔了一级，所以，在新四军北移路线的具体执行上，1940年11月中旬，叶挺在宣城周王村会晤了直接领导，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

上官云相层次虽然低一些，但因为直接负责作战，反而比顾祝同要难缠。上官云相将新四军北移路线由苏南北渡改为由泾县往北开，然后在芜湖以西的荻港附近过江到无为，理由是这条线最近。但叶挺认为日军已严密封锁芜湖一带江面，大部队无法偷渡，为安全计，仍坚持由苏南北渡。上官云相表示，皖南新四军东开进入苏南，在镇江附近渡江也可以，但这仅限于非战斗部队，至于新四军之战斗部队，仍要从驻地往北开，进入沦陷区。在新四军北移路线问题上双方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但经过几次谈判，

上官云相已基本掌握了新四军的移动方向。他认为“新四军北撤的可能较小，‘南窜’的可能较大”。其实，上官云相对新四军先南而东再在苏南渡江的路线是心知肚明的，这条路线是新四军屡次向上官云相和顾祝同明确提出的，但上官云相故意将这种移动路线称为“南窜”，并大造舆论，称“新四军北撤是假的，真的是要搞‘三山计划’，即‘南窜’黄山、天目山、四明山，作为根据地。”，一旦发生冲突，责任可以推到新四军头上。

进入12月，因苏北刘少奇进攻韩德勤，国军总部大为恼怒，同时为免新四军循第三条路线北渡苏北加强刘少奇部力量增添韩德勤部危险，遂否决第三条路线。

12月12日蒋中正明令江北的第21集团军李品仙部应配合新四军于12月底之前由皖南移江北之行动，李品仙当即遵令，具体部署为新四军军部北渡让路，电令向皖东开进的138师“对匪应暂行停止攻击并缩小正面”，“俟新四军态度明了再行处置”；应一面让“其北渡后再令移运河西岸，续开鲁北”，“一面宣传送新四军赴黄河北岸抗战”。李品仙还电令负责江边地带守备的第176师，对新四军北渡开赴河北作战一事，“仰各团政工人员会同当地党部切实宣传毋使潛滋”。

1940年12月28日，项英主持召开了新四军军分会扩大会议，决定皖南新四军绕道茂林、三溪、宁国、再迂回天目山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会后，项英将这一行动方案电告中央。

在尚未收到项英电报的时候，1940年12月30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叶挺、项英：“据恩来称：‘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皖北让路，蒋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四县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等语。我们同意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

1941年1月1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报告皖南新四军北移方案。

1月3日，中共中央在收到项英的电报后，当即由毛泽东起草复项英电：“你

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出动，是完全正确的。”

以上电文，证明新四军最终违反国军命令仍按已被否决的第三条路线行军，是得到中共中央批准的，非叶、项擅自决定。

新四军非战斗人员提前北移

据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参谋处长武之棻回忆：经叶挺与第三十二集团军司令长官上官云相于11月15日左右在周王村会晤商定，先将后方机构、修械所、被服厂、印刷所、伤兵医院及眷属等非战斗人员撤走。12月以来，新四军非战斗人员通过泾县——周王村——黄渡镇——誓节渡至竹篑桥进入沦陷区。

根据叶挺、袁国平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协商结果，新四军非战斗人员沿着国民党规定的路线先期分批北撤。

11月28日，少数先遣队成员开始离开皖南出发，12月3日新四军首批人员开始试探性撤离，从12月5日开始分梯队陆续撤离皖南。

据顾祝同12月14日致何应钦、白崇禧密电中说：“新四军移动情形：（一）该军先头部队约百余人，冬晚（即2日晚）过马头（泾县东北），向杨柳铺一带前进。江晚（即3日晚），其政工队百余过泾县城；（二）微戌（即5日戌时），该军八百余，步枪百余，身着灰军衣，经杨柳铺向宣城前进；（三）鱼戌（即6日戌时），该军直属部队约二千人，沿青弋江西岸在奚家滩下流徒涉，向杨柳铺方向东移；（四）佳午（即9日午时），该军男女政工人员二百，女占三分之二，驳壳枪、步枪各十余支，经马头向东移动……。”

1940年12月9日，教导总队训练处长薛暮桥带领教导队二百名人员离开皖南，薛暮桥回忆与宋裕和汤光恢同行，此为最后一批和平北撤人员。据各种材料显示，新四军非战斗人员约3000人分批撤离了皖南，其中有薛暮

桥、宋裕和等高级干部。

皖南新四军非战斗部队开始侦察北移的时间是11月28日，第二天，也就是11月29日拂晓，刘少奇、陈毅的华指部队开始进攻韩德勤。从这个时间，到蒋介石明确宣布封闭苏南路线的12月10日，历史给皖南新四军北移留下了12天宝贵的时间。在延安毛泽东明确指示快速“分批北移”后，项英利用这样漫长的时间仅仅转移了3000人。

国军围歼部署

皖南地区国军总指挥原本是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因其指挥能力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任命上官云相临时全权负责指挥部署皖南国军围歼新四军军部作战，唐式遵被暂时剥夺指挥权，仅负责派出部队供上官云相调遣。

1940年12月27日，上官云相根据顾祝同的指令，在徽州主持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第五十军军长范子英、第二十五军军长张文清、第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第四十师师长方日英、第七十九师师长段霖茂、第一四六师师长戴传薪、第三十二兵站分监李锡庆、第二十三兵站分监郭叔皋、皖南行署主任戴戟等。第一0八师师长戎纪五因在宁国前线、第一四四师师长唐明昭在南陵前线，未能出席会议。

徽州秘密军事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确定围歼皖南新四军的指挥人选及兵力配置问题。第三战区长官部参谋处长岳星明在会上传达顾祝同的指示：“新四军如果北撤，我们要掩护好；如果南窜，我们务要堵止住。无论如何，皖南必须统一指挥，这次打算由上官副长官负责统一指挥。”

会议在研究使用兵力时，第三战区长官部原计划只使用6个师，但在会议进行中，蒋中正派专机送给顾祝同一封亲笔信，这封信由顾祝同派人送给上官云相和参加开会的各军、师长看过，主要内容是蒋指示顾祝同转上官云

相和有关的军师长注意，在行动中要特别秘密、迅速、彻底地把新四军消灭，不使漏网。顾祝同因而指示上官云相，在部署方面要特别慎重。上官云相于是请求顾祝同准他多使用兵力。这样由上官云相统一指挥的国军，除了原来的四十师、一0八师、五十二师、一四四师、一四五师、新七师6个师外，又增加了从浙东前线调来的七十九师和从浙西调来的六十二师。此时的皖南已屯集了国军8个师计8万余人的强大兵力，且并立着第三十二和二十三两个集团军总部，在对日作战紧张的1940年，如此的兵力部署是极不平常的。

上官云相布置方日英的第四十师进驻三溪，此地位于云岭以东南30公里左右，这样，国军便在新四军军部云岭以南地区布下了口袋阵，只要新四军一违令“南窜”而不是遵令北进，就将处于国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会后，上官云相对部下说：“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顾长官早就打算好了，才调我到皖南来担任这个任务的。我的总部可以说是最现代化的兵团指挥机构，自己没有私人的基本部队，但是指挥哪个部队都能作战，唐式遵他就办不到。”上官云相还召集第四十师、五十二师、七十九师师长密谈，面授机宜。并要求各部队在1940年底作好与新四军作战的各项准备，指示各军、师长要绝对保守机密，绝对不许暴露。

上官云相原来对新四军的编制、装备、兵力、部署等均不了解。1940年12月中旬，派往新四军的联络参谋闻援匆忙回到第三十二集团军总部，偷得新四军兵力部署图稿一纸(旧的)，得悉云岭附近的新四军战斗部队有万余人。据此，上官云相认为：“按日寇作战规律，每季必来‘扫荡’一次，必须抓住这个间歇时期，发迅雷之势一举消灭新四军，战斗时期不能拖长，拖长有变，与国军不利。”

1940年12月29日，以第三十二集团军司令部名义制定的“肃清”皖南新四军的作战计划正式完成。其兵力部署：第二游击第八十八军、忠义救国军、第六十三师、独立三十三旅及苏南地方武力担任原阵地守备，防止苏南新

四军策应皖南新四军作战；第二十五军的五十二师和一0八师，各仅留少数的一部对日寇监视守备，抽出主力进驻南陵、泾县，准备对新四军作战；第五十军的一四四师、一四五师以及新七师之第二旅各留一部仍归该军部指挥，对日寇监视守备，抽出主力由刘雨卿指挥，进驻茂林以西一线，准备对新四军作战；第七十九师开太平；第六十二师开宁国。

1941年1月3日，蒋中正直接致电叶挺，指定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

（一）该军应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沿途已令各军掩护。

（二）所请补给，俟到达指定地点，即行核发。

此即前述第一条路线。此电是蒋中正在国军围歼部署已经完成后签发的。

欧美和台湾文献的记录和叙述

抗战期间从头到尾，毛泽东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组织联合政府，可是私底下却集中力量扩大中共势力。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给国共之间日益累张的关系火上加油。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随后1941年4月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除去了统一战线的学说基础和权宜之利。国共冲突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新四军驻扎的鲁西地区和江苏，局势尤为严峻。 共产党在长江流域的扩张，特别是新四军的行动，也引起了蒋介石控制的国军的报复。在皖南事变爆发前，新四军的指挥官是叶挺。新四军所处的位置是在长江下游，地理位置上很接近抗战爆发前蒋介石的根据地。1940年的秋天，国民党控制的国军和新四军发生严重冲突，国军惨败。蒋介石担心这个事件会导致新四军长久的驻扎在那里，并且形成一个新的反蒋战线。

1940年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彭叶项发出“齐代电”，除了继续“皓电”的论调外，要求迅即遵令将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悉数调往河北。9日，蒋介石亲自下令，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在12月底和明年1月底分别移防到黄河以北，新四军必须在12月以前先开到长江以北。然而新四军和国军在有关行军路线、安全措施以及撤离经费和给养问题方面纠缠，未能迅速达成一致。新四军一直等到1941年1月4日才开始移动。由于国军发现新四军是在向南移动，由此怀疑新四军是要回到之前中共的游击战根据地江西。

经过

皖南事变双方指挥官

国民革命军：顾祝同

新四军：叶挺

顾、叶两人以及负责皖南事变前线作战的上官云相曾同时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学习，叶挺任军长的新四军名义上归顾祝同的第三战区领导。

中共文献的记录和叙述

1月4日—7日

1941年1月4日夜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准备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由于连日阴雨，道路泥泞，加上夜行军，部队行军缓慢。5日，部队行至茂林地区时，军部下令休整一天。顾祝同以新四军“违抗中央移防命令，偷袭围攻国军第40师”为由，将新四军军队包围和攻击。当日下午，叶挺、项英在潘村召开各纵队首长会议，叶挺主张往回打，从南陵、宣城方向冲破国军包围

圈，但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仍坚持由茂林方向进军，最终新四军各部决定在7日正午前会攻星潭地区，跳出包围圈，经苏南北渡。

6日，顾祝同与上官云相率第三战区之第32集团军8万多人，在蒋中正命令下，向新四军发起总攻，并强令“彻底加以肃清”。7日拂晓，双方的大规模冲突展开。当时叶挺、项英收到毛泽东、朱德急电：“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破其包围线有利。”新四军各部决定进攻国军包围圈外围阵地星潭，一纵占领球岭，但在横渡徽河时被阻击，损失惨重；二纵在7日拂晓前占领丕岭，向星潭急进，但在星潭遭遇国军40师120团的抵御，攻势受阻，而国军也有三名营长伤亡；三纵占领高岭，击败国军部队，但仍然被阻。7日14时，新四军军部到达丕岭山脚下的百户坑。15时许，军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行动方案，叶挺提出了沿原路撤回和进攻三溪镇方向的两个方案，但项英对此犹豫不决，召开的紧急会议持续了七个小时。叶挺忍无可忍，气愤地说：“时间就是胜利，不能没有决心，不能犹豫不决。我的态度就是错误的决心，我也服从，请项副军长下决心吧”。21时许，新3团第1营攻进了星潭镇。但因通信工具落后，这个信息未能及时传到军部。22时左右，周子昆提议原路退回里潭仓，出高岭，到太平、黄山伺机东进，获得项英同意。

会议结束后，叶挺亲自到第五团，命令该团“连夜由原路返回，走里潭仓去抢占高岭，遇到敌人就坚决消灭，无论如何要在高岭坚守三天，阻击由太平方向来的敌人，掩护军部和大部队向泾县方向突围。完成任务后，你们可以分散单独行动，在皖南坚持游击战争，尔后待机过江。”

1月8日—14日

8日凌晨，新四军五团攻占高岭，击退国军的进攻。新四军向西南方向行动，又遭阻击。当日午后，由于向导带错路，加之国军79师向高岭进攻，

与新四军处于对峙状态，新四军军部在里潭仓原地宿营。23时，上官云相根据顾祝同19时的指示，下达命令："务于明日正午以前，将匪包围于现地区而聚歼之。"9日凌晨，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感到部队"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企图带小队穿插绕小道而出"，于是带领十余人离队出走。同时，新四军攻占国军高坦阵地，并击退反击。黄昏，叶挺决定部队直接向石井坑地区开进。第一纵队此时阵地失守，部队被分割，分散突围。10日拂晓，前锋部队翻过石井坑北侧山岭，即被伏击，无法继续前进。上午，新四军总部退守石井坑地区，收拢部队约5000人。叶挺决定在石井坑四周控制制高点，构筑工事，休整部队，防守待机。下午，无法突围的项英等人回到军部。同日黄昏，第五团完成"占领高岭并阻击国军三天"的任务后，并未按叶挺指示分散行动，而是向北追上军部并与军部回合，由此导致第五团与军部一同覆灭，团长徐金树和政委林开凤后均被俘，后皆惨死于上饶集中营。晚上，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

11日，国军开始收紧包围圈，双方激烈交火，叶挺亲自到东流山阵地督战。新四军敌工部长林植夫前往国军谈判，被扣。12日，毛要求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中共中央决定皖南全军由叶挺和饶漱石指挥，解除项英指挥权。同时还决定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当日石井坑附近阵地纷纷失守，音乐家任光阵亡，新四军军部完全暴露在国军火力之下。当晚，新四军开始分批突围。军部分两路突围，叶挺、饶漱石带一路，项英、周子昆、袁国平带一路。当时月色皎洁，能见度高，突围新四军暴露在国军火力之下。周恩来在13日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立即撤围。蒋介石表示将下令查处攻击新四军的将领，但同时又命令顾祝同将新四军一网打尽。

13日，叶挺率新四军余部退守承流山高地。双方火线冲突进行了七天七夜，新四军已陷于绝境，叶挺根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致书上官云相，表示愿往上官总部“议和”，14日下午，叶挺下山到国军108师师部谈判时被扣押。同日黄昏，新四军茂林阵地完全被占领。全军约9000人，除约1000人在黄火星、傅秋涛率领下突围外，大部被俘、失踪或阵亡。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于突围时身负重伤，1月15日清晨，为免连累战友而自尽；宣传教育部部长朱镜我阵亡。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组织部长李子芳等被俘。

突围情况

傅秋涛率领的第一纵队老1团300多人突围至泾县、宁国交界一带山区，转战半月余，先后遭国军约4个团围剿，部队再一次分散突围。傅秋涛率领一部分干部于3月初到达溧阳第6师第16旅。此后，第1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江渭清、老1团团长熊应堂先后率领部分指战员亦到达到溧阳。新1团团长张铚秀率领200多人，到达繁昌长江边，于2月底渡过长江到达无为，与新四军江北部队汇合。

第二纵队突围时分左右两路。右路800余人由新3团团长熊梦辉、参谋长张日清、政治处主任阙中一率领，从石井坑西北向章家渡方向突围。左路600余人，由新3团第2营营长巫希权、第1营副营长张玉辉率领，从石井坑西面向茂林方向突围。纵队部随右路突围。右路在突围中，先后遭到第108师、第144师、新7师的多次阻击，损失较大，部队被打散。纵队司令员周桂生阵亡，副司令员冯达飞受伤，后在群众家中养伤时被捕。黄火星、熊梦辉、张日清、阙中一分别率领部分人员突出重围，于1月中下旬先后渡过长江，到达无为。左路以九挺机枪开道，捣毁国军144师师部，1月13日夜就穿过茂林、章家渡，1月25日夜冒雪渡过长江，到达无为，仍有400余人。

第三纵队特务团280人余人，在纵队参谋长黄序周、团长刘别生、团政治委员张闯初等率领下，从高坦突围，转战20多天，分别到达铜陵、繁昌，于2月中下旬渡江北上，到达无为。第5团在防守东流山阵地时伤亡较大，临突围时只剩百余人，突围中又被冲散。纵队司令员张正坤受伤被俘，政治委员胡荣阵亡。团长徐锦树、政治委员林开风被俘。项英、周子昆在事变当中成功脱险，但在3月14日因携有新四军的黄金储备而被副官刘厚总枪杀。其他60多人在军部作战科科长李志高等人的率领下，于4月底渡过长江。

欧美和台湾文献的记录和叙述

1月9日，新四军遭到国军的重击。在重庆，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后者说他不相信这冲突报告，因为他已经之前同意给新四军一条安全通道离开。当新四军逗留在石井时，叶挺通过延安转发信息给蒋介石要求国军停止攻击。之前北伐战争时，叶挺曾经率独立团参加北伐军。当时蒋介石是北伐军司令。然而这个重要的信息并没有在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根据地及时的转发到蒋介石手上。十万火急的信息没及时转发，人为错误的可能性很小。乔纳森·芬比（Jonathan Fenby，《环球时报》称呼他为英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由此推测毛泽东并不想看到叶挺在长江下游建立起另一个不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根据地。这个信息的延误有可能影响了之后的战况。国民党控制的国军对新四军展开了猛烈的炮击和轰炸。叶挺的信息被延安方面延误后终于转发到蒋介石手上，但已经晚了。新四军的伤亡估计在两千到一万人。

后续处理及影响

中共文献的记录和叙述

中共对策

1941年重建后的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左）和代理军长陈毅（右）

事变发生后，1月18日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亲笔题词。在当时局势下，刘少奇建议中央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暂时不实行反攻。1月17日，刘少奇请中央任命陈毅代任新四军军长，在苏北成立军部。18日，他与陈毅联名致电中央，再次提出重建新四军军部。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军长叶挺在新四军事件中与国民政府谈判时被扣），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新的军部在江苏盐城，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组成，并将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全军9万余人，继续在华中活动。其中傅秋涛等人率领的皖南事变突围部队改为新四军第7师，也是7个师中实力最弱的一个，张鼎丞挂名师长但人在延安从未到任；傅秋涛在经过一年多审查后被认为无政治问题遂被任命为该师代师长。抗战胜利后，新四军番号继续被沿用到1947年2月才撤销，原新四军部队主力除第3师（黄克诚部）开赴东北加入东北野战军，第5师（李先念部）改编为中原军区外，其余主力改编为华东野战军，1949年1月改称第三野战军。

共产党方面认为这是严重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认为自己新四军被害人员是殉难的爱国者，事件责任完全在国民党方面。中共中央决定将驻各地办事处逐步撤销，八路军总部摆脱蒋介石的领导，不再向蒋呈报任何文电。中共公布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的方式指出：“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

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道路以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中共甚至开始考虑，准备同国民政府全面破裂：“自蒋十七日宣布新四军为叛逆后，我们是否还能承认国民党为上司？”然而，由于抗日战争还在继续，政治条件尚未成熟，苏联和共产国际也不赞成中共采取激烈的反击措施，再加上2月日军发起豫南会战，又使得中共改变了此前的估计，认为蒋介石的“剿共计划已根本打破”，“内战已可避免”。

国民政府对策

在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对处理新四军有过波动。1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对皖南新四军冲突，实违反我意旨，白等坚欲在此时整个消灭共党，诚不识大体与环境，明知其不可能而强行之，其幼稚言行与十年前毫无进步，可叹。余决令放行，只要其知求饶从命足矣”。但是在新四军被围歼之后，蒋的态度再起变化。

1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俄武官来问新四军冲突之消息用意，因此对此案处置更应严肃坚决”。17日，蒋介石由于顾虑到中共方面的强烈反应，接受何应钦、白崇禧等人意见，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国共关系恶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告称新四军“于四日晚，全部潜赴茂林，分兵左中右三路，向该师（四十师）袭击，该师仓卒被袭，不得不加以抵抗，藉资自卫，第三战区顾司令长官，为整饬纪纲，乃下令制裁。至十二日止，该军已被全部解散，所有拿获该军长叶挺等，现已交军法审讯，该军番号业经明令撤销，此该军违反军令卒被制裁之经过也。”“此次新四军违令叛变，非出偶然，而实本于该军一贯之阴谋”，“顾长官对该军相机处置，全部编遣，实为维持军纪上必要之措施。当此全国抗战，一致团结之际，竟发生此种叛变之事，殊可痛心，中央以军令必须贯彻，纲纪必须维持，而后方能争取抗战之最后胜利，故断然将该军番号取消，并将叛军长官分别交军法审判，严缉治罪。”

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宣传部门指示各级党部说，皖南事变“纯粹为军纪问

题，绝不含政治的或党派斗争的意义”，“各言论机关如有评述，应以新四军为范围予以评述，对中共及十八集团军可勿涉及”。1943年，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以“抗日战争”、“制裁解散新四军”及“肃清江南共军”有功，被中华民国政府颁发青天白日勋章。总指挥上官云相晋任第三战区副司令官长官，仍兼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此事变主要将领叶挺遭逮捕，予以监禁，5年后于1946年释放，叶挺出狱后申请成为中共党员，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时飞机坠毁，同机死亡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及叶的部分家人。有传空难由国民政府策划，但未有证据。新四军共有四千余人被俘。关押俘虏的上饶集中营，由多所监狱、集中营组成。一是关押高级干部的茅家岭监狱，二是关押排以上干部的上饶周田集中营，三是关押士兵的铅山监狱。1942年5月由日军进犯在即，上饶集中营迁往福建省。6月17日，在福建省崇安县赤石村发生集体越狱事件，80余人逃脱，号称赤石暴动。四千余俘虏，死于集中营的有150余人，低于一般战俘营的死亡率。但是大批战俘被国民党分批补入第三战区部队。1945年，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后，最终有二百余人获释后重新回归共产党。但回归的新四军俘虏长期遭到怀疑而不被重用。特别是“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的泛滥，受到中共的怀疑和迫害。直到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才得以改变。

战后总结

当时担任新四军秘书长的李一氓，晚年总结出新四军十一条失败原因：“出动太迟，假如能提早四五天，结果也不会如此之难堪；估计敌人太低，估计自己太高，以为四十师不堪一击；在地形选择上当把自己放在高山上，放在深谷中毫无作用；战斗准备不足，非战斗员太多，行装太多；行军过久，行军力不强，敌人是每天一百里路，我们仅四十里路；使用兵力不恰当，兵力分散，假如全军作一路攻击，不会感到兵力不足与彼此脱节；缺

乏大兵团作战经验，过去三年，战斗都是团为单位，这次六个团一齐打，毫无协同作战可言；因过去子弹多，不注意节省弹药，到后来有枪无弹；参谋长工作差，周子昆只能管后方勤务与教育工作，对作战部署与指导毫无把握；叶指挥大兵团作战之经验与能力差；战时工作全无计划，对连指导员只要求单纯的鼓动工作，缺乏整个战役的组织工作。”

欧美和台湾文献的记录和叙述

民国政府在1月17日决定解散新四军，并拘捕叶挺送交军事法庭，关了五年。中共立即任命了另一位军长并报之以将新四军的规模扩充至七个师。幸存者说有妇女在这次事件中被强奸，受伤的俘虏被打，射杀，甚至活埋。1946年，当叶挺在被释放后坐飞机去延安时，飞机失事，导致他遇难。

皖南事变几乎将新四军全覆，也几乎毁坏了统一战线。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宣布拒绝出席3月1日召开的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1943年3月两党重开谈判，但终因共产党要求获得四个军十二个师的正式编制而归于破裂。由于舆论的强烈反应，不久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表示，军事早已国家化，中共不应将八路军、新四军视为“一党所私有的军队”，一边重申“剿灭”新四军绝非“剿共”，更不忍以后再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因此，他恳切希望中共能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与国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国共双方都未承认统一战线结束，因为保持形势对双方都有利，即使合作已经有名无实。在此后的抗战岁月里，国共冲突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虽然蒋介石一再宣称中共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因而应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 但他却派遣一大部分最精良的部队封锁了西北的共产党地区，其意图是——当对日战争结束后爆发内战即动用这部分部队。共产党方面也不停地扩充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在根据地实施一些意义深远的纲领，为未来的对抗作准备。

各界反应

中共文献的记录和叙述

皖南事变后，外界对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反应以批评居多。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英国政府表示中国“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美国政府正式声明，在国共纠纷未解决之前，美国无法大量援华。1941年2月，美国总统特使劳克林·居里来华会见蒋介石，表达了罗斯福不赞成国民党反共，希望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意见。

欧美和台湾文献的记录和叙述

事发后，周恩来告诉记者白修德他相信蒋介石没有下攻击新四军的命令，但当地的将领们相信蒋介石不会介意他们对新四军展开攻击。白修德是个美国记者，他1946年的书《中国的惊雷》表现出对国民政府的失望和对共产党的期望。白修德问周恩来是不是认为蒋介石在撒谎。周恩来说不是。有人对蒋介石撒谎，但蒋介石也一定程度的说了些谎话。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告诉毛泽东说：他认为中共“降低对中国的外来占领者之斗争的政策，以及明显悖离了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犯了“政治错误”。

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1月25日面见蒋介石，指出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发动内战“将意味着灭亡”。

蒋介石说，皖南事变是“打击敌人妄冀我军纪败坏，内部分裂，以减弱抗战力量的妄想。”“申明军队的纪律，使全军得所观感而振奋自爱，为国效命，因而加强我们团结抗战的精神”。

重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的社论在事件发生后说：“只要中共不脱离抗战

阵线，事件不致扩大，而剿共事实亦不至发生”。

双方部队

攻方：国民革命军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副司令长官唐式遵、参谋长邹文华、参谋处处长岳星明

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副总司令郭勋祺、参谋长徐志勖、政治部主任刘汉、参谋处处长武之棻

第二游击区：总指挥冷欣、参谋长徐笙、政治部主任沈铁汉

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

第63师：师长冷欣、参谋长伍开云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范绍曾、副军长罗君彤、政治部主任张一青

挺进二纵队：司令顾心恒、副司令胡炎、参谋长厉百川、政治部主任顾融君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7师：师长田钟毅、政治部主任莫御

第一旅：旅长刘克用

苏保安第一纵队：司令单栋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张文清、副军长唐云山、参谋长韩谊民、政治部主任张麦秋

第40师：师长方日英、副师长陈士章、参谋长朱宇平、政治部主任严毅

第52师：师长刘秉哲、参谋长黄家桢、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张乃鑫

第108师：师长戎纪五、副师长顾宏杨、参谋长史耀东、政治部主任李亭林

第23集团军副总司令指挥所（国民革命军第五十军）：副总司令刘雨卿、代参谋长卢荣光

第144师：师长唐明昭

第145师：师长孟浩然

新7师第2旅：旅长孟存仁

二线部队

第79师：师长段霖茂

第62师：师长陶柳

第32分监部

第23分监部

守方：新四军

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副书记曾山、饶漱石

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秘书长李一氓、参谋处处长张元寿

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傅秋涛，副司令员赵凌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江渭清，参谋长赵希仲，副参谋长吴咏湘。

第一团：团长熊应堂，政治委员肖辉锡、参谋长王怀生。

新一团：团长张铚秀，政治委员丁麟章、参谋长徐赞辉。

第二纵队：司令员周桂生，政治委员黄火星，副司令员冯达飞，参谋长谢忠良，政治部主任钟德胜。

第三团：团长周桂生(兼)，政治委员黄火星(兼)。

新三团：团长熊梦辉，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阙中一、参谋长张日清。

第三纵队：司令员张正坤，政治委员胡荣，参谋长黄序周，政治部主任吴奚如。

第五团：团长徐锦树，政治委员林开凤、参谋长梁金华、政治处代主任何志远。

特务团：团长刘别生，政治委员张闯初。

教导总队：总队长周子昆(兼)，政治部主任余立金。

事变涉及重要人物及其行动、电文

国民政府方面

蒋中正

1940年12月7日，在多日拖延后，蒋方才批准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副总长白崇禧11月14日即以军令部名义拟呈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但仍于9日命令何、白“暂缓下令”，“待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

12月10日，军令部长徐世昌以“现已届十二月中旬，如迟不下达，恐各部队准备不及”为由，再呈前文，促蒋照准。在徐、白的连番催促下，蒋只得照准。

12月25日，蒋拒绝批准《华北作战计划》和胡宗南所上报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表示即便八路军未遵令北撤，也应当“一面发动全国舆论制裁，一面

以军事压迫，促其就范”。

12月25日，蒋召见周恩来，以“极感遗憾的神情”告诉周，“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的事情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我也不愿意内战，不愿意自相残杀，问题是如果新四军非留在江南，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定失败。”

1941年1月5日，新四军违令秘密南下之后一天，未知情况的蒋中正仍电示顾祝同：

“叶、项部在铜陵、繁昌之间渡江后，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而后沿巢县、定远、涡河移动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沿途已令各军保护。”

1月9日，蒋于《困勉记》里写道，“白坚欲在此时消灭共党军队，此诚不识大体与环境之谈。明知其不可能而必强行之。”1月12日写道“对皖南新四军，余只求其遵命渡江。”“只要其求饶而能从命，则尽可放其北移。”

1月15日，除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和政治部部长张治中以外，全体高级将领同意白崇禧“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番号，叶挺交军法(审判)”的主张，但蒋仍然要求“再考虑一夜”。

1月16日，蒋勉强同意白之主张，但日记中写道“此虽违反我意，但事既如此，则应撤销其番号，将叶项交军法会审，彻底解决，以立威信，而振纲纪。”

1945年11月7日，张治中呈蒋电文提及：“三十年（1941年）春间解决新四军事件时，以职判断，觉钧座对当时之措施实未必赞同，事实上等于事后之追认。”

顾祝同

1940年12月27日，在叶挺、项英向顾祝同说明经费、弹药、冬服存在极大困难，要求展期到1941年1月8日出动的要求，特别是北渡长江必须“划定皖北庐江县为职部临时集结地”，“并请指定庐江六安以北路线，庶可以防止与皖北友军无谓之误会与冲突”之提议，顾当即表示可以商量。

12月28日，顾向蒋中正发报，拟除日期不得展延外，其余经费、粮弹、被服等一应照准，对新四军军部北渡提供尽可能的便利：

关于开拔时间仍应遵照本部宥辰扫召电指示，一面陆续开拔，务须依限于本年十二月底北开完毕。

关于该十月份、十一月份欠发经费及冬服代金，准如数发给，至于开拔费及恤金转请核发。

关于交通路线，准增改为二线，一为泾县杨柳镇、孙家铺、姚村、小节渡、寿城镇、梅渚镇、南渡镇、竹篑桥道；一为南陵、宣城、毕桥镇、飞鲤桥、郎溪、安兴、上沛埠道。

关于友军位置，查皖南苏南各部队位置乃系依据敌情及我军任务所定部署，并已命令驻军及皖南江南二行署，予以协助，该军移动时，当能切实协助。

关于行军序列及渡江部署，该军北移应在指定路线以一团或一营为单位，逐次跃进，乘敌不意，迅速渡江，不宜以过长之梯队行进，尤不宜以大部队在临时集结地区之所通过，致被敌发觉，而误期限，至于渡江应以秘密潜渡为原则，不得已时则以绵密之部署，施行强渡。

关于补充，弹药一项应俟该军江南部队北渡半数后，准即查案补充，由该军后渡部队携带过江。

上六项除饬即并本部宥辰扫召电切实遵办具报外，另发该军开拔费各五万元，俾令迅速开拔。谨电鉴核备案

在12月30日叶挺还在要求展期北移时，顾祝同深知蒋12月10日电给予最后期限是12月31日，但并未在期限已过时立即下令进攻，反而仍在1月3日代新四军向蒋求情，电文称：

深查叶挺对于北调命令，已有决心奉行。此次与之磋谈亦颇具诚意，一再嘱职请求钧座，谅其苦衷，使得江南部队顺利北调。

1月5日，在收到叶挺于2日发出的请求“先派一团于虞（七）日经前第三战区指定路线北渡，余部待机北渡”电文后，顾表示同意，并于5日再次发电给蒋中正，继续为新四军求情，唯此时新四军早已于一天前秘密南下：

为贯彻前令，防止其以主力由苏南北渡，增援苏北起见，除复饬仍以主力就原地北渡外，似可允其先派一团走苏南并补给临时经费及弹药。

1月6日，在收到四十师一一九团与南下新四军交火之汇报后，顾祝同当即下令上官云相：

叶挺、项英不遵命令以主力由皖南渡江就指定位置，乃擅率驻皖南所部于支(4)日晚开始移动，企图窜据苏南，勾结敌伪，挟制中央，似此违背命令，自由行动，破坏抗战阵线，殊堪痛恨。为整饬纲纪，贯彻军令，对该军擅自行动部队决予进剿，仰贵总司令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务期于原京赣铁路以西地区彻底加以肃清，并严督党政方面配合军事积极工作，俾绝根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A%97%E6%97%A5%E6%88%B0%E7%88%A

D%E6%99%82%E6%9C%9F%E5%9C%8B%E5%85%B1%E6%88%B0%E5%BD%B9%E5%88%97%E8%A1%A8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战役列表 列出了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国民党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及中国共产党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及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之间的军事冲突。

战役列表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期间，中共根据地不断扩大，加强国共两党的互相猜忌，国共之间的冲突间接不断。共军以“国民党顽固派”之名义打压国军势力。

战役　国共双方部队及主要将领　结果

严家桥战斗

1939年6月3日　　国：忠义救国军第10支队周振刚；共：江南抗日义勇军第2路(即新四军第1支队第6团) 国军两个直属大队被歼，共军胜利

马镇战斗

1939年9月8日　　国：忠义救国军；共：江南抗日义勇军吴焜　　共军向西北转移，至江阴县马镇附近与国军开战，国军胜利

冀中平原战役

1938年　　　国：国军河北民军张荫梧；共：八路军　共军得胜；国军被歼

河北陈庄战斗

1939年　　　国：国军东北挺进军赵侗；共：八路军，具体部队有多种说法　　赵侗部队在陈庄附近被全歼；共军胜利

十里铺之役

1939年11月10日　　国：国民革命军第29师(79团第3营)许光耀；共：新四军(共军一营和民兵)李先念　　　国军险胜，国军击退共军

晋西事变

1939年11月28日　　国：国民革命军阎锡山；共：八路军　　阎锡山军队受损甚重，从此失去对晋西北与东南的控制权，中共正式成立晋绥和晋冀鲁豫两块根据地。

磁县之役

1940年2月10日～14日　　国：国民革命军第97军(560团)朱怀冰；共：八路军124师、115师吕正操　、贺龙、林彪、刘伯承；新五军孙殿英　牧牛地560团被攻破、第97军被迫退守林县，后得假消息移军遭共军埋伏，最终

全军覆没

张垣之役

1940年2月　　国：国民革命军第69军石友三；共：八路军　　共军得胜；国军撤至曹县

磁武涉林战役

1940年3月　　国：国民革命军第97军(560团)朱怀冰；共：八路军124师、115师吕正操 、贺龙、林彪、刘伯承；新五军孙殿英　共军胜利

太行山战役

1940年3月　　国：国民革命军第97军、新五军朱怀冰、孙殿英、鹿钟麟；共：八路军刘伯承　国军第97军 新五军被击溃几近全军覆没；共军胜利

定远战斗

1940年3月　　国：国民革命军第21集团军第138师及第10、第12纵队韩德勤；共：新四军第4、第5支队与苏皖支队　　　共军取得了高塘铺、松树刘等战斗的胜利，攻克了定远县城，共军胜利

半塔集战役

1940年3月～29日　　国：国民革命军第21集团军第176师及地方军（第117师两个团、独立第6旅、盱眙县常备旅、六合县常备团等部）；共：新四军第4、第5支队与苏皖支队（ 另有部分营连、教导大队等）　　新四军分四路大举攻击，王店集、莲塘等地与国军激战，将其击溃，并跟踪追击至南三河畔，共军胜利

古城集战斗

1940年6月～17日～ 国：国民革命军第21集团军第138师和第10游击纵队等部；共：新四军第4、第5支队　　共军集中部队歼灭国军，共军胜利

黄桥战役

1940年10月4日～7日　　　国：国民革命军第89军等韩德勤、李明扬；共：新四军粟裕 、陈毅　　共军胜利，占领阜宁、东台，随后自主撤退，日军接手占领黄桥

曹甸战役

1940年11月29日至12月16日　　　国：国民革命军韩德勤；共：新四军（10个团）、八路军刘少奇 、陈毅、黄克诚等 韩德勤守住曹甸，新四军打通皖东

皖南事变

1941年1月4日—1月14日　国：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部队顾祝同、上官云相、黄百韬；共：新四军叶挺 、项英　国军胜利

涡蒙战役

1941年2月8日—2月11日　国：国民革命军第21师（228屠台部队）63团、62团、61团、21营；共：新四军　国军皆胜，收复涡蒙一带

山子头战役

1943年　国：国民革命军；共：新四军　共军胜利；韩德勤与其部队被俘

八里湾之役

1943年6月16日　国：国民革命军暂编51师史宏熹；共：新四军李先念　共军胜利；国军全军覆没

扫荡豫湘桂战役时期国军留守部队战役

1944年7月-1945年　国：国民革命军杂牌部队王传授、苏北挺进军第二十八纵队李光明等；共：八路军、新四军彭雪枫　国军大部分被歼灭、缴械；共军占据河南一带，共军胜利

豫南战役

1944年7月-1945年4月　　国：国民革命军；共：新四军　　国军败退，共军胜利

天目山战役

1945年2月12日-6月26日　　国：国民革命军；共：新四军　　国军全军覆没，共军胜利

孝丰之役

1945年6月25日-26日　　国：国民革命军第52师刘秉哲；共：新四军　　共军胜利；国军被分割包围，终至国军全军覆没

==

1937年、1938年、1939年中国和1940年中国

https://zh.wikipedia.org/zh/1937%E5%B9%B4%E4%B8%AD%E5%9B%BD

1937年中国

纪年： 丁丑年（牛年）、中华民国26年

大事记

1月

1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同胞、同志书称，经过西安事变，“实足以证明吾国家之统一基础，确已稳固；全民族之集体力量，确已形成；吾全国同胞对于国事之关怀及对于本党领袖之拥护，亦已为世界所共认”；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发出指示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红军及地方部队应停止向中央军及马鸿逵军之进攻，并请国军亦勿再有攻击行动；毛泽东、周恩来电潘汉年称，速与陈立夫接洽，中共愿与宋子文、孙科、冯玉祥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并告知红军已集结训练，静待划定防地，准备抗日，绝无扰乱中央军及侵入国统区之企图。

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分析张学良被扣留后之形势，决定主要方针是力求和平；毛泽东称，现在“仍是打击右派，争取中派”；张闻天阐明中共在目前主要方针“是巩固内部与动员援助西安，反对内战”。

1月4日——国民政府命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1月5日——国民政府：令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甘肃省政府主席兼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应即一并撤职，仍留原任；令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着即裁撤；特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令免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本职；令驻甘绥靖公署着即裁撤；特派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令准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辞职；任命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

1月6日——毛泽东、张闻天联名电周恩来、秦邦宪称，"（甲）目前中心在坚决备战，拒顾（顾祝同）迎张（张学良）。（乙）顾来则张、杨（杨虎城）两部全被宰割，红军将被迫登山"。

1月7日——国民政府公布《提存法》；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左权等率红军2万余人抵达三原、泾阳、富平一带。

1月8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诉愿法》及《行政诉愿法》；行政院电令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速就职，主持陕西省政。

1月9日——蒋介石电复杨虎城，并抄致顾祝同、刘峙二人，强调和平解决军事、政治善后；蒋由杭州至上海。

1月11日——宋美龄电杨虎城称，"中央非由一人负责"，要杨虎城接受蒋要求，使蒋有说话余地，才能"徐图补救，一切主张方能实现，汉卿前途更不成问题"。

1月12日——中国国民党中政会主席汪精卫回国，抵香港发表谈话称："西安事变善后，杨虎城自应听命中央。"

1月13日——张学良致函杨虎城、于学忠等，称"请兄速下最大决心，使委座及弟易收束陕、甘之局"。中共中央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保安动身迁

到延安，同日，中共中央机关自保安（今志丹县）迁延安。

1月14日——汪精卫乘德轮抵上海。

1月15日——冀察绥靖公署重新配置河北省防务，平汉铁路及其沿线由第五十三军担任；平汉铁路以东由第二十九军担任。

1月16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法》。

1月18日——德穆楚克栋鲁普自称“蒙古政治委员会主席”，令各旗限期壮丁入伍。

1月19日——湖南大学改为国立，教育部任命皮宗石为校长。

1月2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并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兼任教育委员会主席与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刘任承任副校长。

1月22日——蒋介石电杨虎城，要其直接与顾祝同商量善后问题。

1月24日——汪精卫与蒋介石在溪口商谈外交与内政方针，议定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于2月15日如期举行。

1月27日——中国国民党候补中央监察委员、第十四军军长陈嘉祐在香港逝世。

1月28日——菲律宾总统奎松抵达上海，次日离去。

1月29日——杨虎城所部开始向渭北三原一带转移。

2月

全国对外贸易是月份入超30余万，美国居首，次为日本。

2月1日——张学良函劝所部遵照中央命令撤防。

2月2日——蒋介石等由溪口至杭州。

2月3日——中国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准蒋介石续假两星期。

2月4日——中央军入驻渭南，推进至临潼，张、杨部队陆续后撤。

2月5日——东北军撤出西安。

2月6日——周恩来等中共人员退出张学良公馆，搬进七贤庄红军招待所，留机要科长童小鹏主持红军联络处。

2月7日——邓宝珊自西安飞抵南京，报告陕西、甘肃状况与善后办法，陕局得以圆满解决。

2月8日——国民政府令：撤销河北、山东、河南三省河务局，另设黄河水利委员会驻各省黄河修防处。

2月9日——蒋介石由杭州至上海。

2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决定，五届三中全会本月15日举行。

2月11日——蒋介石在上海会见杜月笙、张啸林等。

2月13日——宋希濂就任西安警备司令。

2月14日——蒋介石由上海返抵南京，出席五届三中全会。

2月15日——西安行营令于学忠代理甘肃绥靖主任。

2月17日——国民政府令准蒋介石所请，张学良着予恢复公权。

2月18日——蒋介石呈请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辞去本兼各职；全会决议：一、陕变张学良所提八项主张，不予置理；二、恳切慰留蒋介石。

2月19日——何柱国飞返西安，向东北军传达张学良意见。

2月27日——李济深决定出洋考察，李宗仁电中国国民党中央请发给护照。

3月

3月1日——日华贸易协会日本理事会在东京集会，出席会议者有会长儿玉谦次等人。

3月2日——孙蔚如等回西安。

3月4日——蒋介石以禁烟总会总监名义通电全国，要求切实推行禁政，务期如限肃清烟毒。

3月5日——行政院兼院长蒋介石面促铁道部长张嘉璈从速进行铁路五年计划。

3月11日——蒋介石电令孙蔚如、顾祝同等妥筹陕西灾情急赈办法。

3月14日——蒋介石返抵南京。

3月19日——中央军开入兰州。

3月20日——广东省政府主席黄慕松病逝，3月27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4月12日追赠为陆军上将。

3月21日——禁烟总监蒋介石委派14省、市禁烟特派员。

3月23日——蒋介石至杭州。

3月25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准蒋介石辞国民政府委员职，以章嘉呼图克图为国民政府委员。

3月29日——杨虎城、于学忠至杭州谒见蒋介石请示军政要务；次日蒋介石

单独召见杨虎城，劝其往欧美参观。

3月30日——行政院任命朱绍良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冯治安、邓哲熙、章士钊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准冀察政务委员李廷玉、王克敏、冷家骥辞职。

3月31日——蒋介石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向欧美等国商洽借款及购买军火，以备抗日之用；孔祥熙赴欧之行，即负有此项任务。

4月

东北抗日联军李延禄、周保中部联合作战，进攻林佳线和林密线总车站林口，焚毁该地；有三条路线交通历时半月不得通车。

4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准蒋介石续假两月，由外交部长王宠惠代理行政院长。

4月2日——杨虎城自上海返抵西安。

4月6日——中央陆军军官教育长张治中辞职照准，校长蒋介石派陈继承接任。

4月8日——德政府以红十字“明星”勋章授予何应钦，称其对促进德中邦交有重要贡献。

4月9日——国民政府特派顾维钧为出席国际联盟特别大会代表。

4月10日——国民政府特派胡士泽为出席国际联合会第二十二届禁烟会议代表。

4月12日——第一军胡宗南部由陕西调往徐州，负责徐州、蚌埠一带治安。

4月15日——财政部中央造币厂厂长陈行辞职，席德炳继任。

4月20日——蒋介石由杭州至上海就医、疗养。

4月21日——中国农民银行总行由汉口迁至上海。

4月27日——蒋介石在上海接见绥境蒙政委员会委员长沙王（沙克都尔札布）等一行。

4月30日——蒋介石由上海抵杭州；并电参谋总长程潜，设计青岛及济南国防工事。

5月[编辑]

5月1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电令撤销西安绥靖公署及第十七军番号；军事委员会任命徐海警备司令黄杰兼任陇海东段警备司令，第一军军长胡宗南兼津浦南段警备司令。

5月4日——军事委员会任命上官云相为豫鄂陕边区绥靖公署主任。

5月6日——蒋介石由杭州至上海。

5月7日——国民政府明令裁撤西安绥靖公署。

5月9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巡视广东军政。

5月10日——郑州警备司令曾万锺就职；江苏绥靖公署主任于学忠通电就职，6月13日抵淮阴上任。

5月12日——于学忠部第五十一军自安徽移防江苏。

5月13日——蒋介石电周至柔指示防空设备计划；另电商震查询黄河船舶及河南公路修筑情形。

5月14日——蒋介石指示陈诚筹备庐山暑期训练事宜。

5月16日——东北军东调后，改编淘汰三分之一。

5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德国人法肯豪森为该会军事总顾问；蒋介石健康恢复，自上海返南京。

5月18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凡八章一四七条。

5月20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香港巨富何东爵士。

5月23日——蒋介石以“中央人员在川气焰万丈，令人难堪，（有）种种不法行为”，电告重庆行营代主任贺国光，中央在川人员人员约束行为，不得生事犯法。

5月24日——蒋介石抵九江。

5月25日——孔祥熙离开英国赴日内瓦。

5月26日——孔祥熙特使抵日内瓦参加国际联盟年会闭幕式。

5月27日——蒋介石至庐山指示今年暑期训练团筹备工作；国民政府令：刘尚清兼安徽省保安司令。

5月28日——杨虎城以腿伤未愈留上海，并欲晋见蒋介石；蒋电宋子文，请杨虎城不必谒见，促其早日出国。

5月29日——孔祥熙等由日内瓦抵罗马。

5月31日——东北抗日联军200余人，攻袭长城北大川湖镇，与日伪军激战，至6月1日晨开始撤退。

6月

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重行分配：本年春，日本在上海之兵力3,500余人；5月初，调往华北、华南两地约800人；至6月初，只有2,600-2,700人；6月

15日以后陆续增加；至7月15日，在上海之日军陆战队兵力约3,100-3,200人。

6月1日——国民政府授予蒋介石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蓝色大绥采玉勋章。

6月2日——贵州省政府代主席薛岳宣誓就职；王树常任豫皖绥靖公署副主任。

6月3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以中国国民党党歌为中华民国国歌。

6月8日——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长永津佐比重报告中国形势时称："蒋介石领导之新生活运动，已转变为国家军事总动员运动。"

6月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陕西临潼骊山蒋介石躲藏处建"蒙难亭"。

6月11日——陈诚赴庐山谒见蒋介石。

6月14日——孔祥熙离开欧洲赴美国。

6月16日——军事委员会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

6月17日——蒋介石邀请全国各大学著名教授及各界社会名流在庐山举行谈话会，互相交换政治、经济、教育及地方情形之意见。

6月20日——湖北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至庐山，任庐山训练团总队长。

6月21日——孔祥熙由欧洲抵美国访问，是日抵美国纽约。

6月22日——蒋介石兼任庐山暑期训练团团长，陈诚为教育长。

6月25日——孔祥熙与纽约银行讨论中国金融问题，成立初步协定；美国耶鲁大学授予孔祥熙法学博士学位。

6月28日——行政院长蒋介石电国民政府财政部与国民政府实业部，要求民生有关日用品制定最高与最低标准价格，以防止投机操纵，破坏市场。

6月29日——甘肃绥靖公署裁撤。

7月

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

7月10日——蒋介石密电各行营、绥靖公署及各省、市称，中、日双方据报已撤兵，“但日人诡诈，用意莫测，我全国各地方、各部队仍应切实准备，勿稍疏懈，以防万一”。

7月16日——蒋在庐山对学术界领袖明白宣示全民抗战之决心。

7月20日——蒋介石自庐山返抵南京。

7月26日——日军3,000余人自唐山、榆关等地开赴天津，当晚在天津日租界演习巷战，全市异常紧张。

7月27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蔑国军对日军攻击廊坊和广安门之自卫，并声称要消除华军反抗之根源。

7月28日——日军发动总攻击，国军处处被动，牺牲惨重，同日攻陷南苑，国军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力战殉职。

7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特别会议，商讨政府应变方针，并宣布庐山谈话会提出解决芦沟桥事变四点立场“绝无可变更”，表示将“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而牺牲到底”。

7月30日——蒋介石电令驻守平地泉第三十三军军长汤恩伯及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迅速向张家口挺进，置有力部队于平绥铁路，以威胁日军侧背。国军撤守天津。

7月31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在上海组成银行联合办事处，蒋介石兼理事会主席，宋子文为副主席。

8月

蒋介石鉴于敌军装备优良，国军不利阵地作战，乃拟定一长期作战方略，利用广大之空间土地，求得时间上持久之胜利，不重一城一地之得失，而以积小胜成全大局，同时发展敌后武力，使敌军活动仅限于点线，首尾不能兼顾。

8月1日——蒋介石令傅作义、汤恩伯、刘汝明部署平绥线防务：绥远省政府主席传作义兼第七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任前敌总指挥，率部自绥远、山西增援察哈尔，固守南口；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为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守备察哈尔。

8月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午后举行重要会议，讨论对日绝交问题，对时局作出重要决定。

8月4日——国军放弃北平。

8月6日——军事委员会令：宋哲元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负责平汉铁路北段作战；冯玉祥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淞沪战场作战；刘峙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分途返攻天津；蒋介石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8月7日——汤恩伯第十三军于是晨全部到达南口地区，并进入阵地。

8月9日——下午5时，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与士兵斋藤要藏驾驶军，肆意闯入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内，为中国守卫机场之保安队开枪击毙，是为“虹桥机场事件”；晚上10时，上海市长俞鸿钧至日本总领事馆交涉，表示对事件殊深遗憾，盼日方力持镇静，尽力勿使扩大，循外交途径以谋圆满解决，日方同意交由外交途径解决。南口方面战事渐趋激烈，日

军炮兵轰击，第十三军抵抗。

8月10日——日军5,000余人在飞机、重炮和坦克掩护下，强攻南口阵地，占领南口车站，国军第八十九师退守南口镇。

8月1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次会议议决，推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蒋介石下令分配上海国军战斗序列，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防卫上海西部右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防卫上海东部左翼。国民政府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

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晚，军事委员会决定向上海日军发动总攻击，令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明拂晓攻击”，“令空军明日出动轰炸，令海军封锁江阴”；日军突破南口，国军退守居庸关两侧高地。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抗暴自卫声明书》，宣布“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际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中国以维护其领土主领土主权及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张治中就任京沪警备司令，并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事至今日，和平确已完全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不达保我完整领土主权之目的，抗战誓不休止”；国防最高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对日抗战不采宣战绝交方式，政府仍在首都南京，不迁都，指派张群为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中华民国空军出动轰黄埔江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及其军事据点。

8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决，由国民政府授权蒋介石为陆、海、空三军大元帅，统帅全国陆海空三军对日作战，蒋介石以中日尚未宣战，不宜组织大本营，只扩充军事委员会编制，设第一至第六6个部及国家总员会设计委员会、后方勤务部、卫生勤务部等，另有管理部；国民政府下达国家总动员令，宣布：“为求我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对于侵犯我主权领土与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敌国倭寇，决以武力解决之。”。

8月17日——晨，国军第九集团军在上海发动总攻；立法院通过《总动员法》。

8月18日——蒋介石接见是日由庐山至南京之陈诚并嘱以三事：一、赴华北向晋、陕将领说明“中央决心与应战的准备”；二、赴上海视察张治中部作战，并协助之；三、速厘定战斗序列。

8月19日——军事委员会派陈诚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并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蒋介石嘱咐驻苏联大使蒋廷黻介绍沈德燮与苏联政府洽购飞机。

8月20日——蒋介石颁发大本营第一号训令《战争指导方案》，正式确定“以持久战为基本主旨”，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形势，争取最后胜利；军事委员会颁布全军战斗序列：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空军总司令蒋介石，参谋总长程潜，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第一预备军司令长官李宗仁，第二预备军司令长官刘湘，第三预备军司令长官龙云，第四预备军司令长官何成濬，海军总司令陈绍宽。

8月22日——军事委员会颁发委任状，委任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辖第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师3个师。另以林祖涵、张国焘分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副主席。

8月23日——淞沪战场国军改取守势，中央作战军总指挥张治中，左翼（江防）作战军总指挥陈诚，右翼（浦东）作战军总指挥张发奎，同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

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公布“救国十大纲领”。

8月26日——国军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于凌晨1时30分下令南口守军各部突围，向桑干河南岸撤退，南口战役结束。

9月

9月2日——国民政府任黄绍竑、黄旭初、陈仪、熊式辉为陆军中将，并特加陆军上将衔。

9月4日——国防会议开会，蒋方震详细谈德国与苏联情况。

9月5日——蒋介石派北京大学教授胡适赴美国，派军事学家蒋方震赴德国、意大利，表达中国抗日决心。

9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军事委员会设置军法执行总监部，命令各军恪守军律，"自兹通令以后，无论文、武各级官佐，倘有未奉命令放弃土地，擅离职守，或奉令出发，托故延迟者，概以军律处以死刑，不稍宽假"；国共两党达成协议，中共陕甘宁根据地之苏维埃政府更名陕甘宁边区政府，辖陕西、甘肃、宁夏三省23县，边区政府设延安，林伯渠任边区政府主席。

9月8日——台湾革命党宣告与中国一起努力抗战。

9月9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中央政府委员会与中央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议决在最高国防会议下，设国防参议会，蒋介石任主席，汪精卫任副主席，张群任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呈请辞职，魏道明继任行政院秘书长。

9月11日——军事委员会按各战区战斗序列，改第八路军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集团军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由叶剑英负责在南京组织办事处；军事委员会以第一战区所辖津浦铁路、平汉铁路部队过于庞杂，指挥困难，特划津浦铁路北段为第六战区，任冯玉祥为司令长官，鹿锺麟为副司令长官，指挥第一集团军、骑兵第三军及第六十七军等部队。

9月12日——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成立，军法执行总监唐生智，副总监谷正伦、王懋功。

9月13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通令各战区全体将士，沉着应战，抗战到底，摧毁日本侵华野心，以壮烈牺牲达成复兴民族之使命。

9月14日——陈诚以杨行于本月11日失守，向蒋介石建议“转移阵地，逐次抵抗”，但蒋介石下令“死守刘行”，为要取得国际认识中国抗战与同情；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报告已向苏联购买飞机225架，坦克车82辆及其他武器。

9月15日——国军失守上海罗店，军事委员会调黄杰第八军所属税警总团，自海州径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

9月18日——陆军中将刘文辉、杨森特加陆军上将衔。

9月20日——蒋介石电嘱杨杰等再向苏联增购驱逐机150架、重轰炸机30架，杨杰覆电16架驱逐机已运送回国。

9月21日——蒋介石电冯玉祥、顾祝同、张治中、陈诚、张发奎等，调整第三战区军队部署：“（一）司令长官由本委员长兼，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二）左翼军司令陈诚，右翼军司令张发奎。（三）左翼军以第九集团军、第十九集团军、第十五集团军组成之。（四）右翼军以第八集团军、第十集团军组成之。（五）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副总司令黄琪翔。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薛岳，副总司令吴奇伟。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诚兼，副总司令罗卓英。（六）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

9月22日——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7月提交中国国民党方面之《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向全国宣告：（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与现在中国占领导地位的国民党推诚相与，共同为对外抗战对内民主与民生幸福而努力，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取现有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以期全国

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中央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国民政府命令：军事委员会禁烟总会改隶行政院，仍由蒋介石任禁烟总监。

10月

10月1日——军事委员会在广州设立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对外称兴运公司，主办国际运输，11月12日改称西南运输公司，曾养甫兼任处长。

10月3日——忻口战役开始。

10月4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严令前线官兵禁饮生凉之水，以防霍乱与疾病；军事委员会任命孙连仲代刘峙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10月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汤恩伯为第二十军团军团长，指挥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并改隶于第一战区。

10月12日——军事委员会收编江南成立新四军，人数约1万人余，以叶挺、项英为正副军长，规定在皖南地区作战。

10月15日——军事委员会任第二预备军司令长官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国民政府令：陆军中将杨杰特加上将衔。

10月16日——日军攻陷包头。

10月19日——蒋介石命军事委员会第一部决定，第六战区归并于第一战区，仍以程潜代战区司令长官，鹿锺麟为副司令长官，冯玉祥回南京。

10月22日——陆军中将刘兴特加陆军上将衔。

10月26日——第八十八师孙元良部第五二四团谢晋元中校团附与该团第一营营长杨瑞符，率兵一营800人守大陆、盐业、中南、金城四行仓库。日军

攻陷金门。

10月28日——日军大举向第八十八师第五二四团孤守之四行仓库进攻，国军八百壮士毙日军80余名；下午6时30分，第五二四团团附谢晋元宣布："誓与敌拼死一周，永无遗憾。"；上海各界市民慰问并输送食品，女童子军杨惠敏受"八百壮士"精神感召，冒险送国旗于四行仓库，国军高悬四行仓库楼顶，中外人士沿苏州河围观，目睹此莫不感奋。

10月29日——第八十八师长孙元良致书闸北四行仓库守军称："余奉命经营闸北国防轴心，保我疆土，诸同志奋勇却敌，固守二月有半，倭敌终未能越雷池一步，所以保国，幸不后人。近以一发之动，全线西移，本军亦奉命转移阵地，而以最后守卫闸北之责，付托我忠勇之诸将士。诸同志能服从命令，死守据点，誓与闸北共存亡。此种坚毅不拔、临危受命精神，余与全军将士同致无上之敬意……（诸同志）不吝牺牲，早抱成仁之决心。上役杀敌致困，实开震天动地之史页。诸同志固守闸北已三日矣，敌之畏葸与我之勇敢，已为举世所共见，沪上中外人士交口钦佩，民众奔走援助，咸负如可赎也，人百其身之愿。此诚我中华民族之光荣，我中华民国之光荣，亦我国民革命军之光荣。"

10月30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张发奎代朱绍良为淞沪战场中央作战军总司令，刘建绪继任右翼作战军总司令；国军在新泾镇以南阻击日军，四行仓库守军已成孤军，退入公共租界，全部苏州河北岸阵地弃守，日军续向苏州河南岸攻击。

10月31日——蒋介石采纳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及军事委员会作战组长刘斐之建议，下令淞沪前线国军各部队向吴福线（吴江至福山）和锡澄线（无锡至江阴）既设阵；蒋介石嘉奖坚守闸北之第五二四团官兵，通令将该团官兵晋升一级，并呈请政府给与荣誉奖章，命令其放弃闸北最后阵地，撤离四行仓库，进入公共租界。

11月

11月3日——太原会战开始。

11月5日——日军攻陷阳曲，逼攻太原。

11月8日——淞沪战场国军腹背受离，放弃上海阵地，向苏州转进；太原巷战激烈。毛泽东电告八路军各将领，太原失守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吕梁山是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中共中央举行会议，讨论特区的选举与财政，毛泽东不主张实行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权分立制。

11月9日——日军攻陷太原，太原会战结束；松江失陷，国军淞沪阵地侧面受重大威胁，实行全线撤退。

11月11日——蒋介石会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决定迁都重庆。

11月12日——日军攻陷上海。

11月13日——军事委员会委任第三军团长兼第四十八军军长庞炳勋为徐海警备司令，第一六七师师薛蔚英为副司令。

11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决议迁都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当晚乘舰西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会议决：国防最高会议代行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职权。

11月17日——国民政府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另有任用，免去本职；驻闽绥靖主任蒋鼎文另有任用，免去本职，特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特派陈仪兼驻闽绥靖主任；谢晋元、杨瑞符各给予青天白日勋章。

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称，暴日举兵西进，逼我首都，挟其暴

力，邀我为城下之盟，并郑重宣告："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国民政府令：湖北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另有任用，免去本职；特任何成濬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安徽省政府主席刘尚清另有任用免去本职；特任蒋作宾为安徽省政府主席；贵州省政府主席顾祝同另有任用，免去本职；实业部长吴鼎昌特任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实业部次长程天固兼代实业部长；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调任内政部长，特任张治中为湖南省政府主席。

11月24日——国民政府特派唐生智兼南京卫戍司令长官，负指挥守备南京之责。

11月26日——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江苏、浙江两省政府，免去陈果夫江苏省政府委员兼省政府主席，任命顾祝同为江苏政府委员兼省政府主席；免去朱家骅浙江省政府委员兼省政府主席，任命黄绍竑为浙江省政府委员兼省政府主席。

11月27日——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韩德勤代理江苏省政府主席，江苏省政府移驻扬州。

11月30日——蒋介石巡视南京四周防御工事。

12月

12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办公，行政院电告各省、市政府，已移重庆办公。

12月4日——蒋介石巡视南京周围阵地，部署首都保卫战。

12月6日——国民政府令：任命顾祝同兼江苏全省保安司令、黄绍竑兼浙江全省保安司令、蒋作宾兼安徽全省保安司令、何成濬兼湖北全省保安司令、张治中兼湖南全省保安司令、吴鼎昌兼贵州全省保安司令，原兼江苏

省保安司令陈果夫、兼浙江省保安司令朱家骅、兼安徽省保安司令刘尚清，兼湖北省保安司令黄绍竑，兼湖南省保安司令何键，兼贵州省保安司令顾祝同均免兼职；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殉国之第九军军长郝梦龄追赠陆军上将，第五四五师师长刘家麒、第一九六旅旅长姜玉贞、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追赠陆军中将。

12月7日——蒋介石于凌晨飞离南京，移驻庐山。

12月13日——日军伤亡达6千人，国军除少数官兵突围外，余皆殉职。日军攻陷南京，日军各师团开始南京大屠杀，进行集体屠杀，是日枪杀数万人。日军于南京城陷后，纵兵大掠，中国军民死难者在30万以上。

12月14日——首都警卫军副司令少将，12月12日奉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之命，兼任首都警察厅长暨南京市长，率宪兵两团掩护国军大部队由城内撤出，萧山令部在南京城内与日军返复冲杀，兵败殉职，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中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设议政、行政、司法三委员会，汤尔和为“立法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齐燮元、朱琛、王揖唐、董康、江朝宗、高凌霨为“行政委员会委员”，王克敏为“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董康为“司法委员会委员长”，五色旗为“国旗”。

12月15日——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中国徒手车民万余人，其中押往海军鱼雷营用机枪集体扫射9,000余，在挹江门外姜家园南首用机枪射杀或纵火烧毙居民300余人，在司法院难民所内外军民2,000余人，被日军押至汉中门外用机枪射，并对已死或受伤者复用木柴、汽油焚烧。

12月16日——日军从南京安全区搜捕数万人绑赴煤炭港枪杀，将尸体抛入江中，中山北路华侨招待所有难民5,000余人被押往下关中山码头枪杀；高凌霨任“天津市长”，江朝宗任“北平市长”。

12月17日——国民政府令：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现已到任，兼代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组免代；铨叙部长石瑛另有任用，免去本职，特任钮永建为

铨叙部长；至是日，南京安全区1,000名左右妇女遭日军强奸。

12月18日——蒋介石在南昌主持军事会报会，决定封锁马当要塞；日军将南京城郊难民及俘虏5.7余人驱至下关草鞋峡用机枪扫射，又在下关南通路以北将军人难民约300余人集合用机枪扫射，城内大方巷难民区4,000余人押至下关用机枪扫射，无人生还。

12月20日——上午日军在南京下关江桥口将中国军民500余人绑扎后以机枪射杀，是日起在南京城内有计划纵火，所有消防设备遭劫掠。

12月21日——军事委员会组设工厂迁移委员会，协助上海、武汉等地工厂迁往四川省。

12月23日——日军攻陷杭州，国军退守钱塘江南岸。

12月27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会上有人主张接受日本苛刻条件，与日本和谈，蒋介石当即表明，“今日除投降外无和平，舍抗战外无生存”。

12月30日——各战区设党政委员会，委员会主席由团区司令长官兼任，副主席由省政府主席兼任，下设秘书长一人，分党务、政府及国民军训三处。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38%E5%B9%B4%E4%B8%AD%E5%9B%BD

1938年中国

纪年： 戊寅年（虎年）、中华民国27年

大事记

1月

1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六十二次会议议决，兼行政院长蒋介石辞职照准，选任孔祥熙为行政院长，所遗行政院副院长一职，选任张群继任；国民政府调整中央行政机构：一、改实业部为经济部，建设委员会及全国经济委员会之水利部分，与军事委员会之第三部、第四部均并入该部；前军事委员会之农产调整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改隶经济部；二、铁道部并入交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之公路部分亦并入交通部；三、卫生部改隶内政部，全国经济委员会之卫生部分，并入卫生署；四、海军部暂行裁撤，其所辖事务，并入海军总司令部办理；国民政府令：免教育部长王世杰、交通部长俞飞鹏、铁道部长张嘉璈本职，特任陈立夫为教育部长、张嘉璈为交通部长、翁文灏为经济部长。

1月10日——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特任何应钦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白崇禧任副参谋总长，徐永昌任军令部长，何应钦兼任军政部长，白崇禧兼任军训部长，陈诚任政治部长；日军攻陷青岛。

1月1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六十四次会议决议：国民政府委员班禅逝世，遗缺选任陈济棠充任。

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声明，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

1月17日——国民政府改组最高统帅部，军事委员会直隶国民政府，蒋介石负统率全国海陆空军，并指挥全体军民对敌战之责，以何应钦为总参谋长。

1月18日——国民政府重申抗日自卫立场，保障领土与主权之完整。

1月23日——国民政府以韩复榘违反战时军律，明令褫夺陆军二级上将原官及一切荣誉勋典，令免山东省政府主席本兼各职，任命沈鸿烈为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交军事委员会提付军法审判，蒋介石派何应钦为审判长，鹿锺麟、何成濬为审判官，徐业道、贾焕臣为军法官。

1月24日——韩复榘被判处死刑，晚7时在武昌执行枪决。

1月26日——国民政府任命李宗仁为安徽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原任蒋作宾应免本兼各职。

1月27日——国民政府特派沙克都尔札布为蒙旗宣慰使，并在榆林组设蒙旗宣慰使公署。

1月29日——行政院决议：新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未到任前，省政暂由省府秘书长邓汉祥代理，川康绥靖公署主任由绥靖公署总参议锺体干代理。

2月

2月2日——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河南省政府，河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商震、委员兼民政厅长李培基、委员兼建设厅长张静愚均免本兼各职，任命程潜兼河南省政府主席，龚浩兼建设厅长，方策兼民政厅长；蒋介石令税警总团改编为陆军第四十师，以黄杰为师长。

2月3日——徐州会战揭幕。

2月4日——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布：“行政委员会”下设行政、治安、教育、司法、赈济五部，各部总长分别为王克敏、齐燮元、汤尔和、朱琛、王揖唐。

2月6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陈诚任部长，黄琪翔、周恩来任副部

长，张厉生任秘书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

2月9日——国民政府特派鹿锺麟为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原任唐生智免职；特任陆军中将张钫为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2月20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2月21日——蒋介石以各路日军攻势已馁，令各军全线反攻。

2月24日——国民政府任命程潜兼河南全省保安司令，原兼河南全省保安司令商震应免兼职；同日又令豫皖绥靖公署裁撤；国民政府令林伟俦给予青天白日勋章。

3月

3月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七十一次会议议决陈立夫辞国民政府委员职照准，选任马麟为国民政府委员。

3月5日——国民政府任命马步芳为青海省政府主席，原任马麟免职。

3月6日——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任命马良为“山东省政府省长”。

3月7日——日军攻陷山东威海卫，第20师团一部攻陷山西西南永济，直抵黄河北岸。

3月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刘峙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3月17日——日军攻陷滕县，王铭章殉职。

3月22日——蒋介石抵郑州视察军事。

3月24日——蒋介石到徐州视察军事，决定抽调武汉附近兵团北上增援徐州，以黄杰、桂永清、俞济时、宋希濂、李汉魂各军于河南东部归德、兰封一带，并令随行之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军令部次长林蔚组织临时参谋，

留驻徐州，协助李宗仁策划作战。

3月27日——蒋介石再莅台儿庄视察，李宗仁、钱大钧陪同前往，又派陈调元赴徐州前线劳军，记庞炳勋、张自忠各大功一次；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操纵和监视下在南京成立，举行典礼后仍返上海办公，梁鸿志任行政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许修直任司法院长，内政部长陈群，财政部长陈锦涛，外交部长陈箓（后被刺，由梁鸿志兼任），绥靖部长任援道，教育部长陈则民，实业部长王子惠，交通部长梁志鸿兼任，司法部长胡礽泰。

3月28日——蒋介石视察台儿庄前线后返抵汉口，下令山西、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各省同时实行反攻，并颁令嘉勉汤恩伯、张自忠、庞炳勋；军事委员会任命万福麟为第二十六军团军团长。

3月29日——中国国民党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武昌，至4月1日闭幕。

3月30日——国民政府明令撤销张自忠撤职查办处分：“张自忠前经明令撤职查办，兹据军事委员会呈称，此次临沂之役，该员奋勇歼敌，树立柯勋，拟请撤销前令，以资鼓励等情。张自忠撤职查办处分应准撤销。”

4月

4月1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第四次会议，蒋介石、冯玉祥、孔祥熙主席，决议：一、制定《抗战建国纲领》，二、选举蒋介石为中国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三、成立国民参政会，四、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电李宗仁等：“对于台儿庄之离务须歼灭。倘兵力不足可用援军，并须注意步炮协同。”

4月2日——蒋介石致电第二十军团军团长汤恩伯：“……晋南、豫北之敌，不惜放弃既得地区，抽出兵力，以图策应，均足证明敌人对对于鲁南会战之重视，及其危殆之程度。仰我英勇战士，其各认清本会战之重要性，并

我军将获全胜之现状，严令所属作最大之努力，为战略上适切之协同，促成绝对的胜利，以全全局。”

4月7日——台儿庄大捷，凌晨国军冲出台儿庄向北追击，刘家庄、三里庄日军大部歼，余敌向峄县、枣庄退走：国军伤亡3万余人，毙伤日军万余人，缴获步枪万余支，轻重机枪931挺，炮77门，战车40辆，大炮50门。

4月18日——日军进攻徐州。

4月19日——日军攻陷临沂。

4月21日——蒋介石到徐州指示作战方略，次日视察台儿庄战场。

4月22日——蒋介石通令前方将士，务当再创鲁南来犯之敌。

4月23日——日本华北方面军下达徐州会战令。

5月

5月11日——日军攻陷厦门。

5月12日——蒋介石自汉口赴郑州部署军事；国民政府特任杨杰为驻苏大使，原任蒋廷黻免职。

5月13日——日军攻陷合肥。

5月16日——陈诚在汉口举行外国记者会，揭露日军使用毒气、毒物残害中国军民。

5月17日——日军炮击徐州城，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中弹，晚7时李宗仁率司令部自徐州突围。

5月19日——日军攻陷徐州。徐州会战结束，刘汝明第六十八军掩护各部撤退完毕，于是日放弃徐州。

5月23日——日军攻陷兰封。

5月29日——日军攻陷归德。

5月30日——蒋介石委薛岳为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

6月

6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豫东守军向豫西山地作战略转移，同时秘密决定决黄河堤以阻日军西进，并指定由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负责督工实施。

6月4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刘汝明为第二十八军团军团长。

6月5日——日军攻陷开封。蒋介石电令李汉魂为第二十九军团军团长，6月15日该部由河南调守江西。

6月6日——凌晨，日军第14师团以重炮轰毁开封北城，旋以坦克掩护步兵冲入城内，遂攻陷开封，国军宋肯堂师退向中牟，日军随即向中牟急进；蒋介石“麻（6日）电”颁布武汉卫戍区战斗序列，任命薛岳为武汉卫戍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自6月10日起，解除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职，今后战局转趋长江两岸，兰封会战结束。

6月7日——黄河花园口决堤开工，蒋在珍移驻花园口，监督决堤工程；军事委员会任命孙桐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曹福林为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于学忠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

6月8日——军事委员会任汤恩伯为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6月9日——蒋在珍部在花园口决堤成功，是日放水，140万灾民无家可归，日军约4个师团陷于泛区，损失达两个师团以上。

6月12日——日军攻陷安庆，武汉会战开始。

6月14日——蒋介石命令编组第九战区，派陈诚为司令长官，仍兼武汉卫戍司令部；国民政府任命何成濬为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原任鹿锺麟免职；军事委员会任卢汉为第三十军团军团长，万耀煌为第十五军团副军团长。

6月15日——国民政府任陈诚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原任何成濬职；任命蒋鼎文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原任孙蔚如免职；任命王郁骏代理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原任孔祥榕免职。

6月16日——蒋介石以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名义，发表《为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告全国青年书》；中国国民党中央公布《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凡15章71条。

6月17日——日军攻陷潜山；军事委会任命关麟征为第三十二军团军团长。

6月20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第二十三集团总司令唐式遵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

6月21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国国民党中央常会选任汪精卫为国民参政会议长，张伯苓为副议长，定于7月1日召开国民参政会；军事委员会任命孙蔚如为第三十一军团军团长，李默庵为第三十三军团军团长；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各机关自上海迁南京办公。

6月22日——国民政府特派王世杰、彭学沛为国民政参会正、副秘书长。

6月24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裁撤；军事委员会任命上官云相为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6月26日——日军攻陷马当要塞。

6月27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彭进之为第十七军团副军团长。

6月29日——日军攻陷彭泽；军事委员会任命王东原为第三十四军团军团长。

7月

7月4日——日军攻陷湖口；国民政府明令规定每年7月7日为抗战建国纪念日。

7月5日——蒋介石电程潜、阎锡山、顾祝同、李宗仁，指示第一、二、三、五战区开展游击战，谓："……现值青纱帐起，正游击最好时期，各该战区指定担任游击部队应积极行动，努力袭击敌人，尽量破坏交通、通信，以分散进攻武汉兵力。若认为游击实力不足时，须酌量增派，务使彻底遮断敌交通线为要。盼速拟定部署，确切实施具报。"

7月8日——芦沟桥事变之团长吉星文，升任陆军第三十七师师长。

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武昌成立。

7月15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许绍宗第二宂集团军副总司令。

7月17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白崇禧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职，是日白于商城城北之岳家祠堂就职。

7月23日——日军攻陷九江。

7月25日——蒋介石兼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

7月26日——日军攻陷九江、小池口、太湖；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任命江洪杰为交通部长，原任梁志鸿免兼职；"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交通部次长胡祁太为地方行政部长。

7月27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石友三为第十军团军团长。

8月[编辑]

8月3日——南浔会战开始。

8月4日——日军攻陷黄梅；国民政府驻汉口各行政机关全部迁移重庆。

8月5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吴奇伟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李延年为第十一军团军团长，樊崧甫为第十二军团军团长，俞济时为第三十六军团军团长，王敬久为第三十七军团军团长。

8月29日——日军攻陷六安、霍山。

8月30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王家烈为第二十军团副军团长。

9月

9月4日——国民政府通令将行政年度改用“历年制”，即从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为一年度，以与会计计年度相一致。

9月5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高荫槐为第三十军团副军团长。

9月6日——日军攻陷广济、固始。

9月11日——日军攻陷富金山。

9月12日——日军攻陷西孤岭。

9月15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蒋百里为陆军大学代理校长。

9月20日——蒋介石令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改由军事委员会直辖，以罗卓英为总司令，陈诚专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全力指挥江南战事。

9月23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叶肇为第三十八军团军团长。

9月2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邓龙光为第二十九军团副军团长。

10月

10月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龙云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10月6日——国民政府任命察哈尔省建设厅长张厉生为代理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10月7日——薛岳兵团向万家岭总攻，与日第106师团在长岭、张古山一带高地激战，卒将该敌击溃，克复张古山、长岭。

10月12日——日军攻陷信阳，自武胜关移兵南下。日军登陆大亚湾。

10月14日——广东省政府及广州市政府决定移广东北部翁源，10月19日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及市长曾养甫赴翁源，10月29日广东省政府再移连县。

10月21日——日军攻陷广州。国军弃守广州。

10月25日——国军弃守汉口，武汉会战结束。

10月26日——日军攻陷武昌。

10月27日——国立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前身）成立于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今湖南省涟源市蓝田街道），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廖世承为首任院长。

10月30日——蒋介石抵南昌，批准薛岳兵团撤至修水南岸之计划，饬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统一执行。

11月

蒋介石再次重申要“以四川作为最后的根据，北固陕西，南控滇、黔、桂诸省。稳扎稳打。同时促进国际变化，以求盟友。如此日本一定多行不义必

自毙”。

11月11日——日军攻陷岳阳，入湖南北部。

11月13日——长沙大火。

11月16日——蒋介石自南岳岩到长沙，11月18日下令逮捕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崑、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交军法会审。

11月20日——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崑、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分别以渎职殃民及放弃职守罪判处死刑，是日于长沙执行枪决。

11月25日——军令部在湖南南岩召开军事会议。

11月30日——蒋介石下令中等以上学校组织学生军，蒋自兼总司令，教育部长及军委会军训部长为副总司令，各省主席各区司令，各校校长为分队长。

12月

12月1日——蒋介石由衡阳抵达桂林。

12月3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成立，白崇禧兼主任。

12月14日——武汉卫戍总司令罗卓英抵南昌，与薛岳换防。

12月16日——蒋介石应汪精卫之请，扶病同汪单独晤面，谈约半小时；汪以彼此政见不合，提出“联袂辞职，以谢天下”逼蒋，遭拒，谈话不欢而散。

12月17日——国民政府派许世英为中央救灾备金保管委员会委员长。

12月18日——汪精卫偕其妻陈璧君自重庆出至昆明。

12月19日——汪精卫出至河内，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同往，旋国民政府派正在河内之外交部长王宠惠见汪精卫，又派陈布雷前往河内劝汪改弦易辙，被汪精卫拒绝。

12月20日——中国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自成都飞昆明，即转飞河内，追随汪精卫。

12月23日——国民政府令免广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吴铁城本兼各职，任命李汉魂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并兼民政厅长。

12月24日——蒋介石自西安飞返重庆，请顾问端纳通知英国、美国大使馆，汪精卫绝对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并谓："中国不但没有想到与日本谈和，并且现在正准备作大规模之抵抗。"

12月25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张发奎为第四战区代理司令长官；中国文化服务社成立，由中国国民党中宣部发起创办，王世杰任董事长，刘百闵任社长，程希孟任总编辑，总社设重庆，各地分支社共616个；汪精卫自河内致电驻英大使郭泰祺，宣称："日方所提尚非亡国条件，应据以交涉，谋和平而杜共祸，拟向中央以去就力争，故暂离渝。"

12月26日——蒋介石在重庆国民政府纪念周发表长篇演说，对汪精卫离开重庆有所解释，略谓：汪精卫"此次离渝而赴河内实为转地疗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此行不仅与军事委员会无关，即于中央与国民政府亦皆毫无关系"。

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致"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的叛国"艳（29日）电"，称日本首相近卫12月22日对华第三次声明，"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要求国民政和蒋介石"应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按"艳电"由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三人通过森柏生发表于12月31日之香港《南华日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39%E5%B9%B4%E4%B8%AD%E5%9B%BD

1939年中国

纪年： 己卯年（兔年）、中华民国28年

大事记

1月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彭真为书记；周恩来领导建立八路军重庆办事处。

1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除其一切职务，1月13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西康省政府成立，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宣誓就职。

1月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命叶楚伧为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军事委员会任命张凌云为第六十七军军长。

1月4日——杜重远自重庆飞往迪化，就任新疆大学校长。

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汪精卫判国投敌问题，毛泽东指出：我党对目前整体的方针拥蒋反汪；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将华南及西南各省合并成立一中央局，定名为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军事委员会任命陈大庆代第八十五军副军长。

1月7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卢汉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1月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卫立煌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为副司令长官，商震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为前敌总司令；广东省第四区游击司令蒋光鼐辞职，遗缺由李章达继任。

1月10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陈沛为第三十七军副军长。

1月11日——军事委员会重划部分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为卫立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为顾祝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为李宗仁；山东及苏北一部分为鲁苏战区，总司令为于学忠，副总司令为韩德勤；军事委员会任命叶肇为第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董宋珩为第二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郭勋祺为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郭忏为第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关麟征兼第三十七军军长，宋肯堂为第三十二军军长，安恩溥六十军副军长。

1月14日——国民政府任命石友三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原任刘汝明免职；军事委员会任命朱绍良为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为副司令长官，蒋鼎文为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兼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鹿锺麟为冀察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为鲁苏战区总司令、沈鸿烈为副总司令，杜聿明代新编第十一军军长，彭杰如为第十四军副军长，田温其为第六十八军副军长。

1月15日——张治中致电行政院，请辞湖南省政府主席职。

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另设办事处于桂林，联络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及香港工作。

1月17日——陕甘宁边区首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讲话，指出抗战一定要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湖南省政府改组，薛岳代张治中任省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任命薛岳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代司令长官职务），关麟征为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

1月1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香翰屏为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

1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以汪精卫业经撤职，决议推蒋介石任国民参政会议长；军事委员会任命庞炳勋、刘汝明为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沈克为第四十军副军长。

1月21日——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到中央执监委员155人，推举王法勤、丁惟汾、居正、于右任、冯玉祥等11人为主席团，朱家骅为秘书长；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湖南省政府，薛岳兼省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任李兴中为第九十六军军长、王根僧为副军长，赵寿山为第三十八军军长，陈公侠为第六十四军副军长；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转报苏籍顾问关于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对华政策情报称：莫斯科所得日军华方案：一、停止进攻，以准备对俄战争；二、继续进攻，消耗中国兵力，使之不能反攻；三、准备长期作战，占领全中国。

1月22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周嵒为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

1月23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作《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秘密报告，指出党魂是党魂是党的主义，党德就是智、仁、勇，党基是党魂、党德、党史、党纪四要素，宣称这是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国民政府交通部设水陆运输联合委员会，派宋子良为主任委员；军事委员会任命杨汉域为第二十军军长。

1月25日——国民政府令免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本职；军事委员会任命俞济时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刘尚志为第三十九军副军长。

1月26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报告外交方针与国策；军事委员会任命孙魁元为新编第五军军长，夏威兼第四十六军军长、何宣为副军长。

1月28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陶广为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

1月29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报告整顿党务要点，提出在最近半年中必须“增加有组织有训练的党员，至少要照现有党员总数扩充五分之一”。

1月30日——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闭幕，全会决定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由蒋介石任委员长，推叶楚伧为中宣部部长，又秘密通通党务报告决议案，在国共两党关系上确定“溶共、防共、限共”之基本方针，秘密设立“防共委员会”，并陆续制定《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秘密文件；军事委员会任命梁华盛为第二十五军副军长；吴佩孚在北平会见记者，坚拒日本威胁利诱；王克敏、梁鸿志、王揖唐、温宗尧、朱深、陈群等，在北平发起组织“和平救国会”。

2月

蒋介石密派谷正鼎专程赴河内，对汪精卫进行游说；日军在江西德安，使用毒剂并发射毒气炮弹3,000发，染毒面积30万平方米，当地军民死伤惨重。

2月1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结束，另设委员长成都行营和西昌行营。

2月4日——中国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辞职，由黄季陆继任；军事委员会任命陈万仞为第二十一军军长、宣铁吾为副军长。

2月6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李家钰为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王靖国为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国民政府派戴笠为中央警校校务主任委员。

2月7日——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蒋介石兼任委员长，常委为五院院长、外长、正副参谋总长及中常委三人共11人，秘书长张群；军事委员会任命孙蔚如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锺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为副总司令，孙楚为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冯钦哉为第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王敬

久为第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韩德勤为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周祥初兼第八十七军军长。

2月8日——国民政府派贺国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营主任；绥境蒙政会委员长沙克都尔札布飞抵重庆述职，并就任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任命李默庵为第十四集团总司令，宣布除刘文辉第五军团外，其余各军团番号一律撤销。

2月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黄壮怀为第九十四军军长。

2月10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夏守勋为第七十八军军长。

2月上旬——毛泽东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罗伯特·马丁，毛泽东说：中国需要民主才能坚持抗战。

2月11日——蒋介石就日军登陆海南岛对外籍记者发表谈话称："日军进攻海南岛，无异造成太平洋上之'九一八'。"；军事委员会任命陈烈为第五十四军副军长；河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因公离省，由民政厅长方策代行职务。

2月14日——国民政府派张笃伦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营主任；军事委员会任命焦其凤为第二十六军副军长；日军在三亚港登陆，三亚、榆林、崖县均被侵占，尔后日军南北对进，侵占海南全岛。

2月15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张雪中为第十三军副军长。

2月17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田镇南为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杜聿明代第五军军长。

2月1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郑洞国为第五军副军长。

2月22日——中美文化协会在重庆成立，孔祥熙任会长，陈立夫任副会长，宋美龄、史汀生任名誉会长。

2月2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选任宋美龄为国民政府委员。

2月25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庞炳勋为冀察战区副总司令。

2月27日——国民政府任命高宪申为海军学校校长原任李孟斌免职；军事委员会任刘膺古为第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

2月28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马鸿逵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高荫槐为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

3月

3月2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杨澄源为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刘若弼为第七十八军副军长。

3月3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蔡廷锴为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

3月6日——国民政府任命程天放为国立四川大学校长。

3月8日——军事委员会部署南昌会战，任命陈仪为第二十五集团总司令。

3月9日——国民政府特派李济深为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军事委员会任命陈长捷为第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

3月11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颁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

3月12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朱德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赵承绶为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3月13日任命杨爱源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国边区文化促进会在重庆成立，负责人为沙克都尔札布、喜饶嘉错等。

3月13日——蒋介石指定张群兼任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长。

3月15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冯钦哉为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中英正式签订

贷款合同，英国同意给中国信用贷款50万英镑，用以购买卡车行驶滇缅公路。

3月18日——国防最高委员会议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组织大纲》，决定该会会长由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副会长由行政院院长兼任；军事委员会任命牟中珩为第五十一军长，周毓英为副军长。

3月1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梁立柱为第八军副军长，李守维为第八十九军军长。

3月21日——汪精卫在河内遇刺幸免，其秘书曾仲鸣毙命。

3月22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以曾仲鸣遇刺，就汪精卫安全问题作出决定，派影佐祯昭前往河内，策划使汪逃离河内。

3月25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赵承绶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池峰城为第三十军军长。

3月27日——南昌失陷，南昌会战结束。

3月30日——日军三路围攻高安，并施放毒气，国军俞济时部第七十四军王耀武师力战不利，旅长张灵甫重伤，于4月1日退守白石岭、赶车垄之线。

4月

中国国民党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4月1日——蒋介石就南昌弃守后作战方针致电薛岳：“此后战略应以避实击虚为主旨，长岳路前线主力应赶速撤退到湘阴、平江之线，且以长沙、湘阴、平江三据点，形成犄角之势。”；新墙河之只作前进阵地，准备一有力部队弃制日军；湖东应以浏阳、萍乡、醴陵三据点为三角形，日军进来必可予以最大之打击。

4月5日——白崇禧密电蒋介石报告日军近期战略企图，提出拟以“钧座最高持久的战略，侧重游击战与运动战的战术，指导所属各战区的作战”，并提出“经济的使用兵力，非有利地形、有利时机，不轻于决战”。

4月1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鲁崇义为第三十三军副军长，谭邃为第六十六军军长。

4月15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缪培南为第六十五军军长。

4月17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广播中央广播电台发表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演说，宣布自5月1日起，全国各地全部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

4月20日——日军下达襄东作战“准备命令”。

4月2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陈牧农为第九十三军副军长。

4月22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王俊为第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马鸿宾为第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南昌反攻作战开始。

4月24日——国民政府特派白崇禧兼广西绥靖公署副主任；军事委员会任命刑肇棠为新编第五军副军长。

4月25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姚北辰为第十五军副军长；汪精卫等秘密离开河内，前往上海。

4月2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罗历戎为第一军副军长，汪之斌为第七十三军副军长，王文彦为第七十六军副军长，张坤生为新编第一军副军长。

5月

5月2日——国民政府令：陆军中将陈诚、卫立煌晋任陆军二级上将，陆军中将张自忠、孙震特加陆军上将衔；国民政府命何键兼县政计划委会主任委员，李宗黄为副主任委员。

5月5日——国民政府改重庆为行政院直辖市。

5月7日——日军攻陷枣阳、随县，随枣会战结束。

5月9日——白崇禧转达蒋介石停止对南昌之攻击令，南昌会战结束；汪精卫到达上海。

5月11日——军事委员任薛岳兼第十五集团总司令、关麟征为副总司令；日军占领鼓浪屿，因属公共租界，美国、英国、法国等均表不满；日军、苏军在诺门坎冲突。

5月13日——国民政府令；程潜晋升陆军一级上将，卢汉加陆军上将衔。

5月14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缪培南为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

5月15日——国民政府特任徐源泉为军事参议院参议；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下令对随枣全线反攻，5月22日日军全线总退却，会战结束。

5月20日——国民政府任命贺国光兼重庆卫戍总司令。

5月23日——行政院决议设立恳务总局。

5月25日——军事委员任命林岳生四十九军副军长。

5月26日——国民政府特任周锺岳为内政部部长，免去原任何键本职，特派何键为军委员会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军事委员会任命沈发藻为第二军副军长，彭兰为第十八军副军长，曾友仁为第六十五军副军长。

5月28日——随枣会战结束。

5月30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陈沛为第三十七军副军长。

5月31日——国民政府特派孔祥榕为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周佛海等11人离开上海，于6月1日抵东京，洽商成立政府事。

6月

6月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薛岳兼新编第六军军长、沈久成为副军长，彭毓敏为第三十二军军长。

6月4日——军事委员会任命俞济时为第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霍揆彰为第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

6月8日——国民政府明令严缉汪精卫。

6月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宋英仲为第七十军副军长。

6月15日——汪精卫向日本提出《对日本实行尊重中国主权原则之希望》：一、日本在各级政权中应不设置政治顾问或具有类似名义之职位，不占有或操纵各种或各个税收机关；二、确定最高军权的独立性，在最高军事机关设立顾问团，招聘日、德、意三国之军事专家组织之。中央政府建交后，日军应进行局部撤退；三、迅速交还中国公私营工矿企业，对合办事业应重新进行合理估价，与“临时”和“维新”两政府所订契约，给予再次审查之余地。

6月16日——国民政府特派全权代表孙科与苏联特派全权代表米高扬在莫斯科签署《中苏通商条约》。

6月2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杜聿明代第五军军长，周士冕为第二十七军副军长。

6月23日——军事委员会任命俞济时兼第八十六军军长。

6月24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王耀武为第七十四军军长。

6月25日——汪精卫抵达北平会见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杉山元，并和王克敏晤商组织“联合政府”，汪精卫曾约吴佩孚在杉山元官舍会面，遭吴佩孚拒

绝；美国通知日本废止《美日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6月26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陈诚奉蒋介石令，密订《共产问题处置办法》，凡5章63条，于月底秘密颁布。

6月28日——汪精卫返上海。

6月2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莫树杰为第八十四军军长。

7月

7月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吴瑞英为第六十一军军长；成吉思汗灵榇运抵甘肃榆中兴隆山，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等举行安陵祭典。

7月3日——国民政府任命周钟岩兼县政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原任何键免职。

7月5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梁华盛为第十军军长，杨德亮为第四十二军军长，陈烈为第五十四军军长。

7月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冯圣法为第七十四军副军长。

7月10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张文清为第二十五军副军长。

7月13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永远开除周佛海、陈璧君党籍；军事委员会任命鲁道源为第五十八军副军长，安恩溥为第六十军军长。

7月15日——国民政府任命梁龙为驻罗马尼亚特命全权公使。

7月18日——行政院决议战区各省设行署，并公布《战区各省省政府设置行署通则》，凡9条。

7月27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李钿六十八军副军长。

7月28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周熹文为第三十二军副军长。

8月

香港颁布《战时征集条例》，征召适龄壮男加入义勇军或入香港海军防卫队作后备兵。

8月4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胡宗南为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8月5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杨德亮为第四十三军军长。

8月7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张雪中代为第十三军军长、马励武为副军长。

8月8日——军事委员会任命余泽篯为第二十八军副军长。

8月15日——国民政府特派陈大齐为高等考试典试委员长。

8月16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张文清为第十五军军长，冯圣法为第八十六军副军长。

8月22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李守维为第八十九军军长。

8月26日——蒋介石在重庆宴请尼赫鲁，8月28日蒋介石与尼赫鲁会谈中印合作问题，8月30日尼赫鲁抵达成都访问；国民政府明令通缉周佛海、陈璧君。

8月31日——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机构筹建就绪。

9月

9月1日——中国国民党宣布三民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原三青团临时机关改为中央干事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陈诚任中央干事委员会书记长，朱家骅任中央监事委员会常务监察；尼赫鲁因国际形势变化，由成都提前返重庆，次日向蒋介石辞行，准备回国。

9月4日——日本大本营令在南京设置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华北、华中、华南军，西尾寿造为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为总参谋长，原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同时撤销。

9月5日——尼赫鲁离开重庆返回印度。

9月7日——香港英政府宣布限制购买外汇，9月17日又公布补充条例。

9月8日——国民政府令设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联合办事处（四联总处），蒋介石为主席，孔祥熙、宋子文、钱永铭为常务理事，同时公布《战时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军事委员会任命张坤生为第十五军军长。

9月14日——长沙会战（又称湘北会战）开始。

9月17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周碞为第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

9月1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张一能为第九十九军副军长。

9月20日——国民政府改组河南省政府，免去主席程潜等本兼各职，以卫立煌兼主席。

9月2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庞炳勋为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施中诚为第七十四军副军长。

9月28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刘和鼎为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

10月

10月1日——军事委员会决定将第九战区划分为第六、第九战区，10月2日任命陈诚、商震为第六战区正副司令长官，薛岳、王陵基为第九战区正副司令长官，10月5日加任杨森为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汪精卫为筹组中央事再度赴日。

10月2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黄琪翔为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为副总司令，关麟征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部署湘北全面反攻。

10月3日——蒋介石自重庆飞成都理四川政，10月17日飞返重庆；进攻长沙日军分三路溃退。

10月4日——第九战区薛岳所部克复湘阴，即向汨罗江北推进。

10月5日——第九战区各军连克营田、汨罗、平江等地，乘势追击，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下令全线退却。

10月6日——蒋介石电薛岳等将领祝贺湘北大捷，并向参战部队颁发赏金15万元：第九战区各军在民众帮助下击退围攻长沙日军，恢复原有阵地，先头部队追近新墙河；军事委员会任命杨俊青、曾宪栋为第十一军副军长。

10月7日—蒋介石在成都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职，上午召集省府职员训话，下午接见专程到四川之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日军第11军前方指挥所从咸宁撤走，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

10月8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李汉魂为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为副总司令。

10月9日——第九战区一部攻克湘北新墙河及赣北修水。

10月1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重申主权完整不容破坏。

10月11日——薛岳偕同陈诚抵达湖南、湖北边境，督率所部围攻岳阳。

10月12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马步荣为骑兵第五军副军长，詹志忠为第二十五军副军长。

10月13日——国民政府任命韩德勤兼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原任顾祝同免本

兼各职。

10月2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冯钦哉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10月22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柳彦彪为第九十八副军长；香港进行防空演习。

10月23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温剑鸣为第八十军副军长，武士敏为第九十八军军长。

10月24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刘茂恩为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为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

10月26日——军事委员任命武庭麟为第十五军军长。

10月27日——国民政府指令批准定“八一四”为空军日，前定“九二〇”为空军节、“三二九”为航空先烈纪念节一并废止；军事委员会任命李品仙为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10月29日——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策定后期抗战战略，11月5日闭幕，蒋介石讲话称：今后要开始反守为攻，积极采取攻势。

11月

11月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蔡廷锴为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韦云淞为副总司令、夏威为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11月2日——国民政府任命李品仙为安徽省政府主席。

11月4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张发奎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

11月15日——桂南会战开始；军事委员会任命何宣为第四十六军军长，黄

国梁为第六十五军军长。

11月16日——钦州湾登陆日军占领防城，次日占领领钦县。

11月18日——国军第四十六军新十九师经桂南连日激战，伤亡甚大，分向上思、皮城山区撤退。

11月1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区寿年为第四十八军军长。

11月20日——白崇禧电广西省政府召集全省村街民大会，动员民众，配合军事力量，破坏公路，实行空室清野，痛击桂南进犯日军；军事委员会任命叶肇为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张义纯为第二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

11月22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宋希濂为第三十四集团副总司令，段珩为第七十军副军长；日机低空猛烈轰炸南宁南北地区，国军阵地被毁，增援受阻。

11月23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郑作民为第二军副军长，邹洪为新编第二军军长，王本甲为第七十九军副军长。

11月24日——南宁失守。

11月25日——国民政府特派叶楚伧为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总事务所副主任。

11月26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孙连仲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琪翔为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夏威为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蔡廷锴为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

11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胡庶华为国立西北大学校长。

11月30日——宪政促进会在重庆组成。

12月

12月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谷正伦兼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冬季攻势开始。

12月2日——昆仑关形势吃紧，广西10万民团动员，破坏日军工作。

12月3日——日军第5师团主力对昆仑关攻势强大，杜聿明第五军与日军激战。

12月4日——日军占昆仑关，随即构筑工事企图固守，第四战区所部分别退至昆仑关以北及武鸣附近集结整顿，准备尔后会战。

12月6日——国民政府派张道藩为国民大会代表总事务所总干事，张维翰为副总干事，原任叶楚伧、张道藩免职；军事委员会任命古鼎新为暂编第二军副军长。

12月7日——国民政府任命吴国桢为重庆市市长，原任贺国光免职；四川省禁烟督办公署成立，蒋介石兼督办，胡次威任处长。

12月8日——军事委员会任命佟毅为第五十军军长。

12月9日——军事委员会任王士为第六十七军副军长。

12月11日——蒋介石、孔祥熙在重庆宣誓就任行政院正、副院长；军事委员会任命徐庭瑶为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为副总司令。

12月12日——第五战区、第九战区冬季攻势开始。

12月14日——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率部渡湖北襄河，出击洋梓镇、黄家集日军，毙伤敌2,000余人。

12月15日——白崇禧发布反攻南宁作战命令，令各部队于12月18日拂晓开始攻击，乘日部队未到以前将日军包围于邕江南北地区而歼灭之。

12月16日——李济深、陈诚奉蒋介石命自重庆飞广西，协助白崇禧作战；第三战区冬季攻势开始。

12月17日——粤北战役开始。

12月18日——桂南各部队约15万人调整就绪，依照白崇禧部署开始反攻，杜聿明第五军第二〇〇师、新二十二师、荣誉第一师任主攻首先反攻昆仑关，另以第九十二师当日占领七塘南北阵地断绝邕宾公路阻截日军援军，致此后几日日军得用飞机输送弹药给养；国民政府任命寿勉成为经济部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

12月20日——杜聿明部第五军第五师增强对昆仑关之攻击，坦克一度冲入昆仑关，次日割裂九塘与昆仑关联络，空军配合地面部队攻击扫射日军。

12月21日——国民政府特派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

12月23日——日军命令第九旅主力，由龙州“排除万难，日夜兼程，向南宁急进”，次日开始行动，12月27日行抵山墟附近为西路军夏威部第一八八师包围截击，至12月29日进至南宁。

12月24日——第五军副军长郑洞国密电蒋介石：自18日该部围攻敌第五师团于昆仑关，激战已七昼夜，死伤惨重，是日19时经两小时攻克昆仑关罗塘南端最坚固高地。

12月28日——桂林行营下令反攻昆仑关。

12月29日——第五军以步、炮、坦克协同对昆仑关再次猛攻，昆仑关两侧高地日军几无余生；军事委员会任命冯圣法为第八十六军军长。

12月30日——昆仑关日军开始总退却；汪精卫与日本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在上海签字。

12月31日——昆仑关大捷，杜聿明第五军新编第二十二师及余汉谋部第一五九师各一部于11时许攻入昆仑关，是役毙日军4,000余人，国军因采取攻势伤亡约1.67万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40%E5%B9%B4%E4%B8%AD%E5%9B%BD

1940年中国

纪年： 庚辰年（龙年）、中华民国29年

大事记

1月

1月1日——增援桂南昆仑关之日军及由昆仑关退却之日军在九塘、八塘附近占领阵地继续抵抗。

1月2日——香港当局宣布封锁港口，一切船舰不准驶入。

1月3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赴西藏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是日抵拉萨；陶希圣、高宗武宣布脱离汪精卫集团，是日秘密离开上海前赴香港。

1月6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邓龙光为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日本兴亚院会议决定关于汪精卫政权成立之《纲要》，以汪精卫"新中央政府为对手，开始正式调整邦交"。

1月7日——蒋介石飞抵桂林，亲自指导南宁作战，1月10日飞抵柳州视察驻迁江之夏威第十六集团军司令部。

1月1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樊崧甫为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

1月12日——蒋介石致电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指示在南宁作战中“不可以侥幸求成”，“必须先求稳当，次求变化，未稳当以前，切不可遽求变化”；第三十六军姚纯部接替第五军杜聿明部防地，向昆仑关日军进攻，因日军抵抗顽强，姚部补给困难，虽力战数日，无法进展，成对峙状态，昆仑关战役结束。

1月13日——桂林行营在迁江召开桂南会战高级将领会议，决定宾阳附近作战方针：目的为攻克南宁，先确保现势，待后续兵团集中完毕，对郁江两岸日军同时开始攻击歼灭，郁江南路由夏威指挥，郁江北路由吴奇伟指挥。

1月17日——国民政府令免鹿锺麟河北省政府主席职，任命庞炳勋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冀察战区副总司令。

1月21日——陶希圣、高宗武致书香港《大公报》，揭露汪精卫日本秘密签订之《日中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并详述汪日密约签订之经过，劝告汪精卫等“悬崖勒马，勿再受日阀之欺骗与用，以冀公私两全”。

1月23日——蒋介石发表《为日汪密约告全国军民书》，称日汪密约“把近卫声明‘东亚新秩序’的一字一句都具体化了”，“骨子里暗藏着机械利刃”，“比之二十一条凶恶十倍，比之亡韩手段更加毒辣”，号召中华国民“光复山河，荡涤汉奸腥膻，报复先烈仇恨”；国民政府决定行政院设立农林部，管理全国农林行政事宜。

1月24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李及兰为第九十四军军长。

1月27日——国民政府明令督办四川省肃清私存烟土事宜公署改为四川省禁烟督办公署，派蒋介石兼四川省禁烟督办，贺国光、徐孝刚为会办，派蒋经国为江西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兼江西省第四区保安司令。

1月2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詹忠言为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日军第5师团主力在桂南八塘附近，一部在五塘附近协同向北攻击，1月31日日军攻陷甘棠。

1月30日——军事委员会命令，2月1日起，桂南作战由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政治部长陈诚协助；汪精卫以高宗武、陶希圣披露其密约，解除其“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职武，并任命周佛海为“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

1月3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夏威、吴奇伟为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缪培南为第九集团军代总司令。

2月

2月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陈鸿远为第十四军副军长；新四军游击支队奉命正式改称为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3个总队和3个主力团。

2月3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商震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日军攻陷五原。

2月4日——桂林行营鉴于所部连日伤亡大且昆仑关失守，不宜在宾阳平地与日军决战，决定待后续兵团到达，再相机转取攻势。

2月5日——国民政府明令特准青海灵童拉木登珠继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2月8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马腾蛟为第八十一军军长。

2月9日——桂南各路日军开始南撤。

2月13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韩全为第七十二军军长、陈良基副军长；第四战区各部收复桂南宾阳、武鸣、武陵、上林。

2月18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对新生活运动之基准礼、义、廉、耻作新解释："礼"是严严整整的纪律，"义"是慷慷慨慨的牺牲，"廉"是切切实实的节约，"耻"是轰轰烈烈的奋斗。

2月1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李梦笔为第二十六军副军长。

2月2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罗卓英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日本中央部以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名义指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开展诱降蒋介石之"桐工作"，内容为：一、日中双方之会谈由中国派遣军指导进行；二、会谈要在建立汪精卫之新中央政权后进行，特别注意照既定方针，不能动摇建立新中央政权之根本工作；三、鉴国内外形势之微妙，应绝对避免急举行全面谈判或盼望谈判成功之态度，从而不丧失随时停止交涉之思想准备。

2月22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农林水利部改为农林部，直隶行政院。

2月29日——国民政府明令裁撤各省市地方自治推进委员会。

3月

军事委员会任命梁培璜为第十九军军长。

何应钦检讨对日作战溃败原因：一、部队作战缺乏协同动作；二、无死守阵地之决心与必胜的信念；三、构筑防御阵地忽略纵深配备；四、谎报军情，过度夸大敌情，用意在减轻自己之责任；五、破坏交通线不要领，或迟或早或不彻底；六、指挥机关臃肿重迭；七、对上级命令不研究，奉行不力；八、鱼肉百姓，扰民作恶。

3月3日——日军攻陷苏北淮阴、宿迁、涟水、泗阳。

3月7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张琼为第二军副军长。

3月12日——桂南灵山战役开始，国军第四十六军一部攻击大塘、小董间之日军，占领崇匡附近之高地及大路岭，第一八八师截断邕钦路。

3月15日——国民政府特任陈济棠为国民政府农林部部长。

3月17日——汪精卫、陈公博等抵达南京。

3月1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陈公侠为第六十四军军长、张弛为副军长。

3月20日——国军五原反攻战开始；汪精卫政权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召开，汪精卫主持并致词，决议授权汪精决定中日新关系调整方针，通过政府名称为“国民政府”，政府成立日期为3月30日。

3月2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莫与硕为第八十六军军长，冯圣法为第九十一军军长。

3月24日——日军反攻五原。

3月27日——五原战役结束，国军董其武部收复五原，日军走出城区向乌加河北逸去。

3月30日——汪精卫政权“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桂林行营命令桂南各部在坚守已占据之阵，同时络织各种出击队，袭击并破坏敌之交通、通信、政治、经济，并将主力集结整训，为尔后反攻南宁做好准备。

3月31日——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抵重庆。

4月

军事委员会撤销桂林行营，改组为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以李济深为主

任，林蔚为副主任。

4月2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郑洞国为新编第十一军军长。

4月4日——国民政府任命盛世才兼新疆省政府主席。

4月5日——宋哲元在四川绵阳病逝。

4月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卫立煌兼任冀察战区司令长官，石友三为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

4月18日——军事委员会决定撤销军事运输总监部及运输总司令部，另设运输统制局，统辖西南运输处、运输总司令部及交通部等运输机构，派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主任，交通部长张嘉璈、后方勤务部长俞飞鹏兼副主任。

4月25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陈大庆为新编第二军军长。

4月2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杨森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

5月

军事委员会撤销第十战区。

5月1日——枣宜会战开始，信阳、随县、钟祥三地之日军以战车引导，飞机及炮兵火力支援，突破第五战区临阵地线，向枣阳方向包围；国民政府任命钱昌照为经济部资源委会副主任委员；军事委员会任命周祖晃为第四十六军军长。

5月2日——信阳方面万余人附炮30门、战车60余辆进至小林店以西及毛集、竹沟一带，继续进攻泌阳方向。

5月3日——国民政府任命万福麟为辽宁省政府委员兼主席，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政府委员兼主席，邹作华为吉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缪澄流为热河省

政府委员兼主席；随枣方面国军第五十九军军长黄维纲指挥在新集一带与日军激战，而日军第三十九师团、第六师团一部10万余人5月5日进至环潭镇、唐县镇、高城镇。

5月4日——随枣方面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及第六师团一部，向国军黄琪翔第十一集团军进攻，5月5日日军先后攻占黄部高城、安居等阵地。

5月5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萧之楚为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国军第八十四莫树杰部与日军在枣阳东之环潭镇、唐县镇、高城镇一带交战，第一七四师唐县镇北侧击北走之日军，主力向日军外翼邓县附近后撤撤；信阳方面日军突破国军第三十军池城峰部防地，进陷桐柏。

5月6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李玉堂为第十军军长；日军攻陷唐河，与国军第二十七师、第三十师、第三十一师各部分别在西新集、固县、沙河铺激战，国军各部转进唐、泌间，与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夹击西向之日军。

5月7日——随枣方面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率第三十八、第七十四师在棘阳西南方家集与日军激战，歼敌千余，继向枣阳、双沟方面日军压迫；唐河日军一部进攻南阳，国军李仙洲第九十二军主力协同第十八军彭善部、第十三军张雪中部在源潭镇一带堵击，日军不支走向唐河，国军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主力由源潭镇向唐河包围，第九十二军主力绕至唐河以东，第三十军主力由唐河南阳大道以南袭击唐河，日军主力急走唐河西南，与第六、第三十九、第十三师团会合，在枣阳以北驻守。

5月8日——汤恩伯第二十一集团军一部与日军在唐河附近激战，克复唐河；日军向唐县镇进攻，并以战车从两翼包围，守备军第八十四军第一七师锺毅部受四面压迫放弃枣阳，向唐河、白河西岸转移，锺毅在突围中殉职，部下官兵伤亡惨重，日军得以逐次攻占随阳店、吴家店，占领枣阳；李及兰第九十四军、王缵斌第七军、陈鼎勋第四十五军等部以日军陷枣

阳，乘机向敌后攻击；军事委员会任命刘雨卿为第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免邓宝珊新编第一军军长职。

5月9日——随枣方面日军自唐河走新野、邓县以南地区，第二十军池峰城部第三十、第三十一师，第八十五军王仲廉部第三十二师及第十三军张雪中部第一一〇师协同夹击，将邓县之日军击溃。

5月10日——蒋介石电令李宗仁等：鄂北之敌经我多日围攻，粮弹殆尽，必向原阵地退却，第五战区应乘敌态势不利、退却困难之好时机，以全力围攻捕捉；军事委员会任命杨宏光为新编第三军代军长；国军张雪中第十三军第一一〇师围攻新野方面日军，克复新野，李洲仙第九十二军一部及池峰城第三十军二十七师攻克泌阳，日军伤亡惨重向枣阳南走。

5月11日——国军第四十五军陈鼎勋部第一二七师克复随县西北吴家店，钟祥方面日军与第五战区李宗仁部守军在土桥铺、兴隆集一带激战，李宗仁部克复豫南武胜关。

5月12日——第五战区各部向枣阳日军反攻，收复唐河、泌阳，日军被迫向枣阳以南收缩；军事委员会任命赵锡光为第三十六军代军长。

5月13日——蒋介石电令李宗仁等，“应以遮断敌退路，断其补给为主眼，克服一切困难，迅速围歼枣阳一带敌之主力”；随枣方面第九十二军李仙洲部克复明港，第八十四军莫树杰部克复唐县镇，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部在黄家垱、万家集、据家湾堵日南退，毙伤日军700多人。

5月14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梁仲江为第三十七军副军长；第五战区李宗仁部克复鄂南通山，日军北走；国军第八十五军王仲廉部克复枣阳北湖河镇，国军池峰城第三十军一部进抵苍台镇东北进击郭滩镇，国军第十三军张雪中部新编第一师由苍台镇东南侧击，日军以一部围沿襄河东岸南走，日军主力在枣阳一带筑构工事固守，国军汤恩伯部及第二十军攻占枣阳以北湖阳镇；张自忠率特务营及第七十四师主力驰往瓜店堵击，5月15日日军

一部由峪南走至方家集，由张自忠及第三十三集团军总部人员围歼，日军不支突围南走；汪精卫政权官制改，军政部改为陆军部、与海军部一并隶属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裁参谋本部与政治训练部，军事训练部与兵监合建为三厅，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改称总务厅。

5月15日——军事委员会下令撤销第六战区，其作战区域并入第九战区；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部在张家集、马家集，第七十七军冯治安部第一三二师在长寿店与日军激战，陈鼎勋第四十五军、莫树杰八十四军在唐县镇附近夹击日军一部由枣阳东南走。

5月16日——上午日军一部附炮20余门、飞机30余人架助战进攻枣阳南之南瓜店，张自忠率第七十四师、骑兵第九师及总部特务营激战六七次，伤亡较重，日军复以大部向张部包围，张自忠登山督战，指挥所部与日军肉膊，大部阵亡，多次击退日军进攻，至下午1时日军冲至山上，张自忠已身中数弹，右弹穿洞，左右劝其转移，张坚决不肯，为防落入敌手，乃拔枪自戕，临终对随官兵嘱称："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大家要杀敌报仇。"；枣阳附近第五战区各部进攻枣阳，池峰城第三十军、舒荣第八十九师一部攻克七房岗、土桥铺，张雪中第三十三军一部克复枣阳。

5月17日——日军由枣阳东南增兵5,000余人，战车数辆，向枣阳反攻，第十三军猝不及防，日军攻陷枣阳，国军退至枣阳附近，5月20日枣阳附近各部除以小部迟滞日军北进外，主力向唐河西南、新野西北、白河以西转移。

5月18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罗树田为第十八军军长。国军克复信阳。

5月24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冯治安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徐景唐为第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

5月25日——国民政府明令陆军中将潘文华、王缵绪、王陵基特加陆军上将衔；军事委员会任命杨天民为第十五军副军长。

5月28日——蒋介石致电军事委员会及各军长、师长以上各主任、长官、司令，追述张自忠英勇抗战事迹，并称："我三民主义之精神，实由荩忱（张自忠字）而发挥之；中华民国历史之光荣，实由荩忱而光大之。其功虽未竟，吾辈后死之将士，皆当志其所志，效忠党国，增其敌忾，翦此寇仇。"；张自忠灵柩运抵重庆，蒋介石及军政要员及重庆各界人士数百人前往朝天门码头迎灵，蒋介石亲为执绋，下午3时举行葬礼，旋运灵柩至北碚双柏树暂厝。

5月29日——国民政府门令在政府机关、民众团体一律改称孙中山为国父，在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民间已印就之图书文字不必强令改易。

6月

6月1日——日军攻陷襄阳。

6月3日——国军收复襄阳。

6月6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裴昌会为第九军军长；日军攻陷荆门。

6月12日——日军攻陷宜昌；军事委员会任命孙兰峰为暂编第三军军长，董其武为暂编第四军军长。

6月14日——第五战区彭善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反攻宜昌，日军一度退出宜昌，国军未及持续进攻，日军复返宜昌。

6月15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陶峙岳为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丁德隆为第一军军长。

6月16日——彭善第十八军、冯治安第七十七军、郑洞国新编第十二军第五师、王仲廉第八十五军第三十二师反攻宜昌、当阳，6月17日彭善部攻入市区克复宜昌城及附近阵地，日军乘夜东退。

6月19日——日军第十三师团再攻陷宜昌。

6月2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刘元塘为新编第十二军军长。

6月24日——蒋介石密令李宗仁、陈诚、薛岳、顾祝同等停止对宜昌日军之反攻，称："为应付国际变化，保持国军战力，俾利整训之目的，第五战区应即停止对宜昌攻击，第二、第九战区亦应停止大规模攻击，而各以一部与敌保持接触，不断袭扰，牵制敌人。"；"满洲国"增设四平省。

6月26日——国民政府令准江西省立中正大学为国立中正大学。

6月28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周绍轩为第十二军副军长；日军宣布封锁香港，香港总督奉命疏散妇孺，香港与内地水陆交通均告断绝。

6月29日——宜昌日军2,000余由美孚油栈附近渡长江南下，陈诚部在五龙口迄磨难山一带与日军激战。

6月30日——第一战区卫立煌部攻克河南开封，又克亳县、鹿县。

7月

中共中央任命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负责中央书记处工作，并分管中央组织部、西北局和工、青、妇工作。

7月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苏祖馨为第四十八军军长，杨光钰为第九十军副军长，并决定重设第六战区，7月8日任命陈诚为司令长官；国防最高委员会任命第一集团总司令卢汉为滇越边防总指挥，总指挥部设滇越线要冲蒙自。

7月4日——军事委员会派遣白崇禧在鄂北老河口召开枣宜会战检讨会议，与会者有李宗仁及各集团军总司令、军、师以上人员。

7月5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李文田为第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

7月7日——蒋介石通电全国，追述张自忠将军抗战功绩，称张自忠抗战以来，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三民主义之精神实由荩忱而发挥之，愿“吾辈后来者皆当志其所志，剪此寇仇，以完成荩忱未竟之志”；军事委员会任命周喦为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

7月8日——军事委员会重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陈诚，统辖湖南、湖北、四川、黔边地区战事，辖第二十集团军、第二十六集团军与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任命刘振三为第五十九军副军长。

7月1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设立战区货运稽查处，查缉敌货及走私；军事委员会任命关麟征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

7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教学研究会在重庆成立，蒋介石为名誉会长，陈立夫兼会长，甘乃光、方治为副会长。

7月17日——国民政府明令定11月21日为防空节。

7月18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李宗鉴为第八十五军副军长，余念慈为第六十七军副军长。

7月1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霍揆彰为第二十集团军代总司令。

7月22日——朱德、彭德怀、左权等联名致电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等，并报中共中央军委，计划在华北大规模破袭交通，此次作战即后来之“百团大战”。

7月2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陈瑞河为第七十一军军长。

7月30日——行政院会议决议设立全国粮食管理局，以统筹全国粮食之产、销、储、运，调节无求，特派卢作孚为局长，何廉、熊仲韬、何北衡为副处长，8月1日开始正式办公；军事委员会任命刘建绪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

8月

8月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刘正富为第六十军副军长。

8月7日——军事委员会重设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余汉谋为司令长官，设于广东曲江，负责广东、江西一部战事，辖第六十三军、第六十五军。

8月12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张人杰为新编第七军军长，李忠毅为副军长。

8月14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张啸林被刺身亡。

8月15日——延安各界千余人举行追悼张自忠、陈安宝、郑作民、锺毅将军大会，朱德、萧劲光、王若飞、王稼祥、王明等到会，毛泽东送“尽忠报国”挽词。

8月20日——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

8月21日——韩德勤于苏北东台下达向黄桥地区进攻之作战命令：特派李明扬为进剿军总指挥，李守维、李长江为副总指挥。

8月22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刘戡为第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任命陈铁为第五集团军副总司令。

8月31日——国民政府改组湖北省政府，任命朱怀冰为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并代理省主席职务。

9月

9月1日——张治中就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职，以治事应公、严、勤、勇勖勉所属；军事委员会恢复铁道运输司令部，将公路与水道之军事运输划归后方勤务部管理。

9月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设立物价审查委员会，谷正纲为主任委员，翁

文灏、张厉生、卢作孚、何浩若、吴国桢等为委员。

9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定重庆为陪都；国民政府节约建国储蓄团成立，蒋介石为名誉总团长，孔祥熙为总团长，叶楚伧、何应钦、张群、陈诚、王世杰等副总团长。

9月8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黄琪翔为预备集团军总司令（11月29日该集团军撤销）；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9月10日——军事委员会任命何绍周为新编第十一军副军长；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结束。

9月1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刘和鼎为第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荣光兴为第五十九军代副军长。

9月12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欧阳棻为新编第二军副军长；最高法院院长焦易堂辞职，遗缺由李发暂代。

9月16日——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合发布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命令，命令要求各部于9月20日开始战斗。

9月17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唐俊德为第五十四军副军长，沈克为第七十一军军长。

9月18日——国民政府特派朱家骅代理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

9月1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杨光钰为第十六军副军长，魏炳文为第三十六军副军长，李梦笔为第九十军副军长。

9月20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蒋光鼐为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

10月

10月1日——行政院通过《重庆陪都建设委员会组织规程》，该会直隶行政院，孔祥熙任主任委员，周锺岩、杨庶堪为副主任委员；中国国民党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成立，蒋介石任委员长，孔祥熙、于右任任副委员长，张厉生任秘书长，党务组主任陈果夫、副主任张道藩，政治组主任蒋作宾、副主任蒋廷黻；中国国民党中央设计局成立，蒋介石任总裁，张群任秘书长，甘乃光、顾翊群任副秘书长；军事委员会政治文化工作委员会在重庆成立，主任委员郭沫若。

10月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免陈诚中央训练团教育长职，遗缺由王东原充任。

10月3日——黄桥战役开始：韩德勤部第八十九军第三十三师（欠一个旅）、第一一七旅、独立第六旅和李明扬、陈泰运部以及5个保安旅，总兵力25个团约3万余人进攻黄桥地区；新四军陈毅部仅3个纵队9个团，约7,000余人。

10月5日——新四军陈毅部第二纵队在第三纵队配合下围歼第三十三师，俘师长孙启人，10月6日又歼第八十九军军部及第一一七师，军长李守维坠入八尺沟河中溺毙，俘师参谋长张晤，黄桥战役结束，韩德勤部1.1万余人被歼，新四军伤亡900余人。

10月18日——滇缅公路重新开放，交通部次长曾养甫赴仰光主持通车事宜。

10月1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罗奇为第三十七军副军长。

10月24日——国民政任命谷正纲为社会部长。

10月2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由张继、刘文岛、贺耀祖等组成中央党务工作考核委员会，张继任主任委员。

10月30日——国军收复南宁。

11月

11月2日——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在成都成立，蒋介石兼任委员长，黄季陆、徐堪、卢作孚、何廉等为委员，是日召开第一次会议。

11月4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马法五为第四十军副军长，刘嘉树为第五军副军长。

11月5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王仲廉为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李楚瀛为第八十五军军长，冯圣法为新编第九军军长，陈式正为第九军副军长。

11月11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黄维五十四军军长。

11月15日——国民政府令：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免本兼各职，以谷正伦为甘肃省政府主席，蒋介石请辞四川省政府主席兼职，派张群兼理四川省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免本职，宪兵司令谷正伦免本职，派张群为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为宪兵司令兼重庆卫戍区副总司令。

11月17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刘广济为第一〇〇军军长。

11月23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宋克宾为新编第七军副军长。

11月29日——国民政府派潘公展为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军事委员会任命廖震为第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王泽浚为第四十四军代军长，佘念慈为第六十七军军长，杜道周为第八十六军副军长。

11月30日——国军第十六集团军夏威、第三十五军集团军邓龙光部收复镇南关，桂南会战历时一年之久结束。

12月

12月1日——经济部合作管理局改隶社会部，局长寿勉成。

12月2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许绍宗为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

12月5日——八路军总部宣布百团大战结束，历时3个月，大小战斗1,842次，毙、伤、俘、和投诚日军共2.1万余人，八路军伤亡1.7万余人。

12月12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方天为第十八军军长。

12月17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郭勋祺为第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刘雨卿为第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刘正富为第五十八军副军长，鲁道源为第六十军副军长，李振为第六十五军副军长，张兴仁为新编第三军代副军长。

12月20日——国民政府令：察哈尔省主席职务由该省民政厅厅长毕泽宇暂行兼代。

12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新四军军部，指出："……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处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权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关于抗日战争过程中的国共之争的简单反思

。。。。

理想与现实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抗日战争时代，在日本的凌厉攻势与野蛮残暴的欺凌之下，中国几乎将要面临亡国的境地。日本以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国力量，居然把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庞然大物一般的大国，欺压到几乎要灭亡的境地，——其中，固然有日本的先进军事武器装备、帝国主义军事化体制、野蛮残暴的国家战争机器、等等重要因素，然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内部的一盘散沙、不团结。

自从1911年清朝灭亡以后，中国就一直试图要学习西方文明、实行西方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但是，无论是袁世凯的复辟，还是袁世凯死后的各地军阀军事割据、彼此混战、争权夺利、蝇营狗苟、诡诈私利，都显明了，在世人心中所弥漫的，无信仰、无道德、无真诚的内心光景。正是这样的人心景况，才导致了，在所谓自由民主体制下，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充斥着没完没了的纷争、自义、分歧、异议、斗争、乃至于暴戾、血腥、谋杀、争战。

这并不是说，在中国人的心中，就没有真诚的理想；也不是说，在中国社会中，就没有那些追求理想的激情澎湃之人。例如，正是黄埔军校当年的那些热血青年【这些人后来大多数都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防军事力量中的骨干与脊梁，成为统帅千军万马的将军元帅、集团军司令、军长、师长、等等】，与许多其他抗日军民一道，在蒋介石等中国国民党领导人的率领下，在抗日战争中的艰苦战斗中，撑起了中国的国防大军，成为了中华民族脊梁一般的力量，成为了舍生忘死与日军作战的、无数可歌可泣之战斗中的英雄一般的人物。

我们并不是说，在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中，国民党的领导框架就是完美的。事实上，在很多方面，恰恰相反，其中充满了许多谬误、腐败、低效、等等之事。我们也不是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就没有大量的、满腔热忱的、真挚积极地寻求真理的人。事实上，在抗战时期，在以延安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阵营中，无论是北方的八路军、以及其他敌后抗日力量中，还是在南方的新四军等等抗日力量中，都有着大量的不畏艰险、舍生忘死的中华优秀儿女们。这些中国共产党人中间，许多人在心中也都存着美好的想往，有着巨大的激情与艰苦奋斗的动力。

可是，本书想要在这里简单地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些充满理想的人们，却在现实中彼此争斗得你死我活、自相残杀、以至于整个中国被日本欺凌得如此不堪、甚至即将彻底灭亡在日本的铁蹄之下呢？【这里，我们仅仅

是聚焦于国共之争，尚且不考虑那些地方势力对于中央民国政府的阳奉阴违、自私自利、互相暗斗之事，例如，山西的阎锡山，以及四川、云南、广西等地的地方军阀等等；另外，在江浙、华北、东北、西北，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地区性政治经济性力量；他们彼此之间往往是面和心不和、互相南辕北辙、力不往一处使、更没有同心同德、等等。】

。。。。

悲剧在于什么

如果我们要深思国共之争中所表明的巨大悲剧【这个悲剧，更在1949年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夺取政权，把整个中国置于更大的悲哀之境之中。直至今天，亿万中国人民已经生活在被奴役之境中长达七十年之久】，那么，其中复杂的内容、情境、思辨，可能需要另外的专著才能够深入分析得透彻、彻底。但在这里，我们仅仅简单地、概要地指出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所在。那就是，——在中国的文化中，——或者，人们常常是蝇营狗苟、仅仅埋头生活于每日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碎之事中，而不去思想那些关乎国家、关乎主义、关乎心灵与灵魂的事情；——或者，人们常常是自以为义、拍案而起、以天下为己任、把自己当作是正义化身、甚至要"替天行道"、高举起理想主义的大旗。————但是，在人

们的心中，却往往缺乏一种宝贵的品质，即：既热忱、又谦卑的品质，——既寻求公义、又满有恩慈，既饥渴慕义、又愿意宽容、饶恕。

++++++++++++++++++++++++++++++++

【引述 圣经马太福音18章 饶恕七十个七次】

那时，彼得前来问耶稣："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多少次？七次吗？"

耶稣对他说："我告诉你，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

因此，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帐，

刚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下六千万银币的人来。

他没有钱偿还，主人就下令叫人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卖掉，用来偿还。

那仆人就跪下拜他，说：'请宽容我，我会把一切还给你的。'

主人动了慈心，把那仆人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

那仆人出来，遇见一个欠了他一百个银币的仆人，就抓住他，扼着他的喉咙，说：'把你欠我的钱还给我。'

那和他一同作仆人的就跪下求他，说：'请宽容我，我会还给你的。'

他却不肯，反而把他带走，关在监里，等他把所欠的还清。

其他的仆人看见这事，非常难过，就去向主人报告这一切事情。

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个恶仆，你求我，我就免了你欠我的一切。

难道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好像我怜悯你一样吗？’

于是主人大怒，把他送去服刑，等他把所欠的一切还清。

如果你们各人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也必这样待你们。”

+++++++++++++++++++++++++++++++

这种重要的、兼具公义与恩慈、既热忱又谦卑的、宝贵品质，正是民主制度的精髓与必不可少的重要基础所在。否则，任何民主制度都一定会最终引致喧嚣混乱的无政府主义，并最后被强力压迫的暴戾专制独裁政权所取代。这一点，正是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所显明的。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基本上处于喧嚣混乱、你争我夺、彼此争斗的无序政治局面之中；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嘈杂无主的政治局面则被专制压迫性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所代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引述 《论民主》 相关章节内容】

民主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

我们从现代民主制度的起源历史中，会清楚地看见，现代民主主义制度不仅发源于欧洲，而且，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一般性而言，在西方各国中间，如果，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在人民大众中传播得越广泛，人民的基督教信仰越真挚而热忱，那么，在这个国家中的民主制度就越容易建立起来，并且，民主制度在这样的国家中就发展得越快、越稳定；反之，当一个国家中的基督教信仰越来越不受到人们重视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中的民主制度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混乱喧

嚣、内耗内斗；甚至，当这个国家中大多数人民都离弃了敬虔信仰的时候，也就必然会导致，民主制度终将引向彻底混乱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并最终被专制主义野心家所推翻、篡权。

其中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于，民主制度究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人民群众内部之间相互协商、共同决策的复杂过程。在这样的复杂过程中，在一个社会中，尤其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世界主要国家中，必然会存在许许多多不同的利益冲突、不同的观点角度、不同的意识理念等等。那么，在这些不同的、甚至激烈的力量角力过程中，怎样能够达到和平安祥的、团结一心的、众志成城、稳定牢固的政治结果呢？

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民主制度若要成功【而不是逐渐滑向无政府主义以及专制主义】，那么，我们就必须思考和面对以下这样的一般性困境：——在民主政策的决策与实施的过程中，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复杂社会环境中，必然会有很多人口成分、很多政治力量的愿望得不到满足，甚至，政策方向是被很多人所彻底反对的。【——尽管，当然，政策方向之所以被决定下来，是因为社会中超过半数的政治力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那些在某个政策决策上意见少于半数的人群；但是，由于社会政策决策有许许多多的方面，因此，这些在每一个政策决策上意见少于半数的人群，加在一起，人数就反而会占据社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例如，有的人反对某些医疗方面的政策决策，而另外有些人则反对某些教育方面的政策决策；虽然那些人在每一项具体政策决策上都少于半数，但他们在不同政策决策相关方面上相应的人数加在一起，却超过了社会人口中

的大多数。】

于是，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怎样避免扯皮、庸碌无为、无法决策？怎样避免决策结果导致国家动荡、不稳定、怨声载道？

核心问题就是，如果“我”是民主社会中的一个成员，那么，当面对某个不符合“我”利益、违背“我”意识形态的、然而却是民主程序下所制定的决策结果的时候【例如，民主决策的某个政策结果是：——减少某个地区的、面向某类职业的教育经费，增加某种医疗的收费，针对某种行业加税，增加某些方面的军费，甚至是堕胎，毒品合法化等等】，——在“我”的内心中，怎样还能有和平安宁的心情呢？“我”怎样还能够平静地、和平地遵守那些既定的民主秩序和政策法律结果【即，和平地等到下一次投票的时候再去表达意见；甚至，——“我”心里明知道自己是少数派，无论再投多少次票也没用，根本不可能改变某种政策决策结果】，而不是心怀怨言、鼓噪喧嚣、甚至图谋用非法手段推翻既定政策法律结果呢？

本书必须在这里清晰地、大声地、毫不含糊地指出，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正是民主制度本身的生死成败之关键所在。

如果在社会中的千千万万个“我”，在各种不同的民主决策结果面前，都忿忿不平地面对上述困境【例如，有的人是在医疗决策结果上，非常不满；有的人是在教育政策决策结果上，充满愤怒；等等】；那么，在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民的心中，就一定没有和平、平安和幸福；在这样的人民之中，民主制度就一定会失败。

请注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各种具体政策决策结果本身，就公义、平等、公正而言，并不一定是正确的；而人们心中的各种怨言、不满、甚至愤怒本身，并不一定是没有道理的，并不一定是不对、不合理的。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关键问题是，虽然有这样许多的、甚至看似很严重的不合理之处，虽然有这样许多的、看似合理的不满之处，但是，——民主制度本身怎样才能够，保持稳定、和平、长治久安，而不是被动辄轻易推翻、政权总是处于动荡更替的无序混乱之中？

如果我们认识不到民主制度本身的局限性、有限性，如果我们不知道应当怎样回答上述问题，应当怎样面对上述困境，那么，——我们国家社会中的民主制度就必然不会成功，就必然会跌入无政府主义混乱之中，并必然最终被专制主义所取代；我们就必然无法挣脱专制主义的欺骗、愚民、诡计、邪恶、与枷锁。

____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在各样的复杂政治角力过程中，在人民群众中间，如果没有一种深挚真诚的、敬虔热忱的、谦卑虚己的、以对于造物主上帝之敬拜为中心的信仰，——来调和、引领、协调民主决策过程，并在民主过程中起到根基性的作用，——那么，从几个世纪以上的长远眼光来看，所谓民主制度就一定会面临失败，跌入无政府主义混乱，并被专制主义取代。

基督教信仰对于现代民主主义制度的成功，具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当人们以那属天的国度为心灵的归依，以造物主上帝自己为心灵归依的时候，那么，——就会在生命品格中有以下重要特征。一方面，这样的人会积极热心地投身于公共事务的讨论、投票、决策过程之中，而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冷眼旁观。另一方面，当民主决策的结果是违背自己的愿望和观念的时候，这样的人并不会要死要活，以为自己是绝望的；——因为，他内心的倚靠，从终极的、根本的层面而言，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在天上，在那上帝永恒的国度里。

最重要的是，在以耶稣基督十字架为中心的信仰中，人们不会把自己当作是世界的中心，更不会颐指气使地把自己当作是绝对真理的化身，甚至要"替天行道"、唯我独尊等等；而是，在内心深处看见己罪、承认己罪、悔改己罪。因此，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心灵深处一定是真正谦卑的，因为他的心灵之锚，他的一切盼望与期待，究其根本层面而言，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在那永恒的天上国度里。正是因此，他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既勤勉地生活、一丝不苟地努力去做好一切所当行之事，以热忱的心灵和情感，去面对一切世事和世人；但同时，他并不以这个世界为依归，而是把心灵的眼目单单地瞩目于那天上的国度，就是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盼望所在。这一点，正是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中马丁路德、加尔文以及无数英国清教徒们、和过去漫长历史中一代又一代无数敬虔基督徒们的深挚信仰和坚定信念。这种信仰和信念用一句简单的英文总结就是：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意思就是，勤勉热诚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却不以这个世界为归依。

正是这样的以圣经为核心、为根基的基督教信仰精神，才导致了现代民主主义革命的诞生。正是这样的基督教信仰精神，才能够使得民主制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稳定地、平安地、和平地持续下去，并使得其中的人民看见世事真理、享有幸福。

正是这样的基督教信仰精神，才使得无数人们以敬虔的心去顺服"在上掌权者"、顺服于世上的法律体系、政权秩序、决策过程；使得人民群众在民主决策过程中，无论决策结果是否如己所愿，都能够和平地彼此相处。在一

个民主社会中，基督徒们在关于各项公共政策事务的协商与决议过程中，会主动而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会为了公共的利益而努力地献计献策；但是，若自己的一些主张和意见建议没有得到全体社会的采纳，那么，基督徒们的心里仍然是有平安的，因为他们在心灵深处的盼望与归依不是在这个世界上。

++
++
++
++
++
++
++
++
++++++++++++++++++++++++++++++++++++++

【【【引述 圣思录 顺服在上掌权者】】】

《顺服掌权者》：

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罗13）

【第一部分】顺服在上有权柄的人。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13:5 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13:6 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

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13:8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13:9 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13:10 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1）正义是什么？正义的源头在哪里呢？正义是来自这个世界的吗？我们又应当怎样在这个世界上寻求正义呢？在这个世上能够得到完全的、真正的正义吗？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或作让人发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2）这世上有多少罪恶，是在伸张正义的借口之下发生的。有多少人，看见不平，拍案而起；但是，他们却不过是在用一种罪恶来代替另一种不

义。

许多人，想要伸张正义，但是他们的心中，却不过是在自以为义。

许多人，口中喊着替天行道（这话本身就是对神的亵渎），心里面热乎乎地热血沸腾；但是，他们心中，却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狂傲之心。他们内心的罪恶和污秽，遮盖在光辉理想的旗帜之下。

（3）敬畏耶和华，是人智慧的开端。

在人们口中，无论是哪种所谓的正义，无论是哪种情境；如果，在人的心中没有对永生真神的敬畏，没有对神的圣洁、公义、主权、主宰、创造、救恩、恩慈的敬畏，没有人内心中发自心底的真正谦卑，没有摒弃自己心中的固执、愚顽、刚硬，那么，在人们中间的任何所谓“正义”都是枉然。人们所谓的革命，造反，战争，斗争，等等，都不过是在很大程度上被人的野心、贪婪、罪恶、欺谎、虚空、狡诈、诡计、虚荣、负气、情仇、自义所充斥着、包裹着、裹胁着、淘汰之下的恶性循环。

那么，又该怎样呢？敬畏耶和华，是人智慧的开端。顺服在上掌权者。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退后，听凭主怒。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使自己的生活圣洁；以爱对待人；祈求神，不乞求人；敬畏神；对掌权者应当恭敬而惧怕，但是，不要在灵里畏惧人；倚靠神，而不要倚靠人；活出基督的圣洁生命与爱，作基督救恩的见证；以彻底地的谦卑和爱，来对待所有的人，包括在上掌权者。

【第二部分】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13:9 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13:10 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这是人应当如何在世上立足、与人相处的一个基本原则。

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第三部分】13:11 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13:12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13:13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13:14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我们真正的正义和公义，应该到哪里去寻求？是在那些"在上掌权者"那里吗？也是，也不是。关键是，我们的源头、归宿和倚靠，应该是在何处。我们应当以这世界为我们的源头、归宿和倚靠吗？不，决不是的！

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11:13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11:14 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11:15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11:16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我们在这世上，都是作寄居、作客旅的。这世界不是我们最终的家。坟墓更绝不是我们的归宿。以这世界为家的人，想要在这世上找到终极的公正；可是，他们无论是贫是富，无论是渺小还是伟大，都只能是品尝到真正的失望、眼泪、痛苦、无奈、疾病、衰残和死亡的滋味。在这世界中寻

找正义的归宿的人，必然要空手失望而回。更何况：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又能拿什么来换自己的生命呢？

我们更应当警醒自己，黑 夜 已 深 ， 白 昼 将 近 。 我 们 就 当 脱 去 暗 昧 的 行 为 ， 带 上 光 明 的 兵 器 。 13:13 行 事 为 人 要 端 正 ， 好 像 行 在 白 昼 。 不 可 荒 宴 醉 酒 。 不 可 好 色 邪 荡 。 不 可 争 竞 嫉 妒 。 13:14 总 要 披 戴 主 耶 稣 基 督 ， 不 要 为 肉 体 安 排 ， 去 放 纵 私 欲 。=====我们只有当有了倚靠神的信、圣洁的生命、基督的救恩时，才能够在这世上真正地见证出神的爱、公义和圣洁。

++
++
++
++
++
++
++
++
++

在这世上的主要宗教信仰中，除了以圣经为中心、核心根基的基督教信仰体系之外，还有以可兰经为中心的伊斯兰教信仰体系，以及以系列佛经为

中心的佛教信仰体系。此外，还有具有一般泛神主义特征的印度教信仰。

那么，除了基督教信仰以外，其它的那些宗教信仰体系，与现代民主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如何呢？为什么现代民主主义制度没有原发性地起源于它们所产生的文化土壤中，而是在来自西方外力的影响下，才开始实行现代民主制度的呢？【甚至，在今天的中东世界，在许多强烈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中，民主之路仍然非常遥远。】

在伊斯兰教信仰中，虽然也是对于那位创造宇宙天地的上天的敬拜，但是，却有着强烈的政教合一、排他主义的色彩。在伊斯兰教中，是典型的"因行为称义"的教义，即，一个人的信仰是否敬虔，要通过外在的许许多多繁文缛节的规条，例如禁食、每日定时祈祷、不吃猪肉、等等无数的规矩，来体现。一个人是否算作是真主阿拉面前可被接纳的信徒，要看其行为是否满足那些繁文缛节的规条，甚至是否愿意成为一名圣战士，等等。伊斯兰教的重要主旨，是在地上按照可兰经的律法规条建立起伊斯兰国。伊斯兰教教义的核心是在于，人必须在行为上遵从和顺服阿拉、以及其最大先知穆罕默德的话语。这种"因行为称义"的教义，会两个严重的致命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任何一个人，如果在内心和良知中真正是诚实的，就一定无法否认自己心中的罪性，无法否认自己所曾经说过的谎话、自己心中曾经的不义的愤怒以及嫉妒、自己对于他人所属之物的贪恋、自己所曾经做过的错事，等等。任何一个百分之一百诚实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无法"因行为称义"的。第二个问题是，这种"因行为称义"的教义，一定会导致人在内心中自高、自傲、自义，并会论断他人、俾倪他人，从而导

致和加剧——而不是消饵——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上述“因行为称义”的特征，在其他宗教信仰体系中，例如佛教和印度教中，也很普遍，但在伊斯兰教中尤其明显。事实上，伊斯兰教所导致的文化土壤，从其当年所开始建立时的火与剑的时期，一直到今天，都始终常常贯穿着戾气、冲突、矛盾；以伊斯兰教为主的社会中，往往是专制主义、或是万马齐喑、而没有生机勃勃、热忱、勤勉而自由的状态。

佛教信仰的教义，与印度教特征一样，都是属于泛神主义宗教信仰体系。在这样的宗教体系中，并没有【——甚至直接否认——】：在这个世界之上的那样一位无限全能、全知、至善至美、公义圣洁、慈爱恩典的造物主、上天、上帝、永生真神。因此，佛教信仰与印度教信仰都具有泛神主义的一般特征，即，它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是悲观的；在它们的眼中，这个世界的本质是虚无、虚空、虚浮、虚幻的，人生的本质是苦的；通向幸福的道路，就是出世，就是看穿世事与人生的虚无，放下执着，以“舍得”的人生态度，来面对一切。换言之，它们看不到这个世界的浩大、瑰丽、奇妙、精确、秩序、等等，是出于上帝的无限智慧、设计、和伟大创造；它们更看不到在人的生命与心灵中，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圣经告诉我们，人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在它们看来，世界就如同荒芜、默然、没有生气的沙漠、旷野、荒地；人生就如同荒诞而荒谬的一场戏。在它们的体系中，看不到道德法则的绝对意义、隽永价值与永恒根基，看不到生命的本质含义与指向永远的真正价值在于什么。它们更看不到“罪”的本质根源所在，以及怎样除去罪的根本途径【罪，不仅在

于外在的言语行为，更在于人内心的自傲自义，在于人对于造物主、上天的背离，在于对良知中道德法则的悖逆】。它们所看见的世事人生，是空的、苦的，但它们看不见罪的本质。它们的敬拜体系中充满了人手所造的金、银、石、木的偶像。它们的教义中有许多关于超自然世界的烦冗的、人为臆想的“知识”，充满了人对于自己悟道与修行过程的倚靠和自傲之心，但却看不见“义”的本质和源泉所在。

在一个佛教或印度教所影响下而产生的文化土壤中，人们往往在心中、在关乎世事上没有执着、认真、奋进、殚精竭虑的态度，而是凡事看空、放下、舍得、反对执著。在这样的土壤中，人们并没有对于道德之罪的同仇敌忾的心理，并没有对于世事人生的热忱、对于公义的执著向往和锲而不舍的追求。当在西方外力作用影响下【甚至是在西方外力的胁迫下（如日本等地），或是保护下（如台湾、韩国、泰国等地）与促进下（如缅甸等地）】，它们的文化土壤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实行民主制度，但是，从长远的眼光看来，它们一定很难于发挥持之以恒的奋进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执著态度。

在中国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中，贯穿着下级服从上级等等三纲五常的伦理。在这种伦理体系下，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拥有极高的人身权威。儒家思想中强调，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以此世为中心的国家社会秩序伦常观念。然而，这种文化土壤所导致的是，人们在人身依附上、社会权势与权力分配上，在生命与人格上，都围绕着权力分配、追逐权力、争夺权力、依附权力等等生活方式

为中心。在这种思想伦理体系中，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上，究其本质而言，人与人不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分成两类，所谓君子和小人。甚至，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儒家思想的这种文化土壤的巨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民主制度的今天，在中国却仍然没有开始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度；甚至，今天的中国距离一个稳定、成熟、现代、先进、发达的民主制度，还非常非常遥远。即使有一天，中国开始在表面上建立了民主制度，也很有可能会如同70年前一样，是虚假的挂羊头卖狗肉，或是如同100年前一样，是动荡混乱、喧嚣躁乱、纷争不断的局面。

++

++

++

++
++
++
++
+++

++
++
++
++
++
+++

++
++
++
++
++
+++

继续简单地反思，抗日战争期间的国共之争。

。。。。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在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曾经有两次重要的合作，以及两个重要的分裂阶段。对于二十世纪的整体中国历史而言，这两次重要合作与重要分裂阶段，都对于亿万中国人民的生活、生命、思想、等等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意义。

国共第一次合作是在1920年代初期。在这个时期，中华民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阶段。在1911年清朝灭亡前后的时期，为了避免在全中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内战、生灵涂炭【满清的灭亡、中华民国的成立，是一次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和平的权力过渡时期；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由于平均每两三百年就有一次血腥的、生灵涂炭的改朝换代，因此，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杀戮之事，甚至有着十四次大规模的人口灭杀（在每一次灭杀中，就常有上百万、千万、甚至上亿人口的死亡，或是占社会总人口的数量达到三分之一、等等）。中国历史上的人口灭杀之事如此残酷，以至于，当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明末清初时期的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对中国政治统治者的一个主要说辞就是，真诚的基督教信仰，能够把永久性的和平带给一个国家。因为，在整个欧洲历史上、中世纪的时期，除了几次十字军东征与瘟疫之外，民间一直是处

于十分安静、祥和、平安的状态之中（欧洲历史上的许多所谓战争，例如所谓“英法百年战争”，或是英国光荣革命等等，其实仅仅是一些王族军队、骑士阶层之间的小规模零星战斗，而非是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士兵的、大规模、长时期、全国性动员、等等。在公元四世纪至公元十五世纪的中世纪期间，在天主教治下的西欧各国之间，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大规模的国族之间的大规模混战）】，孙中山提出，如果当时的满清重臣、袁世凯能够帮助促使清朝退位、建立中华民国，那么，孙中山愿意辞去当时的革命领导职位，而让袁世凯来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总统，并建立中华民国参众两院、宪法制度，把中国引向现代民主自由制度的国家。

然而，在随后的权力斗争与更迭中，袁世凯出于一己之私，想要自己登基称帝。袁世凯失败以后，他过去的新军部下，以及国内其他军事势力，在中国各地建立起地方军阀体制，并在实质上架空中央政府。在这种喧嚣混乱的北洋军阀时代，在1910年代末、1920年代初，孙中山开始试图重新掌握权力、推动中国民主自由政治制度的健康发展。面对各地军阀割据，孙中山不得不试图成立和壮大中国国民党，并试图成立和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在万般无奈之下，孙中山期望能够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但在当时，只有苏联愿意提供物资、金钱、人员等等支援力量。作为代价和条件，苏联要求孙中山以及国民党帮助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借壳上市”，“鸠占鹊巢”，利用中国国民党既有的政治基础和政治资源，从中国国民党内部逐渐壮大自己的力量、组织、干部、政治基础等等；这也是后来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一个主要实质内容】【自从1918年以后，由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运动推翻了沙俄统治、在俄国内部建立起了无神主义的、专制主义的政治统治体制，所以，苏联受到西方各国主要政治军事势力的孤立与敌视，因此苏联亟需在远东地区、东欧各国、

中国等地寻找到政治盟友力量，以对抗欧美其它国家。同时，苏联所领导成立的"共产国际"，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口号和理想，目的是想要推翻各国既有政权、建立起"国际共产主义者联盟"、等等】。这就是1920年代黄埔军校的筹建成立以及孙中山联俄容共的政策政治背景。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史中极其重要的黄埔军校，完全是凭着苏联的支援才得以建立。在此期间，在筹备成立黄埔军校之前，孙中山还派遣年轻的蒋介石前往苏联参观考察。但是，政治敏锐的蒋介石很快看到了苏联统治政权的专制本质，并认识到所谓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罪恶之处。

1920年代中期，在北伐【在蒋介石率领下的、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地区开始向北进军，讨伐那些盘踞在广东、华东、江浙、山东、以及华北地区的各地军阀势力，目的是要努力恢复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威，恢复民主自由政治秩序、参众两院立法、司法体系独立、行政部门公正有力的宪政政治体系、等等】即将开始之前，孙中山逝世。蒋介石等其他中国国民党志士们继承孙中山遗志，开始了势如破竹的北伐攻势。可是，在顺利进行的北伐进程中，那些隐身于中国国民党内部、北伐军内部、以及各地革命力量中间的中国共产党成员们，以及他们所领导的许多工农革命力量，在北伐军所过之处，积极地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推动无产阶级领导之阶级斗争宗旨，甚至在上海等地发动暴动，引致许多血腥混乱之事。这些暴乱之事，直接导致了1927年的四一二事变，从此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力量与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四一二事变还导致了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的国民党内部分裂【蒋介石坚决主张反共、取缔中国共产党，但汪精卫却主张继续容共】、宁汉分裂【南京政府（蒋介石）与武汉政府（汪精卫）之间互相分裂、不承认对方】。直到不久以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暴动革命的危害性，开始

也加入反共阵营，中国国民党的内部分裂才暂时结束。

四一二以后，中国共产党转入江西等地农村，建立农村根据地；之后，在不断反围剿斗争中，开始了长征。最终，中国共产党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几乎与此同时，日本侵占了东北，并且，整个中国都开始面临日本的愈演愈烈的战争威胁。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是，长征的目的是北上抗日；但实际上，陕北并没有日军；长征的一个最主要目标，是试图接近苏联，得到苏联的支援与保护。1936年，被日本人赶出东北的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发动了西安事变；此时，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几乎要灭顶之灾的命运，但却因着“抗日”，而不但得到了生存，更进而壮大了自己。短短13年以后，1949年，中国共产党即通过暴力武装战争，推翻了中华民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者之间，虽然只有几字之差，但在政治理念上却存在着天壤之别。前者的政治理念是实现三民主义，即，学习西方的政治文明制度，以“主权在民”、民主、自由、为政治目标。后者的政治理念则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术语本身就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自相矛盾、甚至含糊不清不知所云的、欺谎诡诈的、政治术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无神论、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等等。无神主义、唯物主义，彻底地消解了人心中的敬神畏天的信仰，消解了人内心中对于道德法则之超自然权威性的敬畏；在这样的思想体系下，人们的人生目标就是“活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在人与人之间，不再有底线，甚至“人至贱则无敌”；一切以实力说话，强权决定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情、手段、方法的好坏善恶，由它的业绩与后果来判断、衡量。——简而言之，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当中国共产党人高举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口号和旗帜的时候，他们并不认为这是荒谬错误的；反而，他们甚至在其中寄予了极大的理想和期望。四一二事变的惨败，以及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失败，都让许多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如果不能组建起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并且最终以这样的武装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夺取全国性统治政权，——那么，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共产主义理想就不可能实现，中国社会的阶级不平等、压迫制度就不可能被消除。

今天，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已经长达七十年之久的时候，在亿万中国人心中【由于漫长时期内的洗脑与思想奴役】，仍然对于上述理念和主张深信不疑。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了呢？为此，我们应当深思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的精髓，并深思究竟什么是民主，以及民主的真义；我们更应当思考人生、国家、社会的真正本质、目的与意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引述 论民主】

。。。。。。。。。。。。。。。。。。。。。。。。。。。。。。。。
。。。。。。。。。。。。。。。。。。。。。。。。。。。。。。。。
。。。。。。。。。。。。。。。。。。。。。。。。。。。。。。。。
。。。。。。。。。。。。。。。。。。。。。。。。。。。。。。。。
。。。。。。。。。。。。。。。。。。。。。。。。。。。。。。。。
。。。。。。。。。。。。。。。。。。。。。。。。。。。。。。。。
。。。。。。。。。。。。。。。。。。。。。。。。。。。。。。。。
。。。。。。。。。。。。。。。。。。。。。。。。。。。。。。。。
。。。。。。。。。。。。。。。。。。。。。。。。。。。。。。。。
。。。。。。。。。。。。。。。。。。。。。。。。。。。。。。。。
。。。。。。。。。。。。。。。。

在一个社会中，有效的经济运行模式

=======================================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经济的本质

在近现代西方政治经济文明大厦中，有三个人的三本书，起到了重要的支柱性、启迪性作用，就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三本书，分别从法治、民主、经济三个角度，勾画出了一个关于现代社会架构的蓝图，并在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实践中，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乃至全世界各国政治建制与运作，广泛地影响了许多现代人心中的人文政治经济思想。当然，在他们出版了那些相关著作以后，后人在他们的思想基础上又进行了许多细化、深化、系统化的思想理论建树。但他们三个人的著作都具有代表性、革命性、原创性、开启性的意义。

但是，我们想要在这里指出的是，在整个近现代西方政治经济文明大厦中，如果除去了圣经、除去了基督教信仰的重要影响与深刻的文化土壤，那么，所谓《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国富论》等等思想所代表的

现代法治、民主、经济架构中，就只有的是贪婪、争斗、战争、私利、一盘散沙、与慵懒、拖沓、低效。关于这一点，如果我们简单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经过、结果，或是研究一下法国大革命的喧嚣混乱【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人曾经试图摆脱宗教信仰的"束缚"，但很快国家陷入无政府主义混乱之中，导致许多内战和屠戮；最后，法国领导人认识到宗教信仰对于国家社会稳定与道德状态的重要意义，才努力地重建曾经被短暂抛弃的基督教信仰】，以及今日法国、希腊、意大利等等政府的腐败与低效，或是环顾一下今天世界上的诸如华尔街、伦敦金融区的无休无止的贪婪与明枪暗箭，或是西方世界里民主政治中的剑拔弩张、互相吵骂，那么，我们就会深刻地认识到，《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国富论》所表达和代表的法治、民主、经济制度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世人生命与心灵之中的真实光景是什么，世人是否在内心中有敬虔、诚实、恩慈、寻求公义的立场。

在本章，我们简要地讨论现代社会中经济运作机制与民主以及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

____

在英国崛起之前，欧洲曾经先后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依次成为海上

强国。在英国之前的海军大国西班牙，尤其看重世上的黄金，因此，西班牙的世界航海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之一，就是想要在世界各地寻找黄金等物质财宝、财富。

然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对英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间接使得英国的崛起走上了一条与西班牙等海上大国之崛起非常不同的经济道路。

亚当斯密的最大的启迪性贡献，就是正确地指出，所谓物质性、经济性的财富，究竟是什么。

根据亚当斯密的定义，所谓经济性财富是指，社会或个人所拥有的、在单位时间内生产产品的劳动生产率与能力。

换言之，财富并非是有形的黄金或是土地等等，而是一个人、团体、社群、社会的劳动创造能力、生产率。

更进一步，根据亚当斯密的思想，真正地增进财富的途径，不是在于囤积物质性的东西，而是在于贸易；因为人们在贸易中通过彼此交换商品，从而达到“术业有专攻”，生产能力与技术精益求精；从而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所最擅长的那一种工作。这样，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协调合作基础上，整个人类社会就能够走上不断进步、繁荣兴旺的道路。

在亚当斯密的贸易经济思想中的本质是，人类应当、也可以通过相互协作、分工合作、社会化大分工，来共同增进富裕程度。这种思想，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根本性基础和精髓，也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在过去两百年内、尤其是在二战以后所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

然而，在自由贸易经济思想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假设性前提条件，那就是，在人类社会、各个国家、世人心中，人们愿意敞开心扉地、没有嫉恨地、彼此信任、通商贸易，彼此平等地互相对待、相互合作、共同富裕。

如果这个假设性前提条件不成立，那么，就无法建立起一个公平、平等、公正的贸易法规环境，人们彼此之间也无法互通有无、进行自由贸易和商品交换。

自由贸易必须需要一个公正、成熟、稳定、可预期的、透明化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如果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动荡，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彼此猜忌、甚至剑拔弩张、发动战争、互相好勇斗狠、争强好胜、一定要拼得你死我活，那么，从根本上说、从长期而言，自由贸易就不可能进行。

而显然，这种公平正义而稳定的政治法律环境，唯有是建基于世人心中的公义、正义、平等、诚实、信实，以及对于法律、秩序、规则的遵守和敬畏。

在现代社会，这样的政治法律环境往往是在民主制度的政治框架下所提供的。

正如本书前文所述，一个公平正义、平等公义的法律规则秩序环境，从长期而言，唯有是建基于整个国家社会中大多数人的道德境况、以及内心深处的真诚信仰。

如果人们在信仰中是虚伪的、轻轻忽忽的、玩世不恭的；如果人们彼此之间充满了尔虞我诈、坑蒙拐骗、羡慕嫉妒恨；如果人们藐视规则与秩序，既贪婪、又喜欢偷窃；如果人与人之间不但没有诚信，而且蔑视那些说话算数、老实巴交的人；如果人们凡事都用计策，不是三十六计，就是孙子兵法的"兵者，诡道也"；如果世人的心中没有道德底线，没有敬畏之心，没有敬虔的信仰，信奉"人至贱则无敌"；如果在人间道德世界中，真的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那么，所谓的自由贸易，不但不会大规模地发生、并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福祉，反而，会激起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仇恨甚至战争，进而导致生灵涂炭的灾难。

——————————————

在现代经济学理念中，人常常被看作是自私的、为了谋求自己利益而努力工作的经济动物。

但是，从整个国家、社会、国际的层面而言，上述现代经济学理念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盲点，即，它看不到，个体的人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选择

待在秩序规则的笼子里面，以诚实守法的辛勤劳动、以宁可吃亏也不说谎的诚信态度，来获得自己应得的利益，而不是以狂野不羁的、投机取巧的、坑蒙拐骗的、见缝插针的方式，来取得财富。

在一个秩序规则法治体系运转良好的国家社会中，或许，那些狂野的、投机取巧的、坑蒙拐骗的行为，会很快受到惩罚；因而，这样的犯规行为并不常见。

然而，随着人类的经济活动愈来愈复杂，随着秩序法规越来越疏于坚守，更重要的是，随着国家社会中许多人信仰越来越不敬虔，越来越虚伪、徒有其表，终有一日，秩序规则体系就会岌岌可危、甚至崩解，从而，自由贸易也会随之消失。

在一个国家社会中，或是在国际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当中，如果大多数人都是没有敬虔信仰、没有对于法律规则秩序的遵守和敬畏、没有诚信与真挚的道德品格，那么，在这样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就不会有开放式的、自由竞争式的自由贸易机制。

————————————

在一个自由贸易体制环境中，从国家、社会、国际层面而言，人们必须认识到、并深刻地尊重两点。

第一点是，人们必须由衷地、从心底深处，真诚地尊重、遵守、敬畏秩序规则体系，而不是——处处喜欢耍小聪明，把别人的诚实和诚信，当作是愚蠢；把自己的诡诈，当作是智慧。

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也应当是如此。

在国际关系体系中，从根本层面、终极意义上而言，人们不应当把人类世界看作是弱肉强食、丛林法则所主宰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世界，而应当是彼此之间、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真诚相处、公义、正直、恩慈的世界。

第二点是，在国际关系之间、国家内部关系等等之中，大多数人们必须有一颗诚实的、信实的、“爱人如己”的心灵。

所谓“爱人如己”是指，在人类中间，在人与人之间，应当彼此有博爱的心。这种博爱的情感是，每一个人在心灵中应当关爱他人，就像关爱自己一样。

请注意这里，并非是否定、放弃我们自己的正当、合理的利益，而是强调，我们应当关爱别人，正如同我们关爱自己。换言之，这正是我们在本书开始之处所引用的圣经话语：“我们应当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上帝同行”。

弥迦书6章

6我朝见耶和华，

在至高的　神面前叩拜，当献上甚么呢？

我朝见他的时候，当献上燔祭，

当献上一岁的牛犊吗？

7耶和华喜悦千千的公羊，

或是万万的油河吗？

为我的过犯，我可以献上我的长子吗？

为我的罪恶，献上我亲生的孩子吗？

8世人哪！耶和华已经指示你甚么是善，

他向你所要的又是甚么；

无非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

谦虚谨慎与你的　神同行。

马太福音22章：

37他回答："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　神。38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39第二条也和它相似，就是要爱人如己。40全部律法和先知书，都以这两条诫命作为根据。"

____

上述两点原则【即，第一，人们必须由衷地有一颗愿意谨守、敬畏、顺服的心灵；第二，人们必须有一颗爱人如己的心灵】都与基督教信仰内容有着深刻的联系。

在这个世上有很多宗教信仰，其中又有许多迷信【即，以占卜性质观念看待世事与自然世界，并试图从中操弄、筹划，以期得到自己的属世利益；例如，风水、算卦、趋吉避凶、生辰八字、占星术、炼金术、交鬼、画符、拜拜并给神灵烧金纸、等等】以及偶像恶俗【即，把神灵物化为人手所作的偶像，例如金、银、石、木、泥像等等；或是用雕像来代替上天、神鬼；或是把信仰的对象当作是人臆想出来的、属世性质的对象、或是人出于自义自傲而杜撰的、没有诚实完整事实根据的玄学深奥之理，例如拜金主义，物质主义，玄学主义，等等；即，人以属世之利或是自己的自义、自己的心思意念为偶像】。

在这个世上林林总总的宗教信仰中，只有三个宗教信仰体系，有着强大的历史渊源背景、相对而言完整的理论支撑、比较完全的组织体系、以及正规宗教经典系统为核心内容。它们是，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体系，以可兰经为核心的伊斯兰教信仰体系，以及以系列佛经为核心的佛教信仰体系。以下我们引述一些简单的比较和反思。

++
++
++
++
++
++
++
++
++

【【【引述 《从金刚经说起》前言】】】

前言

世上的宗教有很多。然而，在世上许许多多林林总总的、千差万别的宗教信仰、以及相应文化传统中，成体系的、有详尽而系统化的宗教经书与教义为支撑的，有强大理论背景支撑的，能够构成一个相对而言完整神学、信仰理论体系基础的，——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宗教，或三个宗教体系，即，以圣经为中心的基督教信仰体系；以及，可兰经为中心的伊斯兰教信仰体系；还有，一系列佛经为中心的佛教信仰体系。

在本书中，我们以佛教经典中的一本最重要的核心教义性书籍《金刚经》为聚焦点（以后，我们也会讨论佛教经典中的其它重要典籍、书籍），从中分析、评介、剖析佛教的教义与思想，以及它在社会中、世人生命之中产生的相应影响。

无论是世上哪一种宗教信仰体系，它们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试图回答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信仰观。

所以，如果，我们要分析、评介、剖析一个宗教的精髓与核心体系内容，那么，我们就应当来仔细地、认真地看一看，它们在关于上面五个方面的观念中，是如何阐述的。

正如《世界佛教共识宣言》中所说，也正如几乎每一本佛教经典中的思想核心所表达的，——在佛教信仰体系中，并没有那样一位全能的、创造宇宙天地的、终极的造物主。

由于在佛教中没有造物主、或不相信有造物主，因而，这一特征直接影响到佛教在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等领域中的一系列深刻的理念与观点。这些理念与观点的特征往往是泛神主义哲学所共有的。

这些理念与观点的特征，就是：——在世界观上，它们往往把世界看作是

无珍贵价值、无隽永意义的，而不是把世界看为瑰丽、奇妙、意义深刻的。它们往往强调，世事无常，人不应当被世事羁绊，而是应当醒悟，看清世界与世事的虚无等等。在人生观上，它们往往把人的生命、心灵、位格等等看作是并无深刻价值意义的。

这种泛神主义哲学体系，由于没有造物主为中心的世界观、人生观，所以总是会指出，物质世界的虚浮性、不可倚靠性。然而，即使，这样的论点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错，并且是重要的；但是，它们却缺失了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它们不能看见世界被造的奇妙性、美丽性、智慧性，也看不见世人生命的珍贵与独特、心灵的奇妙、思想的可贵。人的这种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是宇宙世界中一种最为独特、奇妙、珍贵的能力与品质，是来自于造物主、创造生命之主自己的无限能力与完美品质；这样的能力与品质，正是道德的基础，是爱的根源。

总而言之，它们把人生、世事、价值等等，往往都看为羁绊人的东西，提倡要离弃、舍得、放下，而不是要有满腔热忱的、执著的向往、盼望与信念。

究其原因，无论是人们在思考世界观、还是在思考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信仰观的时候，如果离开了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全能之造物主，那么，世界就是冰冷、荒芜、混乱、无意义、虚浮的，而人生也就在本质上是苦的；因而，根据泛神主义哲学，这些就都应当被看破、看空、舍弃，放弃执著，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相。

在本书评析《金刚经》的过程中，我们会清晰地看见上述特征。

+++
+++
+++
+++
+++
+++
+++
+++
+++

【【【引述 关于伊斯兰教的综述】】】

《关于基督教信仰证据的反思》

世上存在的谎言，并不能证伪真理。许多人相信谎言，这恰恰证明了，世人生活在轻忽、自私、满了罪性与罪行的生命之中。世上存在许许多多的骗子，这并不表明，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诚实”这件事。

世上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们，常常用伊斯兰教为例，以此说明——：“一个广泛传播、被许多人相信的宗教信仰，并非只有基督教信仰一个宗教；因而，人们就并不能说明，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基督教信仰是真实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信仰或者都是真实的，或者就都是虚假的。”

所以，我们在本章这里，仔细分析，看一看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究竟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我们承认，伊斯兰教在历史上也是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就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到了世界上的很大一部分地区。我们也承认，穆罕默德的确是可兰经的著者（他或许有一两位助手帮助他写完此书）。我们也进一步承认，穆罕默德的确是一个非凡的人，以至于他能够以非同寻常的决心和毅力，把他的事业一直进行到底。我们也不否认，可兰经中讲述了很多关于上帝的完美性等内容，以及教导人应当道德高尚等。可兰经的语言看似优美，具有阿拉伯语的纯粹风格；这一点，许多伊斯兰教学者都同意，很多基督徒学者也都不反对。但是，穆罕默德声称自己得到了上天的特别启示；——关于这一点，却没有任何外在证据能够证实；并且，从可兰经的教义内容中，我们能够看见大量的证据，显明了，伊斯兰教绝非是来自上帝的启示。

为了让这一点能够得到更加清楚的说明，让我们公正无偏地考虑以下几项事实：

1. 关于穆罕默德的自我宣称，既没有任何神迹的支撑，也没有任何预言的证明。

事实上，穆罕默德经常性地被他的反对者要求提出确凿的证据，来显明他的身份与使命的真实性；但是，他总是以轻蔑的语气拒绝，并用一系列理由来推搪。可兰经里面写道："真主对穆罕默德说：——完全可以差遣你，让到地上来行神迹；但是，以前的国家民族用谎言败坏了神迹，所以，你只是一个传道者。""如果你行神迹，百姓不会相信你；因为从前摩西、耶稣、以及众先知行神迹的时候，百姓也弃绝了他们；所以，你不要行什么神迹。"

PALEY博士曾经列出了可兰经中至少十三处不同的地方，都以与上文相似的理由，来解释穆罕默德为什么没有行神迹的能力。的确，穆罕默德用很多华丽的辞藻，讲述了很多神奇的事情；但是，他本人却没有任何能力，来

施行哪怕一点神迹。所以，他一生的传道都是空口无凭的。

在穆罕默德去世几百年以后，他的追随者们假意讲述了一些穆罕默德所行的神迹；但是，这些事情不但没有任何见证（即，在事情发生的当时，见证人的见证），更是与可兰经的内容直接违背的；因为可兰经多次重申，穆罕默德没有行神迹的能力。并且，那些几百年后追随者们所编造的神迹，本身也没有任何深刻或重大的价值与意义，而仅仅是一些虚浮的、博人眼球、哗众取宠的事情；这些类似的事情，世上有很多迷信的风俗与赝品；比如，树木可以行走，石头可以向他打招呼，水泉可以说话，骆驼可以抱怨，羊肉说自己里面有毒，等等。

综上所述，伊斯兰教的教义本身中，并没有任何神迹的内容，而仅仅是一个自我谎称者的、空口无凭的宣称。所以，基督教信仰的教义，与伊斯兰教的教义有着深刻而本质的区别，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建基于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神迹（这是整本圣经内容的核心，是整个基督教信仰教义的中心与基础；此事有着深刻的价值和意义；有着斩钉截铁的、令人无可置疑的历史见证；基督使徒们为此而甘洒热血，走遍天涯海角传这和平的美好福音；整本圣经旧约，在跨越上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以令人无可推诿的清晰预言，证明了这件事情的历史真实性）；后者则没有任何证据的痕迹和影子；没有任何人能够显明，伊斯兰教教义是来自天上的启示。

2. 我们也可以从道德教导与特征的角度，来比较基督教信仰与伊斯兰教两者之间的不同。对此，我们有充足的历史和文献证据，能够显明我们的比较结果。耶稣基督是圣洁的、无害的、毫无罪污、毫无瑕疵；在他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罪性与罪行。基督的生命是纯洁的；即使基督的敌人，也无法找到他的任何罪与错。基督的生命，向我们展示了完美生命的榜样；他有着热忱的信仰，纯洁的爱心，柔和谦卑；这些无限美好的品格，都是世人所从未见过的。

穆罕默德的生命品格则与耶稣基督的生命品格完全不同，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穆罕默德的生命中，充满野心、淫欲、残忍、不公不义；他的生命中充斥着许多最血腥、最残暴的罪行。亵渎、撒谎、谋杀、通奸、淫欲、掠夺，等等这些事情，对于他来说，几乎都是每天发生的家常便饭之事。而为了给自己的行为辩护，避免其他人的效仿，他谎称自己的这些行为都是出于真主的直接启示、旨意。他无耻地宣称，是真主给了他那些特权，使他可以随意行那些丑恶的罪行。这些事情的数量如此大，如此令人震惊，以至于我不愿在这里过于详细地谈论它们的细节，免得它们玷污了本书的纸张，也免得玷污了读者的情感。

3. 对于一个公正不偏、心态诚实的人来说，可兰经本身的内容，与圣经新约的内容根本无法相比。可兰经的内容，基本就是一些所谓高尚情感、道德教导、宗法礼制的大杂烩、堆砌；其中也包含了许多匪夷所思、荒谬的

故事；处处显出谎言与自相矛盾的特征。穆罕默德自己也承认其中的内容包含许多矛盾；他自己对此的解释是，他的真主就是这样告诉他的；所以上一章的内容，有时在下一章就被否决掉。这种矛盾的内容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很难向一个穆斯林证明可兰经的内容是错的；因为他常可以找到相反的内容来为自己辩护。

可兰经的内容，并非是超出人的想象；它巧计地融合了当时阿拉伯地区流行的宗教信仰观念；它激励人心中的最强烈的、最暴戾的情感；它鼓励人的野心、权力、复仇、战争；它打开淫欲的大门；它宣称人们在天国可以得到这方面的、属肉体的奖赏；这些，都是为了引发人心中不洁的动机。它不鼓励、拒绝、甚至禁止人们自由地发问；它禁止人们进行任何教义上的反思、思索、自由讨论。可兰经中的那些优秀的部分，都是由于抄袭、模仿了圣经；而可兰经中那些不同于圣经的部分，即，那些穆罕默德按着自己的判断或想象而添加的内容，则充斥着虚假、敬虔、荒谬。

4. 穆罕默德传教的方式，与福音传播的方式完全不同，天壤之别。

如果，在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信仰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那么就是，这两者都在刚建立的短期时间内，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并且，两者都自从建立以后，就一直持续地存在下去，直到今日。

但是，当我们仔细认真地考察两者的传播方式的时候，就会更加惊讶地发现，两者之间不仅一点相似性都没有，而且甚至是完全相反，互相形成了鲜明对比。

穆罕默德在一开始传教的时候，的确想用劝服和计谋的方法；但是，他这样持续进行了十二年以后，收效甚微。前三年，他只有十四个门徒；七年中，他只有八十多门徒；十二年后，他从麦加逃走的时候，跟从的人数很少。

在这个时期的伊斯兰教的传播，与基督教信仰的早期传播根本没有可比性。基督教信仰的传播从一开始就是极其迅速的，如同闪电爆发一样，从天的一边照到另一边。在短短数年之内，没有什么属世的势力与权力的帮助，面对着重重阻力与反对的势力，基督教信仰却很快就传遍了罗马帝国的疆域，甚至传遍了当时已知世界的许多角落。但是，伊斯兰教却在十二年内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而且，与基督教信仰所针对的、文化程度高度发达的罗马帝国内的各地百姓（即，公元一世纪的罗马人不会轻信一个外来的信仰）不同，伊斯兰教在公元六世纪，即，在其开始建立的时代，所针对的是无知、轻信、没有什么文化的阿拉伯地区人民。然而，在这个期间，伊斯兰教的拓展却极其缓慢。

事实上，若没有刀剑，这个宗教信仰根本就不可能在人类的社会与历史中泛起一点涟漪。当MEDINA的居民开始支持穆罕默德以后，穆罕默德改变了他的整个计划；他正式宣称，要用武力的方式开始传教。从这时起，穆罕默德就变成了一个军事战斗家。他开始频繁地袭击、劫掠商队；当武力增长以后，他开始征服阿拉伯地区的一些部落、国家。有时，他会大规模杀死战俘，或是把战俘卖为奴隶。起先，他的命令是杀死一切不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后来，随着他武力征服的区域越来越多，他的命令逐渐变为："可兰经，或死亡，或上贡"。

不过，我们不要产生误解，不要错误地认为穆罕默德的征服区域极广；其实，在穆罕默德的有生之年，他的统治区域从未超出过阿拉伯地区，除了叙利亚的一两个省份之外。是他的后继者、哈里发们，用刀剑与火，把伊斯兰教的疆域扩展到亚洲以及埃及的部分区域。在这些拓展过程中，除了血腥的杀戮，还能有什么事情呢？

因此，虽然伊斯兰教的传播速度很快、范围很广，但是，这些都是通过刀剑、杀戮、血腥、征服而达到的；这与基督教信仰的和平温柔的传播过程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是凭靠野蛮的武力，后者是来自天上的祝福。

5. 伊斯兰教的教义内容，及其在人生命中所带来的影响，与基督教信仰内容和影响相比，完全不同、天壤之别。

不论基督教信仰传播到哪里，它都给所到之处带来祝福与温馨；那些真正贯彻实施基督教信仰教义原则的人，以及受到这些美好教义原则的影响的人们、国家、民族、或地区，都得到了极大的益处。如果我们放眼查看世界地图，就会清楚地看见，世界上的真正文明的国家、民族和地区，那些科学与文化发达、经济得到蓬勃发展的区域，都在哪里呢？什么地方，有真正的欣欣向荣的气象呢？相对而言，什么地方，有良好的道德风貌、和谐的社会秩序呢？穷人和受苦难的人，在哪里会得到最好的帮助、救济呢？人民在哪里能够得到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享有自由呢？妇女在哪里受到尊重，在社会中享有应得的、受尊敬的地位呢？针对年轻人的普及教育事业，在哪里得到最好的发展呢？人们在哪里最恩慈、良善、幸福呢？

显然，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以上问题的答案：——是在那些基督教信仰发扬光大、基督徒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有相对而言的很大影响力的地区。并且，在那些以基督教信仰为主的国家和地区，当地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全、自由、和平程度，与他们的基督教信仰的实质情况、敬虔的景况，有着直接的关系。

相反，我们如果仔细考察当今那些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地区，就能够清晰地看见，满目苍夷、民不聊生、极其荒凉的景况。在今天的中东地区，那曾经是艺术、文学、精致工艺都很繁荣的地区，现在早已凋零破败。许多古代的良好礼制都已经无影无踪。在中东各个国家中，到处是暴君与专制政权的铁腕统治；那曾经的安宁社会生活，已经变成了无知与奴役制度遍地的境况。

在伊斯兰教的统治下，各地禁止、或不鼓励教育、学识、做学问。人们不能自由地探索真理；国家的统治政权、伊斯兰教的统治，所要求于人民的，就是要像奴隶一样顺服。社会中没有正义；或是，正义常常被人们忽视。没有人享有生命与财产权的安全。伊斯兰教任何所及之处，人民就立刻失去了宝贵的自由。与此同时，整个伊斯兰教的传播运动就完全成为一个战争扩张的行为。根据可兰经，一个人最好的行为，就是为了伊斯兰教的扩张而投入战争；最高的荣誉，就是那些死于战争的人。无疑，可兰经的这些内容，直接导致了穆斯林的圣战士的战争原则，使他们在战争中不怕死亡；使他们期望在战场上战死，然后进入那个充满肉体血气满足之乐的"天国"。穆罕默德在可兰经中说道："刀剑是进入天国的钥匙。为了真主而流出的一滴血，在战场上睡的一晚上觉，超过两个月的禁食和祷告。死在战场的人，罪得赦免。审判日的时候，他的伤口将要铺满玫瑰，香气扑鼻；他的残臂断腿，将要换成天使的翅膀。"

然而，当穆斯林在各个地区的征服战争取得胜利、结束以后，他们的生活就成了慵懒、愚昧、昏昏欲睡的样子。当别的国家在艺术、文化、科技方面取得进步的时候，穆斯林各个国家始终陷入停顿的状态，停滞不前；甚至常常倒退。他们在文学、文化方面，在绘画、科学探索、文艺等方面，再也没有优势。他们的人民常常俯伏在暴君政权的统治之下，没有自由与个人的权利。

++

++

++

++

++

++

++

++

++

【【【引述 基督教信仰与伊斯兰教信仰的比较，以及基督教信仰对于社会生活与体制的影响】】】

基督教信仰给人类社会提供了什么

本章的题目主要局限于基督教信仰在人类社会道德方面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力。关于福音对于个人能力全面发展的巨大作用，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另外，关于福音对于人生命更深层次问题的深刻作用，我们则将要在本书最后一章专门论述。在本章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福音对于人类社会的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以及社会整体的生机勃勃、自由而团结的状态。这个题目虽然是局限在一定范围内的讨论，但仍然是一个极大的广泛话题。而且，这个话题在很漫长的历史中都曾引起了许多人的深思。在这里，我只想进行一些言简意赅的、初浅的论述。我的这些论述其实相比于前人的相关著作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颖的地方。如果说与前人的著作有什么稍微不同，那么我想，本章的文字大概更专门地针对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许多问题、缺乏以及所经历的很多具体事情。

我想要论述的一个重点是，关于人与人之间、乃至整个社会之团结状态的概念，在一个敬畏上帝的人群，与一个不认识上帝、不敬畏上天的人群之间，存在着极其巨大的差别。在后者而言，这些不认识上帝、不敬畏上天的人群所能够在一起组成的最好的团结状态，就是一个无中心的、散漫邋遢的“共和国”。在前者而言，那些认识上帝、敬畏上帝的人群在一起则会构建起一个“有坚固根基的城”、一个有良好核心、众志成城的“上帝的国

度”。

在我们考察基督教信仰与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来注意看一下基督教信仰中一些重要的抽象原则，然后再看其在基督徒们的教导中、以及生命中的应用与体现。

当我们讨论基督福音中的抽象原则、及其与人类社会道德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会立刻想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于人类社会的存在性与福祉而言，我们最缺乏的、最需要的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在福音的最根本层面的真理中，社会的存在性与福祉之所需，如何得到了满足？

人类社会的根本性需要，取决于构成社会的所有组成分子的需要。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每一个人都能够单独地站立，面对自我，面对上帝。然而这些个体性的人却生活在一个社会中，通过一个心灵的网络纽带，彼此连结在一起。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会通过一些外在的言语行为来彼此影响生活习惯，而且他们在内心的许多观念上也会受到整个社会群体的相当程度的影响与改变。他们互相影响的程度和力量，取决于社会的团结程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一个社会的良好而健康的状态，取决于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的自由程度与群体的团结程度之间的平衡。但是实际上，这个平衡点是非常难于达到的。即使在

理论上，我们也很难判断，个人自由与群体团结之间的完美平衡点到底应该在哪里。如果个人自由太多，则社会的状态会变得道德堕落、生活散漫邋遢。如果群体团结程度太多，则每一个人在其中的生活可能会非常压抑、束手束脚，人的幸福与创造力也会大大下降。当社会无法达到个人自由与群体团结两方面之间的平衡的时候，社会就往往会陷入周期性的动荡。个人自由散漫现象如果普遍地在社会中发生，社会就会逐渐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与堕落状态，并最终导致暴君专制主义的盛行，然后暴君专制又被新一代的无政府主义者推翻。这样，社会就会如此周而复始地陷入动乱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专制主义政府的统治机器是针对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的手术刀。但是，这个手术刀总是在病人的伤口上刻下更深的伤痕，使病人付出惨重的代价。

对于正常的、健康的社会福祉而言，必须同时需要有两个原则得到满足：自由的原则，与团结的原则。这两个原则的建立，部分地取决于政府的官方治理，部分地取决于人民的自由意愿。

一方面，对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来说，人们需要自由。自由的意思是，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一定的限度内、一定的范围内采取自由的选择和行动；以及，社会中的每一个由个体组成的社团、群体能够自由地行动和发展。

另一方面，社会的团结状态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稳定性是社会长久存在、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是社会团结状态得以维护的重要原则。社会稳定性的原则独立于、或先于，组成社会的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原则。

如果没有自由原则，就不可能有人的社会生活，因为人人都成了奴隶，自由思想也更无从谈起。如果没有稳定原则、或团结原则，社会就不可能延续下去。

一个完美的、或相对而言比较健康的社会形态，我们称之为“文明”。这个词本身就蕴涵着这方面的意思。在社会中，每一个个体都应当处事“文明”，享有自由、但要为集体做贡献，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为了社会的团结而愿意牺牲自己。

现在我们来思考，基督福音与上述两个根本性社会原则有什么关系呢？或者换句话说，福音向我们启示的社会生活之真正原则是什么？

无疑，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最重要内容就是，敬拜那位宇宙天地的造物主、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独一的永生真神。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是："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地爱主你的上帝"。"我们的生命、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的生命隐藏在他那里"。上帝的圣洁道德律法，要刻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人类的最好状态、最高理想、最大幸福，就应当是像上帝那样圣洁、公义、恩慈。显然，基督教信仰为上述社会两原则中的稳定性原则提供了重要的真理层面的支撑：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需要一个先于其自由意志之上的、社会成员所共有的道德基础。

有人会就此争辩说："即使社会中的人们不认识上帝、不敬畏上帝，也没有关系。如果我们观察人类社会的历史，会看见我们自己的良心所起到的作用。我们每一个人只要随从自己的良知，就足以维护社会的基础了"。

但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是社会"律法"的现实性。不论我们所说的律法是什么，总之，社会需要这样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来治理，而这些律法、或规章制度总是要限制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自由意志。这种社会统治的权柄与社会个人自由意志之间总是存在这样一种张力，不论两者之间哪一个大，哪一个小。

对于无神论主义者或泛神论主义者而言，这种社会律法的来源是宇宙自然

世界，或者基于人性自身的光景。事实上一般而言，无神论主义与泛神论主义【译者注：泛神论主义是指，认为世界本身就是神；这个世界之上并没有那样一位全能的、终极的、有着自由意志与自我认知的、自有永有的上帝、造物主。因而，在泛神主义者眼中，人在这个宇宙自然世界中，并没有什么终极层面的高贵性；人的自由意志、自我认知并没有什么本质层面的高贵源泉和永存价值】的理论家们，都往往是王权、专制政权的坚决推崇者、坚定拥护者、热烈鼓吹者，因为他们推崇社会的稳定要胜过社会的自由。在他们眼中，个人自由并没有那么珍贵，思想自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甚至，这些个人自由都会被看作是放纵与放荡的代名词；这些都可以为了社会稳定的原因而被裁减、践踏。这是因为，在他们眼中，人生命的意义并没有本质上的终极高贵性、尊贵性；在人与自然界宇宙之间的关系上，个人并没有什么特殊性【译者注：人的尊严，按着圣经中所述，是来自于上帝自己的尊严与荣耀，因为人的生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他们的所谓和平与稳定，是压制自由的结果。他们所推崇的统治常常导致社会中属灵状态的荒凉。他们的和平往往是一种扭曲的、徒有其表的外在和平。

对于社会大众而言，无疑，无论从历史来看、还是从理论上来分析，敬拜全能、全知、公义之上帝的信仰体系，能够给社会带来最坚固、最安全的稳定性环境因素。对于个人自由与意志的所划定的界限："你只能走到这里，不能再向前逾越"这样的律法，必须是在终极层面意义上来自那位有位格的、能听能看的全能者上帝自己的话语。个人思想与生命就像是大海中匍匐向前的海浪潮水。对这潮水的限制力量，必须是来自天上的力量，来自那位创造和管理宇宙天地万物的上天、独一的真神。

然而一神主义本身却并不一定能够使社会在稳定原则与自由原则之间达成平衡。【译者注：一神主义是指，信仰这个世界是由一位独一的真神所创造和掌管的。在人类历史中，一神主义的宗教信仰有三个主要宗教形式：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后两者的起源都与犹太教的圣经旧约经典有密切关系。伊斯兰教否定旧约圣经的主要部分，认为犹太人的祖先篡改了上帝的启示，于是穆罕默德就另起炉灶，另外创建出了伊斯兰教信仰】。这是因为，一神主义可能会导致人类社会生活中非常苛刻的管理，以至于达到完全排他主义的程度。比如，伊斯兰教的社会具有强烈的王权和专制政府的特点。在犹太教的社会中，这种专制倾向不那么严重，因为根据旧约圣经，"耶和华所膏的"人有君王、先知和祭司。君王负责国家政事，先知把上帝的启示向世人传讲，祭司则负责全国百姓与政府人员们的敬拜信仰和仪式。在以色列的所罗门王时代，这三个角色在某种程度上重合，结果导致百姓担负很重的轭。在地上的国家政权体系中，当君王、祭司、先知三个职事高度重合的时候，社会的统治权力就会很大，而社会中的个人自由就会受到很大挤压与压制。

而在穆罕默德的伊斯兰教、一神主义中，社会里面的每一个个人完全沦为绝对命运下的被动受体，因为所有人的自由意志都要无条件地完全服从于穆罕默德在国家政权中的统治权力。在伊斯兰教的一神主义下，"一神主义"的概念就成为完全的"真主凌驾世人"。在这样的统治下，每一个个人都是微小的、盲目的、软弱的、罪恶的。真主是至高无上的律法颁布者，是全能的法官。在每一个人的社会生活中，一切都要绝对服从真主的旨意。任何人都不能有任何质疑的权力。在这种一神主义统治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在外在言语行为上的服从与顺服，看起来是最重要的。人们不应当有，

也不需要有任何自由。在这样的一神主义社会中，个人的自由生活无法在社会的纽带关系中立足。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在政府绝对统治权力之下往往失去了权利与自由的空间，不再有活力和创造力。整个社会变成了一种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状态，直到下一次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政府权力与国王被推翻。然后社会进入下一个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周期循环。

有时，上述弊病也成为一些现代人反对基督教信仰的原因。他们认为，如果基督教信仰在国家政权中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国家社会也会像伊斯兰教社会那样，变得死气沉沉、没有活力、没有创造力，社会大众就会失去个人生活的自由以及思想上的自由。

但是，基督教信仰与简单的、伊斯兰教那样的一神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教义中，上帝的启示表明了，上帝与世人的关系不是“上帝凌驾世人”，而是“上帝与人同在”，即，“以马内利”。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上帝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使人有思想、有自由、有意志。正是在这样的基督教信仰核心教义中，人的自由才有了真正高贵的、终极的、本质性的根基。虽然人是软弱的，虽然人应当谦卑地承认和悔改己罪，虽然人不得不面对死亡的恐惧，但是，在人的生命本质当中，应当本有自由的属性。正是在这样的、与生命自由息息相关的、基督教信仰核心教义中，上帝才真正是世人的天父，人才真正是上帝的儿女。圣灵在人的心里面作工，不是把人当作无意识的机器，也不是把人当作被压制的奴隶，而是，圣灵净化我们的心灵与灵魂，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使我们由内而外地、由衷地、忠心地、自由地来到公义圣洁之上

帝的面前。福音的奥秘在于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与赎罪之祭。在福音中，包含着最令人震惊的事实与真理。保罗把这福音看作是上帝的奇妙大能，看作是基督教信仰最本质、最核心、最深刻的内容。人与上帝是朋友、是同工、是亲人、是至爱。这不是冷冰冰的、抽象的哲理，而是真实的、热忱的、生命的信仰。

这正是福音的奥秘与最迷人、最甜蜜的精髓，正如耶稣基督在圣经中所说的："你们必晓得真理，因为真理必使你们得到自由"。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世人的救恩，是使人得到自由的恩典之约，而不是使人处于被奴役之境地的律法之约。恩典之约使人真正地、衷心地愿意来寻求上帝、来遵行上帝的旨意和圣洁的律法典章，因而真正成就了、完全了上帝的律法。这恩典之约使人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为称义，因为人之所以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是因为自己有任何优点，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白白地赐下的救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使我们每一个愿意相信和接受他救恩之人的罪债被偿清，使我们的罪得到上帝的赦免和饶恕，因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之中得到真正的自由，得到永远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救恩的人是谦卑的，因为我们真心地承认自己本都是该死的罪人。这样的人是诚实的，因为我们必须要承认和悔改自己的罪。这样的人是真诚而热忱的，是自由的，因为不再有灵魂之中、罪恶权柄之下的奴役和羁绊。

正是在这样的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之下，我们才能够认识到，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应当拥有之自由的价值。这自由是尊贵的，是高尚的，而不是放纵

与放荡的代名词。正是在这样的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之下，在欧洲古代历史上，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度被逐渐废除了，中世纪的农奴制度逐渐消失了，以及在我们当代，美洲境内的奴役制度也这样被最终取消了。

请注意，圣经本身并不是一个直接的、解放人类奴隶制的“解放神学”，而是指出世人普遍的罪的光景，指出世人对于上帝的背离，以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福音救恩与大能。人灵魂所处的被奴役光景，真正根源不是外在的奴隶制，而是内在的、人生命处于罪的奴役之中的光景。每一个世人在其生命的本质中都有着倾向于罪的性质。这也正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恩所在。他使我们的生命脱离了罪的辖制和捆绑。我们的真正自由，其核心不是在于外面的、肉体上的自由，而是在于里面的、灵魂之中的、脱离了罪恶捆绑的自由，是脱离了死亡恐惧、有永远生命、天国盼望的自由，是能够过一个圣洁公义之生活的、热忱地爱上帝、完全地归向上帝的自由。

但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教义、福音之中所包含着的这种最根本的关于人生命之真正自由的思想，的确对于社会学中的个人自由具有重大影响和价值意义。这以生命自由为中心实质的教义，这以自由为基础的信仰、思想、行为、规范，是对任何专制政权、暴君统治、强迫压制、寡头政治、强奸民意等等社会暴虐法权机制的本质性的反对。

基督教信仰的这种特点，正是导致世上的那些想要奴役人民的政权讨厌、排斥、压制基督教信仰的原因。比如，TRAJAN以及MARCUS AURELIUS等等专制政权，都极力想要反对和排挤基督教信仰。在基督教历史上，在历世历代中，在各个国家的历史里面，都曾经有许多基督徒殉道者。这些殉道的事情，尤其发生在福音刚刚传到一个国家的时候，或是那里正在经受信仰上的逼迫的时候。每一位基督徒殉道者，从本质上说，都是为了自由而死的殉道者。他们为了坚持自己的谦卑而和平的信仰，为了心中所敬畏的上帝，为了在耶稣基督里所得到的恩典，为了对于上帝的爱，而宁肯丧失性命，也不愿放弃这宝贵的信仰。他们愿意在一切世事上温和地、和平地、恩慈地、勤劳、谨守地生活，愿意在一切世事上遵从在上掌权者，尊重政府权力和法律，遵守社会中的一切法律典章制度。但是在信仰之事上、属灵之事上，他们却绝不愿意在任何属世的权力面前卑躬屈膝、苟延残喘，绝不愿意听从人而不听从上帝。他们知道，有一个属天的、终极的律法赐予者，要远远地高于世上一切立法者；上帝的典章，要远远地高于世上一切的规章制度与法律。

这种既谦卑温和、又坚毅稳定的信仰，不仅仅是历史上那些无数基督徒殉道者们的信仰，也更是历世历代以来的、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普通平凡而真诚之基督徒的信仰。每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信仰都应是如此。这种信仰中包含着一种与世俗中的好勇斗狠的英勇主义完全不同的、谦卑温和的英雄主义精神。在这种英雄主义精神中，有着对于人灵魂自由的高尚本质的追求和尊重。在人的心灵土壤上，在人的信仰之中，只有上帝自己才能亲自来掌权。上帝以道成肉身的、舍命牺牲的、救赎性的爱，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因此，我们不能在这个世界上，以任何属世的人为我们灵魂之主。

在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革命；但至少在名义上，这些革命更多地是为了信仰的缘故，为了要真诚地、按着圣经所教导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为了信仰的自由，而不是完全为了属世的政治权利的自由。在一个国家的基督教信仰中，如果没有对于个人自由的尊重和重视，那么，这个国家可能就已经偏离了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真理。

所以，我在这里想要提出这个论述的结论和论点，即，基督教信仰是最适合人类社会健康蓬勃发展的宗教信仰，因为它不仅满足了一个正常健康社会所需要的团结稳定原则，也满足了这个正常健康社会所需要的个人自由原则。正是因着基督教信仰，社会才能够有真正的长治久安，因为人们在其中的生活可以生机勃勃、充满创造力、勤奋谨守、享有自由和尊严，但却不会滑入道德堕落、无政府主义、刁酸尖滑、彼此猜疑、毫无信任、好勇斗狠的混乱与败坏的深渊。当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渐渐失去基督教信仰、沉迷于饮酒宴乐、骄奢淫逸、彼此争斗不休的时候，就是他们逐渐走向败坏与崩塌的时候。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基督教信仰本身并没有在社会团结稳定原则与个人自由原则两者之间试图进行某种调和，或是给出某种明确的界限和公式。圣经福音书中，当有人来问耶稣基督是否要纳税的时候，耶稣给出了一个在

历世历代以来非常著名、人所熟知的回答。他并没有像许多人期望的那样，在什么是属世、什么是属天的事情上，划出一个明确的、楚河汉界一般的界限，而就是说："凯撒的当归给凯撒，上帝的要归给上帝"。当然，耶稣对那个具体问题的回答意思是说，应当纳税。但是从更广泛的角度说，在这一点上、在这方面的本质性问题上，耶稣基督的有限度的沉默，以及有限度的澄清，给了我们一个极其重要的教导。

无疑，在历史上我们常常会看见，基督教的教会、团体、会众要起来，以和平的精神，为社会公义而发声；在政府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上，常常需要挺身而出、为弱者呼吁、秉公行义、抵挡罪恶，无论这罪恶是来自高举稳定大旗的政府权力、还是来自高举自由主义的社会个人、甚至暴民。然而，无论基督教信仰、福音针对社会具体问题所采取的具体立场是什么，我们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那种具体立场本身，并不是永恒的价值原则，而仅仅是此时此地的、福音之永恒价值与原则的一个具体应用。只有福音原则本身才是永恒的。在福音中，既包括了对于自由主义的强调，也包括了对于集体主义、团结主义的强调。这两者虽然看似矛盾，但却都是重要的、高尚的，因为都是来自上帝的律法："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地爱主你们的上帝，并要爱人如己"。

更进一步说，究其本质，基督徒们的真正终极的归宿和盼望，不在于这个地上的繁荣与富强、或是公义与和平，而是在于天上的永远国度，那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的盼望，那没有死亡和眼泪、没有痛苦与别离的属天国度，那个与上帝同在的、永远的、真实的家园。所以，无论是贫

是富、是显赫还是卑微，基督徒们都能在这个世上和平地、谦卑地、忍耐地度日。基督教信仰不是遁世的信仰，而是积极入世的信仰；基督徒们要在这个世上作光和盐，发光发热，竭尽全力、毕其一生爱上帝、爱世人。然而同时，基督教信仰也不是以这个世界为归宿、倚靠、终极价值的思想体系。

所以，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中，基督教信仰都会把真正的福祉带给那个社会，并渐渐地也把个人自由和长治久安带到那里。无论是在稳定不动的东方，还是在活泼变化的西方；无论是在早期的、以家庭为单位与核心的、简单社会中，还是在现代的、复杂社会纽带所连接的、庞杂社会环境中；基督教都能够把人心灵所饥渴的、渴慕的信仰与精神支柱带给人。并且，因着基督教信仰的广传与普及，社会道德风貌得到大大提高，社会更加稳定和谐，人民同时享有更多丰富美好的自由。

如果，在历史中的某一个特定阶段，基督教只强调稳定原则或是自由原则中的一方，而不强调另外一方，那么很可能是因为，在当时的那种特定社会形态中，稳定与自由这两个原则因素之间不平衡，一方太大太多、而另一方太小太少。

在人类近现代历史上，我们常常看到的现象是，许多国家的社会随着个人

主义的解放而导致道德失序、社会混乱。但是，当那些国家的社会从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中经过重整、进入法律秩序状态中的时候，结果往往是，专制主义政权上台，公民自由被一扫而光。当今，在许多没有基督教信仰的国家中，或是许多明确反对基督教信仰的国家中，专制极权主义常常被当成针对社会淫乱放荡、混乱、失序、道德败坏的解药。他们的国家社会形态如同钟摆一样，在极权与放荡之间摆来摆去，总是不能停歇、不能有真正的长治久安。在他们的社会中，或是没有自由，或是没有稳定，二者总是不能兼得。

综上所述，基督教信仰对于人类社会有着极其重大的益处。从久远的历史层面来说，从漫长的时间见证来说，在人类历史中，只有真正的、以圣经为唯一根基的基督教信仰，才能给人类带来一个这样的社会：——既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自由、充满温馨博爱、同情弱者、鼓励强者、彼此平等、满怀热忱情感的社会；又是稳定繁荣、长治久安、和平安宁、不断奋进地进取的社会。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如此独具特点的基督教信仰，居然成为了千古以来无数哲人志士所苦苦思索的、一直找不到答案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极其惊奇诧异的事情。关于人类究竟应当怎样才能彼此和谐相处，历史上无数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都曾经对此思索不已。许许多多的人都在这方面有汗牛充栋的著述。世上也有许多流派和学院，不断在探讨这些事情。但是，他们或是流于一些象牙塔内的文字游戏、而对真实的社会影响微乎其微；或是导致一些说得比唱

得还好听、但做出来却尽是假冒为善的虚伪之辈所组成的社会。而基督教从诞生到发展，从卑微的开始到逐渐的增长，看似平淡无奇、和平温柔，却如此深刻地改变了无数世人的生命，改变了许许多多的国家、民族、与文化，这在我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神迹。没有什么，比这些历史更加坚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十字架救恩，我们永生与天国的盼望，等等这些教义，即使是最没有文化的文盲，最简朴的公众也都能够理解。我们如果否认这些教义，就不能理解基督教信仰在人类历史上的奇妙作为，不能理解教会的永存性，不能理解圣经的教导。

++
++
++
++
++
++
++
++
++

++
++
++
++
++
++
++

++
+++

让我们继续讨论和阐述，在自由贸易体制系统内，其中重要的两点前提性原则【即，第一，人们必须由衷地有一颗愿意谨守、敬畏、顺服秩序法规法律体系的心灵；第二，人们必须有一颗爱人如己的心灵】都与基督教信仰内容有着深刻的联系。

以圣经为核心基础的基督教信仰，对我们的教导是：——应当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地爱主，就是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无限全能、公义圣洁、慈爱恩典、无限智慧的、上天、上帝、造物主。并且，我们应当爱人如己。

人与人之间的爱，唯有是建基于我们与上帝之间的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爱的根基与源泉，是来自于神。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爱里面，既应当包含着，对于良善、公

平、正义、公义的追求和秉持，也应当包含着，对于罪恶的憎恶和离弃。我们的爱的本质，应当是憎恨罪，爱罪人。

哥林多前书13章：

现在我要把更高的道路指示你们。 1我若能说世人和天使的方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2我若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甚么。3我若把一切所有的分给人，又舍己身被人焚烧，却没有爱，对我仍然毫无益处。

4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5不作失礼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动怒，不计较人的过犯；6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7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8爱是永存不息的。先知的讲道终必过去，方言终必停止，知识终必消失。9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所讲的道也只是一部分；10等那完全的来到，这部分的就要过去了。11我作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想法像孩子，既然长大了，就把孩子的事都丢弃了。12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到那时就完全知道了，好象主完全知道我一样。13现在常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马太福音5章：

43“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44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45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46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甚么赏赐呢？税吏不也是这样作吗？47如果你们单问候你们的弟兄，有甚么特别呢？教外人不也是这样作吗？48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____

什么是良善？遵从那永生之神、上天、上帝、造物主就是良善。

什么是罪恶？悖逆那永生之神、上天、上帝、造物主就是罪恶。

上帝自己是分别良善与罪恶的根基与基准。分别善恶的终极权柄，唯有是属于神。他是道德律法的终极颁布者，更是道德律法的终极审判者。

人在内心中，若没有在上帝面前的真诚信仰、谦卑顺服，就也不会在他人的面前诚实、信实【宁肯吃亏也不愿说谎；宁肯吃亏也不愿违反规则与承

诺】，也不会在秩序、法律、规则、法规面前由衷地顺服、敬畏、谨守。【许多世人在这个世上之所以暂时表面上遵纪守法，仅仅是因为他们害怕受到世上法律的惩罚。如果有法律的空子，或是如果人们意识到，违反法律规则、撒谎、占便宜、玩弄规则等等不会受到立刻的、严重的惩罚，——那么，我们就会看见这世上许许多多人的内心真实光景如何；看见他们以欺谎、虚伪度日；看见他们肆无忌惮地破坏规则、玩弄秩序，毫无真诚敬畏之心。】

人在内心中，若没有在上帝面前的真诚信仰、倚靠、热忱，就也不会真正地爱人如己。在这个世界上，在一切被造的世人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无缺、没有瑕疵、没有罪污的。在我们的生命与心灵深处，充满着深刻的、本质性的罪性与罪行。我们对于他人的真诚之爱，唯有是建基于我们首先的、对于上帝的爱中。这正如，在一个大家庭中，弟兄姐妹（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都有着许多的缺点）之间的爱，首先是建基于他们对父母的爱。只有在我们心里对于上帝的热忱真挚之爱，才使我们有力量去真诚地饶恕别人、接纳别人。

____

在现代的世界，自由贸易是经济的基础与根本支撑。自由贸易的本质是整

个人类进行社会化大分工、大生产；在人类社会中间，各样不同的人群各司其职、各专其长、各尽其事，从而每一个人都能够为整个社会做出最大的、最高效的贡献。

在各种不同的、五花八门的劳动生产活动中，都往往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熟能生巧；即，如果我们大批量地专门做同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人类）就能够便于发明出极其快捷甚至高度自动化的生产模式，从而使得商品的成本变得极低、价格变得非常便宜。例如，今天的大规模汽车生产线工厂，可以平均不到一秒钟就能够生产组装完成一辆汽车，其背后的深刻原因正是在此。

在过去五百年来，近现代化工业文明，除了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诞生与爆炸性发展以外，其巨大成功的奥秘就是在于，自由贸易所导致的人类整体化的社会化大生产、大分工模式。

____

但是，上述的人类整体化的社会化大生产、大分工模式，必须依赖于良好运行的经济秩序与规则体系。否则，从长期而言，所谓自由贸易体系就是不可能的。

现代经济学中所常常忽视、甚至无视的，就是我们在本章前文中所阐述的重要前提性假设。那就是，在整个自由贸易体制系统内，所涉及到的人们、社会、各个国家，必须应当有着谨守和敬畏秩序规则法律法规体系的心灵，以及，必须应当有着爱人如己的心灵【在这些背后，就是公平、正义、公义、顺服、谦卑、敬畏与敬虔的信仰】。否则，所谓自由贸易，不但不会给人类带来福祉，反而会引发巨大的冲突甚至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有着很复杂的原因和许许多多的直接间接因素，但是，其中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德国体系与英法体系等等之间因贸易冲突而逐渐激化所导致的深刻结构性矛盾。今天，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冲突，随着中国得益于世界贸易组织框架而得到飞跃性发展、但却不愿意遵守许多承诺和世界贸易规则秩序，很可能会愈演愈烈，甚至导致战争。这种冲突，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政治经济背景环境，在某些角度，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源自于一个半世纪以前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经济理论与思想，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唯物主义历史观。它在一百年前开始在俄国付诸实践，并直接导致了世上许多的专政暴政，导致了数以千万计、甚至数以亿计的人类的非正常死亡【因专制统治者人为谬误国家政策而引致的大规模饥荒，以及数以百万计人被关进劳改营、集中营、监狱、强迫下放劳动、甚至被直接屠杀等等】，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甚至直到今天，在中国、北朝鲜、以及南美等国家地区，这样的思想仍然还很有市场、很有号召力，仍然得到许多人在内心的真诚信从。

那么，社会主义的错误根源在于什么呢？为什么它这样具有迷惑性，以至于在二战以后、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鼎盛时期，曾经席卷了世界上俄罗斯、中国、东欧各国、越南、北朝鲜、柬埔寨、古巴、南美洲【当然，许多东欧等国家往往都是在苏联的武力逼迫之下；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国家内部、包括曾经的东德内部，都有很多真心拥护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等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呢？甚至，直到今天，社会主义的思想，在西方高等学校的文科院系中，在西方左派政治势力中，甚至在西方（包括美国）的选举政治中，仍然很有市场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究竟在于什么呢？社会主义思想中，包含着真理吗？为什么？社会主义思想的致命性错误是什么？

____

有人说，在马克思主义与希特勒纳粹主义之间，有以下两个共同点。

____

第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否认、或远离对于上天、上帝、造物主的信仰；它们都推崇人自身的伟大性、光辉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劳动人民是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最光辉的。在纳粹主义中，日耳曼人民是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最光辉的。然而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上，由于它们所推崇的劳动人民或是日耳曼人民需要一个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代表、反映者，于是，它们就必然推举出一位伟人，来真实地体现它们的推崇对象。因而，它们的思想体系和政治实践都聚焦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以及不可避免的专制暴政。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和政治实践中，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卡斯特罗、金日成等领袖独裁人物。在纳粹主义思想体系和政治实践中，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希特勒这样的领袖独裁人物。

它们所诞生的文化土壤，都与其文化思想氛围中的无神主义影响有着深刻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德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纳粹主义思想的兴起，是德国十九世纪无神主义哲学兴起的直接结果。在十九世纪，当年在德国最优秀的大学中，盛行着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种族优越论思想、无神主义思想；以至于著名哲学家尼采在著作中写道："上帝死了"。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的德国主流哲学界，盛行着自然神主义、泛神主义思想【即，否定上帝的位格性，否定上帝是能听、能看、能言的，否定上帝的自由意志，或是把上帝与世界本身看为同等，或是把上帝看作是无知无觉、没有意志的一种超自然之理、意识流、规律、因果逻辑、等等；或者，认为——上帝在创造了世界以后就撒手不管了；除了用自然规律管理世界以外，上帝并不干预和涉入这个世界中的事务和自然现象；等等】。这些思潮【也包括德国以外、诸如法国思想界许多学者、英国学术界的一些教授，等等】，终于导致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及二十世纪上半叶突然流行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纳粹主义者。

正是因为他们在内心中离弃了那创造宇宙天地以及其中万有、创造世人生命的上天、上帝、造物主、那生命之主，那无限全能、全知、全在、全备，那能听、能看、能言的，那公义圣洁、恩典慈爱的上帝，那圣经中所启示的救赎主；——所以，他们才把心灵的眼目转向地上的被造之人，把对于政治领袖的个人崇拜，当作是自己的生命的倚靠、心灵之锚、心灵的归依。

在世人的心灵中有一个空洞，只有上帝自己才能填满。然而可叹的是，世人却常常离弃和悖逆那创造天地、创造我们生命的主，那道德律法的根源与终极颁布者，那对于世人生命之道德价值的终极鉴察者、终极审判者。这正是世人生命与心灵深处所充满的、本质性的、普遍性的罪性。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罗马书1章

1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蒙召作使徒，奉派传　神的福音。2这福音是　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预先所应许的，3就是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4按圣洁的灵说，因为从死人中复活，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的、　神的儿子。5我们从他领受了恩典和使徒的职分，在万族中使人因他的名相信而顺服，6其中也有你们这蒙耶稣基督所召的人。7我写信给各位住在罗马，为　神所爱，蒙召为圣徒的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　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

8首先，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大家感谢我的　神，因为你们的信心传遍天下。9我在传扬他儿子福音的事上，用心灵事奉的　神，可以作证我是怎样不断地记念你们，10常常在祷告中恳切祈求，也许我可以照着他的旨意，终于能够顺利地到你们那里去。11因为我很想见你们，好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定；12也使我在你们中间，借着你我彼此的信心，大家一同得到安慰。13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好几次预先定好了要到你们那里去，为了要在你们中间也得一些果子，像在其他的民族中间一样，可是直到现在还有阻碍。14无论是希腊人或是未开化的人，聪明的人或是愚笨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15所以，对我来说，我随

时都愿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16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　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17　神的义就是借着这福音显明出来，本于信而归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18　神的震怒，从天上向所有不虔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是向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19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　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20其实自从创世以来，　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21因为他们虽然知道　神，却不尊他为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22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23他们用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了永不朽坏的　神的荣耀。

24因此，　神就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作污秽的事，以致羞辱自己的身体。25他们用虚谎取代了　神的真理，敬拜事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事奉造物的主。他是永远可称颂的，阿们。26因此，　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原来的性的功能，变成违反自然的功能；27同样地，男人也舍弃了女人原来的性功能，彼此欲火攻心，男人与男人作出可耻的事。他们这样妄为，就在自己身上受到应该受的报应。28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　神，　神就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去作那些不正当的事。29这些人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心、阴险；满怀嫉妒、凶杀、好斗、欺诈、幸灾乐祸；又是好说谗言的、30毁谤人的、憎恨　神的、凌辱人的、傲慢的、自夸的、制造恶事的、忤逆父母的、31冥顽不灵的、不守信

用的、冷酷无情的、没有恻隐之心的。32他们虽然明明知道行这些事的人， 神判定他们是该死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也喜欢别人去行。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所推崇的伟大劳动人民，还是纳粹主义所推崇的伟大日耳曼人民，都显明了，世人在内心深处的自以为义、自高、自傲。

我们绝不是在这里说，劳动人民就不好，或是日耳曼人民就不好。固然，在劳动人民的身上，在日耳曼人民的身上，从世事的角度而言，有着许多美好的优点、品格、道德素养、聪明、富有才干、智慧、勤劳、等等。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而谦卑地认识到，从根本的本质层面而言，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任何人群、任何团体、任何阶级、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是完美至善的，都不可能是没有瑕疵与本质性罪污的；也都不应该被当作是一种心灵的偶像，供世人来顶礼膜拜。恰恰相反，在人类中间，我们彼此之间在本质上应当是平等的，应当彼此是弟兄姐妹，应当一同地把我们的心灵归向那公义圣洁、慈爱恩典的天父，应当单单地仰望和敬拜事奉他。

凡自高的，必降卑

马太福音23章

1那时，耶稣对群众和他的门徒说：2“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座位上，3所以凡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行和谨守，但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只会说而不去作。4他们把重担捆起来，压在人的肩头上，但自己连一个指头也不肯动。5他们所作的一切，都是要作给人看：他们把经文的匣子做大了，衣服的繸子做长了；6他们喜欢筵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7又喜欢人在市中心向他们问安，称呼他们‘拉比’。8然而你们不要被人称为‘拉比’，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老师，你们都是弟兄。9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父。10你们也不要被人称为师傅，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傅，就是基督。11你们中间最大的，必作你们的仆人。12凡高抬自己的，必被降卑；凡自己谦卑的，必被升高。”

————————

第二个共同点是，关于人类社会事务层面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之事，马克思主义与纳粹主义都认为，人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存在着一种深刻的、不可调和的、不可原谅的矛盾；这些矛盾，只能通过一方彻底地消灭另一方，来得到解决。

在马克思主义中，这种深刻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阶级斗争的矛盾。在纳粹主义中，这种深刻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种族斗争的矛盾。因而，马克思主义主张，全世界无产阶级要团结联合起来，进行本质性的、暴力性的社会政治革命，彻底地、暴力性地消灭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正如毛泽东先生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画画绣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而纳粹主义的种族灭绝行动以及专制暴政就更加令人震惊、举世皆知、臭名昭著，我们就不在此赘言。

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在世上其它思想体系、伦理系统或是宗教信仰体系（例如伊斯兰教等）中，我们也常会见到，——这种推崇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消灭敌人、打倒敌人的思想文化。这种思想文化，就像是在中国共产党员中有一段著名的话，说道："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上述思想文化的背后，包含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特征，即，在世上的许多道德伦理体系或是宗教信仰体系中，往往是"因行为称义"、而不是"因信称义"的。

所谓“因行为称义”是指，这样的思想体系认为，——人的道德价值，从终极性、根本性而言，是通过他的外在的、言语行为等等来决定的。

所谓“因信称义”是指，这样的思想体系认为，——人的道德价值，从终极性、根本性而言，不是因他外在的言语行为而决定的，而是因他在心灵与灵魂深处、对于上帝之救赎恩典的信靠，而决定的。

因行为称义与因信称义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就是在于，人究竟是自以为义，还是以上帝（以及他的救赎恩典）为义。如果人自以为义，即，人自己认为自己是正义的，自己认为可以凭着自己的力量、能力、道德、品格，而得到正义，甚至成为正义的化身，——那么，在这样人的内心深处，就必然是骄傲自高的。当人信奉因行为称义的思想文化、伦理体系的时候，人就会在行为上互相攀比、比较，并进而俾倪他人、藐视他人、甚至憎恨他人、互相争斗不息。

相比之下，因信称义的思想，不是以人自己的义为中心，而是恰恰相反，从谦卑承认和悔改人自己的罪性为基点，寻求和倚靠上帝的救赎恩典，完完全全地信靠上帝的救赎、饶恕与赦免。

罗马书3章

9那又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控诉过，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10正如经上所说：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11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　神的；

12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

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13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用舌头弄诡诈，

他们嘴里有虺蛇的毒，

14满口是咒骂和恶毒；

15为了杀人流血，他们的脚步飞快，

16在经过的路上留下毁灭和悲惨。

17和睦之道，他们不晓得，

18他们的眼中也不怕　神。”

19然而我们晓得，凡律法所说的，都是对在律法之下的人说的，好让每一个人都没有话可讲，使全世界的人都伏在　神的审判之下。20没有一个人

可以靠行律法，在 神面前得称为义，因为借着律法，人对于罪才有充分的认识。

21现在，有律法和先知的话可以证明： 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22就是 神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毫无区别地临到所有信的人。23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 神的荣耀，24但他们却因着 神的恩典，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25 神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是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为的是要显明 神的义；因为 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了人从前所犯的罪，26好在现今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又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27这样，有甚么可夸的呢？没有可夸的了。凭甚么准则说没有的呢？凭行为吗？不是的，而是以信心为准则说的。28因为我们认定，人称义是由于信，并不是靠行律法。29难道 神只是犹太人的 神吗？不也是外族人的神吗？是的，他也是外族人的 神。30 神既然只有一位，他就以信为准则称受割礼的为义，也要以信为准则称没有受割礼的为义。31这样说来，我们以信废掉了律法吗？绝对不是，倒是巩固了律法。

____

请注意，因信称义的教义思想体系并不是说，我们的行为就不重要。恰恰相反，我们外在的言语行为，正是我们内在真实信心的写照与表现。然而

从根本上、终极角度说，我们的义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更不是由我们的外在行为所决定和体现【否则人就在心中自以为义，自高自傲，俾倪、藐视他人，甚至憎恨他人、争斗不息】。我们的义，唯有是建基于上帝自己所赐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为我们所成就的、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信靠他之人的永生恩典。

雅各书2章

14我的弟兄们，人若说他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甚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15如果有弟兄或姊妹缺衣少食，16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那有甚么用处呢？17照样，如果只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信心就是死的。

18也许有人要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请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就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指给你看。19你信　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就连鬼魔也信，却是战兢。20愚昧的人哪，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没有用的吗？21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祭坛上，不是因行为称义吗？22你看，他的信心与行为是一致的，信心就因着行为得到完全了；23这正应验了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　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也被称为　神的朋友。24可见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仅是因着信心。25照样，妓女喇合接待了探子，又从另一条路把他们送走，不也是因行为称义吗？26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照样，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正是由于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因信称义的信仰，我们才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义，不是在于我们自己，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完完全全地在于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完全全地是出于他的圣洁无罪，出于他为我们而死、承担了我们所本应承受的罪债与刑罚、所成就的赦罪之恩典。因着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对我们的饶恕，所以，我们这些罪人的罪才得到赦免，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与他和好。因此，我们在任何世人面前，就无以自夸，更无法自以为义。因而，我们才深刻地知道，从根本上说，我们也应当以饶恕的心，去对待他人。

马太福音18章

21那时，彼得前来问耶稣："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多少次？七次吗？"22耶稣对他说："我告诉你，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23因此，天国好象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帐，24刚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下六千万银币的人来。25他没有钱偿还，主人就下令叫人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卖掉，用来偿还。26那仆人就跪下拜他，说：'请宽容我，我会把一切还给你的。'27主人动了慈心，把那仆人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28那仆人出来，遇见一个欠了他一百个银币的仆人，就抓住他，扼着他的喉咙，说：'把你欠我的钱还给我。'29那和他一同作仆人的就跪下求他，说：'请宽容我，我会还给你的。'30他却不肯，反而把他带走，关在监里，等他把所欠的还清。31其他的仆人看见这事，非常难过，

就去向主人报告这一切事情。32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个恶仆，你求我，我就免了你欠我的一切。33难道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好象我怜悯你一样吗？’34于是主人大怒，把他送去服刑，等他把所欠的一切还清。35如果你们各人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也必这样待你们。”

从上述马克思主义与纳粹主义的两点共同点的比较中，我们能够看见，其根本性的、本质性的症结就是在于，人在心灵与灵魂深处，背离、离弃了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上天、上帝、造物主，背离了那道德法则的终极基准与颁布者、那道德律法的终极审判者；因而，人在内心中自以为义；从而，人在面对世上他人的时候，————（1）或是以之为自己心灵生命的归依【即，对于领袖、对于权力的无限个人崇拜】，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专制独裁；（2）或是以之为自己的敌人、死敌，甚至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地对待敌人，直至彻底消灭对方，而心中没有本质性的谦卑、饶恕与恩慈的态度。

请注意，这并不是说，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就应当逆来顺受、与世无争、消极遁世。恰恰相反，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倚靠那天地之主、我们生命救主的人，应当以热忱而勤勉的人生态度，在这个世上努力地生活、去做好一切当作之事，而不应当慵懒懈怠、更不应当唯唯诺诺、胆小懦弱。我们应当努力地秉公行义，寻求正义，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

我们应当憎恨罪，但是要爱罪人。我们所争战的对象，不是世人，而是罪。在这个世上，我们所爱的对象，不应当是罪，而是罪人。

以弗所书6章

10最后，你们要靠主的大能大力，在他里面刚强。11要穿戴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能抵挡魔鬼的诡计。12因为我们的争战，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的和天上的邪灵。13所以要穿起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在这邪恶的时代里可以抵挡得住，并且在作完了一切之后，还能站立得稳。14因此，你们要站稳，用真理当带子束腰，披上公义的胸甲，15把和平的福音预备好了，当作鞋子，穿在脚上，16拿起信心的盾牌，用来扑灭那恶者所有的火箭；17并且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　神的道，18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随时在圣灵里祈祷，并且要在这事上恒久警醒，为众圣徒祈求。

马太福音5章

43“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44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45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46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甚么赏赐呢？税吏不也是这样作吗？47如果你们单问候你们的弟兄，有甚么特别呢？教外人不也是这样作吗？48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

现在，让我们继续思考，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与精髓，及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比较。

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是一种建基于无神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以及人类共同享有和均分财富的乌托邦社会思想。【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以地上的财富和国度为世人生命与心灵

的终极归依；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本书最后一章中讨论、阐述上帝之国与地上之国之间的异同与关系。】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子集，所强调的是：——社会经济财产分配原则，倾向于公有制、计划经济、平均分配、劫富济贫等等特征。

我们应当指出的是，社会主义思想并非是完全彻底错误的。其所重视的关于社会财产尽量平均分配、避免贫富分化过于严重、等等，是有其道理与价值的。事实上，西方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尤其是二战以后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就正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极其强调了避免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福利政策等。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西方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中，直到今天，一直有着强烈的造福于大众的主旨和内涵，这并非是受到什么马克思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而是受到自古以来基督教信仰思想的巨大推动和深刻影响。

公道地说，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避免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的内容，并非是错误的。

但是，社会主义思想与体制的致命错误在于，（1）过于强调集体主义、否定人的生命独特价值与人的生命自由；（2）思想控制与言论控制；（3）专制主义思想，邪恶与欺骗；（4）社会经济发展上的乌托邦主义，以及国家经济道路的荒谬性；（5）无神主义内核；否定公平竞争；平均主义、大锅饭；丑恶的社会管理机制与控制；思想层面、理念层面的空洞、荒芜、荒谬、谎言；统治者的自私、腐败、欺谎。

所谓资本主义是指，在一个经济体制中，通过经济资本的置配、自由流动、分配管理、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等等机制，促进社会经济整体的发展与高效化，从而为人类社会整体创造更大的物质性财富。

相对而言，社会主义是一个更大一些范畴的政治经济词汇，因为它不仅包

含了经济运作思想与原则，也包含了政治思想理念、社会思想理念体系等。在社会主义框架下，由于其对于集体主义的强调、对于个体主义的践踏和压制，因此，其政治思想理念与社会思想体系往往是专制独裁的，因而往往是邪恶、欺骗的；并且，它会千方百计地控制人们的思想，消灭个体的生命与思想自由，试图把所有人都变成国家机器上的某一个无知无觉的零件与螺丝钉。所以，社会主义往往与专制主义有着强烈的姻亲关系。

资本主义则往往具有民主主义的色彩，尽管两者之间并不一定严格划等号。资本主义往往是一个比较狭义的术语，仅仅包含经济运作范畴的含义，而不像社会主义这个术语那样，既包含了经济、又包含了政治性意涵。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由于其对于自由竞争、公平竞争、市场经济公开竞争的鼓励，因此，资本主义往往最终会强烈地倾向于民主主义制度，倾向于社会整体的公开化、自由化、民主化、去中心化、平民化。

然而请注意，正如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本身一样，资本主义本身并不一定具有道德好坏、善恶的意涵。

正如本书所开宗明义地指出的，民主制度本身并不一定适用于任何人民。譬如，在圣经创世纪中所记述的所多玛、俄摩拉，虽然看似是由主流民意所驱动的社会结构，但是，他们所行的事情却是恶事；他们所作的，在耶

和华永生之神的眼中是罪大恶极。严格地说，从长远、长期的稳定状态而言【而不是从短暂的、短期不稳定的状态来看】，民主制度是圣洁自由之民所进行自我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换言之，如果人民、百姓不是自由而圣洁的，如果人民中的大多数不愿意寻求真相、渴望真理，没有行公义、好怜悯的心灵，那么，在这样的人民中，所谓民主制度并不能长期地存在；在这样的人民社会中，即使短暂地出现民主政治制度形式，也会是昙花一现、很快会陷入无政府主义混乱喧嚣状态、并很快会因此被专制主义野心家政治集团和政治势力革命、篡权、推翻。这就是十九世纪法国革命中混乱喧嚣的历史，也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中混乱喧嚣的历史。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鼓励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公平竞争、资本自由流动的经济机制和经济制度，与民主主义政治制度一样，严格地说，从长远、长期的稳定状态而言【而不是从短暂的、短期不稳定的状态来看】，也应当是建基于自由圣洁之民所组成的社会体系之上。

这是因为，如果，在一个国家社会中，人民大多数成员在社会事务上、公共世事上都没有正直之心，不愿意行公义、好怜悯，——那么，若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利用、欺压、坑蒙拐骗、尔虞我诈、贫富严重不均。在这样的国家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就不能长久而稳定地运行；饥饿之民就会常常起来造反、打家劫舍，或是像马克思主义所煽动的那样，——政治集团利用所谓无产阶级来推翻资产阶级。

————————————

这正如，马克思在著名的《资本论》中的名言：“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的这句话，虽然是夸张的、偏颇的、别有用心的；但是，却也并非完全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

————————————

在这里，我们且不说马克思本人的不道德的私生活，也不说马克思理论体系中所推崇的狂风暴雨般暴力革命中的不义、不公、欺谎、罪恶、甚至邪恶，及其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和所引致的数以亿计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与苦难。而是，我们在这里指出，仅仅作为一个在整整一个多世纪中影响【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暴力征服与谎言欺骗的形式达到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思想意义上的影响性】了人类几乎四分之一人口的思想家，马克思【以及他所代表的、启发的无数后世思想家、知识分子们】的思想中的致命性漏洞和谬误。

的确，马克思正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缺陷与弊病；但是，他却无视、甚至故意忽视了，从十七世纪以来，一直到他所生活的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巨大益处和福祉。

马克思的思想既是浅薄的【因为它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缺陷与弊病的真正病根与医治之法】，也是偏颇的【因为它忽视、无视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带来的巨大益处；更重要的是，它没有看到，也并不深刻理解，这种巨大益处是来自于何处以及为什么，其本质原因和机理究竟是在于什么。换言之，它并不真正理解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公平竞争体制的本质精髓与益处所在】。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本质性谬误，也正是它邪恶所在之处，就是在于，它完全地误解了、谬解了、错待了，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究竟是在于什么。

马克思主义思想，就像是一个庸医，看见战场上一个战士的胳膊上中了箭伤，箭杆露在皮肤外面，箭头插在肉里面；于是，这个庸医拿出剪刀，剪断箭杆，并用一个锤子在那受伤的胳膊上狠狠地砸下去，让箭头在肌肉里

面陷得更深；然后，庸医自豪地大声宣布说，这个人的箭伤被治好了，因为露在皮肤外面的箭杆已经看不见了。

马克思主义思想正确地看见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某些弊病和缺陷，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却彻底地扭曲了、玷污了、糟蹋了文明的真正价值，彻底地毁坏了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个体生命价值本身是没有终极意义的；人的个体生命和价值，唯有能够在集体中体现、实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专制主义、国家集权主义、独裁主义、甚至纳粹主义异曲同工的本质原因】。

马克思主义决绝地宣称，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救赎主、也没有什么神仙皇帝。它公然地、厚颜无耻地宣告，无神主义思想是伟大的、光辉的。它欺谎地、诡诈地对世人说，这世上并没有什么救赎主、没有神仙皇帝，一切都只能靠自己；然而在政治现实主张中，它却剥夺人的自由与生命的高贵价值，把人置于思想奴役、身体奴役、经济奴役的铁链之下。

请注意，我们并没有在这里说，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是不好的。事实上，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重要优秀道德品质之一。但是，集体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必须建基于公平、正义、平等、公义、良善的基础之上，必须建基于公义圣洁的道德法则基础之上，必须建

基于我们对于那无限全能、公义圣洁、恩典慈爱的上天、上帝、造物主的信仰的基础之上。

当人在内心中离弃了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上天、造物主、上帝的时候，人就会迷失在世事的喧嚣之中，就会看不清人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究竟在于何处，看不见人的心灵与灵魂的隽永价值和意义。

当人在内心中离弃了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永生之神的时候，世人良心中的道德法则也就失去了隽永的价值和意义，真理就成为了强权的丫鬟，政权就成为了枪杆子的机器，国家就在本质上与黑社会无异。在死亡面前，任何以属世之事为根基和归依的道德说教，都是苍白的，甚至是滑稽的。

只有当我们看见上帝的全能与无限智慧，看见他的公义圣洁与恩典慈爱，我们才能够明白生命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是在于什么。

我们都不仅是被上帝所造的，而且是被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

的。——因此，在人的里面，有自我认知、自由意志的能力，有心灵和灵魂，有思想、智慧、意识、理性、情感、爱、等等的美好能力。

正是因此，人的生命与自由才是高贵的。

人的生命与自由是珍贵的，因为那本是能够指向永远的、圣洁属神的生命。

在这个被罪所充满的世界上，在世人生命的里面，都普遍性地、本质性地遍满了罪。在每一个世人的心中，都是背离神、不愿意寻求公义的；都是自以为义的，是自高而自傲的；都是在为了属世之利而活着，以属世之事为自己生命与心灵的归依。但是，那内心谦卑、看见己罪、承认己罪、并真诚愿意悔改己罪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马太福音5章

1耶稣看见群众，就上了山；他坐下之后，门徒来到他跟前，2他就开口教

训他们：

3“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4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5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6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7怜悯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怜悯。

8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看见　神。

9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　神的儿子。

10为义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11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12你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

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曾这样迫害。”

————————

在一个国家社会中，如果人们都是敬虔而真诚地信靠上帝，倚靠他的救赎与恩典，饥渴慕义，勤勉而公义圣洁地生活与工作，——那么，这样的国家中就根本不会出现马克思主义眼中所看见的那些资本主义的弊病和缺陷。

然而，在这个地上的世界是复杂的；我们在许许多多的世事中，常常看见好坏参杂的因素、泥沙俱下的局面。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也是如此。

一方面，在两千年的历史中，基督教信仰在思想与文化上，对于西方各个国家产生的深刻影响，早已经在许许多多历史记忆与文化土壤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整个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自由贸易经济的蓬勃发展，包含着深刻广泛的博爱之心，包含着对于社会全体大众、乃至全人类的巨大福祉。任何看不见这一点、或是故意无视、忽视、

蔑视、否认这一点的——人、思想、主义，就像是马克思主义一样，——不但是浅薄的、虚伪的、欺谎的、自私的，而且是罪恶的、邪恶的。

另一方面，虽然，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自由贸易经济的蓬勃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性利益与许多精神文化方面的福祉，但是，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这些近现代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经济、自由贸易经济、乃至现代民主主义制度，并非是终极的真理，并非是我们心灵的归依和倚靠。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无论是近现代科学技术、还是资本主义经济、或是自由贸易经济，当被应用于一个没有信仰、没有敬虔、没有敬畏的社会大众文化土壤中的时候，那么，它们所带来的，就很可能不是福祉，而是灾难，甚至是巨大的灾祸。

在满清末年、民国初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曾经喊出"德先生"【即民主】"赛先生"【即科学】的口号。他们以为，用民主和科学，就能拯救中国脱离愚昧、落后、黑暗、败坏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局面。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民主与科学本身，并不能向我们指明，人生命与自由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它们本身，也不能带给我们敬虔的信仰、良善的道德、恩慈的心灵、公义的信念。固然，现代民主主义的诞生，正如现代科学的起源一样【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一书】，与基督教信仰的文化土壤以及相应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等有着深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它们本身却不能代替：——那真正的、诚实的、真挚热忱的，对于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之上帝的敬拜与信仰。

____

单从经济制度角度而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自由贸易制度是好的，但它们必须应当被置于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法律、规则、体系之下。

这样的社会秩序、法律、规则、体系，应当是保障和重视人的生命与自由的。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应当是鼓励公平竞争、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的。但同时，它不仅是应当“行公义”的，而且更应当是“好怜悯”的；应当是注重避免社会贫富严重分化，避免贫穷百姓得不到照顾。

____

当年，在十六世纪下半叶、以及十七世纪，那些伟大的现代科学开启者们、基督徒思想家们，正是认识到了科学【即他们当时所说的自然哲学，

或第二哲学】的内在局限性【即，科学本身，应当是人以谦卑的心态对于自然规律与现象本身的、基于客观事实的、实事求是的研究，而不应当是：——（1）人凭着自己的骄傲自义之心所进行的主观臆想、（2）或是牵强附会的关于人生意义与自然现象之间关系的生搬硬套、生拉硬扯、人为地进行瞎联系，（3）或是占卜性质、“万物有灵”性质的臆测；——就像是占星术、炼金术、星座性格属相、或是亚里斯多德的主观臆想之宇宙论，或是中国的风水、算卦等等。————因为，关于人生命的终极价值和意义，是在于上帝自己的话语、启示和旨意之中，是在于圣经所启示的上帝之救赎恩典之中，是在于上帝所放置在世人良知之中的圣洁公义的道德律法之中】，从而深刻地批驳了罗马天主教廷所秉持的、与圣经本身没有关系的、古希腊罗马的亚里斯多德与托勒密等人的主观臆想、玄学主义等等试图在自然世界中赋予臆测性、占卜性、万物有灵涵义【就像占星术、炼金术、星座属相、或是中国的风水与算卦那样】之系列思想的根深蒂固的谬误，进而导致了现代科学思想体系与方法论的诞生和爆炸性发展。【详情请见《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一书。】

简言之，现代科学之开启的重要原因，正是在于那些现代科学开启者们、基督徒思想家们认识到了科学本身的内在局限性，才纠正了从前人们思想观念中的根本性错误与方向性偏差，从而导致了现代科学思想体系与方法论的起源、诞生与成功发展。这个重要原因，正是来自于、建基于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中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正是由于基督教信仰的巨大而深刻广泛的影响，才使许许多多的世人认识到，人生的终极价值和意义，应当到哪里去寻求；同时，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和研究自然世界，应当到自然世界中去寻找什么，——更重要的是，不应当到自然世界中去寻找什么。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才导致了现代科学体系的诞生、成功与发展。

与此类似地，现代民主主义制度，以及现代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自由贸易制度，它们的诞生、成功与发展，也是如此。它们的成功原因，正是在于它们首先认识到了它们自己的局限之处的本质在于什么。

现代民主主义制度的成功，正是因为它在制度体系化设计中，不是假设人是无罪的、无辜的，而是恰恰相反，它清醒地看到，在世人的心中，普遍地存在着罪性。因而，它在体系设计与规划中，处处尽量实现和体现权力分散化、制衡化、去中心化的原则，同时尽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尽量保障政府行政部门的有效性、有力性。

请注意，这并不与我们在本书的主旨中所反复申明的内容——“民主是圣洁自由之民在这个世界上进行自我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相矛盾。

一方面，一个成功的民主主义制度，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世人心中普遍的罪性，并从而在制度体系设计上不好高骛远、不好大喜功、而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权力制衡的规则化设计。

另一方面，一个成功的民主主义制度，必须建基于人民诚实的心态基础之上；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体系中，虽然，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被罪所羁绊，但是，在人民大多数成员心中，必须愿意寻求真理和公义，必须愿意看见己罪、承认己罪、悔改己罪，必须有饥渴慕义的心，有真诚与敬畏的情感。

现代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自由贸易制度、自由公平竞争制度，也是同样如此。

一方面，它们应当在公平正义的规则秩序体系的约束与制衡框架之下。另一方面，它们应当建基于人民普遍诚实的心态基础之上。

一方面，它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世人心中所普遍存在的、本质性的罪

【所以，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采取规则秩序体系与制衡机制框架】。另一方面，它们应当认识到，人生命与自由的高贵价值和意义【所以，尊重和推崇人思想与生命的珍贵价值和自由】。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等思想体系的致命性症结根源，就是在于，它们没有看到上述两个方面的精髓本质，因而望文生义地、彻底地误解了、扭曲了、歪曲了现代民主主义政治、现代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自由贸易制度、自由竞争经济制度。

更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等思想体系的致命性症结根源，就是在于，它们的出发点是完全错误的；它们的出发点，与现代民主主义政治、现代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自由贸易制度、自由竞争经济制度的出发点，是完全相反的。在上述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现代民主等政治经济制度完全南辕北辙。马克思主义等思想的出发点在于，假设人性是无罪的、无辜的，劳动人民是伟大光荣的；它们看见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的不完美，于是提出，彻底砸烂那些制度，重新建立一种建基于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所谓完美制度；然而，在这样的所谓完美制度中，却既不尊重人的生命与自由的高贵价值意义，也不明白，人生命与自由的真正珍贵意义，究竟来自何处。

上文所述，现代民主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自由贸易制度、自由平等竞争的经济制度之中，所包含的两个方面【即，一方面，它们应当在公平正义的规则秩序体系的约束与制衡框架之下（换言之，它们清醒地认识到人心灵中普遍存在的罪性）；另一方面，它们应当建基于人民普遍诚实、愿意寻求公义的心态基础之上（换言之，它们清醒地认识到人生命与自由所本来应有的高贵价值和意义）】，实际上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这同一个硬币的两面，都与基督教信仰有着深刻的关系，是直接地来自于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

这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既应当认识到，在世人生命与心灵深处所普遍存在的本质性的罪；也应当认识到，人生命与心灵本所应有的高贵价值和隽永意义。

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是创造我们的生命之主。我们都是上帝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因此，人的生命在这个宇宙天地之中，是最高贵的、最奇妙的。

圣经也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正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人的生命本所应有的圣洁与高贵价值意义，所以，我们才认识到，在现实生活中，世人常常说谎、占便宜、自私自利、冷漠无情、没有信仰与敬虔人生态度、等等，从本质而言，是多么地污秽鄙陋、罪恶不堪。

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良心之中都无可置疑地知道自己在本质上的罪污、欺谎、不义，所以我们才珍视那来自于上帝所启示的救赎恩典、圣洁信仰，更在内心深处为罪而忧伤痛悔、饥渴慕义，真心真意地愿意悔改己罪、完全归向我们的生命之主、救赎之主，得着那真正圣洁没有瑕疵的、能够直到永远的属神生命。

____

因此，我们在这里清晰地指出，现代民主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自由贸易制度、自由平等竞争的经济制度，正如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一样，——

它们之所以诞生，正是由于直接地受到了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文化土壤的深刻影响而导致的。它们是来自于上帝所启示的、那真实的、指出世人生命之罪、并赐下救赎恩典的信仰。

然而，我们却不应当把它们当作是我们思想的偶像，而是恰恰相反，应当深刻地、清醒地认识到，它们本身并不具有终极的价值和隽永的意义。它们绝不应当是我们的心灵所期盼、归依和倚靠的终极真理。它们绝不应当是我们所信靠的对象。

我们的生命、心灵与灵魂所期盼、归依、倚靠的对象，应当是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之主，就是那全能、全知、全在、全备的、至善至美的、公义圣洁、恩典慈爱的上帝。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的生命之主；只有在他那里，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只有在他那里，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良善与公义。他是我们的永生之神，是那属天国度的君王，是把饶恕与赦罪恩典赐给我们的伟大救赎者。他就是圣经里所启示的那位伟大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永生真神。圣经是他的完全而全备的话语、启示和旨意。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谦卑诚实地看见己罪、承认己罪、悔改己罪，真挚地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恩典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子民，是属乎天国的百姓，必将进入那无限幸福美好的永生国度之中。

==

自由贸易与社会分工

自由贸易经济的本质，是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精诚协作、共同生产、共同致富。自由贸易经济的成功正是在于，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化的大分工、大生产。在今天的经济产业链中，有数以亿计的、甚至更多的不同产品、零件、食品、用具、硬件、软件、服务。在整个人类社会中，一般性而言，每一个人都勤勉地工作，并专注于各自擅长的事项，从而在国家社会整体上，乃至在整个人类世界的国际合作中间，人们互相帮助、取长补短、精细分工、深度协作。

这种大规模的、大分工的社会机制所必需的，正是公平、正义、平等、公义的政治制度、秩序、法律、规则体系框架。固然，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完美的，也没有什么政治制度、秩序、法律、规则体系框架是完美的，但是，一般性而言，就主流性质来说，整个国家社会、乃至整个国际秩序，应当是基本上公平正义的，是互助互利的；一般性而言，人们应当基本上彼此诚信、信任、以善相待；人们应当以宽容良善的心、而

不是仇恨的心态看待彼此；——否则，从长期性、根本性来说，自由贸易制度就不会真的成功。

===

财富的定义

在人类经济体制中，如果人们在心底以此世的物质性财富为心灵的终极性归依，那么，人们就往往会为自己积聚财物、金钱、房屋等等；而不愿意走出去与人交换商品、或是消费商品、促进商品经济流通。从而，繁荣发达的自由贸易经济就往往不会发生。如果人们的心灵沉浸于积聚此世的物质性财富与黄金等等，如果人们在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中自满自足、裹足不前，以之为自己的心灵的归依、生命的归宿，而不思进取，那么，除非迫不得已，人们就往往不会愿意主动地去与他人进行分工合作，更不会想到去与异国他乡的人进行大规模产业协作。

因而，亚当斯密所开创的现代经济理论所作出的划时代贡献，正是让世人

看到，财富的定义，不是在于有形的、物质性的东西，而是在于生产物质商品的能力、生产率、知识技巧。换言之，财富不仅是一件关乎身体的事情，更是一件关乎心灵的事情。

正如本书上文所言，现代经济制度本身并不应当被我们看作是终极真理，因为它是有所局限的。如果说，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它对人类社会有益，那么，它之所以有益，其益处正是因为它来自于基督教信仰的文化土壤，并深刻地受到了基督教信仰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的某些正面性的、积极性的影响。正是因此，现代经济制度虽然是讲述自由贸易与自由竞争，但是，从一般性、整体性、主流性而言，它迄今为止并没有把西方世界拖入自私自利的彻底混战局面之中，而是相反，通过国家社会的大规模协作，使数量巨大的世人脱离贫困之境。

然而如果有一天，当人们忘记了上述这一点的时候，当人们离弃了敬虔真挚的信仰的时候，当人们心中的罪愈来愈泛滥，而不是谦卑真诚地悔改己罪、寻求公义、行公义、好怜悯，——那么，自由贸易等等现代经济制度，就会显明其深刻内在局限性，显明人心中之罪的丑恶，甚至给许多国家地区带来更深的冲突、混战与灾祸。

____

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财富：——不是那地上的财宝、那些必朽坏的东西；而是我们生命、心灵、灵魂中的那属天的品质，是我们在天上的基业与幸福，是天父上帝对我们的恩典、悦纳与恩赐。

+++
+++
+++
+++
+++
+++
+++
+++
++

【引述圣经 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语】

马太福音6章

19不可为自己在地上积聚财宝，因为地上有虫蛀，有锈侵蚀，也有贼挖洞来偷。20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天上，那里没有虫蛀锈蚀，也没有贼挖洞来偷。21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22眼睛就是身体的灯。如果你的眼睛健全，全身就都明亮；23如果你的眼睛有毛病，全身就都黑暗。如果你里面的光变成黑暗，这是多么的黑暗！24一个人不能服事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事　神，又服事金钱。

【马太亨利圣经注释】

19-24节

除了虚伪之外，另一个常常在人的灵魂中得逞的撒旦试探、诡计是——贪恋世界。没有什么其它事情，比“虚伪”和“贪恋世界”这两件事情，更能够经常地掩藏在表面敬虔信仰的面纱之下。所以，基督在上文中警告了我们关于信仰虚伪之人的事情以后，在这里继续警告我们，不可贪恋世界。我们必须不可像那些信仰虚伪之人一样；他们的根本性错误，其实就是：——他们把这个世界当作是他们的奖赏；他们所看重的，就是世人的称赞，就是属世的利益和好处。在我们选择财富、目标、主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这里的这两个罪——虚伪的信仰，以及贪恋世界的心。

I。我们应当以什么为我们真正的财富。一个人，总会在生命中、在心底深处，把一些东西当作是他的财富、他的份、他的倚靠。他会尽力地去积累这些财富，并把这些财富积累当作是为未来所需而进行的预备。传道书2章3节："我心里察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在我们的灵魂中，总会把一些事情当作是最好的事情；总会把那些事情当作是我们的喜乐、满足和倚靠。基督在这里所说的话，并不是要剥夺我们的财富，而是要指教我们，应当选择什么为我们真正的财富。

1.这里警告我们，不要把那些可见的、暂时的东西，当作是我们最珍贵的东西；不要把那些东西，当作是我们幸福的所在。不要为你们自己在地上积攒财宝。基督的门徒们已经抛弃所有、来跟随他；他们应当一直持守着这样的心态。财宝，是那些丰富的、在我们眼中极其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必须不能为自己在地上积攒财宝，就是说，——（1）我们必须不能把这些东西当成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最有价值的东西、最有用处的东西：——我们不能称这些东西为"荣耀"——就像拉班的儿子们那样。而是，我们要把它们看成是没有荣耀的东西。那真正的荣耀，远远超乎它们之上。（2）我们必须不能贪图这些东西的丰富，不能无止境地、没完没了地搜刮这些东西、加添这些东西。一个人如果把那些东西当成是心里的财宝，就会这样贪婪地去做。（3）我们必须不能信靠、倚靠这些东西，把它们当成是为我们的未来遮风挡雨、给我们带来安慰与安全感的东西。我们

必须不能对黄金说：——你是我的盼望，是我的心系所在。（4）我们必须不能在这些东西中得到满足；必须不能把它们当成是我们的渴望与祈盼。我们应当安于简朴，但不以这个世界为我们的分。这些东西不能是我们的慰藉（路加福音6章24节），不能是我们的喜笑和饱足（路加福音6章25节）。我们真正需要积攒的，不是这个世界中的繁华与财富，而是在另一个世界中的东西。在我们的面前，面临着抉择；我们努力积攒的东西，就是我们看为至宝的东西。我们应当智慧地作出选择；因为无论你为自己选择了什么样的东西，你自己也就成为了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知道、明白、思想，在我们的里面是何等大，我们的生命是何等长久，那么，我们就会看见，在地上积攒财宝是一件多么愚妄的事情。

2.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不应当在地上积攒财宝：——因为这些都是将要丢失和朽坏的东西。（1）这些地上的财宝，会从里面败坏。世上的财宝总是这样，被虫子咬，从里面锈坏。那些我们以为储藏得最稳妥的属世财宝，最后都会变得破败不堪。路加福音12章16、17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 传道书5章10-12节："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 雅各书5章2、3节："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注意——世上的财

物，在它们之中，有一个朽坏与败坏的律——它们总是逐渐枯萎凋残。（2）这地上的财宝，也会面临暴力的抢夺而失去。贼进来，会把财宝偷走、抢走。强盗、小偷的眼睛，总是会盯着那些积攒财宝的房屋和家庭；在这世上的任何属世的财宝之中，没有什么是真正能够安全稳妥的。我不应当把我的信心和倚靠放在属世的财宝上，即使它们看起来华丽炫目；不论这世上的财宝、虚荣、繁华，似乎能够给我们带来多少属世的暂时好处，我都应当轻看这一切——因为它们都是必将朽坏、轻易失去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上那些属世的、轻易会失去的、随时被抢夺的东西，当成是我们的财宝，那么，我们就真是太愚妄了。

3.我们应当把那些永恒的、属天的、不可见的东西，当成是我们的真正财宝，当成是我们最美好的东西，当成是我们的幸福、喜乐与荣耀。你们要在天上积攒财宝。（1）是的，在天上的的确确有财宝，是比地上的财宝更真实、更美好、更久远的。我们在天上的拥有，才是我们真正的财宝、富足、荣耀、与喜乐。我们的财宝，在神的右手中；神使我们成为圣洁与完美，也使我们的财宝成为圣洁与完美。（2）只有真正智慧的人，才知道应当在天上积攒财宝；勤勉地为天上的财宝而努力地劳作；我们应当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永生的确据，并把我们的幸福完全地倚靠在他的身上，仰望他的名；用圣洁的心，轻看这世上的一切——因为，这世上的一切，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与基督美好的救恩相比。我们必须坚定地相信，在天上有我们永远的幸福和盼望；并且，以那里的一切为我们的满足；不以这世上的任何事物为我们的满足和慰藉。如果我们是以那天上的东西为我们的财宝，并且勤勉地为我们自己积攒那天上的财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信靠神，相信他会安全稳妥地保守着我们的财宝。我们的一切心思、意念、渴望、情感、努力、勤勉，都应当是以那里为目标。我们不要被世界的钱

财所缠累；那些东西只会欺骗我们、压垮我们；而是应当积攒那真正稳妥的财富。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每一个真诚信从基督之人，在天上都有丰富的财宝；这是关乎我们的未来的永久归宿。（3）这是对我们的极大鼓励——我们在天上的财宝，是安全的。只有我们天上的财宝才是安全的。在那里，没有虫子咬；财宝不会朽坏；我们不会被欺诈；也没有人来偷盗或是抢夺。这是那天上的幸福，是超越时间的限制的；是不能朽坏的基业。

4.你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因此，我们对财宝的抉择，必须是正确而智慧的。我们的心意，生命的意义，都是取决于此的——或是属世的，或是属灵的；或是属地的，或是属天的。心总是跟随着财宝，正如向日葵总是跟随着太阳。财宝，是我们的价值和眼目的归宿，是我们的恋慕和情感的归宿（歌罗西书3章2节），是我们的渴盼与追求的归宿，是我们的目的与意图的方向，是我们的心所属的地方。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关切和顾虑也在哪里——是我们急切恳求、期望、相信、喜悦、朝思暮想的；是我们心里牵挂、割舍不下、得着慰藉、专注凝思、常常挂念的事情。箴言18章10、11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义人奔入，便得安稳。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在他心想，犹如高墙"。诗篇119篇111节："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 箴言23章26节："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 我们的心，应当是属于神的；我们的财宝，必须是在神那里；这样，我们的灵魂才能归向他。

这里所教导的关于财宝的事情，是与前面的警告教诲紧密相连的。我们的信仰，必须是真正的、真诚的；必须是寻求真神的，而不是寻求人的赞誉以及属世的好处。我们的财宝，就是施舍奉献、祷告、禁食，以及这些事情给我们所带来的赏赐。如果我们做奉献、祷告、禁食这些事情，仅仅是为了人的赞誉和称许，那么，我们就是在积攒地上的财宝，因为我们只看重这个世界中的利益与好处。这样做的人是愚妄的，因为，我们所贪图的别人的赞誉，就像是那些地上的财宝，很快就会朽坏，被虫子咬，（传道书10章1节），被别人偷走、夺去。诋毁和谤渎就是像小偷强盗一样，偷走我们为自己积攒的财宝——我们在别人眼里的名誉地位。若我们把心放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们的努力就终将是徒劳的。虚伪的人，在天上没有任何财宝（以赛亚书58章3节："他 们 说 ， 我 们 禁 食 ， 你 为 何 不 看 见 呢 ？ 我 们 刻 苦 己 心 ， 你 为 何 不 理 会 呢 ？ 看 哪 ， 你 们 禁 食 的 日 子 ， 仍 求 利 益 ， 勒 逼 人 为 你 们 作 苦 工 "）；当他们的灵魂被收去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资财能够带走，没有任何价值能够存到永远。（约伯记27章8节："不 敬 虔 的 人 虽 然 得 利 ， 神 夺 取 其 命 的 时 候 ， 还 有 什 么 指 望 呢 ？"） 但是，如果我们以真诚而正直的心，来奉献、祷告、禁食，并仰望神、渴盼他的悦纳，那么，我们就是在天上积攒财宝；在神那里，有记念册记录我们的一切（玛拉基书3章16节）；而且，将要有我们的赏赐。当我们来到死亡与坟墓的另外一面的时候，我们就必会得到安慰。虚伪之人的分，是在这个世界上（耶利米书17章13节）；然而属神的信实百姓，他们的名要记录在天上（路加福音10章20节）。神对我们的悦纳，就是我们在天上的财宝；这财宝是不会朽坏、不会被偷抢的。我们的财宝如果是积攒在神那里，我们的心如果是系在神的身上，那么，还有什么其它地方能更好呢？我们必将在神那里永远站立。

II。在我们的信仰中，必须警惕虚伪之罪，以及贪恋世界之罪。这里有两种人的眼睛，一种是好的，一种是不好的（22、23节）。眼睛是身体的灯——因为眼睛寻找、发现对象，并引领着身体的行动。如果没有身体的灯，那么，外面世界的光就对我们没什么用处。箴言15章30节：眼 有 光 使 心 喜 乐 。 好 信 息 使 骨 滋 润 。

1.你 的 眼 睛 若 了 亮 ， 全 身 就 光 明 。如果我们的眼目看重的，是良善之事，那么，我们的心就趋向于那些事情，我们的生命，就会在基督里有完全的光、确据和真诚；我们就会有良善的行为，如同光一样照在人前；我们的信仰在天父的面前，就是纯洁、没有玷污的。但是，如果心里面是罪恶、贪婪、苦毒、嫉妒、怨恨——这些东西常被描述为罪恶的眼目（马太福音20章15节）（马可福音7章22节）（箴言7章22节）——那么，我们的身体和生命就会是黑暗而昏花不明的；我们的言语行为中就会充满罪恶。以赛亚书32章6-8节："因 为 愚 顽 人 ， 必 说 愚 顽 话 ， 心 里 想 作 罪 孽 ， 惯 行 亵 渎 的 事 ， 说 错 谬 的 话 ， 攻 击 耶 和 华 ， 使 饥 饿 的 人 ， 无 食 可 吃 ， 使 口 渴 的 人 ， 无 水 可 喝 。吝 啬 人 所 用 的 法 子 是 恶 的 。 他 图 谋 恶 计 ， 用 谎 言 毁 灭 谦 卑 人 。 穷 乏 人 讲 公 理 的 时 候 ， 他 也 是 这 样 行 。高 明 人 却 谋 高 明 事 ， 在 高 明 事 上 ， 也 必 永 存"。　　如果我们里头的光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地大呢————如果，在我们里面的、本应该引领我们的那些良知、情感完全败坏了、失丧了，那么，我们的生命该是多么黑暗而可怕！

2.我们的眼睛，对应的也是我们对事物的理解和明白——我们的认知、判断、引导，等等。如果我们的眼睛了亮，如果我们有真诚而正确的判断，如果我们能够明辨是非——尤其是能够辩明，我们真正的财宝应该是在哪里——那么，我们的情感、行动就会得到正确的引领；我们就会有完全的、恩典的、安慰的光。但是，如果我们的眼目是邪恶的、败坏的、被世俗所羁绊的，那么，我们的世界观就会是错误的、昏花不明的；我们的心与生命就会充满了黑暗；我们的整个生命就会是败坏的。诗篇82篇5节："你们仍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了。"人的灵本应是为主燃亮的蜡烛；但是，生命如果昏花了，将是多么可怕。 以赛亚书5章20节："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

3.我们的眼目，也对应了我们人生的目的与目标。我们用眼睛来为自己设定当前目标、寻找前进方向；并专注地朝着那个方向努力。我们的眼目，引领着我们在信仰中所作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所追求的，总是我们眼睛所瞩目的什么东西或是事情。如果我们的眼睛是单纯而明亮的，那么，我们就能诚实地设定正确的目标，并正确地向着那个目标努力————我们会纯洁地、单单地仰望神的荣耀，寻求神的名、神的恩惠，在一切事情上都单单地倚靠他。这样，我们的眼目就是纯洁的。保罗说，我活着，是为基督而活。这样，我们的整个身体就是在完全的光中；我们所有的言语行为就会充满了恩典，讨神的喜悦，也令我们自己得到安慰。但是，如果我们的眼目是邪恶的，那么，我们就不会单单注目于神的荣耀，我们也不会得到神的悦纳；我们会看重人的称许与掌声————甚至，即使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当我们表现得想要荣耀神、寻求基督之事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深

处，却也仍然是寻求我们自己的荣耀和属世利益。我们的整个生命就会是败坏的、不安稳的；我们的根基就摇曳不定。在我们的心里，就会充满了迷乱和罪恶的心思意念。如果你里面的光昏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地大呢。在你的生命中，会有根本性的错误；你所作的一切，都会被这根本性的错误毁掉。目标，决定了行动。在我们信仰中最重要的事，就是确定正确的目标——哥林多后书4章18节："原 来 我 们 不 是 顾 念 所 见 的 ， 乃 是 顾 念 所 不 见 的 。 因 为 所 见 的 是 暂 时 的 ， 所 不 见 的 是 永 远 的 "。信仰虚伪之人，就像是风筝，虽然飞了上去，但是却被地上牵着，随时要落到地面。真诚的基督徒，就像是美丽而自由的云雀，在天空中飞翔得越来越高，把地上的事情放在脑后。

III。我们必须要小心警惕虚伪之罪、以及贪恋世界之罪；我们要谨慎地选择自己的主（24节）。没有人能事奉两个主。服事两个主的人，眼目不是单纯的。一个信仰真诚的人，会像诗篇123篇1、2节所讲述的那样——"坐 在 天 上 的 主 阿 ， 我 向 你 举 目 。看 哪 ， 仆 人 的 眼 睛 怎 样 望 主 人 的 手 ， 使 女 的 眼 睛 怎 样 望 主 母 的 手 ， 我 们 的 眼 睛 也 照 样 望 耶 和 华 我 们 的 神 ， 直 到 他 怜 悯 我 们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严厉而又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虚伪之人的欺谎。他们以为，可以在神与世界之间骑墙——既有地上的财宝，也有天上的财宝；既讨人的喜欢，又讨神的喜欢。这些虚伪之人说：为什么不呢？一石两鸟总是好的。他们期望，他们的信仰既可以给他们带来属世的利益，又给他们带来天国的利益。正如那个伪装的母亲，愿意把孩子分成两半；或是，像那个撒玛利亚女子，在偶像与真神之间踌躇。但是，基督说，不，这样绝对不行。提摩太前书6章5节："他 们 以 敬 虔 为 得 利 的 门 路 。"

1.这里，有一个非常一般性的、根本性的原则：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假如一个仆人有两个主人，那么，当这两个主人彼此一致的时候，仆人会高高兴兴地跟随着他们；但是，当这两个主人彼此分开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个仆人到底是属于谁的。他不可能同时爱两个主人、遵从两个主人、忠诚于两个主人。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这就是真实而实际的局面。

2.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玛门代表的是财利等一切属世的利益。腓立比书3章7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在这个世界中，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生命的骄傲，等等，都是玛门。对有些人来说，他们的玛门就是肚腹；这就是他们服事的对象（腓立比书3章19节）。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他们的玛门则是安逸、睡眠、运动、消遣（箴言6章9节）。有的人把世上的财富当作玛门（雅各书4章13节）；有的人把荣誉和进阶当作玛门；有的人把别人的赞扬和掌声当作是玛门，就像法利赛人那样。总之，自我、感官、世俗、等等，就是这个世界的玛门。我们不能同时又事奉这些，又事奉神。否则的话，世界的利益一定会与神相冲突、相争竞。基督没有说，我们必须不要，或是不应该事奉神和玛门。而是，基督说，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可以事奉这两个主；我们不可能两者都爱。约翰一书2章15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雅各书4章4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哪，（淫乱的人原文作淫妇）岂不知与世

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 我们不可能两者都遵从、都服事、都信靠、都事奉。因为他们二者是彼此矛盾的。神说：“把你的心给我”。玛门说：“不，把你的心给我”。神说：“你要满足于你现在已有的东西”。玛门说：“你要利用一切机会去抓取。钱，钱，你要不择手段地去获取财富”。神说：“不要欺谎，不要欺诈，不要说谎言。在你所说所作的一切事情中，都要诚实”。玛门说：“如果你能够得着什么利益，那么，连你自己的父母都可以欺骗”。神说：“要有慈善、慷慨的心”。玛门说：“你要抓紧自己的东西，不要给别人”。神说：“不要为各样事情而忧虑”。玛门说：“你要为每一件事情忧虑”。神说：“要谨守主日、安息日”。玛门说：“你要利用每一天来为自己赚取利益”。在神与玛门之间，是有着本质性矛盾的，因此，我们不可能两个主都事奉。让我们不要在神与巴力之间骑墙，而是要作出选择；你要单单地遵从神，并事奉他。

++

++

++

++

++

++

++

++

++

===

经济贸易与民主社会

在自由贸易经济体系中，往往需要的是自由、开放、平等、公平竞争的政治经济环境；这样，世上的人们才不会被人为的、逼迫性的政治权力所羁绊，而是各自发挥主动积极性，把自己所擅长的生产劳动、工作技能、服务技能做到最好。因此，自由贸易经济体制常常是与民主社会制度紧密相关、相辅相成的。

==

信仰，政治与经济

如本书前文所反复重申指明的，在一个公平、公正、平等、公义的政治经济体系背后，——对于那创造宇宙天地与世人生命之主的上帝的敬虔信仰，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上文所引用的圣经经文和马太亨利圣经注释告诉我们，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处于某种政治、经济制度中，但是，我们的心灵的真正归依，应当是上帝，而不是这个世界以及其中的属世之利。我们所真正服事的对象，应当是神，而不是玛门。我们所应当事奉的，不应当是自己的财物，而应当是我们的生命之主。我们真正的财宝，不是在这个地上，而是在那永远的天上。我们的生命，应当是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地爱主我们的神，并要爱人如己。

===

===

==

。。。。。。。。。。。。。。。。。。。。。。。。。。。。。。。。

。。。。。。。。。。。。。。。。。。。。。。。。。。。。。。。。

。。。。。。。。。。。。。。。。。。。。。。。。。。。。。。。。

。。。。。。。。。。。。。。。。。。。。。。。。。。。。。。。。

。。。。。。。。。。。。。。。。。。。。。。。。。。。。。。。。

。。。。。。。。。。。。。。。。。。。。。。。。。。。。。。。。

。。。。。。。。。。。。。。。。。。。。。。。。。。。。。。。。

。。。。。。。。。。。。。。。。。。。。。。。。。。。。。。。。
。。。。。。。。。。。。。。。。。。。。。。。。。。。。。。。。
。。。。。。。。。。。。。。。。。。。。。。。。。。。。。。。。
。。。。。。。。。。。。。。。。

社会契约、人生价值与目的

==

教会与社会

基督教会是上帝百姓子民的集合体。社会是世上人群的集合体。在这两者之间，一个是上帝之国度，一个是地上的国度。在地上可见教会中，有时，也常会有虚伪之徒。在世上万国之中，有神所呼召的、必将要属他的人。那全知的永生之神，知道每一个属他的百姓子民。

教会是神的百姓、上帝子民在地上的见证。在人类历史上，基督教会对于无数的国家社会、对于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和塑造作用。在这方面，有无数的事例。比如，一些简单的例子包括，今天，在我们生活中的一夫一妻制法律【不到一个世纪以前，在中国、以及世上许多其他国家，一夫多妻制还是一件合法的事情，而且还是一件让很多男人感到羡慕和荣耀的事情。直到今天，在中东、非洲等许多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地区，一夫多妻制还仍然非常流行，因为伊斯兰教的可兰经明文允许人可以同时娶四个妻子。一百年前，在中国古代的许多个世纪历史中，中国妇女还裹小脚；直到西方传教士在一个半世纪以前进入中国，并大声呼吁阻止这样的事情，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改变】、公共医院体系【现代医学的诞生本身，以及公共医院的建立、医护院校的建立、等等，都是在基督教会的推动下而导致产生的。在中国，所有的医院门上都有红十字的标记，因为中国的公共医院系统的建立是始于西方传教士来华所建立的】、公共教育体系【一百多年前，在中国还没有公共教育体系，没有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小学、中学、大学。中国的小学、中学、大学教育体系，一开始都是来自于一百多年前西方来华传教士所首先创立的诸多学校。在西方国家历史上，小学、中学、大学的建立，也都是由于基督教会的直接推动而导致的】，等等，都是来自于基督教会的大力推动和影响。

事实上，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也是从基督教会开始的。自从十六世纪初马丁路德所代表的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以来，在基督教会内部组织结构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革新。基督教会的组织形式从天主教体系内的各级主教与神职人员所组成的金字塔式组织治理结构，逐渐演变为基督徒弟兄姐妹之间彼此平等的会众主义组织结构。在今天的基督教会中，例如浸

信会、卫理公会、长老教会等体系内，教会的执事、长老等组织结构人员基本上都是由教会的会众选举产生的。这种教会组织结构的变革，最终深刻影响了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导致了现代民主主义制度的建立。【例如，读者可以参考《五月花号之天路者的故事》一书，从中可以看见美国的最初起源。】

以弗所书5章

22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象顺服主一样，23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好象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24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照样凡事顺服丈夫。25你们作丈夫的，要爱妻子，好象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26为的是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27可以作荣耀的教会归给自己，甚么污点皱纹等也没有，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28丈夫也应当这样爱妻子，好象爱自己的身体一样。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了。29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好象基督对教会一样，30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31为了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32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33无论怎样，你们各人都要爱自己的妻子，好象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应当敬重丈夫。

==

契约与联合

在一个社会中，人们彼此相处在一起，就像是互相以契约的形式，共同处于一个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之下。这种社会契约，是建基于彼此信任、诚信、公平正义的基础之上。从根本上说，社会契约的根基，是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仁爱，更首先是在于人对于上帝的敬畏与热爱。我们人生的目的与终极价值，不是在于地上的荣华，而是在于得到上帝的悦纳，进入那无限幸福美好与永生的国度之中。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只有当人与上帝和好的时候，人与人之间才可能真正地和好。只有当人的心中对上帝有敬畏的时候，人与人之间才可能有真正的诚信。只有当人得到了上帝的饶恕恩典的时候，人与人之间才能够真正地彼此饶恕、包容与原谅。

==

社会契约论

当我们认识到信仰的真正价值与意义的时候，当我们明白——应当怎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怎样持守和见证我们的信仰、怎样面对世事、怎样与人相处、怎样思考社会与人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认真地思考，社会政治组织形式与制度中的一些重要而基本的原则是什么，并在社会制度层面上，进行科学而仔细的设计与规划。

卢梭所著的《社会契约论》描述了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些基本运作原理和原则。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究其根本而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真正根基，应当是爱。只有在爱的基础上，人们才能彼此包容、饶恕、接纳、信任、合作、协调。人与人之间，本应当是弟兄姐妹。这样的弟兄之爱，唯有是来自于上帝的恩典慈爱、圣洁公义。

===

人怎样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应当以热忱的信仰与生命，荣神益人。我们应当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地爱主我们的神，并爱人如己。我们应当在一切事情以及言语行为中，仰望我们的造物主、救赎主。我们所作的一切事情，都应当是为了归荣耀于神。因此，我们应当爱人如己，应当尽一切力量与生命，见证上帝在我们生命之中的恩典与大能。

+++
+++
+++
+++
+++
+++
+++
+++
++

马太福音5-7章

1耶稣看见群众，就上了山；他坐下之后，门徒来到他跟前，2他就开口教训他们：

3“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4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5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6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7怜悯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怜悯。

8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看见　神。

9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　神的儿子。

10为义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11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12你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曾这样迫害。

门徒作盐作光（可9:50；路14:34~35）

13“你们是地上的盐；如果盐失了味，怎能使它再咸呢？结果毫无用处，唯有丢在外面任人践踏。14你们是世上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隐藏的；15人点了灯，不会放在量器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16照样，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又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

论律法

17“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完成。18我实在告诉你们，就算天地过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全部都要成就。19因此，无论谁废除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这样教导人，他在天国中必称为最小的；但若有人遵行这些诫命，并且教导人遵行，他在天国中必称为大。20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就必不能进天国。

不可恨人（路12:58~59）

21“你们听过有这样吩咐古人的话：‘不可杀人，杀人的必被判罪。’22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向弟兄发怒的，必被判罪。人若说弟兄是‘拉加’，必被公议会审判；人若说弟兄是‘摩利’，必难逃地狱的火。23所以你在祭坛上献供物的时候，如果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对你不满，24就当在坛前放下供物，先去与弟兄和好，然后才来献你的供物。25趁着你和你的对头还在路上的时候，要赶快与他和解，免得他抓你去见法官，法官把你交给狱警，关在监里。26我实在告诉你，除非你还清最后一分钱，否则决不能从那里出来。

不可动淫念

27“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不可奸淫。’28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看见妇

女就动淫念的，心里已经犯了奸淫。29如果你的右眼使你犯罪，就把它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被丢进地狱里。30如果你的右手使你犯罪，就把它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进到地狱里去。

不可休妻（太19:9；可10:11~12；路16:18）

31"又有这样的吩咐：'人若休妻，就应当给她休书。'32可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如果不是因她不贞，就是促使她犯奸淫；无论谁娶了被休的妇人，也就是犯奸淫了。

不可发誓

33"你们又听过有这样吩咐古人的话：'不可背约，向主许的愿都要偿还。'34可是我告诉你们，总不可发誓，不可指着天发誓，因为天是　神的宝座；35不可指着地发誓，因为地是　神的脚凳；不可指着耶路撒冷发誓，因为它是大君王的京城；36也不可指着自己的头发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或变黑。37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不可报复（路6:29~30）

38"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以眼还眼，以牙还牙。'39可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对抗，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另一边也转过来让他打；40有人要告你，想拿你的衬衫，就连外套也让他拿去。41有人要强迫你走一里路，就陪他走两里。42有求你的，就给他；想借贷的，也不可拒绝。

当爱仇敌（路6:27~28、32~36）

43"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44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45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

儿子；因为他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46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甚么赏赐呢？税吏不也是这样作吗？47如果你们单问候你们的弟兄，有甚么特别呢？教外人不也是这样作吗？48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1“你们小心，不要在众人面前行你们的义，让他们看见；如果这样，就得不到你们天父的赏赐。2因此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到处张扬，好象伪君子在会堂和街上所作的一样，以博取众人的称赞。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3你施舍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4好使你的施舍是在隐密中行的。你父在隐密中察看，必定报答你。

如何祷告（路11:2~4）

5“你们祈祷的时候，不可像伪君子；他们喜欢在会堂和路口站着祈祷，好让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6但你祈祷的时候，要进到密室里去，关上门，向在隐密中的父祈祷。你父在隐密中察看，必定报答你。7你们祈祷的时候，不可重复无意义的话，像教外人一样，他们以为话多了就蒙垂听。8你们不可像他们，因为在你们祈求以先，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你们的需要了。9所以你们要这样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你的名被尊为圣，

10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一样。

11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

求你今天赐给我们；

12赦免我们的罪债，

好象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

13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

救我们脱离那恶者。’

14如果你们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15如果你们不饶恕别人，你们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禁食不让人知

16“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伪君子那样愁眉苦脸，他们装成难看的样子，叫人看出他们在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17可是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18不要叫人看出你在禁食，只让在隐密中的父看见。你父在隐密中察看，必定报答你。

积财于天（路12:32~34）

19“不可为自己在地上积聚财宝，因为地上有虫蛀，有锈侵蚀，也有贼挖洞来偷。20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天上，那里没有虫蛀锈蚀，也没有贼挖洞来偷。21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里面的光（路11:34~36）

22“眼睛就是身体的灯。如果你的眼睛健全，全身就都明亮；23如果你的眼睛有毛病，全身就都黑暗。如果你里面的光变成黑暗，这是多么的黑暗！

不要为明天忧虑（路12:22~31）

24“一个人不能服事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事　神，又服事金钱。25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甚么喝甚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甚么。难道生命不比食物重要吗？身体不比衣服重要吗？26你们看天空的飞鸟：牠们不撒种，不收割，也不收进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牠们；难道你们不比牠们更宝贵吗？27你们中间谁能用忧虑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28何必为衣服忧虑呢？试想田野的百合花怎样生长，它们不劳苦，也不纺织。29但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最威荣的时候所穿的，也比不上这花中的一朵。30田野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投进炉里，　神尚且这样妆扮它们；小信的人哪，何况你们呢？31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该吃甚么？喝甚么？穿甚么？’32这些都是教外人所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33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34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1“不可判断人，免得你们被判断。2你们怎样判断人，也必怎样被判断；你们用甚么标准衡量人，也必照样被衡量。3为甚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木屑，却不理会自己眼中的梁木呢？4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弟兄说：‘让我除掉你眼中的木屑’呢？5伪君子啊！先除掉你眼中的梁木，才可以看得清楚，去除掉弟兄眼中的木屑。6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免得牠们用脚把珍珠践踏，又转过来猛噬你们。

祈求就必得着

7“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8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9你们中间哪一个人，儿

子向他要饼，反给他石头；10要鱼，反给他蛇呢？11你们虽然邪恶，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难道不更把好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吗？12所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

13“你们当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14但引到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路6:43~44）

15“提防假先知！他们披着羊皮到你们当中，里面却是残暴的狼。16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里怎能摘到葡萄？蒺藜里怎能摘到无花果呢？17照样，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18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19凡是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被砍下来，丢在火中。20因此你们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21“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入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22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难道我们没有奉你的名讲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过许多神迹吗？’23但我必向他们声明：‘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听道要行道（路6:47~49）

24“所以，凡听见我这些话又遵行的，就像聪明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盘石上。25雨淋、水冲、风吹，摇撼那房子，房子却不倒塌，因为建基在盘石上。26凡听见我这些话却不遵行的，就像愚蠢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沙土上。27雨淋、水冲、风吹，摇撼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厉害。”

28耶稣讲完了这些话，群众都惊奇他的教训。29因为耶稣教导他们，像一

个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经学家。

+++

+++

+++

+++

+++

+++

+++

+++

++

===

人生的价值与目的

【引述：马太亨利圣经注释序言】

信仰是真正有价值的事情；认识、热爱、敬畏我们的造物主、神，并在我们一切的事情、行动和交谈中以热忱的情感仰望他，遵守他的诫命（传12：13）；无疑地，这才是一个人的全部意义；这是一个人的全部价值所在。在《传道书》中的许多讲述之后，得出的最后结论，就在于此；所以，我也把这个原则当作是整件事情的根本基础。一般性地，这是对一切人类所必需的；这世上如果没有信仰，那么，人的荣耀也就无处得以保守；人类社会的秩序也根本无法得以保持。具体地，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也必需要有敬虔的信仰；否则，我们就无以回应我们受造的目的所在，无以回应我们造物主对我们的恩惠，我们的内心也不会安稳轻省，更永远也不会有幸福。一个人，被造物主赐予了心灵和理解的能力，能够明晓、服事、享受自己的造物主；但是，如果他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眼目和心中却全然忘记了神，那么，他就是日光之下的一只最可鄙、最可悲的动物。

==

上帝之国

约翰福音18章36-38节：

36耶稣回答："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世界，我的臣仆就要作战，使我不至被交给犹太人。不过，我的国不是这世上的。"37于是彼拉多问他："那么，你是王吗？"耶稣说："我是王，你已经说了。我要为真理作见证，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上。凡是属于真理的人，都听我的声音。"38彼拉多问他："真理是甚么？"

【马太亨利圣经注释】

基督在接下来的回答中，对彼拉多的前一个问题，即"你是王吗"作了更完全和直接的回答，解释在什么意义上他是王，但不是在任何方面危及罗马政府的王，不是一位世俗的王，因为他的利益不是用世俗的方法支持，约18:36。请留意，

[1.] 对基督的国的本质与构成的叙述：它不属这世界。这是用否定的说法纠正当前人对它的错误看法；但这隐含了肯定的事，它是天国， 属于另外一个世界。基督是一位君王，有一个国，但这国它不属这世界。第一，它不是从这世界兴起；人的国从海里从地中上来（但7:3；启13:1,11）；但圣城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启21:2。他的国不是通过继承，选举或征服而立，而是藉着神旨意和计划直接和特别任命。第二，它的本质不是属世界的；它是在一个在人心里的国（路17:21），建立在他们心里和良心里（罗14:17），它的财富是属灵的，它的能力是属灵的，它一切的荣耀在于内。

基督国中的国务大臣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林前2:12,。第三，守卫和支持它的不是这世上的；它的兵器是属灵的，它不需要、也不使用世俗的势力来维持和扩展，也不是用与列王和各省有害的方法治国；它丝毫不干预君王的特权或他们臣民的财产；它不是为了改变在世俗之事方面任何国家的建制，除了罪和撒但的国以外，不与任何国作对。第四，它的趋势和目的不是这世上的。基督不追求，也不容他的门徒追求地上的尊贵人的排场和权柄。第五，它的臣民虽然在这世上，却不属世界；他们从世界中蒙召被拣选，从另一个世界生，往另一个世界去；他们既不是这世界的学生，也不是它的宠儿，既不受这世界智慧的规管，也不因这世界的财富致富。

[2.] 提出基督的国属灵本质的一个证据。如果他要反抗政府，他就会用他们自己的武器反对他们，就会按同样性质以暴制暴；但是他没有走这条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我的国被他们败坏。"但是，第一，跟从他的人没有提出要争战；没有暴动，没有拯救他的企图，虽然此时城里满了加利利人，他的朋友和同乡，一般他们都有武装；但在这重大时刻他门徒和平的表现足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第二，他没有命令他们争战；并且他禁止他们争战，这证明他既不依靠世界的帮助（因他本可以传召十二营天使为他服务，这表明他的国是从上头来的），也不惧怕世界的拦阻，因为他非常愿意被交给犹太人，因为他知道，他的国要是推进和建立，任何世上的国就会如何被毁；所以他正当地得出结论，现在你可以看到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在这世界，但不属这世界。

(5.) 他回答彼拉多进一步的提问，就更直接加以回答，约18:37，我们在当中看到，[1.] 彼拉多直截了当的问题："这样，你是王吗？你说你有一个国；到底你是谁，你是王吗？对这样的宣告，你有什么说法？你自己解释吧。"[2.] 作为对此的回答，我们的主耶稣在本丢彼拉多面前作美好见证（提前6:13）："你说我是王，就是，按你说的，我是王；因为我来给真理作见证。"第一，他承认自己是王，但不是按照彼拉多所指的意思。弥赛

亚是按照王，弥赛亚王的身份受人期待；所以，他向该亚法承认了他是基督，就不会面对彼拉多，不承认他是王，免得他似乎自己前后不一。请注意，虽然基督取了奴仆的形象，但即使这样，他仍有充分根据宣告拥有王的尊荣与权柄。第二，他解释自己的话，表明他如何是王，就是他来给真理作见证；他通过真理的大能在人心中作王。如果他要宣告自己是世上的王，他就会说，“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作万民的王，征服诸王，占有诸国；”不是的，他来作见证，见证创造世界的神，见证反对败坏世界的罪，通过他见证的道，他建立并维护他的国。圣经预言他要作万民的见证，并且作为这样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赛 55:4。基督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这世界诚实少见（赛59:15，Qui nescit dissimulare, nescit regnare — 人不能作假，就不知如何作王），而是属于真理永远作王的那世界。基督到世上来的使命，他在世上的工作，就是给真理作见证。 1. 启示真理，向世人显明关于神、他的旨意和他对人的美意，约1:18；约17:26，而没有他给真理见证，人是不可能认识这一切的。2. 证实真理，罗15:8。通过他行的神迹，他为信仰的真理，神的启示、神的完全和护理的真理，以及他的应许和约的真理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通过如此行、他是王，建立起一个国度。(1.) 基督的国的根基和权柄，精义和特征，是真理，属神的真理。当他说，“我是真理”，他实际上是在说，我是王。他用真理那说服人的证据征服；他用真理命令的权柄统治，为真理，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诗 45:4。他要用他的真理信实审判万民，诗96:13。真理是他国的权杖；他以慈绳吸引人，以向我们启示，因对他的爱被我们接受的真理吸引人；就这样他将人心意夺回顺服。他到世上来乃是光，就像日头用光线作王一样作王。(2.) 这国的臣民是属真理的人。被神的恩典从说谎人的父的权势下拯救出来，所有被改变来领受真理，服从真理的权柄和影响的人，都要听基督的声音，要成为他的臣民，要相信他，真正忠心于他。每一个对真信仰有任何真认识的人，都要接受基督教信仰，他们属于他的国度；使用真理的大能，他要使他们甘心，诗90:3。所有爱真理的人，都要听基督的声音，因为除了在基督里，哪里都

找不到更伟大、更美好、更确实和更甜美的诸般真理，真理和恩典由他而来，因着听基督的声音，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约壹 3:19。

(6.）彼拉多为此向他提了一个好问题，但不等回答，约18:38。他说，“真理是什么呢？” 说了这话，又出来。

[1.] 肯定这是一个好问题，是向一位无人比他更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发问。真理是那颗重价的珠子，人的悟性愿意并追求要得到它；因为不得到它，或至少那被认为是真理的，悟性就不能歇息。当我们查考圣经，领受神话语的事奉，这查考一定要这样询问，真理是什么呢？并带着这祈求，求你带领我进入你的真理，进入一切的真理。 但是很多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并没有足够的耐心和坚持，在他们对真理的追求中坚忍到底，或者没有足够的谦卑和真诚，在找到真理的时候领受，提后3:7。就这样，许多人面对他们自己的良心，问良心这些不可缺的问题，“我是谁？”“我做了什么？”但却不花时间寻求答案。

[2.] 不肯定彼拉多问这个问题有何目的。第一，也许他说这话，就像一个开始对基督有好感，带着某种敬意看他的人那样，为要学习，希望了解在信仰和学问方面他可以进一步有的新观念，自称可以有怎样的进步。但虽然他希望从他那里听到一些新的道理，就像希律希望从他那里看见一些神迹一样，但在他门口祭司们的暴徒的喧嚷和大怒，让他不得不突然中止这谈话。第二，一些人认为他是作为一名审判官说这话，进一步查问现在被带到他面前的这案情：“让我看看这神秘的事，告诉我它有什么真理在其中，这件事真实的情况。”第三，其他人认为他是讥笑着说这番话，是一个嘲笑的人：“你说到真理；你能说什么是真理吗，或者给我一个真理的定义？”就这样他取笑永远的福音，大祭司仇恨和逼迫，基督现在为此作见证和受苦的那伟大真理；他就好像喜欢讥笑所有信仰的无信仰之人那样，对双方发出嘲笑；所以基督不回答他。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但是，虽然基督不愿告诉彼拉多真理是什么，他却已经

告诉了他的门徒，并且通过他们告诉了我们，约14：6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7如果你们认识我，就必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看见了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